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ISSN 3079-4552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编辑出版: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1卷11期
2025年12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办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出版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编辑部
编辑部邮箱 xk@wisvora.com
投稿地址 www.wisvora.com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总编辑 陈科存
副总编辑 梅见华 孙文杰

编辑委员会

李兆祺	林鑫	苏天	穆艾伟	熊森浩
刘伟伟	吕憬岩	黄少安	刘宇	叶明裕
陈曦	景瑞宾	崔健	王正威	李泽宇
姚金芳	李明蔚	吴钰双	穆尚海	曹一君
陈立立	舒波	袁臣辉	郝澳茹	

版权声明

文章版权由文章作者与维思沃尔出版社(WISVORA Publishing)所有。单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 所刊载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进行许可。根据该许可协议, 任何第三方在明确署名原作者与出处的前提下, 均可对本刊内容进行复制、传播、演绎使用, 无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个别授权。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已获得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许可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专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 旨在为学者提供研究支持, 并促进知识的共享与应用。研究院通过出版学术期刊、举办学术会议及提供政策建议, 推动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对话与合作。

网址: www.hks.ac.cn 邮箱: info@hks.ac.c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电子出版 ISSN 3078-4387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维思沃尔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蒲岗景福街99号启德工
业大厦8楼D07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国大陆引进
北京中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大陆运营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微信扫一扫

维思沃尔出版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文化与文学研究

- 文化认同视域下胶东武术符号体系的思政隐喻多维解析 - 商昌敏 - 1-5
- 文化翻译观视角下典籍英译研究——以《颜氏家训》为例 - 陈海龙 - 6-11
- 文旅融合视域下凉山彝族婚俗活态传承的创新途径研究 - 王叶兰, 张卓然, 马文琼, 沙马阿依木, 邓景 - 12-17
- 雪中取火: 抒情的双重境界——论周梦蝶的诗歌思想 - 高若栋 - 18-24
- 非遗跨越文化中舞蹈元素的传承与研究 - 钱湘芸 - 25-28
- 高校文物保护建筑的可持续利用策略研究——以四川大学华西校区为例 - 陈逸璇, 蒋宝晴, 樊梅 - 29-33

教育理论与实践

- 文化资本理论视阈下传统文化融入“五育并举”体系的实践研究 - 方梦麟, 董芳远, 颜同宇 - 34-38
- 以学习为中心的《学前儿童发展科学》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 孙思洁, 刘 丽, 张文莉, 高雯吴钰 - 39-42
- 奥尔夫教学理念在幼儿园打击乐活动中的应用——以大班打击乐“布谷鸟”为例 - 朱姝 - 43-45
- 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师教学中的困难与优化措施 - 丁嘉仪 - 46-50
- 赋能专业课堂: 混合式翻转教学在临床康复学中的融合路径研究 - 王岑依, 焦欣荣 - 51-55
- “双师型”教师培训需求与人力资源规划的关联性研究 - 商昌敏 - 56-61
- 高等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建模思想的改革路径探析 - 王慧颖, 吴振兴, 于晟伟, 曹琳 - 62-67
- 职业教育与增值性评价探究 - 徐硕, 赵靖蓉 - 68-72
- 新《职教法》背景下中职好老师的核心素养重构研究 - 赵靖蓉, 徐硕 - 73-77
- 从现代性困境到自然回归: 大学生户外运动的存在论意涵探析 - 杨晨飞, 但懿, 蒋梦溪, 白鸥 - 78-82
-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外语教师数字能力现状及人口学变量考察 - 谭铭元, 杨国强, 董晓瑜 - 83-89
- 以科学思维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杨耀焱 - 90-93
- 基于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双师课堂实践模式构建——以小学语文精读课为例 - 傅欣 - 94-98
- 提升宿舍安全保障大学生就业: 新质生产力的挑战与机遇 - 葛蕴仪, 庞鑫鑫 - 99-102
- 党建引领下研究生“又红又专”实践育人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 葛茹 - 103-107
- 区块链 3.0 背景下教师课堂教学方法的探究 - 赵映霞, 何丽梅 - 108-113
- 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应用型高校教师评价策略研究 - 柳仪 - 114-118

社会与治理

- 新时代提升政党治理能力的内在缘由、主要挑战及实践路径 - 任江东 - 119-122
- 百千万工程驱动下高校服务地方文化传播的机制创新——基于 TTM-2.0 模型的分析 - 董芳远, 颜同宇 - 123-126
- 从国家基石到战略选择: 奥地利中立政策的演进与挑战 (1955-2025) - 王国璋 - 127-132
- 不完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困境与出路 - 赵超 - 133-138
- 长三角地区人口出生率预测研究 - 尤艺霖, 张宸豪 - 139-143
- 中国陪诊师行业的兴起、挑战与规范化发展路径综述 - 祝壮壮 - 144-148
- 医学人文视域下亲情化陪诊服务模式的构建与实践路径 - 祝壮壮, 冀艳云 - 149-152
- 高校青年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与成效研究——基于“数智助农, 文化筑魂”项目的分析 - 葛茹 - 153-158
- 马锡五式工作法对司法助力乡村法治建设的当代启示 - 王鑫雨, 李哲 - 159-163
- 从碑刻看清代凉山地方治理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 - 彭文欣 - 164-170
- 粤港澳大湾区 AI 法律诊所的应用研究 - 陈军艳, 周聪宇, 黄峻 - 171-176
- 政策工具视域下养老服务的协同治理框架——基于区域老龄政策文本的实证研究 - 丁惠炯, 陈熙惠 - 177-186

经济与管理研究

- 广东省家具出口贸易的竞争战略研究 - 胡乐琼, 赵映霞 - 187-192
- 地方应用型高校审计质量提升策略研究——基于异常审计费用与科研创新双重视角的实证检验 - 宣晓旭 - 193-197
- 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发展策略研究 - 李莹莹 - 198-202

传媒与艺术研究

- 设计可持续性的重要性——以贝聿铭设计理念为例 - 张宇欣, 施可欣 - 203-207
- 新中式服装: 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 姜懿芯, 房婷钰 - 208-211
- 多维审美: 张大千传记纪录片美育价值研究 - 陈矿 - 212-216
- ATI 模型——解构艺术定义的工具 - 马傲 - 217-220
- 老年护理场景: 适老化康复辅助服饰的功能优化与设计实践研究 - 赵一璇, 张松 - 221-225
- 迷因化城市传播的媒介逻辑——以哈尔滨冬季旅游“热”为例 - 贾仕海 - 226-230
- 媒介化视域下摇滚乐歌词重构策略研究 - 邢新宇, 孔祥伟, 孟庆天, 苏爱民 - 231-236
- 哈尔滨植物造景的地域特色与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 王熙媛, 周权 - 237-243
- 中国语境下《好东西》的女性叙事及其凝视话语重构 - 李春裔, Low Yong San - 244-248
-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野下主旋律影视剧反类型化叙事与美育价值研究 - 陈矿 - 249-253
- 北魏神龟三年 (520 年) 李僧智等造佛石像碑研究 - 王颖 - 254-258

文化认同视域下胶东武术符号体系的思政隐喻多维解析

商昌敏

(烟台文化职业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3)

摘要: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胶东武术符号体系进行解析。研究认为, 胶东武术的文化特点突出体现在实用导向的技法原理、建构完整的拳种谱系、地域文化互鉴的武术风格以及哲学与军事思想的融贯实践; 胶东武术文化符号可解构为物质符号系统、行为符号系统、精神符号系统; 其思政隐喻的机制主要通过身体技艺到价值编码、价值体系的具象投射、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三重维度生成。

关键词: 胶东武术; 文化认同; 思政隐喻

基金项目: 烟台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YT SK2025-306)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31

一、概念阐述

(一) 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作为群体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价值共识体系, 本质上是民族成员对本群体文化符号系统(包括语言、习俗、信仰、艺术等)的自觉确认与价值内化。这种对族群核心价值体系集体认同的动态过程, 不仅塑造了维系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更构成了文明传承与族群延续的认知根基。正因如此, 文化身份认同在多维度认同结构中占据基础性地位, 既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理论前提, 亦是实践层面的精神纽带。

(二) 胶东武术文化认同

胶东地区, 指胶莱谷地及其以东具有相似语言、文化及风俗习惯的山东半岛地区。而胶东武术文化即为区域性身体实践与价值建构的复合体, 本质上是胶东民众在历史长河中通过技击传统、仪式展演与伦理传承形成的符号认知体系。核心机制体现在对“刚柔相济”“天人合一”等核心价值的集体内化过程, 这种基于地域性身体记忆的认同建构, 不仅维系着胶东社会共同体的内部凝聚力, 更成为地方文化基因延续的精神载体。在认同层级维度上, 胶东武术文化认同通过“家国同构”的文化逻辑, 既强化了族群内部的身份边界, 又通过“忠勇仁义”的价值观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有机衔接, 构成地方性知识向国家认同转化的重要中介。

二、胶东武术文化特点

胶东武术文化作为中华武术的重要分支,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形意相生: 武术技击的实用导向

胶东武术文化深植于齐鲁武学传统, 依托胶东半岛滨海地域的独特生态位, 在黄渤海文化交汇处衍生出兼具海洋性与内陆性的武术形态。文化渊源可溯至东夷文明图腾摹拟意识, 在渔猎生产经验中形成的仿生学原理, 随至明末王朗以螳螂拳为载体重构仿生武学体系, 标志着胶东象形拳完成从原始搏击术向武学理论体系化的转型。稽古证今, 胶东武术的文化嬗变呈现出三重维度: 其一, 在宗教维度上, 方仙道呼吸吐纳法与军事格斗术的兵道合流, 催生出“形塑自然, 意通太虚”的修炼范式, 典型代表如崂山道教武术; 其二, 在民俗维度上, 渔民号子的节奏韵律、剪纸艺术的线性美学与秧歌的腾挪步法, 共同熔铸为独特的武术技术语汇; 其三, 在现代化进程中, 通过国际武术赛事展演与非遗传承机制, 实现从地域性身体技艺到全球化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

实战特点上, 胶东武术以地域军事文化为根基, 注重技法实用性, 其核心可归纳为“短、快、密、连”: 技

作者简介: 商昌敏(1996—), 男,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武术理论与方法。

通讯作者: 商昌敏

术体系依托近身短打, 强调招式紧凑直接(螳螂拳“勾、搂、采、挂”连环技法), 配合“寸劲”发力, 追求短距离内击打要害; 步法遵循“闪展腾挪”原则, 灵活切换三角步、圈步等, 适应狭窄空间与突发对抗; 攻防逻辑突出“后发先至”, 通过封拦截打破对手节奏, 典型如六合螳螂拳的“截手连击”; 器械技法(南塗山六合棍)注重实战效能, 枪扎一线、棍扫大片, 动作简洁刚猛; 战术上融合虚实变化与借力打力, 正如梅花螳螂拳谱所述“不招不架顺势进, 巧借他力化为攻”, 形成以巧制胜的实战思维。

(二) 流派多元: 拳种谱系的完整建构

胶东武术文化以流派众多、体系完整著称, 其多样性不仅体现在技术差异上, 更根植于其历史脉络与地域文化。螳螂拳的仿生哲学、孙膂拳的兵家谋略、戚家拳的环境适应性、六合棍的刚猛实用, 共同构建了多元一体的武术生态, 成为中华武术文化的重要缩影。目前, 已有吴氏太极拳、戚家拳、螳螂拳、经梧传陈式太极拳、南塗山六合棍等八项传统武术拳种名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胶东武术的流派与技术分层特点, 也体现了其历史积淀、地域文化融合及实战需求导向。以螳螂拳为例, 作为胶东武术的代表性拳种, 螳螂拳分为太极、梅花、七星、六合四大主要分支, 各派技术体系独立且互补。其中, 太极螳螂以“内三合(心、意、气)”与“外三合(手、足、肩膀)”为核心, 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 武术套路则强调身法变化; 梅花螳螂以“七长八短, 八打八不打”为纲要, 动作紧凑连贯, 讲究“一招三变”, 如《梅花路》《白猿偷桃》等套路模仿梅花绽放的形态; 七星螳螂以“七星步”为基础, 结合“分身八肘”技法, 形成攻防一体的连环招式; 六合螳螂强调“刚柔相济”, 注重以柔化劲化解对手攻势, 代表对练套路“对三捶”, 拳势稳健扎实、迅猛凌厉、劲力精巧合一。各派均包含基本功、单手练、器械及对练套路, 形成“内外兼修”的完整体系。

(三) 山海交融: 地域文化互鉴的武学烙印

胶东武术的文化交融特征根植于半岛的地理枢纽地位与历史进程的多维度互动。作为齐文化与东夷部落的交汇之地, 齐国尚武传统与渔猎搏击技艺的结合, 塑造了其刚猛灵动并重的技术底色。唐宋以降, 佛教禅武文化与崂山道教内炼思想逐步渗入武术体系, 催生出“崂山玄真拳”、“崂山玄功拳”、“崂山玄真拳”等内外兼修的武术流派; 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南北移民与商业交流, 则促进了少林拳、南拳等外来武术与本土技术的融合。此外, 明代抗倭实践中, 戚继光吸收民间武术改良军阵, 民间则发展出戚家拳等针对性技法, 进一步强化了胶东武术的实战性。这种文化融合, 既源于地理枢纽的开放基因, 也得益于军事防御与民生需求的共同推动。

另一方面, 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民俗传统则塑造了胶东武术鲜明的地域特色。海洋文化的影响渗透于器械与技法中, 《纪效新书》“凡试叉钯, 先令自使, 手其身手法合一”, 就体现了渔具改造兵器——叉钯; 多山临海的地形也促成了灵活步法与稳扎桩功并重的技击风格。武术还与胶东民俗深度共生, “海阳大秧歌”将武术与秧歌、高跷结合, 成为传承与凝聚社区的核心文化。这种重实用、轻花架的理念贯穿胶东武术文化。不仅延续了胶东人刚毅务实的精神, 更成为地域文化认同与对外交流的鲜活符号。

(四) 兵道合流: 哲学与军事思想的融贯实践

胶东武术的哲学思想根植于道家阴阳辩证与兵家谋略传统, 强调“刚柔相济、顺势而为”。崂山道教将“以柔克刚”的哲学融入拳术, 如玄真拳以气运力、借力打力, 体现道家“守弱处静”的辩证思维; 仿生拳法则通过对自然生物动态的观察, 提炼出“动静相生”“攻守合一”的技击理念, 暗合“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 兵法思想渗透于武术体系, 螳螂拳“连消带打”连续性技法模拟了战场短兵相接的对抗, 《纪效新书》中“虚实并用”的战术思维被转化为武术虚实步法, 形成“形虚意实、后发制人”的实战智慧, 使武术超越单纯技击, 成为承载传统哲学的文化实践。

胶东武术的军事基因则源于抗倭实践与戍海防御需求, 凸显“化武为战、以战养武”的实用智慧。戚继光在胶东练兵时, 将民间武术改良为“鸳鸯阵”“狼筅术”等军阵杀招, 同时吸收战场经验反哺武术技法, 形成了“兵民一体”的防御体系。这种双向渗透使胶东武术既保有战场搏杀的凌厉, 又蕴含“兵无常势”的机动性, 最终塑造出“以武止戈、以智御力”的深层文化逻辑。

三、胶东武术文化符号体系解构

(一) 胶东武术的物质符号系统

胶东武术文化的物质符号系统, 作为地域性武术实践的物质载体与意义表征, 通过器物、空间、文本及仪式的多维互动, 系统映射了其技艺体系、文化基因与社会功能的复合性特征。这一系统不仅为武术技术的具身化操演提供物质基础, 更通过符号化的物质实践构建了文化记忆与社会认同, 其内在逻辑可从以下层面解析:

器物层的技术编码与文化隐喻。胶东武术器械体系以实用性为核心特征, 如螳螂剑(双手剑)、戚家刀等兵器的形制构造, 借鉴倭刀的弧度样式, 随着战争的需要进行改良, 最终融合为攻防技术符号; 云纹、兽首等装饰元素的介入, 则使实用武术器物成为地域审美与民间信仰的物质投射; 对襟短衫、腰牌等服饰系统通过材质、形

制与符号的三重规约,既满足武术训练的功能性需求,亦构建了“门派身份—身体实践”的象征秩序,体现出物质性与符号性的双重属性。

空间层的历史叙事与传承机制。武术典籍《太极硬螳螂拳谱》《单氏六合螳螂拳》《太祖长拳三十二势》等拳经拳谱,以图文互文形式完成了招式的转载,形成“文本—图像”双轨并行的记忆存储模式。莱阳七星螳螂拳武馆、蓬莱登州武术馆等的习武空间建构,既包含功桩、沙袋等功能性设施的实用取向,亦通过宗族伦理空间与武术操演场的叠合,赋予技术训练以文化仪式性,实现“身体规训—文化传承”的空间化表达。

仪式层的符号转化与社会整合。胶东民间传统祭祖、拜师等仪式中的兵器陈列、擂台陈设,通过“器物—仪式”的语境转换,使实用器械升华为文化认同的象征媒介;社火表演中的彩绘兵器与狮舞道具,则通过民俗语境的再编码,将武术符号嵌入地方社会的节庆叙事,强化了武术文化的集体记忆建构。

物质符号的现代性重构与文化再生产。在技术介入背景下,传统武术衍生出数字化招式库等新型传承媒介,藉由螳螂拳种的象形艺术,衍生出系列影视作品;影视道具、文创雕塑通过符号抽离与跨界融合,推动武术文化从胶东地方性知识向全球消费符码转化。这种创造性转化既延续了“形意一体”的传统造物逻辑,亦通过媒介革新实现了武术物质文化的范式转换。

综上所述,胶东武术物质符号系统的建构本质上是地域文化的地方性书写。其以器物为基点,通过技术符号、空间符号与仪式符号的层累交织,构筑起贯通“历史—当下”“个体—社群”“技艺—文化”的意义网络,不仅为武术非遗研究提供了物质转向的典型案列,更揭示了传统武术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物质实践重构文化主体性的深层机制。

(二) 胶东武术的行为符号系统

胶东武术文化的行为符号系统,是以具身化实践为核心的文化表达机制,通过程式化技术操演、仪式化社会互动与伦理化传承模式,构建了武术技艺、文化价值与社群关系的动态符号网络。其行为实践不仅承载着武术本体的技术逻辑,更通过符号化展演参与地方文化秩序的再生产,具体也可从以下维度阐释:

武术技艺的符号化生产与身体规训。胶东武术以拳种为核心,通过不同的技术展现不同的表达,以螳螂拳为例,其技术体系以象形螳螂为核心,通过“滑步”“跟步”“踏步”“拖步”等仿生动作的程式化编排,将生物意象转化为攻防符号,形成“形意互构”的技术语言。而武术基本功、武术套路等功法训练,以“形神合一”为准则,通过重复性身体操演完成技术内化;师徒“拆招喂手”的互动实践,则借助具身化示范与即时反馈,实现隐性知识的活态传递。这一过程中,身体既是技术载体,亦成为文化隐喻的媒介——象形步法对自然文化的征引、抱拳礼对伦理秩序的具象化,均体现身体行为的地域文化编码特征。

仪式实践中的文化认同建构与社会整合。武术行为通过神圣化仪式嵌入地方社会网络:拜师礼通过递帖、叩首、敬茶等符号化程序,将师徒关系纳入宗法伦理框架;祠堂祭祖仪式以兵器陈设、门规诵读强化历史记忆与门派认同。民俗节庆则成为武术符号的公共展演场域,借助武术的艺术化特征,形成“演练同构”的视觉叙事;相对的,这种通过竞技性展演,既延续尚武传统,亦激活社群凝聚力。此类实践通过“神圣—世俗”双重维度的符号操演,实现武术文化从个体技艺向集体记忆的转化。

传承机制中的伦理符号与社群互动。师徒制以“口传身授”为纽带,通过“七长八短”“八刚十二柔”等口诀隐喻、动作调校等非文本传递,构建“师—徒”权力关系与知识垄断。“八打八不打”“三不传”等门规戒律作为行为禁忌符号,通过伦理约束维系武术共同体边界;乡村义务传习则依托地缘关系,将武术实践嵌入乡土社会互助网络。武馆集体演武、农闲授艺等行为,既强化技术传承的公共性,亦通过身体共在场域生产地方文化认同。

身体展演与社会角色的符号互嵌。武术行为通过服饰统一、礼仪展演等外显符号标识身份归属;武德实践则以“点到为止”“扶弱济困”等行为编码,将尚武精神转化为道德资本。历史上,“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上下抗日声浪日渐高涨,其中有600多名胶东螳螂弟子英勇抗日,体现武术行为符号与民族精神的深度耦合。

现代性语境下的符号重构与范式转型。传统行为符号面临竞技化、数字化与全球化三重变革:螳螂拳套路经标准化改编成为竞技评分符号,影视武打设计将其转化为视觉消费符号;信息技术的兴起则通过短视频碎片化解构师徒制时空逻辑,动作捕捉技术则使古拳谱招式转化为数字遗产符号。这种再生产既引发“技术祛魅”风险,亦拓展了武术文化的传播维度,彰显行为符号系统在文化调适中的动态生命力。

胶东武术行为符号系统的本质,是以身体为介质的文化意义实践。其通过“技术—仪式—伦理”的多层符号互动,将个体武术操演升华为地域文化表征,在动态传承中维系着尚武精神的文化基因。这一系统不仅为武术人类学研究提供鲜活案例,更揭示了传统武术通过行为符号创新实现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

(三) 胶东武术的精神符号系统

胶东武术文化的精神符号系统是胶东地域文化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独特表达范式,其以武术技艺为载体,通过技术体系、仪式制度与民俗实践的多维互动,构建了一套融合伦理规范、哲学认知与文化认同的意义网络。这一系统的精神内核根植于儒家伦理与道家思想的互构,表现为“尚武崇德”的价值取向与“刚柔相济”的方法论

原则。儒家文化通过“仁、义、礼、信”的德性规约，将武术实践纳入道德教化体系，强调“以武止戈”的伦理责任，如明清时期抗击海患的历史叙事即凸显了武德与家国情怀的共生性；道家思想则从“道法自然”的哲学维度，赋予武术技术以顺应天时、借力制胜的智慧，正如螳螂拳通过仿生机制实现的“短打快攻”策略，暗合《道德经》“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与此同时，胶东半岛海陆交汇的地理特征，促使武术文化呈现出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既保留中原农耕文明的务实性，又吸纳海洋文明的流动性，体现南北拳法刚柔风格的交融。

在符号表征层面，胶东武术通过具身化、仪式化与象征化的实践，完成了文化意义的编码与传递。技术符号体系以身体动作为核心，如螳螂拳的腾跃舒展、地躺拳的滚翻伏击，通过攻防逻辑的空间化演绎构建了“虚实相生”的认知图式；器械符号系统则兼具实用与象征功能，剑器之“正”、枪法之“变”被赋予人格化隐喻，经由民间工具演变而来的棍、叉等武术化改造则印证了“兵民合一”的社会传统。仪式制度作为文化传承的规范性框架，通过拜师礼、拳谚的经验凝练，强化了门派伦理与技艺秘传的合法性。

这一符号系统的文化功能，本质上是胶东社会应对历史生存挑战的适应性策略。在身份认同维度，七星螳螂拳与梅花螳螂拳等武术门派分流的谱系化传承成为地域文化认同的微观镜像，通过代际传递维系着胶东人的集体归属感；在生存智慧层面，武术技术体系隐含对地理环境与社会危机的应对方案，如对抗倭寇的协同作战模式，折射出“以技御险”的实践理性；而在精神教化方面，武德规训通过身体规诫与道德内化，塑造了坚韧果敢、谦抑守礼的人格特质，实现了个体修为与社会秩序的共构。

当代语境下，胶东武术文化的精神符号系统正经历从传统生存技艺向文化资本的价值转化。其德性伦理为现代人格教育提供本土资源，技术哲学中的辩证思维可为跨文化对话提供方法论参照，而符号系统的开放性特征则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预设了理论可能。这一活态文化体系不仅承载着胶东地域的历史记忆，更在全球化背景下成为诠释中华武术文化多元性的重要范式。

四、胶东武术文化思政隐喻的生成机制

（一）符号转译路径：从身体技艺到价值编码

胶东武术文化中通过符号学机制将武术实践系统转化为意识形态载体的过程，其核心在于以具象的武术符号为媒介，借助隐喻、象征与制度化实践，完成从技术层面向价值体系的编码跃迁，构建了“技艺—伦理—秩序”三位一体的思政教育范式。这一路径的生成逻辑可分为三重维度：

首先，身体符号的抽象化实现了道德规训的具身传递。武术通过程式化的肢体动作形成技术意象系统，将“以柔克刚”“动静相生”等传统哲学命题转化为可感知的身体语言；身体规训被投射为“沉心静气”“克己复礼”的伦理要求，使习武者在重复性训练中无意识内化价值规范，形成具身认知与道德自律的双向互动。其次，器物符号的伦理化构建了家国叙事的物质载体。武术器械通过功能属性与文化意象的叠加，被赋予装饰与文化追求的双重象征意义，使器物超越实用工具范畴，成为承载集体记忆与价值共识的文化符码。最后，仪式符号的秩序化形塑了规则认同的仪式场域。武术通过空间实践将物理空间转化为意识形态教化场所，隐喻“公正”“法治”等现代治理理念；仪式行为则通过程式化操演，将“尊师重道”“信守承诺”“文化传承”等价值观念植入集体无意识，借助文化记忆的重复强化形成稳定的意义共同体。

符号转译的核心机制包含三重逻辑：具身认知—通过身体实践内化抽象价值、隐喻映射—建立武术符号与思政概念的跨域关联、重复强化—以制度化操演固化文化记忆。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对武术“技击性”的符号学重构，通过将技术要素升维为价值能指，使其成为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性载体，最终达成“以武化人”的思政教育目标。其理论价值在于揭示了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中“技术伦理化”的实践路径，为当代思政教育提供了“具身参与式”的方法论启示。

（二）核心隐喻维度：价值体系的具象投射

胶东武术文化中价值体系的具象投射，通过武术特有的符号系统与身体实践，将抽象的社会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播的文化意象。这一维度以武术技艺为载体，通过历史经验、伦理规范与哲学思想的符号转译，构建了一套基于身体隐喻的价值传递机制。其核心在于将抽象的伦理价值、哲学思想与社会认同转化为具象化的动作符号与行为范式，形成动态的文化载体，实现意识形态的柔性渗透与代际传承。

从生成逻辑看，该维度包含三个层面：其一，伦理与哲学的价值符号化。儒家伦理通过武德规范，被具象为暴力使用的正义边界；自然哲学则通过象形拳法和器械辩证运用，以身体运动诠释“道法自然”“阴阳相济”的宇宙观。其二，历史记忆与社群认同的仪式化建构。戚家刀法等武术套路与海阳秧歌等民间艺术通过肢体语言的夸张展演，塑造了康健有为的民族精神符号；门派服饰、器械纹饰等视觉标识通过符号化凝聚乡土认同，而“拳术展演”等集体仪式则将个体武技展示转化为“众志成城”的集体精神表达。其三，身体符号的能指重组与时代转化。武术文化通过“技艺—伦理”“个体—集体”“传统—现代”三重机制实现价值传递，当代通过与公民道德建设、爱国主义教育结合，完成从传统载体向意识形态柔性传播媒介的功能转型，形成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胶东范式”。这一机制本质上是将历史经验、哲学思想与伦理规范凝合为价值体系。

(三) 时代性转化逻辑：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机制

胶东武术文化的“时代性转化逻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社会机制，其核心在于通过符号重构、实践转向与价值整合，将传统武术资源转化为适配现代治理需求的文化治理工具。这一逻辑以“创造性转化”为方法论内核，具体表现为以下递进层次：

第一，文化符号的脱域化转译与再嵌入。胶东武术通过技术赋能与叙事重构，剥离其传统语境中的封闭性特征，将其“侠义精神”“家国情怀”等核心价值符号进行普适化提炼，继而嵌入现代文化消费与意识形态传播场景，使符号资本在数字媒介与文旅经济中实现价值增殖例社区武术。这一过程完成了武术文化从“地方性知识”向“可流通文化资本”的形态跃迁。第二，身体实践的功能化转型与治理工具化。武术的实践形态从传统技击术转向复合型社会治理载体，表现为“身体规训—道德教化—健康管理”的三重功能叠加，这种工具化转型将武术的身体实践重构为柔性治理技术，实现了社会治理效能的文化赋能。第三，制度话语的系统性对接与范式创新。通过政策驱动下的资源整合，武术文化被纳入乡村振兴、国家形象塑造等宏观战略框架，形成“传统—现代”价值互构的制度化路径。例如，烟台国际武术节、烟台武术文化节，通过武术外交活动将地域文化升华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符号媒介。这一过程中，武术的文化资本通过“符号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链式转化，最终凝练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胶东范式”，揭示了非正式文化传统与正式制度体系间协同创新的内在机理。

参考文献：

- [1] 张帆.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探赜[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5, (02): 57-65. DOI: 10.16415/j.cnki.23-1021/c.2025.02.005.
- [2] 宫中怡. 胶东螳螂拳文化变迁研究[D]. 宁夏大学, 2024. DOI: 10.27257/d.cnki.gnxhc.2024.000054.
- [3] 郭学松, 曹莉, 刘明云, 等. 中华文化认同的内涵、维度与路径：基于两岸民族传统体育宋江阵文化视角[J]. 体育科学, 2022, 42(10): 77-86. DOI: 10.16469/j.css.202210010.
- [4] 昌隽如, 高雯馨, 孟庆波. 从自发到集成：胶东民间面磕子文化特征和传承创新研究[J]. 艺术百家, 2024, 40(02): 147-154.
- [5] 纪效新书[M]. (明)戚继光撰; 曹文明, 吕颖慧校释. 中华书局, 2001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etaphors in the Symbolic System of Jiaodong Martial 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ntity

Shang Changmin

(Yantai Vocational College of Culture and Tourism, Yantai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symbol system of Jiaodong martial art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Jiaodong martial arts are prominently reflected in the practical-oriented principles of techniqu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plete lineage of boxing styles, the martial arts styles influenced by mutual learning of regional cultures, and the integration and practice of philosophical and military ideas. The cultural symbols of Jiaodong martial arts can be deconstructed into material symbol systems, behavioral symbol systems, and spiritual symbol systems. The mechanis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etaphor is mainly generated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hysical skills into value encoding, the concrete projection of the value system,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Keywords: Jiaodong martial arts; cultural ident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etaphor

文化翻译观视角下典籍英译研究——以《颜氏家训》为例

陈海龙^{1,2}

(1.江西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2.江西理工大学 巴基斯坦研究中心,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文学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颜氏家训》开后世“家训”的先河,是中国家风、家庭教育第一部典范教材。本文详细介绍典籍《颜氏家训》目前译介,理清家训这一“训”体的文化源流,挖掘背后的深层次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深度探索其对君子人格的推崇,中庸思想和祖先崇拜的内在思想逻辑和文化蕴涵,以文化翻译理论为指导并结合《颜氏家训》的文化内涵,通过具体的案例分别对其主要英译策略进行探析,使之水乳交融,允理愜情。最后,从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视角研究《颜氏家训》中的文化现象与问题,探寻译者在翻译中国文化典籍中采取的策略与方法,以期为典籍翻译研究提供参考,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助力中国话语与叙事体系的建立,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关键词:文化翻译观; 典籍英译; 《颜氏家训》; 君子人格; 中庸思想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83

引言

中国自古高度重视家风家教。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531-597)所著的《颜氏家训》,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且极具影响力的家庭教育著作。该书将儒家思想巧妙地融入家庭教育实践之中,是全面阐述修身齐家之道的开创性作品。颜之推在书中反复告诫子孙后代,要效仿贤能之士,刻苦学习以求成才,并强调所学知识应服务于实践,以报效祖国、传承家业、扬名立世。全书共分为七卷十篇,内容广泛而深刻,除了详尽的家训之外,还从侧面折射出当时的历史风貌和社会生活状况。该书语言平实,见解独到深刻,思想体系博大精深,不拘泥于世俗之见,一直备受赞誉,影响深远,被誉为“家训之祖”。

1 《颜氏家训》介绍和译介研究

《颜氏家训》是中国首部系统化论述家庭教育的读本,也是中国汉民族历史上第一部体系宏大且内容丰富的家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凝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家风家教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其作者为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颜之推,其生不逢时,命途多舛,也正是颜之推几经波折的经历使他全面地理解当时的社会风俗、政治变迁及学术风气,撰写了《颜氏家训》以训导后世子孙。该书内容广泛,运用传统儒家思想教导子弟如何修身养性、管理家庭、为人处世以及求学问道。《颜氏家训》自成书以来就成为了家庭教育的典范,广泛流传且历久弥新。其备受推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它满足了封建社会中儒家学者教育子女、指导他们立身处世的需求,提出了一系列实用且有效的教育方法和理念;其次,该书主张培养既懂得治国之道又擅长治家之才的实用型人才,这一观念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认同;再者,它继承并发展了儒家以“明人伦”为核心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思想,这些思想恰好符合了当时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颜氏家训》的翻译历史由来已久,深刻地影响译者生产传播和译本接受的社会语境^[1]。英译本主要有三个版本,分别是邓译本、宗译本和田译本。邓译本(Family Instructions for the Yan Clan)为汉学家邓嗣禹先生(Teng Ssu-yu, 1905—1988)所译并由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E. J. Brill)于1968和1969年先后两次出版;宗译本(Admonitions For the Yan Clan: a Chinese classic on household management)由常熟理工学院外语系教授宗福常先生所译并于2004年在外文出版社出版,也是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100部经典文化典籍译著之一;田

作者简介:陈海龙(2000—),男,江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应用翻译、翻译理论与实践、语料库翻译;

通讯作者:陈海龙

译本则是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田晓菲于2021年在德古意特(De Gruyter)出版的英文学术著作《颜之推集》(Family Instructions for the Yan Clan and Other Works by Yan Zhitui(531-590s))。这些译本既向西方读者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而且其中丰富的史料文献记载也为西方汉学家研究古代中国的历史人文和乡土人情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国内学者不仅对《颜氏家训》多语种译介，而且对《颜氏家训》及其译本多样化深入研究。薛睿从读者期待视角出发，比较《颜氏家训》两个英译本在词汇、句法、语篇维度的差异，发现更贴近目的语读者期待的译本更能引发共鸣，促进文化传播^[2]。雷传平和师衍辉深度解读颜之推的成长历程指出《颜氏家训》结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形成以儒雅为业、归心佛教、兼收道教的独特信仰观念^[3]。彭靖深入分析了该英译本的翻译特色，并全面总结了其在海外的传播现状，最后对中华典籍英译提出相关具体建议^[4]。国内学者研究表明《颜氏家训》已经超越了单一姓氏家庭教育文化的限制，升华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与文化瑰宝。然而在国家大力宣传、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宏观背景之下，家训外宣翻译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翻译中国，让世界理解中国，需要充分认识到《颜氏家训》的文化价值，挖掘阐释家训蕴含的思想理念并弘扬其当代价值，促进更多中国典籍“出海”，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2 文献综述

文化翻译理论由翻译文化学派的典型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提出，她与安德烈·勒弗威尔合著《翻译、历史与文化》，并且首次明确倡导翻译应当从文化角度对翻译展开研究，不仅界定了翻译研究这一学科的基本研究范畴，且提出了翻译文化学派的基本理念，促使翻译研究的焦点从单纯的语言层面扩展到文化层面的多元因素，探讨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和制约翻译活动，从而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范式与视角^[5]。她还认为，翻译并非纯粹语言表达，它根植于语言所在的文化中，而“历史”因素是导致“文化转向”必然发生的一个因素^[6]。历史维度的引入揭示了翻译活动有其自身局限性，因其既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也不可能真空中被接受，而是受到政治、权力、法则、规范和相应的习俗规约，这些要素的本质就是“文化”。换言之，翻译的产生和接受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下进行的。此后巴斯奈特在其著作《翻译研究》中，详细的论述了文化翻译理论的深层含义：首先，翻译本质应是文化的交流共鉴，语言只是表现形式之一。其次，翻译不应是简单是源语文本信息的再现，而是以文化为单位，脱离语言的外在表象，实现原文在目的语中的文化价值对等。最后，翻译的原则和规范会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需求和特定文化群体的需要而改变。

翻译的核心在于利用源语文本的交换价值或比较价值，旨在尽可能精确且全面地再现源语文本的内容。这一过程不仅涉及语言的单向转化，还包含着文化的移植，这说明翻译研究开始重视文化在翻译中的独特作用。文化翻译理论从西方传到东方，离不开1995年中国译界围绕《红与黑》的重译展开的大讨论。论争的焦点由“等值”与“再创造”转化到“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和“再创作”三者的辩证关系，最后产生对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思考。此后国内文化翻译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接连涌现^[7]。陈宇柱与雷晴岚从文化翻译视角出发，解析《霍比特人》中奇幻形象的文化内涵，以实现源语文化的有效传递与跨文化交流^[8]。张林影从文化翻译视角分析理雅各《庄子》内篇英译，发现其在处理标题、哲学概念与修辞时，常采用音译、意译与注释结合的策略，并提出译文应兼顾可读性与文化保留，以实现有效的文化传递^[9]。国内学者将文化翻译理论应用于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证实该理论在典籍外译中不仅能保留原作文学韵味，更能通过译者的创造性转化使其焕发新的光彩^[10]。宋引秀与郭粉绒在少数民族文化外宣中运用文化翻译观，其研究揭示了“翻译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深化了对于翻译跨文化特性与社会功能的认识^[11]。文化翻译理论以文化为单位，脱离了语言层面的外壳，以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视角去展开翻译活动，达到不同文化之间价值功能的对等。

3 《颜氏家训》背后的文化内涵

《颜氏家训》乃南北朝杰出文学家与教育家颜之推(约公元531-591)所著之家训杰作，旨在教育后代。此书不仅详尽记录了颜之推的个人经历、思想精髓及渊博学识，更以其深邃的教诲成为后世家训之典范，素有“古今家训之祖”的美誉。《颜氏家训》结构体例严谨，分为七卷，共二十篇，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蕴，其中包括对君子人格的高度推崇、中庸之道、祖先崇拜，以及对大同社会治世理想向往等。对《颜氏家训》文化内涵的深入剖析，有助于我们脱离语言的外壳，聚焦于其文化精髓，从而更有效地解读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要素，并为《颜氏家训》的翻译及海外传播奠定坚实基础，促进这一文化瑰宝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共享。

3.1 君子人格的推崇

“君”字在商朝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本意是发布命令。“子”是对专门对男子的尊称。“君子”合称，原

意是地位崇高的人，如君王之子或贵族阶层，是对贵族统治者的尊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君子”一词逐渐超越了地位的范畴，被赋予了道德的含义。在儒家思想中，君子指的是具有高尚品德、修养良好、行为正直、有学问有教养的人。他们不仅具备卓越的才智和学识，更注重道德品质的修炼，追求内在的道德完善。“君子”较早见于《尚书·大禹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除《尚书》外，《易经》《诗经》中也有关于“君子”的记述。在这些典籍中，君子一词已经涉及仁、义、礼等概念，但此时君子还仅仅是一个概念，不具有完整的、系统性的内涵。完成君子内涵的建构并设定其人格特征的是孔子。在《论语》一书中多次提到君子一词并且做了详细的解释，认为君子是兼具政治属性和理想情怀的双重概念：在位者和有德者，而后者更接近于后代对君子的定义要求。孔子对君子做了品德、情感、行为甚至生活情态等多方面的界定，赋予君子以近乎完美的人格意义。现代也有学者对君子形象进行细致解读，详细地论证了君子该有的品德风尚：文质彬彬的君子之貌、“仁”“智”“勇”的君子之道、坦荡荡的君子之风、乐学知命的君子之乐。

在中国传统文化，“礼”和君子的关系在尤为紧密。“礼”不仅是一套外在的行为规范，更是君子内在修养的体现。君子通过践行“礼”，能够逐渐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和学问修养。孔子提倡“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即要求君子在广泛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这种约束不仅是对外在行为的规范，更是对内心情感的调节和升华。通过践行“礼”，君子能够逐渐达到“仁”的境界，实现自我完善。在颜氏家训中并没有直接论述如何成为一名君子，但是在字里行间却都是对君子人格的推崇。当然这与颜之推成长背景密不可分，他继承儒家传统，视成就道德人格为人生根本。他在《颜氏家训》中列举了交际之礼、父子之礼、还有丧葬之礼、迎送宾客之礼等相当多的“礼”，大到人际关系，小到个人修养，都体现出对君子和君子人格的肯定与强调。他希望子孙遵照奉行，以“礼”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进而成为有德君子。除外在“礼”的约束，《颜氏家训》还强调内在“自省”的思考，这都与修养君子人格紧密相连。

3.2 中庸思想推崇

中庸思想是中国儒家经典思想之一，它强调以一种调和平衡、不偏不倚的思想去实现太平和合理想。《中庸》对中庸的定义如下：“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意为内心没有较大的情绪波动就是中；而发生喜怒哀乐等等情绪时，始终用中的状态来节制情绪，就是和。中的状态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而始终保持和，不受情绪的影响和左右，则是天下最高明的道理。

中国也有其他学者对中庸思想的解释展开了讨论，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简而言之，中庸思想强调在处理事务时，要随事物发展灵活把握矛盾平衡，坚持中庸之道，既不偏左也不偏右，以中为度，调和情感与理智，追求内心平和与行事适度实现和谐统一。

中庸思想不仅仅是颜之推个人生活经历总结的集合，也是《颜氏家训》的核心思想之一。首先，作为古代仁人志士，颜之推也明白“学也，禄在其中矣”、“学而仕则优”的道理，以挤身仕途掇职从政作为最终目的，但他也懂得不能宦海逞欲，不单单是因为其个人信奉的佛老思想，更是在北齐生活期间见证了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背后的残酷血腥，和文人权臣之间的生死暗斗，因此坚定地选择了秉持其先祖的遗训，坚持着中庸仕宦心态。也正是这种中庸仕宦心态使其躲过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权谋还能多朝为官。这是颜之推的仕宦之道也是他的求生之道。其次，中庸思想也在书中多次出现。读书入世是古代读书人的最高最求，颜之推不可能让他的子孙放弃这条康庄大道。于他提出两条中庸仕宦建议：其一“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前望五十，后望五十，足以免耻辱，无倾危也。高此者，便当罢谢，偃仰私庭。”；“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这是其二。

3.3 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即人们尊重和敬仰、崇拜并祭祀先祖，追思先祖的功绩与德行，同时祈求先祖之灵保佑自身，助已达成心愿，进而传承并光大先祖所奠基的事业。原始祖先的崇拜在中国由来已久。广义而言，史前时期的有燧人氏、伏羲氏、黄帝等，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他们的丰功伟绩代代相传，被人们供奉崇拜。狭义而言，指的是有本族始祖和先人的崇拜。在文字尚未创作出来以前，家训就以原始歌舞的形式出现。原始歌舞不仅是巫术与艺术的融合体现，还承载着原始宗教仪式的功能，并且作为教育后代狩猎与渔猎技巧的重要手段。原始歌舞最初是作为教育传承的功能，是原始祖先们通过歌舞表演的形式来教育子孙后代狩猎和渔猎，教会氏族成员他们如何更好的掌握狩猎技巧。而伴随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过程中，血脉亲缘意思的深化，由原始的图腾崇拜演变为对本族始祖及先人的敬仰之情。并且氏族社会的演进使得父权制度的正式确立，家庭制度都明确和强化。基于这一背景，人们逐渐形成了父亲或氏族中前辈长者能够庇护本族成员、为子孙后代带来福祉的观念，并开始进行祭拜祖先、祈求祖宗庇佑和为祖先歌功颂德的活动。这一转变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祖先崇拜思想初步

形成。

原始歌舞可以说是家训最古老的表现形式，但它狂野宗教性的表达表现使其呈现的内容显得混沌、愚昧和复杂。家训真正开始进入原始社会家庭教育的是封建家族私有制下，宗族族长（领袖）、是富有经验的长者、当时取得巨大成就或声誉名望的前辈对晚辈的训导，即长老训教。家训的产生就是长老训教的文字化表征，通过表达富贵人家“不在当下而在子嗣”的担忧，寄希望于子孙后代能够长享富贵，永保天命。在《颜氏家训》中也出现较多的长老训教的相关例子，充分反映颜氏家训文化背后的祖先崇拜思想。也正因此，颜之推提出“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这一重视家族内部家风建设的主张。不仅如此，《颜氏家训》对祖先崇拜思想还体现在“孝”道上。颜之推提到“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整顿门风，警醒后背）”、“父母威严而有慈，子女畏惧而生孝”，可见他重视对后代孝道的教育，希望建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永怀祖德的良好家庭生态。对上祖先崇拜，对下为家庭和睦，形成良性家风家教循环。

4、案例分析

结合《颜氏家训》的思想文化内涵，本文以《颜氏家训》为源文本，同时结合宗福常译本进行翻译文化再现。《颜氏家训》共有七卷，二十篇，分别是序致篇、教子篇、兄弟篇、后娶篇、治家篇、风操篇、慕贤篇、勉学篇、文章篇、名实篇、涉务篇、省事篇、止足篇、诫兵篇、养生篇、归心篇、书证篇、音辞篇、杂艺篇、终制篇，涵盖了家庭伦理、道德修养、为人处世、宗法礼教等内容。源文本呈现的是显性文化，但是相关研究发现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能很好理解，即使理解部分也未能领会其精髓和要义。因此，结合文化翻译观，本文将选取其中四个典型案例进行《颜氏家训》翻译文化再现，多角度全面地介绍《颜氏家训》背后深层次隐性文化：对君子人格、中庸思想的推崇、祖先崇拜思想等。

例 1：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孔子曰：“无友不如己者。”颜、闵之徒，何可世得，但优於我，便足贵之。

译文：As the saying goes, a person in good company becomes scented, as if living in a room of fragrant orchids, whereas a person in bad company turns malodorous, as if staying long in a market of salted fish. ……Confucius 孔子 (551 B.C—479 B.C, saint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founder of Confucianism) said, “Have no friends not equal to yourself.” // But, since men as virtuous as Yan Hui 颜回 (521 B.C-490 B.C, the top of 72 sages) and Min Sun 闵损 (536 B.C-487 B.C, protagonist of Obedient Son's Single Garment and the Whipping of Reed Flowers) are scarce, we cannot afford to lose any chance of emulating our betters, whoever they might be.

例 1 分别来自《颜氏家训》“卷二慕贤第七”，描述了君子的难能可贵之处和择友标准，折射出君子核心价值标准为克己复礼和择善原则交友观。源文本中涉及文化隐喻和与典故有关的人名翻译。翻译重在文化交流，文化是首要的，信息是次要的，因此在翻译时采取不同的策略来体现翻译的文化功能对等，从而实现文化的交流。

首先，文化隐喻的翻译采取了“直译+意译”的翻译策略。例 1 中运用了古代典故，引用“兰花”和“鲍鱼”的典故，同时化用孔子提出“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自战国时期浪漫主义诗人屈原以来，就沿用以“兰花”这一文学意象比喻为有德君子，并且赋予了兰花君子人格的象征意义，因此将其直译为“fragrant orchids”，隐喻君子。而“鲍鱼”（Abalone）则采取意译的翻译方法译为“salted fish”，主要出于以下考量：第一，实物的对应。在源文本中并非指食物海鲜而是取腌湿法制成的咸鱼，“鲍”其实是一种处理鱼的方式，即腌渍。古代腌鱼、腌肉被统称为鲊，并因做法不同又分为两类：腌而湿的成为“鲍”，也称“暴腌”；腌而干的称“鲞”。第二，文化意味的再现。鲍鱼也是作为文学意象的存在，比喻臭秽、恶劣的环境或小人，糟糕透顶的人，这种隐喻与盐渍咸鱼会散发浓烈刺鼻的恶臭的属性存在关联。而“鱼”在英语文化中通常用来指含有贬义意味的人或物，如 cool fish（无耻之徒）、fresh fish（新囚犯）等，刚好与语言所处的文化相适应。

其次，典故人名运用了“音译附以注释+汉字显化”的翻译方法。案例中主要介绍了颜回、闵损两位德才兼备，品行高尚的颜氏先祖，意在突出君子行风，是颜家后世学习的典型榜样。同时颜回、闵损也是兼具历史教化意义和文化故事背景的特殊人物，比如说，颜回安贫乐道，陋巷箪食瓢饮；闵损单衣顺母，鞭打芦花。他们自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所以在翻译时根据文化翻译观和“三贴近”原则，音译附注的同时显化汉字表达。一来可以忠实地保留传统文化中的专有人名和文化，二来对他们的信息的丰富译写，也精准地传递源语文本的文化内涵和意蕴，满足文化交流的需要。

例 2：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前望五十八人，后顾五十人，足以免耻辱，无倾危也。高此者，便当罢谢，俯仰私庭。

译文：In pursuing an official career, stay at a mid-ranking post, and no higher. With some fifty people above you and as many below, you will enjoy proper dignity and contented security at the same time. Decline any office higher than

that, and retire into the seclusion of a peaceful family life.

例 3: 常以二十口家, 奴婢盛多, 不可出二十人, 良田十顷, 堂室才蔽风雨, 车马仅代杖策, 蓄财数万, 以拟吉凶急速, 不啻此者, 以义散之; 不至此者, 勿非道求之。

译文: I have always thought that a family of twenty should own no more than four score acres of arable land, and employ no more than twenty nobi (slave or servant subordinate to some body in Chinese ancient time and) . Houses, which furnish shelter from wind and rain, need not be ornate; carriages, which are a means of transport, need not be elegant. As for money, just save a few dozen strings of cash for marriages, funerals and contingencies. What surplus money there is should be put generously to charity purposes. And, if this cash reserve is inadequate, don't try to make it grow by dishonest means.

例 2 和 3 源于《颜氏家训》“卷五止足第十三”, 将“中庸思想”在政治仕途和生活理念上具象化为并且现实解读。颜之推推崇的为官之道并非位高权重权倾朝野, 而是追求官居中品, 避祸保身慎言尽职即可, 这巧妙地达到“学而优则仕”立身扬名的目的, 又不会宦海逞欲。在生活理念中也是同样如此, 追求适中, 点到为止, 希望生活在无过不及的中等家庭中。无论是入世, 还是出世, 追求的都是“无过不及”、“不违中和”的适中理念和中和之态, 这些理念本质上仍未跳脱出中庸思想的范畴。源语言具有经验叙述特征。

本例中涉及两个翻译策略: 一是“奴婢”采取“音译+增译”的翻译方法。封建奴隶制度下对失去自由、对主人具有人身财产依附关系的男女奴隶的统称, 男性称为奴, 女性称为婢, 他们被视为主人的财产, 可以随意买卖、馈赠, 社会地位极其卑贱。后亦用为男女仆人的泛称。查询相关文献资料和历史译法中, 主要有 housemaids、alave、maid or servant girl、retainer or retinue、personal attendant、household slave、male and female slaves、nuhi 等诸多译法。但是综合来看, 这些译法并不完全反映“奴婢”这一词汇在中文中的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结合英文中难以找到一个完全等价的词汇来准确传达其含义的客观事实, 因此英译为 nobi, 同时增译其文化背景, 从而体现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二是采取“意译”的方法, 将“吉凶”译为“marriages, funerals (红白事)”。意译重深层含义, 不拘字面, 依语境文化再创造, 传达原文情感色彩与意图。采用意译的方法主要出于以下原因: 首先, 源语文本中的“吉凶”是一个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词语, 它泛指自然界的变化以及人生中的福祸。在中国文化中, “吉”通常与喜庆、吉祥相联系, 而“凶”则与悲伤、灾祸等不幸的事情相联系。因此, “吉凶”在语境中往往指的是人生中的喜庆之事(如婚礼)和悲伤之事(如丧礼)。其次, 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吉祥、喜庆和幸福, 因此婚礼等喜庆场合被称为“红事”; 白色则象征着哀思和丧礼, 因此丧礼等悲伤场合被称为“白事”。将“吉凶”翻译为“marriages, funerals”, 不仅传达了原文的深层含义, 还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色和表达意图。

例 4: 夫风化者, 自上而行于下者也, 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 兄不友则弟不恭, 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 兄友而弟傲, 犬义而妇陵, 则天之凶民, 乃刑戮之所摄, 非训导之所移也。

译文: Education and reformation works through examples set by superiors for inferiors and seniors for juniors. So an unkind father will be matched by an unruly son, an unfriendly elder brother by a disrespectful younger brother, and an unfaithful husband by an ill-tempered wife. Should there be a rebellious son for a kind father, a disdainful younger brother for a friendly elder brother, or an arrogant wife for a devoted husband, the former must belong to the brute type unresponsive to instruction, and can only be deterred by the severest of penalties.

例 4 选自《颜氏家训》“卷一 治家第五”, 主要描述了颜之推重视内部家风建设, 上下尊卑有序, 希望建立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 夫义妇顺的良好和谐家庭环境。原文虽然未直接提及敬祖, 但强调了家族中长辈对晚辈的言传身教和榜样作用, 通过良好的家风家训来传承家族的精神和传统, 从而实现对祖先的尊敬和纪念, 折射对祖先崇拜思想的隐形推崇。案例中主要采用了“直译+省译”的翻译方法。风化主要是指通过教育感化, 以此将其译为“Education and reformation”。同时后面源语文本运用了排比的手法, 具体举例表达不同的家族角色有不同的风化对象。采用排比手法的目可以提升表达的韵律感, 强化语言的力量与冲击力, 进而深化表达效果。翻译并非简单的译码和重组, 更重要的还是一个文化交流。因此在翻译案例中排比内容时为避免重复, 仅保留了一个“will be matched by”, 同时为了保留了排比的句式表达。

5、结论

典籍英译是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之举, 是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这需要译者具备优秀的翻译技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不只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 还需要深会典籍背后还蕴含的深邃思想。文化翻译观并非纯语言的翻译行为, 而是将文化甚至是其背后的思想作为翻译单位进行译码重组, 在在目的语中赋予等值的文化功能, 从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颜氏家训》文化内涵丰富, 涵盖了个人修养、家庭伦理、社会治理等多个层面, 折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层次的道德理念、人生哲学以及家族精神。研究中挖掘了《颜氏家训》的价值

意义,并在翻译时采用“音译”、“减译”、“增译”等多种翻译策略,尽量在克服文化差异的同时保留源语文化色彩。因此《颜氏家训》的英译不仅是一项语言任务,更是一次文化交流的契机。通过精准而富有情感的翻译,家训中的智慧得以跨越时空,与世界读者产生共鸣,加深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家训中文化内涵得以广泛传播,为增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作出了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 [1] 钱灵杰,邓嗣禹《颜氏家训》英译的社会翻译学视域论析[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2025(25):96-102
- [2] 琳惠,刘明埔.《颜氏家训》的海外传播与影响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3(12):128-136.
- [2] 薛睿,王玉.读者期待视野视角下《颜氏家训》两个英译本的对比探析[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68-73.
- [3] 雷传平,师衍辉.由《颜氏家训》解读颜之推“儒释道”三教兼容思想[J].东岳论丛,2015(11):42-48.
- [4] 彭靖,邓嗣禹《颜氏家训》英译研究与传播意义[J].国际汉学,2020(4):161-166.
- [5] 曾文雄.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反思[J].外语研究,2006(03):45-47.
- [6] 陈丕.西方翻译理论史之文化视角透视——苏珊·巴斯奈特翻译史研究思想述评[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9(2):116-121.
- [7] 赵稀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从西方到中国[J].学习与探索,2017(1):141-145.
- [8] 陈宇柱,雷晴岚.从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解析西方奇幻文学形象翻译[J].文化学刊,2020(07):87-89.
- [9] 张林影,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下理雅各《庄子》内篇英译本解读[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61-65.
- [10] 王学勤,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与诗歌翻译[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01):321,337.
- [11] 宋引秀,郭粉绒.“文化翻译”观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化外宣翻译[J].贵州民族研究,2015(04):88-91.

A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Yan's Family Instruction*

Chen Hailong^{1 2}

(¹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China; ²Pakistan Research Center,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China)

Abstract: The cultural movement is linked with the national movement, and the cultural pulse is linked with the national pulse. Literary classics are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Admonitions for the Yan Clan" set the precedent for later generations "family instruction" and is the first model textbook of Chinese family style and family education. This paper gives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 current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 Admonitions for the Yan Clan, clears out the cultural origin and flow of the "instruction" style of family instruction, excavates the deep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behind it, and deeply explores the internal ideological logic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its respect for gentleman's personality, the idea of the mean and ancestor worship. Guided by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mbined with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Admonitions for the Yan Clan, Through specific case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main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o as to make them harmonious and comfortable. Finall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ultural phenomena and problems in Admonitions for the Yan Cl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an Bassnett's cultural translation perspective, and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adopted by translators in translating 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of Chinese classics,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help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system, and better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and spreading Chinese voices.

Keywords: Cultural translation vi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dmonitions for the Yan Clan; Gentleman personality; Doctrine of the mean

文旅融合视域下凉山彝族婚俗活态传承的创新途径研究

王叶兰 张卓然 马文琼 沙马阿依木 邓景

(西昌学院, 中国西昌, 615000)

摘要: 在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的国家战略推动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日益成为促进民族地区社会进步与文化振兴的关键力量。凉山彝族婚俗作为一项集语言、文学、宗教、习惯法与伦理观念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体系, 其传承与发展正面临现代化进程与旅游开发异化的双重挑战。本文立足于文旅融合的视角, 系统梳理了彝族婚俗从历史渊源到现代实践的整体谱系及其文化逻辑。研究发现, 当前彝族婚俗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呈现出“仪式简化、传承断裂、内涵空泛”等问题。对此, 本文创新融合环境心理学、美学与价值共创理论, 提出从“叙事重构—空间赋能—社区激活—产业协同”四个层面构建创新路径, 并建立一套完整的“预期成效与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强调, 必须坚持“利益共享、文化尊重、主体回归”的原则, 妥善处理游客与居民、开发与保护、利益分配之间的三大核心关系, 以实现彝族婚俗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的良性循环, 为民族地区文化振兴与文旅深度融合提供兼具理论支撑与实践意义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凉山彝族; 婚俗文化; 活态传承; 创新路径; 环境心理学; 评估指标

基金项目: 凉山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凉山州民族文化研究基金规划项目 (SKL202519)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84

引言

彝族是我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少数民族之一, 其独特的文化体系贯穿于社会结构、伦理观念、信仰实践乃至宇宙认知之中。婚俗礼仪作为彝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不仅是婚姻缔结的仪式过程, 更是其社会关系、文化认同、天文历法知识与宇宙观念的整体呈现^[1]。凉山彝族自治州作为彝族文化的重要承载区, 其婚俗仪式涵盖“说媒”“背亲”“哭嫁”“赛克智”等环节, 构成了一套复杂而严谨的文化文本, 具有极高的民俗学、人类学及天文学研究价值。

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以及年轻一代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转变, 凉山彝族婚俗正经历前所未有的传承挑战。仪式流程被大幅简化, 深厚的文化语境逐渐消失, 核心传承人出现断层, 使得这一古老习俗的存续面临严峻威胁^[2]。肖雪 (2009) 在田野调查中指出, 凉山彝族婚俗的旅游开发已呈现明显的“舞台化”与“形式化”倾向, 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旅游展演中被割裂与简化, 沦为“碎片化”的歌舞节目^[3]。十余年过去, 在商业化浪潮的持续影响下, 这一问题不仅未得到缓解, 反而更加突出。

在“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国家战略的指引下, 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4]。文旅融合不仅是一种产业发展方式, 更是一种有效的文化再生产机制, 通过将静态文化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的旅游产品, 实现文化价值的市场认可、社会认同与代际延续^[5]。近年来, 贵州“村超”、广西马山攀岩小镇、福州长乐游神等成功案例, 均展现出文旅融合在激活地方文化基因、推动社区深度参与、塑造文化品牌等方面的巨大潜力^[6]。

本文基于现有理论成果, 结合实地调研, 并创新引入环境心理学与旅游体验设计等交叉学科理论, 尝试构建一个更为系统的凉山彝族婚俗活态传承框架。研究将整合彝族古老婚俗形态的梳理、凉山彝族婚俗现代变迁与旅游开发状况、传统婚礼流程的文化解析, 以及对彝族历法体系的前沿探讨, 致力于通过叙事重构、空间赋能、社

作者简介: 王叶兰 (1980—), 女,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文化旅游、旅游开发。

张卓然 (1981—), 女, 讲师, 研究方向为文学研究、语言与写作研究。

马文琼 (1991—),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民族学。

沙马阿依木 (199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语言文学。

通讯作者: 邓景

区激活与产业协同四位一体的路径,推动彝族婚俗实现从“静态保护”到“活态传承”的创造性转化,并建立科学的成效评估体系。

一、凉山彝族婚俗的文化内涵、历史渊源与活态传承价值

(一) 文化内涵与历史渊源:从古老形态、女性叙事到历法智慧的融合

要全面把握凉山彝族婚俗的当代价值,需追溯其历史源头并理解其多元文化内涵。沈良杰的研究揭示了彝族支格阿鲁文化中所包含的古老婚姻形态,如母系氏族外婚、血亲外群婚、自由松散的一夫多妻制、女人不落夫家等习俗^[7]。这些古老婚俗元素虽在现代凉山彝族婚俗中已不尽相同,但其文化基因,如对家族联姻的重视、对婚姻自由的某种追求,以及舅舅在婚姻及家庭中的重要地位,仍在当代仪式中有所体现。

王美英对“哭嫁歌”的研究,为理解婚俗中的女性视角与情感世界提供了重要线索。哭嫁歌内容极为丰富,既有对童年时光的追忆与对故土的眷恋,也有对无自主婚姻的痛苦控诉,批判将女性物化的婚姻制度,同时表达对未知丈夫与未来生活的忧虑。以往,“哭嫁歌”被视为一部“用血泪凝结”的抒情长诗,是彝族女性在父权与包办婚姻制度下,对男权中心不合理现象的控诉,以及对个人命运无奈与不屈的复杂情感宣泄^[8];而如今的“哭嫁歌”更多表达对父母的感恩之情。

刘明武对彝族河图洛书的探讨,从天文历法的角度深化了我们对婚俗文化内涵的认识。其研究提出,在彝族文化中,“洛书”对应十月太阳历,“河图”则对应十二月太阳历^[9]。历法作为时间秩序的哲学体现,也是社会生活的节律指南。婚俗作为人生重要的过渡仪式,其时间选择与仪式节奏往往与古老历法智慧紧密相连。婚礼多安排于农闲时期、节气转换或历法认定的吉时,体现了彝族先民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与遵从。将历法智慧纳入婚俗文化的阐释体系,能够揭示其不仅是社会伦理的体现,更是宇宙观与时间哲学在人生礼仪中的具体实践。

肖雪的田野调查为我们呈现了现代凉山彝族婚俗一套完整而细致的仪式图景。其过程严谨复杂,富含象征意义,主要包括三大阶段:婚前礼仪(说媒、订亲)、结婚礼仪(迎亲与背亲、哭嫁与梳妆、断线、分礼与赛克智)和完婚礼仪(回门)^[3]。在此基础上,课题组于2025年6月至10月,对西昌市、昭觉县、普格县、越西县及攀枝花市盐边县的传统彝族婚礼展开调研。调研采用田野调查、访谈与问卷等方法,对各地传统婚礼的仪式、流程、服饰、饮食等元素进行了系统提取。这些仪式环节,既承载了彝族文化的古老基因,又蕴含深沉情感,其时间安排也可能契合河图洛书的历法逻辑。

凉山彝族婚俗是一个融合宗教、法律、文学、艺术、伦理与天文历法的综合性文化文本,既继承了彝族文化中的古老婚俗基因,蕴含仪式流程中的深厚叙事与情感张力,又融合了河图洛书所代表的历法智慧,并在历史长河中发展出一套丰富而细致的仪式实践。其价值远超婚姻本身,是理解彝族社会运行机制、文化心理与宇宙观念的关键。

(二) 活态传承价值:从文化认同到乡村振兴的多维效能

1. 文化认同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

彝族婚俗作为活态文化实践,通过代际传递与周期性仪式展演,持续强化个体对彝族文化的认同与归属。郑恩指出,民俗文化具备“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四维一体的认同建构功能^[10]。在婚俗仪式中,参与者通过身体实践与情感共鸣,形成对彝族文化身份的深层认同,并在家族、村落乃至更广范围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旅游吸引与文化消费的潜力

彝族婚俗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参与性与仪式感,其独特的文化符号与互动环节,天然适合作为文旅融合的核心资源。马天在研究青海班彦新村时提出,民俗符号元素的提取与传播是旅游形象构建的核心^[11]。彝族传统婚俗中的“泼水迎亲”“梳头换装”“呼哈嘿”“克智比赛”等环节,本身具备强烈的戏剧冲突、文化魅力与知识趣味,易于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深度体验型旅游产品,从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良性互动。

3. 社区治理与乡村共同体的维系

婚俗仪式的组织与实施,高度依赖家族、村落等传统社会单位,本身即为一次高效的社区动员与治理实践。王艳琼的研究表明,文体旅融合能够“集聚治理主体,带动治理有效”^[12]。一场传统婚礼的成功举办,需要全村协作与角色参与,这在无形中巩固了乡村社会资本,增强了社区凝聚力、组织力与自我管理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内在而持续的文化动力。

二、凉山彝族婚俗传承与旅游开发的现实困境

（一）仪式简化与文化内涵的“空心化”

在社会变迁的洪流中，彝族婚俗的许多核心仪式正被不断简化甚至遗弃。课题组访谈了解到，因工作原因和居住环境变化，彝族人民从传统院落变为楼房，“泼水迎亲”难以原汁原味地开展；因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动辄数小时的“克智”比赛常被压缩或取消。“哭嫁歌”的境遇尤为典型。王美英的研究表明，随着交通便利、婚姻自由度的提高，哭嫁的内涵已从对包办婚姻的“血泪控诉”，转变为对父母感恩的“礼节性表达”，甚至出现了“不哭不唱，无声无息，仅当做一种仪式来履行”的现象^[8]。仪式背后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功能随之弱化，婚俗从一种具有神圣性与规范性的社会礼仪，逐渐演变为娱乐化、表面化的表演。肖雪早在2009年就批评道，在火把节等旅游节庆中的婚俗表演“过于舞台化和形式化，脱离了彝族婚俗的文化背景，显得支离破碎，演变成了纯粹的歌舞节目，失去其蕴含的文化内涵。”^[3]这种“去语境化”的展演，导致文化内涵的“空心化”，使其只剩下苍白的外壳。

（二）传承主体断层与年轻一代的认同危机

年轻一代彝族人对传统婚俗的认知与情感联系普遍减弱。更多人倾向于选择简约的西式或现代婚礼，对繁复传统仪式缺乏了解与传承意愿。与此同时，精通婚俗全程知识、擅长“克智”论辩的老一辈传承人，以及能即兴吟唱传统“哭嫁歌”的妇女逐渐老去，传承队伍出现严重青黄不接。郭晓勋在研究赫哲族文化时指出，语言与仪式传承人的缺失是文化断代的重要标志^[13]。在彝族婚俗中，能即兴进行“克智”论辩的民间艺人与能完整哭嫁的妇女已极为罕见，这使得婚俗失去了最精彩的文化内核与智慧光芒，传承面临根本危机。

（三）旅游开发中的同质化、符号化与异化

在过往粗放式的旅游开发中，彝族婚俗常常被简单粗暴地处理为“歌舞表演”或“邀请游客扮新郎新娘”的浅层互动。这种开发模式为了追求短期的娱乐效果和经济效益，将婚俗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剥离出来，进行碎片化、符号化的利用，严重损害了文化的真实性与尊严。喻计耀指出若非遗IP构建仅停留在表面符号的粘贴，而忽视其深层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的挖掘，将导致其生命力的枯竭与游客的审美疲劳^[14]。其中，“哭嫁歌”所蕴含的沉重历史与复杂情感，在旅游表演中极易被简化为一种猎奇式的“哭戏”，其背后的社会意义被完全消解。

（四）利益分配机制与社区参与度的缺失

旅游开发的可持续性，关键在于能否让文化的主人、当地社区、成为主要的受益者。肖雪的调查深刻揭示，在旅游开发中，利益分配是影响当地居民参与意愿与态度的关键变量。她发现，在不同类型的村落，居民的诉求有所不同：在半山以下的彝汉杂居村，经济利益是主要驱动力；而在高山彝族聚居村，民族感情和文化尊重更为重要^[3]。若不能建立一套公平、透明、普惠的利益共享机制，确保文化持有人在旅游开发中拥有话语权、决策权和收益权，那么婚俗旅游开发将难以获得社区的真心拥护与持久支持，最终走向不可持续。

三、文旅融合视域下彝族婚俗活态传承的创新路径

针对上述困境，本研究融合环境心理学、旅游体验设计与共创价值理论，构建一个以“情感共鸣”为核心，以“主客共创”为方法的活态传承创新路径体系。该体系旨在将彝族婚俗从观光对象转化为可沉浸、可感知、可共创的高质量文旅体验。

（一）叙事重构：从文化展演到情感沉浸的深度IP转化

以“恢复性环境理论”与“叙事传输理论”为指导，构建能引导游客深度沉浸的文化叙事场，具体有以下方式：

1. 构建“双核叙事”IP体系

利用叙事传输的“情感驱动”机制，将游客代入故事世界。打造“《妈妈的女儿》生命史诗”情感IP。以“哭嫁歌”从历史控诉到现代感恩的情感变迁为主线，开发情感地图导览。游客通过扫码可聆听不同时代的“哭嫁歌”选段与解读，在特定空间触发，形成一条“从悲怆到祝福”的情感流线。打造“河图洛书·天时婚典”认知IP。将婚礼仪式与彝族十月太阳历结合，在景区设置历法解说牌和AR互动点。游客用手机扫描婚礼广场的特定图案，即可浮现虚拟的星象图与历法知识动画，解释为何婚礼要选择特定时节，将感性体验提升至哲学认知。

2. 创设“角色代入式”观光性参与流程

借鉴“行为场景理论”，为游客提供明确的行为脚本与角色身份，降低参与门槛。彻底摒弃浅尝辄止的舞台

化表演，致力于将游客置于高度还原的、真实的文化情境之中。肖雪倡导的“观光性参与”，其精髓在于“旅游者主动转换为主体，深入到当地人家，作为当地人的一份子去体验当地民俗”^[3]。为此，可以设计“一日彝族家人”深度体验项目。一是角色代入：游客在体验开始前，被赋予特定的社会角色（如远道而来的表亲、友邻村寨的代表），并被告知需遵守的基本礼仪规范。二是任务驱动：游客需参与婚礼的筹备过程。女性游客可协助酿制迎亲必饮的醪糟酒、绣制送给新人的小饰品；男性游客则参与迎亲队伍的“岗前培训”，学习应对泼水考验的简单“克智”辞令和策略。三是全程情感与认知体验：从参与前夜的青年聚会（喝啤酒、对唱婚歌），到凌晨陪伴新娘哭嫁梳妆，再到白天的迎亲闯关、共享婚宴、聆听赛克智，让游客作为“文化参与者”而非“局外观众”，完整体验婚俗仪式的起承转合与内在的情感逻辑。在此过程中，不仅要让游客参与身体实践，更要引导其进行情感与认知的共情。同时，在介绍婚礼日程时，可巧妙融入历法知识，解释为何传统婚礼会选择特定时节，将婚俗体验提升为对彝族整体世界观的理解。

（二）空间赋能：基于环境心理学的沉浸式场景营造

运用环境心理学的“恢复性环境”与“场所依恋”理论，系统性优化物理与数字空间的体验质量。

1. 规划“动静分区”的恢复性景观

依据注意力恢复理论，设置“高唤醒”的活动区与“低唤醒”的静休区。动态体验区，用于“迎亲”、“赛克智”等热闹仪式，设计开阔场地，色彩鲜明，鼓励互动。静态恢复区，设立“火塘静思角”、“听嫁楼”等空间。这些空间采用自然材质、柔和光线，并循环播放轻柔的彝族民歌背景音，为游客提供脱离喧嚣、消化情感的“情感缓冲区”。

2. 打造“数字孪生”博物馆与 AR 场景活化

通过数字技术延伸空间叙事，克服物理限制。线下 AR 活化，在古村落旧址，通过 AR 眼镜或手机 APP，复原“背亲”古道的虚拟场景，展示已消失的仪式细节。线上云博物馆，建立“凉山彝族婚俗数字孪生博物馆”，不仅提供 360° 虚拟游览，更设立“数字传承人”板块，用高清影像记录并展示老一辈传承人表演的“克智”论辩全过程，支持多语种字幕，成为永不关闭的文化课堂。

（三）社区激活：基于共创与共享的利益共同体构建

以“价值共创理论”与“场所依恋”为核心，确保社区不仅是参与者，更是主导者和受益者。

1. 推行“社区文旅合作社”模式

通过赋予社区决策权与收益权，培养“主人翁”意识，强化其与本地文化的正向情感联结（场所依恋）。可以由村民选举成立“婚俗文旅合作社”，下设仪式展演部、游客接待部、质量监督委员会。明确权责利，合作社负责制定《文化真实性操作手册》；统筹安排村民参与演出与服务；管理“婚俗旅游发展基金”。收益按“基本工资+绩效分红+传承人补贴”模式分配，确保公平透明。

2. 实施“新乡贤引领，专家智库支撑”的双轨人才计划

融合本地知识与外部智慧，实现可持续的创新管理。设立“新乡贤创业基金”，资助本地青年开展彝婚主题民宿、彝绣工作室等微业态。与高校合作，建立“专家工作站”，定期为合作社提供品牌管理、数字化营销等专业培训，并共同研发新产品。

（四）产业协同：构建“婚俗+”价值网络

通过产业交叉融合，构建一个自我造血的产业生态系统：

1. 开发“分级体验”产品线

运用 STP 营销理论进行市场细分，提供差异化产品。大众体验线（1-2 小时）：“彝婚风情快闪秀”+“婚宴美食街”，满足浅层观光客需求。深度体验线（半天至一天）：“一日彝家亲”角色扮演项目，定价中高端。定制高端线（2-3 天）：“我的彝族婚礼”全流程定制，面向寻求转化性旅游体验的游客，包含历法择日、全家族角色扮演、非遗手作等，打造终身难忘的旅程。

2. 推动“文创 IP+特色农旅”的深度融合

将文化符号（IP）植入实体产品，提升其附加值与情感价值。推出“克智金句”盲盒、服饰元素的日用品，以及融合“哈帕”头饰元素的时尚饰品等文创产品。打造“从田间到婚宴”体验链。游客可预约参与养殖“婚宴猪”、种植苦荞、酿造醪糟酒等过程，最后在婚宴上品尝自己参与制作的美食，形成“体验—消费—记忆”的完整闭环。

四、核心关系处理：实现可持续传承的保障

（一）建立一种基于文化平等与相互尊重的游客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通过对游客开展“行前文化培训”，使其了解并尊重彝族的文化禁忌与社交礼仪；同时对居民进行接待服务意识与跨文化沟通技巧的培训。目标是营造一个主客共享、情感交融、相互学习的文化空间，而非单向的凝视、消费与被消费关系。

（二）坚守文化本真性的底线妥善处理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成立由德高望重的传承人、民族文化学者、村民代表共同组成的“文化真实性评审委员会”，对各类旅游展演项目进行文化审核与把关。对于核心的、具有神圣性的仪式环节，可划定其为“非商业化”或“有限度参与”区域，确保文化的内核与尊严不受商业逻辑侵蚀。必须明确，开发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与传播，而保护是开发不可逾越的前提。

（三）构建“政府引导、企业运营、社区主导”的互利共赢模式

政府主要负责政策支持、基础设施提升与宏观监管；企业发挥其在市场开拓、专业化运营与资本引入方面的优势；社区作为文化的持有者和传承主体，必须享有充分的决策参与权与收益主导权。建立常态化的三方协商机制，定期评估与动态调整利益分配方案，确保合作的长期稳定与公平正义。

五、预期成效与评估指标体系

为确保本研究提出的创新路径不仅是理论构想，更能产生切实的社会、文化与经济效益，特建立以下多维度的预期成效与评估指标体系。该体系旨在对实施效果进行长期、动态的跟踪与评估。

（一）文化传承与活化成效

彝族婚俗核心仪式得到完整记录与活态传承，文化内涵“空心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形成老、中、青结合的传承人梯队，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感与传承意愿显著增强。建立起“数字-实景”双轨并行的文化保护与传播体系。

（二）经济发展与产业带动成效

成功打造“彝婚”核心文旅IP，形成多层次、高附加值的文旅产品体系。显著提升目的地旅游综合收入，带动社区就业与创业，实现文旅收益对文化传承的反哺。

（三）社会效益与社区发展成效

构建权责清晰、利益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模式，社区凝聚力与自我发展能力增强。提升主客互动质量，建立文化尊重与平等对话的和谐关系。

（四）理论创新与学术价值成效

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文化-情感-产业”协同发展的民族地区活态传承模式。在环境心理学、旅游体验设计与非遗活态传承的交叉研究领域产出标志性成果。

六、结语

凉山彝族婚俗，这门承载千年历史、族群智慧、女性叙事与天地哲学的生活艺术，其活态传承不仅关乎彝族文化身份的延续，更是激发地方社会内生动力、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文化资源。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深度融合了沈良杰关于支格阿鲁古老婚俗的溯源研究、肖雪对凉山婚俗现代变迁的详实记录与深刻批判、王美英对“哭嫁歌”中女性情感与社会叙事的深度挖掘，以及刘明武对彝族河图洛书历法体系的揭示，并创新引入环境心理学、价值共创等前沿理论，系统回应了“观光性参与”模式如何在新时代文旅融合背景下落地、深化与创新的核心问题。

研究指出，在文旅融合的视域下，凉山彝族婚俗的传承之路，必须通过叙事重构实现从浅表表演到深度文化体验与哲学认知的转型；通过空间赋能拓展文化传播的广度、深度与永恒性；通过社区激活确保传承的生命力、主体性与可持续性；通过产业协同释放文化所蕴含的经济与社会价值。而这一切创新的底层逻辑与成效保障，在于妥善处理好游客与居民、开发与保护、利益分配这三大核心关系，并辅以科学的评估体系。

未来，应在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跨领域的资源整合与广泛的区域合作基础上，将凉山彝族婚俗的活态传承实践，精心打造为中国民族地区文旅融合与非遗保护的典型案例。正如王杰文所言：“民俗博物馆的剧场化实践，

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展演，更是对未来的文化创造。”^[16] 凉山彝族婚俗的活态传承，正应成为一场面向未来的、由文化持有人自信主导的、融汇古老智慧与现代创意的、充满文化自信的伟大实践。它的成功，将不仅闪耀于大凉山的水山之间，更将为全球范围内同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一份融历史深度、情感温度与哲学高度于一体的“中国方案”与“彝族智慧”。

参考文献

- [1]彭兆荣.旅游人类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 [2]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优[J].探索与争鸣,2007(07):66-68.
- [3]肖雪.凉山彝族婚俗旅游开发的思考[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19):9230-9231,9275.
- [4]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巩固拓展非遗扶贫成果[N].人民网,2021-05-20.
- [5]黄永林.数字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J].文化遗产,2015(01):1-10+157.
- [6]刘玉堂,李振鹏.传统民俗的现代传承:基于影视民俗的文化考察[J].新疆社会科学,2023(06):137-146+169.
- [7]沈良杰,洛边木果.彝族支格阿鲁文化中的婚姻习俗及婚育观念析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2):29-34.
- [8]王美英,沙马日体.凉山彝族“哭嫁歌”传承与保护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42-46.
- [9]刘明武.河图洛书揭秘——彝族文化中的河图洛书[J].中国文化研究,2009(春之卷):20-31.
- [10]郑恩,刘旭东.民俗文化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2025(2).
- [11]马天,李宗南,楞智.民俗遗产旅游中典型文化元素的提取与传播——以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新村为例[J].黑龙江民族丛刊,2025(2).
- [12]王艳琼,张亚文,谭燕玲,等.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价值、模式与路径[J].体育文化导刊,2025(2).
- [13]郭晓勋,陈红宇.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传承与民俗旅游融合发展探析——以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为例[J].黑龙江民族丛刊,2025(3).
- [14]喻计耀,陈广明.乡村振兴背景下新文创助推非遗民俗文化传播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25(8).
- [15]尹金凤,陈毓冰.非遗民俗文化的活态传播探析——以福州长乐潭头游神为例[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5(5).
- [16]王杰文.民俗博物馆的剧场化与表演研究[J].民族艺术研究,2025(4).

Innovative Pathways for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Liangshan Yi Marriage Customs under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Perspective

Wang Yelan, Zhang Zhuoran, Ma Wenqiong, Shama Ayimu, Deng Jing
(School of Tourism and Urban-Rural Planning,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China)

Abstract: Driven by the national strategi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key force in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 an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 ethnic regions. The marriage customs of the Liangshan Yi people, as a composite cultural system integrating language, literature, religion, customary law, and ethical concepts, face dual challenges from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alienation brought by tourism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overall genealogy and cultural logic of Yi marriage customs from their historical origins to modern practic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urrent tourism development of Yi marriage customs exhibits issues such as "simplification of rituals, breaks in transmission, and hollowing out of meaning." In response,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integrates theories from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esthetics, and value co-creation to propose constructing innovative pathways from four dimensions: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 spatial empowerment – community activation – industrial synergy," and establishes a complete "Expected Outcomes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The research emphasizes the necessity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benefit-sharing, cultural respect, and subject return," and to properly handle the three cor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ourists and residents,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and benefit distribution. This aims to achieve a virtuous cycle where Liangshan Yi marriage customs develop through protection and are inherited through development, providing a solution with both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ethnic regions.

Keywords: Liangshan Yi; Marriage Customs Culture; Living Inheritance; Innovative Pathways;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Evaluation Indicators

雪中取火：抒情的双重境界——论周梦蝶的诗歌思想

高若栋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中国 香港 999077)

摘要：作为台湾诗歌“49年一代”重要人物的周梦蝶，命运受制于时局、心灵憧憬于古典。作品蕴含的孤独与悲慨气质、所掺入的兼含儒道释三家的文化信息，既奠定鲜明的个人艺术特色，又为现代汉诗的价值理论进行拓边与实践。在作品中呈现的发源于虚构和现实场域的双重境界的抒情，推动对历史空间的修缮、延伸或变构的同时，创造了精神层面的“还乡”之旅。深入研究并阐释其诗歌思想，或将有利于扩充当代文学批评的家园。

关键词：周梦蝶；台湾文学；诗歌思想；抒情价值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80

一：寂寞如蝶：病弱、流浪和自渡

周梦蝶带有清苦孤绝底色的诗篇长期作为汉语诗坛的一个“异数”存在，自初代白话诗发轫以来，多少年间无论是“象征主义”或“表现主义”大行其道的台湾诗学，还是崇尚“现代性”写作并扩充国际视野的香港或马华文学，都鲜少有风格近似者。大陆诗坛确有少许沉心传统、续接古典的新诗写作群体，但细究起来，文本上耸峙的山水图景与各怀源流的思想情绪，与周梦蝶的作品实在难以找寻更多共同点，甚至有着部分本质区别。譬如1980年代进入第二个新诗发展高潮的大陆地区，以“进步神话”[1]的态势迎来了诗人流派百家争鸣、理论与批评家汪洋恣肆的局面，其中催生的一批在未来30至40年时间颇具影响力的诗人里，不乏如叶舟、梁平、庞培等具备古典诗学统绪、语言特征者。但他们的共性是几乎都具备有一处诗歌写作所萦绕的地理概念上的中心点，且该中心点一般以诗人故乡或久居地为主，如敦煌关塞、重庆山城、江南湖泽等，唯有极少数如杨键，写诗更依托于较为非现实场域化的思想内容，譬如佛学的探微或想象追思中的山水画卷。但即便如此，他依然难以摆脱踏足实地、游览勘探的心思。在周梦蝶的诗学构造中，“去中心化”成为不可忽视的特性，根本不存在一个维系于现实世界的勘探点，或以现实景况为基础而构筑的精神原乡，他是失路之人，一生留下的200余首作品对故乡的沾染几近于无，对于长期居住之地台北的描绘和抒发的眷恋也淡泊至极。周梦蝶的古典诗境是不依托或无法依托现实场域的砖瓦草木而营造的，“他乡之客”既是命运轨迹的表述，也深度植入了其思想与诗学生涯之中，化为沉重的烙印。从他写诗的开端年华起，便与同侪乃至历代的大多数文人相异，寂寞与僻静是生活与诗意内最瞩目的高峰。

1952年踏足诗坛的周梦蝶，毫无意外地被学界归入了“49年一代”作家群体的行列，他比纪弦年轻，岁数又稍长于罗门、洛夫、向明、郑愁予等人，由于四年内战国民党败离大陆的时代背景，超百万的各行业人群或被迫裹挟前往或主动东渡到了台湾，除纪弦在赴台之前即为文人之外，上述提到的其他诗人基本是登岛后陆续开展写作的，其中出身各异，包含官僚眷属、学生或工商业者，而周梦蝶相对特殊，他是军人，对社会的感知和所承担的痛苦走在了同侪的前列。在随后被称之为台湾诗歌“黄金十年”[2]的岁月里，这批诗人作品纷呈、各抒才华、谈尽见解和主义，在对生命讴歌和青春赞颂的声音、对民族精神的复振和个人价值的腔调、对西方史学技巧和思想甄别与取舍之外，周梦蝶保持着冷静与沉默，他既不涉入围绕覃子豪所谓的“六大信条”（其一是要承续波德莱尔的现代派传统，其二强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其三所谓新内容、新形式、新工具、新手法，其四知性之

作者简介：高若栋（2003—），男，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社科前沿》及 Multidimensional Culture & Arts 编委、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化生态研究。

通讯作者：高若栋

强调,其五追求诗的纯粹性,其六反共坚守自由民主)而展开的批驳论战[3],在各种诗论之争中有条不紊地汲取养分,继而从中穿过。又绝不同于彼时大陆诗坛主要由贺敬之、郭小川等主导的歌颂“大跃进”的主旋律写作,周梦蝶语言细密温婉有柔中带刚之感,不追求给予读者极大的心灵震撼或唤起广泛的回响,对公众读者层面的考量看似几乎隐身,但在更深的维度却潜移默化策动古典文学的新生。当然这种“新生”并非传统式的古文今译或搬挪技法续写章节,周梦蝶用类似“拆洗”、“选剃”等方式,保留并延伸旧文学中的脊骨,以此尝试改变乃至重构文本的面目。新诗的体式在历经初期的“四大阶段”,即草创(1917年至1920年)、奠基(1921年至1925年)、拓展(1925年至1937年)和普及与深化(1937年至1949年)[4]之后又接受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整合过程,戴望舒和艾青也在事实上完善了其主体和相关批评与理论铺设,呈现在周梦蝶眼前的诸多篇章早已形成了近乎系统性的脉络、范式甚至套路。扎根于西化的诗学结构之中可以学到类似狄金森、勃朗宁、雪莱甚至更古早的莎士比亚或彼特拉克的译本语言,端起家国情怀的墨海可以对抗抗日战争时期所激涌的包括鲁黎、沙可夫、杨朔等继承、效仿,如果醉心于抒情柔和或关照生活的诗篇,可以向张君勱、丁文江、林徽因、陈西滢等人学习比较直观的意境之美和格式之匀称,甚至向彼时同样身在台北的白话诗先驱胡适讨教一二。但周梦蝶的诗篇显然志不在此,他对于作品寄予的情愫和赋予的主观价值,几乎回归到了最古老的“诗言志”境地,仅仅想对生活庸常、命运见闻、自身阅历和关乎万象的想象与虚构作出表达,在此之外所获得的“艺术张力”和读者品评的“超现实体验感”只是立足于他沉潜写作的纸面偶得之物。

在描绘明月与河水时,周梦蝶写道:“在无终亦无始的长流上/在旋转复旋转的虚空中”[5],如此的情境,正如他安宁而浪漫的诗观、低调与诚恳的存世之道。在1963年之前,周梦蝶大多数时间的诗歌写作都与“蓝星诗社”这项台湾文学史上的重要“地标”脱不开关系。诗社内部虽不存在绝对的硬性写作要求或文学纲领,但以对抗西方现代性诗歌思潮的过分浸入,是与“怀乡写作”并列的最大重点。苏雪林曾批评彼时的台湾诗坛存在“晦涩暧昧到了漆黑一团的地步”[6]的问题。在其揭示的表象之下,根本原因是自五四时期以来遗留下来且未完全妥善解决的新文学问题。在诗学上具体可以看作思想上是汉语自有的古典体系与西方引入或介入的体系之间的矛盾,语言上是格律的或文言式的与纯白话或翻译腔之间的矛盾。痲弦曾直言“论战似乎都是从诗的语言开始,但争论到最后,几乎全胶着在传统与现代的思辨上”[7],在这一节点上余光中所认为的五四作家们疾呼西化,最终试图建立完全新文学的行动是近乎于失败的,属于“西化不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再估价也不正确”[8],周梦蝶极少发表诗论、大肆参与研讨,但通过作品可以看出他与余光中的想法高度类似,具备某种在中西诗学之间左右逢源的思路,兼顾兼用而不偏废。甚至存在更进一步的空间,在文言与白话的融合并存、西化的汲取和传统的延伸的基调之上,进一步确立了主客体的定位性区别。以中国传统文脉的主枝为核心,以汉诗的统一与思想为主,而西化涛涛浪潮之中奠定影响的物质作为“客”的身份历经甄别后进入并参与汉语新诗的构筑,贡献其智慧推动交融,与主枝相辅相成。

除此之外对于以张默、辛郁等同侪具备较为典型的现实主义倾向的情况,周梦蝶的写作则彰显了与之较为明显的分歧,他并不过分瞩目的“浪漫主义”特征,恰好是诗歌内可能最不容忽视的美学价值。按照普雷明格(Alex Preminger)的说法,具备浪漫派倾向的作家,普遍习惯于“先创造一种幻觉,尤其是美好的幻觉,然后忽然毁掉它,比如用话锋一转,或者个人评论的方式,或者情绪上的强烈反差”[9],周梦蝶的文本精通于此道,世外桃源和咫尺深渊在他的笔端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处转折或过渡,一切都如云水般有条不紊。悲哀到了极点,也不过是两壶浊酒一夜孤天,从截取的冷风写到生命的凄凉、从造化的惊变写到岁月的和缓,周梦蝶把握调教之下的抒情语言,绝非是登堂入室的虚裱牌匾,或文学桑田里腹心空虚的稻草人。他精通“浪漫派的反讽(Romantic irony)”[10]作为一种表达现实的悖论性的方式,往往看似紧绷的词藻,下一步便是化作几段涟漪,风吹水皱。

怀乡问题,是几乎所有赴台诗人无可规避的写作重镇,然而相较于各种深邃悲苦的泣血文字中对大陆故乡抒发的思念和怅惘,周梦蝶无比安静,在诗中“既不遥望,也很少咏叹乡愁,而是安于沉默的久坐”[11],他几乎不对家乡的旧貌进行写作,也无意对往昔光景作过多的追思。这种看似平淡幽静的情态之下,实则埋藏着近乎老庄所谓的“哀莫大于心死”[12]的情愫。心潮一旦归零即跌入静止状态,一切周遭的响动、呼唤或杂音都将面临被吞噬和消解的结局。周梦蝶的世俗命运过分困厄与苦难,幼年丧父、少年丧母、中年丧妻、暮年丧子,几乎饱经常人难以忍受的生活剧变和情感灾难。然而,除了极致的孤独缠绕其终生外,还有病弱之苦和事业之困不断侵蚀他的身心,家境贫寒、战乱辍学、摆摊贩书被取缔,甚至曾在台风中的街头流浪三天三夜。胃溃疡、肺炎、败血症等疾病持续折磨着他的躯体。萨洛季妮·奈都(Sarajini Naidu)曾评价他是“以诗的悲哀征服命运的悲哀”[13],诚如是,“悲哀”如同一层幕布或帘帐遮蔽覆盖了周梦蝶的人生。悲到极致,他反而不再轻易流露或传递

苦楚的情绪，漫长孤苦中的诗歌逐渐发生重构和自省、流变与对峙，从而抵达了作品中竟然具备“自渡”意义的状态。周梦蝶有意识地纾解、释放自己的情绪，小桥流水、沟渠溪泉般缓缓发生，他厌倦乃至恐惧于大江河的奔涌和躁动，狂潮带来的伤害令人难以负担。

二：怀叹如雪：诗学从古典中寻根

周梦蝶的诗歌文本具备较为强烈的复古或崇古特性，在语言结构的排布梳理、辞藻选用和节奏习惯上都能发觉深厚且可追溯的古典根脉，即便其中混合交融了部分白话文运动以来的革新产物，以及汲取自欧美现代诗的价值成分。譬如写作时在段落布局处置上展现的契合于雷切尔·迪普莱西 (Rachel Blau DuPlessis) 曾提出的“段位性”概念[14]，其中所展露的空白和声音对于诗歌叙事的作用，是比较典型的新诗特色。但在诗境中营造静谧感，发挥某种类似布帛山水画的艺术情调时，这种类似景深镜头或延时摄影技术中运用光与影、明与暗的动静之间的艺术效果，则无疑是继承自唐宋词学以来在造景领域的衣袍，恍若温庭筠所谓“小山重叠金明灭”[15]之感。周梦蝶的写作生涯总是双向性开展并延伸的，一方面沿着古典诗学的逻辑经验与典籍材料回溯过去，另一方面置身日新月异的当代发展潮流中，检视乃至收编部分新生的诗学价值，其中经历了一系列包括诗歌韵律的革新或复旧在内的，广受关注的重要议题。

围绕新诗的音韵发展取向的探讨，是汉语诗坛百年历程中频频发生的事情。在周梦蝶之前，已经出现了不下于三次的集群式辩论以及至少五种流派性质的观点输出。譬如1920年代闻一多以中国传统诗歌为主要资源，兼取了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的部分发展特点而提出的“格律诗理论”；1930年代郭沫若、柯仲平等所提倡的打破格律樊笼，集中批判与抗争精神的写作；1940年代以林庚、康定等为代表的早期“九叶诗派”（包括《诗创造》杂志）提出新诗需要融汇现实、象征和玄学的价值追求；1950年代代表可嘉借鉴英美批评派先驱瑞恰兹等的逻辑经验而提出的“新诗戏剧化理论”或“新诗现代化理论”。周梦蝶是比较典型的“兼容”或“兼取”思想的诗人，在完全推翻传统诗歌的格律体式主张与完全恪守延续的主张之外，他更青睐调和、交汇或整饬的思路。如同徐志摩1926年提出“诗的生命就是在它的内在的音节 (Internal rhythm)” [16]的理论一般，周梦蝶很早便意识到音韵之美（或音乐之美）对汉语诗歌的重要性，既是阅读节奏上可感性和优美性的主要支柱，也对诗歌这一体裁区别于散杂文式的记叙模式或小说式的章法逻辑做出了类似路碑的价值，如何在继承古典诗歌音韵美学的基础之上进行改良或一定范畴的重构，始终是他矢志运作的文学事业。正如1990年余光中在诗论中追忆往昔，谈到周梦蝶的作品时曾直言“他的诗和当时的现代诗风有颇大的差异，成为制衡西化的一个反动” [17]，1950-1970年间的周梦蝶已经逐渐拥有大陆部分“新古典主义”诗人在1985年“第三代”诗歌运动后，才发觉或觉醒的包含抵抗与修缮意识的写作心态。

通过对格律诗词时代音韵要求的变革，综合新诗写作体系和现代汉语环境的客观因素，进行契合当代文本的音韵追求和价值定义，成为了周梦蝶通过自身诗歌作品不断尝试完成的事情。正如查尔斯·哈特曼 (Charles O. Hartman) 在西方学界曾提出“如果‘自由诗’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韵文 (verse)’，那么所有那些在诗律学中已经取得的发现都必须被重新审视” [18]理论一般，从诗歌批评乃至理论研究的场域根源性地解决影响诗歌创作者的桎梏，实非易事，周梦蝶的探索之路坎坷不平，他在与域外的学者产生思维交汇或材料借鉴的同时，心境与隋唐以来驱动古文运动改革的先贤们也存在着某种不易察觉的共振。在他革新后的音韵与现代汉诗的关系中，更多非句尾单纯音调押韵的句子中关乎内容留白、停顿或情节变换的“内在韵律”得到重视，这种需要对文本进行探索的非显性的音韵之美，在力主建设“新格律诗”的何其芳、在强调语言“咏叹节奏”的卞之琳、在着眼“规范”和“音乐美”的陈梦家三者之间达成了某项平衡点，在“诗用”和“诗美”的选择矛盾之间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效果。事实上按照孟繁华“文学性一定与人物和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相关” [19]的判断，周梦蝶的追古抚今、兼济中西的诗学构造还有利于“文学性”的提升。

在诗画技艺的交晖、抒情腔调的呈现上，周梦蝶的古典“寻根之旅”更为成功，从先秦诗经时代的诗学养分，到宋明时期文人札记的精神生态，深刻吸引召唤着清苦贫瘠的笔杆，构筑更自适的新空间。历经现实世界的诸般消磨和折损，周梦蝶长久熬煎的内心愈加坚实紧密，最终造就了一个清丽梦幻的思想堡垒，没有进出的门洞，诗歌是唯一与外界沟通的窗子，透过窗口，窥见内里的物事一片当代罕有的古典元素丰富陈列的景象。这种近似乌托邦性质的精神层面产物，正是承载周梦蝶丰饶内心思绪的桃花源，而诗篇是所谓的虚浮与美好的见证，譬如在《菩提树下》他如此落笔：

谁是心里藏着镜子的人呢？

谁肯赤着脚踏过他的一生呢？
 所有的眼都给眼蒙住了
 谁能于雪中取火，且铸火为雪？
 在菩提树下。一个只有半个面孔的人
 抬眼向天，以叹息回答
 那欲自高处沉沉俯向他的蔚蓝。[20]

在静谧中听尽纷扰，从枯寂里炼就繁华，以三个问句直击人性的要津，敲开命运的玄关中难以测探的风景，在诗境凌空于现实的状态中，周梦蝶几乎彻底抛开了物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义理，甚至是灵活变通或“混淆”了部分客观概念，在抒情的范畴内“雪”与“火”既可以自由交融相生相克，又不断产生着相背而行、对峙与割裂的局面。所谓的“雪中取火”更接近于阐释某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所展现的对传统物事关系进行逆反和背叛的现象，类似于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所言说的“在任何创造性的艺术家的作品背后，都有三个主要的愿望：制造某种东西的愿望、感知某种东西的愿望（在理性的外部世界里，或是在感觉的内部世界里），还有跟别人交流这些感知的愿望”[21]，周梦蝶囿于人生阅历的悲哀，在漫长的岁月中几乎丧失了与欢呼雀跃共情的能力，在人声鼎沸之中，他永远心如冷霜一片，思想的轨迹中反复徘徊于无福消受的残影，或曲高和寡的断弦之音。故此诗中看似不通常理的物象组合、叙述构造，实际上是其内在思想世界的折射。周梦蝶所习惯隐匿乃至几乎无踪的“交流的愿望”被更庞大深邃的“感知的愿望”所吞噬。而他的“感知”最终将内外两处世界形成了事实上的隔离，一重是“抬眼望天，以叹息回答”的连接或依托于现实场域的境界，他长期在台北武昌街骑楼下明星咖啡厅门口摆书摊营生，并曾因妨碍市容之原因被取缔紧闭，因此得以充分感受望天叹息的悲情。

另一重是“俯向蔚蓝”的纯粹脱胎于虚构想象的境界，在此之中的周梦蝶已经彻底将自身让渡给了空灵的历史长河，沉溺于一种浩大以至于虚无的天地之中，语言古朴，思想也趋近于古典时代的部分诗人。这和当代汉语诗坛内程抱一、北岛等具备流亡心绪的文人不同，所构筑的具备古典基因的诗学系统之中对社会观测、人性论断和政治隐喻的质地较为稀薄，并不存在自身现实中处于两种或多种文化板块边缘地带的危机感或疏离感，周梦蝶的“疏离境界”本质上是放弃现实场域的“自我处境”转而投射或寄身于多种乃至无数个古典文人的衣钵上，展开“不同姓不同命而同梦”[22]的遨游之旅。

关于周梦蝶饱含虚设与梦幻的诗歌国度建构，本质是依托于古典文学境界和历代文人典故进行取材与编排，具备传统中国人想象世界时所谓“天圆地方，我在中央”的思维惯性和艾儒略（Giulio Aleni）所说的“无处非中”[23]的意识定位，在具体开展写作之时，周梦蝶呈现出了受到多股足以相融，但各有其所各具其势的文化源流影响的状态。主要是枯山水画面与自嘲之苦的情绪位面，他善于推敲典故借物或借景抒情，将诗内容中的建筑、山川、气象等相对宏大的物质进行折叠压缩或横切裁剪，以透视或倾斜的视角完成对画面的剖析和收容，对于相对微观的如浮萍、落叶、香蜡等事物则以近乎折叠或透视的手法将其与宽阔的抒情底色进行镶嵌，按照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的理论，即“我们能参与自然界生命力内部共鸣的前提，是我们自己的内在转化”[24]，周梦蝶在诗中所运作的“内在转换”便是极其突出的，他所常用的修辞手段既稳住了文学与伦理责任之间的必要关系，又在传统的悲剧色彩等文本基底之中，呈现其内心世界深奥莫测或玄虚缥缈的内容。追索其根源，这并非刻意的炫技之举，而是词语和心灵的同频同步。

三：悲慨如火：命运在历史里还乡

在现实场域内，周梦蝶毕生未曾还乡，河南浙川的故园格外遥远和陌生，在写作生涯中，他极少触碰归去来兮的情绪，虽并未设置文本的禁区，但总会有意识地绕道而行。史学界曾有名言“往昔乃是异乡（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25]，即访问过去好比访问异国他乡般疏离，实际上对于周梦蝶而言，乾坤世界竟如同处处是异乡，在时间轴上向前探寻，战乱与流离的青少年时代难言幸福，向中晚年的后半截人生望去，单薄简朴之极的生活轨迹几十年如一日，街前看花开花谢，单衣陪日升日落。台北只是居所，从来无法替代家乡在心中的空缺，然而浙川县城与周梦蝶之间早已隔着万千山水，伴随政治、人文、商业等因素组成的大时代变革持续发生，如同无法返老还童一般，周梦蝶也无法与地缘意义上的家乡再续前缘。他最终只能投身于苍茫书山纸海之中，从繁如云锦的历史信息内不断解码、阐释，从早已亡故的古典人物与岁月的割裂与缝合之间搜寻与自己相似的片缕深思，然后组合拼凑，最终实现精神概念里的还乡历程。

诗歌内所发动的“还乡”写作，检索视域与涉及范畴之广，几乎囊括了一切品类的诗学经验，甚至是潜藏在

不同时区的社会中难以觉察的禀赋，人生经历与周梦蝶拥有部分相似之处的木心，曾在纽约旅居写作札记讨论古典中国与诗歌的关系，他直言“皇帝的诏令、臣子的奏章、喜庆贺词、哀丧挽联，都引用诗体，法官的判断、医师的处方、巫覡的神谕，无不出之以诗句，名妓个个是女诗人，武将酒酣兴起即席口占，驿站庙宇的白垩墙上题满了行役和游客的诗”[26]，中国曾经是个诗国，贯穿于各行业身份或社会地位的人群，都能从中窥见诗人的影子，或是和其专业（职分）紧密相关的生活写照，或是高官显贵咏叹风流韵事的凌云章节，总之多位面多层次的丰富语言构筑了古典中国的诗歌境界。周梦蝶醉心于此，他崇敬、憧憬和信赖各种古典的语言模式乃至是部分价值观，在他的思想中，汉语言形态的最原声化状态应该就是诗歌。清贫、坚韧的周梦蝶在诗歌与历史时空中充当或客串过多重角色，比较典型的隐逸之心充盈在笔尖，对于沉疴旧事的放逐尽显其豁达。但他的“隐”却并非普遍回归田园告别俗尘的诗人所秉持的完全远赴山水之乐的模式，而是介于“江湖之远”和“庙堂之高”间的某种“半隐”状态，本非官僚文人出身的周梦蝶其实内心对于“致君尧舜”式的传统儒家士大夫思想的笃信较为有限，但他始终怀揣着介入世界的心思，在小隐于野和大隐于市之间，企图做到兼得的结果，即心在旷野与山川，而身在闹市街衢消遣年华。

按照秦汉时代社会结构中所瞩目的“游侠”一类群体的特征比对，在诗境中游历江山、壮怀激烈的周梦蝶，竟与之存在部分匹配。他在大彻大悟和生活悲感之外的陶然与乐天情怀，既建立在孔孟思想中普遍存在的“仰不愧天、俯不怍地的不卑不亢之精神”[27]之上，却不以此充作全部的行文之基，而是结合部分“侠”的气质推动对春和景明的冶游探索、自然之乐的沉浸与享受。如此可谓“儒侠并举”的文本，使得周梦蝶的思想独立于任何一类高度体系化的固定约束之中，他把握时而利落如刀刃时而昏沉如青灯的语言，勘破功名和俗物，但并不“逾矩”（超出一般道德价值观与判断逻辑的界限），这对于诗歌创作者而言实非易事。丰盈而多元的思想源泉正是激活并助推周梦蝶写作的核心力量。

由于具有对神性或“形而上”的境界交流的欲望，周梦蝶的诗中不乏饱含宗教在内的中外诸种思想体系的产物，譬如以“上帝”为代表的基督教词汇在其写作中“反复出现，且贯穿了其前后期作品”[28]，这是他为自己的文本精神主旨之一的“悲悯”所搜寻到的一处释放点，通过“上帝”形象所具备的“造物”及“创见”能力，周梦蝶得以在诗歌写作中开拓多形式的抒情方式，其中较为显著的是“发问”，他不吝嗇疑惑的表达，无论是关乎自身现实维度所见所感的社会现象，或是历史中曾发生的悬而未决的迷蒙遗案。当然周梦蝶并不固执或苛求于一定获得相关的答案，所谓迷雾重影中天光乍破的一角，对于他而言也是诗歌所收获到的启迪。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跳出“得失二元论”或“零和博弈”的思想模式，很大程度上除了儒家、基督之外，还有广阔板块的与之决然不同甚至看似对垒的思想在发挥作用，正如杜维明所言说的理论，“道家批评儒家的礼仪，儒家批评道家的避世，都体现一种对话式的交互作用，它反映出两家之间存在着更深层的一致”[29]，在这种更深层的“一致性”中，当代学者得以进一步解读和阐释周梦蝶所具备的脱胎于禅宗、道家的修身与无常性、逍遥与自然观的思想内涵。

首先是老庄之学的影响。周梦蝶的笔名便取自《庄子·齐物论》中的“昔者庄周梦为蝴蝶”[30]的典故，寄托对自由的向往，同时也与其诗歌写作中所构筑的虚幻空间相应和，看似舍去或隐匿掉“现实之我”的周梦蝶实际在道家关乎天人思想的理解中，可以被解读为人与景、“物”与“我”的融合，即诗境中的山海世界处处可见周梦蝶“本我”的身姿存在，高度类似天人兼容、天人合一的理念，甚至还不仅是天与地两项宏大的元素与“本我”相融，按照威尔弗雷德·C·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提出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31]概念，周梦蝶在诗学中将包括花草、府邸、云雨在内的“万物”内容都混同自身的特性而出现，而其中尤为重要，需要注意的是“山水”问题。周梦蝶视域辽阔，从历代的传统礼义及典乐规程中，汲取了足以直观性改变现代诗普遍书写逻辑的重要内容，即是来源于山水修行、自然秩序的“空寂”之音，其中所包含的“以无证有”和“无音之静”的哲学理念，与道家的“贵无原则”以及“对虚静境界的推崇”[32]相契合，乃至可能存在继承衍生的关系。周梦蝶以此哲学理念中的“寂”对应自身命运历程中所感受的“寂”，造就了道家思想的部分价值，从隐性走向了可观之于文字之间的显性状态，由此他的诗篇在事实上等同于赵汀阳所谓“仁者智者借得山水的尺度以观历史，因此能够平静理解人世”[33]的境界，周梦蝶得以自由穿梭或静坐于一个丰赡宁静的寰宇之内，以此对照、关怀或融化现实闹市街衢、人声鼎沸的一个充斥紊乱不安或零星幸福的世界。

然后是禅意佛法的影响。周梦蝶四十岁前后开始礼佛习禅，这份包裹着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内涵的思想体系长期植入他的写作之内，令本身就较为稀薄的尘世之味愈加空无，让抒情成为历史时空里随手可掬的波纹月色，而不再是一粥一饭之间打量铜板的镜片。佛学赋予了他面对坎坷命运和人生苦难之时足以稳持内心的定力，同时

也为创造诗境的虚幻和迷离之际提供了部分理论性的依据,正如佛家经典曾用诗句“月落乌啼,三千界唤醒尘梦”警醒人心的钟声,所谓“有情世界即一大漂泊,何处才是止泊?”[34],周梦蝶深受人生如梦幻泡影的世界观浸入,他既在乌斯藏、安多、康巴、拉达克为代表的藏地佛教所提倡的“众生皆苦”概念中开展自身的修行,又在高棉、阿逾陀为代表的南传佛教所注重的寻悟人间“慧果”的意念内求证此生的价值,但主要介入他诗学质地的还是汉地佛学中历代文人诗家所留下的产物。其中所蕴含的辩证与哲理、气质和情绪始终吸引乃至左右着写作,譬如《四行》中的语言:

眼之上有眼,之上复有眼;
足之下有足,之下复有足——
路是倒退着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一眼望不到边,荷叶上的泪点。[35]

在“眼”与“足”的哲理性讨论之中,周梦蝶顿悟了至少两个层面的“路”的意义,其一是人生发展路径的追悔与反思,其二是诗学中沿着时间轴反溯历史的信息,令人多有感伤和触动。周梦蝶像是执棋之人,诗境空间中的“我”与现实凋敝的“我”长久对弈,同时却也是棋中人,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棋盘上,万象万物的任一因素都或可改变周梦蝶的命运公式。对于他而言,抬头也是低头,天上月也是地上雪,静坐也是在践行某种概念上的行走,在街边贩书也是在贩卖人生的感悟和精神。在佛学中“复”的概念又可以解释为一项“轮回”,周梦蝶的诗意除却梦幻美好的想象追踪、率真诙谐或从容心绪的呈现之外,对于世事无常、情感幻灭的叹息,以及对失落的咀嚼乃至超越,和同为参悟佛学的诗人李商隐极其相似。陆琳曾指出“李商隐的佛缘特别是在他丧妻之后越发加深”[36],事实上周梦蝶在1948年与发妻分离后,在台生涯终生未续娶,长期孤独行居,或也因此造成了佛缘的加深。与身外的风物如同隔绝有一道透明的墙体,更多的读书与冥想只是心口循环发生的冷肃运动,禅与诗在他的笔端犹如天然的搭档,在“道”的思想所赋予的安宁和逍遥的“静”之外,另增加了一种无迹无求、无言忘言的“无”感,纵观同期的诗坛这几乎是独有的境界。

研究周梦蝶的写作和思想,既类似针对古典美学的副本展开勘探,又如同是面朝一部横跨汉语新诗发展史的“稗官野史”进行甄别与归档。诗歌是周梦蝶在精神层面赖以生存、在物质层面视为珍稀的私家札记,其中所展现的兼合、克制、静养、敬惮等特征所组成的思想,具备充沛的中国古典文学养分,在客观上是置身西化风潮与白话横行的文学时代,对古典汉诗尊严及价值观的一种守护和拱卫。与之同时周梦蝶对抒情结构的个性化改良、针对想象空间的特殊化拓增,在事实上造就了一种介于“没有规范的天才美,自然美,不事雕琢”和“严格规范的人工美,世间美,字句斟酌”[37]之间的诗歌美学的模式。时至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汉语新诗的主潮已经距离古典的语言系统,和基于此建立的诗歌境界愈来愈远,伴随口语性质的诗歌泛滥流行,周梦蝶的思想近乎于某种古刹深幽的碑铭,或河谷旧日的水文线,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等待来访的人。

参考文献:

- [1] 张桃洲. 1980—1990年代诗歌场域与诗学论题的转变——以出版物为线索[J].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025(1).
- [2] 李春阳. 白话文百人百论之: 周梦蝶、余光中、洛夫[J]. 社会科学论坛, 2024(1).
- [3] 郭枫. 风雨凄迷路, 彩虹照眼人——覃子豪: 五十年代台湾新诗荒野播种者[J].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14(4).
- [4] 龙泉明. 中国新诗第二次整合的界碑[J]. 中国社会科学, 1996(5).
- [5] 周梦蝶. 梦蝶 66首[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社, 2023: 31.
- [6] 苏雪林. 新诗坛象征派创世者李金发[N]. 自由青年, 1959-01-01(001).
- [7] 白少帆, 王玉斌, 张恒春, 武治纯. 现代台湾文学史[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 316.
- [8] 钟怡雯. 诗的炼丹术——余光中的散文实验及其文学史意义[J]. 华文文学, 2008(4).
- [9] ALEX PREMINGER.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407.
- [10] 李章斌.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穆旦诗歌的修辞与历史意义[J]. 文艺争鸣, 2018(11).
- [11] 程一身. 台湾“49年一代”诗人的大陆书写[J]. 上海文化, 2025(3).
- [12] 庄子. 庄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316.
- [13] 陈仲义. 周梦蝶: 孤绝而幽邃, 空无而丰盈[J]. 南方文坛, 2021(2).
- [14] 杨四平. 中国新诗叙事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316.

- [15] 孟晖. 花间十六声[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21.
- [16] 徐志摩. 诗刊放假[N]. 晨报副刊·诗镌, 1926-11-01(011).
- [17] 周梦蝶. 约会[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5: 3.
- [18] 李章斌. 自由诗的“韵律”如何成为可能? ——论哈特曼的韵律理论兼谈中国新诗的韵律问题[J]. 文学评论, 2018(2).
- [19] 孟繁华. 文学性意味着什么——从阅读经验看文学性[J]. 文艺争鸣, 2023(1).
- [20] 周梦蝶. 梦蝶 66 首[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社, 2023: 76.
- [21] [美] 威斯坦·休·奥登著; 王敖译. 读诗的艺术[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25.
- [22] 周梦蝶. 约会[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5: 104.
- [23] 葛兆光. 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J]. 文史哲, 2021(3).
- [24] 徐剑.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儒家民本思想的观念特征及其现代转化[J]. 燕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2).
- [25] 罗新.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批判、怀疑与想象力[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24: 4.
- [26] 木心. 鱼丽之宴[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64.
- [27] 郑培凯. 谁共我醉明月[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292.
- [28] 屠丽杰. 浅论周梦蝶诗歌中的基督教意象[J]. 文学教育, 2016(12).
- [29] 杜维明. 儒家思想: 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5.
- [30] 庄子. 庄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17.
- [31] 孙艳艳. 个人的“信仰”与“累积的传统”——论史密斯的比较宗教学思想与方法[J]. 世界宗教文化, 2018(2).
- [32] 单月, 张东旭. 道家美学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空寂声音景观[J]. 中国韵文学刊, 2024(4).
- [33] 赵汀阳. 历史·山水·渔樵[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67.
- [34] 胡晓明. 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16.
- [35] 周梦蝶. 约会[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5: 73.
- [36] 陆琳. 浅谈王维、李商隐诗歌佛学意趣的差异[J]. 江淮论坛, 2002(1).
- [37]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147.

Fire in the snow: the dual realm of lyricism -- On Zhou Mengdie's poetic thought

Gao RuoDong

(Hong Kong Academ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49 year generation" of Taiwan poetry, Zhou Mengdie's fate is subject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her soul yearns for classicality. The lonely and sad temperament contained in the work, and the cultural information mixed with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not only laid a distinctive personal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expanded and practiced the value theor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 lyric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dual realm of fiction and reality in the works promotes the repair, extension or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space and creates a spiritual journey of "returning home". A thorough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of his poetic thoughts may help expand the scope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Keywords: Zhoumengdie; Taiwan literature; Poetic thoughts; Lyrical value

非遗骆越文化中舞蹈元素的传承与研究

钱湘芸¹

(1. 南宁师范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 530299)

摘要: 骆越文化作为壮族代表性文化遗产, 其舞蹈元素承载着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生活智慧与精神信仰,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化进程加速与文化生态变迁的双重背景下, 骆越舞蹈正面临传承断层、创新不足等现实困境。本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为切入点, 通过文献研究、田野调查、访谈与实证分析等多重方法, 系统梳理骆越文化的历史渊源与舞蹈元素的文化内涵, 深入剖析当前传承现状与核心问题, 探索“挖掘-提炼-创新-传播”的活态传承路径。研究旨在为骆越舞蹈元素的系统性保护提供理论支撑, 为民族民间舞蹈的现代化转化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助力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实现活化新生。

关键词: 骆越文化; 舞蹈研究; 活态传承; 文化创新

结题项目: 2025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校级), 《非遗视域下骆越文化中舞蹈元素的活态传承路径研究》项目资助, 项目编号: KY25ZQN037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708

一、引言

骆越文化发源于中国南方珠江流域, 是壮族、侗族等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 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左江花山岩画等遗存中的舞蹈图像, 印证了其舞蹈文化的悠久传承。这些舞蹈与先民的祭祀、生产劳动、宗教信仰紧密相连, 在壮族聚居地代代相传, 骆洞舞已列入广西区级非遗名录。然而, 现代化进程使骆越舞蹈面临传承人断层、文化内涵挖掘不深等挑战, 从非遗保护视角开展传承研究具有紧迫性与学术价值。理论上, 本研究可填补学界空白, 丰富非遗活态传承理论体系; 实践中, 能为保护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提升民族文化认同。目前, 国内对骆越文化研究多集中在考古学、人类学领域, 对舞蹈文化关注较晚, 系统挖掘、传承机制及创新路径研究不足; 国外相关研究观点及保护模式可为本文提供借鉴, 但国内外尚未形成针对骆越舞蹈元素传承与创新的系统性成果。本研究采用多种研究方法, 创新点在于首次从非遗活态传承视角构建“挖掘-提炼-创新-传播”完整体系, 探索传统舞蹈元素现代化转化路径, 并通过编创实践验证其可行性。

二、骆越文化与舞蹈元素的历史渊源

骆越族是古代岭南重要少数民族, 活动范围广, 涵盖今广西、广东西南部、云南东南部、贵州南部及越南北部, 核心聚居珠江流域中下游河谷平原与丘陵地带, 气候湿润、土地肥沃, 利于发展渔猎、农耕文明。骆越文化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 先民掌握原始石器制作技术, 形成适应环境的生产方式与文化习俗。晚期进入定居, 稻作农业成主要生产方式, 社会组织结构初步形成, 原始宗教萌芽, 为舞蹈文化产生提供基础。

青铜时代(约4000年至2200年前), 骆越文化鼎盛。青铜冶炼技术成熟, 铜鼓等器物出现, 成为文化标志。社会组织完善, 部落联盟形成, 文化影响力扩大, 舞蹈文化跨越式发展, 从简单肢体动作发展为具固定仪式、特定内涵的艺术形式, 成为维系部落认同、沟通人神、庆祝丰收的重要载体。秦统一岭南后, 中原文化与骆越文化交融, 儒家思想、汉字体系传入, 影响深远。骆越族逐渐融合发展为壮族等现代少数民族, 文化传承中吸收新元素, 骆越舞蹈保留核心基因, 融入不同时期元素, 成为活态文化遗产。骆越舞蹈起源与生产生活、原始信仰相关,

作者简介: 钱湘芸(1994—), 女, 湖北武汉人, 硕士研究生学历, 讲师, 研究方向为舞蹈教学理论与文化研究。

是人类早期艺术起源典型代表。新石器时代,先民为祈求风调雨顺等,通过模仿动物、再现生产场景、举行祭祀等方式表达敬畏与向往,发展为早期骆越舞蹈。左江花山岩画留存舞蹈人物形象,还原早期形态,印证舞蹈与原始宗教深度绑定。青铜时代是骆越舞蹈成熟期,铜鼓推动其发展。骆越铜鼓工艺精湛,纹饰丰富,舞蹈图案再现当时繁荣。铜鼓不仅是伴奏乐器,纹饰也蕴含文化寓意,如蛙形象征繁衍丰收。此时舞蹈类型渐丰,祭祀、劳动、节庆舞初步形成,仪式性、规范性增强,动作的完善,成社会生活重要部分。骆越舞蹈文化内涵深厚,起源于原始巫舞,核心是沟通神灵、祈福禳灾。骆洞舞是典型代表,祭祀文化内涵深厚,仪式流程庄重,表达对祖先缅怀与敬意,祈求部族平安、五谷丰登。同时,舞蹈动作多源于生产劳动,是艺术再现,蕴含生活智慧与对自然的感恩。如捕鱼舞再现渔猎过程,插秧舞等还原农耕场景,鹭鸟舞、蛙舞等体现“天人合一”生态智慧,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

骆越舞蹈蕴含深厚民族精神内涵,强调集体性与统一性,动作整齐、节奏有力,展现团结协作、坚韧不拔的精神,是维系族群认同的文化象征。其集体舞蹈形式不仅艺术表达所需,更与骆越族社会结构、生存环境紧密相关。在古代,团结协作是部族生存发展关键,集体舞蹈则成为培养团结意识、增强凝聚力的重要方式。骆越舞蹈动作刚健质朴,体现积极向上、奋发图强的精神力量。骆越舞蹈类型与分布地域特征鲜明。祭祀类舞蹈以骆洞舞为代表,分布于武鸣、上林等地壮族聚居区,用于祖先祭祀等仪式,表演庄重肃穆,具有强烈宗教仪式感。节庆类舞蹈参与性最强、流传最广,主要在三月三等传统节日表演,用于庆祝丰收等,广泛分布于广西壮族聚居区,如三月三的跳堂舞等,动作简单欢快,充满喜庆氛围。劳动类舞蹈最具生活气息,动作源于渔猎、农耕等生产劳动,形式灵活多样,兼具娱乐性与实用性,主要分布于农村地区,与生产生活场景紧密结合,如插秧舞、捕鱼舞等。这些舞蹈无固定表演场地,田间地头、村寨庭院皆可,表演形式灵活,可单人也可集体,是骆越先民将生产劳动艺术化的生动体现。

三、骆越文化中舞蹈元素的传承现状与问题

骆越舞蹈传承现状呈现传统与现代交织特点,传承主体多元,包括民间艺人、专业舞者与高校力量。民间老艺人出身传承世家或长期表演,掌握纯正技艺与仪式流程,通过师徒传承和文化活动传播骆越舞蹈。专业舞者与工作者毕业于专业院校,挖掘整理改编元素,创作符合当代审美的作品,推动专业化发展。高校如南宁师范大学、广西艺术学院等开展相关研究,设立课题,组织田野调查,收集资料建立数据库,并将元素纳入课程体系培养人才。骆越舞蹈传承正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形成“口传心授+学校教育+媒体传播”的多元模式。口传心授保留原始风貌,但范围有限;学校教育成为重要渠道,中小学融入美育课程,高校深化研究;现代媒体与数字技术提供新路径,通过新媒体平台和VR、AR技术传播,建立数字化数据库。

保护措施上,政策、学术与社会协同推进。政府政策支持提供保障,列入非遗名录,给予资金支持,出台政策建立传承基础,举办文化活动。学术研究深入提供理论支撑,学界研究升温,加强国内外交流。社会力量参与注入新活力,企业赞助文化活动、开发文创产品,社会组织开展普查、研究、推广等工作,志愿者协助传承。然而,骆越舞蹈元素传承面临核心问题。传承人断层严重,老龄化且年轻群体传承意愿低,传承链条面临断裂。现代化进程改变年轻一代生活方式,他们更追求时尚流行文化,对传统舞蹈缺乏兴趣与认同。同时,传承耗时费力,经济回报有限,难以满足年轻人需求。文化内涵挖掘不足,学术研究多集中于形态描述,对深层次内涵挖掘不够深入,年轻传承人与受众理解流于表面,表演缺乏灵魂与感染力。展演与传播中,主办方侧重舞台效果,观众难以理解文化价值。保护机制不完善同样影响骆越舞蹈传承与发展。尚未形成“政府-学界-社区”协同保护合力。政府层面,政策缺乏系统性与针对性,执行不到位,资金投入不足,部门间协调配合不畅。学界层面,学术研究与实践传承脱节,部分研究过于注重理论探讨,缺乏对实践传承的指导意义,高校与科研机构与民间传承人合作不够深入。社区层面,居民保护意识淡薄,参与度不高,城镇化进程破坏社区文化生态,骆越舞蹈生存空间缩小,传承活动缺乏常态化机制,难以形成持续传承氛围,且社区与政府、学界沟通协作不够。

骆越舞蹈发展受多重因素制约。创新转化能力薄弱,难以适应当代社会。艺术表现形式上,动作体系固定、舞台呈现简单,缺乏个性化与创新性;道具服饰缺乏现代感与冲击力;伴奏音乐风格古朴,难以吸引年轻观众。创新实践层面,尝试多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度与系统性,部分作品简单拼接动作,过度追求舞台效果,掩盖核心

文化元素。同时,创新人才匮乏,传承人与创作者缺乏现代编创理念与技能。传播方式上,仍以线下展演和传统媒体为主,对新媒体运用不充分,难以适应年轻群体传播习惯,传播效果不佳,难以形成广泛社会影响力。

四、骆越文化中舞蹈元素的活态传承路径

构建多元化传承体系是骆越舞蹈活态传承的核心。需强化传承人培养,建立“老艺人+专业教师+青年学生”模式,邀请老艺人进校园授课并结对传承,设立激励机制,通过高校专业课程培养专业人才。推进学校教育传承,将骆越舞蹈纳入中小学及高校教学体系,编写校本教材,组织社团活动,高校则深化课题研究。激活社区传承活力,以壮族聚居地为核心建立传承基地,结合传统节日开展活动,鼓励居民参与编创与传播。深化舞蹈元素挖掘与提炼是基础。开展骆越舞蹈资源普查,全面梳理舞蹈类型,收集资料并建立数字化数据库,分类归档实现资源共享。聚焦核心元素提炼,分析动作特征、动律规律与体态特点,提炼代表性元素,结合考古与文献解读文化寓意,为创新转化提供理论支撑。推动跨学科研究赋能,整合多学科资源,还原历史语境,深化文化内涵理解。推动创新转化是提升生命力的关键。

艺术表现形式上,融合骆越舞蹈核心元素与现代、流行舞蹈,编创新作品,运用现代技术增强视觉冲击力,拓展表现场景。传播方式上,利用新媒体技术打造数字传播矩阵,适应年轻群体传播习惯,提升文化影响力。文旅融合方面,结合旅游资源打造体验项目、演艺活动,开发文创产品,实现双赢,举办文化节提升品牌影响力。完善保护与保障机制是重要支撑。健全政策支持体系,出台专项保护政策,加大资金投入,纳入地方文化发展规划,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强化学术研究支撑,设立专项课题,鼓励深度研究,加强国内外交流合作,借鉴先进经验,支持学术成果转化。提升公众保护意识,通过媒体宣传、文化讲座等普及知识,鼓励公众参与传承与传播,形成良好氛围。

五、骆越文化中舞蹈元素的研究成果

为验证骆越舞蹈传承路径可行性,课题组以核心元素为基础,开展两年创新编创实践,推出群舞《花山印象》,探索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创新转化路径,提供可复制推广的实践案例。作品以左江花山岩画为灵感,再现骆越先民祭祀、生产生活与精神信仰,搭建古今文化桥梁。创作团队实地考察岩画遗址,观察舞蹈人物形象、器物样式等,走访老艺人与文化学者,收集相关神话传说、民俗故事,深入了解骆越先民宇宙观、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确立“以岩画图像为载体,以文化内涵为核心,以现代编创为手段”的创作思路,力求打造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时代创新性的作品。核心元素运用上,动作层面提炼岩画、铜鼓纹饰及传统骆越舞蹈中的核心动作符号,艺术化加工重组。如岩画中舞者姿态经放慢节奏、强化力度,突出庄重感;铜鼓纹饰中的羽人、蛙形舞蹈动作简化夸张成点睛之笔;传统劳动舞蹈动作提炼为核心动律,融入祭祀场景。同时,注重动作规范性与创新性平衡,借鉴现代舞蹈发力方式与肢体表达,增强表现力与感染力。动律层面保留骆越舞蹈铿锵有力、整齐划一特征,融入现代音乐元素,丰富节奏层次。伴奏以铜鼓为核心,加入民族乐器与电子音乐元素,营造不同情感氛围与场景转换。体态风格与服饰设计上,延续庄重质朴、刚健有力风格,服饰以壮族传统服饰为基础,融入岩画色彩与纹饰元素,营造神秘意境,增强视觉冲击力。

群舞《花山印象》实践成效显著,获业内与观众认可。入选广西音乐舞蹈比赛决赛,评委赞其创新理念与舞台呈现,为民族舞蹈创新提供范例。后在西南少数民族舞蹈展演中获广泛关注,受邀参加多个文化活动,成为展示骆越文化名片。作品传播成效显著,线下展演与新媒体的广泛传播,播放量超500万次,获点赞超20万次,部分学校将其作为教学案例。其成功推动骆越舞蹈文化认知度与影响力提升,带动文旅产业发展,促进学术研究与文创开发,实现文化与经济双赢。该作品验证了“挖掘-提炼-创新-传播”体系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为骆越舞蹈活态传承带来启示:坚持文化自信,注重创新思维,强化协同合作,关注受众需求,提高受众覆盖面与认同感。

六、结论

骆越文化中的舞蹈元素承载着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生活智慧与精神信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传承目前面临传承人断层、文化内涵挖掘不足、创新转化薄弱、保护机制不完善等困境。要实现

骆越舞蹈的活态传承,需构建“老艺人+学校+社区”的多元化传承体系,深化核心元素的挖掘提炼,推动艺术表现与传播方式的创新转化,完善“政府-学界-社区”协同的保护保障机制,而《花山印象》的成功实践已印证了这些路径的有效性。随着保护意识的提升与传承路径的完善,骆越舞蹈元素必将在当代焕发新生,成为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纽带,让这一古老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绽放绚丽光彩。

参考文献:

- [1] 张明学,王宇坤. 广西壮族骆洞舞研究[J]. 艺术评鉴, 2019(19).
- [2] 覃彩銮. 骆越舞蹈文化——骆越文化研究系列之一[J]. 广西民族问题探究中心, 2019(6).
- [3] 覃彩銮. 骆越舞蹈文化[J]. 广西社会文化学院学报, 2019(3).
- [4] 吉尔伯特·默里. 希腊悲剧中的仪式[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5] 王文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
- [6] 田青.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活态传承[J]. 文艺研究, 2017(10).
- [7] 李海革. 多学科理论构建下的民族民间舞蹈艺术[M].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8] 许毓晓. 论我国民族民间舞蹈艺术中的美学因素[J]. 大众文艺, 2016(8).
- [9] 李凯. 广西花山岩画图像元素在壮族师公舞编排中的应用与研究[J]. 艺术评鉴, 2019(10).
-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20.
- [11]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 [12]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
- [13] 资华筠. 中国舞蹈美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14] 骆越文化研究会. 骆越文化研究论文集[C].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17.
- [15]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案例集[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8.

Inheritance and Research on Dance Elements i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Luoyue Culture

Qian Xiangyun

(1.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530299)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Zhuang ethnic group, Luoyue culture's dance elements carry the historical memories, life wisdom, and spiritual beliefs of southern ethnic minorities, constituting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ed modernization and cultural ecological changes, Luoyue dance is facing practical dilemmas such as inheritance discontinuity and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s its starting point and employs multiple methods, including literature research, field investigations, interview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o systematically illustrate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Luoyue culture a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its dance elements. It delves deeply into the current inheritance status and core issues, exploring a living inheritance path of "excavation-refinement-innovation-dissemination." The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systematic protection of Luoyue dance elements, offer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thnic folk dances, and assist in the revitalization and rebirth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words: Luoyue culture; dance research; living inheritance; cultural innovation

高校文物保护建筑的可持续利用策略研究

——以四川大学华西校区为例

陈逸璇 蒋宝晴 樊梅

(四川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本研究着眼于高校文物保护建筑的保护与利用, 以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古建筑群为例, 通过文献调查、参与观察、采访等方法, 探索高校文物保护建筑利用中的问题与可持续利用策略。旨在提升文物保护资源的利用质量、传承优秀办学精神、凝聚师生文化自信, 为校园古建筑的有机更新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

关键词: 大学; 文物保护建筑; 可持续利用; 校园文化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90

1. 引言

百年建筑折射百年精神, 高校历史建筑是大学重要的物质遗产和精神文化载体。据国家文物局所属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查询平台显示, 截至目前, 全国共有 32 所高校的历史建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 如今历史景观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已成为许多拥有文物保护建筑的高校面临的共性问题[2]。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增强文化自信的语境下, 挖掘高校历史建筑的文化底蕴, 优化其利用方式, 符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国家发展需要。

2. 历史及分布概况

四川大学华西校区起源于 1910 年由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在成都联合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新中国成立后, 华西协合大学在 1951 年更名为“华西大学”, 之后学校从综合性大学变更为医学院校并改名为“四川医学院”, 1985 年又改名为“华西医科大学”。经院系调整与合并, 2000 年成为四川大学华西校区。最早的华西协合大学选址在老成都城南锦江外的一块平地上, 故此地被称作“华西坝”。华西坝古建筑群由英国贵格会建筑师荣杜易(Fred Rowntree)设计, 加拿大建筑师苏继贤(Walter Small)等与中国工匠们从 1912 年起历时 34 年共同合作建成, 是中国建筑史上第一个教育和医疗专业化建筑群。华西校区的建筑中西合璧, 大楼布局和内部结构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纯西式贵格结构, 外观和装饰上则使用了青砖黑瓦、画栋雕梁、红门绿窗等中式建筑特色[3]。这些建筑是东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结晶, 既可见传统的延续, 也开启了成都现代化的起点。

2013 年 5 月“四川大学古建筑群”被国务院认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群中, 一处位于望江校区, 八处集中在华西校区。华西校区的国家级文保建筑分别是: 一教“嘉德堂”、二教“懿德堂”、四教“合德堂”、五教“育德堂”、六教“明德堂”、医学博物馆(原图书馆)“懋德堂”、办公楼“怀德堂”、钟楼。此外, 华西校区还有七教、八教等市级历史古建筑。

八座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使用概况详见表 1, 部分建筑的风貌如图 1、图 2、图 3 所示。

作者简介: 陈逸璇(1991—),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医学教育管理、社会学;

蒋宝晴(1987—), 女, 硕士,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医学教育管理;

樊梅(1986—),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医学教育管理。

通讯作者: 陈逸璇

表 1. 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的使用概况

序号	名称	建成年份	用途	使用单位
1	嘉德堂 (一教)	1924	教学、科研、办公	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
2	懿德堂 (二教)	1941	教学、科研、办公	华西药学院、化学学院、建筑与环境学院、分析测试中心、后勤保障部、校纪委监察处
3	合德堂 (四教)	1920	教学、科研、办公	华西口腔医学院
4	育德堂 (五教)	1928	教学、科研、办公	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科技产业集团
5	万德堂 (六教)	1920	教学、科研、办公	华西药学院
6	怀德堂 (行政楼)	1919	办公	华西医学中心
7	懋德堂 (医学博物馆)	1926	展览、公众教育	华西医学中心
8	钟楼	1925	外观展示	后勤保障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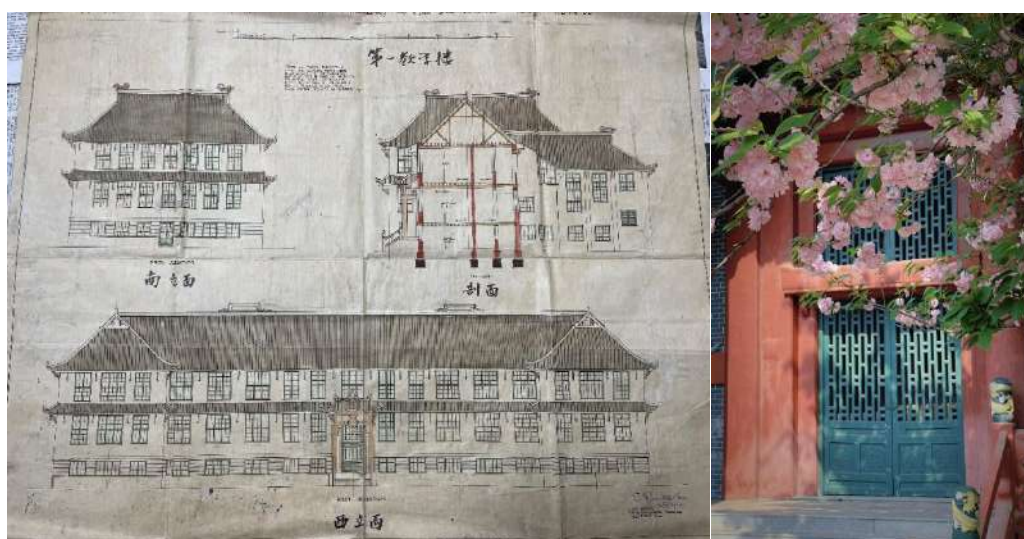


图 1 嘉德堂 (一教) 1922 年的设计图纸与 2025 年的正面实景

注: 2024 年 5 月摄于四川大学档案馆和嘉德堂



图 2. 代表性建筑怀德堂 (行政楼) 的外观

注: 2025 年 10 月摄于四川大学华西校区



图 3. 懋德堂（原图书馆、现医学博物馆）建成之初的实景图与现在内部景观

注：2024 年 10 月摄于四川大学华西校区

3. 利用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3.1 建筑条件与空间利用方式间不匹配

二十世纪初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启航，一批承载着时代印记的校园建筑不断涌现。然而，高等教育历经百年变革，这些校园规划与建筑已与当下办学需求出现龃龉。随着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需求的增加，四川大学医学口的师生人数、实验室规模都快速扩张，华西校区位于土地资源紧张的中心城区，校园空间十分有限，难以拓展。虽然近年来新建的实验室大多设立于新区，但华西坝作为华西医学的发源地，仍保留了许多实验室。医学实验室涉及动物实验与化学试剂，对建筑的物理和化学条件、废水废气设施都有较高要求。而华西校区内古建筑的建筑结构、空间布局等条件与现代化实验室的使用需求产生了突出矛盾。

3.2 管理主体分散、缺乏统一筹谋与顶层设计

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古建筑的主管部门是校资产管理处，主要负责与文物保护部门的普查对接、修缮资格审批、公房分配协调等业务。古建筑的日常维护与安全保障则由各使用单位直接负责。校级层面缺乏对于文物保护建筑的统一政策指导、定期维护和建筑安全评估，一旦日常使用中有问题，涉及审批手续、经费申请、维修执行等又有不同归口。这种管理主体分散、业务职责不清的现状使得文博建筑的风貌保全与可持续利用受限，难以形成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

3.3 修缮中的审批与资金困境

高校国家级文物保护建筑的大型修缮资金来源大致分为文物保护口径的财政拨款、教育口径的财政拨款、和自筹三种。文物保护口径财政拨款的修缮，对项目的必要性、紧迫性和方案的科学性的要求高，且审批流程长。由于资金竞争激烈，文物部门往往倾向于投入给无其他收入渠道的非盈利单位，大学因为有教育口径的经费很难在此渠道获批。教育口径的房屋修缮类财政拨款全名叫“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其用于古建维修则有以下三点困境：一是标准限额需控制在 2000 元/m²内，而古建筑的维修成本普遍高于此；二是经费本着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原则，评审会把修缮内容限制为最基础、最紧急的部分，而文保口的维修审批要求设计和实施都是整楼方案；三是教育口径也会因为文保建筑适用于文保口径经费，往往将项目的优先级置后。因为经费困境，华西校区文保建筑的实际修缮往往需由使用单位自筹部分资金，但由于校内各二级单位经费状况不同，校区内文保建筑安全状态和建筑风貌上良莠不齐。

零星修缮原则上也需要审批报备，但因审批复杂度且无统一经费支持，实际操作层面存在使用单位请非古建筑专业人员未经审批直接修缮的情况。这可能导致建筑健康问题治标不治本，且破坏历史痕迹和真实性。再者，因缺乏系统、连续的档案记录，导致后人不了解历次维修的具体情况，为未来的保护决策带来困难。

3.4 文化元素未得到挖掘、关注度与保护参与度低

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古建筑群的价值不仅限于中西合璧的建筑形式，更在于它作为中国近代医学、高等教育与文化交流活化石的深厚内涵。嘉德堂、懋德堂、合德堂、育德堂、万德堂是教学、科研和办公的混用空间，怀

德堂（老行政楼）和懋德堂（老图书馆、现医学展览馆）则从建成之初起就具有公众集会功能。然而现有利用方式单一、陈旧，仅作为日常工作的运行空间，其作为精神文化载体的可能性未得到重视和展示。以公共建筑怀德堂和为例，出于保护目的，日常不允许师生和民众参观游览。再者如懋德堂，建成之初便是中国第一座公共大图书馆，百年来一直是重要的展示形公共空间，但如今馆内以影像展览为主实物展品匮乏，未与校博物馆、档案馆联动挖掘展示内容。此外，建筑群并未作为有机整体来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4.其他高校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利用经验

高校历史建筑在构建和使用过程中，见证了大学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外动力所构成的历史脉络，并在其独特的历史空间中凝聚了能够彰显、认同与尊崇的文化形态，如人文传统、价值理念、研究风气等[4] [5]。

随着当代高等教育理念的转变，人才培养模式的革新，高校建筑的空间环境应该朝着开放、交流、多元、共生的方向发展。西安交大、西北大学等学校通过拆墙拓展空间、内外景结合、分层设置功能的策略，打破传统封闭布局，构建了开放多元的现代教学环境[6]。厦门大学作为港口城市的一流大学，也拥有许多有地域特色的历史保护建筑，其在校园的规划实践中，将校园空间向城市开放，促进功能与文化的双向渗透，最终形成城市校园的共生格局，打破“千校一面”与有形围墙的困境，也提升了大学与所在城市的互动[7]。针对文物保护建筑维护资金的困境，广州构建了“制度—政策—资金”立体支持体系，通过《历史建筑合理利用实施办法》等地方性政策允许功能置换与适度扩容，设立“岁修+修缮”双轨补贴，并积极引入社会资本、申请中央预算与地方专项债，形成多元资金支撑[8]。日本同志社大学是1875年由进步人士建立的有基督教背景的综合大学，其与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建校的背景有共同之处，有五处建筑被评为日本的国家级重要文化财产。同志社大学针对这些历史建筑的特色做法为建立了以师生为主体“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统筹资源开展建筑保护、历史文化研究、公众教育与观光等调查研究和实践[9]。

5.关于文物保护建筑可持续利用的建议

为系统解决华西校区古建筑在利用与保护中存在空间利用方式落后、管理分散、修缮资金困境及文化内涵挖掘不足等问题，实现其从静态保存到功能可持续的转变，结合其他高校和地区的先进经验，提出以下优化建议：

5.1 推动空间功能复合化转型，优化空间资源配置

针对历史建筑与现代使用需求不匹配的矛盾，在公房调配和新区规划中，逐步将对木制建筑健康易产生负面影响的腐蚀性、高负重实验室迁出，把腾退出的空间转型为教学和交流空间，如文化陈列、学术沙龙区或接待空间。此举既能缓解功能冲突，又能通过引入公共活动，增强人与建筑的互动性，提升空间价值与活力。

5.2 建立协同管理机制，完善建筑健康监测体系

文物保护建筑的使用与保护不能完全照搬常规建筑的管理体系，而应当针对其脆弱性、珍贵性、文化性的特征，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管理机制。首先可依托资产管理处成立校级“文物保护建筑管理小组”，统筹资产管理、基建、后勤保障部、博物馆、档案馆、各使用单位参与日常使用与维护管理。其次，编制保护与利用导则，制定清晰的权责清单，明确各主体职责和审批流程。同时，建立数字化的建筑档案，包含通过三维扫描等技术搭建的建筑安全信息和历史档案等文化信息。

5.3 设立专项维修基金，构建多元资金保障体系

对于大型维修，文物保护建筑管理小组应在把握所有古建筑健康状况的前提下，根据修缮紧迫度、经费自筹能力等建立维修排序，逐次申请财政拨款的专项基金。同时予以不同归口审批流程的支持。对于零星维修，制定符合古建修缮规律的预算标准，在校内设立专项维修基金、购买专业的古建维修服务，杜绝因资金不足或管理不清导致的小病不治或私自不当修缮。资金筹措方面，除依靠文保口径和教育口径的财政拨款外，通过系统梳理华西坝文化内涵，面向校友群体设立文脉传承基金，完善捐赠反馈机制，激励社会资本投入，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支撑格局。

5.4 深化展教融合，打造文化育人场域

依托“文物保护建筑管理小组”，定期面向师生开放活动项目和研究项目的申报，将古建筑群整体作为育人核心场域，推动展教深度融合。如设计文化游览路线，鼓励学生社团开展测绘、口述史采集等活动，让师生在历史环境中感受校园文脉，将保护意识内化为文化自信。此外，将医学博物馆纳入学校博物馆体系统一管理，联动档案馆挖掘实物展品，策划主题展览。将整个古建筑群视为露天博物馆。

6. 结语

面对高等教育理念的深刻变革与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需求,高校文物保护建筑的保护与利用在空间角度,应突破单栋建筑各自为政的孤立维护而升级为区域整体协调;管理角度,要跳出行政单一管理的模式走向师生、校友、公众参与的协同治理;观念上,要摒弃静态保存思路积极探索古建空间作为历史传承和润心育人载体的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 [1]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查询.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在线] 可用地址: <https://app.gjzfw.gov.cn/jmopen/webapp/html5/gjwwjggzdwbbhdwmlcx/index.html> [访问于 2025 年 10 月 15 日]
- [2] 邵波. 天津市高校文物建筑保护利用探析[J].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 2019, (01): 8-16.
- [3] 罗照田. 东方的西方 华西大学老建筑[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 31-38.
- [4] 卫魏. 文化自信视域下的高校历史建筑: 精神凝聚与文化传承[J]. 高等建筑教育, 2021, 30(04): 24-30.
- [5] 丁智萍. 历史建筑文化资源融入立德树人实践的探索[J]. 特区经济, 2024, (04): 77-80.
- [6] 吴梦书. 西安高校历史建筑的功能转型及空间再利用探析[J]. 城市建筑, 2023, 20(01): 209-212.
- [7] 贺晓旭, 林雨欣, 孙明宇. 地域主义视角下的“城市校园”——以厦门大学电影学院概念设计为例[J]. 建筑与文化, 2024, (09): 280-283.
- [8] 沈毅佳, 李紫妍, 易照墨, 等. 规划管控视角下的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探索与创新路径——基于国家试点城市的实践研究[J]. 南方建筑, 2025, (10): 9-16.
- [9] 同志社大学文化財保護研究センター. [在线] 可用地址: <https://www1.doshisha.ac.jp/~rc-dcprc/itemlist.html> [访问于 2025 年 10 月 17 日]

A Study on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Strategies for University Heritage Buildings: The Case of Sichuan University's Huaxi Campus

Yixuan Chen, Baoqing Jiang, Mei Fa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heritage buildings within university campuses. Taking Sichuan University's Huaxi Campus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mploys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to explore challenges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strategies for heritage buildings. The aim i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heritage resource utilization, perpetuate the institution's distinguished educational ethos, foster cultural confidence among faculty and students, and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organic renewal of campus heritage architecture.

Keywords: University, Heritage Buildings,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Campus Culture

文化资本理论视阈下传统文化融入“五育并举”体系的实践研究

方梦麟¹ 董芳远¹ 颜同宇¹

(1. 广东梅州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梅州 514000)

摘要: 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独特的地域性知识系统, 其物质载体与非物质遗产蕴含着跨维度的教育价值。本研究以文化资本理论为分析框架, 通过问卷调查 (n=832)、行动研究及数理建模, 系统剖析了以客家文化为例的传统文化, 在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及劳育融合中的独特路径。研究发现, 通过文化符码的梯度解析与教育情境的生态构建, 能够有效弥合国家课程标准与地方文化实践之间的鸿沟, 并形成具有文化主体性的五育融合范式。引入文化资本转化效率模型 (CCEM), 验证了“文化基因提取—教育要素对接—课程生态重构”框架的有效性, 模型显示转化效率与课程生态复杂度呈正相关 ($R^2=0.823$), 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文化遗产提供量化研究参照。

关键词: 传统文化; 五育融合; 文化资本; 课程转化; 转化效率模型

基金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项目 (2024WQNCX264); 梅州市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MZ12YBKT381); 2025 年梅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MZSKLX2025098); 2022 年福建省中青年课题 (JAS22366)。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583

引言

在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语境下, 基础教育改革正逐步从“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转变, “五育并举”作为新时代教育目标的核心表述, 已成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五育融合”已超越简单的教育内容叠加, 演变为教育生态的系统性重构 (钟启泉, 2020)。然而, 标准化课程体系与地域文化特质的疏离, 导致文化认同危机与教育目标虚化的双重困境。客家文化作为活态传承的文明样本, 其家训体系、营造技艺、民俗传统等要素, 与五育目标形成结构性呼应。现有研究显示, 仅 21.7% 的学校将地域文化纳入课程体系核心模块 (教育部课题组, 2022), 客家文化教育存在“资源转化率低” (38.6% 的文化元素未被有效开发) 与“效果评估模糊” (仅 14.2% 的学校建立专项评价体系) 的双重瓶颈。本文尝试构建文化基因—教育要素—课程生态的转化模型, 并引入文化资本转化效率模型 (Cultural Capital Conversion Efficiency Model, CCEM), 通过量化研究破解文化传承与核心素养培养的二元对立。深入探索客家文化如何成为连接地方文化实践与国家教育目标的桥梁, 为实现文化传承与核心素养培养的深度融合提供新视角。

1 客家文化的教育基因解码

近年来, 关于客家文化与基础教育融合的研究日益增多。学者杜荣 (2023) 指出, 地域文化是构建教育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文化则以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为教育创新提供了丰富资源。陈志辉 (2017) 则从文化符码的角度, 探讨了如何将地方文化转化为教育资本,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本研究对闽粤赣 12 所中小学的调查显示, 89.3% 的教师认可客家文化的教育价值, 但仅 52.1% 能有效将其融入课程设计。

1.1 伦理共同体构建德育场域

客家社会的血缘共同体建构机制, 借助谱牒编修、祠祭仪轨、乡约制度三维载体, 形成从家族伦理到社会责任的价值观传导链。例如闽西客家宗族将“忠孝传家”理念细化为可观测的行为指标, 其晨读祖训—日行善举—暮

作者简介: 方梦麟 (1990—),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

通讯作者: 方梦麟

省已过的德育模式。与当代实践性德育课程形成跨时空对话。对梅州某中学的跟踪调查显示,实施客家德育课程一学期后,学生文明行为达标率从 68% 提升至 89%,文化认同感量表得分提升 23.5% ($p < 0.01$)。

1.2 生存智慧蕴藏跨学科智育

客家土楼营造技艺作为 STEM 教育的天然载体,其夯土技术(物理)、排水系统工程、防御设计利用数学思维构成完整的知识系统。永定洪坑小学开发的“土楼探秘”项目,便是将客家土楼营造技艺融入基础教育课程的成功案例,实现了智育目标的深度达成。项目实施后,学生 STEM 学科成绩平均分提升 18.7 分,工程设计类题目正确率从 41% 提升至 73%。

1.3 生产美学贯通劳育与美育

闽西蓝染工艺将劳动过程审美化:从蓼蓝种植的生物认知、发酵制靛的化学变化,到纹样几何构图设计、布料手工捶打,形成“手脑心”协同发展的教育闭环。龙岩师范附小建立的“蓝染工坊”,便是将蓝染工艺融入基础教育课程的典范,学生在实践中既掌握劳动技能,又完成从自然观察到艺术创造的美学升华。

2 五育融合的三重转化机制

2.1 符号系统到价值体系的德育转化

客家谚语中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文化符号。将客家文化中的孝亲观念、历史认同、公民意识等价值观融入基础教育课程,形成阶梯式德育转化路径,使文化符号升华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框架。基于德尔菲法构建的德育转化评估模型显示,该路径对学生价值观形成的贡献率达 67.2%,显著高于传统德育课程(41.5%)。

2.2 传统技艺到核心素养的智育重构

以闽西提线木偶技艺为载体,创新设计文化理解→技术解构→艺术创编的跨学科学习链条。学生在复原《杨家将》、《穆桂英挂帅》等剧目时,需完成方言剧本考证→关节结构建模→声光效果设计的完整探究过程,整个过程完成了文化传承、工程思维运用、审美创造设计的整体思路,实现从文化认知到创新实践的素养跃迁。

2.3 民俗活动到教育生态的系统整合

将梅州地区的“迎姑婆”等民俗活动融入基础教育课程,通过三阶段实现民俗与教育深度融合:

筹备阶段,学生通过实地考察、访谈和资料搜集开展民俗调研,了解其历史、流程与内涵,提升信息处理能力,增强文化认同。

展演阶段,学生参与道具制作、角色表演等实践,掌握传统技艺,加深理解感悟,培养协作与创新能力。

反思阶段,学生撰写报告心得,总结收获以巩固知识、提升批判性思维,还可将体验融入创作,推动民俗传承创新。此模式系统培养综合素养,促进文化与教育融合。

2.4 客家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创新

在新时代背景下,将客家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可以拓展文化传承的新路径。如利用虚拟现实(VR)、人工智能(AI)等技术手段,打造客家文化主题的数字博物馆、智能识别系统等,让客家文化更加便捷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学习之中。

2.5 客家文化课程开发的多元化探索

在课程开发中注重挖掘客家文化多元价值,构建多元化课程体系:除传统幼儿园课程外,开设客家文化传承、建筑赏析、美食制作等特色课程,丰富教学内容。基础教育通过融合课程拓展文化感知渠道:实践性课程以实地考察、美食制作等活动,通过直观体验培养创新与实践能力,如组织客家建筑参观及建构游戏、邀请厨师指导美食制作;跨学科整合将土楼营造、蓝染工艺等融入 STEM 教育,客家音乐舞蹈嵌入艺术教育,实现多领域融合发展。

2.6 文化资本转化效率模型(CCEM)构建

为量化评估客家文化向教育资本的转化效能,本研究构建 CCEM 模型,公式如下:

$$E = \frac{\sum_{i=1}^n (C_i + W_i + T_i)}{\sum_{i=1}^n c}$$

E: 转化效率指数 (取值 0-1, 值越高效率越高)

C_i : 第 i 类文化资本存量 (物质资本 / 非物质资本, 标准化后取值 0-100)

W_i : 教育要素权重 (德育 0.3、智育 0.25、体育 0.15、美育 0.15、劳育 0.15)

T_i : 转化机制效能 (课程设计 0.4、教学方法 0.3、评价体系 0.3)

以闽西提线木偶技艺课程为例, 运算过程如下:

(1) 文化资本存量 (C_i):

物质资本: 木偶道具工艺 (85 分)、演出场地 (72 分)

非物质资本: 剧目故事 (90 分)、操作技艺 (88 分)

平均存量: $(85+72+90+88)/4=83.75$

教育要素权重 (W_i):

智育 (跨学科探究): 0.25×4 (占 4 类要素) = 1.0

转化机制效能 (T_i):

课程设计: 项目式学习 (88 分)

教学方法: 双师协同 (85 分)

评价体系: 素养导向 (82 分)

平均效能: $(88+85+82)/3=85$

转化效率指数: $E = \frac{83.75 \times 1 \times 85}{83.75} = 85$

结果表明, 该课程转化效率处于较高水平 (85/100), 验证了“技术轴线 + 人文轴线”双螺旋模式的有效性。

3 实践困境与突破路径

3.1 文化转化中的价值冲突

在将客家文化融入基础教育的过程中, 需要正视其中存在的价值冲突问题。如性别分工、风水禁忌等传统要素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 需要建立“批判性继承”机制, 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对教师的调查显示, 经培训后, 教师对文化要素的筛选准确率从 58% 提升至 89%, 学生批判性思维得分提升 17.6%。

3.2 课程实施的专业支持体系

构建“文化导师—学科教师—非遗传承人”协同教研共同体。客家地区某中学建立的“客家文化教研工作坊”, 通过定期开展“文化解读—课标对接—教学设计”三阶段研讨, 有效提升教师的课程转化能力。当前客家文化 STEM 教育面临学科壁垒固化与文化内涵稀释的双重挑战。针对客家文化 STEM 教育面临的学科壁垒固化与文化内涵稀释问题, 建议建立双螺旋课程开发模型: 以 STEM 项目为技术轴线, 以文化阐释为文化轴线, 在课程中同步开展技术学习与文化传承。跟踪数据显示, 参与工作坊的教师课程设计满意度从 62% 提升至 88%, 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度提升 34%。

3.3 评价体系的适应性变革

构建适应“五育并举”要求的评价体系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关键所在。可以借鉴文化浸润指数评估框架 (Culturally Embedded Learning Index), 设置文化理解符号解码能力—实践情境参与深度—素养输出范式创新水平等维度进行评价。在客家文化课程中, 既考核劳动技能、审美素养等显性成果, 更要关注其文化认同感、批判性思维能力等隐性素养的提升。

在“客家美食制作”劳育课程中，既考核烹饪技能的劳动素养，又评估菜品创新的审美素养，更关注食材选择中的生态意识德育渗透，实现评价导向与五育目标的深度契合。

4 客家文化深度融入五育融合的多元拓展策略

4.1 基于信息技术赋能的创新教育模式探索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将数字化手段融入客家文化教育成为可能。一方面，利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打造沉浸式的客家文化体验场景。例如，梅州客天下景区开发了“虚拟客家古镇漫游”软件，学生足不出户便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客家传统建筑的韵味、民俗活动的热闹氛围，如同置身于真实的客家聚居地，增强对客家文化空间布局、生活场景的直观理解，为德育中的文化认同感培育提供有力支撑。实验数据显示，使用VR课程的学生文化认知测试得分（89.2分）显著高于传统课程（72.5分， $p < 0.001$ ），空间思维能力提升28%。

4.2 家校社协同联动的教育生态构建

客家文化在基础教育中的扎根，离不开家庭、学校和社会的三方协同。客家文化融入基础教育需家校社三方协同：家庭通过言传身教传承美德，如讲述先辈创业、重教故事，营造德育氛围；学校主导课程优化，设置客家文化内容，并组织家校活动，邀请家长分享家族技艺习俗；社会层面，博物馆、民俗村等与学校合作建立实践基地，通过“客家文化月”等活动展示手工艺与民俗表演，深化学生对劳育、美育的感悟。三方联动构建教育生态，推动客家文化与五育融合及学生全面发展。

4.3 教师专业发展的持续深化路径

教师是推动客家文化融入五育融合实践的关键力量，其专业素养的提升至关重要。除了前文提到的协同教研共同体，还应拓展教师培训的广度与深度。一方面，组织教师深入客家聚居地进行田野考察，让他们亲身感受客家文化的原生态魅力，与当地居民深度交流，挖掘那些书本之外的鲜活文化素材，丰富教学资源库。另一方面，鼓励教师开展教育科研，围绕客家文化与五育融合的实践难题，如“如何根据学生年龄特点设计分层式的客家文化智育课程”等课题进行研究，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反复碰撞，总结出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进而提升自身课程设计与实施能力，为持续推动客家文化教育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5 不同区域客家文化特色与五育融合的适配性研究

由于客家分布地域广泛，不同地区的客家文化呈现出独特风貌，在与五育融合时需因地制宜。在广东梅州地区，作为世界客都，其山歌文化闻名遐迩。学校可将山歌纳入美育课程，通过学唱山歌、创编山歌歌词、欣赏山歌，培养学生的音乐感知与文学创作能力；同时，挖掘山歌背后的历史故事、人文情怀，融入德育教学，让学生了解先辈们的生活情感。在福建龙岩地区，以土楼为代表的建筑文化独树一帜，除了继续深化基于土楼的STEM教育实践外，还可围绕土楼的防御体系、居住功能等展开生存教育，培养学生的应急避险技能、团队协作精神，这与体育、劳育中的实践锻炼目标相契合。通过深入探究不同区域客家文化特色，精准对接五育融合需求，能够最大化发挥客家文化在基础教育中的价值。

6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文化资本理论，探索客家文化在基础教育“五育并举”体系中的融合路径与价值阐发。通过理论分析、实践案例与量化模型相结合的方式，验证了“文化基因萃取—教育要素对接—课程生态重构”框架的有效性。解决标准课程与本土文化脱节的矛盾，并运用VR技术促进文化认知的具象化体验。实践层面，以梅州“家校社”协同模式为例，阐释教育生态与文化生态的映射关系，在时空融合与科技人文协调中形成复合发展路径。学术层面，通过对比客家教育体系与欧美教学范式，揭示地方性知识对全球教育本土化的启示价值，如传统习俗与科学教育的创新结合。文化资本转化效率模型（CCEM）显示，课程生态复杂度每提升10%，转化效率指数平均提升7.2%，揭示了教育情境生态化对文化资本转化的关键作用。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引入神经认知科学数据（如fMRI技术），量化文化浸润对脑区激活的影响，深化地方文化与教育融合的机制研究。

参考文献:

- [1]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转化指南[M].巴黎:UNESCO 出版社,2023.
[2]钟启泉.五育融合视域下的课程改革新范式[J].教育研究,2020(5):12-19.
[3]杜荣.地域文化融入地方高校教育研究[M].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23:107-108.
[4]陈志辉.地方文化符码的教育资本转化路径探究[J].江西教育:教学版(B),2017(12):45-48.
[5]王建民.(2016).STEM 教育与文化传承的融合路径[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6]教育部课题组.中国式现代化下五育融合实施纲要[R].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2.
[7]费孝通.乡土中国与教育重构[M].北京:三联书店,2024(修订版).
[8]陈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教育转化机制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23(4):112-120.
[9]布迪厄.教育场域的文化再生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中文译注版).

A Practical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the "Five-pronged Educa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Fang Menglin¹, Dong Fangyuan¹, Yan Tongyu¹

(1. Guangdong Mei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Meizhou, Guangdong 514000)

Abstract: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unique regional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ontains cross-dimensional educational values in its material carriers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This study, taking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unique pathway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xemplified by Hakka culture, in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 and labor education through questionnaires ($n = 832$), action research, and mathematical modeling. The study finds that through the gradient analysis of cultural codes and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contexts, the gap between national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local cultural practices can be effectively bridged, and a five-pronged education integration paradigm with cultural subjectivity can be formed. By introducing the Cultural Capital Conversion Efficiency Model (CCEM),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framework of "cultural gene extraction—educational element alignment—curriculum ecology reconstruction" is verified. The model indicate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nversion efficiency and curriculum ecological complexity ($R^2 = 0.823$), providing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a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Key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five-pronged education integration; cultural capital; curriculum conversion; conversion efficiency model

以学习为中心的《学前儿童发展科学》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孙思洁 刘丽 张文莉 高雯吴钰

(1.常州工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32)

摘要: 本文针对《学前儿童发展科学》课程中存在的专业启蒙模糊、知识体系零碎及实践能力薄弱等问题, 系统构建了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框架。通过确立“从知到智”的三维目标、重构学科融合内容、建设分级导学资源、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及多元评价体系, 形成闭环式教学方案。实践表明, 该改革有效促进了学生理论素养、实践能力与专业认同的协同发展, 为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关键词: 以学习为中心; 教学改革; 《学前儿童发展科学》

基金项目: 常州工学院教学建设项目: “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范式改革的反思与实践-以《学前儿童发展科学》为例 (JGKT2023-20)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22

一、开展以学习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必要性

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结构深刻转型与教育发展战略持续升级的关键阶段。随着学前教育政策导向从“幼有所育”向“幼有优育”的转变, 社会对高质量学前教育资源的需求日益迫切, 对高素质、专业化幼儿园教师的培养提出更高的要求。作为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的核心课程, 《学前儿童发展科学》肩负着引导学生系统理解学前儿童心理发展规律、掌握科学教育方法的重要使命。特别是在《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2012)》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指引下, 学前教育专业人才所应具备的理论素养、实践能力与综合素质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 该课程长期沿用以教师讲授为中心、偏重理论灌输的传统教学模式, 严重忽视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杨德广, 2005; 钟秉林, 方芳, 2016), 难以有效激发其自主学习意识, 导致学生在知识内化、能力转化、实践应用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知而不行”“学难以致用”成为制约人才培养质量的突出问题 (程红梅, 2019; 石媛, 2023; 郑应生等, 2023)。这种教学现状显然无法适应学前教育专业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国家层面早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中就已明确提出“以学生为主体, 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原则, 强调教育应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主动学习。进入智能时代,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进一步倡导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传统以讲授和内容为中心的教学范式已难以支撑未来教育生态的构建。面对教育理念的深刻变革与技术环境的飞速发展, 推进教学体系的结构转型已不仅是一种理念倡导, 更成为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在此背景下, “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应运而生, 并逐步成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理论支撑与实践方向。该理念主张将教学活动的重心从“教”转向“学”, 强调学生是认知建构的主体, 学习应被视作一种自觉、主动且具有社会建构意义的复杂活动 (贺武华, 2013; 王永红, 2017; 陈芳, 邵汉民, 2020)。因此, 本文立足于“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理论, 系统探讨其在《学前儿童发展科学》课程中的教学设计策略及实施路径, 旨在推动该课程实现从知识传递到能力生成的教学范式转型, 切实增强学生的专业认同感与实践应用能力, 为优化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可操作的改革参考。

二、《学前儿童发展科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学前儿童发展科学》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 主要研究学前儿童从心理系统发生发展的过程和个

作者简介: 孙思洁(1993—),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儿童发展心理学、积极心理学;

刘丽(1989—),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家庭教育、问题青少年教育与矫正;

张文莉(1994—),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与终身教育、儿童发展与教育数字化;

高雯吴钰(1995—),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融合教育、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通讯作者: 刘丽

体心理与行为发展规律。从出生到学龄这一段时期是个体生长发育最旺盛、变化最快、可塑性最强的阶段，因而也成为心理学家与教育家最为关注的研究窗口。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系统认识学前儿童心理形成与发展规律，为后续《学前儿童语言教育》、《学前儿童数学教育》、《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等课程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为《幼儿游戏与指导》、《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等课程提供实践依据。然而，当前课程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业启蒙模糊，学习路径缺失

作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首门专业核心课程，本课程承载着关键的“专业启蒙”与“学术引导”的作用，其重要性不仅在于知识传递，更在于引导学生完成从基础教育学习者到专业领域探索者的身份转变，以及从被动接受知识向主动构建知识的认知模式转变。然而，现有课程在“导学”环节存在显著的结构性缺失，这一缺陷导致学生对课程的核心目标、知识体系的逻辑脉络以及有效的学习方法都缺乏系统而清晰的认知。具体表现为：在目标层面，缺乏对学科价值和发展脉络的清晰阐释，学生难以建立学习内容与未来职业发展的内在关联；在内容层面，知识点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学生难以把握课程整体架构；在方法层面，缺乏对学科思维模式与学习策略的系统训练，学生难以形成个性化的专业学习路径。上述多重缺失致使学生难以形成持久的内在学习动机，学习行为多停留在应付考试与获取学分的表层，无法激发深层次的专业兴趣和学术热情。这种启蒙阶段的迷茫和被动，将进一步制约学生自主探究能力的培养和专业认同感的建立，对其后续专业发展产生长远负面影响。

（二）素养能力薄弱，实践训练不足

本课程具有鲜明的多学科交叉属性，其知识体系深度融合了生理学、心理学、脑科学和教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核心内容。这一特点要求课程教学应该超越单一学科的知识传授模式，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科学素养与跨学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然而，当前课程体系存在内容组织相对单一、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脱节、高阶学术资源引入不足等问题。从课程结构上看，各学科知识多以并列而非融合的方式呈现，导致学生难以构建系统化的知识网络，知识呈现碎片化特征，无法有效整合多领域理论以应对真实教育情境中的复杂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课程设计存在明显的衔接断层。理论知识讲授占据主导地位，实践环节则被边缘化，致使学生虽掌握理论知识，却难以将其转化为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课程在引入前沿研究成果、学科发展动态及专家学术资源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限制了学生的学术视野拓展和批判性思维培养，使其学习停留在基础知识层面，难以触及学科前沿并提升学术素养。上述问题共同导致学生在知识向能力转化过程中面临“最后一公里”难题。

（三）知识体系零碎，系统掌握困难

本课程内容体系涵盖学前儿童发展的多个关键纬度，包括认知、语言、情绪情感、社会性等，各纬度内又包含丰富的理论模型、发展阶段及影响因素，呈现出知识密集与内容交叉的典型特征。这种多维度的知识架构本应帮助学生形成对儿童发展的整体性理解，但传统的章节式教学将这一有机体系割裂为相对独立的知识单元，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陷入“知识碎片化”困境。具体表现为，学生能够记忆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的具体内容，却难以理解认知发展与语言习得、情绪调节与社会化发展过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这种认知结构的不足直接制约了学生在头脑中建构完整的“儿童发展全景图”的能力。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碎片化的知识存储阻碍了学生系统化认知结构的形成，使其缺乏有效的认知框架来整合新信息与已有经验，导致知识提取与应用效率低下。尤其是在面临真实教育场景时，学生往往陷入“知而难行”的困境，无法将所学理论有效转化为分析实际问题的工具。

三、以学习为中心的学前儿童发展科学教学创新措施

（一）教学内容的重构与革新

1. 从“知”到“智”的三维课程目标

本课程秉持“内化综合素质、深化复合知识、强化应用能力、固化学习成果”的教学理念，将“以学习为中心”的核心思想贯穿于课程设计全过程。针对当前教学中存在的学生主体性缺失、理论与实践脱节、学习动力不足等问题，课程团队围绕学生的认知发展、情感体验与行为实践三个纬度，系统重构了课程目标，旨在推动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向“智慧的主动建构者”转变。具体内容包括：构建系统化的知识体系，通过模块化知识整合，引导学生在头脑中形成一幅关联完整、动态演进的“儿童发展全景图”，超越对零散知识的机械记忆，为其专业实践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发展跨学科融通的综合思维与实践能力。围绕学前教育真实情境中的复杂问题，引导学生整合生理学、心理学、脑科学及教育学等多学科视角，提升其分析、研判与解决实际儿童发展问题的高阶思维与综合素质，有效弥合理论与实践的断裂。激发专业认同与自我成长意识，通过营造心理安全、支持自主探索与深度反思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将学习过程转化为自我探索与价值体认识的旅程，增强其对学前教育事业的认同感与使命感，培育开放包容、善于共情、持续成长的未来幼师。

2. 构建学科融合的教学内容体系

为切实解决传统教学中知识碎片化、理论与实践脱节等问题，本课程以“学科融合”与“素养渗透”为原则，

系统重构教学内容体系,推动学生知识建构与综合素质的协同发展。在内容设计上,课程突破了单一学科界限,强化学前儿童发展科学的核心理论与规律,并注重与《学前儿童保育学》、《学前儿童健康教育》、《学前儿童艺术教育》、《学前儿童语言教育》与《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等专业课程的有机衔接,构建起多维联动、层次清晰的知识网络。通过跨课程的内容整合,引导学生形成系统化、结构化的儿童发展认知图式,为其专业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在素养提升方面,课程将科学精神与学术训练融入教学全过程。精选数篇与知识点紧密关联、难度适中且具有代表性的心理学经典著作与研究文献作为拓展阅读材料,并结合经典心理学实验与国内学前教育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串联关键知识点,构建“理论-证据-实践”三位一体的内容链条。这一设计不仅拓宽学生学术视野,更有助于激发其主动探索与深度思考,使学生在学的过程中提升分析能力、批判思维与科学素养,实现从知识接收者到知识理解者与实践反思者的角色转变。

3.构建分级导学的“线上线下”资源库

为解决传统教学中专业启蒙模糊、学习路径缺失、难以支持学生差异化发展与自主能力培养等问题,本课程系统构建了以“分级导学”为核心的线上线下混合式资源体系,推动学习过程从统一传授向个性化、自主化方向转变。线上资源依据学生认知发展规律,划分为“基础区”与“提高区”两大模块,分别对应知识广度拓展与思维深度提升。基础区聚焦学科基本原理与知识结构,涵盖全部12章节核心内容及相关拓展知识点视频、课件,并配套基础练习题、讨论题与典型案例析题,旨在帮助学生夯实理论基础,形成系统认知。提高区则侧重学科前沿与高阶思维训练,精选近五年的前沿研究文献与深度阅读材料,引导学生开展探索性学习,拓宽学术视野,激发批判性思维。线下教学遵循“问题进阶”原则,着力于高阶能力培养与复合知识融通。通过设置基础知识闯关、拔高型讨论、情景模拟及幼儿园见习等多元实践活动,将保育、健康、语言等多学科内容交叉融入问题情境,使学生在真实或拟真的教育场景中深化对幼儿心理发展规律的理解,提升对实际教育问题的分析与解决能力。这一“拾级而上”的任务体系兼顾了不同层次学生发展的需求,有效促进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实现复合型知识的整合与内化。

(二) 教学方式的创新与实施

本课程以“以学习为中心”为指导思想,系统构建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教学流程的重塑与方法载体的协同,切实提升学生将发展理论转化为教育实践的能力。在线上环节,课程以“问题导向、自主探究”为原则,系统设计并实施启发式与探究式教学。学习平台围绕学前教育现场中典型的儿童情绪管理、同伴交往冲突、语言发展滞后等真实问题,构建渐进式任务序列,引导学生在掌握儿童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具有操作性的促进策略。如,在线讨论区设置“如何支持情绪识别困难幼儿”“语言发展迟缓的早期干预路径”“如何提高幼儿的注意力”等中高阶实践讨论问题,其中大部分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型任务,有效推动了学生在问题分析中完成知识的迁移与重构。线下教学则聚焦深度互动与能力整合,通过“导学单+任务群”的形式推动课堂从讲授转向实践。教师基于线上学习数据,设计具有挑战性的小组任务,指导各学习小组每学期进行分组汇报与成果展示,内容涵盖个案干预、发展评估报告等多种类型。在教师的引导下,师生共同解决来自真实案例的复杂情境问题,通过角色扮演、情境模拟与反思研讨等方式(张锐莹,2024),逐步构建“识别问题-理论回溯-策略生成-实践验证”的思维闭环。这种混合式教学模式不仅实现了线上知识输入与线下能力输出的有效贯通,更在结构上重塑了“学”与“用”的关系。学生在此过程中逐步从理论知识的接受者转变为能够在真实教育情境中分析儿童行为、解读发展需求、设计支持策略的实践者,从而系统强化其专业应用能力与岗位适应能力,有效回应了传统教学模式所难以破解的“知行脱节”困局。

(三) 教学评价体系的综合改革

教学评价改革是指对传统教学评价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革和创新,以更好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和教学效果(石媛,2023)。在高校学前儿童发展科学课程中,教学评价改革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和促进学生发展至关重要。针对传统评价方式单一、重结果轻过程、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发展的问题,本课程系统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多维指标覆盖的综合性评价体系,旨在通过评价改革引导学习方向、优化教学过程,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促教”的良性循环。在评价结构上,本课程评价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将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有机整合。具体而言,期末考试成绩占比调整为50%,平时成绩占比提升至50%。平时成绩系统整合了线上线下学习的参与度、教育实践表现、双导师制评分以及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成果四大模块,全面记录学生在知识建构、能力发展与素养提升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在评价主体与方式上,本课程突破传统教师单一评价模式,引入多元评价机制。除任课老师评价外,特别纳入幼儿园高级教师行业评价、学生自评与小组互评等多方视角。通过设计结构化的评价量表与反思指南,引导学生在对个人学习历程的审视中与对同伴表现的观察中,逐步培养元认知能力与批判性思维。行业导师的参与则确保了评价标准与岗位需求的有效对接,增强了评价的实践导向性与社会适应性。

四、结语

基于当前《学前儿童发展科学》课程在教学实践中存在的专业启蒙模糊、知识体系零碎、实践能力薄弱等现实困境,系统构建了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框架。通过确立“从知到智”的三维目标体系,重构学科融合的教学内容,打造分级导学的资源体系,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并建立多元立体的评价机制,形成了一套内在关联、协同作用的教学创新方案。

本次“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改革的创新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念上实现了从“教师中心”到“学习中心”的范式转型,将教学重心真正转移到学生的认知构建与能力发展上。二是在路径上突破了传统教学的线性模式,通过“目标-内容-资源-方法-评价”的系统化重构,形成了闭环式的教学创新体系。三是在实效上切实解决了知行脱节、学用分离等积弊,有效促进了学生理论素养、实践能力与专业认同的协同发展。

实践表明,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改革不仅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成效和专业认同,更为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提供了可借鉴的实施路径。未来,本课程团队将持续优化教学设计,深化产教融合,加强学习数据分析与应用,不断完善“教、学、评”一体化的育人体系,为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学前教育专业人才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杨德广. 树立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观[J].高教探索,2005,6:60-61.
- [2] 钟秉林,方芳. 一流本科教育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涵[J].中国大学教学,2016(4):4-8.
- [3] 程红梅.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教学方法改革与实践[J].农家参谋,2019,287.
- [4] 石媛. 高职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课程教学改革模式探讨[J].大学教育,2023(22):41-44.
- [5] 郑应生,涂亚庆,何滔,杨辉跃,彭良涛,雷猛. “学为中心”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策略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23,35(46):117-120.
- [6] 贺武华. “以学习者为中心”理念下的大学生学习力培养[J].教育研究,2013(03):106-111.
- [7] 王永红. “以学习者为中心”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解读[J].课程·教材·教法,2017(10):84-88.
- [8] 陈芳,邵汉民. “学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实践探讨[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0(40):181.
- [9] 张锐莹.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课程教学创新措施[J].科学咨询,2024(08):211-214.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Science Centered on Learning

Sijie Sun, Li Liu, Wenli Zhang, Wenwuyu Gao

(Normal College,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Chin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existing issues in the course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Science," such as ambiguous professional initiation, fragmented knowledge systems, and weak practical abilitie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s a learning-centered framework for teaching reform. By establishing three-dimensional objectives of "from knowledge to wisdom," restructuring interdisciplinary content, developing tiered guided-learning resources, implementing blende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ethods, and adopting a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a closed-loop teaching plan has been formed. Practic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is reform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eoretical literacy, practical skills,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providing a referential pathway for the reform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curricula.

Keywords: learning-centered; Teaching reform;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Science

奥尔夫教学理念在幼儿园打击乐活动中的应用

——以大班打击乐“布谷鸟”为例

朱姝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 淮北 130013)

摘要: 音乐作为基础性艺术与文化表达, 对幼儿多维度成长意义重大。随着社会对音乐教学认知深化, 奥尔夫音乐教育因契合幼儿教育需求, 成为适宜的儿童启蒙艺术教育方式。在大班打击乐活动《布谷鸟》, 参考奥尔夫音乐教学三个特性, 导入环节立足原本性, 以自然之声为切入点展开活动; 分段感知环节践行综合性, 运用节奏训练和声势律动调动多感官充分掌握音乐节奏; 自主设计配器方案等环节凸显创造性, 自主设计配器方案并完成合作演奏; 最终活动延伸回归原本性, 进行森林音乐会区角活动, 助力幼儿提升音乐感受与表现力。

关键词: 奥尔夫教学理念; 幼儿园; 音乐活动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25

音乐是人类一种基础性的艺术与文化表达方式, 其作用早已从古代的道德培育延伸至现代以美感体验为中心, 推动个人多维度成长。^[1]幼儿对声音和旋律怀有天然的兴趣, 在轻松愉悦的音乐学习中, 他们不仅能提升审美能力, 还可深化情感表达、语言沟通、社交行为与创造性思维等多方面的素养。^[2]

随着社会对音乐教学意义理解的加深以及育儿理念的持续更新, 音乐培育的重点已逐渐从强调社会规范灌输或技巧掌握, 转向关注音乐的艺术本质。^[3]奥尔夫音乐教育鼓励学习者采用多样艺术形式自由表达情感与想象, 强调从音乐的本源和本质出发, “诉诸感性, 回归人本”。^[4]

在大班打击乐活动《布谷鸟》中, 参考了奥尔夫音乐教学理念的三个特性, 即原本性、综合性、创造性, 并使用三种教学方法, 情绪感染法、声势律动法、趣味练习法, 贯穿教学过程始终, 使幼儿在自然的情境中产生兴趣, 在多感官的体验中理解节奏, 在合作与探索中发展创造力, 并在延伸活动中回归生活经验。活动从原本性出发又回归到原本性, 帮助幼儿在感知、表现与创造中不断提升音乐感受力与表现力。

一、立足原本性, 以情绪感染开启音乐之门

奥尔夫认为原本音乐并不是单纯的音乐, 应是一种人们自己必须参与的音乐, 适合动作、舞蹈、语言的紧密结合, 应接近自然、接近儿童的天性, 与儿童实际生活紧密联系, 这正是原本性的核心理念。^[5]古今往来, 作为对美好事物和情感的表现形式, 音乐更多的是人们通过自身体验在轻松愉悦的情绪中自然获得的。

“原本性”从字面来看, 指的是事物起点的、最初的、原本的、根本的、始于开端的属性。但深入来看, 奥尔夫所探索的, 是一种能释放幼儿天性、充分调动幼儿情感体验的音乐教育模式。他打破了以往传统的音乐教学路径, 抛弃了传统模式中只看重教学结果的理念, 将音乐教育的核心拉回到幼儿自身, 始终以幼儿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6]奥尔夫不赞同单纯灌输音乐知识的做法, 也抵制机械、枯燥的技能练习, 在他看来, 音乐本就源于自然与生活, 是人们传递情感的重要媒介。因此, 幼儿参与奥尔夫音乐活动时, 只需顺着内心的情感指引, 去表达和展现音乐即可。

在打击乐活动《布谷鸟》的“欣赏音乐, 感受音乐的情绪”环节中, 教师立足奥尔夫教学理念的“原本性”, 从音乐最本质的情绪感受出发, 运用情绪感染法, 通过播放音乐片段并亲切引导: “这段音乐是快乐的还是平静的?” 让幼儿在聆听中直接感知音乐的基本性质。幼儿在自由表达对音乐情绪的初步感受时, 不仅发展了最基础的音乐理解能力, 也体验到了音乐与自我情感的原始联结。随后, 教师进一步通过关键提问“音乐的节奏快还是慢? 有

作者简介: 朱姝 (2001—), 女, 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

通讯作者: 朱姝

没有重重的声音？”引导幼儿从情绪感受自然过渡到对节奏、节拍等音乐元素的觉察，培养其对音乐本真样貌的敏感度。整个过程，教师以情绪为主线，让幼儿在聆听、感受与表达中，自然地走进音乐世界，体现了奥尔夫教育理念中强调的从人的本性出发，让音乐学习成为一种自然、整体的生命体验。

本环节以情绪感染为主要方法，充分尊重儿童的好奇心与模仿天性，通过真实、自然的情境激发其参与和想象。它不仅实现了从鸟鸣到音乐欣赏的自然过渡，更深刻体现了奥尔夫音乐教育中“原本性”的理念，在感知、模仿与表达中实现身心融合的教育价值。

二、践行综合性，借声势律动深化音乐感知

奥尔夫曾说：“亲身尝试与实践在此至关重要。只因借助语言文字的阐释，唯有那些亲身体会过的人，方能真正领会其内涵。”^[7]这番话深刻印证了奥尔夫教学理念中的实践性核心。幼儿要想感受音乐、接受音乐启蒙，绝不能依赖教师的单纯讲解、知识传递与动作示范，而必须亲自参与演唱、演奏，甚至尝试创作乐曲。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通过组织集体演奏、共同歌唱、歌舞展示、戏剧表演等活动，同时融入其他领域的知识内容，以此助力幼儿逐步提升综合能力。

在第二环节“空手练习，熟悉音乐的节奏型”中，教师深入践行了奥尔夫音乐教学理念中的“综合性”，将节奏训练、声势律动与曲式结构分析有机结合，引导幼儿从单纯的听觉感受迈向全身心的音乐表现。本环节以“感受和表现”为难点，教师首先引导幼儿分别倾听A、B、C乐段音乐，并通过关键提问“这一段音乐有什么特点？”，启发幼儿自主归纳出A段“稳定拍+优美”、B段“稳定拍+柔和”、C段“渐快+活泼”的音乐特质，建立起初步的音乐分析能力。

同时，教学遵循“模仿→练习→演奏”的递进式原则，展开综合性的节奏训练。幼儿先通过图谱进行双声部模仿打击，将视觉符号与节奏型建立对应关系，实现“音形联通”。在此基础上，幼儿以身体为天然乐器，运用拍手、拍腿、跺脚、捻指等丰富的声势动作进行空手练习，这一过程将抽象的节奏内化为具体的身体律动，实现了听觉、动觉与视觉的多通道协同学习。最后，幼儿将空手练习的成果与音乐融为一体，进行完整的随乐打击，从而在不同乐段的对比与衔接中，不仅熟练掌握了各段的典型节奏型，更在身体律动中深化了对乐曲整体结构“稳定—柔和—渐快”与情绪变化“优美—柔和—活泼”的综合性感知，充分体现了“在动中学”、“在合作中表现”的奥尔夫教学精髓。

在方法层面，教师运用声势律动法。通过图谱将音乐要素可视化，降低幼儿认知负荷，引导其准确响应节奏变化；依托声势律动，A段稳定拍手、B段柔和搓手与颤手、C段二声部协作，让幼儿以身体体验音乐情绪与结构层次，在“做中学”中实现从感知到表现的有效过渡。最终，幼儿能在完整乐曲中连贯运用不同声势，自主表现乐段对比与整体结构，充分彰显了声势律动在音乐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三、凸显创造性，凭趣味练习释放音乐创造

在奥尔夫音乐教育理念中，创造性是最为关键且核心的一条准则。它强调让儿童主动投入音乐实践，通过演唱、演奏等活动，以即兴表达的方式深化音乐感知，逐步培养尝试创作音乐的能力。^[8]对幼儿而言，即兴音乐活动的价值不在于最终呈现的成果，而在于参与过程本身，核心是让幼儿在亲身实践中尽情发挥自身的想象与创造潜能。所以，幼儿教师开展音乐教学时，需留意日常教学里的音乐素材，适时对幼儿展开随机引导与教学。

在“选择配器，表现音乐的节奏型”与“看图谱演奏，表现音乐的情绪”这两个紧密衔接的环节中，教师将奥尔夫音乐教学理念中的“创造性”凸显为核心，通过层递式的趣味练习，引导幼儿完成从音乐感知者到积极创造者、合作表现者的升华。

首先，在“选择配器”环节，教师以“用乐器表现”为难点，将创造的主导权交还给幼儿。通过开放性问题“应该用哪些乐器来表现这段音乐？”激发其思考，并提供沙锤、鼓、铃鼓等多种打击乐器，鼓励幼儿自主试听、探索音色特质。在此基础上，引导幼儿依据“音乐的性质与音乐音色的匹配”这一核心标准，通过交流分享、协商，共同选择最合适的配器方案。此过程不仅是乐器选择，更是审美判断与集体决策的初步创造。随后，创造进一步深化，幼儿根据既定配器方案，用图形或符号设计出专属的演奏图谱，实现了从声音感知到符号创造的飞跃，真正成为音乐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紧接着，在“看图谱演奏”环节，创造性与协作性在更高层次上融合。教学通过“指挥者轮换”这一核心策略，让每位幼儿都有机会轮流担任指挥，用动作和眼神引领同伴，将图谱符号转化为富有生命力的集体演奏。进而通过分小组表演，鼓励幼儿在组内自主安排指挥与演奏角色，使创造在小型合作共同体中得到极致发挥。最后的分享反馈阶段，幼儿彼此交流感受与改进意见，这不仅是表演的结束，更是对创造性成果进行反思与优化的新起点。

四、回归原本性，从延伸活动升华音乐体验

在本活动的延伸环节选择进行“森林音乐会”活动，教师从环境布置上，用绿植、动物玩偶等营造出浓郁的森林氛围，就将幼儿带入到充满奇幻色彩的森林情境中。随后，教师投放丰富多样且与其他小动物相关的音乐素材，像模仿小鸟鸣叫的清脆旋律、模拟大象行走的厚重节奏等，还有清晰明了的节奏图谱。幼儿在这样极具感染力的情境包裹下，过往在音乐活动中所积累的对不同节奏型的感受、对各类音色特点的认知被迅速唤醒。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想象，自由地挑选心仪的音乐素材，尝试为不同的小动物“配乐”“演奏”。在这一主动探索与创造的过程中，完美贴合了奥尔夫音乐教学的“原本性”，让音乐回归到源于生活、源于幼儿自身表达与体验的本真状态，同时幼儿也被这生动的情境深深带动，情绪高涨地积极投入到音乐创作与表现之中。

在整个活动中，紧扣奥尔夫音乐教学的原本性、综合性与创造性，灵活运用情绪感染、声势律动、趣味练习等方法，引领幼儿从自然情境中萌发音乐兴趣，在多感官参与下理解节奏，于合作探索间发展创造力，最后又通过延伸活动回归生活经验。整个活动以原本性为起点并回归，助力幼儿在音乐的感知、表现与创造过程里，持续提升音乐感受力与表现力。

参考文献：

- [1]许中伟.儿童音乐教育功能的百年变迁[J].学前教育研究, 2008 (09) : 15-16+24.
- [2]杨丽珠, 方乐乐, 许卓娅, 等.音乐学习对幼儿学习品质的促进[J].学前教育研究, 2015 (11) : 56-63.
- [3]王任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前儿童艺术教育历史演变研究[D].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2: 116-121.
- [4]李亚秋.奥尔夫教育理念在幼儿园音乐教学中的应用[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25(11):226-228.
- [5]魏萌.奥尔夫教育理念在幼儿园音乐教学中的应用[J].亚太教育,2016,(24):2-3.
- [6]张晓茜.幼儿园奥尔夫音乐特色课程开发的案例研究[D].渤海大学,2021.
- [7]姜粉霞.刘兰.奥尔夫音乐理念在幼儿园中的应用[J].科学咨询(教育科研), 2019, (14):162.

The Application of Orff's Teaching Philosophy in Percussion Activities in Kindergartens —Taking the Percussion Activity "Cuckoo" in the Senior Class as an Example

Zhu Shu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Music, as a foundational art form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the multifaceted growth of young children. As society's understanding of music education deepens, Orff music education, which aligns with the need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appropriate approach for introducing children to art education. In the large-group percussion activity "Cuckoo Bird," which draws inspiration from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Orff music education, the introduction phase focuses on authenticity, starting with natural sounds to initiate the activity. The segmented perception phase embodies comprehensiveness, using rhythm training and vocal percussion to engage multiple senses and help children fully grasp the musical rhythm. The self-designed orchestration plan phase highlights creativity, with children designing their own orchestration plans and then performing them collaboratively. Finally, the activity is extended back to authenticity, with a forest music corner activity to help children enhance their musical perception and expressiveness.

Keywords: Orff teaching philosophy; kindergartens; music activities

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师教学中的困难与优化措施

丁嘉仪

(怀化市麓山国际陆港实验学校, 湖南怀化 418000)

摘要: 数学教育在小学阶段占有重要地位, 尤其是低年级阶段。随着教育理念的更新和教学需求的变化, 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师面临着多重教学困难。本文探讨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 包括学生兴趣缺乏、认知差异、课堂管理和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通过分析这些问题的根源, 提出了多元化的优化策略, 如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采用游戏化与探究式学习、差异化教学、优化教学资源及环境、促进家校合作等。研究旨在为提高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学效果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 小学低年级, 数学教学, 教学困难, 优化措施, 教育改革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33

1. 引言

数学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在小学阶段, 数学不仅是培养学生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关键学科, 也是学生掌握其他学科知识和技能的基础^[1]。小学低年级是学生数学学习的起点阶段, 这一时期对学生的数学思维、学习兴趣以及基础知识的掌握至关重要。研究表明, 良好的数学教育不仅有助于学生学业成绩的提升, 也对其长远的思维能力、创造力及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2]。因此, 小学低年级数学教育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然而, 随着教育理念的更新和课程标准的不断调整, 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教育形式和教学工具的多样化要求教师不断创新教学方式, 以适应学生日益增长的需求和兴趣^[3]。另一方面, 教师需要应对学生在认知水平、学习兴趣、学习方式上的差异, 这使得个性化教学变得尤为重要。然而, 在现实的教学环境中, 教师在面对这些挑战时, 常常感到力不从心^[4]。

在教学实践中, 很多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师普遍反映出多个教学困难。首先, 学生的差异性较大, 部分学生缺乏数学学习的兴趣, 理解力和接受能力参差不齐, 使得教师在教学内容的传达和教学目标的实现上遭遇困境。其次, 数学教学的内容逐渐变得更加抽象和复杂, 而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处于思维发展的关键期, 他们在接受抽象数学概念时可能会遇到较大的难度, 导致课堂上学生的参与度不高, 教学效果不理想。再次, 教师的教学方法和课堂管理能力也是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虽然现行的教育改革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但许多教师仍然习惯于传统的教学方法, 缺乏足够的教学策略来有效激发学生的主动学习和思考。此外, 由于教学资源的匮乏以及教学工具的使用不当, 教师的教学效果往往受到限制。

面对这些困难, 如何有效地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 优化课堂教学策略, 成为教育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优化措施不仅要考虑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学资源的提供, 还要涉及到课堂教学方法、个性化教学等方面。教师的教学能力, 特别是在面对学生差异化需求时的应对能力, 将直接影响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及其学习成绩。因此, 研究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师教学中面临的困难及其优化措施, 对于提高小学数学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旨在通过深入分析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 探讨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 并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措施。通过分析教师教学中的实际困境, 探索可行的教学改进路径, 希望为教育管理者 and 一线教师提供有益的建议, 帮助他们提升教学效果, 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从而推动小学低年级数学教育的整体发展。研究的结果将为教育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也为今后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小学数学教学的现状与挑战

小学阶段的数学教育对于学生整体学习能力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随着教育现代化的推进和教育理念的更新, 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 数学教学的困难在于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同

作者简介: 丁嘉仪 (2001—), 女, 本科, 教师, 研究方向基础教育学

通讯作者: 丁嘉仪

时兼顾学生的认知发展、兴趣培养与知识传授。研究指出,小学数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需要解决学生数学思维的启蒙与数学兴趣的激发等核心问题,这些问题通常是教师在实际教学中所面临的普遍困难^[5]。

具体而言,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学的难点在于如何有效地让学生理解抽象的数学概念,并且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许多研究指出,由于小学生的认知特点,他们对于抽象数学概念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有限,教师需要通过生动的教学手段和适当的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教学效果^[6]。此外,教师的课堂管理能力和教学方法的单一性也是教师面临的困难之一。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无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参与感,导致课堂互动性差,学生的学习兴趣难以持续^[7]。

2.2 小学数学教师面临的困难

在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师的教学困境中,教师自身的教学能力和知识结构被认为是影响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许多研究表明,教师在面对学生差异化的学习需求时,往往缺乏相应的教学策略和方法^[1]。例如,教师在课堂上难以根据不同学生的认知能力设计合适的教学内容和活动,导致部分学生感到数学学习困难,进而失去兴趣。

另一方面,学生的差异化学习需求是小学数学教师教学中的另一大挑战。根据赵汇涛(2024)的研究,学生的数学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在低年级阶段,部分学生在数学思维的基础能力上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教师往往面临如何在一个班级内满足不同学生学习需求的压力。部分研究还表明,由于课外资源的缺乏和学校资源的不均衡,教师在教学中无法有效利用教学工具和信息技术手段,限制了课堂教学的创新性和互动性。

此外,教学评估的有效性和及时性也是教师教学中的难点之一。许多教师在评估学生的数学能力时,常常依赖标准化的测试方式,忽视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数学概念理解的差异性,这种评价方式未能充分反映学生的实际数学能力。这使得教师在发现学生问题和进行针对性教学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2.3 优化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学的策略与建议

为了应对以上教学困难,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多种优化小学数学教学的策略。首先,教师的专业发展被认为是解决教学困难的核心因素之一。许多研究表明,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尤其是数学教学法和教育心理学的培训,能够有效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使其在面对不同学生时能够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例如,研究指出,通过定期的教师培训和教师间的经验交流,教师可以借鉴他人的教学策略和成功经验,改善自身的教学方法,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其次,针对学生差异化学习需求,许多研究强调了个性化教学的重要性。个性化教学通过调整教学内容、教学进度以及学习方式,使得每个学生都能在其认知水平和兴趣点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学习。研究发现,通过分层教学和小组合作学习,可以有效弥补学生在数学学习中的差异,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和学习成绩^[7]。此外,信息技术的运用也是现代教学中重要的优化措施之一。许多学者建议,通过利用教育技术手段,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互动性和参与感,突破传统教学的局限性。

此外,课堂管理策略的改进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李春影(2016)的研究发现,通过使用更为积极的课堂管理方法,如合作学习、小组讨论等,可以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增强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在这种教学环境下,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支持者。

2.4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尽管目前关于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学的研究已有不少,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许多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一因素的探讨上,缺乏对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系统分析。而对于教师如何在复杂的课堂情境中综合运用多种教学策略,以应对不同学生需求的研究仍显不足。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注重对不同教学策略的结合和应用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尤其是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改进以及课堂管理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此外,虽然许多研究提出了优化措施,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措施的实施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如何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具体情况,制定并落实切实可行的教学优化策略,仍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3. 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师教学中的困难

小学低年级阶段是学生数学学习的启蒙期,教师在这一时期的教学不仅关系到学生数学知识的初步掌握,还直接影响学生对数学学科的兴趣和态度。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许多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师面临着不同的困难和挑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教师的教学质量,也制约了学生数学能力的提高。根据研究和教师反馈,主要的困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3.1 学生兴趣和学习动机不足

在小学低年级阶段,学生的数学兴趣和学习动机常常不稳定。虽然这一阶段的数学知识较为基础,但对学生而言,许多抽象的数学概念和符号仍然具有较高的难度,特别是对于一些基础较弱或兴趣缺乏的学生,数学学习往往成为他们的难题。教师在课堂中难以通过传统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部分学生缺乏主动学习的动力,甚至产生厌学情绪。

许多教师反映,学生在课堂上对数学的参与度低,尤其是那些对数字和算式没有直接兴趣的学生,他们通常表现出学习消极、不专心的态度。例如,数学概念的抽象性和符号化可能让学生觉得难以理解和记忆,这使得他们对数学学习的积极性大打折扣。因此,如何通过创新的教学方法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成为教师在教学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

3.2 学生认知差异与理解能力的差异化

小学低年级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存在较大差异,这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认知心理学理论,低年级学生的思维发展仍处于具体运算阶段,他们在处理抽象数学概念时,往往会遇到较大的困难。尽管教学内容在设计时已经考虑到低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但由于学生个体差异较大,教师在教学中依然需要面对如何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这一难题。

许多教师反映,他们需要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尽可能照顾到每一位学生,尤其是那些学习困难的学生。然而,由于班级人数较多,学生的学习基础和接受能力各不相同,教师常常难以做到个别化教学。这种差异化学习需求导致一些学生在课堂上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及时理解教学内容,进而影响他们的数学学习进度和效果。特别是对于基础较弱的学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难以提供足够的辅导和帮助,造成了学生学习成绩的不平衡。

3.3 教学方法和课堂管理的挑战

尽管教育改革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但许多教师仍然习惯于传统的教学方法,例如讲授式教学和课本导向的教学。这种传统模式在一些低年级班级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学生参与度不高,课堂互动不足,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难以调动。教师通常在课堂中更多地依赖口头讲解和书面练习,而忽视了通过游戏、活动或合作学习等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思考能力。

此外,课堂管理也是教师面临的一大挑战。低年级学生的自控能力较弱,课堂纪律较难保持。特别是在课堂内容比较枯燥、学生注意力容易分散时,教师的课堂管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许多教师反映,在课堂上处理学生之间的互动和行为规范时,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从而影响了教学的流畅性和效果。有效的课堂管理不仅需要教师有扎实的教学基本功,还需要有较强的沟通和组织能力,以确保学生在课堂上的高效学习。

3.4 教学资源和支持的不足

在教学资源方面,许多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师表示缺乏足够的教具、辅助材料和技术设备来支持教学。尽管信息化教学已成为现代教育的趋势,但在许多农村或边远地区的学校,教学资源仍然十分匮乏。教师只能依赖课本和少量的传统教具,无法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来提升教学效果。

例如,互动性强的教学工具如数学实验器具、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等,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的数学概念,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然而,在一些地区,学校对这些教学资源的投资不足,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只能依赖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有限的资源,这使得教学效果受到了很大限制。缺乏有效的教学支持不仅影响了教师的教学质量,也使得学生的学习效果大打折扣。

3.5 教师专业素养和教学策略的不足

教师的专业素养在数学教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一些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着教学方法单一、教学内容准备不足、教学技巧不灵活等问题,导致教学效果不佳。研究发现,尽管当前的教师培训课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师的数学知识水平,但许多教师仍然缺乏有效的教学策略和灵活的课堂调整能力。例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时难以根据学生的反馈及时调整教学进度或改变教学策略,以适应学生的学习需求。

此外,由于长期的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部分教师对于如何在低年级数学教学中创新教学方法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实践。如何有效地将现代教育理论与具体教学实践相结合,如何在教学中应用新的教学方法和技术,仍然是许多教师需要进一步提高的方面。

4. 优化措施与策略

针对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师在教学中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优化措施和策略,以提高教学质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满足学生差异化的学习需求。如表1所示是针对这些困难提出的几种优化策略和措施。

4.1 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与教学能力

教师是教学的核心因素,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尤其是在数学教学法、教育心理学以及课堂管理技巧方面的素养,能够有效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首先,教师应不断更新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通过定期的专业培训和教学研讨活动,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和教育理念。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进行提升:

(1) 加强数学专业知识与教学方法的培训。定期举办数学教学法培训,提高教师对于低年级数学内容的理解和教学能力。通过专业课程、教研活动等方式,帮助教师掌握适合低年级学生的教学策略,如概念启发式教学、游戏化教学等。

(2) 增强教育心理学的应用。低年级学生的认知和情感特点不同于高年级学生,教师需要更好地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例如,教师应学会运用激励机制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通过正向反馈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和参与度。

(3) 加强课堂管理能力。教师应加强课堂管理技能的培养,学会应对课堂中的突发情况,合理组织课堂秩序,确保教学的顺利进行。通过多种形式的课堂管理,如小组合作学习、学生自我管理,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感和集体合作精神。

4.2 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

为了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教师需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课堂参与度。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式往往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师应当积极尝试创新教学方式，促进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知识。

(1) 游戏化教学。游戏化教学是一种通过将教学内容转化为游戏形式来进行教学的方法。研究表明，游戏化教学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课堂参与感，尤其适合低年级学生。教师可以将数学知识通过互动游戏、竞赛等形式引入课堂，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数学。

(2) 探究式学习。在低年级数学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设置实际问题情境，鼓励学生进行自主探究。探究式学习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使他们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教师可以设计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实验、讨论、合作等方式寻找解决方案，从而提高他们的数学思维能力。

(3) 合作学习。合作学习是一种注重学生之间相互协作、共同学习的教学方法。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学生可以通过讨论和互帮互学的方式，增强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教师可以通过设置小组任务和合作项目，鼓励学生在团队中发挥个人优势，达成共同学习的目标。

4.3 差异化教学与个性化辅导

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在学习能力、兴趣和认知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进行差异化教学。差异化教学可以帮助每个学生在其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最大的发展空间。具体措施包括：

(1) 分层教学。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层次，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的教学内容和任务。例如，基础较弱的学生可以通过更多的练习和个别辅导来巩固基础，而能力较强的学生可以通过挑战性更大的任务来拓展思维。这种分层教学有助于每个学生都能在合适的难度下获得有效的学习体验。

(2) 个性化辅导与反馈。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理解程度，进行个性化的辅导。对于有特殊学习需求的学生，教师可以在课后进行额外辅导，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中的难点。同时，教师应及时给予学生正向反馈，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激励他们不断进步。

(3) 利用多样化评估方式。教师应通过多样化的评估方式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避免仅仅依靠期末考试或单一的测试形式。可以通过观察、课堂小测验、作业评估、项目作业等多种形式，综合评估学生的数学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

表 1 优化措施与策略

优化措施与策略	具体策略
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与教学能力	通过定期培训，提升教师的数学知识和教育心理学素养，增强课堂管理能力。
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	采用游戏化教学、探究式学习、合作学习等方法，增加课堂互动与学生参与。
差异化教学与个性化辅导	根据学生差异性进行分层教学和个性化辅导，提供及时反馈。
优化教学资源与教学环境	通过丰富的教学资源，如教具和信息技术手段，提高教学效果。
促进家校合作，共同支持学生数学学习	加强家校合作，定期与家长沟通，提升家长的数学教育支持能力。

4.4 优化教学资源与教学环境

教学资源的丰富性和教学环境的优化对教学效果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在一些教育资源较为匮乏的地区，如何合理利用现有资源，优化教学环境，成为提升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

(1) 增加教具与辅助材料。教师应尽可能使用各种教具、教学软件和在线资源来辅助教学。例如，可以使用数学操作工具、图形展示软件等，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数学概念。同时，借助数字化教学平台，可以实现个性化学习和远程教学，提高课堂的互动性和参与感。

(2) 信息技术的有效应用。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现代教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教师可以利用智能白板、互动学习平台等技术手段，提高课堂的互动性和学生的参与感。例如，教师可以通过在线数学游戏、互动视频等方式，让学生在趣味中掌握数学知识，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

(3) 改善课堂学习环境。优化教学环境对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具有积极作用。教师可以通过合理安排座位、组织小组合作、设计灵活的教学活动等方式，营造一个轻松愉快、互动频繁的学习环境。一个积极的学习环境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增强他们对数学学习的热情。

4.5 促进家校合作，共同支持学生数学学习

家庭教育在学生数学学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应加强与家长的合作，形成教育合力。家校合作不仅有助于学生在家庭中得到数学学习的支持，也能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与心理需求。

(1) 定期家长沟通与交流。教师应定期与家长进行沟通，了解学生在家庭中的学习情况，并向家长提供合理的数学学习建议。通过家长会、家庭访谈等方式，教师可以帮助家长更好地理解孩子的学习需求，共同促进孩子的数学学习。

(2) 家长数学素养提升。通过组织家长讲座或家庭数学活动，教师可以帮助家长提高数学素养，让家长成为学生学习的积极支持者。家长与教师的良好配合，有助于学生在家和学校之间形成一致的学习氛围。

参考文献:

- [1] 甄祎明.义务教育数学作业目标设计的质性研究——基于教师的注意力分配[J].数学教育学报,2025,34(04):22-26.
- [2] 潘建明.唤醒数学学习的能动性：“自觉数学教育”思考与实践[J].人民教育,2025,(Z2):111-113.
- [3] 付钰.数学焦虑与数学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基础教育阶段 73 项实证研究的元分析[J].数学教育学报,2025,34(03):90-96.
- [4] 都琳,徐爽,徐宗本.师—生—AI 协同课堂：人工智能赋能大学数学教育的载体及实践[J].中国大学教学,2025,(04):59-65+81.
- [5] 董黎明,焦宝聪,张清利.中小学数学教师数字素养评价指标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25,35(04):35-43.
- [6] 任磊,刘磊,司红颖.数学建模思想在中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5,41(03):69-71.
- [7] 燕宏.新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教学管理问题对数学教学效率的影响[J].科学咨询(教育科研),2022,(02):97-99.
- [8] 赵汇涛,卢梦霞,周圆圆.核心素养视域下高校数学师范生教学能力的培养[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23(03):69-72.
- [9] 李春影.课堂讨论在中小学课堂的适用性及其蕴含的价值教育评估——基于知识论与心理学的立场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6,36(35):49-52.

Difficulties and Optimization Measures in Teaching Mathematics to Lower Elementary School Grades

Ding Jiayi

(Huaihua Lushan International Land Port Experimental School, Huaihua, Hunan 418000)

Abstract: Mathematics educa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early grades. With 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ies and teaching demands,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face multiple challenges in their teaching practic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ain difficulties faced by teachers, including student disinterest, cognitive differences, classroom management, and the use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By analyzing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issues, several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such as enhanc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mplementing gamified and inquiry-based learning,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optimizing teaching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home-school cooperation.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lower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Keywords: Lower elementary grades, mathematics teaching, teaching difficulties, optimization measures, educational reform

赋能专业课堂：混合式翻转教学在临床康复学中的 融合路径研究

王岑依¹ 焦欣荣^{2*}

(1.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2.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 广西 南宁 530222)

摘要:以教师主导的传统课堂模式已不足以满足运动康复专业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教育目标。本研究依托超星“学习通”线上教学平台,在临床康复学课程中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并将翻转课堂的概念贯穿其中,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满意度。结合翻转课堂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未来可以结合学科特点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尝试和推广。

关键词:运动康复; 临床康复学; 翻转课堂

基金项目: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GZC20231899)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32

前言

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带动了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体育运动越来越成为健康生活的重要一环,随之而来的运动损伤和运动相关疾病的发生率逐年上升。近年来,通过运动康复以最佳的状态参加各种运动,回归家庭,参与社会生活的需求日益庞大。作为运动学与康复医学相互交叉融合形成的综合性学科,运动康复专业具有鲜明的“体医融合”特色^[1],其知识体系涉及体育、生物、医学、康复、心理以及社会等多学科。临床康复学正是在这种需求下设置的专业核心课程,课程以疾病为中心,整合了常见疾病的功能障碍,评定与治疗,是专业基础到临床的桥梁,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依据^[2]。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通常处于主导地位,学生被动接受知识,不利于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混合教学是传统的面对面学习方式与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数字或在线学习方式的融合,目的是充分发挥学习者的主导作用,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个人学习成果^[3]。本文通过在临床康复学课程中将翻转课堂的概念贯穿于混合教学的实践,以期以学生为主体,探索结合翻转课堂的线上线下教学模式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 2021-2023 年在苏州大学体育学院进行,2018 级(线上组,年龄:20.00±0.67; n=19),2019 级(传统组,年龄:20.00±0.65; n=20)和 2021 级(混合组,年龄:20.05±0.61; n=20),三个年级运动康复专业的同学共 59 人参与了本次研究。三个年级分别学习了为期四个月的《临床康复学》课程,每学时 45 分钟,共 34 学时。三组同学均使用中国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临床康复学》第 2 版作为教材,由同一位老师授课。其中,2018 级(n=19)接受的是完全线上的教学,被定义为线上组。2019 级(n=20)进行线下的传统面对面授课,被定义传统组。2021 级(n=20)接受的是结合翻转课堂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被定义为混合组。所有同学均能正常参与教学活动,且能认真填写课程问卷,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

作者简介:王岑依(1994—),女,博士,博士后,讲师,研究方向为运动康复生物力学,运动健康促进;
焦欣荣(1994—),男,学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物理治疗。

通讯作者:焦欣荣

1.2 教学方案

(1) 传统教学组

传统组由老师按照教学大纲采用传统模式，集中学生于教室进行线下教学，用 PPT 进行知识讲解。课堂中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以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对学生提问和适当解答，并于课后给同学们布置作业。

(2) 线上教学组

线上组以超星“学习通”APP^[4]为平台。每节课前，老师在“学习通”上发布预习作业、课程安排和学习目标。同时根据各章节内容上传相关拓展资料，包括相关疾病的网站资源和最新专家共识，疾病康复的操作视频以及不常见病例的康复视频等。在线授课期间，教师按照既定的要求和目标进行教学，同时与学生进行在线互动。课后，根据课程安排发布作业。

(3) 混合教学组

混合组基于超星“学习通”APP 平台发布与线上组相同的资料，以及两次线上作业，在线下进行面对面授课。线下授课前先组织线上讨论，以了解学生的预习情况，把握本章节的授课脉络。线下授课还包括了四次翻转课堂，其中三次是基于病例实操的技术展示翻转课堂，另一次则是以 PPT 汇报形式进行的翻转课堂。翻转课堂具体形式为授课前两周教师在“学习通”发布任务，4-5 人自由组队并随机选取肌肉损伤的康复、韧带损伤的康复、肌腱损伤的康复和软骨损伤的康复中的一个主题进行准备。上课时各组依照翻转课堂的模式按顺序进行汇报，汇报结束后根据 PPT 制作水平、汇报内容逻辑性、汇报流畅性、互动活跃度四项评价指标进行评价。

1.3 课程评价与教学评估

传统组与线上组的考核构成均为理论考试 (50%) 加日常表现 (50%)，理论考试使用同一套试卷分线下、线上进行。混合组采用综合评价体系，包括期末考试(50%)和形成性评价(50%)，其中形成性评价包括日常表现(20%)、线上作业(10%)和翻转课堂(20%)。学期期末通过“学习通”发布教学质量评价量表(Student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Quality, SEEQ)^[5]，对三组参与者进行匿名问卷调查，以评估教学效果。SEEQ 是一份经过长时间使用和验证的，具有极高可靠性的问卷^[6]。通过学习兴趣、教学热情、组织清晰度、群体互动、个人交流、课程拓展、考试评估、作业设置、总体印象及学生和课程特点十个维度进行评价。

1.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20.0 软件(SPSS Science 20.0, Chicago, USA)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平均值±标准差(M±SD)表示。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P < 0.05$ 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研究结果

2.1 课程测试评价

混合组日常表现成绩显著高于线上组和传统组，在翻转课堂对应章节成绩上混合组也呈现相对较高的得分。然而，在期末成绩和总成绩指标上，三组未表现出显著差异。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课程得分比较

指标	线上组 (n=19)	传统组 (n=20)	混合组 (n=20)	F	p
日常表现得分	47.58±4.54	44.34±4.69	48.82±0.41	7.461	0.001
期末得分	80.26±8.63	84.15±6.98	80.30±5.57	1.940	0.153
总分	87.71±6.26	86.41±5.41	88.97±2.71	1.305	0.279
翻转课堂分数 (对应章节)	14.58±2.06	15.90±1.65	16.55±1.54	6.319	0.003

注：字体加粗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2.2 教学质量评估

混合组在学习兴趣、教学热情、组织清晰度、群体互动、课程拓展、总体印象的满意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另外两组，而个人互动、考试评估和作业设置方面则未见显著差异。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2 教学质量评价的比较

SEEQ 项目	线上组 (n=19)	传统组 (n=20)	混合组 (n=20)	F	p
学习兴趣	18.47±1.17	18.05±1.32	19.10±1.21	3.654	0.032
学生发现本课程有一定挑战性,并能激励自己深入学习	4.74±0.45	4.70±0.47	4.65±0.59	0.144	0.866
通过课程学习,学生学到了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4.32±0.75	4.30±0.73	4.85±0.37	4.766	0.012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提高了对临床康复的兴趣	4.42±0.61	4.25±0.72	4.75±0.55	3.264	0.046
课程结束,学生掌握课程内容,对临床康复有一定了解	5.00±0.00	4.80±0.41	4.85±0.37	2.043	0.139
教学热情	18.95±1.08	19.30±0.98	19.75±0.64	3.775	0.029
老师上课时充满热情	4.79±0.42	4.80±0.41	5.00±0.00	2.455	0.095
老师上课时充满活力且精神饱满	4.58±0.69	4.85±0.49	4.95±0.22	2.829	0.068
老师上课风趣幽默	4.63±0.68	4.85±0.37	4.90±0.31	1.728	0.187
老师讲课的方式很能吸引学生	4.95±0.23	4.80±0.41	4.90±0.31	1.046	0.358
组织清晰度	18.63±1.01	18.65±0.93	19.45±1.10	4.184	0.020
老师对授课内容的讲解清楚明白	4.79±0.42	4.60±0.68	4.85±0.37	1.310	0.278
老师会认真备课与仔细讲解内容	4.74±0.56	4.80±0.52	4.95±0.22	1.114	0.335
实际授课内容与教学目标一致,学生能够跟上课程进度	4.37±0.76	4.45±0.76	4.85±0.37	3.068	0.054
老师上课讲解有助学生整理笔记	4.74±0.56	4.80±0.41	4.80±0.41	0.119	0.888
群体互动	19.00±0.94	18.35±1.63	19.40±1.19	3.367	0.042
老师会鼓励学生参与课堂讨论	4.79±0.42	4.75±0.55	4.85±0.37	0.248	0.781
老师会邀请学生分享想法与知识	4.53±0.61	4.55±0.51	4.80±0.41	1.711	0.190
老师会鼓励学生提问并解答	4.74±0.45	4.35±0.75	4.95±0.22	6.818	0.002
老师会鼓励学生发表观点或质疑	4.95±0.23	4.70±0.47	4.80±0.41	2.019	0.142
个人互动	19.05±1.08	19.40±0.94	19.70±0.80	2.291	0.111
老师对每一个学生都很友善	5.00±0.00	4.90±0.31	4.90±0.31	1.002	0.374
无论课内或课后,老师都欢迎学生寻求帮助或提问	4.47±0.61	4.75±0.55	4.95±0.22	4.635	0.014
老师对每位同学都有积极的交流兴趣	4.79±0.42	4.75±0.44	4.90±0.31	0.776	0.465
办公或课后时间,学生都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联系老师	4.79±0.42	5.00±0.00	4.95±0.22	3.193	0.049
课程拓展	23.58±1.22	23.15±1.27	24.35±1.14	5.062	0.010
老师能对比各种相关理论的内涵	4.79±0.54	4.75±0.55	4.80±0.52	0.048	0.953
老师能介绍临床康复中运用的知识背景与概念来源	4.63±0.60	4.45±0.76	4.80±0.52	1.520	0.228
老师会在适当时机提出各种观点引发学生思考	4.47±0.70	4.35±0.81	4.90±0.31	4.026	0.023
老师能充分讨论与临床康复相关的最新发展与趋势	4.84±0.50	4.75±0.55	4.95±0.22	1.000	0.374
老师会在适当时候提出相关人士的看法与观点	4.84±0.37	4.85±0.37	4.90±0.31	0.159	0.854
考试评估	14.37±0.83	14.60±0.75	14.75±0.55	1.388	0.258
考试对检验该课程教学效果是有价值的	4.84±0.37	4.95±0.22	4.90±0.31	0.602	0.551
老师对学生考核和评价的方式是公正和适当的	4.79±0.42	4.75±0.44	4.90±0.31	0.776	0.465
老师强调的重点与考试内容一致	4.74±0.45	4.90±0.31	4.95±0.22	2.093	0.133
作业设置	9.68±0.67	9.55±0.76	9.75±0.64	0.434	0.650
本课程要求的扩展阅读或相关视频观看是有价值的	4.79±0.42	4.60±0.68	4.85±0.37	1.310	0.278
各种作业都有助于对课程主题的理解与提升	4.89±0.32	4.95±0.22	4.90±0.31	0.227	0.798
总体印象	8.79±0.92	8.55±0.60	9.30±0.80	4.784	0.012
这门课程比其他课程好	4.32±0.67	4.30±0.47	4.60±0.50	1.853	0.166
这门课的老师比其他课程的老师好	4.47±0.61	4.25±0.79	4.70±0.47	2.499	0.091

注: 字体加粗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3 讨论

临床康复学是苏州大学体育学院运动康复专业的限制性选修课之一,本门课程的学习是江苏省运动康复专业报考卫生专业技术资格(康复医学治疗技术)的必备要求。鉴于本课程对多学科理论知识与实践技术操作要求同等重要,因此本研究采用了线上线下课程结合翻转课堂的教学形式,以期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在临床康复学中,神经康复内容复杂且最为重要,骨骼肌肉疾病是运动康复学专业的的主诊疾病。运动康复专业学生正式进入医院实习前,需要熟悉神经疾病与骨骼肌肉疾病的理论并能掌握常用康复技术进行应用。这两大块内容既是重点,也是难点,因而我们在其中选取核心章节,进行学习内容、学习方法融合,学生自主广泛学习建立知识体系的混合教学,再通过翻转课堂模式进一步深化学习的实践。同时,我们还在翻转课堂中引入小组内和小组间的相互评价,以提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形成更公平、公开的过程性评估。本研究结果表明,在考察结合翻转课堂授课的章节内容时,混合组的得分显著高于线上组和线下组。这样的结果表明结合了翻转课堂的混合教学可能对学生成绩产生更积极的影响,这与以往对翻转课堂相关研究结果一致^[7]。此外,混合组学生的平时成绩也相对较高,这可能是在混合教学中学生学习的兴趣得到放大,学习意愿更强烈,完成作业的质量相对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也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与所有的教学方法一样,翻转课堂也需要考虑实际局限性,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动机也可能受到课程中提供的自主性的影响^[8]。翻转课堂的优势体现既取决于学生在课堂中主动学习的程度,又与教师在课堂中的实施策略紧密相关^[9-10]。需要注意的是,接受混合教学的学生期末成绩与传统线下教学的差异不太明显,仅略高于线上组学生。此结果与以往一些研究结果类似^[11-12],一开始有学生可能不满意新的教学模式,反而更习惯于传统的被动学习。为了更好地进行课程中的互动,完成相关作业,过多课外时间的消耗也可能引发学生的焦虑^[13],这可能是混合组学生成绩没有得到相对提高的原因^[13]。此外,线上教学虽然丰富了教学资源 and 形式,但需要学生能动的按照学习目标,找到自己的学习节奏,这对学生的自主能力和自律性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缺乏强大的内在动机和时间管理技能可能会降低学生的学习效率。

通过学生教学质量评价的调查问卷,我们发现在课程的学习兴趣、老师的教学热情、组织清晰度与课程拓展、群体互动等方面,多数学生表现出了极高的满意度,对这门课程的认可和对任课老师的认可都远超线上组和线下组。学生对混合教学模式普遍持积极态度,满意度显著高于单纯的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4]。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不仅结合了新方法,也在课程中增加了新内容,拓展了学习的深度,突破了书本的局限。教师在这一过程只有投入更多的精力、饱满的热情,才能持续保持学生的参与度,不断提高学习兴趣。线上、线下之间的师生互动常态化、多样化,构建了持续且积极的沟通平台。这样的教学模式强调学生平时的主动性,课程中的团队合作以及师生共同参与,在个人互动方面与传统教学和线上教学并没有明显区别,这可能是混合组学生对此满意度不高的原因。结合翻转课堂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在考试评估和作业设置方面进行了许多创新,但学生也要面对较大的压力,难免会有学生一时难以接受。本研究混合组有同学表明本门课的作业/任务相对其他课程困难。需要考虑这样的模式下,作业的难度是不是过大,量是不是过度,因而使得学生大量的课后时间被占用。在满意度调查中,考试评估和作业设置与其他教学模式没有显著差别可能就此体现。这也为我们今后改进教学模式、合理安排课后任务、完善形成性评价方式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总的来说,通过混合式教学方法,形成了良好的氛围,学生增加了对临床康复学学习的兴趣。精心的教学设计和课堂安排,激发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参与度,锻炼了学生的综合能力,这表明结合翻转课堂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非常适合临床康复学教学。高等教育的教学理念已经从以教师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方法也必须相应调整^[15]。改革现有教育方式,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主体,是解决当前教育问题的有效途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不应该是形式上的“线下+线上”的结合,更应该是内容和方法上的深度融合,发挥“1+1>2”的功能,是一种创造性和个性化学习的教学模式,这样的模式可能会成为未来教育的基本形式^[16]。混合教学已然成为高等教育的永久组成部分,并将不断发展。

4 结论

研究表明,结合翻转课堂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应用在临床康复学课程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对运动康复专业学生的课程学习效果有积极影响,并广受学生好评。线上线下相辅相成的混合教学模式可能是促进大学生专业学习,提高课程学习表现的有效方式,未来可以结合学科特点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推广和尝试。

参考文献:

- [1] 王国祥, 邱服冰, 杨剑. 中国运动康复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J].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2020, 26(10): 1133-41.
- [2] 张安仁, 冯晓东主编; 齐瑞, 何坚, 杨俊兴等副主编. 临床康复学 本科中医药类 康复治疗学 第2版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 [3] SUN Y, TANG J, CAI J. Research on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of humanities and general education for English majors [J]. Audio Visua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2017, 1: 8-15.
- [4] 赵萌萌, 薛林贵. “线上线下混合式”微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J]. 微生物学通报, 2021, 48(11): 4432-43.
- [5] MARSH H W. SEEQ: A RELIABLE, VALID, AND USEFUL INSTRUMENT FOR COLLECTING STUDENTS'EVALUATIONS OF UNIVERSITY TEACHING [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82, 52(1): 77-95.
- [6] GHARATAPEH A, REZAEI M, PASDAR Y, et al. Comparison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aspects by Student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Quality (SEEQ) and students survey questionnaires health school, Kermanshah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 [J]. Education Strategies in Medical Sciences, 2015, 8(4): 247-54.
- [7] 赵丽, 鲍莹莹. 基于混合学习的大学“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实践研究 [J]. 中国大学教学, 2017, (09): 75-9+90.
- [8] ITOKAZU M.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preferences for Flipped or Traditional classrooms and Perceived course workload [J]. Journal of Asian Rehabilitation Science, 2019, 2: 17-22.
- [9] 于文浩, 张豫丽. 翻转课堂的施动主体:教师的价值和正能量——访“翻转课堂先行者”乔纳森·伯格曼 [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6, (03): 3-9.
- [10] GU J, TANG L, LIU X, et al. Promoting Pre-service Teacher Students' Learning Engagement: Design-Based Research in a Flipped Classroom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 13.
- [11] SMITH K, HILL J. Defining the nature of blended learning through its depiction in current research [J].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2019, 38(2): 383-97.
- [12] ZHANG W, ZHU C. Review on blended learning: Identifying the key themes and categori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2017, 7(9): 673-8.
- [13] WU Y-Y, LIU S, MAN Q, et al. Appl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Based on Micro-Video Class in Pharmacology Teaching [J].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2022, 10.
- [14] MA L, LEE C S.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blended learning using the ARCS model [J].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2021, 37(5): 1397-408.
- [15] 洪艺敏.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学质量标准 [J]. 中国大学教学, 2017, (10): 88-91.
- [16] YUNHUO C, WENSEN Y, YUANXIANG G, et al. 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 on online teaching [J]. Education Science, 2020, 36(3): 1.

Empowering Professional Classrooms: A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Blended Flipped Classroom in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Wang Cenyi¹, Jiao Xinrong²

(¹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China; ² Faculty of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 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ning,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teacher-led classroom model is not sufficient to serve the learning demands and educational goals of sports rehabilitation students.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of Superstar "Learning Link" to explore the mixed teaching of online and offline in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courses, and runs through the concept of flipped classroom, which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satisfaction of students. The blende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odel combined with flipped classroom could be explored and promoted in professional course teaching in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ciplines.

Keywords: sports rehabilitation;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flipped classroom

“双师型”教师培训需求与人力资源规划的关联性研究

商昌敏

(烟台文化职业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3)

摘要: 本文以“双师型”教师培训需求与人力资源规划的关联性为研究对象, 通过分析双师型教师内涵特征、培训需求现状及人力资源规划实践, 探讨两者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 双师型教师培训需求与人力资源规划之间存在政策协同、动态调整、资源协同和评价反馈四大关联机制, 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支撑。基于此, 本文提出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双师型教师培养策略, 为职业院校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实践指导。

关键词: 双师型教师; 培训需求; 人力资源规划; 关联机制; 培养策略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21

在职业教育“高质量、类型化”转型关键期, 高职院校作为培养产业一线技能人才的核心, “双师素养”将直接影响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适配性。2019 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 高职院校要围绕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优化师资, 推动“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超半数; 2021 年《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将其培养机制纳入专项部署, 明确高职需构建“校企协同”师资路径, 标志高职师资培养从“数量达标”转向“质量适配”。据 2023 年教育部数据, 中职“双师型”专任教师占比达 56.71%, 高职虽接近该水平, 但仍面临产业实践能力弱、新兴产业师资缺口大、专业群适配度低、梯队断层等问题, 且培训体系与岗位脱节、缺乏动态调整, 难支撑服务区域产业升级使命。

“双师型”教师培训需求与人力资源规划的关联性研究, 对高职破解师资瓶颈意义重大。理论上, 其突破“重培养、轻规划”局限, 立足高职专业群、产教融合特色, 构建“需求—规划—培养”系统理论框架, 推动学科交叉; 实践上, 可解决培训资源盲目投入、规划与产业不同步问题, 助力精准识别培训需求, 实现资源与规划协同。本研究以高职为样本, 结合区域产业定位与专业群需求, 分析培训需求与规划问题, 探讨内在关联并提出培养策略, 为打造产业适配的“双师型”队伍提供借鉴。

1 国内外“双师型”教师核心研究脉络

1.1 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对“双师型”教师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核心围绕三大维度展开: 其一, 概念界定形成多元共识, 早期教师职称与行业职业资格并行的“双职称论”、理论教学能力与实践指导能力导向的“双能力论”逐步向“双融合论”演进, 强调“产业实践经历与教育教学能力的深度耦合”, 这与《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中“兼具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能力”的官方界定高度契合。其二, 能力模型研究聚焦高职特色, 近年研究多结合专业群建设需求, 如针对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的“双师型”教师, 提出“需求响应+制度供给+发展通道+分层赋能”师资队伍建设路径(周静, 2025), 但多停留在静态能力框架, 缺乏与师资规划的动态适配分析。其三, 培养路径以政策驱动为主, 研究多集中于“校企合作培训”“企业实践锻炼”等单一措施, 如陈欢欢(2025)探讨了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优化路径, 但对“培训需求如何匹配人力资源规划中的梯队建设、专业布局”等关联性问题涉及较少。

1.2 国外研究特征

国外高职类院校的师资研究, 始终以“实践驱动”为核心, 且天然融入人力资源规划逻辑: 日本《专门学校教育振兴法》明确要求新任教师需具备 3 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 将产业实践经历纳入师资准入规划; 德国《职业训练法》不仅规定高职教师每 3 年需参加不少于 60 学时的企业培训, 更通过“企业专家-学校教师”双向流动机制, 实现培训内容与师资结构调整的协同; 丹麦则依托“师徒制”培养模式, 将“以老带新”与师资年龄梯队规

作者简介: 商昌敏(1996—), 男,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武术理论与方法、职业教育。

通讯作者: 商昌敏

划结合,保障实践经验的代际传递(Larsen, 2021)。但国外研究多聚焦“校企协同培养”的操作模式,鲜少针对“培训需求识别与人力资源规划目标匹配”开展专项理论分析,且其模式与我国高职“服务区域产业”的定位存在适配差异。

1.3 现有研究缺口与本文研究定位

现有文献在“双师型”教师培训需求与人力资源规划关联性研究中存在明显不足:理论层面,国内研究多孤立探讨培训内容设计或人力资源规划要素,缺乏对“需求识别-规划目标-资源配置”内在逻辑的系统性建构;国外研究虽有实践衔接,但未形成普适性的关联机制理论框架。实践层面,现有成果多依赖定性分析,缺乏基于高职专业群的实证数据支撑,难以指导院校针对不同职称、不同专业教师设计“培训-规划”协同策略。

2 双师型教师概念与人力资源规划理论基础

2.1 双师型教师的概念界定

根据教育部要求,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中“双师型”教师占比需不低于50%。双师型教师需持有“双证”或“双职称”,即“教师+中级以上技术职务”。因此,可将双师型教师界定为:具备良好师德素养、企业工作或实践经历,同时掌握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并能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融入教学的职业教育教师。

双师型教师的核心能力模型包括三个方面:基础胜任力(专业知识技能与专业实践经验)、提升胜任力(教育教学能力与教育研究能力)和鉴别胜任力(个人特质与职业认同)。

2.2 人力资源规划理论基础

人力资源规划是组织根据自身发展战略和人才培养目标,科学预测未来的人力资源需求,合理规划师资队伍、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配置,确保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的系统性过程。战略人力资源规划(SHRM)强调组织战略与人力资源的匹配,将人视为“资源”而非“成本”,通过具有战略意义的人力资源管理形成组织竞争优势。

战略人力资源规划主要包括五个关键环节:企业战略分析、人力资源需求预测、人才招聘与选择策略、培训与发展计划、绩效管理与激励机制。其中,培训与发展计划环节与双师型教师培训需求直接相关,为构建双师型教师培训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

3 双师型教师培训需求特点与人力资源规划现状

3.1 双师型教师培训需求特点

通过对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训需求的实证调研,发现双师型教师培训需求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分层需求显著:新入职教师亟需提升基准性胜任力,重在课程资源开发能力和教学实施能力的提升;骨干教师需要提升的是技术应用与创新能力;名师教师则需要提升鉴别性胜任力,比如技能大赛指导能力、校企关系构建能力等。二是专业差异明显:不同专业对教师的实践技能要求不同。比如对操作技能要求较高汽修类、机电类专业以及更注重教学方法与课程设计能力管理类、服务类专业。三是内容针对性不足:现有培训课程在设计前缺乏对参训教师已有胜任力现状的测评,对教师培训需求分析不够细致,培训内容与教师胜任力的现实不相耦合,专业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强。四是信息资源分布不均:校企合作对企业和企业人员共享信息资源不足,产教融合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教育体系会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做出调整,在信息资源流通不畅的情况下,企业和企业人员很难了解、跟进教育教学改革方面的最新动向和实际需求等。

3.2 人力资源规划现状分析

职业院校相关研究中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已开展了一些探索,但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规划定位不清晰,部分院校的人力资源规划缺乏对“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明确目标和路径,导致培训资源分散、低效;二是校企协同管理混乱:学校和企业对跨组织人员的聘任管理没有统筹规划,缺乏完善的招聘制度和公开招聘渠道,业务管理无章可循,工作任务分配和岗位职责划分模糊;三是资源配置不合理:职业院校更关注教师队伍的整体规划和结构设置,对“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仅简单地以获取“双证书”或参与企业实践为目标,缺乏对教师职业发展能力和综合素养的全面规划;四是评价反馈机制不健全:校企内部没有设置跨组织人员的信息库和档案管理业务,兼职人员的工作情况、科研活动等不能予以记录和备案,导致教学质量难以考评和追溯,相关数据的统计和上报工作难以开展。

4 双师型教师培训需求特点与人力资源规划现状

4.1 双师型教师培训需求特点——基于高职实证场景的细化分析

结合国内多省市高职师资调研数据及院校实践案例,当前高职“双师型”教师培训需求呈现出“分层精准化、

专业差异化、供需错位化、信息断层化”四大特征，且每类特征均紧扣高职“理实一体化”教学与“产教融合”的核心诉求：

(1) 分层需求：紧扣教师职业发展全周期的能力缺口

从教师职业成长规律看，不同阶段的“双师型”教师面临的能力瓶颈差异显著，绝非“统一培训”可覆盖。新入职教师（教龄3年以内）的核心痛点是“理实脱节”，虽具备学科专业知识，但缺乏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教学的能力，尤其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新教师来说，基本没有实际操作的实践背景；骨干教师（教龄5-10年）则面临“技术迭代滞后”问题，随着产业技术升级，其现有技能难以匹配课程更新需求，调研显示83%的高职骨干教师认为“需每1-2年参加产业新技术专项培训”；名师教师（教龄10年以上、学科带头人）的需求则聚焦“资源整合与引领能力”，既要指导学生参与技能大赛，需“赛项解析+指导方法论”培训，也要主导共建实训基地、开发特色教材等校企合作项目，需“校企协同谈判技巧+资源整合策略”培训，这类需求已超越单纯的“技能提升”，转向“战略协作能力”。

(2) 专业差异：锚定“专业群-产业需求”的适配逻辑

高职不同专业群的“双师”能力需求，直接受对应产业的技术属性影响，呈现出“实操导向型”与“教学创新导向型”的鲜明分野。实操密集型专业的培训需求聚焦“设备操作与故障解决”，如新能源汽车专业教师需培训“高压系统安全检测”“电池PACK维修”等核心技能，护理专业教师需掌握“智慧护理设备操作”；而服务管理型专业则更侧重“教学内容与产业场景的融合创新”，如电商专业教师需学习“直播电商运营全流程”“私域流量运营”等课程设计，旅游管理专业教师需了解“智慧景区管理系统”“文旅融合产品开发”，这类培训若仅停留在“理论讲解”，则无法满足“让学生掌握岗位实战能力”的教学目标。更关键的是，部分交叉专业的培训需求尚未被覆盖，现有培训多聚焦单一领域，难以培养“跨学科双师型”教师。

(3) 内容针对性不足：陷入“无测评-乱培训”的恶性循环

当前多数高职的“双师型”教师培训存在“先培训、后分析需求”的逻辑倒置问题——培训前未开展系统的“胜任力测评”，仅依据“经验判断”设计内容，导致“供需错配”严重。在某高职的培训需求调研中发现，学校为机械专业教师开展“CAD基础绘图”培训，但测评后发现85%的教师已熟练掌握该技能，反而急需“三维建模与3D打印技术”培训，最终出现“教师被动参训、培训效果虚化”的“陪训”现象；此外，培训内容更新速度远滞后于产业发展，47%的“双师型”教师认为“培训内容至少落后产业技术1-2年”，尤其如工业领域已普及“数字孪生技术”，但相关培训仍以“传统机械加工”为主，无法支撑教师将新技术融入课堂。

(4) 信息资源不均：产教融合中的“信息孤岛”困境

校企信息流通不畅是制约培训需求精准度的核心障碍。一方面，学校不了解企业最新技术需求，导致培训后教师仍无法参与企业实践；另一方面，企业不熟悉学校教学改革方向，导致部分合作企业提供的“实践培训项目”，与学校“项目化教学”需求脱节，教师参与后难以转化为教学案例。更突出的是，缺乏常态化的校企信息对接机制，多数院校仅靠“校企合作专员”单线沟通，信息传递易出现偏差，错失培训最佳时机。

4.2 人力资源规划现状——高职“双师型”队伍建设的现实困境

尽管近年高职普遍重视“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但从人力资源规划的系统性、协同性、长效性来看，仍存在四大突出问题，直接制约“培训需求-规划落地”的衔接效率：

(1) 规划定位：重“数量指标”轻“质量适配”，目标与路径脱节

部分高职将“双师型”教师占比作为唯一规划目标，忽视与“专业群建设、区域产业需求”的匹配度，导致“数量达标但质量不足”。调研中发现，不少高职院校将“双师”作为职称评审、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要求所有专业教师1年内考取“电子商务师”证书，即便学前教育、护理等专业与电商无关，最终出现“证不符岗”——教师持有证书却无法在教学中应用；更关键的是，规划缺乏分专业群的细化路径，分数不同专业类别的两个专业群共用同一套“双师型”培养方案，导致规划落地时资源分散、重点模糊。

(2) 校企协同：管理机制“碎片化”，权责与流程混乱

校企协同是“双师型”教师培养的核心路径，但当前多数高职的协同规划缺乏统筹设计。一是“人员管理无标准”，企业兼职教师的聘任无明确准入条件，部分兼职教师仅具备行业经验却不懂教学规律，上课内容随意性大，学校也未制定对应的考核标准；二是“任务分配不清晰”，校企共建的“双师培养项目”中，学校教师负责理论部分、企业导师负责实践部分，但两者缺乏课前沟通，导致课程出现“理论与实践断层”；三是“招聘渠道单一”，校企人才双向流动多依赖“熟人推荐”，未建立公开的“校企人才对接平台”。

(3) 资源配置：重“短期获证”轻“长效成长”，规划缺乏系统性

在资源投入上，多数高职将“双师型”培养等同于“考证+短期企业实践”，忽视教师职业发展的长效需求，导致教师“实践后仍不会教”。资源分配也存在“重重点专业、轻冷门专业”的失衡——更侧重于机械、电商等热门专业，相对冷门专业，如农林、纺织等专业仅能保障基础费用，导致冷门专业“双师型”教师难以支撑专业群均衡发展；此外，未考虑教师个体差异，对实操能力弱的教师，仍采用“集中实训”模式，而非“一对一企业导师带教”，资源投入效率低下。

(4) 评价反馈：“数据断层”导致规划无法动态调整

完善的评价反馈是人力资源规划优化的关键，但当前高职普遍存在“信息记录缺失、反馈闭环断裂”问题。一是“跨组织数据未整合”，校企合作培养的“双师型”教师，其在企业的实践表现未纳入学校档案，仅靠教师口头汇报，无法客观评估培训效果；兼职教师的教学质量、学生评价也未建立系统数据库，导致“续聘与否无依据”；二是“规划效果无追踪”，多数院校仅统计“双师型”教师数量、培训次数等表面数据，未跟踪“教师技能提升后对教学质量的影响”，无法判断规划是否真正落地；三是“反馈机制失灵”，教师对培训内容、规划方案的意见，仅通过问卷收集却未用于调整规划，导致同类问题反复出现，规划陷入“僵化执行”的困境。

5 基于关联机制的双师型教师培养策略

5.1 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双师型教师培养策略——破解“培训资源错配”困境

针对前文提及的“培训内容与胜任力需求脱节”问题，需以“基础-提升-鉴别”三维胜任力模型为锚点，构建“需求-资源-效果”闭环的培养路径，而非简单划分培训方向。

在基础胜任力培养上，核心是解决“理论与产业实践脱节”，需依托校企共建的实践基地设计“任务导向型”顶岗实践。例如长三角某高职与本地新能源汽车企业合作，为机电专业教师设置“电池PACK维修”“高压系统诊断”等实战岗位，要求教师在3个月实践期内完成至少2个企业真实维修项目，实践结束后需提交“企业项目报告+教学案例转化方案”，确保实践经历能直接转化为教学资源——这种模式既避免了“走过场式”实践，又精准匹配了实操密集型专业的教师能力需求。

提升胜任力培养需突破“单一技能培训”，转向“教学创新+研究能力”融合。可联合高师院校或职教研究机构开展“工作坊式”培训，如深圳某高职院校组织的“理实一体化课程开发工作坊”，通过“案例拆解—分组实操—专家点评”的流程，指导教师掌握“项目化教学方案设计”“实训考核标准制定”等核心能力；同时配套“微课题研究计划”，要求教师结合教学痛点申报校级课题，院校提供研究经费与导师指导，以此解决“教学能力与研究能力割裂”的问题，呼应骨干教师“技术迭代与教学创新并重”的需求。

鉴别胜任力培养的关键是“职业认同引领+资源整合能力塑造”，名师工作室需突破“单一示范”功能，构建“引领-辐射-传承”机制。例如山东某高职“智能制造名师工作室”以省级技能大赛金奖导师为核心，采用“1名名师+3名骨干教师+5名新教师”的梯队结构，工作室任务不仅包括“技能大赛指导”，还需牵头校企合作项目，新教师通过“参与项目+观摩指导”逐步掌握“校企协同谈判”“跨团队协作”等能力；同时定期开展“职业教育价值观分享会”，邀请行业大师、资深“双师”讲述成长经历，强化教师对“双师”身份的认同——这一模式直接对接名师教师“资源整合与引领”的需求，也为后续人力资源规划中的“梯队建设”储备力量。

5.2 基于分层分类的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适配“全职业周期”能力需求

针对“不同阶段教师需求同质化培养”的问题，需在“二类三层”框架基础上，结合专业群差异化培养路径，实现“分层不笼统、分类有侧重”。

首先明确“二类”的核心差异：“双职称型”侧重“资格认证+行业资历”，适用于对职业资格要求严格的专业，需强化“职称证书+行业资质”的双重获取；“双素质型”侧重“能力融合+实践创新”，适用于技术迭代快的专业，更关注“产业新技术掌握+教学转化能力”，而非单纯追求证书。

在“三层”培养上，需嵌入具体场景化措施：

新入职教师（初级）：聚焦“过渡适应”，采用“双导师制”（学校教学导师+企业实践导师），教学导师负责“教案设计、课堂管控”指导，企业导师负责“技能实操实习指导”带教，要求入职1年内完成一定课时或学时的“教学实践+企业跟岗”，并通过“教学试讲+实操考核”双验收——期以解决新教师“理实脱节”的痛点，也为人力资源规划中的“新教师留存率提升”提供支撑。

骨干教师（中级）：聚焦“成长突破”，推行“产业项目攻关+教学研究”双驱动。骨干教师在参与企业企业实践类项目的同时，也牵头对应教学课程的开发和教材的编写，并将“项目成果转化为课程资源”作为职称晋升的重要依据——这种模式既解决了骨干教师“技术迭代滞后”问题，又衔接了人力资源规划中“专业群课程更新”的目标。

名师教师（高级）：聚焦“引领辐射”，赋予“校企合作牵头+团队建设”职责。专业教学名师，对接本地MCN机构，主导相关校企实训基地的建设，同时带领团队开发相关精品课程，并指导骨干教师成长为学科带头人，将“团队建设成效+校企合作产值”纳入绩效考核——这一设计契合名师教师“资源整合与引领”的需求，也推动人力资源规划中“核心师资团队建设”落地。

此外，需兼顾专业差异：实操密集型专业的各层级培养均需增加“实践时长”，服务管理型专业则需强化“行业资源对接能力”。

5.3 基于校企协同的双师型教师培养平台建设——打通“产教信息孤岛”

针对“校企协同管理混乱、资源整合不足”的现状，需构建“政-校-企”权责清晰、流程闭环的平台体系，

避免“平台空转”。

(1) “政-校-企”协同管理机制：明确三方权责边界

政府需发挥“统筹引导+政策保障”作用，例如上海某职教集团出台《双师型教师校企培养补贴办法》，对参与教师实践的企业给予岗位补贴，对院校建设校企实训基地给予一等的经费补贴；同时建立“校企合作信用评级体系”，将提供实践岗位数量、导师配备质量等企业参与度指标纳入地方企业评优指标，倒逼企业主动参与。

学校需承担“需求对接+过程管理”核心职责，成立专门机构专职对接企业：一方面调研各专业群教师需求，与企业共同制定实践方案；另一方面建立“教师企业实践跟踪档案”，通过“月度线上汇报+中期现场检查+末期考核评估”，确保实践不流于形式——避免此前“仅靠兼职人员对接、信息传递偏差”的问题。

企业需落实“实践岗位提供+技术指导”责任，鼓励企业为高职教师设置“设备运维岗”“工艺改进岗”等专项实践岗位，每个岗位配备1名资深工程师作为导师，制定特定的培养计划，实践结束后需出具“技能考核报告”，作为教师培训学分认定依据。

(2) 校企共建培训基地：聚焦“模块化+实战化”

基地运作需突破“场地堆砌”，围绕产业技术更新设计动态课程体系。由高职、企业或职教机构共建双师培训基地，根据车企最新技术开发模块化课程，每个模块包含理论—工程师授课、实操—基地设备训练，教师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模块组合——解决“培训内容滞后产业”的问题。

实践岗位设置需量化且贴合教学需求，而非笼统的“30个以上机会”。针对专业特点，设置与教学紧密相关的多类岗位，每类岗位每年提供一定的实践名额，教师实践内容需包含“至少1个教学案例转化任务”，确保实践与教学直接衔接。

(3) 师资互聘与双向流动：强化“激励+保障”

教师企业实践需嵌入“制度激励”，不将“教师每年参与企业实践不低于1个月”作为摊派性指标，而是在职称评审、考核评优、学时认定等多方面予以政策倾斜；参与企业技术攻关项目，可折算教学科研业绩，解决“教师参与意愿低”的问题。

企业人员入校任教需配套“能力培训”，参考福建省经验，对企业兼职教师入校前开展“30课时教学能力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授课；同时建立“兼职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由学生、学校督导、企业共同评分，评分结果与课酬挂钩——避免“企业人员懂技术但不会教”的问题。

5.4 基于信息化赋能的双师型教师培养方法创新——提升“培训效率与适配性”

针对“信息化应用流于形式”的问题，核心对策在于将技术工具与“双师”能力需求深度融合，而非单纯叠加VR或线上课程，具体可通过三大路径实现：

首先，将数字化技能融入培训体系，聚焦教师教学应用能力提升，从“学生实训”转向“教师能力培养”，鼓励教师开发的专业相关“VR系统”，让教师模拟多在企业技术技能操作与故障排查实景，解决“实体设备不足、难以反复训练”的痛点，掌握后还可直接用于学生教学，数字孪生技术则助力“复杂设备教学能力培养”，教师能在平台上完成生产线布局优化、设备联动调试等实战任务，平台自动生成操作报告与改进建议。其次，构建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形成“理论-实操-考核”闭环，平台需深度对接产业真实场景，培训平台的搭建不仅要包含理论学习，还模拟故障场景，让教师完成“故障诊断-方案制定-实操排除”全流程，平台自动记录操作并评分，同步生成个性化改进建议，解决“传统培训难以复现故障场景”的难题。最后，推行线上线下混合式培训，强化资源整合与效果追踪，线上依托权威资源，如教师通过“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学习“直播电商教学设计”等专题课程并获取学分，线下聚焦实操验证，同时建立培训数据追踪系统，记录课程完成度、实操成绩及教学应用情况，数据作为效果评估与后续培训推荐的依据，破解“培训效果无追踪”的问题，通过上述路径，技术工具不再是形式化的“附加项”，而是真正服务于教师能力提升的“赋能器”，推动信息化应用从“表面叠加”向“深度融合”转型。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围绕“双师型”教师培训需求与人力资源规划的关联性展开研究，核心结论如下：其一，明确两者存在政策协同、动态调整、资源协同、评价反馈四大关联机制，四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系统框架；其二，两者的协同能有效破解队伍建设核心问题——政策协同实现国家导向与院校目标匹配，动态调整应对行业变革与院校战略调整，资源协同整合校企优势提升培训效率，评价反馈优化培训效果与规划衔接；其三，基于关联机制的培养策略，可实现培训资源的精准配置与高效利用。

为推动高职“双师型”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提出关键建议：强化政策协同，将国家政策转化为院校具体规划指标，完善“双师”认定与职称评审衔接；完善动态调整，建立行业技术分析 with 培训需求预测联动机制，实现规划与培训计划实时对接；优化资源协同，构建“政—校—企”协同管理体系，提升资源共享与投入效率；健全评价反馈，建立分层分类评价指标，推动评价结果与规划双向优化；创新培养模式，以胜任力为核心、信息化为支撑，深化校企协同培养平台建设。

参考文献:

- [1] 聂伟进. “体验式参与”学习对教师培训效果的提升——基于江苏省高职新教师培训项目的跟踪研究[J]. 江苏高职教育, 2023, 23(06): 34-40. DOI: 10.15903/j.cnki.jniit.2023.06.005.
- [2] 周静, 苏醒. 产教融合共同体赋能“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路径研究[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5, 43(11): 101-107. DOI: 10.19903/j.cnki.CN23-1074/G.2025.11.017.
- [3] 陈欢欢, 刘冬冬.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价值意蕴与优化路径[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5, 45(03): 61-64.
- [4] 刘韧, 韩玉铭, 刘玉静. “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自我身份认同危机形成机理与化解策略——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J]. 教育发展研究, 2025, 45(07): 66-75. DOI: 10.14121/j.cnki.1008-3855.2025.07.008.
- [5] 董照星, 罗生全. “双师型”教师的现代化理念及发展路径[J]. 中国教育学报, 2024, (10): 73-78.

Research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raining needs of "dual teacher" teachers and human resource planning

Shang Changmin

(Yantai Vocational College of Culture and Tourism, Yantai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raining needs of "dual qualified" teachers and human resource plann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ual qualified teacher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raining needs, and human resource planning practices, it explores the inheren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in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re are four major correlation mechanisms between the training needs of dual qualified teachers and human resource planning: policy synergy, dynamic adjustment, resource synergy, and evaluation feedback. The two promote and support each other.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dual teacher training strategy based on the competency model, providing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dual teacher" teaching team in vocational colleges..

Keywords: dual teacher type teacher; Training needs; Human resource planning; Association mechanism; Cultivation strategy

高等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建模思想的改革路径探析

王慧颖 吴振兴 于晟伟 曹琳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北京, 102202)

摘要: 本研究针对高等数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 以应急管理领域人才培养需求为导向, 探索将数学建模思想深度融入课程教学体系的改革路径。通过系统重构教学内容与方法, 以灾害风险评估、应急资源优化调度等实战场景为教学牵引, 有机整合问题识别、模型构建、求解验证和决策支持等关键环节, 构建了“理论奠基—案例解析—应用实践”三位一体的闭环教学模式。实践表明, 该模式能够有效贯通传统教学中离散的教学知识点, 显著增强学生在复杂应急情境下运用数学工具进行建模、分析与科学决策的综合能力, 为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应急管理专业人才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方案。

关键词: 高等数学; 数学建模; 教学改革; 应急管理; 应用能力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高校学生社团工作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 (BJST2025YB14);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2024 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立项资助(2024ZXGG03);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2025 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立项资助(2025RGZN01Z)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67

一、引言

在新工科建设响应“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号召下, 高等数学作为理工科的核心基础课程, 其教学改革亟需突破传统学科壁垒, 以实战为导向, 培养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创新人才。全球极端天气事件与自然灾害频发, 如汶川、盈江地震及印尼、日本海啸等重大灾害造成惨重损失, 2019 年全球约 7100 万流离失所人口中半数儿童, 这一严峻形势对应急管理人才的数学建模能力提出了迫切需求。灾害情境下的应急决策、资源调配及避难场所规划等关键任务, 高度依赖于数学建模工具的有效应用, 如灾害扩散模拟、救援路径优化等场景化问题的解决[1]。然而, 传统高等数学教学存在显著的结构性矛盾, 教材普遍侧重理论完整性, 案例陈旧且与前沿领域脱节, 极少涵盖应急管理等实战场景, 教学模式多以“教师讲、学生听”的灌输式为主, 考核机制过度侧重闭卷考试, 导致超过 60% 的学生认为数学“无用”, 仅为应试而学[2]。这种“重理论轻应用”的范式使学生难以建立数学工具与专业领域的关联认知, 无法满足非常规突发事件对应急量化管理人才的需求[3]。

本研究立足应急管理领域的特色需求, 探索数学建模思想与高等数学教学的深度融合路径。通过重构教学内容体系, 融入灾害救援、资源调度等实战案例, 创新项目制、赛课融合的实践教学模式, 并优化能力评价机制, 旨在培养学生将微积分、线性代数等理论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一改革不仅呼应了新工科对“领军型”工程师培养的要求, 强调原创能力、跨学科整合及社会需求驱动, 也为应急管理人才培养提供了可推广的教学改革方案, 助力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

二、数学建模的内涵与教育价值

1、数学建模的核心内涵

数学建模作为连接现实问题与数学工具的桥梁, 其核心内涵体现为“现实问题—数学工具—决策支持”的闭

作者简介: 王慧颖, 女,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数学建模、大数据分析、高等数学教育;

吴振兴(1982—), 男, 讲师, 研究方向为政治工作教育;

于晟伟(1995—), 男, 讲师, 研究方向为代数表示论、高等数学教育;

曹琳(1989—), 女, 讲师, 研究方向为无人机摄影测量和卫星遥感技术在应急救援中的应用研究。

通讯作者: 于晟伟

环转化过程[4]。与纯理论数学不同,数学建模强调对实际问题的抽象简化和结构化表达,通过定义变量、构建关系、设定约束条件,将复杂现实系统转化为可量化分析的数学模型,最终为科学决策提供定量依据[5]。这一过程可类比为导航地图对真实道路系统的简化——在剥离冗余细节后保留核心拓扑关系,使复杂问题获得可操作的分析框架。在应急管理实际场景中,数学建模的应用流程尤为突出。以火灾蔓延预测为例,需先抽象出关键影响因素(如可燃物分布、风速、温度等),借助偏微分方程构建时空演化模型,再通过仿真验证与参数调整,最终输出火势蔓延的预测结果,体现出“问题识别—模型构建—求解验证—优化迭代”的标准化方法论。

数学模型的价值不仅在于精确计算,更在于揭示变量间的内在规律[6]。例如,传染病传播模型通过基本再生数反映疫情扩散趋势,中央储备库选址模型借助多目标优化平衡覆盖范围与建设成本,这些抽象关系的发现往往比具体数值更具决策指导意义[7]。同样,在地震救援中,资源需求计算需综合学生人数、瓶装水规格与持续时间等变量建立方程组,而应急物资调度则可转化为以运输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线性规划问题。这种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回归具体的认知循环,正是数学建模作为科学研究方法的生命力所在,也凸显了其在应对复杂现实挑战中的深层价值。

2、数学建模的教育价值

数学建模作为连接理论数学与现实问题的关键桥梁,其教育价值在知识整合、能力提升与素养培育三个递进层次上得到系统体现,并在应急管理应用领域展现出鲜明的实践意义[8]。在知识层面,数学建模能够将微积分、线性代数等原本孤立的数学知识点整合为具有逻辑关联性的思维工具,帮助学生理解理论知识背后的应用逻辑。例如,在震后建筑损坏评估建模项目中,学生需要综合运用概率统计、优化方法等多学科知识,从而形成对数学工具的整体性认知。这一整合过程在应急管理场景中表现尤为突出,比如借助图论方法规划最优救援路径,或通过线性规划模型优化应急物资调配策略,使抽象的数学概念转化为支持科学决策的可操作工具。

在能力层面,数学建模的有效性得到多类实证研究的支持。Meta分析表明,建模教学对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合并效应量达到0.976,对学术成就的效应量为0.70[9]。集群随机试验进一步验证,接受建模训练的学生在理性函数考试中表现显著优于对照组,并在灾害情景模拟、模型优化等复杂任务中展现出更优秀的即时与持续表现[10]。在素养层面,通过“课赛研”融合模式的系统化训练,学生不仅能够参与数学建模竞赛中取得突出成绩,也能够参与应急管理相关科研项目中展现创新思维。例如,学生通过开展符合FEMA标准的避难场所可达性分析,在“实际问题—数学抽象—模型求解—实践验证”的全流程中,不仅深化了对数学工具的应用能力,也强化了社会责任意识和人文关怀精神。

综上,数学建模教育通过知识系统化、能力实证化与素养场景化三重路径,重构了高等数学的教学价值。在应急管理高阶应用领域中,它有效构建了从理论奠基、实践锻炼到决策支持的闭环培养体系,为复合型人才的全面成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高等数学教学现状与挑战

1、教学内容与实战需求脱节

高等数学教学内容与实战需求的脱节,突出表现为案例选择的滞后性与应用场景的局限性。传统教材中超过半数的案例内容仍停留在2010年前编写,且多集中于物理运动、生产调度等传统领域,未能充分融入应急管理现代公共安全与灾害应对场景[11]。这种结构性滞后直接导致学生难以建立数学工具与社会现实需求之间的关联,调查显示约60%的学生认为数学学习“无用”,严重削弱其学习动机与应用能力培养意愿[12]。教材与应用领域之间的鸿沟,反映出数学教育内容更新缓慢,未能响应新工科建设对跨学科整合与实战能力培养的要求。

在具体教学内容上,数学工具与实际问题的应用割裂尤为明显。例如,微分方程教学多沿用单摆运动、物体冷却等经典物理案例,而对火灾救援中的烟气扩散模拟、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传染病传播预测等应急场景涉及极少;线性规划模块亦长期围绕工厂生产调度展开,未能引入地震救援物资分配优化、应急避难所科学选址等更具现实意义的建模问题。反观当代应急管理实战需求,从城市内涝淹没范围预测到群体性事件风险动态评估,均依赖数学建模实现量化决策支持。教学内容与现代应用场景的严重脱节,不仅制约了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更成为应急管理等领域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关键瓶颈。

2、学生基础与学习动机分化

高等数学教学中,学生在认知基础与学习动机两个层面均呈现显著的分化特征。在认知基础方面,学生数学能力差异悬殊,以高考数学成绩为例,分数跨度可从50分延伸至140分,形成“理论擅长型”与“应用薄弱型”两类典型群体[13]。部分学生表现出较强的理论推导能力,能够较好地掌握抽象概念与公式演算,但在将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时则显得薄弱;另一部分学生则因中学数学基础不牢固,对高等数学产生畏惧心理,进一步加剧了学习困难。这种固有的认知差异,在传统“一刀切”的教学模式下往往被放大,难以实现因材施教[14]。多项调查数据显示,超过60%的学生认为数学学习“无用”,其学习动机主要停留在应付考试层面,导致内在学习兴趣持续下降。

学习动机的分化则与学生的专业背景和未来职业导向密切相关。相较于普通工科学生,应急管理应用型专业的学生普遍更关注数学知识在实战场景中的价值,例如灾害预测、资源优化调度等。然而,传统高等数学教学内容常与物理、几何等经典案例绑定,与应急管理的前沿实践场景存在显著脱节,这直接强化了学生心中“数学无用”的认知偏差。认知基础的差异与专业应用导向的动机差异相互叠加,使得统一化的教学内容与方法难以满足不同学生群体的多元化需求。有试点项目通过引入分层教学、结合专业案例的数学实验等方式,数据显示学生平均成绩可提升约15%,表明个性化教学路径对弥合学生差异具有积极效果。然而,此类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覆盖率仍相对有限,凸显出现行教学体系在适配学生多样性方面的结构性不足。

3、教学方法与考核体系滞后

当前高等数学在教学方法和考核体系两个层面,均存在与新时代建模能力培养需求不相适应的结构性滞后问题。在教学方法上,“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灌输模式仍占主导,导致学生课堂参与度低、知识应用能力薄弱[15]。有高校的对比研究显示,采用传统讲授模式的班级,其学生数学建模平均分仅为62分,而采用问题驱动式教学(如引入华为杯竞赛案例分组研讨、应急运输调度方案设计等实战情境)的班级平均分达到85分,差距显著。同时,教育技术应用不足也制约了教学效率的提升,部分学校的技术融入教学比例仅为40%,低于全球60%的平均水平,仿真软件、建模平台等现代教学工具的缺位,使得抽象数学概念难以转化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在考核评价方面,现行体系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偏差。闭卷笔试仍为主要形式,其中对计算技巧和公式记忆的考查占比高达70%,而对模型构建、问题分析与方案答辩等关键能力的评价严重缺失。这种“重计算、轻建模”的倾向,导致约30%学生的真实建模能力被低估,成绩误判率可达25%。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考核内容未能有效覆盖从数学理论到实际问题的转化过程,尤其在应急资源调度、灾害扩散模拟等跨学科应用场景中,学生综合运用数学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难以得到科学评估。教学与考核的双重滞后,不仅削弱了学生对于数学理论实用价值的认知,也暴露出教师在整合技术、设计研究性学习任务方面的能力短板,进而固化了传统模式与创新人才培养需求之间的脱节。

四、数学建模融入高等数学教学的实施策略

1、构建应急场景化教学内容体系

构建应急场景化的高等数学教学内容体系,应以核心知识模块为基础,系统开发融合实战要素的教学案例库。在微积分模块,可对比讲解传统人口增长模型与森林火灾扩散应急模型,借助MATLAB模拟火势蔓延速率与灭火资源需求的动态关系,揭示微分方程在灾害预测中的决策价值。导数概念的教学可结合瞬时变化率问题,例如通过分析灾害中人员疏散的瞬时速度或应急物资消耗速率来引入,使抽象概念具体化。定积分应用部分则可设计变力做功、交通信号灯时间优化等与实际应急场景紧密相关的数学模型,运用微元法思想求解,体现积分工具在量化分析中的效用。

在教学内容设计上,应确保每个案例包含问题描述、模型假设、数学表达与求解代码四个核心要素,形成从现实抽象到模型求解的完整训练链条。例如,在微分方程章节,可引导学生基于“小孩药物中毒施救”等现实案例建立微分方程模型,不仅学习方程构建与求解,更深刻体会数学工具的实用价值。这种将数学建模思想渗透到高等数学概念讲授、定理理解中的应用,有助于改变学生认为数学“无用”的观念,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其将数学知识转化为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的关键。

通过这种系统化的案例库建设,能够有效推动数学工具与应急管理实践的深度融合,使学生在掌握高等数学基础知识的同时,初步获得数学建模的知识和技能,为将来运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应急管理问题奠定坚实基础。

2、创新“问题驱动-课赛研融合”教学模式

“问题驱动-课赛研融合”教学模式通过构建“基础—应用—创新”三阶递进式培养体系，有效贯通了高等数学理论教学与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该模式以来源于应急管理领域的真实问题作为驱动主线，将课程教学、学科竞赛与科研训练有机串联，形成螺旋式上升的能力发展路径，在夯实学生数学基础的同时，显著强化其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综合素质。

在基础层，聚焦课堂教学改革，通过在高等数学课程中系统嵌入微型建模任务，如“依据疫情数据建立传播模型”或“构建方程计算灾害被困人员的用水需求”，将抽象的数学概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建模实践。国内外实践表明，采纳类似“僵尸末日”情景的开放结局项目，并结合过程性审查和执行摘要写作训练，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知识迁移能力。在应用层，以数学建模竞赛为关键纽带，通过组织校级竞赛并采用“震后物资调度”“抢渡长江救援优化”等应急管理真实议题作为赛题，强化学生在复杂约束条件下的模型构建与求解能力。一些高校通过“灾后救援”等主题驱动教学，引导学生完成从问题拆解、变量定义到模型验证的全流程，使竞赛成为理论知识应用效果的重要检验环节。

在创新层，则着力推动科研反哺教学，通过选拔竞赛中表现优异的团队直接参与应急管理部门合作的实际科研项目，例如“灾害风险评估模型优化”，让学生深度体验从数据收集、模型迭代到方案设计的完整科研过程。多所高校的实践成效显著，验证了“课赛研”深度融合对创新能力培养的促进作用。该模式成功构建了“第一课堂理论奠基、第二课堂竞赛锤炼、第三课堂科研拓展”的协同育人新体系，促使教师角色从知识传授者转向项目指导者，助力学生实现从擅长“解题”到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能力跃升。

3、强化跨学科知识整合与技术工具应用

强化跨学科知识整合与技术工具应用是高等数学教学改革的关键路径，应以真实问题为纽带打破学科壁垒，系统构建“知识整合—工具实操—能力转化”的教学闭环。在知识整合层面，可以应急管理中的真实问题为核心载体，有机融合数学与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例如，在“概率统计”教学中，可结合生物学的病毒传播机理与计算机科学的大数据分析技术，引导学生利用 Python 处理新冠疫情数据，建立 SEIR 模型并预测疫情拐点；在应急运输调度方案设计中，则需综合运用图论、运筹学与计算机科学知识，通过 MATLAB 实现 Floyd 算法求解最优路径，或利用 Lingo 软件求解线性规划问题。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整合模式，不仅凸显了数学建模在连接数学与物理、工程等学科中的桥梁作用，更有助于学生形成跨学科的系统分析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部分高校教育技术采用率相对较低，这要求教师主动提升技术素养，将 MATLAB、Python 等工具深度融入教学，以解决复杂模型的求解与验证需求。

在技术工具应用层面，应突出实操性导向，通过提供简化的代码模板和标准化框架降低学生的学习门槛。例如，在微分方程组求解教学中，可提供基于 SciPy 库的代码框架，帮助学生掌握从模型构建到编程实现再到结果解读的完整流程；在交通流预测中，可指导学生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提取交通参数，并结合机器学习模型进行预测。成功的实践表明，具备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等多学科背景的教学团队，能更有效地指导学生应对不确定性高、多约束的复杂应急问题。因此，教学改革需同步推进师资队伍跨学科建设与技术工具的体系化教学，最终实现数学应用能力与创新思维的协同发展。

4、建立多元化考核与评价机制

为破解当前高等数学教学评价体系偏重理论、忽视建模能力考察的困境，亟需构建以能力为导向的多元化考核体系。该体系应通过过程性评价与多维度指标的有机结合，系统、全面地评估学生在数学建模方面的综合应用能力。其构建需从评价指标设计、实施路径优化和动态反馈调整三个层面协同推进。在评价指标设计上，可建立“三维度能力评估框架”。知识应用维度考察模型与实际问题的适配性，例如评估应急运输调度模型是否满足调运量、时间窗等现实约束；创新思维维度关注学生在特殊情境下的模型改进与方案调整能力，如面对道路中断时的动态路径优化；团队协作维度则评价在数据处理、模型建立、软件求解等任务中的分工合理性与协同效率，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能力评估的核心，旨在突破单一知识考核的局限。

在实施路径方面，可采用“双盲评审+实战模拟”的复合评价模式。具体包括：建模报告匿名评审环节，可引入应急管理部门等行业专家参与，确保评估的专业性和客观性；团队答辩环节则可模拟“应急决策会议”场景，要求学生现场阐述模型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效果，并展示如救援调度时间缩短 20%等量化成果。过程性评价的比重需科学配置，可参考建模报告（30%）、团队答辩（20%）、实战模拟表现（10%）等权重，形成侧重过程与成果并重的考核结构。为确保评价体系的持续优化，还应建立基于“考核结果-学生反馈”的动态调整机制，通过

收集和分析学生对评价过程的意见, 定期修订指标权重与评审标准, 使考核不仅能准确衡量建模能力, 更能有效引导教学改进, 最终实现评价体系科学性与发展性的统一, 达成对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支撑目标。

五、改革预期成效与实证分析

1、学生应用能力与创新思维提升

将数学建模融入高等数学教学, 对提升学生应用能力与创新思维成效显著。量化评估数据显示, 实施教学改革后, 学生建模报告的平均得分由之前的 65 分提升至 82 分; 某高校采用新教学法的班级, 其数学建模能力平均分达到 85 分, 较传统教学班级的 62 分高出 23 个百分点。Meta 分析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趋势, 表明参与建模活动的学生在问题解决能力、认知技能及学业成就等方面均有显著提高。

在创新思维层面, 学生展现出从“解题”到“构题”的能力跃升。例如, 在“应急救援路径规划”任务中, 学生引入实时交通流数据对经典 Dijkstra 算法进行动态修正, 构建了更贴合实际场景的路径优化模型。应急管理领域的实践案例也表明, 学生能够运用数学工具支持科学决策, 如在社区避难场所规划中综合运用人口分布与风险评估模型, 其所提出的“多灾种协同救援模型”更被地方应急管理局采纳为参考方案。此外, 学生在学科竞赛中表现突出, 累计获得国家及以上奖项 403 项, 并连续五年在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斩获特等奖。这些成果印证了建模教学在培养学生模型构建、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能力方面的有效性, 不仅深化了其对于数学工具的理解, 也强化了其面对真实挑战时的社会责任意识。

2、教学质量与师资队伍优化

为深化高等数学教学改革, 提升教学质量与师资队伍水平, 需从教学资源系统化建设与师资队伍结构化发展两个维度协同推进。在教学资源方面, 应建立动态更新的应急场景教学案例库, 例如每年对 30% 的案例进行修订或替换, 确保教学内容与灾害应对实践保持同步。同时, 可组织编写《数学建模方法》等突出实践应用的特色教材, 为同类课程教学提供重要参考。学校可投入专项资金, 建设集学习、研究与实践功能于一体的“数学建模实验室”等实体平台, 进一步强化教学资源的硬件支撑能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教材和教学资源的开发可积极利用数字技术, 开发微课、动画、虚拟仿真实验等多元化资源, 以适应教育数字化的发展趋势。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实施“双导师制”, 即由校内教师与应急管理部门专家共同指导学生, 能有效提升教学的实战性。通过引入 FEMA (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 等国际先进标准与案例, 有助于促进教师团队专业素养与行业前沿实践的深度融合。同时, 可通过组建“创新教学团队”, 优化团队的年龄、职称与学缘结构, 形成老中青相结合的梯队, 并依托“传、帮、带”机制加速中青年教师的成长。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离不开有效的监测与反馈机制。通过建立“学生能力追踪档案”, 可以长期评估数学建模思想融入教学对学生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实际效果, 从而形成“资源优化—教学实施—科学评估”的闭环管理, 推动高等数学教学从单纯的知识传授向综合能力培养的根本性转型。

六、结论与展望

将数学建模思想深度融入高等数学教学, 是响应新工科建设与应急管理人才培养战略需求的关键举措, 其核心价值在于有效弥合数学理论与工程实践之间的鸿沟, 为培养具有科学决策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奠定坚实基础。本研究通过系统化探索, 形成了以“内容场景化—方法问题化—评价多元化—师资协同化”为核心的教学改革经验体系: 通过构建紧贴应急管理实战场景的教学内容, 实现数学工具与专业需求的有效衔接; 以问题驱动教学法创新破解传统“灌输式”教学的滞后性; 建立多元能力评价机制全面提升学习成效的综合性; 并借助跨学科师资协同强化教学实施的专业性。这一体系在实践中显示出对学生应用能力与创新思维的显著促进作用。

未来改革可在三个方向深化推进, 其一是开发面向应急管理领域的微建模课程群, 以 MOOC 等形式构建模块化学习资源, 提升教学内容的针对性与学习路径的灵活性; 其二是构建“高校-政府-企业”三方协同育人平台, 推动数学建模教学与应急管理实战需求的深度融合, 合作开发基于我国国情与灾害特征的本土化案例库; 其三是建立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建模教学资源共享平台, 促进优质课程、案例及教学成果的开放与共享。需要指出的是, 本研究在样本院校覆盖面上仍存在局限, 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开展不同专业背景下的教学模式适配性比较、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中的深度整合等方向的探索, 持续推动高等数学教育向更加实战化、智能化的方向演进。

参考文献:

- [1] 陈富媛.高等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建模思想初探[J].现代职业教育,2018(04):38-39.
- [2] 巴娜.在工科高等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建模思想的浅探[J].数学学习与研究,2017(11):15.
- [3] 吴晖琴,潘小霞.军事院校数学建模竞赛辅导对策探讨[J].长江大学学报(自科版),2014,11(34):116-117+120+5.
- [4] 刘春艳.如何在高等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J].科学咨询(科技·管理),2019(12):242.
- [5] 赵彦勇,叶绪国.数学建模思想融入课堂教学的策略和路径研究[J].凯里学院学报,2021,39(03):99-104.
- [6] 杨人子,王静.数学建模思想融入高等数学的教学研究[J].大学教育,2021(03):103-106.
- [7] 孟新友.数学建模思想融入新工科数学教学的探索[J].数学学习与研究,2020(24):10-11.
- [8] 吴亚平,冯丽珠.浅析如何将数学建模思想有效融入线性代数课程教学[J].知识文库,2020(19):110+112.
- [9] 张军,张新宇,刘菊红,吴国栋,吴国荣.数学建模思想融入线性代数课程的教学模式[J].高师理科学刊,2020,40(10):64-67+81.
- [10] 曹建美,王凤翔.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中融入数学建模思想的策略[J].西部素质教育,2020,6(12):166-167.
- [11] 李娜.如何将数学建模思想融入到化学教学中[J].文理导航(中旬),2020(09):84+86.
- [12] 司玉琴.将数学建模与科学计算思想融入高职院校数学教学的研究——以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现代职业教育,2020(05):176-177.
- [13] 刘敬刚,郭燕.融入数学建模思想的线性代数案例教学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36(01):15-17.
- [14] 王晓斌,代丽娟.解析数学建模思想融入应用型本科高校数学教学的途径[J].现代职业教育,2020(01):166-167.
- [15] 汤秀良.基于建模思想的中等职业学校数学教学探究[J].技术与市场,2017,24(04):275+277.

Analysis of the reform path for integrating mathematical modeling thinking into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Wang Huiying, Wu Zhenxing, Yu Shengwei, Cao Lin

(China Fire and Rescue Academy, Beijing)

Abstract: To addres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talent cultivation needs in the field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proposes reform paths for integrating mathematical modeling thinking into the curriculum system. By restructur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s, and guided by practical scenarios such as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 and resource optimization scheduling, the reform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s core steps including problem analysis, model construction, and solution verification, forming a closed-loop teaching mode of "theory-case-application".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this model can effectively connect discrete mathematical knowledge points, significantly enhanc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to solve complex emergency problems, and provide important support for cultivating emergency management talents with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capabilities.

Keywords: Higher Mathematics; Mathematical Modeling; Teaching Reform; Emergency Management; Application Ability

职业教育与增值性评价探究

徐硕 赵靖蓉

(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 朝阳 100101)

摘要:近年来, 职业教育一直肩负着促进就业、培养人才的使命, 但是职业教育评价体系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无法完全满足当前职业教育的需求。本文结合实际论述职业技术教育的增值性评价应用研究, 运用多种方式和多维指标综合评价, 侧重实际成果、作用和对学生的促进影响。对学生的知识技能掌握情况做测评的同时, 要考察学生的职业及社会责任准备情况, 客观地检测发展水平, 并指导发展方向。针对职业技术学校重在培训学生的实用型技术能力以适应市场的能力, 而非单纯的学业成绩, 在此基础上, 运用增值性评价技术是必要的。

关键词: 增值性评价; 职业教育; 教育评价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86

一、引言

职业教育在培养具备实际工作技能和职业素养的人才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 职业教育被国家日益重视。党的二十大指出, 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 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1]。增值评价就是衡量教育的附加值, 通过跟踪学生成绩随时间的变化并剔除客观上不平等的影响, 评估学校为学生成绩带来的净附加值。增值评估是衡量教育价值和贡献的一种方法。对学校在洞察其教育行为对学生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方面具备重要意义。随着对教育质量追求日益提升, 增值性评价在职业教育领域的重要性逐步凸显。增值性评价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 为实现有效地评估职业教育领域提供科学化的路径, 提升教育质量并增强培训效能。此外, 它也是一种寻求发现其对社会和学生真实价值的方式, 同时为切实提高职业教育成效和质量供给有力依据。

二、研究综述

增值性评价是一种关注学习者潜能的评估方式, 近年来在教育研究和实践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种评价把教师和学生都看作重要的对象, 既能全面衡量学生的整体发展, 也能检查教师的教学行为对教育增值的作用。以学生为中心的增值性评价不使用单一的量化指标, 而是强调多种方式、过程和情境的评价; 以教师为中心的评价则旨在提升教学质量, 为教师提供系统的反馈, 帮助他们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并促进专业成长。

近几年, 国内外学者围绕增值性评价开展了众多研究。以学生为评价主体, 有学者探讨学生学习质量问题, 如杨旭^[2]认为增值评价将就业所需的知识、素养与效能增值纳入要素, 注重考察职业能力和基础知识学习质量; 也有学者认为, 增值数据可以对学业质量标准进行反馈。既要让学生知道个人已经达到的学业质量水平, 也可以让学生认识到与更高一级学业质量水平存在的提升空间, 避免因标准化评价引发的“天花板效应”^[3]。不过, Yeh, Stuart S^[4]指出增值模型未控制学生自我效能, 而自我效能感与学生成绩相关, 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成绩增长趋势高。

在技能水平方面, 庄西真^[5]认为教师根据增值评价的反馈, 能及时纠正学生技能学习不足; 尹忠根等人^[6]认为其为学生体质健康测评提供新思路; Zhu Cheng 等学者^[7]利用实验得出增值性评价可揭示数学阅读能力对数学学习持续发展的影响。

作者简介: 徐 硕(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旅游职业教育;

赵靖蓉(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旅游职业教育;

通讯作者: 徐 硕

探讨学生全面发展问题时,谢小蓉等人^[8]认为增值性评价是发展性评价,能推进学生进步,实现全面发展;汶莎莎等研究者^[9]认为增值评价可了解影响学生发展的因素,挖掘增值原因。

探讨学生道德品质问题,安富海^[10]认为要构建诚信体系提升评价真实性和可靠性;李鲜等人^[11]认为当增值评价融入道德评价中,可有效评价学生道德发展水平,推动道德评价体系更新;李梦等人^[12]认为依托智能技术推动德育增值性评价,促进立德树人任务落实和学生可持续发展。

教师增值评价起源于英美,在各国应用。以教师为评价主体,增值评价引导教师公平、发展、全面关注学生,促进专业发展。国内外学者对其视角下的教师工作效能进行了探讨,Robert E. Floden 等人^[13]认为评估学习效果应衡量教师“附加值”;Audrey Amrein - Beardsley 等人^[14]认为其可追究教师对学生成绩变化的因果影响及责任;James H. Stronge^[15] 等人发现教师对学生学习的进步有影响,且可以通过该评价被测量出来。任聪敏^[16] 认为职业教育的增值,体现了学生进步在技能等方面的幅度,可考量教师和教育效果;梁文艳^[17] 认为可以从因果效应角度揭示教师质量构成要素;赵德成^[18] 认为其可提高教师绩效考核客观性与公平性。

综上,增值性评价相关研究成熟,无论谁为主体,结果都更公正全面,具有“效果导向性”“公平性”和“客观性”。本文将分析职业教育现状,探讨其实施增值性评价的可行性,并提出对策建议。

三、研究现状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将其视为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提升国民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联合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加强职业学校核心能力建设,深化产教融合,以推进职业教育一体化、大众化为关键,将科教融合作为新方向^[19]。教育部也颁布通知,支持各地组织校企共同开发生产实践项目,引导学生在真实职业岗位中学习知识与技能^[20]。在这些国家政策推动下,我国职业教育培养模式不断创新,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职业教育承担着为工作与创业做准备的责任,与社会及市场关系紧密。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劳动力市场对高素质人才需求大增。在此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规模持续扩大,培养劳动力市场所需人才的供给能力显著增强。企业招聘时也更倾向职校毕业生。截至2021年,我国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2021年高职院校招生557万人,是十年前的1.8倍;中职学校(不含技工学校)招生489万人,招生规模企稳回升^[21]。新兴产业及传统产业升级对高技能专业人才需求巨大,制造业、IT、健康护理等领域对员工综合素质与专业技能要求日益提高。

然而,我国职业技术教育也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其一,概念内涵较落后,如对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必要性争议不断,按传统职业教育定义,人们难以理解其延伸至本科层次^[22]。第二,在大众的看法里,职业教育主要面向在普通教育中因各种原因学业不完整的人,主要培养低技能劳动力,帮助他们获得谋生的能力。第三,人工智能时代对职业教育培养的专业人才要求很高。人才不仅要熟练掌握专业技能和知识,还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以制造业为例,机器人功能强大,这要求职业教育人才具备比人工智能更高的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最后,职业教育的课程和评估标准很难统一。不同的行业和岗位需求不同,课程需要定制,难以形成统一标准。技能的实际应用难以评估,各学校的评估方法也不同,成绩难以标准化和比较。学生的学习速度和能力差异大,影响学习进度和方式,统一评估的难度很大。

四、职业教育与增值评价的关系

职业教育学业评价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重要途径^[23]。增值评价是以学习者对象开展的一种基于可测量数据以及过程性评价的测量方式,用来判断学生的增值程度。采用统计学模型将学生的起点成绩与后续成绩进行比较,了解教师或者学校对学生有哪些增量。其目的是在消除学生的起点能力、家庭因素、学习动机等干扰因素的基础上,评价出教学的真实结果。增值评价认为通过比较学生的基线成绩以及后期的成绩来考查进步是否达标,并且不是单纯的比较两个成绩,而是要看到学生提高了多少技能。职业教育的增值评价方式恰恰能满足以上的评价要求,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符合职业教育学生的个体差异性。职业教育的学生各有自己的兴趣、长项、发展进度,在此背景下,增值评价能促进其个人成长,即注重考察学生在校内所取得的技能与知识进步量,着眼于区分学生受控于共同起始

基础下的所得出的除开一般性发展因素外的增值部分, 发掘潜质, 并以学生成长为目标导向, 充分考虑个体差异与个人成长速度, 不是通过分值高低进行学生的横向比较, 而是根据起点不同予以综合评判, 给学生更多的鼓励。这可以作为教师对学生差异化个性化指导的重要参考, 帮助其在职业教育之路上更好成长。

其次, 其评价更加全面。即为了培养具备实际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劳动者, 增值评价把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结合在一起, 考察学生的技能、知识、素质等全方位的发展情况, 并不仅以学生成绩作为评价标准, 而是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也重点考虑其付出的努力程度以及发展的速率, 这样的结果便更加完整的呈现出一名学生的各项能力, 真实反映职业教育培养出的是什么样的人才, 是否达到了目的。所以与单一考核相比, 增值评价可以更好的针对学生的综合能力予以展现, 只看重分数等单一数据存在不足之处, 无法更好的体现学生的综合能力, 增值评价角度更多元, 对于学生的评价也会更加客观公正。

第三点是跟随着行业、市场的需要变化。职业教育应该针对市场、行业实际情况进行开展, 能通过增值评价进行检测学生的知识水平、职业素养、就业满意度等是否符合要求, 以此判断教育目标是否实现, 再结合上述评价的结果, 根据行业与市场需要、根据工作岗位能力要求的变化对学生评价的标准适时调整, 并将学生毕业进入就业岗位所需要的能力要求和素质要求有机结合起来, 扩宽学生的职业发展空间, 提升行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另外, 应给予及时反馈以用于学习监测; 增值评价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给予改进建议, 它所采集的数据不仅可以呈现某时点上学生的表现, 还可以追踪到学生长期的进步情况, 了解这种进步所对应的幅度与速度。这能够使教师根据学生反馈及时调整教法, 为学生提供恰当的教学; 同时还能让教师清楚地了解到自己的教有没有产生效果, 并且可以用此作为本人工作的参考; 学校可以根据上述结果不断进行自我完善, 如果有明显的没有进步, 那么就说明教学方法或教学内容要做出相应的改变。

综上所述, 增值评价迎合个体成长目标定位较高、力求全面发展、适应多变职业能力要求的特点, 可用于职业教育领域; 应用职业教育中的增值评价是有利的, 能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 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在我国的职业教育深化改革过程中应发挥增值评价作用, 促进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变革。

五、对策研究

增值性评价凸显了教育评估对教育公正及学生成长的重要价值。我国增值评价尚在理论与实践探索阶段, 为发挥其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价值, 需合理运用模型并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合理运用增值评价模型

学生百分等级增长模型 (SGP) 和田纳西增值评估系统 (TVAAS) 是常用的模型。SGP 用来测量学生的学业进步, 主要把学生和成绩相似的同伴进行比较, 关注学生的成长而不是绝对成绩。使用时先看学生过去的成绩, 找出成绩相近的同级群体, 然后比较指定时间段内的学业进步。在职业教育中使用 SGP 时, 还应注意要结合其他评估方式, 如综合能力评价、项目作品评价等, 这样才能全面了解学生的能力。要针对不同的成长领域, 加强职业技能训练, 优化课程内容。教师可以根据反馈调整教学方法。还要把学生的成长与职业生涯规划结合, 确认他们的技能能够在实际工作中使用。

TVAAS 旨在衡量学生学业成长价值增加情况, 评估学校和教师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关注一定时间内学生学业进步。其也有局限性, 运用时要减少影响。评价标准应与行业标准对齐, 反映学生职业技能真实进步, 了解理论转化实际技能情况; 关注长期职业发展, 学校设立长期跟踪机制, 评估职业教育对学生职业道路影响, 分析 TVAAS 分数与就业率、工资水平关系。可建立毕业生就业数据库, 通过多种方式保持联系, 对比关联 TVAAS 分数与毕业后就业情况, 评价教学内容和方法对职业的实际帮助, 确定有效教育策略。

(二) 改进教学方法

增值性评价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变化与发展, 不是单纯的成绩; 通过增值性评价, 可以进一步剖析教学活动对学生学习增值的作用。以实践课为例, 对学生的技能、创新、职业素养等各方面表现作纵向追踪与考察, 就能找到具有实效性的教学方式与实践模式, 如发现了项目式学习对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及团队合作水平的提高非常有效, 那教师就可以将这类项目所占比例适当增加。根据职业实际设计适合的项目主题, 按计划督促并指导项

目开展,让项目式学习真正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养的目的。

同时,增值性评价允许教师视学生的学习增值得以灵活选取教学内容,对于基础较为薄弱、学习能力相对较弱的学生而言,适当降低部分内容的难易程度,增加基础性的训练,而对于基础知识相对较为扎实,学习能力强,具有较强接受能力和接受兴趣的学生,则给予其更多的学习难度大的专业知识,为其开设相应课程。这样就能合理的安排教学进度,并且也能使学生更好吸收所教知识和技能。

若是某个教学主题增值效果不佳,则增值性评价可以帮助教师反向思考。回看自己的教学过程,有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方法的选择上存在问题;也可能是内容的安排上出现了偏差;又或者是进度的把控出现问题;抑或是在反馈的节奏把握不到位。这时,可以邀请同事,互相沟通,大家共同分享经验,寻求解决方法;或是邀请专家提供指导,由专家运用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从多角度提出解决方案,找出有效解决的办法。

增值性评价是基于证据和结果,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调整的重要手段;能使教师的专业成长具有更强的动力性,让其可以及时掌握新的理念、方法与技术,以更新自身的专业知识;它还可以改良教学方式,通过这一方式职业教育可以更好的满足不同的学生的需求,使得不同兴趣和风格的学生可以在更契合他们发展的环境中成长为一名学生。因此有利于整体质量的提高,从而实现更好地促进职业教育朝着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并且源源不断地向全社会提供更多的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

(三) 增强课程相关性

对于职业教育来说,课程相关性是课程质量以及教学效果的一个核心要素,关系到学生毕业后能否顺利上岗就业的问题,也是判断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适配情况的要点所在。增值性评价是一个科学性较强的课程评价方式,其能够让课程更加有效率地与行业需求、职业标准密切接轨。

增值性评价注重考查学生职业技能、专业知识的学习积累与发展情况。不同于以往只将目光聚焦于学生成绩本身的做法,其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发展变化上,并通过比较学生入学前后职业技能和知识水平的情况来客观反映课程对学生掌握实际操作技能和专业知识度等方面的促进作用。这一评价结果可以直接给课程设计者呈现课程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课程与实际工作需要有哪些差异。

为了保证教学内容贴近企业真实的应用场景,教师要与一线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技术人员密切配合,发挥好人员和资源的优势互补作用;增值性评价结果是引领这种合作的重要抓手,如果在增值性评价结果中发现学生的某一项或几项职业能力提升不明显,说明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或者深度不够,或者教学方式对学生学习这种技能的促进作用不大,在和行业专家共同讨论后加以完善,再引入相应的技术和工艺、国家的相关标准等新信息以保证教学内容与时俱进,从而使教学内容得到持续改进。

增值性评价为学校提供了可供提取有用部分和淘汰不用部分的依据,通过多维度大容量数据分析了解哪些知识点有利于学生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哪些知识点与生产实际相脱节,无法促进学生的就业,对于这样的知识点,应积极地删除或替换,使学生所学的点是与社会对接的、最有价值的知识和最有用的技术。将这些信息应用到学校的课程体系建设中,可以实现学校的课程体系更加符合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公司人才标准。此外还可以避免有些内容过于陈旧或部分内容的知识过时等情况的发生。价值高的可适当加强和优化,过时的予以摒弃或更新。

增值性评价对于学校和行业来说,能起到一些推动作用。学校想获得较为准确、完整的增值评价数据,则需要与企业进行信息互换,学校可以从学生实习和就业的过程中获得数据,再将其同学生在校学习的情况进行比对分析,判断出其偏离值程度。同时,将这些数据反馈给学校,并结合学生在校学习成绩,发现学生存在问题的具体原因,并将最新行业资料变换成教学内容,不断对其做出修正和优化。企业可以了解到学校对自己人才的具体培养情况,更加有目的地为学校提供适合自己的人才培养方案,在企业提供一些岗位的同时,也会给学校提出一些修改建议。这样企业和学校也能够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综上所述,增值性评价可以有效保证职业教育课程的增值性,以保证职业教育课程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对促劳动力市场需求,紧跟行业发展趋势,保障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2] 杨旭. 高职学生学习质量增值评价的逻辑理路与实践框架[J]. 上海教育评估研究, 2023, 12(04): 20-24+50.
- [3] 李锋, 沈玲霞, 林众. 信息科技新课标中素养导向的增值性学习评价[J]. 课程教材法, 2022, 42(11): 44-50.
- [4] Yeh, Stuart S. Educational Accountability, Value-Added Modeling, and the Origin of the Achievement Gap[J]. *Education and Urban Society*, 2020, 52(11): 1181-1203
- [5] 庄西真. 论增值评价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义[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1(04): 12-17.
- [6] 尹忠根, 孟现录, 李采丰. 学生体质健康增值性评价模型构建与应用建议[J]. 中国教育学报, 2022(04): 56-61.
- [7] Cheng Zhu, Xiao peng Wu. A Study on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Mathematics Reading Ability on Students Value-Added Mathematics Achievements[J]. *Behavioral Sciences*, 2023(09): 754
- [8] 谢小蓉, 张辉蓉. 五育并举视域下学生增值评价的发展困境与破解策略[J]. 中国电化教育, 2021(11): 32-38.
- [9] 汶莎莎, 孙刚成. 增值性评价: 促进每一个学生可持续发展[J]. 上海教育科研, 2022(03): 70-75.
- [10] 安富海. 学生发展增值评价诚信体系建设研究[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2(05): 124-130.
- [11] 李鲜, 雷云. 增值性评价在学生道德评价中的应用[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36(02): 47-54.
- [12] 李梦, 徐洁. 智能技术赋能中小学德育增值性评价: 内涵解析与应用框架[J]. 教育学术月刊, 2023(03): 64-70.
- [13] Floden, Robert E. Teacher Value Added as a Measure of Program Quality: Interpret With Caution[J].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2012(11): 356-360.
- [14] Audrey Amrein-Beardsley, Tray Geiger. Methodological Concerns About the Education Value-Added Assessment System (EVAAS): Validity, Reliability, and Bias[J]. *Sage Open* 2020(04): 215-218
- [15] James H. Stronge, Thomas J. Ward, Leslie W. Grant. What Makes Good Teachers Good? A Cross-Case Analysis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eacher Effectiveness and Student Achievement[J].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2011(09): 339-355
- [16] 任聪敏. 职业教育开展增值评价的理论构建与路径探索[J]. 职教论坛, 2021, 37(07): 40-44.
- [17] 梁文艳. 探索教师质量的增值性评价: 国际经验与本土展望[J]. 教育科学研究, 2022(04): 91-96.
- [18] 赵德成. 探索增值性评价: 教师绩效考核改革的突破口[J]. 中小学管理, 2020(10): 16-20.
- [19]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12/21/content_5732986.htm
- [2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zcs_zhgg/202307/t20230717_1069319.htm
- [21] https://www.gov.cn/xinwen/2022-05/25/content_5692164.htm
- [22] 徐国庆. 什么是职业教育——智能化时代职业教育内涵的新探索[J]. 教育发展研究, 2022, 42(01): 20-27.
- [23] 宁玉红, 张奇峰, 费潇潇, 等. 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学业评价: 一种综合性评价框架的建立[J]. 职业技术教育, 2025, 46(20): 76-80.

Exploring Value-Added Assessment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Xu Shuo, Zhao Jingrong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consistently borne the mission of promoting employment and cultivating talent. However,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failed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unable to fully meet the current demand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value-added evaluation i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based on practical experience. It employ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hrough multiple methods and multidimensional indicators, emphasizing tangible outcomes, impact, and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n students. While assessing students' mastery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it is equally important to evaluate their readiness for profession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bjectively measure their developmental level, and guide their future direction. Given that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chools prioritize cultivating students' practical technical abilities to meet market demands rather than solely focusing on academic grad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value-added assessment techniques is essential.

Keywords: Value-added Assessm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新《职业教育法》背景下中职好老师的核心素养重构研究

赵靖蓉 徐硕

(北京联合大学 应用科技学院, 北京 100101)

摘要: 新版《职业教育法》于 2022 年颁布实施, 并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职业教育的独立地位。在法律施行后, 对中职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升也愈发重视, 并逐渐成为撬动职教改革的关键支点。据此, 本文尝试建立“职业性—教育性—人文性”的三维教师素养模型: “职业性”作为素养的基础和源泉; “教育性”是实现素养的关键路径; “人文性”是素养的最终归宿, 三者相互交融并相互影响, 共同促进教师素养发展。然而, 当前存在“产教融合”机制并不健全、教师评价体系结构不合理、人文性素养培养缺失等问题, 并基于此提出: 加强校企合作、建立健全以能力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完善服务教师专业发展的全方位支持体系三点建议, 以期引导新时代中职教师从传统的“知识传递者”转型为具备产业技术实践能力、教学转化能力、价值引领能力的复合型教育者。

关键词: 新《职业教育法》; 中职好老师; 核心素养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85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度转型, 就业市场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攀升, 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新版《职业教育法》于 2022 年颁布实施, 并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职业教育的独立地位, 对职业教育的地位作用、发展空间提供了新的法规依据^[1]。在法律施行后, 对中职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升也愈发重视。引导新时代中职教师从传统的“知识传递者”转型为具备产业技术实践能力、教学转化能力、价值引领能力的复合型教育者。

此外, 对职教法修订来讲, 更重要的一个突破就是建立“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机制。把课程内容和技术相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相联系, 建立起能够灵活调整、相互关联的完整体系, 以期解决传统职业教育教授内容未能满足产业实际发展要求等问题, 为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发展提供更加有力保障。

二、理论框架: 三维素养模型建构

(一) 解析政策文本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是国家于 2013 年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它指出教师素养培养要围绕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专业能力这三个核心要求。此标准贯穿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培养、入职、培训和考核等所有环节。它要求教师遵守立德树人、育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并且具备岗位应有的专业理论和实践能力。

专业理念和师德维度涉及职业理解、对学生充满爱心、教学态度和自我修养等方面, 着重体现师德培养, 促进学生发展的相关思路; 专业知识维度包括教育知识、职业常识、课程教学知识和综合知识, 要求教师要不断追踪行业发展动态, 适时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 与时俱进; 专业能力维度包含教学设计能力、教学实施能力、实训组织与指导能力、班级管理和评价沟通能力、教学研究能力等实践能力, 以能力本位为基点, 融入终身学习思想理念^[2]。

(二) 能力本位教育的理论映射

能力本位教育(CBE)理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形成。它的核心目的是把职业岗位需要的能力标准, 变成可以量化和评估的教学单元^[3]。这个理论对职业教育的教师培养有重要启发。主要有两点: 第一, 教师应该有能力把

作者简介: 赵靖蓉(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旅游职业教育;

徐硕(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旅游职业教育;

通讯作者: 赵靖蓉

岗位任务(岗)变成课程内容(课)。这需要他们长期深入地参加企业技术实践。第二,教师应该能用能力标准进行教学评价。这样可以帮助技能竞赛(赛)和职业资格证书(证)之间互相认可价值。

(三) 三维素养模型的生成逻辑

立足中职教师“教书育人”的双重职责及“德技并修”根本任务^[4],以《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能力本位教育(CBE)为指导纲要,构建“职业性—教育性—人文性”三位一体素养模型(见图1)。以职业性为基底、以教育性为桥梁、以人文性为导向,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循环往复而形成有机的整体。其中“职业性”作为素养的基础和源泉,却需“教育性”将其经验译成可教、可学、可评的课程,并借“人文性”把价值判断注入标准与对话;“教育性”是实现素养的关键路径,若脱离“职业性”的真实情境,“教育性”的基础便难以立足,脱离人文性则沦为冰冷流程;“人文性”是素养的魂魄归宿,但如果不能在“职业性”和“教育性”基础上展开,就会陷入空谈层面。因此,打造“职业性-教育性-人文性”三位一体素养模型,三者相互融合,相互依赖,缺一不可,以期解决传统职教师资培养技术“脱教”和教学“去育”这一问题,促成教师实现从技能传授者到学生成长引导者的角色转变。

1. 职业性维度

在职业性方面,要求教师详细了解产业技术动态、内化前沿实践能力,要求教师持续进行企业实践,不断更新自身技术知识储备,以适应岗位所面临的相关挑战。为应对产业技术迭代以及新职教法等对人才素质提出的新要求。根据教师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要求等不同,构建差异化的教师技能培训机制成为必然选择。借鉴德国等职教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形分为不同的类型:对于技术知识更新频率高的领域,例如人工智能的应用、数字媒体技术等,可以选择高频率和短周期来进行培训;而对于一些技术知识更新相对较慢的技术领域,例如传统工艺,基础制造等,在保证效果的基础上,可以适当拉长周期,以适应教师自身的发展需要。这样一来,在提高实施性的同时,兼顾了时效性。

在完成培训体系设计后,课程内容的精准定位成为关键环节。需要及时了解并掌握行业先进技术发展动态,立足于“四新”即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规范的相关内容,将“四新”应用落到实处^[5]。以旅游服务专业为例,教师不仅要熟练运用智能导览、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更要理解这些技术在行业中的实际应用场景。其次为使教师接受培训后能够很好地落实到以后的工作中,应在开展完全部理论性的培训之后,还要组织实践操作考核。主要包括:一是通过学分记录的方式,反映教师参加培训情况;二是建立案例转化激励机制,促使教师对在企业实践工作过程中积累的典型工作情景和实例系统化提取成模块化教学资源,实现由学到做再到教的过程。

教师在企业实践中既要保持教育者的敏感度,将新技术转化为教学案例;又要具备人文关怀的视角,从生产一线汲取工匠精神和职业伦理养分,最终促进三维素养的有机融合。

2. 教育性维度

作为该模型的中介层,教育性维度旨在中职教师将一线企业的产业技术内容转化为日常教学。借鉴建构主义等相关教育理论,该维度要求教师突破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建立由岗位需求—教学过程—能力认证的教学链路,推动职业技能培养的精准衔接。其根本任务是完成从“工作逻辑”到“教学逻辑”的系统性转译与教学设计。具体来说,就是教师要从分析岗位任务转变为设计学习情境,从关键工作任务中先将其分解成几个大的工作任务,再以学生的认知规律将这些能力分成多个步骤,设计成具有完整步骤的学习情境,使课程内容与岗位要求保持一致;其次,还要注重在教学过程之中及时收集并制作各种数字教学资源,例如采用虚拟仿真实训、网络化实训基地教学手段等建立起与行业实际工作同步的教学材料库,做到与时俱进,精准对应;再次,通过对数字化教学内容的学习,能够使学生感到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得到充分调动,提高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水平,并且夯实了自身未来工作岗位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发挥教育性是凭借专业性的滋养得以显现,并通过对人文性的价值实现来得到证明。如果教学设计与产业发展、技术变化脱钩,则会成为无本之木;如果教学过程不能铸就学生的职业情操和匠人品质,则无疑是失去了灵魂。而教育性维度的功能主要是完成“产业技术知识”到“教育教学知识”的创造性转化,并引导“学生价值内化”。

3. 人文性维度

人文性维度并非游离于职业教育实践之外的独立要素,而是深度嵌入职业性与教育性维度的价值内核。人文性维度是这个模型的价值引领部分。教师的人文性素养,不仅体现在对学生“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培育能力上^[4],也体现在关注教师自己的价值观和职业态度。这个方面要求教师不只是教技术,还要在工作中

和教育中建立完整的人文素质。具体来说，人文性方面包括三个相关部分：第一，教师需要深刻理解职业道理并主动实践，把职业道理变成教学中的行为规则；第二，教师应该理解职业教育中的人文内容，让技术教学变成价值引导；第三，教师需要不断积累自己的文化基础和审美素质，给教学加入人文关心。

在实践方法上，建议建立“观察—模仿—创新”的三阶段培养方式^[6]。通过开展道理案例分析、传统文化学习、工匠精神实践等活动，帮助教师在专业发展中主动提高价值观。同时，应该制定教师人文素质的评价要求，把价值引导能力加入教师专业发展的评价中。

人文性方面和职业性、教育性一起组成教师专业素质的完整系统。具体来说，职业性支撑教育性，教育性承载人文性，人文性则反过来引导职业性与教育性的发展方向。三者形成一个完整循环：技术支持教学，教学包含人文，人文指导发展。最终推动教师实现从传授技能的“经师”到培育学生的“人师”的专业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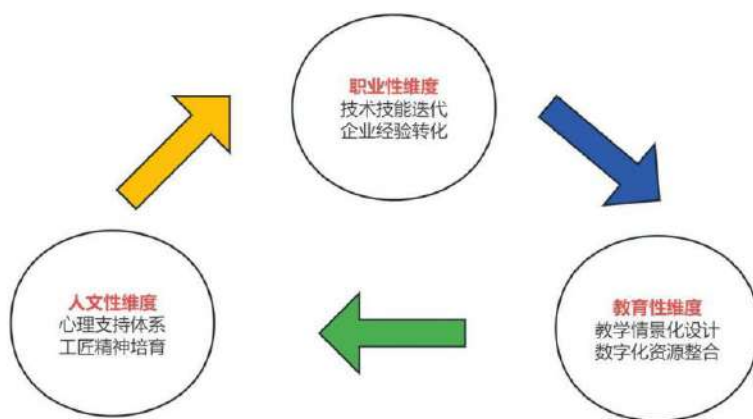


图1 三维素养模型理论框架

三、现实困境：中职教师素养提升的实践壁垒

中等职业教育作为连接基础教育与职业发展的关键环节，教师的专业水平及专业素养直接影响职业教育的质量^[7]。但目前中职教师在专业成长中遇到不少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限制教师自身发展，也深刻影响着职业教育的长期进步。

（一）产教融合机制不健全

生产与教育脱节已成为制约中职教师实践能力提高的主要障碍^[8]。其核心问题在于“教”与“产”在实践环节的深度割裂。尽管新《职业教育法》明确倡导“德技并修”，并要求弘扬“工匠精神”，但教师的企业实践往往与教学改革、课程开发脱节。正如研究指出，劳动教育与实习实训未能有效“挂钩”^[4]，导致教师难以将前沿的技术技能、职业伦理与工匠精神有机融入日常教学。这种脱节使得教师的“职业性”素养沦为静态的过往经验，无法与产业升级同步迭代，最终造成教学内容与行业真实需求的错位。

（二）评价体系异化

现有的教师评价机制存在显著的“重硬轻软”倾向，难以支撑“三维素养”的全面发展。评价标准过度偏向可量化的技能证书、竞赛获奖与科研成果，而忽视了教师在教学转化、价值引领等“软实力”上的表现。这直接导致了双师型教师认证在实践中异化为“持证不练功”的形式主义。其根源在于，评价体系未能将如在课程思政中融入劳动教育等综合育人能力纳入核心指标^[4]。这种导向偏差，迫使教师将精力集中于追逐显性成果，而非深耕于融合职业性、教育性与人文性的高质量教学，从而抑制了其向复合型导师转型的内生动力。

在“双师型”的教师认定中，存在重资格、轻实践的现象。一些教师更关注获取证书的结果，而不是在获取证书的同时真正提高实践能力从而反哺教学。同时，由于教学评价过于看重竞赛成绩等表面指标，导致相对忽视课堂教学效果及育人成果的综合评估。这种评价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积极性和方向。

（三）人文关怀能力的缺失

当前，关于教师人文素养的系统性培养，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现有的支持体系在帮助教师树立职业信念、提

升伦理素养方面仍较为薄弱,并且缺乏专门针对教师人文素养培养与发展的有效机制,也存在“原则性规定多,缺乏实践可操作性”的困境^[4],绝大多数教师未曾接受过将人文精神、职业伦理进行“教学转化”的系统培训,也缺乏将劳动教育融入专业课的实操方法与资源支持。这种缺陷不仅会影响教师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和工作幸福感,也会影响他们在实际教学中有效引导学生价值观的能力。教师作为教育环节中重要角色之一,其人文素养的水平直接关系到育人工作的质量与成效。

这些困境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共同构成中职教师专业与素养发展的相关挑战。产教融合机制不完善制约教师实践能力的提升;评价体系的导向偏差影响教师发展的方向选择;人文素养培养的缺失从更深层次限制教师专业境界的提升。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制度设计、支持体系和发展环境等多个方面进行系统规划和全面推进。

四、优化路径:素养重构的系统化解决方案

中职教师素养提升面临多方面的困难,涉及教育理念、制度设计和资源配套等多个层面。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机制创新、评价改革和体系完善三个方向系统推进,构建一个校企合作、动态评价和全面支持相结合的教师专业发展新环境。

(一) 深化校企协同,构建教师实践能力发展新机制

校企合作是提升教师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应当改变过去松散的合作方式,建立双向流动和资源共享的深度合作机制。具体来说,可以借鉴国际经验,采取两种做法:一是邀请企业技术专家到学校担任产业导师,参与课程开发和教学活动;二是安排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通过参与技术研发和生产管理等实际工作,帮助教师及时了解行业变化,并将企业需求融入教学^[9]。

从合作形式来看,要建立校企多层次的协同体系,在学校成立企业导师工作室、共建技术研发中心和联合实验室等平台,向校内师生输送企业的最新项目、高端技术和先进的企业管理思想,让师生充分了解企业的业务和企业文化,帮助教师更新知识、改造内容,使教学更加契合企业的需求。

(二) 动态评价体系构建

优化评价体系是提高教师素质的重要方法,建立动态化、多维度的评价体系,可以使教师的教学实践情况以及教学效果得到更真实的反映^[10],采用理论、实践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取消以往“重证书、轻实践”的做法,既要考察教师的教学能力,又要考核教师的实践能力。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建立教学案例库,即围绕典型的工作场景,汇总一系列教学案例,并要求教师结合实际工作进行应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测评;通过案例测评其教学设计与问题解决的能力。二是建立企业反馈机制,即围绕技术运用、问题解决、沟通协调等方面,设置相关的评价指标,邀请企业对教师进行评价,考察教师的实践能力与职业素养。

(三) 支持系统完善策略

建立一套系统、全面的支持系统,是帮助教师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此系统需要集结学校和企业的优质资源,为教师提供技术发展、开展教学研究、促进成长及心理健康方面的全方位的系统、服务和储备资源。在支持系统上,学校可构建“专业发展—心理支持—职业发展”三位一体的支持系统,促进教师的全面发展,例如组建教师学科教学团队、设立教师专业发展基金、开展教师学习共同体等等,为教师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同时要完善教师职业发展通道,建立与教师职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激励机制,激发教师自我发展动力,形成促进教师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的组织氛围。

以上三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融通,校企合作为教师素养提升打下实践基础,动态评价为教师发展指明方向,全面支持体系则为教师持续成长提供环境保障。为教师素养内化的实践性打好基础,动态评价为教师素养内化的方向性指明道路,全方位支持为教师素养内化的成长性提供保障,这就形成一个承接、推进、支持与辅助中职教师素养内化的有机、良性循环的系统,为当今时代中职教师队伍建设搭建可行平台。

五、结论:类型教育视角下的模式创新

三维素养模型为职业教育教师的专业素养发展,提供新式理论框架:将教师素养培养路径划分为职业性、教育性和人文性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并非简单叠加,而是一个相互联系、彼此促进的整体。职业性维度关注教师的技术能力,确保其与行业发展同步;教育性维度强调教学转化,帮助教师把专业知识有效传递给学生;人文性维度则注重育人价值,为职业教育增添人文关怀。这种系统性的设计突破了以往对教师素养的单一理解,形成了

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

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框架,本研究构建的三维素养模型恰揭示了当前教育评估体系的局限——这些评估往往偏重对知识记忆水平的考查,却相对忽视了对能力建构过程与价值塑造成效的关注^[1]。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模型并非一个封闭的终极体系,而是一个需要在多元职业教育情境中不断验证、持续演进的发展中框架。未来的研究与实践应致力于在以下三个方向寻求突破,以深化其内涵并拓展其外延:一是深入探索该模型在不同专业领域的具体表现与差异化要求。例如,在技术迭代迅捷的人工智能专业与强调技艺传承的传统工艺专业中,职业性、教育性等维度的权重与内涵必然存在显著差异,亟待通过分专业的案例研究来描绘出清晰的素养图谱。二是纵向分析这三个维度在教师职业生涯不同发展阶段——从新手教师、熟练教师到专家型教师——的作用机制与演进规律。理解它们如何伴随教师成长而动态变化,将为设计阶梯式的教师发展支持体系提供关键依据。三是将模型置于更宏观的职业教育生态系统之中,系统研究其与课程标准、教学资源、评价制度乃至学校治理结构等关键要素的互动关系与耦合机制。唯有通过这般细致而系统的后续工作,才能使该模型超越理论探讨,真正精准、高效地指导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进而为锻造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与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 [1] 陈鹏,李天航.职业教育学科建设刍议——访江苏师范大学陈鹏教授[J].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30(05):121-124.
- [2] 徐国庆.职业教育课程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3] Spady W G. Outcome-Based Education: Critical Issues and Answers[M].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 1994.
- [4] 问清泓.职普融通视域下职业教育、劳动教育和实习:目标融通与实践策略[J].职业技术教育,2024,45(07):33-41
- [5] 秦伶俐,范宝莉,郭秋生.新工科背景下“建筑施工技术”课程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报,2022,38(04):58-61.
- [6] 卢菊,赵春宇.美育视角下高职院校传统手工艺课程实践探索——以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现代商贸工业,2024,45(08):234-236.
- [7] 刘丽恒,吴波,罗德宪,等.试论构建中职班主任能力评价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J].成才之路,2024,(19):73-76.
- [8] 许海峰,石伟平.高职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提升的困境及对策[J].职教论坛,2017,(20):16-20.
- [9] 金星霖.中职教师“双师型”教学能力评价体系的构建——以“双师”教学能力群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为理论基础[J].职业教育研究,2020,(10):70-74.
- [10] 杨仲璋,刘翔.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用户画像”式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研究[J].现代职业教育,2024,(22):97-100.
- [11] 高伊菲,张雪凌.数智时代教师数字素养的综述研究与展望[J].电脑与电信,2024,(07):1-7

Research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re Competencies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Teachers under the New Vocational Education Law

Zhao jingrong, Xu shuo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he newly revised "Vocational Education Law" was promulgated and implemented in 2022,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legally established the independent statu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ollow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increasing emphasis has been placed on enhancing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teachers, which has gradually become a key lever for driving the re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respons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three-dimensional teacher competency model encompassing "vocational proficiency," "pedagogical expertise," and "humanistic cultivation." In this framework, "vocational proficiency"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and source of competency, "pedagogical expertise" represents the critical pathway to achieving competency, and "humanistic cultivation" constitutes the ultimate goal of competency development. These three dimensions interact and influence one another, collectively fostering teacher growth. However, several challenges persist, including an underdeveloped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mechanism, structural flaws in the teacher evaluation system, and a lack of emphasis on humanistic competency development.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recommendations: strengthening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establishing a sound competency-oriented evaluation system, and improving a comprehensive support system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aim is to guide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teachers in transitioning from traditional "knowledge transmitters" to versatile educational professionals equipped with industry technical skills, teaching transformation capabilities, and value-guiding competencies.

Keywords: New Vocational Education Law; High-Quality Secondary Vocational Teachers; Core Competencies

从现代性困境到自然回归：大学生户外运动的存在论意涵探析

杨晨飞 但懿 蒋梦溪 白鸥

(玉溪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 云南 玉溪 653100)

摘要:在智能手机和平台经济深度渗入校园生活的情境中,大学生的时间与身体经验日益被课程表、绩点和屏幕逻辑所规训,现代性中的理性计算与绩效取向延伸到体育实践之内。与此相对,徒步、露营、骑行等户外运动为大学生提供了暂时脱离制度化空间的身体场域。本文立足体育现代性批判,引入身体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相关研究,将身体视为世界经验与意义生成的原初根基,从时间经验、空间经验、他人共在、风险与有限性、自我叙事五个方面分析大学生户外运动的存在论意涵,进而提出高校体育教育在课程目标、活动组织与生命教育整合方面的若干启示,强调在安全边界内保留适度风险,使户外运动成为学生面向自我与自然的存在教育契机。

关键词:现代性困境; 户外运动; 身体现象学; 存在主义; 大学生

基金项目:玉溪师范学院2024年教学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202401)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89

当代中国高校校园高度网络化、制度化。课程安排、成绩评定、奖学金评审等环节,都在无形之中把大学生的时间压缩成一格一格可计算的单元,身体活动也被纳入体质测试、课堂考勤等指标体系之中^[1]。在此背景下,体育课往往被学生视为完成学分和达标测试的工具,身体更多以“需要维护的指标”身份被召唤,而不是具有独立意义的存在方式^[2]。与此同时,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几乎占据了大学生大部分碎片时间,人与世界的连接越来越多地通过屏幕中介完成,交往场景、情绪表达甚至价值判断,都在算法推送构筑的环境中展开。身体感受在这种结构下逐渐退居幕后,只在出现疼痛、疲劳或异常时才被注意。学者指出,现代体育从产生之初便深深镶嵌在工业文明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其发展逻辑与现代性密切相关^[1-2]。在高校校园,体育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现代性烙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些年各类户外运动开始受到大学生追捧。周末去郊外徒步、寒暑假参加登山或穿越活动、在校园周边自发组织露营和骑行,正在成为不少学生的日常选项。在表层看来,这一浪潮与社交媒体的打卡文化、文旅产业发展密切相关,但若从更深层的角度观察,会发现户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承载了大学生对自然环境、真实身体感受以及非功利性关系的渴望^[3-4]。因此,单纯从健康促进或技能习得角度理解大学生户外运动,已经无法充分把握这一现象背后的精神诉求。本文试图引入现代性批判、身体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相关理论,探讨大学生走向户外的动机及其蕴含的存在论意涵。换言之,我们关心的是,在现代性困境之中,大学生为何要离开教室和屏幕,走向山野与湖岸。这种“走出去”的行动,在存在论层面意味着什么。

一、现代性批判、身体现象学与存在主义

(一) 现代体育与现代性逻辑

现代性常被概括为以理性化、工具化、制度化为特征的一整套社会发展过程,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展开,对身体与体育的影响尤为深刻^[1-2]。研究指出,中国现代体育的引入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密切相关,体育被赋予国民体质提升、军事训练和国家形象展示等多重功能,带有强烈的目标理性色彩^[1]。在此过程中,身体被视为可以训练、测量和管理的对象,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之一。

从历史脉络看,体育发展长期受到西方式身心二元论和工具理性传统影响。古希腊以来,理性与灵魂被置于主导地位,身体在相当长时间里处于被压制的地位^[2]。近代体育虽在竞技和教育领域大放异彩,却延续了以速度、

作者简介:杨晨飞(1989—),男,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户外运动理论与产业。

蒋梦溪(1991—),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户外运动理论与实践;

白鸥(1989—),男,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户外运动理论与实践。

通讯作者:但懿(1989—),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与领导力。

力量、记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把身体视为可不断优化的“机器”。这种理解方式,在学校体育中以成绩、标准和等级制度的形式体现得尤为明显。这种体育现代性逻辑在当代高校中依旧发挥作用。课程安排服从统一模版,教学目标以掌握技能和通过测试为主。学生在体育课上需要完成规定次数的跑步、跳远或球类练习,在期末接受标准化测评,身体活动紧紧扣住“合格”“达标”等关键词。从存在论角度看,这样的制度安排容易将身体的多维意义收缩为功能性维度,使学生难以从体育实践中体会更丰富的生命经验。

(二) 身体现象学与身体哲学的基本立场

与传统身心二元论不同,身体现象学把身体视为经验世界的原初场所。梅洛-庞蒂认为,身体不是单纯的物质对象,而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交互结构,人通过身体与他物发生关联,在行动中理解世界^[5]。这一观点为重新理解体育运动提供了重要视角。国内学者在引介身体现象学的基础上,系统讨论了身体在体育运动中的认识论与审美意义。叶浩生指出,传统体育观念往往将身体运动视为理性目的的手段,从现象学视角看,第一人称身体经验本身具有认识价值,运动中的知觉、节奏和姿态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身体知识^[6]。赵歌借助梅洛-庞蒂和舒斯特曼的身体思想,提出体育健身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身体化”的审美活动,人在此过程中通过对身体感觉的细致觉察,与自身生命状态建立更亲近的联系^[7]。苑文静则从“习惯”的角度分析体育运动中的身体实践,指出习惯并非简单的刺激与反应重复,而是身体在身体图式统摄下开辟世界的一种方式^[3]。这些研究共同表明,体育活动不仅关涉健康和技能,也关涉人与自身、他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在身体现象学视野中,身体不是被动接受训练的对象,而是主动体验、构成意义的主体。

(三) 存在主义、生命教育与自然回归

存在主义哲学关注的是“此在”的具体生活处境,尤其关注人在荒诞、焦虑和有限性体验中的自我选择和意义追寻。海德格尔提出的“向死而在”和“本真存在”等概念,强调人在面对有限性时有可能从日常的沉沦状态中醒来,重新审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8-9]。近年来,有学者将存在主义引入生命教育领域,指出教育不应仅仅关注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还应帮助学生直面生命的有限与脆弱,培养对存在本身的敏感和尊重^[10]。体育哲学研究也开始借助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讨论体育活动中的本真与非本真状态。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分析运动员在比赛和训练中的经验,探讨体育活动中真实性的可能性,反思当代体育商业化和成绩中心倾向^[11-12]。这些讨论为理解户外运动中“真实体验”的教育意义提供了理论资源。

综合上述理论线索,可以构建一条贯穿现代性批判、身体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分析路径:现代性通过规训身体、压缩时间、塑造制度,改变了人对自身和世界的体验结构;身体现象学提醒我们回到具体身体经验之中,从运动中的知觉和行动理解世界;存在主义则关注人在有限性和风险情境中的选择与自我塑造。以此为背景,大学生户外运动可以被视为在现代性困境中寻求自然回归和存在更新的一种实践形式。

二、现代性视野下大学生身体经验的困境

(一) 时间规训与身体感受的退场

大学生日常时间高度表格化。课程表、作业截止日期、考试安排、社团活动排期共同构成了一张细密的时间网络,学生在其中不断切换角色。运动时间多被放置在课余或周末,在任务密集和作业堆积时,往往成为可以牺牲的选项。体育课本身也深受时间规训影响。每节课堂被切割成若干固定环节:集合、点名、热身、技术练习、结束放松。教师需要在有限时间内完成教学要求,难以留出空间用于学生对身体感受的细致体会。学生对身体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心率是否过快、是否会影响下午上课精力,而不是动作中的重量、节奏、平衡感等细节。身体感受在这种时间结构下逐渐退到背景位置,变成完成任务的工具。

(二) 虚拟空间的扩张与地方感的削弱

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极大拓展了大学生的虚拟空间,但同时也削弱了对现实空间的敏感度。许多学生对校园周边的自然环境并不熟悉,却能熟练说出各类线上平台的推荐算法。日常行动路线在宿舍、教室、食堂和图书馆之间重复,身体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趋于单一。地方感缺失意味着人和具体环境之间的情感纽带变弱,世界被体验为互换性很强的场所集合,某个教室与另一栋楼里的教室差别不大,只要网络顺畅、设备可用即可^[4]。在这样的生活情境中,自然景观往往以壁纸、短视频或滤镜照片的方式出现,与真实的风、温度和地形阻力脱节。身体不再通过脚步丈量距离,而更多通过地图软件和步数统计了解世界。

(三) 学校体育制度对身体的双重塑造

学校体育一方面为学生提供了定期运动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把身体纳入现代性管理体系。体质测试、课外锻炼打卡、体育成绩与综合素质评价挂钩等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对身体的关注,但关注的焦点多集中在分数、等级和合格线^[6]。身体被量化为若干指标,健康被理解为“通过某项测试”。在这种结构下,

学生很容易把体育实践看作应付任务。如果身体活动只被理解为提高体测成绩的手段，学生在运动中体验到的紧张和焦虑，往往与分数和排名有关，而不是与身体本身有关。长此以往，体育实践难以成为通往存在感与意义感的路径。

三、大学生户外运动的存在论意涵

在上述背景下，大学生选择走向户外，并不仅仅是寻找新鲜活动方式，更是在客观上进入另一种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之中。户外运动为大学生提供了重新理解身体、自我和世界的机会，其存在论意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感知与行动中的“在场”

与操场上的重复跑圈不同，户外路径往往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路面的坡度、石块的大小、泥土的湿度、风向的变化，都需要身体实时调整步伐和姿势。脚底与地面的接触不再是统一的塑胶材质，而是不断变化的土、草、岩石。身体必须对这些差异保持敏感，否则很难顺利完成行程。从身体现象学角度看，这种高度依赖感知与行动协调的场景，使身体重新成为经验世界的中心^[9]。学生在山路上行走时，很少有精力去考虑抽象的分数和评价，而不得不集中注意力感受呼吸节奏、肌肉酸胀和重心移动。这种通过运动中的感知与行动获得的身体知识指向的不仅是某种技术，更是对自身状态和环境关系的整体把握。从“身体化审美”的角度，体育健身被视为一种以身体为媒介的审美实践，个体在其中通过对身体感觉的细致体察，与生命状态建立直接联系^[7]。大学生在徒步或攀登过程中感受到的疲惫、舒展和节奏感，不仅是生理反应，也是对自己存在方式的审美体验，此时，身体不再是需要保养的“机器”，而是一个正在与世界发生关系的“现场”。

（二）节奏、耐受与等待

在校园生活中，时间往往以课时和节次的形式出现，是被预先划定好的网格。户外运动则呈现出一种不同的时间经验。以一整天的徒步为例，学生从清晨出发，通过连续几个小时的行走，把时间经验拉长为一个整体过程。途中上坡、平路、休息点和观景点，共同构成了具有内在节奏的时间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学会调节步伐，找到适合自己体能的节奏，同时也要学会耐受单调和疲劳。等待队友、配合队伍整体进度，使个体时间不断与他人时间发生交汇。时间不再是单一的效率单位，而是与身体感受和人际关系紧密交织的流动过程。身体现象学强调，人的时间意识往往嵌在具体行为之中，通过行动的连续性来把握过去、现在和未来^[5]。在户外运动中，这种通过行动体验时间的方式尤为明显。对于习惯被各种即时反馈包围的大学生而言，长时间行走和等待构成了一种难得的“慢”。在这种“慢”中，他们得以从高频信息刺激中暂时抽离，与内在感受重新建立联系。这种对时间的重新经验，为反思日常生活的节奏和价值判断提供了机会。

（三）信任、依赖与责任

户外活动通常不是单独完成，而是以团队形式进行。队伍中有体能强的学生，也有经验不足的初次参与者。行进过程中，大家需要共享水源、食物和装备，在遇到路况变化时协商路线，在有人体力不支时调整节奏。这种高度依赖合作的环境，使“与他人共在”的结构变得格外清晰。存在主义和现象学都强调，人与他人的关系不是可选的附加项，而是存在结构的一部分^[5,8,10]。在户外运动中，学生会直接感受到自己对他人的依赖，也会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例如，走在队伍前方的同学需要适时提醒后方成员注意危险路段，走在后方的人则要留意队伍是否有人掉队。某些看似微小的举动，例如主动分享热水、帮人调整背包，都在无形中强化了彼此之间的信任感。与课堂小组讨论不同，山路上的协作往往需要承担具体后果。一句不负责任的催促、一时的逞强，可能导致队友受伤或队伍陷入被动。通过这类经验，学生能够更真切地理解“责任”一词的重量，也更容易在活动结束后把这种经验迁移到日常生活中的社团工作和人际关系之中。

（四）面对风险与有限性

在城市和校园中，许多风险被基础设施和制度过滤，学生很少直接面对生存层面的威胁，这种状况容易滋生一种“无事感”，仿佛重大风险只会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户外运动则在可控范围内重新引入风险元素：天气变化、地形复杂、迷路可能、轻微受伤等情形，提醒参与者自身的脆弱与有限。海德格尔认为，人只有在面对有限性时，才更有可能从日常沉沦状态中走出，向本真存在靠近^[8]。在山野环境中，大学生会发现自己并非随时随地都可以撤退，也并非随便哪一个错误决定都可以轻易挽回。在这种情境下，谨慎与畏惧不再被简单视为软弱，而是一种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生命教育研究指出，教育实践有必要为学生提供适度的边缘经验，使他们在安全前提下体会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形成对生命价值的更深理解^[10]。大学生户外运动正具备这样的潜力。如果高校在组织中既有合理的安全保障，又保留一定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使学生在决策和行动中真正面对风险，那么户外运动将不仅是休闲方式，也是一种重要的存在教育途径。

（五）自我叙事与意义建构

当一次户外活动结束后,许多学生会选择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和文字。从表面看,这是一种符合平台逻辑的“打卡”,但如果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其中包含许多细碎而具体的记忆:某一段路的特别陡峭、某位同伴的鼓励、某次差点放弃又坚持下来的时刻。这些微小片段经由叙述重新连接,构成了个人的生命故事。体育哲学研究已经注意到,体育活动常常成为个体建构自我叙事的重要资源,人通过回顾自己的运动经验来讲述“我是一个怎样的人”^[7,11]。对于大学生而言,一次成功完成的长距离徒步、一次顶着风雨到达营地的经历,往往会在自我叙事中占据重要位置。这类叙事不仅记录身体的变化,也记录心态的转折和价值判断的调整。当学生在复盘活动时说出“原来我可以做到以前以为做不到的事情”或“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其实很依赖队友”,这些话语本身就是存在论层面的自我说明。通过讲述和书写,户外运动被纳入个体生命历史,现代性生活中原本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的时间,被某些长线经验重新串联起来。

四、从现代性困境到自然回归:高校体育教育的实践启示

(一) 在课程目标中加入存在教育视角

传统体育课程目标强调增强体质、掌握技能和培养意志品质,这些目标当然重要,但不足以概括户外运动蕴含的全部教育价值。基于身体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视角,课程目标可以适度加入“存在教育”维度,例如帮助学生发展身体感知能力,学会倾听疲惫和快乐背后的意义;帮助学生在风险和不确定情境中形成合适的判断方式,而不是只追求速度和成绩。在具体教学设计中,教师可以留出短时间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一次训练中的身体感受和情绪变化,而不是立刻进入下一个技术动作。这种看似浪费时间的安排,实际上是对身体经验和存在感的承认。

(二) 重视地方自然与户外资源的教育化转化

中国具有十分丰富的自然地理和户外资源,许多地区的高校周边都分布着山地、湖泊、河谷等环境。相关研究指出,中国特色户外运动在吸收西方经验的同时,需要结合本土地理和文化传统,挖掘具有地方根基的人文价值^[4]。对于高校而言,探索校园周边的户外课堂,不仅可以降低组织成本,也有助于学生建立对本地自然环境的地方感。课程设计可以从短距离的郊野步道开始,让学生在反复往返的过程中逐渐熟悉地形和四季变化。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记录同一路线在不同季节的色彩、气味和光线差别,使地方环境不再只是背景,而成为具有人文与自然意涵的教育资源。

(三) 在安全管理与存在体验之间寻找平衡

户外运动确实存在风险,高校安全管理部门强调“安全底线”有充分的现实依据。问题在于,如果出于规避责任的考虑而完全取消风险和不确定性,户外运动的存在论价值也会被大幅削弱。如何在安全与体验之间取得平衡,是高校需要认真面对的课题。一方面,可以通过科学评估和分级管理,将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例如对路线难度进行分级,对学生身体状况做基本筛查,在关键路段配备有经验的领队。另一方面,也应当避免把一切活动都简化为“项目体验”,让学生只在完全可控的环境中走一个流程就结束。适度保留例如天气变数、路线选择、团队协商等环节,为学生亲身参与决策和承担后果提供空间。

(四) 构建支持性叙事空间

如前所述,户外运动的许多存在论意涵通过叙事得以沉淀。高校可以有意识地为这种叙事提供平台,例如在学院网站或新媒体账号上开设“在路上”的栏目,鼓励学生用文字和照片记录一次有意义的户外经历。在分享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身体感受、人际关系和价值思考等角度梳理经验,而不仅仅是展示景色和路线数据。此外,课堂上也可以安排简短的经验交流环节,让学生用自己的话讲述一次“改变了看法”的户外体验。这种叙事空间有助于学生把零散体验整合为具有内在结构的生命故事,同时也为同伴提供多样化的存在范例。

五、结语

本文以“现代性困境”和“自然回归”为两端,以大学生户外运动为中介,尝试在体育现代性批判、身体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框架下,探讨户外运动的存在论意涵。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当代高校生活在时间规训、虚拟空间扩张和制度化体育实践的多重作用下,容易使身体经验退居次要位置,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更多扮演合格的学习者和绩效承担者,而较少以具体身体和独特存在的方式感受世界。大学生走向山野湖岸的行为,既是对自然环境的接近,也是对自身身体和存在方式的重新追问。在户外运动中,学生通过感知与行动的统一重新“在场”,在长时间行走和协作中重构时间经验和他人共在的结构,在面对风险和疲惫的过程中体会生命的有限与可贵,在事后叙事中把零散体验整合为具有意义的生命故事。这些经验共同组成了户外运动的存在论厚度,也为高校体育教育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当然,本文仍然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未对具体高校和学生群体进行实证调查。未来研究可以通过深度访谈、体验日志分析等方法,进一步细化不同类型户外运动在存在论意涵上的差异,并探讨性别、专业背景、家庭出身等因素对大学生户外经验和意义建构的影响。即便如此,本文至少表明,如果我们只把户外

运动理解为健康促进或技能训练,就会错过其中最富教育潜能的部分。只有在现代性批判与存在关怀的双重视野下,高校户外运动教育才能真正回应当代大学生对身体、自然和意义的多重期待。

参考文献

- [1]李香华.中国现代体育与体育现代化[J].体育学刊,2002,(05):20-22.
- [2]马祥海,宋玉红,程卫波.身体之维:体育运动的历史嬗变[J].体育学刊,2008,(08):16-18.
- [3]苑文静,张再林.体育运动中“习惯”的身体哲学解读——从梅洛-庞蒂到理查德·舒斯特曼[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8,42(06):18-22+29.
- [4]杨占东,于涛,董耀华,等.中国特色户外运动的人文价值考量——基于中外户外运动人文价值的对比分析[J].体育科学研究,2024,28(06):33-39+87.
- [5]Merleau-Ponty M, Landes D, Carman T, et al.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M]. Routledge, 2013.
- [6]叶浩生.身体的意义:从现象学的视角看体育运动的认识论价值[J].体育科学,2021,41(01):83-88.
- [7]赵歌.作为“身体化”审美活动的体育健身的文化哲学研究——基于莫里斯·梅洛-庞蒂和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思想[J].体育科学,2019,39(01):85-97.
- [8]Heidegger M. *Being and time*[M]. SUNY press, 2010.
- [9]Deng X.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dy and sports? From Merleau-Ponty's body phenomenology and philosophy perspective[J]. *Trans/Form/Ação*, 2024, 47: e0240053.
- [10]张焯.当代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培育与提升——欧文·亚隆存在主义心理理论的启示[J].教育探索,2022,(05):53-58.
- [11]Jirásek I, Oborný J, Hurych E. The authentic and inauthentic sport in the Hermeneutic and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s[J]. *Acta Facultatis Educationis Physicae Universitatis Comenianae*, 2018, 58(1): 8-18.
- [12]Filiz N. Heidegger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Authenticity' in sports participation[J]. *Sport, Ethics and Philosophy*, 2024, 18(5): 511-526.

From the Predicament of Modernity to a Return to Nature: An Ontological Reflection on University Students' Outdoor Activities

Chenfei Yang, Yi Dan, Mengxi Jiang, Ou Bai

(Facul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Yuxi Normal University, Yuxi,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s immersion, this paper explores its theoretical logic and mechanisms in construc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By reviewing relevant literature, the study builds a logical framework of sports immersion, including cultural transmission, ritual interaction, and bodily participation, and further elaborates on its implications in cultural identity, social integration, and educational governance. On this basis, it proposes a theoretical path through which sports immersion promotes the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The study argues that sports immersion plays a unique role in stimulating collective honor, strengthening national unity, and fostering the awareness of “all ethnic groups belonging to one Chinese family,” thu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practices in border ethnic regions.

Keywords: Sports Immersion; National Community; Cultural Identity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外语教师数字能力现状及人口学变量考察

谭铭元^{1#} 杨国强^{2#} 董晓瑜²

(1.东新大学, 韩国 罗州 58245, 2.烟台南山学院, 山东 烟台 265713)

摘要:在教育数字化全面推进的背景下,提升高校外语教师的数字能力成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任务。本文基于“基础—进阶—扩展”三层次能力框架,构建五个维度、36项指标的问卷工具,对288名高校外语教师开展调查,运用SPSS 27.0进行描述性统计、T检验与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高校外语教师整体数字能力处于中上水平,基础性能力较强,扩展性能力相对薄弱。性别差异不显著,但在学历和教龄维度上差异显著,特别是教龄超过20年的教师在多个维度上能力明显不足。职称虽未达统计显著,但在评估能力方面呈现一定趋势性差异。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教师数字能力的结构特征,揭示了人口学变量的影响路径,并从学校支持机制与教师自主发展两方面提出针对性提升建议,为高校外语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高校外语教师; 数字能力; 人口学变量; 数字化转型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91

1.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数字化”作出了全方位的战略部署,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创新教育模式,旨在借助数字化手段提升教育质量与效率,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教育公平[1]。为达成上述目标,完善教育信息化标准体系,增强教师运用数字技术优化、创新与变革教学活动的意识、能力与责任成为关键举措。为此,教育部组织制定了《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并于2023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正式发布[2]。该标准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教育系统在推进教育数字化进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在信息化时代,数字素养已成为高校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高等学校教师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对教育数字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3]。关于数字能力的概念界定,已有诸多研究涉猎[4]-[5],但在高校外语教师数字能力的新特征方面,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从人口学变量维度来看,现有国内研究多聚焦于性别因素,对其他人口变量的关注相对不足[6]。因此,有必要对我国高校外语教师的数字能力开展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本文拟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理清高校外语教师数字能力的新特征;2.考察高校外语教师数字能力的现状;3.探究人口学变量对高校外语教师数字能力的影响。

2.数字能力及相关研究

2.1 数字能力概念

在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能力”(digital competence/digital literacy)逐渐成为衡量学习者与教师信息素养、技术运用及创新能力的关键指标。尽管各机构对该概念的表述存在差异,但整体共识在于:数字能力不仅包括对技术工具的操作技能,更涵盖信息分析、在线沟通、创造性表达与数字伦理等综合素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全球数字素养框架》中,将数字能力定义为“在技术环境中有效、批判

作者简介:谭铭元(1996—),男,博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环境设计;
杨国强(1989—),男,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高等教育;
董晓瑜(1996—),女,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笔译、高等教育。

通讯作者:董晓瑜

#共同一作

性、创造性地获取、评估、使用、分享与创造信息的能力”，强调其作为终身学习基础素养的重要性^[7]。欧盟委员会推出的“数字能力框架（DigComp 2.2）”则系统划分了五个领域、21项能力指标，包括信息与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作、安全问题意识与技术性问题解决能力，广泛应用于教育、就业与公民参与等多个领域^[8]。

韩国教育部在“未来教育推进战略”中也指出，教师与学生需共同具备 AI、数据素养和 ICT 活用能力，提升对技术的理解与整合水平，推动教育系统的结构性转型^[9]。中国教育部则于 2022 年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将教师数字能力归纳为“理念素养、技术素养、数据素养、学科融合、创新实践”五大维度，反映出对国际框架的吸收与本土化发展^[2]。

这些框架共同表明，数字能力是一种高度情境化的综合性能力，不仅适用于学习者，也成为教师应对教育变革的基本要求。尤其在高校外语教育领域，教师不仅承担知识传授者角色，还需在多语境下进行信息筛选、多模态资源整合、在线跨文化交流与学习反馈优化等工作。因此，针对高校外语教师数字能力的专项研究，不仅具有现实紧迫性，也为跨国教师能力标准建设提供了经验样本与实践路径。

2.2 外语教师数字能力新特征

在人工智能加速教育数字化的背景下，高校外语教师的专业角色正经历由知识传授者向学习促进者的根本转变，数字能力已成为其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外语教师的核心能力在原来的基本语言本体能力、学科教学能力、学术研究能力上展现新的特征。教师在传统能力基础上，逐步掌握数字能力，逐步形成涵盖基础操作能力、高级教学设计能力及持续专业发展的扩展能力的三个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能力格局。

首先，基础能力是高校教师在数字化教学环境中实现有效教学的起点。包括数字技术使用能力和数字资源应用能力两方面，强调教师能够熟练使用多种教学平台（如 Welearning、LMS 等）进行课程发布、资源整合和在线互动，掌握多媒体课件制作与技术支持等基本技能。这一层次的能力为教师从传统课堂向混合式、线上课堂的顺畅过渡提供了必要保障。

其次，进阶能力聚焦于教师如何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教学各环节，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转型。该层能力包括促进学生应用能力和开展教学评估能力，要求教师在数字环境中能够根据学生个性化需求进行差异化教学，同时结合数据分析和多样化评估方式（如测验、作品展示、学习日志等）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这一层次能力的建构，标志着教师从单一技术使用者转变为教学优化者。

最后，扩展能力指向高校教师在快速变化的教育技术环境中，能够主动探索新兴工具与教学模式，持续提升自身数字素养和教研能力。教师应积极参与数字化教学的教研创新，结合人工智能、计算语言学等新兴手段推动学科交叉与科研发展，实现教学与研究的深度融合。该层能力不仅是对教师数字能力的拓展，更体现其作为终身学习者和教育创新实践者的职业追求。

整体来看，三层次能力从基础到进阶再到扩展，构成了一个层层递进、相互支撑的完整框架。它强调教师数字能力的动态演进过程，突出“教学—教研—专业成长”的螺旋式提升路径，为后续的实证分析和能力培养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引。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及工具

结合前文对高校外语教师数字能力新特征的探讨，将教师数字能力划分为 5 个子类：数字技术使用能力、数字资源应用能力、促进学生应用能力、开展教学评估能力、专业持续发展能力。其中数字技术使用能力和数字资源应用能力属于基础能力范畴，促进学生应用能力和开展教学评估能力属于进阶能力，专业持续发展能力属于扩展能力。5 个子类能力下设 36 个具体指标，依据数字能力水平对每个指标从低到高分别赋值 1 - 5 分。在量表的背景信息部分，根据研究子问题，加入教师性别、教龄、学历以及职称等背景信息，形成《高校外语教师数字能力》问卷调查表。设计好的问卷在 1 所高校进行了预测，经过 Cronbach's alpha 值检测、修正数据以及 KMO 检验等，最终问卷检测结果显示信息化教学信念 Alpha 值为 0.87, KMO=0.703。问卷结构效度良好，符合预期。

3.2 数据收集及分析

2025年3月-5月,课题组正式将调查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给高校外语教师进行了在线数据收集。共收回312份问卷,有效问卷288份,有效率为92%。问卷收集之后,首先通过SPSS27.0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以判断高校外语教师数字能力现状,其次,通过T检验以及单因素ANOVA检测等方法分析了高校外语教师的人口学变量在数字能力上的差异。

4. 研究结果

4.1 高校外语教师数字能力总体特征

首先,对高校教师数字能力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

表1展示了高校外语教师数字能力各维度的整体特征。从平均值来看,五个维度中得分最高的是“数字技术使用能力”(M=3.76),其次依次为“开展教学评估能力”(M=3.75)、“促进学生学习能力”(M=3.73)、“数字资源应用能力”(M=3.65),得分最低的是“扩展专业持续发展能力”(M=3.57)。这一结果表明,教师在基础性操作与教学实践相关的数字能力方面表现较强,而在与个人专业成长和长远发展相关的维度上相对薄弱。教师在基础性操作与教学实践相关的数字能力上表现较强,可能与疫情期间线上教学的全面推行密切相关。大规模线上授课促使教师在平台使用、资源上传、课堂互动等方面形成实践经验,有效提升了其数字技术使用能力。同时,国家“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等政策持续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与教师数字素养培训,为教师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与制度保障。上述因素共同促使教师在基本教学层面的数字能力得到普遍提升。

表1 数字能力整体特征

变量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方差
数字技术使用能力	288	2.13	4.75	3.76	0.52	0.27
数字资源应用能力	288	1.50	4.63	3.65	0.47	0.22
促进学生学习能力	288	2.71	4.71	3.73	0.38	0.15
开展教学评估能力	288	2.71	4.86	3.75	0.41	0.17
扩展专业持续发展能力	288	1.33	4.67	3.57	0.64	0.41

从标准差和方差指标看,“扩展专业持续发展能力”维度的离散程度最大(SD=0.64,Var=0.41),说明该能力在教师群体中存在较大个体差异,部分教师表现出较高的发展意识与实践能力,这可能与教龄分布、岗位状态与技术接受度密切相关。相比之下,“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得分最为集中(SD=0.38,Var=0.15),反映出教师群体在该维度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总体来看,高校外语教师的数字能力整体处于中上水平,但在持续发展层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4.2 影响高校外语教师数字能力的人口学变量分析

本章节探讨性别、学历、教龄、职称等背景变量对高校外语教师数字能力的影响,采用T检验以及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进行数据分析。数据分析在SPSS 27.0软件中进行,以验证不同背景变量在数字能力各维度上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结果为后续研究结论提供了统计基础。

4.1.1 性别

为探究性别在高校外语教师数字能力各维度上的差异,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男性与女性教师的得分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五个维度中男女性教师的平均得分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p 均 >0.05),表明性别并非影响高校教师数字能力水平的显著因素。尽管部分维度上女性教师平均得分略高于男性,如“数字技术使用能力”与“促进学生学习能力”,但差异均较小($T<1.1$),无统计意义。这一结果提示,在当前教育数字化推进背景下,男女教师在数字工具使用、资源整合及教学创新等方面已趋于平衡,性别因素对数字能力的影响逐步弱化,能力表现更可能受到教龄、学历、职称及培训经历等变量的共同作用。

表2 各维度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变量	性别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t	sig
数字技术使用能力	男	101	3.73	0.53	-0.64	0.52
	女	187	3.77	0.51		
数字技术使用能力	男	101	3.61	0.48	-0.98	0.33
	女	187	3.67	0.46		
数字技术使用能力	男	101	3.70	0.39	-1.08	0.28
	女	187	3.75	0.38		
数字技术使用能力	男	101	3.74	0.41	-0.24	0.81
	女	187	3.75	0.41		
数字技术使用能力	男	101	3.61	0.65	0.75	0.46
	女	187	3.55	0.63		

4.1.2 学历

将研究对象学历划分为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三个阶段,对不同学历高校外语教师在数字能力五个维度上的表现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数字技术使用能力”和“扩展专业持续发展能力”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1$),其余维度差异均不显著。LSD 事后比较进一步发现,在“数字技术使用能力”维度上,硕士与博士研究生群体的得分显著高于本科群体;在“扩展专业持续发展能力”维度上,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教师亦明显优于本科教师,且本科组均值最低、标准差最大,呈现出能力表现的不均衡性(详见表3)。

表3 各维度在学历上的差异

变量	学位	平均值	标准差	F	Sig	多重比较
数字技术使用能力	本科	3.43	0.64	6.67	0.01	2>1、3>1
	硕士研究生	3.76	0.52			
	博士研究生	3.85	0.44			
数字资源应用能力	本科	3.48	0.74	2.27	0.11	3>1
	硕士研究生	3.65	0.45			
	博士研究生	3.70	0.38			
促进学生学习能力	本科	3.70	0.38	0.13	0.88	/
	硕士研究生	3.74	0.39			
	博士研究生	3.73	0.37			
开展教学评估能力	本科	3.78	0.37	0.26	0.78	/
	硕士研究生	3.74	0.44			
	博士研究生	3.77	0.37			
扩展专业持续发展能力	本科	2.83	1.05	22.67	0	2>1、3>1
	硕士研究生	3.62	0.55			
	博士研究生	3.69	0.49			

进一步查看原始数据发现,本科学历的教师大多为教龄超过20年的资深教师,其中相当部分已接近退休,职称以副教授和教授为主。该群体在数字技术使用和持续发展意识方面,普遍存在技术适应滞后与更新动力不足的问题,部分教师甚至对数字教学持观望或抵触态度,这一现象可能是造成“数字技术使用能力”和“扩展专业持续发展能力”在学历差异显著的重要原因。因此可以推断,学历与数字能力之间的差异并非完全源自教育层级本身,而与教龄分布、岗位状态与技术接受度密切相关。整体而言,学历虽非数字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但其背后所反映出的群体特征在特定维度上具有显著影响,应在教师发展策略中予以充分关注和分类引导。

4.1.3 教龄

将研究对象教龄按照1—5年、6—10年、11—20年和20年以上划分为四个阶段,对不同教龄高校外语教师

在数字能力五个维度上的得分进行方差齐性检验,结果显示 Sig 值均大于 0.05,认为满足方差齐性前提。对各组样本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在“数字技术使用能力”和“数字资源应用能力”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00$),其余维度差异不显著。事后 LSD 检验显示,在“数字技术使用能力”上,1—5 年组得分显著高于 6—10 年、11—20 年及 20 年以上组,6—10 年与 11—20 年组亦显著高于 20 年以上组;在“数字资源应用能力”上,1—5 年、6—10 年与 11—20 年组得分均显著高于 20 年以上组(详见表 4)。

表 4 各维度在教龄上的差异

变量	教龄	平均值	标准差	F	Sig	多重比较
数字技术使用能力	1-5 年	3.98	0.45	37.05	0	1>2、1>3、1>4、2>4、3>4
	6-10 年	3.80	0.41			
	11-20 年	3.79	0.44			
	20 年以上	2.90	0.56			
数字资源应用能力	1-5 年	3.78	0.36	31.04	0	1>4、2>4、3>4
	6-10 年	3.70	0.39			
	11-20 年	3.70	0.35			
促进学生学习能力	1-5 年	3.76	0.39	0.33	0.80	/
	6-10 年	3.74	0.36			
	11-20 年	3.72	0.41			
开展教学评估能力	1-5 年	3.70	0.40	0.61	0.61	/
	6-10 年	3.75	0.43			
	11-20 年	3.79	0.39			
扩展专业持续发展能力	1-5 年	3.70	0.48	1.46	0.23	/
	6-10 年	3.56	0.66			
	11-20 年	3.48	0.67			
	20 年以上	3.60	0.76			

数据结果表明两个特征:第一,教师的基础性数字能力呈现出随着教龄增长先稳定后下降的趋势,尤其在教龄超过 20 年后出现显著滑落,可能与资深教师在数字工具适应、平台更新接受等方面存在障碍有关;第二,技术能力的表现并不与教龄成正比,初任教师虽然缺乏丰富教学经验,但在操作能力与工具熟练度方面优势明显。该结果提示我们,在推动高校教师数字能力提升的过程中,应针对不同教龄群体实施分层培训策略,尤其需加强对高教龄教师的技术适应与平台更新培训,促进其顺利融入教育数字化进程。

4.1.4 职称

将研究对象职称划分为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四个层级,对其在五个数字能力维度上的得分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所有维度均未达到显著性差异 (sig 均 >0.05),但在“开展教学评估能力”维度上 F 值相对较高,接近显著水平 ($\text{sig}=0.087$)。这虽未在统计意义上达到显著,但在实际教学情境中仍具有一定解释力。相较于初任教师,高职称教师往往具备更丰富的教学经验与科研能力,具备较强的课程整合与反思性教学能力,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数字手段优化教学过程。然而,在“扩展专业持续发展能力”与“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等维度上,各职称组表现接近,差异不显,提示职称对部分高阶数字能力的影响有限。综合来看,职称虽对某些基础或结构性能力具备潜在影响,但其作用受限于教师自身学习动力与平台支持环境,需结合其他变量进行系统分析。

表 5 各维度在职称上的差异

变量	职位	平均值	标准差	F	Sig	多重比较
----	----	-----	-----	---	-----	------

数字技术使用能力	助教	3.703	0.543	2.06	0.11	/
	讲师	3.717	0.534			
	副教授	3.789	0.464			
数字资源应用能力	教授	3.971	0.527	1.73	0.16	/
	助教	3.654	0.513			
	讲师	3.580	0.500			
促进学生学习习惯能力	副教授	3.722	0.381	0.71	0.55	/
	教授	3.716	0.407			
	助教	3.684	0.387			
开展教学评估能力	讲师	3.730	0.394	2.21	0.09	/
	副教授	3.760	0.370			
	教授	3.797	0.355			
扩展专业持续发展能力	助教	3.766	0.413	0.47	0.71	/
	讲师	3.693	0.439			
	副教授	3.767	0.352			
	教授	3.912	0.433			
	助教	3.527	0.703			
	讲师	3.618	0.606			
	副教授	3.560	0.617			
	教授	3.487	0.715			

5. 研究结论及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 288 份高校外语教师问卷数据, 构建“基础—进阶—扩展”三层数字能力框架, 从五个维度系统考察了教师数字能力的整体水平与群体差异特征。研究发现, 高校外语教师整体数字能力处于中上水平, 其中以“数字技术使用能力”得分最高, 表明教师在基本操作与教学实践层面已具备良好适应性。这一结果可能受益于疫情期间全面线上教学的锻炼效应以及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持续推动。相比之下, “扩展专业持续发展能力”得分最低, 且个体差异显著, 提示教师在持续专业成长与前沿技术整合方面存在发展不平衡现象。

在影响因素方面, 性别在各维度上的差异均不显著, 说明当前男女教师在数字能力表现上趋于均衡。学历对“数字技术使用能力”和“扩展专业持续发展能力”具有显著影响, 高学历教师表现更优, 而本科组差异显著落后, 追溯发现该群体集中于高教龄、临退休岗位, 存在技术接受度不足等现实障碍。教龄变量则表现出“倒 U 型”结构, 短教龄群体在基础能力维度上显著优于资深教师, 提示高校应重视高教龄教师的技术更新与支持策略。职称变量未形成统计显著性差异, 但在“开展教学评估能力”维度上表现出向高级职称集中的趋势, 反映出其在教学设计与反思能力方面的潜在积累效应。

5.2 建议

首先, 应建立分层分类的数字能力培养机制。考虑到不同学历、教龄、职称教师在能力结构上的差异, 高校可依托教师发展中心、课程教学部等平台, 制定“基础强化—教学融合—研究拓展”三阶段培养路径。对于教龄较长、数字能力相对滞后的教师, 应重点开展数字教学平台操作、资源整合与互动设计等方面的基础技能培训; 对中青年教师则可聚焦于数据驱动教学、AI 辅助设计等进阶模块, 实现从工具掌握向教学创新的转化。其次, 应推动教师数字能力提升与高校考核评价制度深度融合。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以教学为中心, 突出信息化能力导向”的要求, 建议将数字素养纳入教师聘任、职称评审、教学质量评价等环节, 明确数字化教学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 强化“能用、会用、善用”的实践导向。再

次, 教师应加强对国家和地方教育数字化政策的关注, 理解政策背后的技术趋势与教学导向。教师可结合《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培训指南》等政策文件, 明确自身能力建设重点方向, 在数字伦理、数据安全、跨平台适配等方面形成基本认知与操作规范。最后, 教师可通过参加线上教育技术课程、订阅领域资讯、加入专业社群等方式保持技术敏感度, 并借助“师徒结对”或“教学共同体”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与经验互助。尤其在平台迭代、工具升级过程中, 跨代协作有助于缩小技术鸿沟, 提升团队整体适应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OL].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722378.htm>.
- [2]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的通知[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302/t20230214_1044634.html
- [3] 陈坚林. 数智赋能背景下外语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构建研究[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7(01): 7-14.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41101566.
- [4] 肖永贺, 邹玉梅, 冯文勤等. 高校外语教师数字素养能力的评价分析与提升路径研究[J]. 现代教育技术, 2024, 34(10): 83-91.
- [5] 王亚南, 王京华, 韩红梅等. 中国高校英语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现状调查研究[J]. 外语界, 2023(02): 54-61.
- [6] 李小鹏, 李加强. 高校外语教师信息化教学信念现状及人口学变量考察[J]. 长春大学学报, 2025, 35(02): 84-90+104.
- [7] UNESCO. (2018). A Global Framework of Reference on Digital Literacy Skills.
- [8] European Commission. (2022). The Digital Competence Framework 2.2.
- [9] 교육부. (2021). *디지털 기반 미래교육 전환을 위한 추진 전략* [Strategy for transition to digital-based future educ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public of Korea.

An Examination of Digital Abilities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among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an Mingyuan¹, Yang Guoqiang², Dong Xiaoyu²

(¹DongShin University, Naju, Korea; ²Yantai Nanshan University, Yantai,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mprehensive digitalization in education, enhancing the digital capabilitie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at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a key task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questionnaire tool with five dimensions and 36 indicators based on a three-tier capability framework, surveying 288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using SPSS 27.0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s, and one-way varianc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have average to upper digital abilities, strong foundational skills, and relatively weak scalability. Gender differences are not significant, but there are notable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particularly among teachers with over 20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who are clearly lacking in multiple dimensions. Although the titles do not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ere are certain trend-based differences in assessment capabilities. The study further clarifies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s' digital abilities, reveals the impact pathway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proposes targete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rom both school support mechanisms and teacher autonomous development,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at universities; digital capability; demographic variabl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以科学思维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杨耀焱

(山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西太原 030012)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党和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当前,我国已建立起覆盖全国的思政教育体系并取得显著成果,但仍存在教育形式枯燥单一、教学内容理论性过强导致学生难以吸收,以及缺乏实践教学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包括思维方式的表面化、对教学活动多面性认识不足,以及对理论本质理解不够深入。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转换思维模式,采用“为什么-如何做-做什么”的黄金思维圈定式,抓住问题本质;辩证均衡地看待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关系,将二者生动结合;提高教育者专业能力,转变授课方法,深入讲解理论背景和本质,构建完备的理论体系。在科学思维的指导下,我国的思政教育工作将不断完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合格人才。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科学思维; 理论与实践结合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93

一、引言

近年,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的持续推进,防止返贫致贫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民生工程不断丰富,我国已经实现并巩固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努力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我国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党和国家也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怎样更加科学有效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适应党和国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要求就成为了目前亟需讨论的课题。本文将着重探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特别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

二、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我国意识形态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学校则是推进意识形态工作最主要的斗争阵地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加大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投入,到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覆盖全国,涵盖各个学段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成果十分显著。但我国的思政教育工作仍然不可避免的存在许多问题。

(一) 教育形式较为枯燥单一

早在 2018 年就有相关研究指出,我国思政教师教学方式单一,使学生在课堂中处于被动的地位。^[1]我国目前的思政教育主要在各中小学和高等院校中开展,其形式也主要以教师课堂讲授+PPT 展示的形式为主,形式较为单一其效果也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个性差别的影响,有些时候可能无法发挥很好的效果。甚至许多思政课堂上存在着教师直接念教材或者文件,不做任何讲解,敷衍了事,让学生自行背诵教材内容的现象,这种不负责任的现象对我国思政教育的开展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作者简介: 杨耀焱(2004-),本科在读,男,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通讯作者: 杨耀焱

（二）教学内容理论性过强，学生难以吸收

思想政治教育是建立在充分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上的。因为其这一特性，使得教学内容理论性较强，很多学生对相关理论原理接触过少，导致学生们很难能够真正理解和吸收所学内容。一份关于湖北省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实践教育的调查数据就显示大学生中喜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只有9%。^[2]在教学中，我们通常只注重将教科书上所呈现的理论快速的灌输给学生们，以达到应对考试的作用，并没有让学生们真正理解理论的内在逻辑和本质。这种方法也使得我们思政课的效果没有达到最初的预期。

（三）缺乏实践教学，学生无法真正理解所学内容

列宁在他的文章《青年团的任务》当中有如下一段论述：“如果说，学习共产主义只限于领会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我们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而这往往会使我们受到损害，因为这种人虽然把共产主义书本和小册子上的东西读得烂熟，却不善于把所有这些知识融会贯通，也不会按共产主义的真正要求去行动。”^[3]我国的思政教育长期处于只重视理论学习而忽视理论在社会实践中的实际运用的状态，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纸面之上，无法将理论真正运用进日常的生活和实践当中，理论知识无法真正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产生联系。无法被运用的理论实际上就变成了毫无生气的“死的”理论。在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就无法真正使理论深入人心，进而造福社会。

三、造成目前状况的主要原因

（一）思维方式的表面化

我国开展思政教育思维方式采取常见的“做什么-如何做-为什么”的思维定式，由要开展思政教育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探讨开展思政教育的原因和方法。这种思维方式很容易使我们在开展思政教育工作时，只求结果而忽视开展工作的方法和根本追求。这种思维方式在具体教学活动中就体现为很多思政课教师在教学中只重视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而不重视对教学方法以及对思政教学活动的本质的研究。而这种思维方式也就必定导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一样：“如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照本宣科、应付差事，那到课率、抬头率势必大打折扣。”^[4]

（二）对教学活动的多面性缺乏足够认识

教学活动使理论教育和实践教学等多方面教育的结合，思政课作为一门至关重要的课程则更是如此。但受制于我国多年来由应试教育等所必然导致的问题和受其影响所产生的社会整体认知，理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上升到了高于实践教育的地位上。而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我们的思政课教师也没有能够辩证均衡的看待理论教育和实践教学的作用，这也使得思政教育无法发挥出应试以外的真正的思想和政治教育的作用。这就使思政教育产生了，形式单一，脱离实际，死板僵化等一系列问题，阻碍了思政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对理论本质理解不足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从根本上说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它的根本任务则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人民群众，不断提高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5]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6]可以说，只有正确理解和掌握了理论的人才能运用理论去说服人。而思政教育正是一种说服人的工作。但在现实中，一部分思政课教师并没有完全理解和掌握理论的内容和本质，对于理论的讲授仅仅停留在对教科书的机械复述上，无法向学生们讲清理论诞生的背景和运作的机理，更没有能力指导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也是导致我国思政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 转换思维模式, 抓住问题本质

前文曾提到, 目前开展思政教育的主要思维模式是“做什么-如何做-为什么”的定式。然而, 这种思维定式是从表面出发, 以表象为开端思考问题的一种思维模式, 很容易在过程中忽略或掩盖住问题的本质, 以至于无法达成最初的目的。我们不妨转变一下思维模式, 采用“为什么-如何做-做什么”的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也被称为“黄金思维圈”。在开展思政工作或进行教学活动之前, 我们首先应该质问自己“为什么”, 也就是去思考开展思政工作的本质是什么。只有了解问题的本质才能使我们工作的开展不受各种表象的迷惑, 从而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做和做什么的问题。我们要明确, 思政教育的开展是为了提高包括学生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 让他们能够理解和吸收所学到的理论, 并将理论运用在日常生活实践当中。只有完全明确“为什么”, 我们才能真正高效高质量的开展思政教育工作。

(二) 辩证均衡的看待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关系

我国思政教育工作目前出现了重理论教育而缺乏实践教育的状况。正如前文所说, 这是受到了包括应试教育体制在内的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 作为思政教育第一线工作者的思政课教育工作者不能放任这种倾向继续发展, 更不能主动接受这种片面、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式的教育方法, 这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应该采取辩证均衡的态度去开展工作, 应始终坚持“全面观、辩证析、促转化、达均衡”的工作方法, 用全面、联系、发展的教育方法区均衡开展理论与实践教育, 将理论与实践生动的结合起来。没有理论与实践的均衡开展的思政教育, 就只能是一潭死水, 无法发挥强大的作用。可以说, 只有辩证均衡的思政教育, 才是真正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也只有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 才能真正展现出思政课堂的魅力。

(三) 提高专业能力, 转变授课方法

教育者自身专业知识水平的有限和授课本领的生疏也是造成目前现状的一大要因, 针对这一问题, 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教育者自身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 加深对理论内容的理解, 特别是要参透理论所要表达的本质内容是什么, 形成一套完备的理论逻辑体系, 并能够拥有强大的授课本领和通俗易懂的言语体系去引导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去学习和理解理论的内容及本质, 真正让思政教育深入人心, 使思政教育深入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此同时, 应该转变授课方法, 改变以往以复述教科书内容为主要方式的授课方法, 重点讲解理论产生的背景和理论的本质, 使被教育者在逻辑上明确理论的形成过程、发展脉络、社会基础、最终目标等, 真正建构起完备的理论体系, 培养起他们自身的理论逻辑, 而不是流于表面, 沦为应付考试的背诵材料。

五、结语

面对目前思政工作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 我们只有采用更加科学的思维才能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我们也应采取科学的思维方式去分析并给出解决方案。只有真正运用科学的思维去发现问题, 阐明背后的原因机理, 并提出科学方法去解决问题, 才能使思政教育长期、有效、可持续的发挥作用。笔者相信, 在科学思维的指导下, 我国的思政教育工作将不断的发展完善, 我们的思政教育工作者将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蓝图培养出一大批政治立场坚定, 专业技能过硬, 思维理性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 [1]李伟.高校思政教育探究[J].西部素质教育,2018,v.4(17):41.
[2]张颖.湖北省大中小学生思政一体化实践教育的现状调查及分析[J].秦智,2024,No.33(03):191-193.
[3]列宁.列宁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2012.
[4]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奋斗,2020,No.621(17):4-16.
[5]郑永廷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2.

Advanc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with Scientific Thinking

Yang Yaoyan

(School of Marxism,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s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historical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have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Currently, China has established 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covering the entire country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issues such as monotonous educational forms, overly theoretical content that is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absorb, and a lack of practical education. The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include superficial thinking patterns,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a lack of in-depth comprehension of the essence of theori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t is necessary to shift thinking patterns and adopt the "Why-How-What" golden thinking circle approach to grasp the essence of problems. Additionally, a balanced and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adopted, vividly combining the two. Furthermore, educators should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transform their teaching methods, delve into explaining the background and essence of theories, and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Guided by scientific thinking, China'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cultivating qualified talents for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cientific thinking;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基于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双师课堂实践模式构建

——以小学语文精读课为例

傅欣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推进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赋能小学语文双师课堂实践, 是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有力抓手, 也是落实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重要举措。为解决城乡师资不均衡、小学语文教学形式单一、双师协作缺乏流程指导等问题, 研究以小学语文精读课为场景, 综合运用文献资料与专家工作室实践材料, 构建双师课堂实践模式。该模式以“粗读感知—精读感悟—品读体悟—内化运用”四阶教学程序为框架, 明确了双师在各环节的职责与协同方式, 为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深度融入学科教学提供了可操作范例、为提升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质量、拓展教育信息化应用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双师课堂; 小学语文; 精读课; 实践模式

基金项目: 基于测评的高校教师数字胜任力分层培养模式研究 (JXJG-23-2-54)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91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 2024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进一步强调应加强国家平台建设, 积极促进资源共建共享, 持续深化数字教育合作与创新。《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亦明确要求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 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我国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以下简称“国家平台”“平台”)不仅为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注入了新的动力, 也是推动这一转型的重要抓手和基础支撑^[1]。

双师课堂作为国家平台典型应用模式, 依托“国家平台教师+课堂授课教师”协同教学, 可有效缓解部分地区师资薄弱、国家课程开不足、开不齐、开不好等问题, 对促进教育公平具有重要作用^[2]。尽管现有研究已关注到平台在双师课堂中的应用价值, 但针对小学语文阅读课的研究仍显不足, 尚未形成适配性强的实践模式。在授课过程中, 线上与线下教师间的协作也缺乏明确的规范和流程指导^[3], 影响双师课堂教学效果。鉴于此, 本研究以小学语文精读课为具体场景, 构建基于国家平台的双师课堂实践模式。这既是推动平台深度融入学科教学的必然要求, 也是提升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质量、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探索。

一、国家平台概述与双师课堂应用

平台资源丰富、功能强大、实用性强、操作简单且资源免费^[4], 涵盖了德育、课程教学、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课后服务、特殊教育、教师研修、家庭教育、教改经验、教材、人工智能教育和地方频道十三个资源板块, 支持自主学习、教师备课、教师授课、双师课堂、作业活动、答疑辅导、课后服务、教师研修、家校互动和协同管理十大应用场景, 广泛地适用于基础教育的全领域、各学段。

双师课堂是由课堂授课教师与国家平台教师协作配合, 共同完成教学活动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具体而言, 国家平台教师主要负责教学内容的讲解, 课堂教师则负责组织学生学习、个别答疑与辅导, 维持课堂纪律等^[5]。作为应用最广泛且成效最显著的模式之一, 双师课堂受到了各地的高度重视与广泛应用, 但在乡村学校中可能存在使用不充分的情况^[6]。这种融合线上线下教学优势的新型模式,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应用价值, 乡村教师要通过切实的教学实践推动平台与课堂教学的融合^[7]。

作者简介: 傅欣(1999—), 女, 江西省吉安市, 研究方向为小学语文教学、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研究。

通讯作者: 傅欣

二、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赋能双师课堂的核心价值

(一) 资源供给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作为教育资源供给的“国家队”，其资源的制作通常由学科专家和一线优秀教师参与，并经过专业团队的精心挑选和严格审核，呈现出专业化、精品化、体系化的特征^[8]。平台教学资源不仅优质，还公开易得、数据庞大，从学段来看，小学阶段资源数量最多，从学科来看，数学和英语的资源数量最多，其次是语文^[9]。其中，小学语文涵盖了拼音、识字、阅读、写作等资源，以阅读为例，有经典课文的讲解视频，内容涉及课文的深度剖析、写作背景的介绍以及阅读技巧的传授等。

教师在首页“课程教学”板块，选择“教师备课授课”，然后依次选择相应的学段、学科、版本、年级、册次，最后在教材目录中选择课题，就能获取相应的视频课程、课件、教学设计、学习任务单、课后练习等，可直接在原课件上添加、删减、修改或切片化处理视频等，再将其保存至“我的资源库”。教师还可直接在首页输入课文题目，快速检索到各名师、名校长工作室的相关教学视频、课件、教案等。资源的丰富性为教师提供了多样化的教学选择，有助于教师更高效地开展教学活动。

(二) 技术支撑

教师授课时，可直接从“我的资源库”中调用课件，并配合使用画笔、魔术笔、橡皮擦等课堂教学工具，更有效地组织和展示教学内容；也可利用白板、模板和加页等辅助教学工具，进一步为教师的内容展示提供便利；还可借助放大镜、计时器、聚光灯、课堂评价、随机点名、随机组队等课堂互动工具，显著提升课堂活跃度与学生参与感；此外，国家平台还提供生字卡、生词卡、人物卡、修辞手法卡、朗读工具等学科工具，以支持特定的教学活动。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通过提问、群聊等功能将疑问发送至师生群中，教师可通过群聊集中解答共性疑问，也可对个体问题进行针对性辅导，学生间亦可互助答疑。对于学生提交的学习活动成果，教师也能在线批改。学习活动结束后，系统会对学习活动整体情况及个人表现进行统计分析，并给出数据统计报告供教师查阅参考。

(三) 个性化教学

平台资源可以根据双师课堂的具体教学需求进行个性化组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目标、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能力水平，挑选不同的资源片段进行拼接。例如，在进行单元复习时，教师可以从平台上选择该单元重点生字的讲解视频、课文重点段落的分析视频以及相关的练习题讲解视频，将这些资源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复习课程，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复习需求。

对于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教师也可以通过资源组合来实现分层教学。对于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可以选择一些拓展性的阅读资源和具有挑战性的写作任务资源；对于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则侧重于基础字词巩固和简单阅读理解的资源组合。例如，在阅读教学中，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古代文言文阅读材料和解读视频，为基础薄弱的学生提供简单易懂的现代童话阅读资源。

三、双师课堂实践模式构建

综合运用文献资料与国家平台专家工作室实践材料，系统挖掘理论依据与实践智慧。以粗读课文，整体感知；精读课文，深入感悟；研读品读，深层体悟；熟读成诵，尝试运用的精读课四阶教学程序为框架^[10]，依托国家平台构建小学语文双师课堂实践模式，见图1。

(一) 课前准备

教师在深入研读教材基础上，系统梳理国家平台上各类资源，明确其内容特点与呈现形式，进而依据平台资源与学生实际情况，对原有教学目标、重难点、方法及活动等进行适应性调整与优化。具体而言，可将某一教学视频对特定知识的出色讲解，合理纳入教学环节并调整教学时间与讲解方式；同时，预设难点、疑点，做好课堂答疑、课后辅导的准备；此外，还可巧用平台学习任务单和课后练习助力课堂教学²。

(二) 课中授课

1. 粗读感知

²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双师课堂可依托国家平台构建“线上资源赋能+线下互动引导”的协同引导模式。国家平台教师制作与课文主题相关的生动短视频、动画故事或启发性问题，快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其自然进入课文情境。初读课文时，国家平台教师可设计字词认读、理解、书写等闯关小游戏，在游戏过程中分享拆词解字、结合上下文、分析字形等学习技巧并做出书写提示，课堂教师则利用生字卡、生词卡等学科工具进行补充讲解，通过小组认读接龙落实读准、读顺要求，帮助学生扫清字词障碍。再读课文时，课堂教师结合国家平台教师提供的表格、人物关系图、情节填空式文字等结构化工具，引导学生自主梳理文章主要内容，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课文脉络。同时，鼓励学生提问质疑，为后续精读埋下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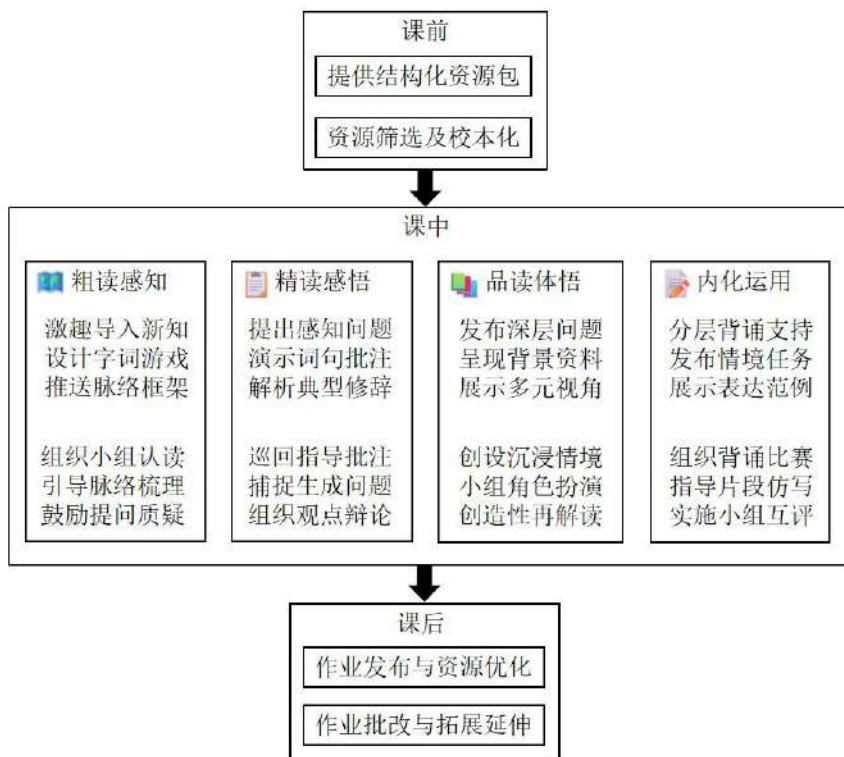


图 1 小学语文精读课双师课堂教学流程

2. 精读感悟

双师课堂可依托国家平台构建“线上精准点拨+线下深度互动”的互动深化模式。国家平台教师聚焦课文重点部分，依据文本核心矛盾提出关键性问题，启发学生围绕问题思考与讨论，并结合文中关键词句、重点段落进行深层解析，如通过对比阅读素材呈现修辞手法的表达效果，助力学生把握文本内涵。课堂教师则引导学生围绕国家平台教师提出的关键问题及课堂生成性问题，开展文本细读与批注实践，帮助学生深入感悟语言韵味。课堂教师在巡回指导下，需及时纠正学生理解的偏差，敏锐捕捉并组织研讨学生的奇思妙想。针对开放性问题，也可调用平台的随机组队工具，组织学生进行观点辩论，在思维碰撞中深化对文本的多元理解。

3. 品读体悟

双师课堂可依托国家平台构建“线上引航启思+线下沉浸体悟”的深度融合模式。国家平台教师围绕课文深层意蕴发布探究性问题，同时推送相关文化背景资料和多元解读视角，为学生体悟文本情感提供资源支撑。课堂教师则依托平台创设沉浸式情境，通过多样化的阅读形式，组织学生反复阅读某一重点段落，通过品味其中关键字词、语句，体悟事中之理、事中之情、景中之情、情中深情，并引导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小组圆桌讨论、小组角色扮演等，深入体悟课文主旨、人物情感，以支持学生对文本的创造性解读。

4. 内化运用

双师课堂可依托国家平台构建“线上支架引领+线下实践内化”的实践转化模式。国家平台教师依据学段提供分层背诵支持，如低年级呈现关键语句填空式提示，中高年级则给出核心意象线索，引导学生在反复阅读中达

成熟读成诵, 夯实语言积累。课堂教师则借助平台随机点名工具组织背诵擂台赛, 激发学生积极性, 同时通过计时器把控活动节奏。在语言运用环节, 国家平台教师结合课文内容发布情境任务, 同步提供优秀范例以供参考, 助力学生将文本语言内化为自身表达能力。课堂教师则组织学生开展书面仿写实践, 也可根据教学需要, 辅以生活化口语分享, 并引导学生互评, 促进相互学习。

(三) 课后巩固

教师可直接从平台课后练习及基础性作业中筛选内容, 设计与布置分层作业, 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学习需求, 国家平台会实时反馈学生答题数据, 教师基于答题情况再利用国家平台上的视频资源让学生巩固知识点, 或借助“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家庭教育”“课后服务”等栏目资源, 拓展延伸学生的课程教学^[11]。

四、落实双师课堂的建议

(一) 了解学情与技术准备

教师需依据以往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与学生的日常交流等方式, 全面了解每个学生的语文学习基础、学习习惯、兴趣爱好及学习能力等, 以便在双师课堂中更好地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学校需加大教师数字技能培训力度, 定期开展基于平台的数字化教学培训和学科研讨会, 及时宣传和推广平台最新功能模块并答疑解惑, 增强教师数字教学认同^[12]。对于国家平台的基本操作, 可结合线上微课与一对一实操指导, 确保每位教师能独立完成常规教学流程。

(二) 秩序维持与指导互动

教师要注意维持课堂秩序, 对注意力分散的学生及时以眼神示意或轻声提醒, 灵活处理突发情况, 为学生营造安静专注的学习氛围。当学生在理解知识点或参与互动遇到困难时, 教师适时暂停教学节奏, 借助平台工具对关键知识点进行圈画、批注, 强化学生理解^[13], 实现平台教师精品资源突破重难点, 课堂教师现场拓展讲练^[14]。同时, 要着力激活课堂互动生态, 组织好的小组讨论与合作学习, 引导学生在思维碰撞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

(三) 资源适配与双师协同

国家平台提供的教学资源能够进行“块状应用”或“切片处理再应用”^[15], 教师筛选资源需注重与教学内容的适配性, 既要避免简单堆砌资源导致教学节奏混乱, 也需通过校本化加工让平台资源与课堂实际需求深度契合, 真正服务于教学重难点的突破。针对新手教师及乡村学校的实际需求, 国家平台教师可承担资源供给、难点解析、示范引领的核心角色, 课堂教师需聚焦课堂组织、活动引导、个性辅导的关键职责, 由此形成线上专业引领与线下落地实施的科学分工模式, 实现双师优势互补与教学效能的协同提升。

参考文献

- [1] 柯清超, 刘丽丽, 鲍婷婷, 等.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赋能区域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四重机制[J]. 中国电化教育, 2023, (03): 30-36.
- [2] 曾媛, 黄志南, 薛瑾, 等.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应用情况、典型模式与赋能策略[J]. 中国电化教育, 2023, (11): 98-104.
- [3] 钟伊娜, 钟志勇. 交互影响距离理论下的“双师课堂”互动效果及对策分析——基于迪庆 D 中学的个案研究[J]. 学术探索, 2020, (12): 138-145.
- [4] 李岩. 用好智慧教育两级平台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J]. 中国基础教育, 2024, (08): 44-47.
- [5] 黄继良. 用好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促进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J]. 中国民族教育, 2024, (05): 39-41.
- [6] 贺玮, 颜京莉, 刘桓秀, 等. 数字转型视野下乡村教师对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持续使用意愿研究[J]. 现代教育技术, 2024, 34(08): 59-68.
- [7] 郭炯, 付瑞. 乡村教师应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影响因素研究[J]. 现代远程教育教育, 2023, (06): 33-42.
- [8] 柯清超, 马秀芳, 邓博扬.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助力学校构建数字教育新生态[J]. 人民教育, 2024, (05): 57-60.
- [9] 顾小清, 王欣苗, 李世瑾. 数字教育资源发展水平如何? ——基于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资源的证据回应[J]. 远程教育杂志, 2024, 42(01): 61-73.

- [10] 廖哲勋.关于小学阅读教学新模式的探讨[J].课程.教材.教法,2004,(02):45-53.
- [11] 高方银.技术赋能双师课堂教学三部曲——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助力乡村学生“上好学”[J].中小学数字化教学,2023,(10):87-91.
- [12] 段雨迪,张雅君,周琼,等.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应用及其优化研究[J].教学与管理,2025,(18):24-29.
- [13] 郝红喜.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助力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以河北省沙河市为例[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22,(19):10-13.
- [14] 郭绍青.聚焦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在教育中的稳定应用模式[J].人民教育,2024,(05):53-56.
- [15] 王娟,周琼,段雨迪,等.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应用:现状调研与提升策略——基于全国4272位教师的调查数据[J].中国电化教育,2024,(07):74-82+108.

Building a Practical Model for Dual-teacher Classroom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Based on the 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Fu Xi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to the practice of dual-teacher classrooms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is a powerful approach to building a high-quality and balanced basic public education service system and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implementing the digitalization strategy in education. To address issues such as the imbalance of teaching resour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monotonous teaching forms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and the lack of process guidance for dual-teacher collaboration, this study takes primary school Chinese reading comprehension classes as the scenario and integrates literature and practical materials from expert studios to construct a dual-teacher classroom practice model. This model is structured around a four-stage teaching process: "coarse reading for perception - detailed reading for comprehension - refined reading for appreciation - internalization and application", clearly defin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collaborative methods of dual teachers in each stage. It provides an operational example for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he 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into subject teaching, and offers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and expanding the application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Keywords: 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Dual-Teacher Classroom; Primary School Chinese; Reading Comprehension Class; Practice Model

提升宿舍安全保障大学生就业：新质生产力的挑战与机遇

葛蕴仪^{1*} 庞鑫鑫¹

(1.南通理工学院, 江苏 南通 226600)

摘要: 在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 大学生就业面临着诸多挑战与机遇。宿舍安全作为大学生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其心理健康、学习效率及就业能力均有显著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新质生产力对大学生就业的具体影响, 探讨了宿舍安全与大学生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 高校应加强宿舍安全制度建设, 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和隐患排查, 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 探讨了在新形势下, 如何通过宿舍安全保障来增强大学生的职业素养与创新能力, 从而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宿舍安全在大学生就业保障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值得高校予以高度重视。

关键词: 宿舍安全; 大学生就业; 新质生产力; 心理安全感; 职业素养提升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辅导员就业指导策略研究(2024SJSZ0746)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704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逐渐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 也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1]。因此, 提升宿舍安全保障不仅是改善大学生生活环境的必要措施^[2], 更是确保他们顺利进入职场的重要环节。

目前有关宿舍安全和大学生就业方面的文献研究比较多^[3-4], 但主要侧重于宿舍管理和就业指导的研究, 针对宿舍安全对大学生就业影响的研究相对匮乏。本研究旨在探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 宿舍安全对大学生就业的保障作用。调查当前大学生在宿舍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 以及这些问题如何影响他们的心理安全感和就业竞争力。通过深入研究宿舍安全与大学生就业之间的关系, 明确宿舍环境对职业素养的促进作用。提出改进宿舍安全管理的对策, 以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心理适应能力, 从而为高校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提供科学的管理建议,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5]。通过这一系列研究, 期望为实现提升宿舍安全保障大学生就业的目标贡献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使高校能够更好地应对新时代的发展需求, 进而推动社会各界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重视与关注。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多个维度拓展对宿舍安全与大学生就业关系的深入探讨^[6]。结合心理学、教育学与管理学, 为宿舍安全的提升提供多元化的思维与解决方案。结合新质生产力的变化, 研究其对宿舍安全管理模式的影响, 探索如何通过科技手段提升宿舍安全保障, 为大学生创造更具安全感的学习与生活环境。这些研究将为实现高校宿舍安全与大学生就业的双重保障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二、宿舍安全的现状分析

2.1 当前宿舍安全问题

随着高校招生人数的增加, 宿舍已成为大学生生活的重要场所。宿舍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 成为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和学习生活的重要因素。宿舍管理制度不完善, 例如, 门禁管理松散, 外来人员随意进出, 易导致不法分子进入宿舍区域, 对学生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宿舍内火灾隐患较多, 电线老化、私拉乱接电缆现象普遍存在, 加之学生在宿舍内使用大功率电器, 极易引发火灾事故。此外, 宿舍环境脏乱差, 存在卫生死角, 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 影响学生的身体健康。再者, 宿舍安全设施的缺乏或功能失效, 如灭火器的未配备或过期等, 也是一大隐患。学生的安全意识薄弱, 部分学生对安全教育和自我防范重视不足, 未能积极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综上所述, 当前高校宿舍安全问题亟待解决, 以保障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安全和健康。

作者简介: 葛蕴仪(1996—), 女,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思政教育;

庞鑫鑫(1996—),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思政教育;

通讯作者: 葛蕴仪

2.2 宿舍安全对大学生的影响

宿舍安全是大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身心健康和学习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安全的宿舍环境能够有效减少意外事件的发生,降低学生在生活中面临的安全风险,给学生提供一个安心、稳定的栖身之所。良好的宿舍安全条件能增强大学生的心理安全感,使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更加专注,释放心理压力,从而提升学习效率。

宿舍安全直接影响大学生的社交活动与情感支持。一个安全和谐的宿舍环境能够促进同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营造互相支持的氛围,进而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沟通能力。此外,宿舍安全管理的良好运作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宿舍安全问题的忽视可能导致学生的心理问题,如焦虑和抑郁等,从而影响其学业和就业。因此,高校应重视宿舍安全,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提升学生的安全感,以支持其健康成长和顺利就业^[7]

2.3 宿舍安全管理现状

当前,高校宿舍安全管理面临诸多挑战,整体管理水平有待提升。大部分高校的宿舍安全管理系统尚不完善,存在管理盲区。宿舍安全设施建设不足,如缺乏有效的监控设备和应急疏散通道,导致在突发事件中无法快速反应。另外,宿舍安全管理责任落实不力,许多高校未能形成清晰的责任分配体系,相关职能部门在管理过程中缺乏协作,造成了安全隐患难以及时排查和整改。

学生的安全意识普遍较低,部分学生对宿舍内外的安全隐患缺乏足够的关注,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因此,高校在宿舍安全管理中应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此外,宿舍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责任心也需进一步提升,确保日常管理工作的落实。通过强化宿舍安全管理,整合资源与责任,可以有效提升宿舍的安全环境,为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更有保障的条件。

三、宿舍安全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

3.1 宿舍安全对就业竞争力的影响

宿舍安全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从而间接影响其就业竞争力。安全的宿舍环境能够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氛围,减少因安全隐患带来的心理压力,提高学习效果。研究表明,心理状态良好的学生在面试和职场竞争中更具自信,展现出更强的职业素养和能力。宿舍安全保障措施的完善,能提高学生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和沟通能力,进而提升其就业综合素质。此外,良好的宿舍安全管理还能够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团队协作精神,这些都是企业在招募人才时非常看重的素质。因此,宿舍安全不仅是学生个人生活的重要保障,也是影响其就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应更加重视宿舍安全管理,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以培育出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3.2 心理安全感与就业能力

在当今社会,心理安全感对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发挥着重要作用。心理安全感是个体在环境中感受到的安全与稳定的心理状态,影响着其自信心、抗压能力和创新思维。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面对激烈的竞争和复杂的就业形势,心理安全感能够帮助他们保持积极的心态,从而更好地应对挑战。相反,缺乏心理安全感的学生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这会直接阻碍就业能力的提升。

心理安全感的提升与宿舍安全密切相关。良好的宿舍环境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和安全感,降低心理压力。高质量的宿舍管理和人际关系能够为学生创造一个和谐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的职业技能,提升自我效能感。因此,重视宿舍安全不仅是保障学生身心健康的必要措施,也为他们的就业能力提升提供了积极的支持。在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教育机构应将心理安全感培养作为重点,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职场,提高就业竞争力。

3.3 宿舍环境对职业素养的促进

宿舍环境对于大学生的职业素养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良好的宿舍环境能够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促进学生之间的沟通与合作。这种互动不仅让学生在生活学习中学习到团队合作的精神,还能帮助他们在未来的职场中有效地与他人协作,提升其职业素养。宿舍的安全与舒适性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心理状态。当学生感到安全和放松时,他们更能专注于学习与自我提升,而不是因宿舍环境的不安而分心。这种心理状态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培养自我管理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宿舍环境中的文化氛围,比如学习交流活动的开展和文化活动的参与,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促进其职业素养的进一步提升。因此,高校在宿舍管理中应重视环境的营造,通过优化宿舍条件和促进各类活动,助力学生在职业素养方面的全面发展。

四、宿舍安全保障对大学生就业的积极影响

4.1 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宿舍安全对于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提升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安全的宿舍环境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增强了他们的学习效率和自我管理能力。这种环境不仅减少了心理压力和焦虑感,还促进了学生对未来职业的积极思考和规划。在宿舍内,学生能够通过互相交流、分享学习经验和职业规划,提

升其人际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宿舍安全管理的完善也使得学生更容易参与校园各类活动, 锻炼组织、管理和领导等综合能力, 这些都是就业市场上所需的重要技能。宿舍安全确保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专注度, 让他们可以更好地参与实习和课外活动, 从而积累实际工作经验。宿舍提供的心理安全感, 帮助学生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 增强了他们对自身能力的信心, 进而提升了求职竞争力。因此, 保障宿舍安全, 是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重要保障。

4.2 促进职业素养提升

宿舍安全的保障在促进大学生职业素养提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良好的宿舍安全环境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稳定和舒适的居住条件, 使他们能够更专注于学业和职业技能的培养。安全的宿舍环境能够减少学生在住宿期间的焦虑感, 增强他们的心理安全感, 这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应对学习和就业中的压力。宿舍的集体生活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社交平台, 促进了人际交往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的提升, 这些都是职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 宿舍管理制度的完善和安全教育的推行, 使得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遵守规则意识, 从而为他们进入职场打下良好基础。综上所述, 重视宿舍安全不仅能维护学生的基本权益, 还能积极推动学生职业素养的全面提升, 为未来的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4.3 增强心理安全感

在大学期间, 心理安全感是影响学生求职心态和就业能力的重要因素。宿舍安全的保障能够有效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安全感, 使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保持稳定的情绪和积极的心态。良好的宿舍环境不仅提供了身体上的安全感, 还能营造出一种温馨、和谐的氛围, 减少学生由于住宿环境所带来的焦虑和不安, 从而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和抗压能力。

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 面临着竞争激烈和不确定性的挑战。如果他们的宿舍安全得不到保障, 容易导致情绪波动, 影响其面试表现和职业选择。因此, 高校应重视宿舍安全的建设和管理, 通过完善设施、加强巡查和开展安全教育, 使学生在心理上感受到安全与支持^[8]。这种安全感能够促进学生的自我价值认同, 增强其对未来的期待与信心, 为其顺利就业提供坚实的心理基础。总之, 宿舍安全不仅关乎学生的身体健康, 更是其心理安全感的源泉, 从而在就业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五、高校宿舍安全管理的挑战与对策

5.1 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当前新质生产力背景下, 高校宿舍安全管理面临诸多挑战。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使得宿舍空间相对紧张, 管理难度随之加大, 安全隐患增多, 诸如火灾、盗窃等事件时有发生。技术手段不足, 许多高校的宿舍安全管理仍依赖传统模式, 缺乏智能化监控和预警系统, 导致对潜在风险的反应能力较弱。此外, 部分高校的宿舍安全管理政策不够健全, 缺乏明确的责任划分与制度落实, 导致安全管理工作流于形式, 难以形成有效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 学生的安全意识普遍不高, 部分同学对宿舍安全问题过于轻视, 缺乏自我防范能力, 增加了安全事故发生的风险。宿舍安全管理的经费投入不足, 限制了相关设施和技术的更新与维护。因此, 面对这些挑战, 高校必须积极探索有效的解决方案, 提升宿舍安全管理水平, 以保障大学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推动学生健康成长。

5.2 改进宿舍安全管理的对策

为了有效提升高校宿舍安全管理水平, 必须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对策。建立健全宿舍安全管理制度。高校应制定详细的宿舍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明确管理职责, 定期组织安全检查, 确保宿舍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加强宿舍安全设施的建设与维护。高校需要投资更新宿舍设施, 如安装监控系统、门禁系统以及完善的消防安全设施, 以增强宿舍安全防范能力。此外, 定期开展安全教育与应急演练, 提升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通过举办安全知识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 提高学生对宿舍安全的重视。与此构建宿舍安全管理的多方合作机制, 鼓励学生参与宿舍管理, 通过建立宿舍自治委员会, 促进学生自主维护宿舍安全。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如智能化管理系统, 来实时监测宿舍安全动态, 及时发现和处理潜在安全隐患。通过以上措施的综合实施, 可以有效改善宿舍安全管理, 提高大学生的安全感, 为他们的就业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

5.3 加强安全教育与心理辅导

在提升宿舍安全管理的过程中, 加强安全教育与心理辅导至关重要。高校应定期开展宿舍安全教育活动, 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 使学生了解宿舍安全的基本知识和注意事项, 如消防安全、用电安全等。通过开展安全演练和知识竞赛等形式, 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增强其对安全问题的关注。

心理辅导在宿舍安全管理中同样不可或缺。大学生正处于心理发展的关键期, 面临学业压力、就业压力等挑战, 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因此, 高校应设置专门的心理咨询机制, 为学生提供心理支持和疏导, 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9]。定期举办心理健康讲座和团体辅导活动, 可以提升学生的情绪管理能力和应对压力的技巧。

通过安全教育与心理辅导的结合, 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宿舍安全意识, 还能增强其心理素质, 从而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为今后的就业提供良好的基础^[10]。

六、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宿舍安全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研究表明,宿舍安全环境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心理安全感,进而有效提高其就业竞争力,促进其专注于学业和职业发展,提高综合素质与职业素养。针对当前宿舍安全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宿舍安全管理的对策,强调了心理辅导与安全教育的重要性。这些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宿舍安全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大学生的就业保障提供良好的环境。宿舍安全的提升不仅是高校管理的要求,更是促进大学生顺利就业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 [1]杨迪瑞,袁庆庆.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J].教育教学论坛,2024,(47):185-188.
- [2]周立,朱加俊,何苏扬.大数据背景下的高校宿舍安全管理政治策略研究[J].高校后勤研究,2024,(10):18-21.
- [3]李宏.以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J].北京观察,2024,(10):52-53.
- [4]张宾,赵常杰.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我国新兴行业从业青年的就业质量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4,(10):12-20.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4.0117.
- [5]赵曜,孙宁华.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创新型大学建设[J].中国高校科技,2024,(09):31-35.DOI:10.16209/j.cnki.cust.2024.09.003.
- [6]王静,刘爽.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数字赋能高校精准思政的探索与实践[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5(05):11-20.
- [7]高乔楠.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探析[J].合肥大学学报,2024,41(04):134-138.
- [8]韦曙和.高校后勤新质生产力培育[J].高校后勤研究,2024,(08):1-5+8.
- [9]赵晓妍.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构建策略[J].公关世界,2024,(18):85-87.
- [10]罗渊俊,张轩宇.新时代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新路径研究[J].中国军转民,2024,(08):96-97.

Enhancing Dormitory Safety to Secure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Yunyi Ge^{1*}, Xinxin Pang¹

¹Nant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angsu, Nantong 226600,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llege students face numerou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ir employment. A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college students' living environment, dormitory safety exert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mental health,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employability. By analyzing the specific impacts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rmitory safety and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ormitory safety systems, conduct regular safety education and hidden danger inspections, and enhance students' safety awareness and self-protection capabilities. Meanwhile, it discusses how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professional literacy and innovative abilities through dormitory safety guarante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reby enhancing their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Dormitory safety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ensuring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and deserves high attention fro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words: Dormitory Safety;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sychological Sense of Security; Improvement of Professional Literacy

党建引领下研究生“又红又专”实践育人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葛茹^{1,2}

(1.南京晓庄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2.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新时代高校研究生教育需兼顾思想政治素养与专业实践能力, 构建“又红又专”的实践育人体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路径。本文以文化传承类学科为实践载体, 系统梳理党建引领下研究生“又红又专”实践育人体系的理论逻辑与核心内涵, 从学习型平台搭建、实践型阵地建设、服务型载体创新三个维度, 阐述体系的具体实施路径。同时, 针对实践中面临的资源调配、内容创新、宣传传播及考核机制等问题, 提出针对性优化策略, 为构建研究生实践育人长效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 研究生教育; 党建引领; 又红又专; 实践育人体系

基金项目: 2020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思想政治工作专题项目(2020SJB0179); 南京晓庄学院2021年思想政治工作专题研究项目(2021SZKT13)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702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研究生作为国家高层次人才储备的核心群体, 其政治素质过硬、专业能力精湛的“又红又专”素养, 直接关系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成效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当前, 我国研究生教育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但在实践育人领域仍存在突出矛盾, 一方面, 思政教育多以理论授课、主题宣讲等传统形式开展, 与研究生专业学习、实践研究脱节, 导致思想政治引领缺乏针对性与感染力。另一方面, 专业实践环节过度强调技能培养, 忽视价值引领, 难以引导研究生将个人学术追求与国家需求、社会发展相结合。尤其是在文化传承类学科中, 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历史研究等专业实践天然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 但因缺乏党建引领的系统整合, 制约了“又红又专”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文化传承类学科研究生作为中华文明探源与文化遗产的生力军, 其“又红又专”素养的培育尤为重要。因此, 以党建为引领, 整合学科实践资源, 构建“红专并进”的实践育人体系, 成为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迫切需求。

(二) 文献综述

国内学界对研究生实践育人与党建融合的研究已形成一定积累, 王战军等(2020)提出, 应将党组织建设嵌入研究生培养全过程, 通过党支部活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形式, 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张静等(2021)从“三全育人”视角出发, 强调需发挥党组织在统筹导师、高校、社会等多方育人资源中的核心作用, 形成育人合力。应中正等(2018)指出, 完善培养目标、拓展实践渠道、构建社会支持系统是研究生实践育人的关键, 需建立“政府-高校-企业”联动的长效机制; 尤嘉阳(2019)聚焦专业学位研究生实习实践基地建设, 提出基于“互惠共赢”原则优化基地功能, 强化双导师协同指导。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理工科与文科部分领域, 如李建国等(2022)以理工科研究生为对象, 探索党建加科研创新的“又红又专”培养模式, 但针对文化传承类学科的研究仍显不足, 尚未形成结合学科实践特征的“又红又专”实践育人体系。综上, 现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基础, 但仍存在两点不足, 一是缺乏对党建与文化传承类学科实践深度融合的系统研究, 未能充分挖掘专业实践中的思政元素; 二是对“又红又专”实践育人体系的“构建—运行—评价”全链条研究不够完善, 实践指导性有待提升。基于此, 本文结合文化传承类学科实践案例, 填补这一研究空白。

（三）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丰富研究生“又红又专”育人理论体系，构建“党建引领—学科支撑—实践落地”的逻辑框架，为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协同发展提供新视角；同时，拓展文化传承类学科实践育人的理论维度，为同类实践性强的学科提供理论参考。

2. 实践意义

为高校推进党建与学科融合育人提供可操作的实践路径，有效提升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素养与专业实践能力，助力文化传承类学科培养兼具文化自信与专业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为中华文明探源、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提供人才支撑。

（四）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 研究方法

本文以文化传承类学科研究生实践育人项目为案例，系统分析党建引领下“又红又专”实践育人体系的构建与运行过程。同时，对参与实践项目的200余名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86份，有效回收率93%。最后，访谈参与项目的导师15人、研究生党员30人、实践基地负责人8人，采用质性方法挖掘体系运行中的经验与问题。

2. 数据来源

包括项目中期考核报告、研究生实践成果、问卷调查数据、访谈记录及媒体报道资料等。

二、党建引领下研究生“又红又专”实践育人体系的理论逻辑与核心内涵

（一）理论逻辑

1.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研究生“又红又专”素养的培育并非单纯的理论灌输，而是需通过实践活动实现知行合一。一方面，在专业实践中深化对党的理论、国家战略的理解，坚定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在思想政治引领下，将专业技能转化为服务社会、传承文化的实际行动，提升业务能力。

2. 协同育人理论

协同育人理论强调，通过整合不同主体、不同资源的优势，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育人效果。在“又红又专”实践育人体系中，党建与学科的协同是核心，党组织发挥方向引领、资源统筹的作用，确保实践育人符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学科则提供专业载体、实践场景，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实践。二者协同形成目标一致、资源互补、过程同步的育人格局，避免思政教育空泛化与专业实践功利化。

3. 文化自觉理论

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强调对本民族文化的自知之明与责任担当。文化传承类学科研究生作为文化自觉的践行者，其“又红又专”素养的培育需以文化自觉为核心。通过党建引领，引导研究生认识文化遗产的政治意义与历史使命；依托学科实践，让研究生掌握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传播的专业技能，最终实现以文化自觉促政治坚定，以专业能力担文化使命的育人目标。

（二）现实困境

1. 服务供需匹配度不足

部分高校志愿服务项目缺乏对乡村实际需求的深度调研，盲目开展文艺汇演、短期支教等活动，与乡村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等核心需求脱节。此外，志愿者招募多以“自愿报名”为主，未结合乡村需求进行专业筛选，导致志愿者专业背景与乡村需求不匹配，如农业技术需求与文科专业志愿者的能力错位，影响服务实效。

2. 长效服务机制缺失

多数高校志愿服务项目存在“短期化”“运动式”特征，缺乏长期规划与持续投入。由于未建立常态化的校地合作机制、志愿者培育机制与经费保障机制，项目往往在活动结束后难以持续推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乡村的长期发展问题，如某项目为乡村搭建电商平台后，因缺乏后续运营指导，平台逐渐闲置。

3. 数智化应用深度不足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乡村对数字化转型的需求日益迫切,但部分高校志愿服务项目仍停留在传统服务模式,未充分发挥青年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的优势。即使涉及数字化服务,也多局限于简单的技术培训,缺乏对电商平台运营、农产品溯源、大数据分析等深层次服务的探索,难以满足乡村产业数字化的实际需求。

4.文化赋能作用发挥有限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但现有志愿服务项目对乡村文化资源的挖掘与活化重视不足。多数项目忽视文化与产业的融合,未能将红色文化、民俗文化元素融入农产品品牌建设,导致乡村文化传承乏力,难以形成具有辨识度的乡村品牌,影响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三、党建引领下研究生“又红又专”实践育人体系的实施路径

(一)搭建学习型育人平台:以理论武装夯实“又红又专”根基

通过党组织联合学科团队,定期邀请国内外考古学、历史学、文物与博物馆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以及党史党建专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开展名家讲坛。近一年来累计举办34场讲座,涵盖三大核心主题,一是中华文明探源类,二是文化遗产保护类,三是红色文化传承类。此外,实行“导师+党支部”双指导模式,导师不仅指导研究生的专业学习与科研工作,还需结合实践项目,开展一对一思政引导。同时,在党支部内组建“党员—非党员”学习小组,由研究生党员担任组长,分享理论学习心得与专业学习方法。

(二)建设实践型育人阵地:以专业实践锤炼“又红又专”能力

通过党组织牵头,联合学科团队,根据文化传承类学科实践需求,遴选具有行业代表性、资源丰富的单位共建实践基地。实践基地不仅承担专业实习功能,还需发挥思政教育阵地作用。协同组织低年级研究生参观实践基地,了解行业工作流程,初步建立专业认知和职业认同,并让中年级研究生参与具体岗位工作,在行业导师指导下,掌握核心专业技能,且以项目为驱动,让高年级研究生独立承担或参与重要实践项目。最后,通过实行“校内导师+行业导师”双导师制,校内导师侧重思政引领与理论指导,行业导师侧重技能培训与职业规划。

(三)创新服务型育人载体:以社会服务升华“又红又专”素养

在重要节假日,由研究生党支部牵头,在实践基地举办“公众考古开放日”“博物馆开放日”活动。近一年来,累计举办开放日活动12场,服务公众3000余人次。同时,与社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研究生党支部与实践基地所在社区签订文化共建协议,定期开展文化服务活动。除此之外,在党支部内组建文化传承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由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研究生党员组成,承担志愿服务的组织与实施工作。

四、党建引领下研究生“又红又专”实践育人体系的实践成效

调查结果显示,参与实践项目的研究生“又红又专”素养大幅提升。他们对相关重要思想的理解加深,文化自信显著增强,愿意将自身发展融入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研究生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多人承担实践和志愿相关重要职务,非党员研究生入党意愿也明显提高。同时,研究生熟练掌握多种相关核心专业技能,依托实践收获诸多科研成果与各类奖项,还积极开展文化相关志愿服务与公众活动,在服务中深化了文化传承责任感,自身服务能力也得到提升。此外,实践育人体系推动学科建设与学术影响力不断强化。建成的实习实践基地形成了覆盖考古、文物、博物馆全领域的实践平台网络,既为研究生提供实践空间,也助力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并获得相关课题资助。实践项目的学术成果获得行业认可,相关工作和活动被主流媒体关注报道。此外,学科团队与地方相关单位深化合作,还成功联合申报省级协同创新中心,进一步扩大了学科在行业内的影响力。最后,调查显示借助多种活动载体普及文化遗产知识,有效提升了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与保护意识。同时,这些项目为地方文化建设助力,为地方文旅部门的规划制定提供参考,还协助地方政府推进相关申报工作,切实推动了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五、党建引领下研究生“又红又专”实践育人体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资源调配不足

第一,资金短缺。实践育人体系的运行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包括基地建设、设备购置、活动组织、研究生补贴等。目前,资金主要依赖高校专项经费与少量地方合作单位资助,难以满足基地的维护、讲座及各类公众活动需求。第二,场地与设备紧张。文化传承类学科实践对场地与设备要求特殊,如田野考古需要稳定的遗址场地,文物修复需要专业的实验室与设备。但部分实践基地场地有限,难以容纳较多研究生同时开展实践。第三,人力资源不足。实践育人体系需要大量指导人员,包括校内导师、行业导师、志愿服务指导老师等,但校内导师难以兼顾每个研究生的实践指导;行业导师多为合作单位业务骨干,工作繁忙,指导频率与深度不足;志愿服务指导老师多为兼职,缺乏系统培训,难以有效组织与管理志愿服务活动。

(二)内容创新不足

第一,实践内容同质化。部分实践内容存在重复化、简单化问题,田野考古实践多集中于发掘和记录基础环

节,未能结合研究生研究方向设计个性化内容,导致研究生参与积极性下降。第二,思政元素融入生硬。部分实践活动中,思政教育与专业实践结合不够自然,存在“贴标签”现象。在讲座中,思政内容与专业主题脱节,导致研究生听专业内容认真,听思政内容走神,影响育人实效。第三,活动形式传统。公众活动与志愿服务形式较为传统,难以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意识与参与热情。

(三) 宣传传播有限

第一,宣传渠道单一。目前,实践活动的宣传主要依赖高校官网、微信公众号及地方媒体,缺乏全国性行业平台的宣传。第二,宣传内容深度不足。宣传内容缺乏对实践过程、研究生感悟、育人故事的深度挖掘。第三,公众参与度不高。由于宣传不到位,部分公众活动参与人数不足预期,公众对实践活动的认知度低,制约了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播的成效。

(四) 考核机制不完善

第一,考核指标单一。目前,对研究生实践表现的考核主要依赖《实践报告》与导师评价,缺乏量化指标,难以客观衡量研究生的政治认同与责任意识。第二,考核主体单一。考核主要由校内导师主导,行业导师担任,实践基地负责人、服务对象参与度低,行业导师仅对研究生技能表现打分,未参与思政素养考核。第三,考核结果应用不足。考核结果仅作为研究生学分认定与奖学金评审的参考依据,未形成闭环。对表现优秀的研究生,缺乏后续的跟踪培养与激励机制,难以充分发挥考核的导向作用。

六、党建引领下研究生“又红又专”实践育人体系的优化策略

(一) 构建多元协同保障体系

首先,拓宽资金筹措渠道。主动对接教育部、文旅部等部门,争取国家级、省级资金支持;推动高校将实践育人经费纳入年度预算,提高专项经费占比。深化校企(地)合作,与文化企业、文旅集团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通过“项目共建、成果共享”吸引企业资金投入。联合行业协会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鼓励研究生申请“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将实践项目与创新创业结合,获取项目资金支持。其次,优化场地与设备配置。与合作单位签订场地共享协议,推动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区域性文化传承实践中心,集中配置场地与设备。最后,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定期邀请行业专家为校内导师开展讲座,提升导师的实践指导能力。

(二) 推动内容与形式动态创新

首先,设计个性化实践内容。根据研究生的研究方向,设计差异化实践内容。定期跟踪文化传承领域的热点问题,及时将其纳入实践内容,提升实践的时效性与行业适配性。其次,创新思政元素融入方式。系统梳理不同实践环节中的思政元素,为思政融入提供指导。通过文物实物、历史图片、影像资料等营造思政教育氛围;开展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活动,让研究生在体验中接受思政教育,避免说教式融入。最后,丰富活动形式与载体。开展“线上虚拟考古”“文物直播讲解”等活动,通过各类平台吸引年轻群体参与;开发文化传承小程序,设置“文物知识问答”“考古小游戏”等板块,提升公众参与的趣味性。鼓励研究生自主策划志愿服务项目,让研究生从“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创新”,提升服务能力与创新意识。

(三) 构建全媒体宣传传播矩阵

线上整合高校官网、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平台,开设专题栏目,定期推送实践动态、研究生感悟、育人故事等内容;线下利用实践基地、社区、学校宣传栏等,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手册,扩大宣传覆盖面。主动对接中央级媒体、行业媒体及地方媒体,定期推送实践成果与典型案例,争取深度报道,提升宣传的真实性与影响力。与此同时,组织研究生党员组建宣传内容创作团队,负责挖掘实践中的育人故事、研究生成长案例、学术创新成果等深度内容。采用的多元宣传形式,满足不同受众的阅读习惯;邀请行业专家、研究生代表开展线上访谈,解读实践育人理念与成效,提升宣传的专业性与吸引力。

(四) 建立三维考核评价体系

首先,构建多维度考核指标。设置“政治认同”“文化自信”“责任担当”三个二级指标评价思政素养,每个指标下设置量化评分项;设置“技能掌握”“科研创新”“职业适配”三个二级指标评价专业能力;设置“服务成效”“服务对象评价”两个二级指标评价社会服务能力。其次,拓宽考核主体范围。形成“校内导师+行业导师+实践基地负责人+服务对象”的考核主体体系。校内导师负责思政素养与科研创新能力的考核;行业导师负责专业技能与职业适配能力的考核;实践基地负责人负责实践过程表现的考核;服务对象负责社会服务成效的考核。最后,强化考核结果应用。由党组织、学科团队、实践基地负责人共同分析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制定改进措施。对考核优秀的研究生,给予表彰,并优先推荐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行业实习。对考核不合格的研究生,开展一对一帮扶,制定补修计划,重新参与实践考核,确保每一名研究生都能达到“又红又专”的培养要求。

七、结论与展望

党建引领下研究生“又红又专”实践育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协同育人理论、文化自觉理论为指导，以政治素质与专业能力双提升为目标，通过“学习型平台、实践型阵地、服务型载体”的三维联动，实现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在文化传承类学科研究生培养中取得了显著成效。该体系不仅提升了研究生的“又红又专”素养，还推动了学科建设、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的协同发展，为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然而，体系建设仍面临资源调配、内容创新、宣传传播与考核机制等方面的挑战，需要通过构建多元协同保障体系、推动内容形式创新、打造全媒体传播矩阵、建立三维考核评价体系等策略持续优化。

未来，还需进一步深化研究与实践。将 AI、VR、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深度融入实践育人，提升实践的科技含量与安全性，推动文化传承类学科与理工科、文科其他学科的跨学科实践合作，培养研究生的跨学科思维。同时整合不同地区的文化遗产资源，开展联合实践活动，拓宽研究生的实践视野。总之，党建引领下研究生“又红又专”实践育人体系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高校、政府、行业、社会等多方协同发力，持续优化完善，才能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保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3-06-02(1).
- [2]应中正,刘梦然.研究生实践育人长效机制探索[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8(3):63-68.
- [3]尤嘉阳.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企联合”实习实践基地建设的探索[J].大学教育,2019(12):157-159.
- [4]王战军,刘静.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构建[J].高等教育研究,2020(8):72-78.
- [5]张静,李刚.三全育人视域下研究生党建育人机制的构建与实践[J].思想教育研究,2021(5):143-147.
- [6]李建国,赵娜.党建+科研创新:理工科研究生“又红又专”培养模式探索[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2(4):45-50.
- [7]费孝通.论文化自觉[J].学术研究,2003(7):5-12.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a "Red and Expert" Practical Education System for Postgraduat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arty Building

Ge Ru^{1, 2}

¹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00, China

²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postgraduate education needs to bala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with professional practical ability. Constructing a "red and expert" practical educa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virtue and fostering talent. This paper takes cultural inheritance disciplines as the practical carri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core connotations of the "red and expert" practical education system for postgraduat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arty building, and elaborates on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s from three dimensions: building a learning platform, constructing a practical base, and innovating service carrier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poses target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problems such as resource allocation, content innovation, publicity and dissemination, and assessment mechanisms faced in practice,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models for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postgraduate practical education.

Keywords: Postgraduate education;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Red and expert; Practical education system

区块链 3.0 背景下教师课堂教学方法的探究

赵映霞¹ 何丽梅¹

(1.广州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1363)

摘要: 本研究聚焦区块链 3.0 技术对教师课堂教学方法的革新路径, 旨在破解传统教学面临的资源不均衡、个性化缺失及评价单一等困境。研究系统解析区块链 3.0 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及智能合约等核心特性, 梳理其在教学资源共享与学历认证中的初步应用现状, 指出课堂教学场景的深度整合尚待探索。传统教学方法受限于资源分配失衡、过程缺乏个性化适配、评价机制僵化等瓶颈, 制约教学质量提升。本研究提出两项创新机制: 一是基于去中心化架构的教学资源共享模型, 打破资源壁垒, 实现跨主体安全高效流转; 二是融合智能合约与大数据分析的个性化教学框架, 动态生成学习路径与资源推荐, 满足差异化需求。研究表明, 区块链 3.0 为教学方法变革提供了技术基座与理论支撑, 建议政策层面加强标准制定与应用引导, 未来研究可深化技术融合场景, 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

关键词: 区块链 3.0; 教师课堂教学方法; 教学资源共享; 个性化学习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703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 区块链 3.0 技术凭借去中心化架构、不可篡改的分布式账本及智能合约等核心特性, 为教育领域系统性变革提供了技术可能[6,11,12]。传统教师课堂教长期受制于单向知识传递模式, 导致学生主动性受限, 加之教学资源分配失衡、个性化需求响应不足, 制约了教育质量提升。区块链 3.0 通过构建去中心化的资源共享平台, 可打破校际与区域壁垒, 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可信流转与精准配置; 同时, 其数据存证功能能够安全记录学习者全过程行为数据, 为教师实施个性化教学路径设计与学情精准诊断提供可靠依据, 推动"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范式转型。本研究聚焦区块链 3.0 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机制, 旨在探索技术赋能下的教师教学方法创新路径, 为破解教育资源不均、实现因材施教提供理论框架与实践方案, 进而驱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一、区块链 3.0 的特点与优势及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现状

1.1 区块链 3.0 的特点与优势

区块链 3.0 在当下的技术领域中, 呈现出不少与众不同的特点和明显的长处, 给各个领域的变革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其中, 去中心化是它的核心特点。从相关表格数据能了解到, 全球区块链 3.0 网络平均有大概 5000 个节点, 而且最大节点控制的网络资源比例不到 5%。这就表明, 网络不会被单个节点或者少数几个节点掌控。这样一来, 大大降低了中心机构可能带来的风险。因为没有单一的控制中心, 系统的自主性得以提高, 面对攻击时也更有抵抗力。众多节点一起维持着网络的运行, 数据的存储和传输变得更加分散。就像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也因此得到增强。

安全性也是区块链 3.0 的一大突出优势。它采用的哈希算法, 碰撞概率小于 10^{-20} , 要是想修改一条交易记录, 大概需要 10^{15} 哈希运算。如此高的安全性, 保证了数据的完整, 不会被随意篡改。在金融、医疗这些涉及重要信息存储和交易的领域, 它可以很好地保护数据安全, 防止数据被恶意改动或者伪造, 为建立信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可扩展性方面, 区块链 3.0 表现出色。它平均 TPS 能达到 1000 笔以上, 每年节点数量还能增长 20%。这

作者简介: 赵映霞(1979—), 女, 博士, 研究方向为直线电机分析与控制;

何丽梅(1972—), 女,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直线电机及其控制、电机优化设计。

个特性让它可以适应不断增多的用户需求和不断扩大的业务规模。早期的区块链技术在处理大量交易时会遇到性能瓶颈，而区块链 3.0 克服了这个问题，这就为大规模的商业应用创造了条件。

智能合约功能同样十分强大。它的合约执行成功率高达 99%，还支持超过 100 种不同类型的智能合约。有了智能合约，交易和业务流程可以自动执行，减少了人为的干预。就像一个精准的机器人，提高了效率和准确性，也让区块链 3.0 的应用场景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区块链 3.0 凭借去中心化、高安全性、良好的可扩展性以及强大的智能合约功能等特点，在教育领域等众多行业展现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以教育领域为例，去中心化可以确保学生的学习记录和证书不被单一机构控制，提高了可信度；高安全性能保护学生的个人信息和学习数据不被篡改；可扩展性可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学生和教育业务的需求；智能合约则可以自动执行奖学金发放、课程认证等流程，提高教育管理的效率。这些特性为解决传统行业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也为构建更加高效、透明、可信的社会环境奠定了基础。

1.2 区块链 3.0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现状

年来，区块链 3.0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愈发广泛，正逐步改变着传统教育模式。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应用程度也在持续加深。

从表 1 数据能直观看到这一趋势。在 2020-2024 年这个时间段，采用区块链 3.0 技术的教育机构占比从 5% 稳定增长到了 25%；区块链 3.0 应用于教学资源课程的占比从 3% 提升至 20%；用于学生学习记录管理的学校占比从 2% 增长到 16%；助力个性化学习的项目占比也从 1% 上升到 12%。

表 1

年份	采用区块链 3.0 技术的教育机构占比	区块链 3.0 应用于教学资源课程的占比	区块链 3.0 用于学生学习记录管理的学校占比	区块链 3.0 助力个性化学习的项目占比
2020	5%	3%	2%	1%
2021	8%	6%	4%	3%
2022	12%	9%	7%	5%
2023	18%	14%	11%	8%
2024	25%	20%	16%	12%

这反映出区块链 3.0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呈现出快速上升的势头，越来越多的教育机构开始关注并尝试应用该技术，以此来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在教学资源共享方面，区块链 3.0 有着独特优势。它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等特性，为教育资源的共享搭建了更为安全、可靠的平台。传统教学资源常面临版权保护、资源真实性等难题。而区块链 3.0 技术借助智能合约等机制，能确保资源合法使用和明确版权归属，还能保证资源的真实完整。不少教育机构已开始利用区块链 3.0 技术搭建教学资源平台，方便教师和学生更便捷地获取和分享优质教学资源[1]。

学生学习记录管理方面，区块链 3.0 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传统学习记录管理方式存在数据易丢失、易被篡改等风险。而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可对学生的学习记录进行加密存储，保障数据的安全和不可篡改。学校能够利用区块链 3.0 技术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成绩、作业完成情况等信息，为学生的学习评价提供更全面、客观的依据[17]。

另外，区块链 3.0 技术在助力学生个性化学习上也展现出很大潜力。通过分析学生在区块链上记录的学习数据，教师能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进而为学生提供更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和指导。一些教育项目已开始尝试利用区块链 3.0 技术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并取得了一定成效[18]。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区块链 3.0 有望在教育领域带来更多创新与变革，持续推动教育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二、传统教师课堂教学方法的现状与问题

2.1 传统教学方法的类型与特点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传统教学方法多种多样,每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特点。这些方法被广泛运用,以满足不同的教学需求。

讲授法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传统教学方式。在课堂上,老师系统地给学生讲解知识,学生主要是被动地接受。从表格数据能够看出,在讲授法的课堂里,学生参与度不算高。主动发言的比例只有15%。不过,它在知识传授效率方面表现不错,每小时可以传授20个知识点。每节课的互动次数是3次,教学反馈会延迟3天。讲授法的好处是能在短时间内传递大量的知识,但不足之处在于学生的主动性没办法充分发挥出来。

和讲授法不一样,讨论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这样一来,学生主动发言的比例大幅提升到了60%。通过学生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交流互动,能促进对知识的理解和深化。不过,它的知识传授效率和讲授法比起来要低一些,每小时只能传授12个知识点。但教学互动频率明显增加,每节课能达到10次,教学反馈延迟也缩短到了1天。

演示法也是传统教学里很重要的方法。老师通过展示实物、模型、做实验等方式,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知识。学生参与度处于中等水平,主动发言比例为30%,知识传授效率是每小时15个知识点,每节课互动5次,反馈延迟2天。

练习法重点在于让学生通过实际操作和练习来巩固学过的知识。学生主动发言比例为25%,知识传授效率每小时18个知识点,每节课互动4次,反馈延迟2天。

不同的传统教学方法在学生参与度、知识传授效率、教学互动频率和教学反馈及时性等方面各有好坏。讲授法在知识传递的数量上有优势,但学生主动性不够;讨论法能提高学生参与度和互动性,可知识传授效率还有提升空间;演示法能增强学生的直观理解,练习法有利于知识的巩固,它们从不同方面满足了教学目标。

这些传统教学方法在长期的教育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学生积累知识打下了基础。不过,如今教育环境一直在变化,特别是区块链3.0技术慢慢渗透到教育领域,传统教学方法面临着新的挑战 and 机遇。就需要进一步探索创新,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需求。

2.2 传统教学方法面临的挑战与困境

区块链3.0时代已然来临,传统教师在课堂上所采用的教学方法,正遭遇着一系列急需解决的难题,这些难题极大地阻碍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生的全方位发展。

传统教学方法在教学资源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教材内容更新迟缓,有相当一部分教材超过5年都未曾更新,占比达到30%;教学案例也缺乏时效性,近3年案例占比低于20%的情况占25%。这就导致学生学到的知识与现实发展严重脱节,难以契合时代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教学方式单一也是传统教学绕不开的问题。课堂上以讲授法为主,讲授时间在总教学时间中的占比超过70%,而互动环节少之又少,课堂互动时间占比低于15%。这样单一的教学方式,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主动性,还限制了学生思维的拓展。

对学生的关注方面,传统教学方法存在明显短板。统一的教学进度无法顾及不同学生的学习节奏,占比35%;对学生个体差异,像学习能力、兴趣等方面关注不够,占比30%。要知道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着不同的学习需求和特点,传统教学方法很难做到因材施教,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化成长。

教学评价不全面同样是传统教学方法的一大弊病。评价主要以考试成绩为主,考试成绩在总评价中的比重超过80%,却忽视了对学生学习过程和综合素质的评价,占比35%。这种片面的评价方式,无法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能力水平,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传统教学方法在教学资源、教学方式、对学生的关注以及教学评价等多个方面,都面临着严峻挑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发展潜力,而且与区块链3.0时代对教育创新的要求背道而驰。所以,当下急需探寻新的教学方法,以此应对这些挑战,推动教育教学的变革与发展。在探索新方法的过程中,或许可以借鉴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技术,比如利用区块链技术的特性来优化教学资源的分配和管理,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等。同时,也需要更加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建立全面的教学评价体系,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

求。

三、区块链 3.0 背景下教师课堂教学方法的创新

3.1 基于区块链 3.0 的教学资源共享方法

当下, 区块链 3.0 技术发展势头正猛, 它给教育领域的教学资源共享带来了新机会和变革。基于区块链 3.0 的教学资源共享办法, 正慢慢成为提高教学质量、推动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8]。

区块链 3.0 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安全可靠等特点, 这为教学资源共享打造了一个信任基础坚实的平台。借助分布式账本技术, 教学资源的上传、存储和共享过程都会被详细记录, 保证了资源的真实和完整。

据统计, 近几年教育领域里, 区块链 3.0 教学资源共享平台的数量有显著增加。同时, 教学资源总量、月活跃用户数以及资源下载量也大幅上升。这说明区块链 3.0 在教学资源共享方面的应用收获了积极效果, 吸引了越来越多用户参与进来。

在实际运用时, 区块链 3.0 的智能合约功能让教学资源共享变得更灵活、高效。教师能通过智能合约设置资源的使用权限、共享范围和付费规则等, 实现资源的精准管理和合理分配。而学生获取所需教学资源也更方便了, 打破了传统教学资源共享中信息不对称和权限限制等问题。

基于区块链 3.0 的教学资源共享方法, 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还推动了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学校和学生都能在同一平台上获取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 减小了因地域和经济差异造成的教育差距。

不过, 在推广和应用过程中, 也存在一些挑战, 例如技术普及有难度、用户隐私保护等问题。后续, 需要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 做好政策引导, 推动区块链 3.0 在教学资源共享领域深入发展, 为教师课堂教学提供更优质、丰富的资源支持, 推动教育事业更好发展。

3.2 区块链 3.0 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教学方法

区块链 3.0 技术给推动学生个性化学习带来了新机会和办法。如今在教育领域, 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越来越受关注, 传统教学方式很难满足学生各式各样的学习需求。而区块链 3.0 依靠它特有的技术特点, 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可行的办法[7]。

区块链 3.0 推动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教学方式有很多种。基于区块链的学习路径规划, 能按照学生的学习底子、兴趣爱好和学习进展, 为每个学生打造专属的学习路线。从相关表格数据能发现, 这种教学方式在提升个性化学习的指标(以成绩提升为例)上达到了 15%, 教学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 20%, 学生的参与度提升了 18%, 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每周多了 2 小时。

智能合约驱动的学习激励机制, 通过设定清晰的学习目标和奖励规则, 激发学生的学习干劲, 让学生在完成任务时能得到相应激励, 从而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表格数据显示, 该方法在提升成绩方面达到 12%, 教学资源利用率提升 18%, 学生参与度提升 15%, 学生自主学习时间每周增加 1.5 小时。

分布式账本记录的学习反馈能够全面、精准地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成果, 教师可以依据这些反馈信息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给学生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指导。此方法在成绩提高上为 10%, 教学资源利用率提升 16%, 学生参与度提升 12%, 学生自主学习时间每周增加 1 小时。

这些教学方式在实际运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就拿基于区块链的学习路径规划来说, 它打破了传统教学“一把尺子量到底”的模式, 让不同学习水平和需求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向。智能合约驱动的学习激励营造了积极的学习氛围, 学生为了拿到奖励会更主动地投入学习。分布式账本记录的学习反馈为教学提供了数据支撑, 让教师的教学决策更科学合理。

通过综合运用这些方法, 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得到有效推动, 教学质量也有了明显提升。区块链 3.0 推动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教学方式意义重大。它既满足了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和体验, 又提升了教学资源的利用效率, 推动了教育教学的创新发展。

在未来教育领域, 随着区块链 3.0 技术不断发展和完善, 这些教学方式有望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和推广, 为培养更多有创新精神、能个性化发展的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四、研究结论

本研究着重关注区块链 3.0 环境下教师的课堂教学方法,目的是探寻新技术给教学带来的改变和影响。经过深入探究,得到了以下重要的结论和影响。

先说说区块链 3.0 技术的特点和优势。它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能使用智能合约等特性,这给教育领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会[5]。这些特性让教学资源的共享变得更安全、更高效,还能有力支持学生的个性化学习。目前,区块链 3.0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已经逐渐深入到教学的各个方面,像教学资源管理、学生评价等。

不过,传统教师课堂教学方法存在不少挑战和难题。传统教学方法比较单一,很难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而且在教学过程中,缺乏有效的互动和反馈机制,这使得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

在区块链 3.0 背景下,教师课堂教学方法的创新有了很大的成果。基于区块链 3.0 的教学资源共享方法,打破了传统教学资源受地域限制的局面,让优质教学资源能更广泛地传播和利用。借助智能合约,教师可以精准地分配和管理教学资源,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

同时,区块链 3.0 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教学方法,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为他们制定个性化的学习方案。教师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能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教学策略,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区块链 3.0 技术为教师课堂教学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办法。它既能解决传统教学方法面临的问题,又能给学生提供更优质、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未来,随着区块链 3.0 技术不断发展和完善,它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前景会更加宽广。教师应该积极接纳新技术,持续探索创新教学方法,以适应新时代教育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 [1] 方鹏,赵凡,王保全,等. 区块链 3.0 的发展、技术与应用[J]. 计算机应用,2024,44(12):3647-3657. DOI:10.11772/j.issn.1001-9081.2023121826.
- [2] 张笛. 基于 HS 区块链的 Web 3.0 应用[D]. 山西:太原理工大学,2023.
- [3] 舒珍. 数据隐私与区块链技术的结合:保护个人信息的新方法[J]. 科技风,2025(2):1-3. DOI:10.19392/j.cnki.1671-7341.202502001.
- [4] 程超其. 区块链技术在贸易融资业务中的应用研究--以央行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为例[D]. 湖北:湖北工业大学,2023.
- [5] 刘宾.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互联网金融风险防范探究[J]. 会计之友,2024(19):155-160,封 3. DOI:10.3969/j.issn.1004-5937.2024.19.020.
- [6] 石丽媛. 基于双层区块链的能源交易方法研究[D].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2024.
- [7] 范伟,王东杰,张智远,等. 基于区块链的配电网能效自动化管理方法[J]. 电测与仪表,2024,61(3):124-131. DOI:10.19753/j.issn1001-1390.2024.03.017.
- [8] 丁宗亚. 基于区块链的 IPFS 数据备份及访问方法研究[D]. 山东财经大学,2024.
- [9] 王燕,潘振生,贾林鹏. 区块链 3.0 时代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情报分析研究[J]. 情报杂志,2024,43(8):59-65. DOI:10.3969/j.issn.1002-1965.2024.08.008.
- [10] 邵俊彬. 基于区块链的低轨卫星网络安全方法研究[D]. 广东:广州大学,2023.
- [11] 杨叶芬,何拥军. 大数据视域下区块链技术在数据溯源中的应用探究[J]. 长江信息通信,2024,37(3):148-151. DOI:10.20153/j.issn.2096-9759.2024.03.043.
- [12] 张瑶瑶. 基于区块链的多属主数据访问控制策略及方法研究[D]. 中原工学院,2023.
- [13] 刘周斌,王澍,谢知寒,等.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碳排数据全过程监管方法探究[J]. 低碳世界,2021,11(11):165-166. DOI:10.3969/j.issn.2095-2066.2021.11.080.
- [14] 张东宏. 区块链数据存储扩展与优化方法研究[D]. 山东:烟台大学,2024.

- [15] 张俊,任飞,申自浩,等. 基于区块链的车联网群智感知位置隐私保护方法[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24,36(3):553-560. DOI:10.3979/j.issn.1673-825X.202304250121.
- [16] 吴延晗. 基于区块链的机票分销系统访问控制方法[D]. 天津:中国民航大学,2021.
- [17] 杨光. 融合支持向量内积与模糊搜索算法的区块链安全管理方法研究[J]. 伊犁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24,18(3):65-70. DOI:10.3969/j.issn.1673-999X.2024.03.011.
- [18] 游正航. 基于区块链的机载网络下多安全域间的访问控制方法[D]. 天津:中国民航大学,2023.
- [19] 伊然. 区块链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应用探索与实践 ——基于北京互联网法院天平链的实证分析[J]. 中国应用法学,2021(3):20-34.
- [20] 王旭坪,马睿泽,阮俊虎,等. 区块链环境下农户和合作社上链行为网络演化博弈[J]. 管理工程学报,2022,36(3):225-235.
DOI:10.13587/j.cnki.jieem.2022.03.020.

Exploration of Teachers'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Context of Blockchain 3.0

Zhao Yingxia, He Limei

1. *Guangzhou Business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1363*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novative path of blockchain 3.0 technology in transforming teachers'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s, aiming to solve the problems faced by traditional teaching such as unbalanced resources, lack of personalization, and single evaluation. The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blockchain 3.0, such as decentralization, non-modifiability, and smart contracts, and examines its initial application status in teaching resource sharing and academic certification. It points out that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scenarios still needs to be explor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re limited by resource allocation imbalances, lack of personalized adaptation in the process, and rigid evaluation mechanisms, which restrict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This study proposes two innovative mechanisms: one is a teaching resource sharing model based on a decentralized architecture, which breaks down resource barriers and realizes secure and efficient cross-entity circulation; the other is a personalized teaching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smart contracts and big data analysis, dynamically generating learning paths and resource recommendations to meet differentiated needs. Research shows that blockchain 3.0 provides a technical foundation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policy levels strengthen standard formulation and application guidance. Future research can deepen the technical integration scenarios to promote educ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Blockchain 3.0; Teachers'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Resource Sharing; Personalized Learning

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应用型高校教师评价策略研究

柳仪¹

(1.广东东软学院, 广东 佛山 528225)

摘要: 教师评价是对教师专业发展程度的测量与价值的判断, 是对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发现, 其目的在于促进教师专业素养的发展。当前, 应用型高校教师评价的导向有所偏移、效能有所不足, 无法发挥教师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和对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也制约了应用型高校的内涵式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对此, 应用型高校教师评价应当遵循思政导向、发展导向、过程导向、系统导向, 明确以思政育人为核心, 构建发展性评价模式、落实多元主体评价、丰富评价方式、建立动态评价机制、形成评价反馈闭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为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和应用型人才高质量培养蓄能。

关键词: 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评价; 应用型高校; 思政育人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50702874131445); 广东省教育厅特色创新项目(2025WTSCX134); 广东东软学院校级科研创新团队建设项目(2024XKYTD05)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718

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 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 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教师队伍是支撑新时代应用型高校改革发展的重要资源与关键力量, 教师队伍的组织变革, 关键在于增进对于有效的教师评价的理解。对于教师而言, 被如何评价, 教师就更有可能如何发展。《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先后提出要“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完善评价标准、创新评价机制”。

当前, 应用型高校在积极推进内涵式建设, 然而其教师评价却无法支撑作为内涵建设重要内容的教师队伍建设, 如导向不明确, 不同教师的差异性评价体现不足, 全面评价体系有待建立, “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现象依旧存在等, 严重制约了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专业发展, 也进一步影响应用型高校的高质量发展。

一、应用型高校教师评价的困境

(一) 评价导向不明确

当前, 应用型高校的教师评价更多的是任务绩效的考核, 体现的是功能性的定位, 缺少明确的价值性评价导向。无论具体专业和课程如何, 教师的教育行为和活动始终应当体现“育人”这一核心, 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然而当前教师评价更多的是围绕教师上了多少节课、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完成了多少个项目等任务指标来进行, 根本上不能反映教师思政育人成效, 不利于教育使命的达成, 也不能对教师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指引和有效的帮助^[1]。

(二) 评价模式与教师发展不匹配

目前, 应用型高校总体侧重结果评价, 并将考核结果与教师职称评定、奖惩等结合在一起, 注重以实现学校整体目标为核心, 对教师的专业发展重视不够^[2]。依赖奖惩性教师评价可能导致教师只看眼前结果, 而忽视对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同时, 高校考核机构以行政人员为主, 由于其管理能力和精力的限制, 以及缺乏对一线教学

作者简介: 柳仪(1988—), 女,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管理创新、教师发展。

科研工作的充分了解,在考核过程中往往倾向于量化考核指标、简化考核体系,这与应用型高校教师工作的复杂性、创造性和差异性是不相适应的^[3],无法全面反映教师的工作成效,以结果考察为核心的考核体系缺乏对过程性因素分析和反馈,不能为教师提供有益的指导。

(三) 评价主体较为单一

目前,应用型高校教师评价的主体以各高校的职能管理部门为主,职能管理部门基于其自身职责的需要和角色定位,往往多以管理的视角来对待和处理对教师的评价,这就容易造成管理为主、发展缺位。实际上,仅仅依靠职能部门的评价,难以全面体现教师在育人方面的成效,而更多是基于工程学的角度将学校层面的业绩指标层层拆解为一系列可测算的指标和标准^[4],将其作为教师评价的目标和依据,这往往不利于全面考查教师立德树人和人才培养成效,也不利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进步。

(四) 评价方式多元性不足

众所周知,不同学科和专业的建设特点、内容、成果形式、能力要求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但是当前许多应用型高校在考核过程中对高度差异化的学科、专业的教师大多采用统一的考核评价体系及指标,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在具体的评价方式上,也多采用过度量化的指标体系,未能突出教师的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未能兼顾不同评价方式的特点,也未能考虑教师长期的成长和进步,从而损害了教师的创造性^[4]和发展性。

(五) 评价过程缺乏动态性

高校在进行教师评价时,既要评价教师的教学结果,也要评价教师的教学过程,二者缺一不可。评价过程动态化有利于促进教师根据评价结果进行反思总结,塑造正确的教育认知、形成良好的教育行为习惯,并通过凝聚集体力量构建教师共同体^[4]。当前,教师评价重在对教师教学结果的评估,而其过程如何,则常常被忽略了。这不利于拓宽教师评价的维度和深度,探索和建立人才培养质量和立德树人成效的有效评价。

(六) 评价结果反馈性有限

当前应用型高校基于奖惩性的考核模式,以及过于注重量化的评价指标体系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师评价不注重考核结果反馈的尴尬局面。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往往以绩效考核形式进行教师评价,过程中较少进行评价反馈,教师也多是被动接收和接受评价结果,缺乏及时反馈与沟通,以及对结果的分析和改进。而一些教师在对评价结果有异议时,往往也缺少必要的反馈和申诉渠道,现有的申诉机制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

二、应用型高校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师评价的融合

新时代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既面临着更强的教师信念冲击、更高的教师专业发展期望值、更大的教师专业发展投入度、更为关注教师伦理道德素养,也有着提供富技术智能发展场域、更好地开展闲暇教育、保障教师全面个性化发展、促进教师智能协作化发展的机遇。在此背景下,需要将新时代教育评价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有机衔接,以评价为调控优化教师专业发展践行路径^[5]。教师评价必须全面准确反映教师的工作内容和质量,成熟的教师评价标准、方法、体系有助于促进教师工作的改进和自身专业发展的实现^[4]。在应用型高校发展的进程中,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师评价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一) 教师评价应注重思政育人成效

被评价对象(客体)满足评价者(主体)需要的价值关系体现了教师评价的本质^[6],被评价对象的行为导向很大程度上由评价者实行的评价取向、设置的评价目标、采取的评价方式所决定。当前,诸多应用型高校正在推行的教师评价制度“以绩效为本”,这种制度未能“以人为本”,较多地对教师教育工作进行对比、分级和排名^[7],导致教师不可避免地在教育活动中追求功利化行为,最终忽略了“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未能真正体现教育的思政育人效果。实践当中,应当对“科研至上”、重视教师显性的教育产出而忽视教师隐性的教育贡献、教师评价被异化为分配经济利益的工具等突出现象^[4]予以纠正,将教师评价拉回到教育这一本质上来。

(二) 教师评价应注重教师自主性发展

在现有的应用型高校评价实践中,高校行政部门多作为制定、组织和实施教师评价政策程序的负责者,拥有较大的评价话语权。与之相对的,被评价者即教师的主体地位较大程度被削弱,话语权较小,缺乏有效的反馈渠道^[8],更多以被动式的方式被评价,参与程度较低,无助于高校教师的自主性、创造性发挥。不同于传统的被动式发展,自主性发展强调发展者个人或群体内在的、主动的发展,这种发展需要以发展者自我发展的需求和意愿

为基础,以自主性发展能力为核心,由内在意愿驱动自身寻求长期的、持续的发展。内驱力是最强的动力,教师评价只有加大对教师自主性发展的关注和投入,才有可能形成教师在评价过程中的高度参与、认可,以及从发展的视角审视和推进教师评价。

(三) 教师评价应注重教师发展的反馈作用

教师评价理应是一种双向互动的机制,既通过评价教师是否实现既定目标以体现高校作为评价主体对于教师教育行为的导向以及目标和计划的设定,又通过将评价结果反馈给教师以指导教师反思和改进教育行为。换言之,高校要充分发挥教师评价的作用,就要将其作为双向手段,既为高校实现预期的教育目标提供信息反馈,又为教师专业发展赋能^[8]。然而,目前应用型高校对教师的评价主要侧重于管理功能而非服务功能、指导功能、发展功能,高校更多的关注力集中在评估教师教育行为和结果是否达到学校既定的目标,而对评价中教师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及教师能够获得的发展缺乏必要的反馈和分析,无法给教师的发展路径提供有效的帮助和指引。因此,应用型高校必须改变现有的管理观念,转向服务观念、发展观念,注重教师评价中对教师发展的反馈作用。

(四) 教师评价应注重教师群体发展

教师专业发展过程既体现了教师个人的能力、潜力,一定程度上也是教师群体实力和发展趋向的体现。在对教师进行评价时,应适当将教师所在群体的发展效果考虑进来。教师群体可以有多种,如教研室、基层教学组织、学习共同体等,其中高校教师学习共同体既是基于共同愿景的协作关系,又是小规模、跨学科的学习型组织,还是集挑战与乐趣于一体的赋能机制^[9],学习共同体作为高校教师发挥个人人力资本作用的组织,是当前高校教师发展的重要途径^[10]。因此,学校必须通过教师评价等方法对教师群体施加更大的影响,才有可能实现教师群体作用的发挥。通过使用这些方法,学校可以促进教师群体的不断成熟,同时也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不断提升。

三、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应用型高校教师评价策略

(一) 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应用型高校教师评价导向

1. 思政导向

高校对教师的评价取向、评价目标、评价方式对教师的行为起到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为此,高校在教师评价过程中,需要坚持思政导向,将思政育人成效的评价融入到教师评价目标、评价方式、评价过程中,才有可能建立完善的教师评价策略,推动教师专业发展,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体系,将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全面提高育人实效,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2. 系统导向

教师评价及其改革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教育工程,需要注重整体性思维,要以系统思维理解教师评价和改革,对以往的评价理念、评价模式、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过程、评价结果运用等进行改革,通过科学统筹、协同推进,解决评价主体之间协同、评价方式之间整合、评价各环节之间的畅通等问题,采用“整体性”“系统性”理念和行动策略,从评价目标出发,整合多元参与主体,强化发展与合作,实现从“绩效性评价”向“发展性评价”的转变。一方面,相关部门要正确发挥教师评价的指挥棒作用,确保教师评价改革的政策指导、规则裁判和服务保障,让教师评价的价值导向回归正轨。另一方面,高校需要凝聚集体力量,探索符合自身发展和教师发展的教师评价体系和策略。

3. 过程导向

教师评价本身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促进教师发展、学校发展、教育整体发展的一种手段。因此,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师评价必须注重过程导向。在教师评价过程中,要强调教师的主体地位和参与,改变以往外在管理与推动的角度方式,进而采用内在拉动与牵引的方式^[11],加强对教师评价过程、方法、实施和结果反馈的重视,从而帮助教师及时地参考评价信息,促进教育认知的完善和教育行为的改进,实现更为全面的教师专业发展。

4. 发展导向

教师评价的目标是发展,教师评价改革的方向也是发展,在发展视角下,教师评价不应再作为教师短期的、外在的压力,而应当成为教师持续的、内在的动力,应用型高校在教师评价中也相应地需要从行政干预这一角色转变为教师自我反思和自我发展的促进者^[12]。高校要充分利用教师评价促进教师的主动式发展、内在式发展、全面发展,充分考虑教师现有能力和成长潜能、职业发展与生活需要、理论发展与实践激活、理性判断与感情关注,避免简单地将教师评价作为一种评判工具^[4]。

(二) 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应用型高校教师评价策略

1.明确以思政育人为核心

应用型高校教师评价首先要明确以思政育人为核心,要求教师具备正确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求教师方方面面的工作都以提升育人成效为导向,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以德施教、以德育人。这就要求高校在教师评价目标设置、制度建设、宣贯、结果运用等各环节,均将思政育人作为重点,一以贯之,让教师评价回归到教育这一属性上来。在教师评价过程中,应用型高校可以通过选择代表性的先进和典型,积极宣传优秀教师和思政案例,在高校内树立良好的示范,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效应、品牌效应,结合激励、荣誉等强化思政育人成效在教师评价中的运用,在教师群体内塑造鲜明的思政育人风,增强教师群体的使命感,形成良好的教师评价氛围和生态^[8]。

2.构建发展性评价模式

目前国内外广泛应用的考核模式有奖惩性评价和发展性评价两种。奖惩性评价强调考核的量化性,发展性评价则注重考核的过程性。教师发展性评价以激励为主要手段,通过激发教师的内在动力来推动其实现个人成长、群体进步和学校可持续发展^[13],是一种更适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考核模式。高校在坚持发展导向的基础上,应将发展这一核心目标体现在教师评价指标选择、评价过程实施、评价结果反馈等各环节中,使得教师能够以发展取向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并且及时根据评价结果完善和改进自身,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必要、充分的指导、服务和帮助^[8]。因此,应用型高校要构建发展性评价模式,将评价教师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教师评价对教师专业发展的赋能作用。

3.落实多元主体评价

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高校教师评价要落实多元主体评价。除教学管理部门、人力资源部门等传统的职能部门作为评价主体,还要将二级学院、学生、教师、用人单位等都纳入到评价主体当中来。要勇于改变现有教师评价中管理部门强权力、教师弱权力甚至零权力的状况,以重设权力关系的逻辑思考和重建行政管理者和教师之间的关系,以平等关系为取向,提升教师在教师评价场域中的话语权。一方面,在教师评价相关政策和制度设计过程中,要让教师广泛参与进来,在政策和制度中真正体现教师需求、教师发展。另一方面,在教师评价过程中,要持续保持教师的主体地位,无论是评价内容还是评价过程,都需要得到教师的认可与合作,唯有如此,教师评价的发展功能才会被激活,教师才能摆脱传统的被评价、被管理、被束缚乃至被控制的“工具人”角色,从而真正将评价目标内化为自我发展的要求^[8]。

4.丰富评价内容和方式

应用型高校在进行教师评价时,需要持续地完善与改进教师评价的内容和方式。要以思政育人效果为核心,结合教师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成效对其进行评价。在评价内容上,要注重评价教师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以及教育情怀和素养,将师德师风作为评价的重要指标^[13]。同时,要结合不同学科专业的性质和特点,设置适合该教师群体的评价内容和指标。在评价方式上,要综合过程与结果、内部与外部、定性定量,采取部门评议、学校考察、问卷调查、学生反馈、用人单位评价等,多方面、全方位评价教师立德树人效果^[4]。

5.建立动态评价机制

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过程,教师评价也是如此,因此有必要建立动态评价机制,以实现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师评价。不同于静态教师评价主要对教师在某一时点的状态和特征进行评价,动态教师评价强调对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知识技能、综合素养、教育成效进行实时的、连续的、反馈性的评价。对此,应用型高校在坚持立德树人的基础上,结合院校和专业特征,拓展教师及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维度和深度,提升评价的有效性^[8]。通过分期评价、边评边议、可进可退、动态变化的评价机制,促进教师对长期发展、自主发展的重视。

6.形成评价反馈闭环

不少应用型高校在实施教师评价过程中仍然采用传统的管理和静态视角,往往过多关注评价结果,而对评价过程中的反馈重视不足,如此一来不仅评价结果无法全面反映教师立德树人成效,而且削弱了教师持续改进的动力^[13]。因此,必须建立教师评价反馈制度,形成教师评价闭环,以便于教师基于专业发展进行持续的改进。同时,还要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将评价结果与奖惩制度相结合,形成有效激励,鼓励优秀教师、鞭策后进教师,通过促进教师的自我成长,实现个人与学校的同步发展、共同发展^[13]。

四、结语

当前应用型高校教师评价存在导向不明确、评价模式与教师发展不匹配、评价主体较为单一、评价方式多元性不足、评价过程缺乏动态性、评价结果反馈性有限等问题,应用型高校教师评价的导向有所偏移、效能有所不足,无法发挥教师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和对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制约了应用型高校的内涵式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背景下,应用型高校教师评价可以与教师专业发展相互融合、互相促进。新时代背景和教师队伍改革建设趋向赋予了教师专业发展新的时代内涵,应用型高校教师评价对教师专业发展的作用体现在几个方面:有助于反思教师行为、有助于塑造教育认知、有助于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因此,其教师评价应注重思政育人成效、应注重教师自主性发展、应注重教师发展的反馈作用、应注重教师群体发展。基于教师专业发展构建适合应用型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师评价体系,有助于实现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师评价的相互融合、互相促进。

应用型高校教师评价应当建立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师评价体系,完善教师评价机制。应用型高校教师评价应当明确导向,强化思政育人效果,充分体现思政导向、发展导向、过程导向、系统导向,结合自身发展定位,通过构建发展性评价模式、落实多元主体评价、丰富评价方式、建立动态评价机制、形成评价反馈闭环,充分发

挥多元主体评价、多模式评价、混合式评价等的优势,构建多元化、全过程、动态闭环的教师评价体系,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和应用型人才高质量培养蓄能。

参考文献:

- [1]钱程. 高校教师持续专业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9, 38(1): 19-21.
- [2]苗瑾超, 李焯, 郭勤. 以教师专业发展为核心的教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 2022, 41(5): 15-17.
- [3]陈利民, 燕珍, 杜金涛, 等. 基于发展性评价的高校教师教学评价体系构建[J]. 微型电脑应用, 2019, 35(9): 125-127.
- [4]张志红, 李凌艳. 教师评价观念: 内涵、与评价实践的关系及其差异性[J]. 中国考试, 2022(4): 1-9.
- [5]张会庆, 许亚锋, 辛宪民. 学习科学视域下的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发展研究[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2, 40(6): 54-61.
- [6]胡福贞. 失语与喧哗——教师评价实践中的话语现象分析[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2(12): 30-34.
- [7]操太圣, 任可欣. 评价是如何影响高校青年教师专业性的?——以 S 大学为例[J]. 大学教育科学, 2020(2): 111-118.
- [8]陈由登. 教师发展视域下新时代高校教师评价改革研究[J]. 中国成人教育, 2021(19): 24-27.
- [9]朱景梅. 大学教师学习共同体: 内涵、价值及其构建[J]. 当代教师教育, 2022, 15(1): 39-45.
- [10]郭佩文, 彭建平, 曾栋. 高校教师学习共同体的构建机制及其绩效[J].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19, 35(6): 61-73+85+110-111.
- [11]李立国, 赵阔, 王传毅, 等. 超越“五唯”: 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的忧思与展望(笔谈)[J]. 大学教育科学, 2020(6): 4-15.
- [12]王向红, 谢志钊. 大学教师评价: 从“鉴定与分等”到“改进与发展”[J]. 江苏高教, 2009(6): 121-122.
- [13]李梦妍, 牛一农. 新时代高职院校教师发展性评价改革实践研究[J]. 职业, 2023(18): 78-80.

Research on Evaluation Strategies for Applied University Teachers Based on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Liu Yi¹

¹*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eusoft Institute Guangdong, Guangdong, Foshan 528225, China*

Abstract: Teacher evaluation is a measurement and value judgment of the degree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nd it is the discovery of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s its purpose i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literacy. At present, the ori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eacher evaluation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have deviated, making it unable to play the guiding role of teacher evaluation and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This has also constrained the connotative constru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pplied universities. In this regard, the evaluation of applied university teachers should follow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process orientation, and system orientation, as well as tak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the core, constructing a developmental evaluation model, implementing diversified subject evaluation, enriching evaluation methods, establishing dynamic evaluation mechanisms, forming a feedback loop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nd accumulating energy for the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and the high-quality cultivation of applied talents.

Keywords: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eacher evaluation; Applied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新时代提升政党治理能力的内在缘由、主要挑战及实践路径

任江东¹

(1.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摘要: 本文从党内治理这一视角出发, 先简要说明了政党治理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和意义, 然后阐述了提升政党治理能力的内在缘由, 并讨论了在提升政党治理能力过程中主要面临的挑战, 最后探讨了提升政党治理能力在实践上的路径, 认为一是要以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二是要以打造建设学习型政党提高党运用和发展理论的能力, 三是要以坚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保障党和人民的事业稳步前进。

关键词: 政党治理; 政党治理能力; 自我革命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37

一、何谓政党治理

众所周知, 政党是阶级的组织, 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实体, 任何政党要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 体现自己的政治价值, 都需要一个不断加强自身治理, 以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政党治理一般是指一个政党通过对政党精英、政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的管理提升政治活性和政治能力, 进而有效开展各项政治活动的过程。^[1]

从现代政党诞生之日起, 进行政党治理是政党自身为了实现和维护所代表阶级、阶层的政治诉求和切实利益所必然开展的行动。进行政党治理, 也是一个政党为了能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进程中贡献它自身应有力量的活动。此外对于执政党来说, 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 政党通过自身的治理机制, 可以引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方向, 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评估一个政党的治理是否能到达理想的效能, 一方面要看态度, 也就是看政党自身是否能适时、及时发挥历史主动精神, 善于并坚持治理自身出现的问题, 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是否始终引领时代; 更关键的一方面, 是看这个政党与人民的联系是否紧密, 是否站在人民立场思考和解决问题, 能否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 是历史的创造者,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有着崇高政治目标和坚定人民立场的政党来说, 它“必须而且必然是知识和道德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这意味着它要为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在今后的发展, 为实现更高、更完整的现代文明形式奠定基础。”^[2] 如果一个政党以此为目标, 那么为实现这一目标从而进行长期的、系统的政党治理是不可或缺、义不容辞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作为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更高文明形态的中国共产党, 目前正怀揣着这种强烈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二、新时代提升政党治理能力的内在缘由

(一) 有助于实现政党自身的健康发展

一个政党对自身内部出现的不良状态进行治理, 敢于刀尖向内, 这个行为就是对党本身的“自我批评”。而“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再庸俗不过的是沾沾自喜的乐观主义。”^[3]

列宁曾强调: “在我们取得了辉煌战绩之后的下一年中, 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扩大党, 不如说是加强内部工作, 即提高我们全党。”^[4] 我们党是一个大党, 作为一个大党更有必要加强政党治理, 尤其是更应侧重于让党组织成为“质量”上的大党, 为此非常有必要进行党内治理。

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 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这些目的可能被每天的日常工作暂时遮盖起来, 但是, 任何时候都不应失掉作为斗争着的无产阶级的指路明灯的意义。^[5] 要使我们党

作者简介: 任江东(1996—),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作为点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灯塔的党——永葆先进性、充满生命力，继续勇立时代潮头、走在时代前列，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就必须敢于治党、善于治党、严于治党，这样才能使党在践行初心宗旨、完成既定目标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确保党健康发展。

（二）有助于实现同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

当前世界，政党既是国与国之间进行各种交流活动的重要主体，同时它也是绝大多数国家进行国家治理的主导者和任务执行者。政党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又对国家治理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引领作用，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治理。^[6]

政党治理与政党治理现代化同国家治理有着密切的关联。政党治理现代化的程度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的提升，政党治理的效果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效能。现代政党治理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思想观念保障、坚强的组织结构保障、强大的治理能力保障和有效的制度供给保障。^[7]

就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来说，如果疏于政党治理，对纪律松懈、人心涣散、进取乏力的党不进行入木三分的、直击要害的治理举措，那么最后会使自身得不到人民拥护而危及自身执政地位，甚至因此导致国家政治失败而分崩离析。苏联就是前车之鉴。

我们党通过实施有效治理举措，可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密切政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进而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而有效的政党治理策略和取得的政党治理成就，又可以给我们党治理国家提供有益经验支持和提高政党治国理政的信心底气，最终实现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并且可凭借两者的良性互动来推动两者实现协同发展、和谐双赢。

（三）有助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于全世界的人们来说，尤其处于战争和动乱地区的人们来说，一个社会稳定有序、生活欣欣向荣的国家是人人都羡慕和向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8]

首先，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并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其次，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这样有利于实现人民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之后再转化为国家行动；最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进行政党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在各级党组织、各党员的意识形态教育上、在制定各种方针政策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三个方面内在地规定、督促我们党必须一切为了人民利益着想。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多年里，在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已经充分说明了我们是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努力的负责任的大党。站在当下，这使得我们党有底气去继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为过去的丰硕成果已经证明我们党有这个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已经经过百年风霜磨砺，但依旧初心不改的政党能把自身发展得更好，能继续做到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三、新时代提升政党治理能力面临的挑战

（一）内部：监督制度执行不力影响党组织的整体效能

对于任何组织、任何领域来说监督都是极其必要的。我的党历来高度重视党内监督工作，一方面是为了督促各级党组织正常运转，各级党员能认真工作，尽职尽责，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净性，确保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党内监督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成了一句口号。党内监督缺位，必然导致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9]如果不按既定的党内监督制度及时进行监督反馈，一方面会滋生和助长不良风气，影响党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因为要对不良风气及落后分子加以处理，又会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大影响了其他方面的工作计划。

众所周知，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这要求我们持之以恒地在提高制度执行力方面下功夫。为了党的监督达到理想的效果，我们除了认真执行党内监督制度外，还要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监督形式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使我们党变得更好，这也是对党负责应有的态度。

（二）外部：外来思想观念冲击主流意识形态权威

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迈向现代化建设进程,国与国之间的官方、民间交流日益增加。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难免接触到不同于本国的、不同于主流思想的观点,比如西方的普世价值、西方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以及中国威胁论等等,但是要深知,这些错误的思想观念是一些西方资本主义者刻意宣传出来的“谎言”。其中有的言论是在“粉饰资本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假借学术自由,扮装前沿学术,侵蚀主流意识形态,甚至乔装打扮混入主流媒体,借改革之名,行颠覆之实,严重妨害中国共产党的建设。”^[10]他们企图利用这些思想观点干扰、甚至“稀释”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1]意识形态工作关乎国家的政治安全,如果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始终指引着前进方向、凝聚着社会共识,那么这个国家所规划的蓝图就不可能最终实现。

在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的时代,外国的思想观念输入我国的渠道、方式也变得多样起来,对此我们要时刻警惕,并且要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只有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我们才能坚守住、巩固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四、新时代提升政党治理能力的实践路径

(一) 以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规范和加强党内政治生活是政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把党内政治生活过出高质量,就需要要把民主集中制贯穿始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是其中很重要的法宝。这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志。”^[12]

随着我们党带领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部分党员同志也因傲人的成绩而出现懈怠状态,党性修养反思不力,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对党内政治生活敷衍了事。对于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特征,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长期实践证明,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金钥匙’,是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是纯洁党风的‘净化器’。”^[13]

任何行动和任何活动,只有它们是在前进而不是在后退,是从思想上团结无产阶级,提高无产阶级,而不是降低、腐蚀、削弱无产阶级,它们才是有价值的。^[14]我们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规范、严肃地过好党内政治生活,才是“前进的、团结的、有价值的”活动,这种活动才能提高我们党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我们的政党治理是到位的,才有底气、有信心去治国理政。

(二) 以打造建设学习型政党提高党运用和发展理论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组织实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15]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保持党在理论上、实践上先进性的本质要求,也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加强党的建设以更好实现既定目标的必然要求。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自身建设发展的实践成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学习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必须始终贯彻执行的事情。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汗牛充栋,但是我们既要敢于又要甘于去坐“冷板凳”,扎实的、深入的研究学习经典。

二是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实践经验和有益研究成果。学习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面向世界,用交流借鉴的心态去对待其他国家的事物,这样有助于拓宽我们在实践中的工作思路,进而以更快响应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去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同时我们也应明白,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值得我们去借鉴,但是我们也需要对它以检验。正如列宁指出:“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16]

通过这样的虚心学习和不懈努力,我们党才能最终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才能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不断用更切合我国实际的、时代化的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才能增强我们党的生命力和领导力,为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政党力量。

(三) 以坚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保障党和人民的事业稳步前进

作为我们党给出的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历史经验所

得出的重要结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17]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拥有彻底革命精神的政党,能够以大无畏的精神下决心去淬炼自己,把自己建设得坚强有力。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8]

人民的事业就是国家的、民族的事业,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下,世情国情党情都在深刻变化着,为了能干好人民的事业,我们党就必须坚持深入推进自我革命。

一是要坚持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选贤任能,注重德才兼备、以德为主,选拔忠诚干净有担当的干部。二是要健全完善党的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巡视巡查工作,及时发现并纠正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存在的问题;三是要党员干部自身要加强党性修养,增强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在工作中敢于担当,积极贡献。唯有如此,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才能在保证全党步调一致,团结一心,才能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稳步向前推进。

参考文献:

- [1] 陈家喜.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的模式选择[J].江汉论坛,2023(9):31-32.
- [2] (意)葛兰西.现代君主论[M].陈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
- [3] 列宁.列宁全集:第1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34.
- [4]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9.
- [5] 列宁.列宁全集:第1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
- [6] 包心鉴.严格政党治理: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关键要素[J].政治学研究,2021(3):3.
- [7] 刘先春,柳宝军.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政党治理[J].学术探索,2016(5):21.
- [8]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612.
- [9]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27.
- [10] 张国献,程恩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推进路径[J].山东社会科学,2022(1):27.
- [1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47.
- [12] 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48.
- [1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19-520.
- [14]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1.
- [1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05版.
- [16]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1.
- [17]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76.
- [18]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01.

The Intrinsic Reasons, Principal Challeng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Enhancing Party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in the New Era

Ren jiangdong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jiang, Urumqi, 830017

Abstract: This article, adopting the perspective of intra-party governance, first briefly outlines the specific content and significance encompassed by the concept of party governance. It then elaborates on the intrinsic reasons for enhancing party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discusses the principal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this process. Finally, it explores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for enhancing party governance capacity, arguing that: first, it is essential to rigorously implement democratic centralism to invigorate intra-party political life; second, building a learning-oriented party is crucial to enhance the Party's capacity to apply and develop theory; and third, resolutely advancing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is vital to ensure the steady progress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s cause.

Keywords: Party governance; Party governance capacity; Self-reform

百千万工程驱动下高校服务地方文化传播的机制创新

——基于 TTM-2.0 模型的分析

董芳远¹ 颜同宇¹

(1.广东梅州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梅州 514011)

摘要: 在国家“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 高等院校作为地域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 其在文化再生产与传播中的功能日益凸显。本文以广东梅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个案, 聚焦客家文化的高等教育传播机制, 提出并系统阐释“高校课程—课程实践—文化公共化”三阶转化模型(Triadic Transformation Model 2.0, TTM-2.0)。通过梳理文化记忆理论、文化再生产理论及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框架, 界定模型三阶段的理论内涵, 并创新性地将“文化公共化”重构为“延迟性公共化”, 揭示文化传播的长效性特征。研究进一步剖析在校学生积累的文化资本通过“潜势—惯习—再激活”动态机制, 转化为职业生涯中持续性文化传播行为的内在逻辑, 并提炼出可迁移的教学模块设计原则, 为客家文化的活态传承与高校服务地方文化振兴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 客家文化; 百千万工程; 三阶转化模型; 延迟性公共化; 文化资本; 文化传播

基金项目: 2025 年梅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MZSKLX2025098); 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项目 (2024WQNCX264); 梅州市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MZ12YBKT381)。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582

一、高校服务地方文化传播的模型构建

文化自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基石, 而地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保护与传播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环节。梅州作为客家文化的核心发祥地与集大成者, 拥有客家山歌、广东汉剧、客家围龙屋营造技艺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鲜活见证。然而, 在现代化进程中, 客家文化面临传承主体流失、传播渠道单一、青年认同弱化等现实挑战, 高等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主阵地, 其在客家文化传播中的系统性与实效性仍显不足, 具体表现为课程体系碎片化、实践环节与地方文化场景脱节、学生文化传播能力培养缺乏长效机制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 本研究立足广东梅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实践, 构建“高校课程—课程实践—文化公共化”三阶转化模型 (TTM-2.0), 旨在探索地域文化在高等教育场域中“认知—认同—传播”的闭环路径。模型通过整合文化资本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 重点阐释学生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及其向公共传播行为的转化机制, 并创新性提出“延迟性公共化”概念, 回应文化传播中“在校培养”与“社会输出”的时间差问题, 为高校参与地方文化振兴提供可操作的理论框架。

二、核心分析工具应用: 多学科交叉与地方文化

地域文化的教育传播研究已形成多学科交叉的学术图景, 其中文化记忆理论、文化再生产理论与文化资本理论为本文提供了核心分析工具。

阿莱达·阿斯曼 (Assmann, 1992) 的“文化记忆”理论指出, 文化的传承依赖于“定型的记忆媒介”(如文本、仪式、教育体系), 高等教育通过课程与实践将地域文化编码为集体记忆, 是避免文化“遗忘”的关键机制。然而, 现有研究多聚焦记忆的“存储”功能, 对记忆如何通过教育转化为个体的传播行动关注不足。霍

作者简介: 董芳远(1972—), 男, 研究生, 广东梅州梅州职业技术学院, 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

通讯作者: 董芳远

米巴巴 (Bhabha, 1994) 的“第三空间”理论则揭示了文化认同的建构性, 强调教育场域中师生、生生互动对文化意义的再创造, 但该理论在高等职业教育中的具体应用仍缺乏实证支撑。

布迪厄 (Bourdieu, 1986) 的文化资本理论为解析教育与文化传播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他将文化资本分为“具体化形态”(如技能、习惯)、“客观化形态”(如书籍、艺术品)与“体制化形态”(如文凭、证书), 指出教育过程是文化资本积累与转化的核心场域。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 探讨了地域文化资本在高校课程中的嵌入路径(如王宁, 2020), 但研究多停留在课程设计层面, 对文化资本如何通过学生职业发展实现“跨场域传播”的动态机制仍缺乏系统性阐释。

在客家文化研究领域, 现有成果多集中于历史溯源、民俗考证(如罗香林, 1933)或旅游开发中的文化展示(如陈志明, 2018), 而针对高等教育中客家文化传播模型的构建研究较为匮乏。因此, 本研究通过 TTM-2.0 模型的构建, 试图填补三方面空白: 一是整合多理论视角, 构建文化传播的“输入—转化—输出”闭环; 二是提出“延迟性公共化”概念, 解释文化传播的长效性; 三是基于职业院校实践, 提炼可复制的教学范式。

三、模型架构: 三阶跃迁与文化传播

TTM-2.0 模型结构以“高校课程—课程实践—文化公共化”为核心框架, 通过三阶段的递进与互动, 实现客家文化从“校园传承”到“社会传播”的转化。模型的创新点在于突破传统“即时传播”的局限, 强调文化资本积累与公共化行为之间的“延迟效应”, 并通过动态机制确保传播的持续性。1. 模型结构概述 TTM-2.0 模型的三阶段并非线性割裂, 而是通过“反馈循环”形成有机整体: 高校课程为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课程实践反哺课程内容优化, 文化公共化的效果则反向指导课程与实践的调整。1.1 高校课程: 文化资本的系统化输入

此阶段是文化资本积累的基础环节, 旨在通过结构化课程体系实现客家文化的“认知建构”。课程设计遵循“三维一体”原则: 内容维度: 涵盖客家文化的物质层(如围龙屋建筑)、制度层(如宗族治理)与精神层(如“崇文重教”理念), 形成从具象到抽象的知识链条; 形式维度: 采用“理论授课+案例研讨+数字资源”混合模式, 例如通过 VR 技术还原客家迁徙历史, 或引入非遗传承人参与课堂教学; 测评维度: 突破传统笔试, 采用“知识考核+项目成果+文化反思报告”综合评价, 重点关注学生对文化价值的理解深度。1.2 课程实践: 文化认同的情境化建构

实践环节是连接认知与认同的桥梁, 通过“沉浸式体验”实现文化资本的“具体化转化”。具体形式包括: 田野调查: 组织学生深入客家古村落(如梅州大埔三河坝), 记录民俗活动、访谈非遗传承人, 形成《客家文化田野笔记》; 创意转化: 结合职业院校专业特色(如旅游管理、艺术设计), 开展“客家文化 IP 设计”“非遗文创开发”等项目, 将文化元素转化为现代产品; 社区参与: 参与地方文化节庆(如梅州客家文化旅游节), 承担策划、展演等工作, 在服务地方中深化文化认同。1.3 文化公共化: 从“即时传播”到“延迟性公共化”

传统“文化公共化”多强调在校期间的即时传播(如校园文化活动), 而 TTM-2.0 模型将其重构为“延迟性公共化”, 指学生毕业后在职业场域中持续进行的文化传播行为。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包括: 时间延迟性: 传播行为并非发生在校在校期间, 而是滞后于文化资本积累阶段, 与学生职业发展周期同步; 场域多样性: 传播场景从校园扩展至教育、文旅、媒体等多元职业领域, 例如毕业生作为旅游从业者讲解客家文化, 或作为教师开设客家文化校本课程; 效果长效性: 通过职业身份的持续性, 实现文化传播的“滚雪球效应”, 形成比校园传播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2. 核心命题的理论阐释基于上述结构, TTM-2.0 模型提出两大核心命题, 揭示文化资本向传播行为转化的内在规律。2.1 延迟认同强度的影响机制

学生毕业后的文化认同强度并非静态, 而是取决于在校期间的文化资本积累与职业场域的匹配程度, 即:
$$\text{延迟认同强度} = f(\text{在校期间文化资本储量}, \text{毕业后场域匹配度})$$
 文化资本储量: 包括“知识存量”(如客家历史知识)、“身体技艺”(如客家山歌演唱)与“情感认同”(如对客家文化的价值认同), 三者形成相互强化的资本包; 场域匹配度: 指职业环境与客家文化的关联程度(如文旅行业匹配度高于纯技术行业), 匹配度越高, 文化资本越易被激活, 延迟认同强度越强。2.2 公共化行为频率的生成逻辑

延迟认同强度最终转化为具体的传播行为, 其频率受职业场域资源支持的影响, 即:
$$\text{公共化行为频次} = g(\text{延迟认同强度}, \text{职业场域资源支持度})$$
 职业场域资源支持度: 包括组织层面(如单位是否设立文化传播项目)、社会层面(如地方政府是否提供政策扶持)与网络层面(如是否融入客家文化传播者社群); 行

为表现：高频次行为可能表现为“主动传播”（如开发客家文化课程），低频次行为可能表现为“被动响应”（如应要求讲解客家文化），两者共同构成文化传播的连续光谱。四、运行机制：潜势—惯习—再激活 TTM-2.0 模型的有效运转依赖于“潜势—惯习—再激活”的动态机制，该机制解释了文化资本从积累到转化的全过程。1. 潜势 (Potentiality)：文化资本的储备阶段此阶段对应“高校课程”与“课程实践”环节，核心是通过系统性学习与体验，形成可转化的“文化资本包 (Cultural Capital Package, CCP)”。

其构成可表示为： $(CCP = \alpha_1 \cdot \text{知识存量} + \alpha_2 \cdot \text{身体技艺} + \alpha_3 \cdot \text{情感认同} + \epsilon)$

其中， α_1 、 α_2 、 α_3 为各维度权重（通过因子分析确定，通常情感认同权重更高）， ϵ 为随机误差项。例如，一名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 CCP 可能包括：客家历史知识（知识存量）、客家礼仪演示能力（身体技艺）、对客家文化“和而不同”理念的认同（情感认同）。2. 惯习 (Habitus)：文化资本的内化阶段布迪厄提出的“惯习”概念在此阶段发挥核心作用——学生在积累文化资本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稳定的文化认知与行为倾向。例如，长期参与客家民俗活动的学生，可能会将“敬祖睦邻”的客家价值观内化为职业交往中的行为准则。这种惯习具有“场域适应性”：当学生进入职业环境后，会自动筛选与惯习匹配的文化实践，为后续“再激活”奠定基础。3. 再激活 (Reactivation)：文化资本的外化阶段当职业场域出现“触发事件”时，内化的文化惯习被激活为具体的传播行为。其概率公式为： $(P(\text{reactivation}) = \sigma(CCP \cdot \text{Fit}))$

其中，Fit 为职业场域与客家文化的匹配度 (1-5 分)， σ 为 Sigmoid 函数（确保概率值在 0-1 之间）。触发事件包括：地方政府发起的“非遗进校园”项目（政策触发）、工作单位承接的客家文化推广任务（组织触发）、社交网络中客家文化话题的讨论（网络触发）等。例如，一名在梅州本地中学任教的毕业生，可能因学校要求开设“客家文化选修课”（组织触发），激活其在校期间积累的客家历史知识与课程设计能力，形成持续性的传播行为。

四、理论增量：长效传播的文化推进

TTM-2.0 模型通过构建“高校课程—课程实践—延迟性公共化”的三阶框架，揭示了高等教育参与地域文化传播的长效机制。其理论价值在于：一是创新性提出“延迟性公共化”概念，突破了文化传播的时空局限；二是整合文化资本与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解析“教育—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视角；三是基于职业院校实践，验证了“潜势—惯习—再激活”机制的可行性。

在实践层面，模型为高校设计地域文化课程提供了三大原则：

在地性原则：课程内容需深度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如梅州客家文化的“迁徙性”“包容性”），避免泛化；

职业导向原则：实践环节应与学生专业及未来职业场景衔接（如旅游专业聚焦文化解说，设计专业聚焦文创开发）；

长效性原则：建立毕业生文化传播跟踪机制，通过校友网络持续收集传播案例，反哺课程优化。

未来研究可从三方面深化：一是扩大研究对象至不同类型高校（如综合性大学、艺术类院校），比较模型的适配性差异；二是量化分析“延迟性公共化”的效果评估指标，如传播覆盖面、受众认同度等；三是探索数字技术（如短视频、元宇宙）对模型各阶段的赋能路径，提升文化传播的时代性与影响力。

在“百千万工程”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高校应进一步强化“文化传承”与“社会服务”的双重职能，通过 TTM-2.0 等模型的实践，培养既懂专业又通文化的复合型人才，让客家文化等地域瑰宝在乡村振兴中焕发新的生机。

五、结论与前瞻

TTM-2.0 模型的启示并不止于客家文化，也不止于职业院校。任何一所身处地方的高校，只要其课程体系愿意“向下扎根”，都能把区域文化转译为可迁移、可再激活的“文化资本包”。齐鲁大地可以把祭孔礼仪做成文旅策划的脚本，湘西苗寨可以把鼓舞节奏嵌入学前教育专业的音乐教学法，闽南红砖厝可以把榫卯结构转化为建筑工程专业的“非遗 BIM”课程。文化多样性由此不再是“被保护的遗产”，而成为“可增长的资产”；高校也不再是“区域发展的外部变量”，而是“文化生态的内生节点”。

面向未来，我们至少还有两个“下一步”：

第二，启动双循环师资建设。一方面，把非遗传承人、地方志主编、文旅集团策划总监聘为产业导师，让他

们带着真实项目进课堂；另一方面，选派专业教师到县域融媒体中心、文旅投公司、乡镇中心小学挂职，把学术研究写在梅州大地上，形成“高校—地方”双向奔赴的文化传播主力。

第三，创建“区域文化基因库”数字孪生平台。用激光扫描、动作捕捉、声纹识别等技术，把客家山歌的颤音、汉剧的唱腔、围龙屋的夯土墙全部转译为可编程的文化模块，接入元宇宙引擎。学生可以像拼乐高一样调用模块，快速生成“客家文化元宇宙景区”或“虚拟客家文化体验”，实现“文化资本”的指数级增值。

参考文献：

1. Assmann, J. (1992).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王海岳. 文化资本理论研究述评[J]. 南通职业大学学报, 2012(01): 8-12.
3. 胡钦晓. 高校文化资本: 内涵、类型及其特征[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2, 40(07): 24-34.
4. 程猛, 康永久. “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6, 37(04): 83-91.
5. 方梦麟. 两创”背景下客家童谣融入幼儿园课程的路径研究——基于文化生态学视角[J]. 人文与社会学刊, 2025, 1(5): 168-170
6. 仇立平, 肖日葵. 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06): 121-135.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Universities' Services in Local Cultural Dissemination Driven by the "Hundreds, Thousands, and Ten Thousands Project":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TTM-2.0 Model

Dong Fangyuan¹, Yan Tongyu¹

(Guangdong Mei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Meizhou, Guangdong 514011)

Abstract: Against the strategic backdrop of the national "Hundreds, Thousands, and Ten Thousands Project"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s vital carrier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hav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oles in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Taking Guangdong Mei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igher education dissemination mechanism of Hakka culture and proposes and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on the Triadic Transformation Model 2.0 (TTM-2.0) of "university curriculum—curriculum practice—cultural publicization." By reviewing the core frameworks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 and actor-network theory, it define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model's three stages and innovatively reconstructs "cultural publicization" as "delayed publicization," revealing the long-term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The study furth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by which cultural capital accumulated by students on campus transforms into sustaine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behaviors in their professional careers through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potential—habitus—reactivation." It also extracts transferable design principles for teaching modules,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radigms for the living transmission of Hakka culture and universities' services in loc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Hakka culture; Hundreds, Thousands, and Ten Thousands Project; Triadic Transformation Model; delayed publicization; cultural capital; cultural dissemination

从国家基石到战略选择：奥地利中立政策的演进与挑战 (1955-2025)

王国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2488)

摘要: 奥地利的中立政策确立于冷战时期, 并已持续七十年。该政策并非静态不变, 而是在国内外政治压力的共同作用下不断经历重构与调适, 表现为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其内涵从冷战时期基于《奥地利国家条约》的“积极中立”, 逐步转向后冷战时代更具适应性的“后中立”。自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奥地利的中立政策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国内外交界关于是否放弃中立或采取更具灵活性的中立模式的讨论也随之兴起。

关键词: 奥地利; 永久中立; 俄乌冲突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23

“中立 (neutrality)” 作为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中的一个历史悠久且具有复杂内涵的概念, 是国家在战争状态下互动与博弈的产物, 体现为非冲突方为应对战争和武装冲突所采取的一种制度性安排。现代意义上的“中立”主体为主权国家, 指在两个或多个国家发生战争或武装冲突时, 非交战方所秉持的不参与军事行动、不向任何交战方提供军事支援的法律地位与政治立场。19 世纪中期以前, 中立规则主要体现为国际习惯法, 尚未出现成文性法律文件。直至 1856 年, 英国、法国等七国签署《巴黎会议关于战时海上国际法宣言》(以下简称《巴黎宣言》), 历史上首部专门规定中立制度的国际公约方才诞生。继《巴黎宣言》之后, 1907 年在海牙缔结的《关于国家间发生战争时中立国及中立人员的义务与权利的公约》中, 中立概念成为法律, 中立单纯意味着一个国家不参加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后至 1909 年在伦敦制订的海战宣言等国际协定, 直接或间接地规范战时中立的权利与义务。^[1]

国际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在其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中, 将中立国称为“extra bellum positae” (处于战争之外的国家), 并提出中立制度的两项基本原则。在此理论基础上, 逐步形成现代中立制度的核心内涵, 即一国在国际冲突中应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与行为。中立国须承担以下义务: 不参与战争行动、不向任何交战方提供支持、禁止交战国使用其领土作为军事基地或过境通道、不加入军事联盟等。相应地, 交战国亦须尊重中立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不得在其领土内开展军事行动。

一般而言, 中立国分为“战时中立国”与“永久中立国”两类。战时中立国仅在某一具体冲突中保持中立, 承担相应法律义务, 该中立状态仅对当前冲突有效, 对该国在未来冲突中的立场不具约束力。而永久中立国则须在战时与平时时期皆恪守中立原则, 通常通过国际条约或单边声明承担永久中立的义务, 承诺不主动发起战争, 并始终保持中立地位。学术讨论中的“中立”多指永久中立。2024 年, 随着瑞典与芬兰相继放弃其中立政策, 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永久中立国仍为五个, 即瑞士、奥地利、爱尔兰、哥斯达黎加及土库曼斯坦。

奥地利的中立政策是冷战时期一项具有特殊地缘政治背景的外交实践, 既诞生于东西方对抗的历史语境, 又在欧洲秩序转型中展现出显著的制度韧性。该政策不仅保障奥地利从四国占领中恢复完全主权, 也深刻塑造了其独特的国家身份与国际形象。目前国内关于奥地利中立历史研究已形成较为丰富的学术积淀, 主要集中在冷战时期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的政策演进。王海霞^[2]、海城^[3]、林荣远^{[4][5][6][7]}等学者在 20 世纪末便对奥地利在二战后确立永久中立地位的历史进程、政策特征及其在冷战后所面临的挑战与调适进行了系统分析。朱振优从新古典主义出发, 探讨了 1989-1999 年奥地利中立的转变。^[8]另外, 一些综合性研究《大变局中的中立国路在何方》^[9]《集体安全机制下中立制度的价值研究》^[10]《永久中立国生存模式研究》^[11]等也在探讨中立制度演进过程中对奥地利的中立实践进行了梳理。相较而言, 国外学界对奥地利中立历史的研究则更显系统与全面。针对 1955 年奥地利

作者简介: 王国璋 (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

通讯作者: 王国璋

中立制度的确立有索罗金的《1955年奥地利的中立政策：是德国的范例还是冷战现象》^[12]、贝格尔的《从不结盟到中立：奥地利在首次东西方关系缓和历程的研究》^[13]等；针对冷战期间奥地利中立的发展则有施密德尔《冷战时期“温和中立”政策》^[14]、韦蒂格《和平共处还是铁幕政策？奥地利、中立政策以及冷战与缓和时期下的东欧局势》^[15]等；冷战后相关研究则有莱文特《1989-2017 奥地利的安全认知与安全政策》^[16]、波谱拉夫斯基的《冷战后奥地利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立情况》^[17]等研究。

在1955至2025年的七十年间，奥地利中立政策为研究中小国家在大国博弈中寻求战略自主提供了典型范例，同时也反映出“中立”这一概念在国际法规范与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的复杂张力。作为奥地利国家身份的基石，其中立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过动态调适。从冷战初期为换取主权独立而采取中立立场，到当前面对俄乌冲突所带来的新挑战，其政策内涵与实践方式均不断演进。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奥地利中立政策的历史演变、制度机制与内在矛盾，从而为理解后冷战时代中立政策的功能与局限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一、中立之基石：起源与冷战时期的实践（1955-1991）

奥地利位于欧洲中心地带，与德国、瑞士、意大利、匈牙利等国接壤，地处欧洲东西与南北交通枢纽，历史上因其战略位置而屡屡成为大国争夺的对象。奥地利的中立构想源于两次世界大战后其国际地位与国家实力的变化以及敏感的地缘政治环境。奥匈帝国最后一任首相、奥地利著名的法学家和国际法学家亨利希·拉马什在1919年3月就曾经主张奥地利应该效仿瑞士的模式，确立永久性中立地位。^[18]1938年被德国吞并之前，奥地利部分政治人物也提出了一系列中立方案。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作为纳粹德国的一部分参与战争，其中立构想被迫中断。

二战后，奥地利被美、苏、英、法四国分区占领。为恢复国家独立与完整主权，在日益尖锐的美苏对抗中谋求生存空间，并基于其地理条件与实力局限，奥地利将中立提上实践议程。1953年，新上任的总理朱利叶斯·拉布明确提出以中立换取国家主权恢复与占领军撤离。此外，曾于二战期间流亡瑞典的奥地利外交部国务秘书布鲁诺·克赖斯基，深受瑞典中立模式影响，其与周围一批中立倡导者在国内积极推动中立理念，为政策落地奠定了民意基础。在国际层面，赫鲁晓夫执政后苏联外交政策由斯大林时期的强硬对抗转向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长期非军事竞争，奥地利的中立进程由此获得苏联支持。美国则在未能将奥地利纳入全球反共体系之后，转而将其定位为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缓冲带，试图塑造一个亲西方的中立国。

在此背景下，1955年5月，四国与奥地利共同签署《重建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国家条约》（以下简称《国家条约》），承诺尊重奥地利主权与领土完整。条约核心条款包括：恢复奥地利完全主权、禁止德奥合并、解散一切纳粹组织并明确规定奥地利不得加入任何军事同盟且不得允许外国在其领土驻军。这些条款表面上恢复了奥地利主权与独立，实则折射出冷战初期大国地缘博弈的妥协：苏联希望获得与北约之间的缓冲国，西方则意图阻止共产主义势力西扩。根据条约，四国占领军于1955年10月25日全部撤离。翌日，奥地利国民议会通过《中立宣言》，以宪法形式确立“永久中立”原则，且该日此后成为奥地利国庆日。该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奥地利以对外独立且领土不可侵犯为宗旨，自愿宣布为永久中立国”，并承诺“不加入任何军事同盟，不允许外国在领土设立军事基地”。这一法律表述涵盖两个关键维度：形式上强调“自愿”以彰显国家主体性，实质上接受“永久约束”以换取安全保障。

在成为永久中立国初期，为争取国际社会承认并避免误解，奥地利政府多次对其中立立场进行详细阐释与限定。奥地利政府将中立严格界定于军事领域，仅承担与战争相关的中立义务，强调奥地利为“不受任何义务约束的自由国家，它的中立纯粹是军事性质的”。^[19]然而，1956年苏联镇压匈牙利“十月事件”及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均凸显奥地利东部边境所面临的安全威胁，促使奥地利重新评估其安全战略。此后，奥地利政府根据冷战现实，推出一套“积极中立政策”，尝试将中立理念拓展至非军事领域，以达到生存和稳定的目的。该政策在冷战期间主要体现于以下三方面：

（一）借助永久中立国身份，充当东西方阵营之间的沟通桥梁

奥地利在外交实践中注重维持与两大阵营的等距关系，既不加入北约，也不参与华约，而是同时与美苏保持友好往来。奥地利将美国称为“西方国家中最亲密的朋友”，强调彼此间“建立了高度信任”；同时亦将苏联视作“最可靠的经济伙伴”，认为奥苏关系是“欧洲稳定的重要因素”。^[20]另一方面，奥地利也会对美国与苏联的一些国际政策进行谴责，批评两国的霸权政策、军备竞赛、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等。这种平衡策略不仅保障了奥地利在冷战中的国家安全，还使其频繁扮演阵营间的调停者与斡旋者角色。1961年，奥地利促成美国总统肯尼迪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晤。奥地利还与芬兰共同主持多轮美苏战略武器限制谈判。自1972年起，奥地利作为中立国积极参与“不结盟国家集团”（N+）及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常以调解人身份出现，并于1973年至1989年间担任中欧裁军谈判（MBFR）的东道国。1979年，奥地利在维也纳主办第二轮战略武器谈判，美国总统卡特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此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尽管奥地利的桥梁角色更多是对冷战格局的被动适应而非主动塑造，但它无疑为两大阵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中立交往空间。这一角色是策略性中立与地缘现实结合的产物，其虽未能根本改变冷战结构，却为降低冲突风险、

推动局部合作提供了务实路径。凭借灵活外交与中性身份，奥地利成功在大国博弈中开辟出独特的生存空间，成为跨阵营交流的“润滑剂”。

（二）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外交与国际机制

奥地利在恢复独立后不久即申请加入联合国。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要求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采取一致行动，并参与联合国对侵略者采取的军事行动，与奥地利的中立义务存在潜在冲突，但奥地利将其中立解释为“联合国框架内的中立”，承认《联合国宪章》第一〇三条规定的义务优先性，即安理会依第七章作出强制决议时，其中立义务需让位于集体安全责任。该立场逐渐获得国际社会默认。此外，1955年5月签署的《国家条约》序言中，四国均对奥地利加入联合国表示支持，为其扫清了法律与政治障碍。对奥地利而言，加入联合国是对其主权与国家身份的最终确认，标志着奥地利彻底摆脱战败国与占领国地位，实现国际社会的全面回归。同时，联合国也为奥地利践行其中立政策提供了重要平台。

1970年代，奥地利成为联合国中最活跃的成员国之一，广泛参与各委员会事务，并于1973-1974年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库尔特·瓦尔德海姆曾连续两届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为强化维也纳作为国际会议中心的地位，奥地利政府斥资4.96亿美元、历时六年建成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于1979年8月交付使用，吸引了众多联合国下属机构入驻，推动维也纳向“国际组织之都”转型。此外，奥地利在国际争端调解、利益代理及人道援助等方面也作出显著贡献，如应联合国请求派遣人员参与1960年刚果行动（ONUC）、1972年西奈半岛行动及1974年戈兰高地行动等。

此外，奥地利积极在联合国框架下加入各类国际组织并参与全球事务。为推动维也纳成为“联合国城”与“国际组织总部聚集地”，奥地利鼓励国际机构设立总部于此。例如，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自1957年将总部设于维也纳，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亦于1965年落户。正如奥地利前总理克赖斯基所言，在政治和安全角度，维也纳吸纳众多国际组织就像储备战略型武器一样重要。他还声称，高级会晤和其他的国际会晤无疑加强了奥地利的中立地位，这种会晤和联合国机构的出现本身对奥地利来说就是一种安全因素。^[21]

（三）重视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在中立框架下审慎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

冷战期间，作为欧洲国家，奥地利在坚持不加入北约与华约的基础上，与周边国家推行睦邻友好政策，并在不违背中立原则的前提下有限参与欧洲事务。1956年，奥地利加入欧洲理事会，继而于1958年批准《欧洲人权公约》，正式获得该公约的缔约国身份。受《国家条约》禁止奥地利与德国建立任何形式政治或经济同盟的限制，奥地利无法直接加入欧洲共同体。因此，奥地利转而与英国、丹麦、瑞士等六国共同发起成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通过加入该组织，奥地利在恪守政治与军事中立原则的同时，借助这一较欧洲共同体更为宽松的经济合作框架，积极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以推动本国经济繁荣。此外，奥地利还主动寻求与欧洲共同体建立联系。在面临苏联压力的背景下，经过长达十年谈判，奥地利于1972年7月与欧洲共同体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从冷战期间奥地利中立政策的实践来看，中立已成为其国家主权的重要保障与经济繁荣的基石。凭借中立地位，奥地利成功避免了如德国或朝鲜半岛般陷入国家分裂的命运，实现了完全独立与主权完整。作为奥地利第二共和国国家认同的核心，中立政策帮助该国摆脱历史包袱与战争阴影，重塑了国民的国家意识与自豪感。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奥地利的中立政策严格遵循《国家条约》的法律框架，并主动将中立从军事领域拓展至经济、文化等方面，使其不仅成为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的盾牌，也发挥了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作用。

二、重新定义中立：后冷战时代与后中立（1991-2022）

在冷战时期，中立政策成为奥地利保障国家独立与主权完整的战略性工具。通过始终坚持中立原则，奥地利成功塑造了其中立国的可靠形象，并借此积累了显著的外交资本与国际影响力。然而，随着冷战结束与苏联解体，奥地利所面临的外部安全环境发生结构性转变。东西方阵营对峙的终结，彻底改变了奥地利中立政策所依赖的地缘政治基础。美苏关系的缓和显著降低了奥地利对两极对抗的敏感性，也使其传统中立面临根本性挑战。后冷战时代的奥地利中立不再仅是国家生存的“防御盾牌”，而更多转变为积极参与国际多边体系的“合作工具”。其内涵与实践方式也面临着重新阐释与转变。

随着传统军事威胁相对减弱与非传统安全议题——如移民、环境、经济安全、恐怖主义及南北发展不平等都日益突出，奥地利的安全观念逐步从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中立转向更广泛的“软安全”理念。在这一背景下，奥地利在坚持军事不结盟原则的同时，积极适应区域一体化特别是安全与防务合作的发展，不断重新诠释中立的边界。然而，随着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化，奥地利终须在彻底放弃中立与全面融入区域机制之间做出选择。

（一）加入欧盟与经济中立的终结

奥地利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早有参与意愿，但受《国家条约》中禁止与德国结盟的规定及苏联的反对所限，一直未能推进。冷战末期，尤其是1989至1990年间，国际格局剧变与苏联势力收缩为奥地利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奥地利政府决定放弃冷战时期所奉行的“积极中立”政策中的经济中立原则，积极谋求加入欧共体。

1989年6月29日，奥地利议会以175票赞成、7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申请加入欧盟的决议。同年7月17日，外交部长阿洛伊斯·莫克正式在布鲁塞尔提交申请，开启入盟谈判。为化解中立身份与欧盟经政一体化之间的矛盾，奥地利提出：若欧共体十二个成员国早在1955年即承认其中立地位，则当前应可接受其参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并主张中立与成员国身份可以兼容。奥地利政府还于1993年11月重新对永久中立作出狭义解释，将其限缩为三项核心义务：不参与战争、不加入军事联盟、不允许外国驻军。该界定回归《国家条约》的军事中立原旨，为入盟清除了法理障碍。

针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出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奥地利虽意识到其与中立存在冲突，但因该政策当时仍属构想阶段，奥方采取“有意的沉默”策略，暂不深究兼容性问题。1994年6月12日，奥地利举行入盟公投，投票率达83.4%，其中66.6%的选民支持加入欧盟。1995年1月1日，奥地利与瑞典、芬兰一同正式加入欧盟。

加入欧盟并未改变奥地利中立的国家象征与宪法地位，但其内涵已转向更灵活、动态且高度合作化的模式。奥地利也由此从冷战时期的东西方“桥梁”，转型为欧盟内部的积极参与者与制度塑造者。

（二）参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及与北约有限合作

东欧剧变与海湾危机推动欧盟成员国追求更具一致性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首次将外交与安全政策纳入欧洲一体化框架，此后，欧盟先后通过《阿姆斯特丹条约》（1997）加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尼斯条约》（2000）突破欧盟共同外交，并以《欧洲宪法条约》（2004）规定设立欧盟外交部，达到了欧盟共同外交合作的顶峰，最终《里斯本条约》（2007）基本上维护了冷战结束以来欧盟共同外交建设的成果。

奥地利加入欧盟时，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还处于较低发展水平，因此即便中立国需要考虑中立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兼容性，但总体而言矛盾性相对较小。但加入欧盟后随着其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不断深入，中立国需要对自身中立做出最新的解释。

在入盟过程中，奥地利对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与中立的不兼容，在联邦宪法中特增加一条特别条款（第23条），规定奥地利参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不会受到“中立法”的阻碍。针对《阿姆斯特丹条约》将“彼得斯堡任务”（人道救援、危机处理、维和等）纳入CFSP，奥地利1998年修宪增设第23f条，以承接相关义务。对于《尼斯条约》提出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ERRF），奥地利同意派遣人员参与，但明确反对欧洲联合防务体系。《里斯本条约》推出“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后，奥地利以务实且灵活的态度选择性参与符合自身利益且不根本损害中立原则的项目。

如果说奥地利参与CFSP尚可以“军事不结盟”加以解释，其与北约的合作则更深层挑战中立的军事中立内核。1990年代北约两度东扩后，奥地利被北约成员国包围，北约成为其安全架构中的重要要素。1995年，奥地利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fP），双方依据多项协定在危机管理、维和与重建等领域开展合作，但奥地利不承担集体防御义务。奥地利与北约形成一种“在不结盟中寻求合作”的模式：它并非北约成员国，并将此视为国家身份核心，但同时作为高度可靠的伙伴积极参与与北约领导的行动。这种合作建立在务实利益与严格法律框架基础之上。

（三）积极参与国际维和与冲突治理

后冷战时期，奥地利显著扩大对其国际维和行动的参与。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多国部队发起“沙漠盾牌”行动。为应对联合国授权行动所带来的法律与政策调整，奥地利议会修订《战争物资法》与《刑法》，规定经联合国批准的军事行动不视为战争行为，奥地利在履行集体安全义务时也不违背中立。此举为其参与国际行动提供法理依据。

不同于冷战时期仅提供后勤与医疗支持，奥地利开始派遣建制部队参与联合国及欧盟领导的维和行动。例如，奥地利曾派遣380名士兵加入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UNDOF）驻守戈兰高地；参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UNIFIL）；在欧盟“肯考迪娅”行动中派遣轻装人员，并在欧盟“木槿花”行动中派出大量士兵且由奥地利军官担任指挥职务。

由此可见，后冷战时期的奥地利中立已不再是两极格局下求生存的“盾牌”，而转变为在多边主义框架内提升安全、彰显价值、贡献国际社会的政策工具。这一调整为奥地利应对后续国际危机包括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奠定基础，同时也体现出其在适应新时代过程中所展现的制度韧性与外交灵活性。

三、压力测试：俄乌冲突与中立的未来辩论（2022-2025）

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对欧洲安全格局造成深远影响，也使奥地利的中立政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冲突初期，奥地利在政治与外交层面与美欧立场保持一致，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并在联合国相关决议中多次投下赞成票。与此同时，奥地利亦尝试发挥其中立国的调解作用，例如奥地利总理内哈默2022年4月

访问莫斯科并与普京会谈，成为冲突爆发后首位访俄的欧盟国家领导人。

奥地利在应对俄乌冲突过程中，对其传统“永久中立”政策作出一定调整，试图在国家利益、欧盟成员国义务与外交灵活性之间寻求平衡。作为欧盟成员国，奥地利支持多轮对俄制裁方案，但在能源领域对全面禁运俄罗斯天然气持审慎态度，主张实施“聪明制裁”，并考虑在战后恢复进口俄天然气。在军事援助方面，奥地利恪守不直接参与冲突的原则，仅向乌克兰提供非致命性装备（如头盔、防弹衣）及人道主义支持，但不提供致命性武器。由此可见，其中立政策虽未使奥地利完全超脱于冲突之外，但为其提供了应对空间与政策弹性，使其能够在欧盟集体行动与国家利益之间进行务实权衡。这种“有限参与”模式体现了奥地利在新时代对中立政策的新诠释，但也引发国内外诸多争议与压力。

2022年2月24日爆发的俄乌冲突不仅重塑欧洲安全秩序，也对欧洲传统中立国产生重大冲击。一向秉持中立政策的瑞典和芬兰于2022年5月18日正式申请加入北约，标志着其长期中立政策的终结。这一举动在奥地利国内引发关于是否放弃中立的广泛讨论，并对中立制度的合法性及适用性提出更深层次的质疑。然而，奥地利与瑞典、芬兰的中立立场存在显著差异：后两者的中立缺乏如奥地利般由国内宪法与国际条约共同保障的法理基础，因此其中立调整并未引起剧烈的国际法与国内制度变动。此外，奥地利地处欧洲腹地，不与俄罗斯接壤，所受直接安全压力远低于北欧两国，民众及主流政党均缺乏加入北约的迫切意愿。尽管如此，瑞典和芬兰放弃中立无疑对中立制度构成重大冲击，折射出在后冷战时期欧洲一体化、科技进步与战争形态演变的背景下，传统中立制度正面临严峻挑战。这一趋势也为奥地利的中立政策敲响警钟。

2025年7月26日，奥地利外交部长贝亚特·迈因尔-赖辛格在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仅靠中立无法保护我们免受俄罗斯威胁，奥地利必须考虑加入北约。”她特别指出俄罗斯通过网络攻击和虚假宣传发动的“混合战争”已使传统中立政策失效。这一言论在奥地利国内外引发广泛关注，被视为俄乌冲突背景下国内安全焦虑与政策反思的具体表现。

然而，中立作为奥地利国家认同的核心组成部分，仍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2025年8月的最新民调显示，仅约16%的受访者支持加入北约，而高达71%的民众主张继续保持中立。多数民众视中立政策为国家身份的重要象征与历史遗产，反对轻易放弃。因此，赖辛格的提议并未获得主流民意支持。

从国内政治格局来看，目前奥地利政府是2025年由奥地利人民党（ÖVP）、社会民主党（SPÖ）和新奥地利党（NEOS）三党组成联合政府。赖辛格所属的新奥地利党在国民议会中仅获9%的席位，是五大政党中唯一明确主张放弃中立、推动加入北约的力量。其他主要政党均持保留态度：人民党（ÖVP）强调务实调整而非放弃中立；社会民主党（SPÖ）主张在名义上保持中立的同时深化安全合作；自由党（FPÖ）坚决捍卫中立传统，反对北约成员身份；绿党则倾向于保留中立但强化“积极中立”内涵。由此可见，放弃中立并非当前奥地利政坛的主流意见。

此外，奥地利若放弃中立并加入北约，将面临以下四大挑战：首先是中立作为奥地利国家认同与历史遗产，中立已深入国家意识与历史叙事，其变更可能引发社会分裂与认同危机；其次是奥地利地缘安全紧迫性不足，作为内陆国家，奥地利地缘环境相对缓和，周边多为北约成员国，缺乏加入的紧迫性；第三，加入北约须将军费提升至GDP的2%，对目前仅占1%的奥地利财政构成沉重负担；最后，宪法修订门槛极高，中立原则载入宪法，修宪需获得超高多数民意与议会支持，依据当前民调几乎不可能实现。

赖辛格的主张虽为少数派观点，但仍具有警示意义，反映出俄乌冲突背景下奥地利中立政策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这场冲突标志着奥地利中立进入一个新的调整阶段，其未来走向将取决于国内政治博弈与国际安全环境的演变。

总之，奥地利的中立政策是其独特历史经验与国家身份的象征，并非静态教条，而是在内外部压力下不断被重新诠释与调适的动态体系。未来，奥地利很可能继续在“永久中立”的法律承诺与现实政治的需要之间寻求艰难而必要的平衡。

参考文献：

- [1] 夏国涵. 围城中的金丝雀: 国际博弈中的中立国[J]. 世界文化, 2022, (09): 5.
- [2] 王海霞. 奥地利的永久中立政策及当前面临的挑战[J]. 国际观察, 1998, (04): 28-30.
- [3] 海城. 奥地利的中立[J]. 国际问题研究, 1984, (01): 46-51.
- [4] 林荣远. 奥地利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刍议——兼论其他欧洲主要中立国家的处境[J]. 西欧研究, 1991, (05): 18-24.
- [5] 林荣远. 奥地利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刍议(续)[J]. 西欧研究, 1991, (06): 45-54.
- [6] 林荣远. 奥地利和瑞士的永久性中立——两国中立政策的比较[J]. 欧洲, 1993, (03): 6-14+78.
- [7] 林荣远. 奥地利和瑞士的永久性中立——两国中立政策的比较(续)[J]. 欧洲, 1993, (04): 33-41.
- [8] 朱振优.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视角下奥地利中立政策的转变（1989-1999）[D]. 外交学院, 2023.
- [9] 程卫东. 大变局中的中立国路在何方[J]. 人民论坛, 2023, (14): 84-88.

-
- [10] 赵明宝.集体安全机制下中立制度的价值研究[D].吉林大学,2014.
- [11] 童宇.永久中立国生存模式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9.
- [12] Sorokin A .Austrian Neutrality of 1955: A Model for Germany or the Phenomenon of the Cold War?[J].Vestnik Volgogradskogo gosudarstvennogo universiteta Serija 4 Istorija Regionovedenie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ja,2019,(5):222-235.
- [13] Gehler M .From Non-alignment to Neutrality: Austria's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First East-West Dente, 1953 – 1958[J].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2005,7(4):104-136.
- [14] Schmidl A E .Lukewarm Neutrality in a Cold War? The Case of Austria[J].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2016,18(4):36-50.
- [15] Wettig G .Review: [Untitled]:Peaceful Coexistence or Iron Curtain? Austria, Neutrality,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Cold War and Détente, 1955-1989[J].Osteuropa,2011,61(4):147-148.
- [16] Levente T M .The security perception and security policy of Austria, 1989 – 2017[J].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2021,37(1):66-79.
- [17] Pop awski, D. (2020) "Neutrality in Austria' 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Studia Europejskie – Studies in European Affairs, 2/2020, pp. 105-120.
- [18] 朱振优.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视角下奥地利中立政策的转变 (1989-1999) [D].外交学院,2023: 39.
- [19] 王儀.奥地利中立化以后 [J].《世界知识》,1955(18): 13.
- [20] [21] 王海霞.夹缝中的生存之道——奥地利的永久中立政策[J].当代世界,1998,(08):24-26.

From National Cornerstone to Strategic Choice: The Evolution and Challenges of Austria's Neutrality Policy (1955-2025)

Wang Guozh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Abstract: Austria's neutrality policy, established during the Cold War, has endured for seven decades. This policy has not remained static; instead, it has continually been reshaped and adapted under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ressures, representing a dynamic and evolving process. Its core meaning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active neutrality" based on the Austrian State Treaty during the Cold War towards a more adaptable "post-neutral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in 2022, Austria's neutrality policy has faced even more severe challenges, sparking renewed debate within the country's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circles over whether to abandon neutrality altogether or adopt a more flexible model of neutrality.

Keywords: Austria; Permanent Neutrality; Russia-Ukraine Conflict

不完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困境与出路

赵超

(山东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00)

摘要: 数字经济背景下, 不完全劳动关系作为游离于标准劳动关系与民事关系之间的新型用工形态, 正深刻冲击传统劳动权益保障体系。本文立足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 系统剖析该用工模式在性质认定、权利保障、司法适用中的深层矛盾。研究发现, 传统劳动法从属性认定标准难以适配算法控制下的劳动形态, 劳动基准保护缺位、社会保障体系僵化与司法裁判尺度分裂, 共同构成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三重困境。为此, 需通过立法确立技术从属性认定维度、构建去劳动关系绑定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平台协同治理与司法算法审查, 实现弹性用工与权益保障的动态平衡, 推动数字时代劳动权益保障范式革新。

关键词: 不完全劳动关系; 劳动者权益保障; 算法控制; 劳动关系认定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27

一、不完全劳动关系劳动权益保障的理论基础

(一) 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概念与性质认定

不完全劳动关系是数字经济催生的特殊用工形态, 其核心特征体现为劳动控制权与风险承担的非对称分配。平台借助算法技术、评分机制与格式合同条款, 对劳动过程实施隐形且高强度的控制, 却通过自雇者身份界定将用工风险转移给劳动者。国际劳工组织将其定义为依赖性自雇, 精准揭示劳动者形式自主与实质依附的核心矛盾, 劳动者虽可自主决定接单与否, 但经济生存能力高度依赖单一平台, 劳动行为始终受算法规则的隐性约束。

传统劳动法以人格从属性为核心认定标准, 强调雇主对工作时间、场所、方式的直接控制, 但众包模式下, 平台通过算法调度、数据监控、用户评价等技术手段构建的技术从属性, 已成为劳动控制的主要形式。^[1]这种新型从属性突破传统理论的单一维度, 使得不完全劳动关系呈现人格从属性弱化、技术从属性强化的鲜明特征, 也因此难以被传统劳动关系或民事关系的二元框架所涵盖, 亟需在理论层面重新界定其内涵与边界。

学界对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法律性质存在三种核心争议观点, 但各有理论局限与实践适配难题。劳动法调整说主张将其纳入劳动法保护范畴, 德国学者魏德士提出的经济依赖性剥削标准与我国学者林嘉强调的新型从属性理论, 虽抓住平台控制的实质, 但过度扩张劳动法适用范围可能抑制数字经济的灵活性, 且难以应对众包模式中劳动行为的碎片化特征。中间类型说倡导创设独立于传统二元关系的第三类主体, 意大利准从属劳动制度与我国学者王全兴提出的类劳动者概念, 试图通过有限权利保护实现平衡, 但实践中面临权利边界界定模糊、制度衔接成本高昂等问题, 如类劳动者的工伤保险与休息权如何与现有制度兼容仍缺乏明确路径。^[2]合同法调整说主张通过民事合同规则完善权益保障, 美国学者 Harris 提出的数据驱动型服务合同理论, 虽注重保留用工弹性, 但民事合同的平等性假设与不完全劳动关系中主体地位的实质不平等存在本质冲突, 单纯依赖商业责任险与仲裁机制难以弥补劳动者的弱势地位。

(二) 不完全劳动关系与众包模式的内在关联

众包模式作为不完全劳动关系的主要载体, 其技术逻辑与组织形态从根本上重塑劳动过程的运行机制, 也直接加剧权益保障的困境。在组织形态上, 平台通过三层架构刻意规避用工责任, 以服务协议将劳动者登记为个体工商户, 切断直接劳动关系; 借助外包公司、代理商转移用工主体, 模糊责任归属; 用算法中介替代传统人工管

作者简介: 赵超(2000—),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劳动法

通讯作者: 赵超

理，制造去雇主化的虚假表象，使得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征被形式化的合同安排所遮蔽。^[11]

在劳动过程层面，众包模式将完整的劳动流程解构为离散的任务单元，劳动者需在算法设定的极短时间窗口内决定是否接单，看似享有自主选择权，实则因收入依赖而陷入被迫自主的困境。同时，平台通过GPS定位、App活跃度监测、配送时效考核等技术手段，对劳动者实施全景式数字监控，每单配送的时效、服务评价等数据均被纳入算法评分系统，直接与接单权限、报酬标准挂钩，形成无形的数字鞭策，其控制强度甚至超过传统工厂的考勤管理。

在风险分配机制上，众包模式实现风险的彻底外部化。平台作为劳动过程的组织者与主要受益者，将本应由企业承担的市场风险、安全风险全部转移给劳动者，形成平台获利、劳动者担险的失衡格局，这也是不完全劳动关系中权益纠纷频发的核心诱因。

（三）劳动权益的基本理论与法律依据

不完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理论基础，本质上是对控制与责任相匹配原则的坚守。平台通过算法派单、罚款规则、评分机制等技术手段，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实施实质性控制，即便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已构成事实上的劳动支配关系，理应承担相应的保护责任。这种责任不能因形式化的合同约定而免除，正如劳动关系的认定应穿透合同表象，回归劳动实质。

风险与收益对等原则是权益保障的另一重要理论支撑。平台凭借众包模式实现低成本扩张与高效运营，获取丰厚的经济收益，却将职业伤害、收入波动等风险完全转移给劳动者，违背公平正义的基本法理。例如，骑手在配送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时，平台不能以自雇者身份为由免责，而应根据其控制强度与收益比例分担医疗费用与赔偿责任，避免劳动者独自承受职业伤害的后果。

此外，程序正义与实质公平的双重诉求，要求平台保障劳动者的知情权与申诉权。算法规则的不透明性是不完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重要困境，平台应向劳动者公开算法的核心逻辑、评分标准、报酬计算方式等关键信息，建立有效的申诉机制，禁止利用算法随意压低单价、变相克扣报酬，确保劳动者获得与劳动付出相匹配的公平待遇。这些理论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结论，数字技术带来的用工形态创新，不能成为削弱劳动者权益的理由，法律应通过制度设计，迫使平台将其技术控制力转化为相应的保护义务，在灵活用工与权益保障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二、不完全劳动关系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现实状况

（一）劳动权益纠纷的实践特征

司法实践中，不完全劳动关系引发的劳动权益纠纷呈现主体多元、视角对立、要素混杂、结果分化的复杂特征。在诉讼主体方面，劳动者、平台企业与第三方中介机构构成多重法律关系网络，平台往往通过格式条款将自身定位为信息中介，并将用工责任转移给外包公司或个体工商户，导致劳动者维权时面临主体适格性的争议，难以明确追责对象。劳动者的诉求主要集中于职业伤害赔偿、社会保险追索与劳动报酬保障三大领域，但因责任主体模糊，维权过程往往陷入漫长的程序困境；在裁判视角上，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的对立贯穿于各类纠纷的审理过程。形式审查严格遵循合同文本的表面约定，将劳动者对工作时间、接单数量的形式自主权作为否定劳动关系的核心依据，忽视算法规则对劳动者的隐性约束；实质审查则主张穿透合同表象，重点考察平台通过算法调度、评分机制、奖惩规则等对劳动过程的实际控制强度，认为这种技术控制已具备传统劳动关系中从属性的核心特征。这种视角分歧本质上反映传统劳动法理论与数字经济实践的脱节，也直接导致裁判标准的不统一。

裁判要素的选取缺乏统一规范，进一步加剧纠纷解决的不确定性。部分法院机械适用工作时间自主性、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等形式化要素，简单否定劳动关系的成立；另一些法院则尝试构建复合认定标准，综合考量劳动者的收入依赖性、平台控制强度、劳动行为的持续性等实质要素，但要素的权重分配缺乏明确依据，带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这种要素混杂的裁判模式，不仅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频发，更使得劳动者与平台均难以形成稳定的法律预期，削弱司法裁判的指引功能与权威性。裁判结果的多元化则直观展现司法尺度的分裂。在职业伤害赔偿案件中，不同法院的判决差异显著，部分法院严格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认定平台与劳动者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判令平台全额赔偿；部分法院以双方构成民事服务关系为由，适用风险自担原则，大幅限缩平台的赔偿责任；还有法院尝试采用比例责任模式，根据平台的控制强度与收益比例动态分配责任份额。在劳动报酬争议中，既有法院参照最低工资标准判令平台补足报酬差额，也有法院严守民事合同边界，拒绝干预双方约定的报酬标准。^[12]这种结果分化不仅损害法律的统一性，更让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陷入看运气的被动局面。

（二）司法适用的核心争议焦点

司法实践对平台用工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形成三种典型观点且争议持续不下。信息中介说认为平台仅提供信息匹配服务，不参与劳动过程的管理，与劳动者之间构成纯粹的民事服务关系；混合关系说承认平台兼具信息中介与用工管理双重属性，其在算法调度、规则制定、奖惩实施等方面的行为已超出单纯中介范畴，具备一定的管理职能；劳动控制说则借鉴欧盟立法经验，主张算法控制等同于传统劳动管理，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对劳动过程的实质性控制，足以构成劳动关系成立的核心要件。三种观点的分歧，本质上是对技术从属性是否构成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不同认知。

在众包劳动者致人损害的责任认定方面，司法实践面临过错责任与公平责任的适用困境。传统过错责任原则要求受害者证明平台存在管理过失，但在算法控制场景下，劳动者的配送路线、服务流程、时效要求均由算法设定，其行为往往受平台规则驱动，因果关系的认定变得异常复杂，受害者难以举证证明平台的过错。部分法院严格遵循过错责任原则，因举证困难而驳回受害者对平台的诉求；部分法院则引入公平责任原则，基于平台是劳动收益的主要享有者，判令其按比例承担赔偿责任，但公平责任的适用边界模糊，可能导致责任泛化风险。还有部分判决尝试通过算法参与度量化平台责任，将算法优化路线、时效压力设置等技术干预因素纳入责任分配依据，但缺乏客观统一的计量标准，使得裁判结果带有较强的主观性。

在劳动者自身遭受损害的责任认定上，裁判逻辑呈现明显的价值取向分裂。部分法院机械适用自甘风险原则，以劳动者自愿接单、自主选择工作时间为由，免除平台的赔偿责任，忽视平台在算法规则设计、安全保障义务履行等方面的过错。另一部分法院则尝试扩张解释安全生产法第 52 条的安全保障义务，要求平台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防护设备、优化极端工况下的配送规则，如恶劣天气时适当延长配送时效、减少订单分配量。但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缺乏明确界定，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某些判决认为平台已履行风险提示义务即完成责任承担，而另一些判决则要求平台主动调整算法策略以降低劳动风险。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地方试点政策对司法裁判的不当干预，部分地区通过政策性文件明确平台的责任比例，但不同地区的政策标准不一，导致政策替代司法的现象出现，既破坏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也为平台跨区域规避责任提供可乘之机。

三、不完全劳动关系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困境根源

（一）劳动法律制度的结构性短板

传统劳动法律制度建立于工业化时代，其核心框架与规则设计难以适配数字经济下的不完全劳动关系，形成结构性的制度短板。在劳动关系界定方面，现行法律以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为核心认定标准，强调雇主对劳动者工作时间、场所、方式的直接控制以及收入来源的单一性。但在众包模式下，劳动者呈现人格从属性弱化、技术从属性强化的悖论，形式上可以自主决定接单时间与数量，但实质上受算法规则的深度约束，接单权限、报酬标准、职业存续均依赖于平台的算法评分。^[4]这种控制权与自主权并存的特征，使得传统认定标准陷入解释困境，司法实践中出现截然相反的裁判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现行法律未将技术从属性纳入劳动关系认定要素，未能回应算法技术对劳动控制方式的革命性重塑。

劳动基准保护的缺失是另一突出问题。传统劳动基准法的刚性规定，如工时制度、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权利等，均预设固定工时+固定场所的劳动形态，难以适应众包模式任务化+弹性化的用工特征。在众包模式下，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呈现碎片化、不固定化特征，传统 8 小时工作制与加班工资制度无法直接适用；报酬计算以任务量为核心，缺乏最低工资标准的兜底保障，平台常通过算法调整单价变相压低劳动报酬；休息休假权利更是无从谈起，劳动者为维持收入不得不持续接单，陷入越累越赚、越赚越累的恶性循环。此外，劳动监察部门面临严重的技术壁垒，难以穿透平台的算法系统获取定价规则、评分标准、奖惩记录等关键证据，传统的现场检查、书面审查等执法手段在数字场景中失灵，导致劳动基准的法律规定形同虚设，劳动者权益缺乏有效的行政保障。

（二）社会保障体系的适配性不足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以劳动关系为核心绑定条件，导致不完全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被系统性排除在保障范围之外，形成制度性的权益真空。在社会保险方面，社会保险法将参保义务与劳动关系直接挂钩，平台企业通过将劳动者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委托外包公司管理等方式，切断与劳动者的直接劳动关系，从而规避社保缴费义务。2022 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推行的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因采用自愿参保模式且待遇标准偏低，未能实

现广泛覆盖,多数众包劳动者仍处于无社保、无保障的状态。此外,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参保通道存在诸多障碍,如缴费基数过高、缴费流程繁琐、跨区域转移困难等,进一步加剧社会保险的缺位问题,暴露社会保障体系对新型用工形态的适配性不足。^[vi]

职业伤害保障的不足尤为突出。现行工伤保险制度以劳动关系为前提,众包劳动者因不被认定为劳动关系,被系统性排除在工伤保险覆盖范围之外。平台为降低成本购买的商业意外险,普遍存在保额低、免责条款严苛、理赔流程复杂等问题,难以应对配送、外卖等高危岗位的职业伤害风险,往往在劳动者遭受重大事故时难以提供有效保障。地方试点的职业伤害保险呈现碎片化特征,北京、江苏、广东等地的试点政策在参保方式、缴费标准、待遇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导致不同地区的劳动者面临不公平的保障待遇。^[vii]这种碎片化的根源在于,职业伤害保障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规范,主要依赖地方性政策性文件,既缺乏法律强制力,也存在资金筹集机制失衡、待遇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难以形成稳定、公平的保障体系。

(三) 司法实践的多重现实障碍

司法实践面临的法律规范滞后、裁量权扩张与技术事实认定困难,共同构成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司法瓶颈。在法律规范层面,现行劳动法律体系以工业时代的劳动形态为调整对象,其核心规则难以适配平台经济的算法控制逻辑。一方面,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未纳入技术从属性要素,劳动合同法第7条以用工之日作为劳动关系成立的标志,但众包模式中账号注册—培训考核—协议签署—接单流程链条,使得用工之日的界定模糊不清,导致司法裁判缺乏明确依据。另一方面,法律未吸收算法控制的技术特征,平台通过订单分配算法、时效奖惩规则、评分机制等实施的隐形管理,其控制强度远超传统考勤制度,但法律未将算法指令密度、数据依赖性、评分影响力等技术参数纳入劳动关系评价体系,导致司法机关难以准确界定平台的控制程度。

司法裁量权的过度扩张加剧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由于法律规则的模糊性,法院在审理不完全劳动关系纠纷时,往往需要行使自由裁量权界定权利义务关系,但缺乏统一的裁量标准与指导原则。以职业伤害赔偿案件为例,部分法院严格适用传统劳动关系标准,判令平台承担工伤保险责任;部分法院以民事侵权为由,仅支持医疗费等直接损失的部分赔偿;另有法院根据平台控制力强弱采取比例责任模式,但控制力的量化缺乏明确依据,导致裁判结果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这种裁量权的滥用不仅损害法律的统一性与权威性,也使得劳动者与平台难以形成稳定的法律预期,削弱司法裁判的纠纷解决与行为指引功能。

技术事实认定的困境进一步阻碍司法公正的实现。司法机关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面临三重技术障碍:其一,算法控制强度的认定缺乏客观标准,不同法院对控制的理解存在差异,部分法院以每日派单量作为判断依据,另一部分法院则以劳动者可拒绝接单否定控制的存在;其二,举证责任分配失衡,劳动者因技术壁垒与信息不对称,难以获取平台后台的算法规则、定价数据、评分记录等关键证据,而法院对平台的数据披露要求较为宽松,导致劳动者举证困难;其三,赔偿计算方式混乱,实践中存在最低工资标准补偿、按抽成比例划分损失、人道补偿等多种计算方式,缺乏统一的裁判尺度,使得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难以量化,平台也容易利用规则漏洞降低合规成本。

四、不完全劳动关系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革新路径

(一) 立法革新: 确立技术从属性与分层权利体系

破解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权益保障困境,首要任务是推动劳动立法的系统性革新,突破传统劳动法的理论桎梏。在劳动合同法修订中,应明确将技术从属性纳入劳动关系认定的核心维度,建立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技术从属性的三元认定标准。技术从属性的认定可综合考量算法指令密度、数据依赖程度、行为监控强度、评分机制影响力等核心指标,如平台通过算法强制分配订单、设定不可协商的配送时效、以评分结果决定接单权限等,均应认定为具备技术从属性。同时,确立穿透技术面纱、识别实质控制的审查原则,要求司法机关透过形式化的合同约定,考察平台对劳动过程的实际控制程度,避免平台以个体工商户、服务合作等名义规避法律责任。

构建分层化的权利保障体系,以适配不同类型不完全劳动关系的特征。对于具备完整从属性的劳动者,应赋予其完整的劳动法权利,包括工伤保险、最低工资保障、休息休假等;对于仅具备技术从属性与经济从属性的类劳动者,可借鉴意大利准从属劳动制度的经验,赋予其工伤保险、劳动报酬保障等核心权利,但适当放宽工时与休息休假的刚性要求,兼顾用工弹性与权益保障;对于完全不具备从属性、真正自主经营的劳动者,则通过民事合同规则调整其权利义务关系。这种分层保护模式既避免劳动法适用范围的过度扩张,又能实现对不同类型劳动者的精准保障,平衡数字经济的灵活性与劳动者权益的基础性。

（二）社保革新：构建去劳动关系绑定的职业风险防护网

打破社会保障与劳动关系的机械绑定，是完善不完全劳动关系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关键举措。应建立全国统一的强制性平台职业伤害保险制度，将众包劳动者等新型就业形态劳动者全面纳入保障范围。该制度应明确平台为唯一缴费主体，缴费基数按照平台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计算，避免平台通过拆分订单、降低单价等方式逃避缴费义务；待遇标准参照现行工伤保险待遇执行，确保劳动者遭受职业伤害后能获得足额的医疗救治与经济赔偿。同时，实行省级统筹模式，统一参保范围、缴费标准与待遇水平，消除地区间的保障差异，避免平台跨区域规避责任。

优化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参保机制，降低参保门槛，提升保障的可及性。允许众包劳动者以个人身份便捷参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实行按单缴费、按月缴费等灵活的缴费模式，缴费基数可根据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自主选择，减轻其缴费压力。打通不同参保身份之间的转移接续通道，实现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跨区域、跨制度顺畅转移，解决劳动者在传统就业与灵活就业之间切换时的社保衔接问题。此外，政府应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对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给予社保缴费补贴，鼓励更多劳动者主动参保，扩大社保覆盖范围。

构建基本保险+商业保险+社会救助的多层次保障体系，形成立体防护网络。^[10]在基本职业伤害保险的基础上，政府引导平台为劳动者购买补充商业意外险，提高保障额度；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配新型就业形态的专属保险产品，如针对配送员的交通意外险、针对主播的职业健康险等，满足不同群体的个性化保障需求。同时，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对遭受重大职业伤害且无法获得足额保险赔偿的劳动者，给予临时生活救助与医疗救助，兜住权益保障的底线。

（三）司法与治理革新：强化算法审查与平台协同监管

司法机关应建立算法可解释性审查规则，破解技术事实认定的困境。在审理不完全劳动关系纠纷时，法院可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要求平台提供算法规则的核心逻辑、评分标准、报酬计算方式等关键信息，对算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审查。对于涉及算法歧视、算法压榨的案件，如平台通过算法随意压低单价、设置不合理时效导致劳动者权益受损，应认定算法规则无效，判令平台承担相应责任。同时，明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对于平台控制的关键证据，如后台数据、算法文档等，由平台承担举证责任，若平台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则推定劳动者的主张成立，平衡双方的举证能力。

统一司法裁判标准，减少同案不同判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应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明确不完全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权利义务边界与责任承担规则，为下级法院提供明确指引。例如，明确职业伤害赔偿的责任分配原则，根据平台的控制强度、收益比例等因素确定责任份额；规范劳动报酬的计算标准，要求平台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算法调整单价应提前公示并听取劳动者意见。通过统一裁判标准，增强法律的可预测性，引导平台规范用工行为。

构建政府、平台、劳动者三方协同的治理体系，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政府应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整合人社、市场监管、网信、交通等部门的监管职能，实现数据共享与联合执法，对平台的算法规则、用工模式、社保缴纳等情况进行常态化监管。将劳动者事故率、参保率、投诉处理率等指标纳入平台信用评价体系，对高风险平台实施算法运行实时监测、限期整改等监管措施，对严重违法违规的平台依法予以处罚。^[11]平台应建立内部算法伦理审查机制，成立由技术人员、法律专家、劳动者代表组成的伦理委员会，对算法规则进行合规性审查，优化算法设计，避免数字鞭策。同时，保障劳动者的知情权与参与权，算法规则的重大调整应提前公示，听取劳动者的意见建议，建立有效的申诉与反馈机制。

五、结语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不完全劳动关系这一新型用工形态，其对传统劳动权益保障体系的冲击是全方位、深层次的。从理论层面的性质争议，到实践层面的司法分裂，再到制度层面的保障缺位，不完全劳动关系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面临多重困境，其根源在于工业时代的法律制度与数字时代的用工形态之间的适配性冲突。破解这一困境，不能简单套用传统劳动关系的保障模式，也不能放任平台随意转嫁风险，而应通过多维度的制度改革实现动态平衡。立法层面需确立技术从属性的法律地位，构建分层权利保障体系；社保层面应打破劳动关系绑定，建立统一、普惠的职业风险防护网；司法与治理层面需强化算法审查与协同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数字时代的劳动权益保障范式革新，是在技术正义与制度正义之间寻求平衡，既要尊重数字经济的灵活性与创新性，又要坚

守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底线。唯有通过立法、社保、司法、治理的协同发力，才能让不完全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 [1] 王全兴,刘琦.我国新经济下灵活用工的特点、挑战和法律规制[J].法学评论,2019,37(04):79-94.
- [2] 常凯,郑小静.雇佣关系还是合作关系?——互联网经济中用工关系性质辨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33(02).
- [3] 李贵成.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的表征、挑战与应对[J].云南社会科学,2023,No.252(02).
- [4] 张弓.平台用工争议裁判规则探究——以《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为参照[J].法律适用,2021(12).
- [5] 汤晓莹.论平台经济从业者面临的算法困境及其制度因应[J].兰州学刊,2023, No.352(01).
- [6] 刘桂莲.数字平台劳动者就业身份认定及社会保障权益实现路径[J].国际经济评论,2023,No.163(01).
- [7] 苏炜杰.我国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制度:模式选择与构建思路[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1,38(03).
- [8] 韦杰.不完全劳动关系视野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研究[J].学术论坛,2023.
- [9] 徐新鹏,袁文全.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研究[J].中州学刊, 2023,No.313(01)

Dilemmas and Solutions of Labor Rights Protection in Incomplete Labor Relations

Zhao Chao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0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complete labor relations—an emerging employment form situated between standard labor relations and civil relations—are exerting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labor rights protection system.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sects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this employment model in three core aspects: the determination of its nature, the protection of labor right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judicial practice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subordination-based determination standards under traditional labor law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labor forms governed by algorithmic control. Three interrelated dilemmas collectively hinder labor rights protection: the absence of labor standard safeguards, the rigidity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judicial judgment criteria.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targeted solutions: first, establish the dimension of technical subordination determination through legislative amendments; second, construct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decoupled from the shackles of formal labor relations; third, strengthen platform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judicial review of algorithms. These measures aim to achieve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flexible employment and rights protection, thereby advancing the paradigm innovation of labor rights protection in the digital era.

Keywords: incomplete labor relations; labor rights protection; algorithmic control; determin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长三角地区人口出生率预测研究

尤艺霖¹ 张宸豪²

(1.圣华紫竹学院, 上海 200241, 2.金华第一中学, 浙江 金华 321015)

摘要: 本文通过将“经济发达、高城镇化”的长三角与“平均水平”的全国出生率数据对比, 通过回归分析揭示了各地出生率的走势, 结果反映长三角地区和全国人口出生率将持续下滑, 为应对低生育率挑战提供了实证依据。研究结果为地方政府制定差异化生育支持政策提供量化依据, 如在高房价城市优先实施住房保障政策, 在女性就业率高的地区完善托育服务体系等。

关键词: 人口出生率; 回归; 预测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34

1、引言

近年来, 中国各地出生率呈现显著分化趋势, 引起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根据 2023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部分东部省份出生率已跌破 5%, 而西部某些地区仍保持在 8% 以上。这种区域差异不仅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 更预示着未来人口结构将呈现更加复杂的空间格局。

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区域之一, 人均 GDP 和居民可支配收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基础是影响生育意愿和成本的关键因素^[1]。该地区城市化率领先全国, 拥有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等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城市生活模式如高房价、高教育成本和快节奏等对生育行为有典型的抑制效应。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 这会导致该地区的人们更高的职业追求、更晚的婚育年龄和更低的生育意愿。由于长期的低生育率和较高的人均寿命, 长三角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比许多内陆地区更为突出, 形成了“低出生、低死亡、高寿命”的典型现代人口模式。在此背景下, 建立科学的模型预测未来人口净出生率的走势, 对制定精准化人口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数据来源与回归分析

本文使用回归分析方法拟合年份与出生率的关系。回归是通过拟合最佳函数, 量化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的影响, 并预测 Y 的值。运用回归分析, 首先要明确自变量和因变量, 确保样本量充足, 处理好异常值。然后选择模型, 常先用散点图初步判断 X 与 Y 是否呈线性趋势, 若有, 则是线性关系; 若是非线性关系, 可以尝试多项式或变量转换。之后进行参数估计, 常通过最小化残差平方和求解系数, 再进行模型评估, 对比拟合优度, 最后进行预测与应用。回归分析的意义在于它可以预测未来趋势, 通过回归系数明确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方向和强度, 为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验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在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上获得长三角各地区和全国人口出生率数据如表 1-表 3 所示^[2]。图 1 中, 深蓝色代表浙江省的出生率, 橙色代表上海市的出生率, 灰色代表江苏省的出生率, 黄色代表安徽省的出生率, 浅蓝色代表全国的出生率。

根据散点图中深蓝色的点, 选取浙江省 2009-2023 年的出生率数据, 以时间为自变量, 浙江省的出生率数据为因变量, 因为浙江省的出生率在 2017 年为顶峰, 此后逐年下降, 尤其在 2020 年急剧下降, 浙江省 2017-2023 年出生率的散点图呈现二次函数图像。用浙江省 2017-2023 年的出生率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可以得出 $R^2 = 0.909$, 因变量 90.9% 的变异, 说明模型拟合效果好, 调整后数据依然可靠。F 值=50.21, 对应 p 值=0.00087, 说明模型整体统计显著, 标准误差为 0.0083, $y=0.219-0.0112x$ 。

作者简介: 尤艺霖(2009—), 女, 高中, 圣华紫竹学院;

张宸豪(2008—), 男, 高中, 金华第一中学;

通讯作者: 尤艺霖

表1 2009-2023年浙江省和上海市的出生率, 死亡率和净出生率

年份	浙江省			上海市		
	出生率	死亡率	净出生率	出生率	死亡率	净出生率
2009	10.22%	5.59%	4.63%	8.64%	5.94%	2.70%
2010	10.27%	5.54%	4.73%	7.05%	5.07%	1.98%
2011	9.47%	5.40%	4.07%	6.79%	5.10%	1.69%
2012	10.12%	5.52%	4.60%	9.56%	5.36%	4.20%
2013	10.01%	5.45%	4.56%	8.18%	5.24%	2.94%
2014	10.51%	5.51%	5.00%	8.35%	5.21%	3.14%
2015	10.52%	5.50%	5.02%	7.52%	5.07%	2.45%
2016	11.22%	5.52%	5.70%	9.00%	5.00%	4.00%
2017	11.92%	5.56%	6.36%	8.10%	5.30%	2.80%
2018	11.02%	5.58%	5.44%	7.20%	5.40%	1.80%
2019	10.51%	5.52%	4.99%	7.00%	5.50%	1.50%
2020	7.13%	6.56%	0.57%	5.02%	5.58%	-0.56%
2021	6.90%	5.90%	1.00%	4.67%	5.59%	-0.92%
2022	6.28%	6.24%	0.04%	4.35%	5.96%	-1.61%
2023	5.85%	6.66%	-0.86%	3.95%	6.37%	-2.42%

表2 2009-2023年江苏省和安徽省的出生率, 死亡率和净出生率

年份	江苏省			安徽省		
	出生率	死亡率	净出生率	出生率	死亡率	净出生率
2009	9.55%	6.99%	2.56%	13.07%	6.60%	6.47%
2010	9.73%	6.88%	2.85%	12.07%	5.95%	6.12%
2011	9.59%	6.98%	2.61%	12.23%	5.91%	6.32%
2012	9.44%	6.99%	2.45%	13.00%	6.14%	6.86%
2013	9.44%	7.01%	2.43%	12.88%	6.06%	6.82%
2014	9.45%	7.02%	2.43%	12.86%	5.89%	6.97%
2015	9.05%	7.03%	2.02%	12.92%	5.94%	6.98%
2016	9.76%	7.03%	2.73%	13.02%	5.96%	7.06%
2017	9.71%	7.03%	2.68%	14.07%	5.90%	8.17%
2018	9.32%	7.03%	2.29%	12.41%	5.96%	6.45%
2019	9.12%	7.04%	2.08%	12.03%	6.04%	5.99%
2020	6.65%	6.49%	0.16%	9.45%	7.96%	1.49%
2021	5.65%	6.77%	-1.12%	8.05%	8.00%	0.05%
2022	5.23%	7.04%	-1.81%	7.16%	8.09%	-0.93%
2023	4.81%	7.55%	-2.74%	6.45%	8.56%	-2.11%

表3 2009-2023年全国的出生率, 死亡率和净出生率

年份	全国		
	出生率	死亡率	净出生率
2009	11.95%	7.08%	4.87%
2010	11.90%	7.11%	4.79%
2011	13.27%	7.14%	6.13%

2012	14.57%	7.13%	7.44%
2013	13.03%	7.13%	5.90%
2014	13.83%	7.12%	6.71%
2015	11.99%	7.07%	4.92%
2016	13.57%	7.04%	6.53%
2017	12.64%	7.06%	5.58%
2018	10.86%	7.08%	3.78%
2019	10.41%	7.09%	3.32%
2020	8.52%	7.07%	1.45%
2021	7.52%	7.18%	0.34%
2022	6.77%	7.37%	-0.60%
2023	6.39%	7.87%	-1.48%

绘制出 2009-2023 年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和全国出生率的散点图如图 1。



图 1 2009-2023 年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和全国出生率的散点图

橙色散点图显示，随着 x 值的增加，y 值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y=0.149-0.00758x$ 。回归模型的 R^2 约等于 0.954，表明模型拟合效果好。调整后的 R^2 为 0.946，进一步确认了模型的高解释力。F 检验的 p 值为 0.00003，远小于 0.05，说明回归模型整体高度显著。x 的 t 值为 -11.14，p 值同样为 0.00003，表明 x 对 y 的影响非常显著。标准误差为 0.0044，说明模型的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平均偏差较小，预测精度较高。

关于江苏省的灰色散点图显示，随着 x 值的增加，y 值呈现明显的线性下降趋势。回归分析结果验证了这个直观观察。 $y=0.172-0.0084x$ 。回归模型的 R^2 为 0.912，说明 x 能够解释 y 91.2% 的变异，表明模型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调整后的 R^2 为 0.898，仍然保持高度的解释性。F 检验的 p 值为 0.00022，表明回归模型整体高度显著。x 的 t 值为 -7.9，进一步确认了 x 对 y 的负向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标准误差为 0.0069，表示模型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平均偏差约为 0.69%，截距为 0.172，这一基准值具有统计显著性。

黄色散点图显示，随着 x 值的增加，y 值先趋于平衡后在 2017 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y=0.259-0.0133x$ 。回归模型的 R^2 约等于 0.954，表明模型拟合效果好。调整后的 R^2 为 0.946，进一步确认了模型的高解释力。F 检验的 p 值为 0.000046，远小于 0.05，说明回归模型整体高度显著。x 的 t 值为 -13.10，p 值同样为 0.000046，表明 x 对 y 的影响非常显著。标准误差为 0.0054，说明模型的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平均偏差较小，预测精度较高。

通过浅蓝色关于全国出生率的散点图和回归分析揭示了 X 与 Y 变量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散点图直观显示，当 X 取值在 0-14 范围内时，Y 值呈现明显的线性下降趋势（从 16% 降至接近 0%）。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了

这一关系,结果显示 X 每增加 1 个单位, Y 会显著下降 0.0109 个单位。模型具有极优的拟合效果, R^2 为 0.977, 调整后为 0.973, 标准误差仅为 0.0045, 表明预测精度较高。F 检验和 t 检验均显示模型及变量关系高度显著。截距项 0.199 表明当 X=0 时, Y 的基准预测值为 19.9%。 $y=0.199-0.0109x$ 。例如, 当 X=10 时, 模型预测 Y 值为 9.00%, 与散点图实际观察值高度吻合。

3、出生率预测

Adjusted R^2 是综合度量回归模型对样本观测值拟合优度的度量指标, 它的数值越大, 说明拟合程度越大。估计值的标准差是说明实际值和估计值之间相对偏离程度的指标, 估计的标准差的值越小, 则回归方程的实用性越大。Sig. 是模型 F 值的概率, 反映了模型的显著性水平, 如果 $\text{Sig.} < 0.05$, 说明差异性显著, 方程有意义。表 3 说明, 线性回归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表 4 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分析	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安徽省	全国
R^2	0.9094418	0.95390171	0.91234911	0.97168942	0.97661928
adjusted R^2	0.89133017	0.94621867	0.89774063	0.96602731	0.97272249
标准误差	0.00834751	0.00440854	0.00688559	0.00538668	0.00446018
F	50.2131145	124.156685	62.4533861	171.612444	250.621686
Sig.	0.00086654	3.1157E-05	0.00021774	4.62586E-05	4.0297E-06
函数方程	$y=0.219-0.0112x$	$y=0.149-0.00758x$	$y=0.172-0.0084x$	$y=0.259-0.0133x$	$y=0.199-0.0109x$
Intercept-t 值	11.42694264	18.65185373	13.79544566	20.9527341	29.6413191
Intercept-p 值	8.98798E-05	1.53276E-06	9.02587E-06	4.58732E-06	9.776E-08
x-t 值	-7.9027455	-11.142562	-7.9027455	-13.10009	-15.831036
x-p 值	0.00021774	3.1157E-05	0.00021774	4.62586E-05	4.0297E-06

通过此模型可以预测出 2024-2028 年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和全国的净出生率, 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对 2024-2028 年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和全国的出生率的预测

	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安徽省	全国
2024	4.04%	2.75%	3.75%	4.62%	4.68%
2025	2.93%	1.99%	2.91%	3.29%	3.59%
2026	1.81%	1.23%	2.07%	1.96%	2.50%
2027	0.69%	0.48%	1.23%	0.63%	1.41%

结果反映长三角地区和全国人口出生率将持续下滑, 为应对低生育率挑战提供了实证依据。研究结果警示, 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 我国将很快面临比预期更为严峻的人口负增长局面。这要求我们超越传统的政策思维, 从社会保障体系重构、性别平等推进、工作生活平衡等多个维度, 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生育友好型社会, 这是一个不再让个人和家庭因生育而感到过度经济压力、职业中断、身心疲惫和社会孤立的社会。它通过一套“组合拳”, 将生育、养育的沉重负担, 从单个家庭的“私事”转变为由社会共同承担和支持的“公事”, 从而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活幸福感的社会。

4、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的人口挑战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和结构性的问题, 它标志着中国从一个“人多力量大”的时代, 进入了一个必须应对“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力萎缩”的新时代。本研究通过对 2009-2023 年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及全国出生率数据的系统分析, 不仅印证了“低生育率陷阱”理论的预警, 更凸显了我国人口发展的区域异质性特征^[3]。研究发现, 所有地区的出生率均呈现显著的负时间趋势 (p 值均小于 0.001), 这一结果与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22》中对中国人口发展的预测相吻合。

本研究结果支持了 McDonald (2006) 提出的“生育支持政策差异化”主张。针对东部发达省份,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浙江省应重点解决“高成本抑制生育”问题, 可参考德国“住房+育儿”捆绑式补贴模式 (Hank & Kreyenfeld, 2003); 上海市需完善新市民生育支持体系, 借鉴东京都特别区的积分制福利政策。在国家层面, 需建立生育成

本社会分担机制, 如将育儿补贴提升至 GDP 的 1.5%, 这一建议与最近发布的《中国人口发展报告 2023》中的政策取向不谋而合。

中国生育率呈现显著的区域分化特征, 反映出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如上海、浙江等地受高房价、教育成本和职场竞争等因素影响, 生育率持续走低, 上海 2024 年出生率仅为 4.8%, 中西部地区如安徽、湖北天门等地生育率相对较高, 天津市通过强力补贴政策使出生率增长 17%。东北地区面临严峻的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问题, 黑龙江自然增长率为-5.75%。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如西藏、贵州等地则保持全国最高生育率, 西藏自然增长率达 8.76%。针对这些区域差异, 建议实施差异化政策^[4-5]: 东部地区应重点提高育儿补贴和降低托育成本; 东北地区需结合振兴政策提供就业激励; 中西部地区可推广“天门模式”的全周期补贴政策; 同时全国范围内应优化托育与教育支持、完善住房与医疗配套, 并促进区域协同发展。这些措施需要结合地方特点, 采取“经济激励+服务保障+职业支持”的组合策略, 以构建可持续的生育友好型社会。

参考文献

- [1] 中国国家统计局 <https://www.stats.gov.cn/>
- [2] 刘振, 刘盛和. 2000—2020 年中国县市人口收缩的年龄结构特征及未来预测 [J]. 地理研究, 2025, 44(06): 1515-1533.
- [3] 张耀军, 李佳林. 人口红利: 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J]. 区域经济评论, 2025, (03): 34-45.
- [4] 李建新, 盛禾. 动态结构差异视角下的中国人口低生育水平再析 [J]. 中国人口科学, 2025, 39(02): 12-28.
- [5] 李茂, 常思琳. 河北省未来 30 年人口规模结构预测及发展策略研究 [J]. 经济论坛, 2025, (01): 5-16.

Prediction Study on Birth Rat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YouYilin¹, Zhang Chenhao²

(¹ Shenghua Zizhu Academy, Shanghai, China; ² Jinhua No.1 High School, Jinhua,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birth rate data of th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nd highly urbanized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with the national average level. Through regression analysis, it reveals the trends of birth rates in different area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opulation birth rates in both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the nation will continue to decline,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for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 of low fertility.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fer a quantitative basis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formulate differentiated fertility support policies, such as prioritizing housing security policies in cities with high housing prices and improving childcare service systems in areas with high female employment rates.

Keywords: Birth Rate; Regression; Prediction

中国陪诊师行业的兴起、挑战与规范化发展路径综述

祝壮壮¹

(1.内蒙古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9)

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与医疗体系的持续改革, 一种新兴的职业——陪诊师应运而生, 并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本文旨在系统性地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全景式剖析。首先, 文章从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变迁、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及数字化鸿沟等多维视角, 深入探讨了陪诊师行业兴起的深层社会动因。其次, 论文精准界定了陪诊师作为“流程导航者”、“信息沟通者”、“情感支持者”和“权益维护者”的多元角色定位, 并详细梳理了其贯穿诊前、诊中、诊后的全流程服务内容。进而, 本文重点批判性地分析了当前行业在标准缺失、监管真空、伦理困境、专业能力不足及社会保障缺位等方面面临的严峻挑战。最后, 基于公共治理与行业自治的双重逻辑, 本文构建了一个多主体协同的治理框架, 提出了建立健全行业标准与认证体系、明确监管主体与完善法律法规、构建专业化培训体系、推动行业自律与品牌化建设、以及探索与现有医疗体系融合模式等五位一体的规范化发展路径。本研究旨在为厘清陪诊师行业的发展脉络、破解其现实困境提供理论参考, 并助推其成为中国医疗服务体系中一支专业化、标准化和人性化的补充力量。

关键词: 陪诊师; 医疗陪护; 社会支持; 老龄化; 医疗改革; 行业规范; 公共服务

基金项目: 2025年度内蒙古医科大学“创客培育”项目(编号: 101322025056)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585

一、引言

现代医疗体系的高度专业化和复杂化, 在提升诊疗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 也无形中构筑了一道知识与信息的壁垒, 使得患者就医体验的核心^[1], 从单一的疾病治愈扩展为涵盖信息获取、流程导航、心理适应与决策参与的全过程。在中国特定的医疗语境下, 大型公立医院普遍存在的“三长一短”(挂号、候诊、缴费时间长, 看病时间短)现象, 与快速普及的数字化、智能化就医流程交织, 共同构成了一种结构性困境^[2]。这使得老年人、异地就医者、独居青年、孕产妇、残障人士以及重大疾病患者等群体, 在寻求医疗服务时面临着显著的“功能性”与“情感性”就医困难。他们不仅需要克服身体上的病痛, 更需要应对来自陌生环境、复杂流程和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与焦虑。

在此背景下, 陪诊师作为一种市场化、专业化的社会支持力量, 从最初零散的、基于人情关系的个体行为, 逐步发展为一个初具规模、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新兴服务行业^[3]。他们活跃在医院的各个角落, 通过提供系统性的陪同就诊、流程协助、信息解读与情感慰藉等“非医疗性”支持, 有效地填补了现有公立医疗体系在人文关怀与个性化服务方面的空白, 成为了连接患者与庞大医疗系统之间的“润滑剂”与“翻译官”^[4]。然而, 行业的快速生长也伴随着无序与混乱, 其职业身份的模糊性、监管的缺失以及内部素质的参差不齐, 已成为制约其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瓶颈。

因此, 对陪诊师行业进行一场系统性的、学术性的梳理与审视, 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也兼具理论价值。本文旨在通过整合社会学、公共卫生学及公共管理学的多维视角, 对陪诊师行业的兴起动因、角色功能、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进行一次全面而深入的综述, 以期相关政策制定、行业实践与学术研究提供一份扎实的参考依据。

二、陪诊师行业兴起的多元动因分析

陪诊师的出现与勃兴, 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多种结构性力量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其背后折射出的是深刻的社会变迁与制度变迁。

作者简介: 祝壮壮(1994-),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卫生管理、医学教育

1. 人口结构的深刻变迁与家庭照护功能的式微

中国正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3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2.9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21.1%，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5]。老年群体是慢性病的高发人群，其对长期、频繁的医疗服务的需求远高于其他年龄组。与此同时，我国家庭结构呈现出显著的核心化与小型化趋势，“4-2-1”或“4-2-2”的家庭结构成为城市主流，这意味着少数晚辈需要承担赡养多位长辈的重任。在社会竞争加剧、工作节奏快速的今天，子女普遍面临时间与精力的“双重稀缺”，难以长期、全职地陪伴父母就医。传统家庭养老与照护功能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正在急剧弱化，这种照护赤字为市场化、专业化的陪诊服务创造了巨大的刚性需求空间。

2. 医疗资源的虹吸效应与异地就医的常态化

我国的优质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于北上广等大城市及东部沿海地区的三甲医院，形成了强大的虹吸效应^[6]。大量的患者为了寻求更好的诊疗效果，不惜跨市、跨省流动，形成了就医大军。对于异地患者而言，他们不仅要承受疾病本身的痛苦，还要面对完全陌生的城市环境、医院体系、就医流程乃至方言文化。挂号难、找路难、沟通难成为他们就医路上的“三座大山”。陪诊师凭借其特定医院环境、科室特色、专家专长及内部流程的深入了解，能够为异地就医者提供精准的导航，极大缩短其学习与适应成本，提升就医效率与成功率，从而在这一特定群体中找到了稳固的市场根基。

3. 数字化鸿沟与智慧医疗的普惠性挑战

近年来，“互联网+医疗健康”战略的深入推进，使得网上预约挂号、移动端缴费、电子报告查询、线上问诊等智慧医疗服务迅速普及。这虽然在整体上提升了医疗体系的运行效率，但对于数以亿计的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老年人、数字技能匮乏的低学历群体而言，却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当就医流程从线下窗口大规模转向线上平台时，这部分群体被无情地边缘化，甚至陷入了“失能”的境地。陪诊师的出现，恰逢其时地扮演了“数字代理人”与“技术桥梁”的角色，他们通过代操作智能设备、讲解数字流程等方式，帮助弱势群体跨越技术障碍，重新接入现代医疗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与可及性^[7]。

4. 健康观念的迭代与消费升级的驱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民的健康观念正在发生从“治已病”到“治未病”、从“生存”到“生活”的深刻转变^[8]。民众对医疗服务的期待，已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疾病治愈，而是扩展至整个就医过程的体验感、舒适度与尊严感。尤其对于新兴的中产阶层和都市白领而言，时间成本变得愈发高昂。他们愿意支付一定的费用，将繁琐、耗时的就医流程“外包”给专业人士，以节省宝贵的时间，并换取更安心、省心的服务体验。这种消费观念的升级，为陪诊服务从一种“必需品”向一种“提升生活品质的服务品”转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此外，独居青年的增多，也催生了在脆弱时刻对陪伴和情感支持的市场需求，陪诊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这一群体的心理诉求。

三、陪诊师的多维角色定位与系统性服务内容

要理解陪诊师的价值，必须超越简单的“跑腿”、“陪护”概念，从其在整个就医生态系统中扮演的多元角色和提供的系统性服务来审视。

1. 核心角色定位

流程导航者与效率提升者：这是陪诊师最基础的角色。他们如同医院的“活地图”和“流程专家”，能够帮助患者在最优化路径下完成挂号、候诊、检查、缴费、取药等全部环节，有效减少患者在院内不必要的奔波和等待时间，对抗“三长一短”的体系性痛点。

信息沟通的桥梁与翻译者：医患之间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患者可能因紧张、知识局限而无法清晰陈述病情，也可能因医学术语的晦涩而难以完全理解医生的诊断与治疗方案。陪诊师在其中扮演了“翻译”角色，一方面协助患者更有条理地向医生传递信息，另一方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医学术语和方案要点，促进医患间的有效沟通，提升诊疗质量^[3]。

情感支持与心理慰藉者：疾病，尤其是重大疾病，往往伴随着恐惧、焦虑和无助感。在冰冷的医疗仪器和繁忙的医生面前，患者极易感到孤独与脆弱。陪诊师的在场本身即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支持。他们的倾听、鼓励和陪

伴，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增强其面对疾病的信心与勇气，这一角色具有不可替代的人文关怀价值。

患者权益的协作者与维护者：在复杂的医疗决策中，患者时常处于弱势。陪诊师可以协助患者核对医疗费用清单，避免错账、漏账；可以帮助患者审阅知情同意书等法律文件，确保其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做出决策；在遇到不公或纠纷时，可以协助患者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充当一个冷静的“第三方”。

2. 系统性服务内容分解

陪诊师的服务并非简单的现场陪同，而是一个贯穿始终的系统工程，可细分为：

诊前规划与准备：深入了解患者病情与需求，提供目标医院与专家选择的建议；代抢稀缺的专家号源；提前规划好就诊日的行程、路线与注意事项；诊中全程陪同与协调：按时接诊，陪同前往指定科室；协助办理各项手续；在候诊期间进行心理疏导；陪同检查，并协助处理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如患者不适）；记录医嘱，并就关键信息与医生进行二次确认；诊后支持与随访：代取并解读检查报告（在非医疗解读范围内）；协助建立健康档案；提供用药提醒与康复指导建议；进行定期的电话或线上随访，了解患者康复情况；增值与个性化服务：为特定客户（如海外人士）提供双语陪诊服务；为儿童患者提供更具亲和力的陪伴，减轻其恐惧；为临终患者提供心灵关怀服务等。

四、行业发展面临的深层挑战与结构性困境

行业的野蛮生长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也将其内在的脆弱性与结构性矛盾暴露无遗。

1. 行业标准与准入机制的全面缺失

这是当前行业最核心的痛点。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尚未收录陪诊师这一职业，导致其职业身份不被官方认可。没有统一的职业资格认证，意味着入行几乎“零门槛”。从业者可能来自护士、社工、退休医生、家政人员乃至毫无经验的待业青年，其专业素养、服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天差地别。服务内容、服务时长、收费标准、违约责任等均由各服务机构或个人自行规定，缺乏行业公认的规范，导致服务质量极不稳定，消费者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2. 监管主体模糊与法律风险高企

由于陪诊师服务横跨了医疗、消费服务、人力资源等多个领域，其监管权责归属问题悬而未决。卫生健康部门认为其不涉及医疗行为而难以介入，市场监管部门则因其带有一定的人身服务属性而监管力度有限，民政部门则主要管理社会组织。这种“多头管理、实则不管”的监管真空状态，使得行业乱象缺乏有效的外部制约。更严峻的是法律边界问题。陪诊师一旦在服务中对病情做出任何带有诊断或治疗建议性质的表述，即可能触碰“非法行医”的红线。同时，在陪同过程中若发生患者意外跌倒、病情突然恶化等状况，陪诊师的责任如何界定？其行为的法律性质是代理、委托还是无因管理？这些都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

3. 伦理困境与信任危机凸显

陪诊师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患者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疾病史、诊疗方案等高度敏感的个人隐私信息。如何建立严格的信息保密制度，防范信息泄露和滥用，是关乎行业生命线的伦理底线。此外，行业内部若滋生“医托”化倾向，即陪诊师与特定医生、药企或私立医院形成利益链条，通过诱导患者前往消费以获取回扣，将彻底扭曲其服务本质，摧毁整个行业的信任基石。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职业操守，是每一位从业者必须直面的伦理考验。

4. 专业能力不足与系统性培训缺位

一名优秀的陪诊师，应是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需涵盖基础医学常识、心理学知识、沟通技巧、急救救护能力、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特定医院的管理流程。然而，目前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为期数天的“速成班”，其培训质量堪忧。缺乏权威、系统、深入的专业培训体系，直接导致整个行业的专业服务水平在低层次徘徊，无法满足市场对高质量、专业化陪诊服务的期待，也阻碍了职业社会认同感的提升。

5. 社会保障缺位与职业发展前景不明

绝大多数陪诊师以自由职业者或与平台松散合作的形式就业，无法享受传统的“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他们收入不稳定，职业风险自担，在发生劳务纠纷或意外伤害时缺乏保障。同时，该职业尚未形成清晰的职业晋升

通道和职业生涯规划,导致从业者归属感弱、流动性大,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形成了行业发展的恶性循环。

五、推动陪诊师行业规范化发展的多元协同路径

破解陪诊师行业的发展困境,不能依靠单一主体的努力,而需要构建一个政府、行业、市场与社会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

1. 政府引领:建立健全行业标准与认证体系

建议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门,启动职业论证程序,尽快将“陪诊师”或“患者服务师”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在此基础上,牵头组织行业协会、医学与护理学专家、法律专家及资深从业者,共同研制并发布《陪诊师国家职业标准》,明确其职业定义、等级划分、能力要求、职业道德规范以及考核认证办法。同时,应制定推荐性的《陪诊服务合同范本》与《服务质量标准》,为市场提供清晰的指引。

2. 法治保障:明确监管主体与厘清法律边界

建议通过国务院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的形式,出台《陪诊服务管理办法》,明确指定市场监管部门作为主要监管主体,卫生健康部门在医疗相关环节予以协同监管。该办法应清晰界定陪诊服务的业务范围,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医疗诊断、治疗建议及药品推销行为,划清与非法行医的界限。同时,应明确规定陪诊师在服务过程中的权利义务,特别是关于患者隐私保护、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以及法律责任承担方式,为行业的合法运营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

3. 人才筑基:构建专业化、层次化的培训体系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高等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开设“患者服务与管理”等相关专业或课程方向,进行学历教育,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同时,依托优质的职业培训机构、大型医院或行业协会,开展针对社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与认证。培训内容应模块化,涵盖医学基础、服务礼仪、沟通心理学、法律法规、急救技能及信息系统操作等,并设立严格的实习与考核环节,确保输出人才的质量。

4. 行业自强:推动自律机制与品牌化建设

积极推动成立全国性和地方性的陪诊师行业协会,发挥其行业自律功能。协会应制定并监督执行行业公约,建立从业人员诚信档案和“黑名单”制度,对违规行为进行行业惩戒。同时,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进行品牌化、连锁化经营,通过标准化的服务流程、统一的服务形象、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来赢得市场信誉,淘汰劣质服务提供者,引领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

5. 系统融合:探索与公共医疗服务的互补模式

从长远看,陪诊服务不应完全市场化,其公益属性也应得到重视。可探索将陪诊服务纳入医疗卫生体系的改革范畴。例如,鼓励医院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为本院的老年患者、残障患者等特殊群体提供免费的公益性基础陪诊服务。或者,将陪诊师与医院的社会工作部、志愿者服务中心进行资源整合,形成“专业陪诊师+医务社工+志愿者”的协同服务模式,共同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人文关怀的“患者友好型”医疗环境。

六、结论与展望

陪诊师行业的兴起,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在医疗领域的一个缩影,它精准地回应了人口结构转型、家庭功能变迁、医疗体系复杂化与数字技术普及所带来的新型社会需求。它不仅是一种商业模式,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创新,在提升患者就医体验、弥补公共医疗服务的人文短板、促进医疗资源有效利用等方面,展现出巨大的潜在价值。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行业的“野蛮生长”状态是不可持续的。其面临的标准化、监管、伦理与人才困境,是制约其从“边缘补充”走向“主流认可”的关键障碍。未来陪诊师行业的健康发展,绝不能依靠市场的自发演化,而必须依赖于一个有意识的、系统性的社会建构过程。这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来奠定基石,需要行业的自我净化与能力建设来塑造内核,需要教育体系的专业人才培养来注入活力,也需要全社会的理性认知与包容监督来营造氛围。

展望未来,一个经过规范化洗礼的陪诊师行业,将不再是一个尴尬的“灰色存在”,而是中国整合型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将以专业化、标准化和人性化的服务，成为守护患者就医旅程的温暖伙伴，为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愿景贡献独特而重要的力量。对此，我们应抱以审慎乐观的期待，并积极为之创造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 [1] 赵栋祥,刘祎凡,翟运开.基于服务接触理论的移动医疗服务使用与提升研究[J].中国医院管理,2025,45(02):62-68.
- [2] 师梦丽,梁超.某公立医院门诊患者忠诚度现状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医疗管理科学,2023,13(02):117-121.
- [3] 雷紫雯,刘战伟,章梅芳.“知识摆渡人”:医疗职业陪诊师的知识中介与转译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5,47(03):131-149.DOI:10.13495/j.cnki.cjjc.2025.03.008.
- [4] 张华.解决患者独自就医“痛点”新兴职业陪诊师悄然兴起[N].羊城晚报,2025-10-07(A03).DOI:10.38241/n.cnki.nycwb.2025.003108.
- [5] 郑建中,刘俊娇,郝鸿雁.中国人口结构变迁与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挑战与应对策略[J].医学与哲学,2025,46(05):12-15.
- [6] 郑继承.我国医疗资源配置统计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25,44(06):56-61.
- [7] 袁全.银发经济背后的温情与挑战 上海“陪诊师”的职业化探路[J].新华月报,2025,(12):42-45.
- [8] 方鹏骞,闵锐,俞玉洁,等.主动健康理念下医院体重管理服务生态体系建设研究[J].中国医院管理,2025,45(09):1-5+21.

A Review of the Emergence, Challenges, and Pathways to Standardization in China's Patient Accompanying Industry

Zhuangzhuang Zhu¹

(1.Faculty of Health Management,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in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and ongoing reforms with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a new profession—patient companions or patient navigators—has emerged and is experiencing rapid growth.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systematic and panoramic analysis of this social phenomenon. Firstly, it delves into the underlying social drivers behind the rise of this industry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cluding population aging, evolving family structures, uneven distribution of medical resources, and the digital divide. Secondly, the study precisely defines the multifaceted roles of patient companions as "process navigators," "information facilitators," "emotional supporters," and "rights advocates." It also details their comprehensive service scope, which spans the entire patient journey—before, during, and after medical consultations. Furthermore, the paper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ing the industry, such as the lack of standards, regulatory gaps, ethical dilemmas, insufficient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and an underdeveloped social support framework. Finally, grounded in the dual logic of public governance and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a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It proposes an integrated five-pronged pathway for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establishing a robust industry standard and certification system, clarifying regulatory bodies and improving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building a specialized training system, promoting industry self-discipline and brand development, and exploring models for integration within the existing healthcare system. This study seek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clarifying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the patient companion industry and addressing its practical challenges, ultimately contributing to its evolution into a professional, standardized, and humanized supplementary force within China's healthcare service system.

Keywords: Patient Companions; Healthcare Navigation; Social Support; Aging Population; Healthcare Reform; Industry Standardization; Public Services

医学人文视域下亲情化陪诊服务模式的构建与实践路径

祝壮壮 冀艳云

(内蒙古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9)

摘要: 本文基于医学人文与伦理视角, 探讨亲情化陪诊服务模式的构建与实践。该模式针对老年人、孕妇等脆弱群体的特殊需求, 通过明确陪诊师角色、规范服务流程、强化情感支持, 融入尊重患者自主权、维护尊严及促进医患沟通等伦理原则, 旨在提升服务质量与人文关怀水平。实践表明, 该模式有助于优化患者就医体验、改善医患关系, 并为陪诊服务行业的专业化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陪诊服务; 亲情化; 医学人文; 就医体验

基金项目: 2025年度内蒙古医科大学“创客培育”项目 (编号: 101322025056)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69

一、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医疗需求的不断增长, 医疗服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在不断增加^[1]。在此背景下, 陪诊服务作为一种新兴的医疗辅助服务形式, 正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陪诊服务的出现, 不仅是对传统医疗服务模式的补充, 更是对医疗服务人性化需求的一种积极回应^[2]。然而, 当前陪诊服务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 存在诸多问题, 如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 难以充分满足老年人、孕妇、异地就医患者等脆弱人群的特殊需求^{[3][4]}。因此, 构建一种更具温度和人文关怀的陪诊服务新模式, 对于提升脆弱人群的就医体验、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不仅关注陪诊服务的实践操作, 更从医学人文与伦理视角出发, 探讨如何在服务中体现对患者的尊重、关怀与理解。在医疗技术日益发展的背景下, 强调以患者为中心, 重视其情感需求与人文体验, 是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关键。通过融入人文伦理维度, 旨在促进陪诊服务的规范化与专业化发展, 为行业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照。

二、陪诊服务的现状与需求分析

近年来,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医疗服务的需求模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陪诊服务作为一种新兴的医疗辅助服务形式, 其市场需求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5]。据统计, 2023年我国陪诊服务人次达到434.3万, 市场规模达7.47亿元^[6]。这一增长主要源于人口老龄化、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以及患者对人性化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加。截至2024年末, 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已达2.2亿, 占总人口的15.6%^[7]。老年人群体的扩大显著增加了对陪诊服务的需求, 同时也凸显了当前陪诊服务行业面临的诸多挑战。

我国陪诊服务市场近年来快速增长, 主要受人口老龄化加剧、慢性病高发及患者对就医便利与情感支持需求上升等因素推动。然而, 行业尚处发展初期, 仍面临诸多问题: 一是缺乏统一的服务标准与规范, 服务内容、质量及收费标准差异显著, 影响服务透明度和可比性^[4]; 二是陪诊师专业素质参差不齐, 培训体系和考核机制不健全, 难以保障专业水平^[8]; 三是服务内容单一, 多集中于流程引导, 难以满足患者心理支持、健康教育等个性化需求^[9]; 四是医学人文关怀与伦理考量不足, 对患者自主权、尊严及隐私保护重视不够, 影响行业公信力^[10]。

在陪诊服务的需求群体中, 老年人、孕妇、残疾人和异地就医患者等脆弱人群尤为迫切。他们普遍面临医院环境陌生、流程复杂、自理能力有限等困难, 影响就医效率并加重心理负担。

作者简介: 祝壮壮 (1994-),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卫生管理、医学教育

冀艳云 (1995-),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卫生管理

通讯作者: 冀艳云

三、亲情化陪诊服务模式的构建

亲情化陪诊服务模式的构建旨在通过系统化的理论设计与实践探索,为陪诊服务行业提供一种更具人文关怀和专业性的服务范式。该模式不仅关注服务的效率和规范性,更强调在服务过程中体现医学人文精神和伦理原则,以满足患者的情感需求和心理支持。以下是构建亲情化陪诊服务模式的具体策略和方法。

(一) 陪诊师角色定位与职责

在亲情化陪诊服务中,陪诊师承担多重角色,既是就医流程的协助者,也是患者的情感支持者与医患沟通的桥梁。其服务贯穿诊前、诊中与诊后全程,协助完成挂号、候诊、检查、缴费等环节,减轻患者因流程不熟而产生的焦虑。同时,陪诊师通过倾听、安慰与鼓励,为患者提供情感支持,帮助缓解身心压力,增强应对疾病的信心。此外,陪诊师还需具备一定医学知识,能够以通俗语言解释医嘱与治疗方案,确保患者充分理解病情与治疗路径。在医患沟通中,他们协助患者准确表达诉求,帮助医生把握患者需求,减少信息不对称,促进医患信任与合作。为保障服务质量,需制定明确的职责规范与行为准则,并通过持续培训与考核,不断提升陪诊师的专业素养与服务意识,从而为患者提供高效、温暖、有支持的陪伴体验。

(二) 陪诊服务流程与标准的制定

为确保陪诊服务质量,亲情化服务模式构建了系统而规范的服务流程与标准:预约阶段通过电话、网络或现场方式详细了解患者信息与需求,提前做好准备;接诊阶段陪诊师准时到达、友好迎接,通过初步沟通确认需求并缓解患者紧张情绪;陪诊阶段全程协助完成挂号、候诊、检查与就诊,关注患者情绪变化,提供情感支持并促进医患沟通;服务结束后进入反馈阶段,积极收集患者及家属意见建议,进行总结记录以推动持续改进。同时,依托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通过内外部监督评估不断优化各环节,切实保障服务的高质量与一致性。

(三) 情感支持技巧的培训

情感支持是亲情化陪诊服务的核心,要求陪诊师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与同理心,能够为患者提供有效的情感支撑^[11]。为此,需通过系统培训使陪诊师掌握以下关键技巧:倾听是情感支持的基础,陪诊师应保持专注与耐心,避免打断患者,并通过恰当的肢体语言和言语回应,传递理解与关怀。安慰技巧方面,陪诊师需通过言语和行动给予患者心理慰藉,缓解其因疾病、环境或未知因素引发的焦虑与恐惧。同时,面对疾病时,患者常需外界鼓励,陪诊师应善用积极的语言与行为,增强患者信心与勇气。此外,同理心的培养尤为关键,陪诊师需学会换位思考,真正理解患者在不同情境下的情绪与需求,从而建立信任并提供个性化的情感支持。通过系统培训与实践,陪诊师能够更熟练地运用这些技巧,为患者带来温暖而贴心的服务体验。

四、医学人文与伦理在陪诊服务中的应用

在现代医疗服务中,医学人文与伦理不仅是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衡量医疗服务质量和患者满意度的关键因素^[12]。亲情化陪诊服务模式的构建,强调将医学人文与伦理贯穿于服务的各个环节,以实现患者的尊重、关怀和理解。以下是医学人文与伦理在陪诊服务中的具体应用策略。

(一) 尊重患者自主权

尊重患者自主权作为医学伦理的核心原则,构成亲情化陪诊服务的重要伦理基础。该权利涵盖选择权、决策权与知情同意权,充分体现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在陪诊实践中,尊重患者自主权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协助患者理解医疗信息,陪诊人员需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专业内容,帮助患者准确把握病情与治疗方案,为其在充分知情前提下作出自主判断提供支持;二是尊重患者的选择与决定,恪守角色边界,避免越俎代庖,即便患者面临决策困难,也应通过情绪支持与理性分析协助其自主抉择,避免引入个人倾向;三是保障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落实,确保患者在签署文书或接受诊疗前已充分掌握相关信息并清晰表达意愿,必要时协助其与医务人员有效沟通,真正贯彻知情同意原则。

(二) 维护患者尊严

维护患者尊严是医学人文关怀的核心^[13],也是亲情化陪诊服务的根本价值。在医疗场域中,患者常因信息不对称与身心脆弱而处于弱势,其人格尊严易被忽视。因此,陪诊服务须始终贯彻平等尊重的原则,具体落实于以下路径:尊重患者人格与权利,将其视为具有自主性的个体,尊重其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杜绝偏见与歧视;严格保护患者隐私,对个人信息、诊疗记录等承担保密义务,不泄露、不非议;同时重视患者的个人空间需求,在检查、治疗或私密沟通中合理把握介入程度,保持适当物理与心理距离,维护其边界感与自主空间,

从而真正落实以尊严为本的陪护服务。

（三）促进医患沟通

促进医患沟通是陪诊服务的核心功能，也是亲情化服务模式的重要目标^[14]。良好的沟通有助于减少误解、增进理解，从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在陪诊过程中，具体措施包括：一、充当沟通桥梁，陪诊人员需准确理解患者需求并清晰传达给医护人员，同时帮助医生理解患者感受，缓解信息不对称。二、协助患者表达诉求，通过耐心倾听与引导，帮助因紧张或缺乏医学知识的患者清晰陈述症状与期望，确保信息完整传递。三、协助医护人员理解患者，陪诊人员通过观察及时反馈患者的情绪变化与心理需求，助力医生调整沟通方式与治疗方案，提升服务精准度。

五、亲情化陪诊服务模式的实践意义

亲情化陪诊服务模式的构建与实践，不仅是对传统陪诊服务模式的创新与优化，更是对医疗服务人文关怀理念的深度践行。这一模式在患者、医疗系统和社会三个层面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能够为医疗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一）对患者的意义

亲情化陪诊服务为患者提供专业情感支持，通过倾听、安慰和鼓励，有效缓解其就医过程中的焦虑与压力，增强面对疾病的信心，促进整体康复。该服务尤其帮助老年人、孕妇及异地就医等群体高效完成挂号、候诊、检查等流程，节省时间与精力，避免因不熟悉流程导致的误诊或重复检查，显著改善就医体验。此外，陪诊师作为医患沟通的桥梁，帮助患者理解医疗信息，减少误解与疑虑，增强对医疗服务的信任感。患者在感受到尊重与理解的同时，更积极配合治疗，从而提升治疗效果与康复速度。

（二）对医疗系统的意义

亲情化陪诊服务通过协助患者准确整理和传达病情，帮助医护人员快速把握需求，减少因沟通不畅导致的重复检查或误诊，提升诊疗效率；同时，陪诊人员在流程引导和秩序维护方面的作用，也有助于缓解医院拥挤，优化就医动线。此外，该服务搭建了医患沟通的桥梁，减少误解与矛盾，增强双方信任，促进合作与和谐。陪诊服务更将人文关怀融入医疗全流程，既提升了患者满意度，也为医护人员营造了温暖有支持的工作环境，增强了医疗系统的公信力，推动医疗服务走向更加人性化和高效化。

（三）对社会的意义

亲情化陪诊服务通过为老年人、孕妇、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家庭提供专业支持，有效减轻家庭成员的照顾负担与心理压力，改善家庭关系，从而提升生活质量。该模式也推动社会重视医疗服务中的人文关怀，增强公众满意度，助力形成有温度的服务文化。同时，陪诊服务为医学生提供实践平台，使其深入理解患者需求，培养同理心与沟通能力，提升职业素养与社会责任感，为医疗事业储备人才。此外，通过整合社会资源、优化服务供给，该模式有助于满足脆弱群体就医需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

六、结论

通过构建的亲情化陪诊服务模式，以医学人文与伦理为指导，聚焦老年人、孕妇等群体的特殊需求，明确陪诊师角色、规范服务流程、强化情感支持，将尊重患者自主权、维护尊严、促进沟通等原则融入服务全程。研究表明，该模式能有效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改善医患关系，推动陪诊服务向专业化、人文化发展，为医疗服务质量提升与社会健康服务优化提供了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 [1]余乐山,王兆萍,杨柳.我国失能老人健康状况分析及政策研究——基于 CHARLS 面板数据[J].卫生经济研究,2025,42(08):61-64.DOI:10.14055/j.cnki.33-1056/f.2025.08.017.
- [2]陈青冰. 职业陪诊师兴起[J]. 半月谈,2022(20):43-45.
- [3]熊强,王番宁,李海军,等.陪诊师倒号行为亟待规制[J].中国医院院长,2024,20(21):87-89.DOI:CNKI:SUN:YYYY.0.2024-21-036.
- [4]荣海潮,刘逸天,谈在祥.医疗陪诊服务的现实困境、国际经验及发展建议[J].卫生经济研究,2025,42(04):76-80.DOI:10.14055/j.cnki.33-1056/f.2025.04.010.

- [5]Zhao ,Chi ,Zhang, et al.Survey Report on Medical Accompaniment Service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octors and Patien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2025,2(6):DOI:10.62639/SSPJISS20.20250206.
- [6]中国融媒产业网.异地就医不再孤立无援, 天机医疗打造全流程陪诊方案[EB/OL].(2025-03-26)[2025-10-11].http://baby.ifeng.com/c/8i2YPcEQaOn
- [7]国家统计局.口总量降幅收窄 人口素质持续提升[EB/OL].(2025-01-17)[2025-10-11].https://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501/t20250117_1958337.html
- [8]罗克研.陪诊师: 新职业背后的“陪伴生意”[J].中国质量万里行,2023,(10):48-49.DOI:CNKI:SUN:ZLWL.0.2023-10-036.
- [9]高永维. 让陪诊师这一新兴职业有标准、更规范[J]. 老年教育,2024(13):12. DOI:10.3969/j.issn.1002-3402.2024.13.008.
- [10]白佳丽,栗雅婷,尹思源.职业陪诊师: 让“孤独就诊”者就医有个帮手[J].决策探索(上),2021,(09):20-22.DOI:CNKI:SUN:JCTS.0.2021-09-017.
- [11]张雨薇.制造“亲情”: 青年陪诊师情感劳动的展演策略及其职业建构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5,(01):94-101+110.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5.0006.
- [12]赵飞,李铮,何宇,等.医学人文融入医疗服务实践的理论探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4,41(01):29-33+73.DOI:CNKI:SUN:ZWSG.0.2024-01-006.
- [13]王燕.人文关怀在口腔医院医疗诊治管理中的应用价值[J].安徽医专学报,2023,22(05):12-14.DOI:10.20072/j.cnki.issn2097-0196.2023.05.005.
- [14]雷紫雯,刘战伟,章梅芳.“知识摆渡人”:医疗职业陪诊师的知识中介与转译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5,47(03):131-149.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a Humanized Accompanying Medical Service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cal Humanities

Zhuangzhuang Zhu , Yanyun Ji

(Faculty of Health Management,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edical humanities and ethic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a familial model of accompaniment services. Targeting the specific needs of vulnerable groups such as the elderly and pregnant women, this model clarifies the role of accompaniment professionals, standardizes service procedures, and strengthens emotional support. It integrates ethical principles such as respect for patient autonomy, preservation of dignity, and promotion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iming to enhance service quality and the level of humanistic care.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this model helps optimize the patient experience, improv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s,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accompaniment service industry.

Keywords:accompaniment service; amilial approach; medical humanities; patient experience

高校青年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与成效研究 ——基于“数智助农，文化筑魂”项目的分析

葛茹^{1,2}

(1.南京晓庄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2.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 高校青年志愿服务凭借其人才与智力优势, 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本文以N高校长期开展的“数智助农, 文化筑魂”乡村振兴志愿服务项目为分析对象, 结合乡村振兴“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目标, 系统梳理该项目在多省份乡村的服务实践, 提炼“数智技术赋能+文化资源激活+校地协同联动”的三维服务模式。通过分析项目在产业升级、文化传承、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具体举措与成效, 揭示高校青年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 为高校志愿服务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提供学术参考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 高校青年; 志愿服务; 乡村振兴; 数智助农; 文化赋能

基金项目: 2020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政治专题项目(2020SJB0179); 南京晓庄学院2021年思想政治专题研究项目(2021SZKT13)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63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的战略要求, 将乡村振兴提升至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乡村振兴并非单一维度的经济提升, 而是涵盖产业、文化、人才等多领域的系统性工程, 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参与。高校作为高素质青年聚集地与智力资源高地, 承担着“立德树人”与社会服务的双重使命, 其组织的青年志愿服务活动, 既为乡村注入技术、信息与人才资源, 弥补乡村发展短板, 也为青年学生提供了理论联系实际、厚植家国情怀的实践平台。

共青团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 要推动青年下乡开展志愿服务, 鼓励青年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然而, 当前高校青年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部分项目服务形式单一, 局限于短期支教、物资捐赠等传统模式, 与乡村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等核心需求脱节; 志愿者专业能力与乡村实际需求匹配度不足, 导致服务实效有限; 校地协同机制不完善, 缺乏长期稳定的合作支撑, 难以形成可持续服务模式。在此背景下, N高校开展的“数智助农, 文化筑魂”志愿服务项目, 通过近十年实践, 覆盖多省份近百个行政村, 形成兼具专业性与持续性的服务体系, 为破解上述困境提供了鲜活样本,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现有关于高校志愿服务与乡村振兴的研究, 多聚焦于宏观路径或单一功能(如教育帮扶、生态保护), 对“技

作者简介: 葛茹(1992—), 女, 讲师,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通讯作者: 葛茹

术赋能”与“文化传承”的协同作用关注不足。本研究通过分析“数智助农，文化筑魂”项目的实践逻辑，构建“技术支撑—文化铸魂—人才保障—机制协同”的理论框架，丰富高校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理论体系。同时，针对项目中形成的跨专业协作、校地资源整合等机制进行理论提炼，为志愿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发展提供学术支撑。

2. 实践意义

本研究总结的“数智+文化”双轮驱动服务模式，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推广价值。通过梳理项目在电商平台搭建、文化品牌打造、志愿者培育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可为其他高校设计乡村振兴志愿服务项目提供实践模板。针对项目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的分析，能为高校、政府、企业等主体优化志愿服务生态提供决策参考，推动形成“高校育才—青年服务—乡村受益”的良性循环。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与文献研究法相结合的方式。以“数智助农，文化筑魂”志愿服务项目为核心案例，通过分析项目申报表、服务记录、成效数据及媒体报道等资料，系统梳理项目的实施背景、服务内容、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同时，梳理乡村振兴、高校志愿服务相关政策文件与学术研究成果，为案例分析提供理论支撑，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深度。

二、高校青年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时代内涵与现实困境

（一）时代内涵

1. 青年成长与乡村发展的双向赋能

高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志愿服务，是青年学生实现自我价值与乡村获得发展动能的双向过程。一方面，青年学生将会计学、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等专业知识应用于乡村产业实践，在解决农产品销售、品牌建设等实际问题中，巩固专业基础、提升综合能力；另一方面，乡村的真实需求与发展困境促使青年树立正确价值观，厚植“服务基层”的家国情怀。对于乡村而言，青年带来的数字化技术、创新理念与外界资源，能有效破解乡村在产业升级、文化传播等方面的瓶颈，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2. 高校育人与社会服务的有机统一

志愿服务是高校“实践育人”的重要载体，将课堂教学与乡村实践紧密结合，实现“知行合一”的育人目标。高校通过组织志愿服务活动，推动学科建设与课程改革，使专业设置更贴近社会需求；同时，充分发挥社会服务职能，提升高校的社会影响力。这种“育人+服务”的双重价值，使高校志愿服务成为连接教育资源与乡村需求的重要桥梁，促进城乡资源的精准对接。

3. 传统乡村与现代文明的深度融合

青年学生作为现代文明的传播者，在志愿服务中将数字化技术、现代管理理念带入乡村，推动乡村传统产业向数字化、品牌化转型；同时，青年深入挖掘乡村红色文化、民俗文化等资源，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传播与活化，实现现代文明与传统乡村的双向滋养，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活力。

（二）现实困境

1. 服务供需匹配度不足

部分高校志愿服务项目缺乏对乡村实际需求的深度调研，盲目开展文艺汇演、短期支教等活动，与乡村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等核心需求脱节。此外，志愿者招募多以“自愿报名”为主，未结合乡村需求进行专业筛选，导致志愿者专业背景与乡村需求不匹配，如农业技术需求与文科专业志愿者的能力错位，影响服务实效。

2. 长效服务机制缺失

多数高校志愿服务项目存在“短期化”“运动式”特征，缺乏长期规划与持续投入。由于未建立常态化的校地合作机制、志愿者培育机制与经费保障机制，项目往往在活动结束后难以持续推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乡村的长期发展问题，如某项目为乡村搭建电商平台后，因缺乏后续运营指导，平台逐渐闲置。

3. 数智化应用深度不足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乡村对数字化转型的需求日益迫切，但部分高校志愿服务项目仍停留在传统服务模式，

未充分发挥青年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的优势。即使涉及数字化服务，也多局限于简单的技术培训，缺乏对电商平台运营、农产品溯源、大数据分析等深层次服务的探索，难以满足乡村产业数字化的实际需求。

4.文化赋能作用发挥有限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但现有志愿服务项目对乡村文化资源的挖掘与活化重视不足。多数项目忽视文化与产业的融合，未能将红色文化、民俗文化元素融入农产品品牌建设，导致乡村文化传承乏力，难以形成具有辨识度的乡村品牌，影响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三、“数智助农，文化筑魂”志愿服务项目的实践探索

(一)项目概况

“数智助农，文化筑魂”乡村振兴志愿服务项目始于2016年，截至2025年已持续近10年，服务范围覆盖8个省份，深入13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近百个行政村，重点服务农业种植基地、乡村社区及特色产业园区。项目以“科技赋能农业升级、文化激活乡村活力”为宗旨，通过实地调研、电商整合、文化挖掘等方式，推动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融合，帮助农户增收创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截至2024年，项目累计开展服务360余次，参与志愿者970余人次，志愿服务总时长2800余小时，获国家级、省级媒体报道400余篇，各平台宣传点击量超440万次，带动多个乡村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百万元，取得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二)核心服务内容

1.数智赋能产业振兴，拓宽增收渠道

项目团队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聚焦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构建“技术支撑—渠道拓展—技能培育”的服务体系。一是搭建电商服务平台。整合乡村电商资源，搭建专属电商平台，帮助乡村实现农产品线上销售，部分乡村通过平台实现线上销售额超10万元；同时，开设“乡村振兴富民直播间”，通过直播带货推广特色农产品（如虾稻米、特色家禽、应季水果），带动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大幅增长。二是开展数智技能培训。在乡村开设“数智课堂”，向农户传授电商运营、直播技巧、线上推广等知识，帮助农户掌握数字化销售技能，实现“授人以渔”。三是优化产业发展方案。深入农业生产一线，调研分析家庭农场、合作社的发展困境，为其提供数字化转型建议，如针对某茶场“品牌知名度低、销售渠道窄”的问题，提出“研学品茶+线上电商整合”方案，有效提升品牌影响力与销售额。

2.文化铸魂乡村振兴，打造特色品牌

项目团队将文化资源挖掘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构建“文化挖掘—品牌融合—传播活化”的服务链条。一是挖掘特色文化资源。通过访谈、调研等方式，梳理乡村红色文化（如革命纪念馆相关历史）、民俗文化（如传统技艺、节庆习俗）等资源，提炼文化内涵与价值。二是推动文化与产业融合。将文化元素融入农产品包装、品牌宣传中，打造具有文化辨识度的乡村品牌，如依托乡村红色文化资源，设计特色农产品包装，通过电商平台与直播间推广，提升产品附加值与曝光度。三是活化文化传播渠道。通过微信公众号、抖音、微博等平台，记录乡村文化风貌，传播文化故事，既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也提升乡村文化影响力。

3.校地协同人才振兴，构建支撑体系

项目构建“高校—政府—企业—乡村”四方协同的人才培育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人才保障。一是组建跨专业志愿者队伍，通过校内公开招募，选拔跨年级、多专业学生，注重学科互补（如会计学、电子商务、文化产业管理等），组建多支志愿服务小分队，确保服务能力覆盖产业、文化等多领域。二是开展系统性培训，前期对志愿者进行政策解读、技术应用（如直播技能）及调研方法培训，结合实践地需求定制任务手册，明确分工；邀请专业教师提供指导，提升志愿者专业服务能力。三是推动人才双向流动，通过志愿服务活动，鼓励青年学生深入乡村，同时为乡村培育本土数字化人才与产业带头人，部分志愿者通过基层就业渠道留在乡村，持续贡献力量。

(三)项目运行机制

1.组织管理机制

项目建立“指导老师—项目负责人—小分队队长—队员”四级管理体系，明确各级职责，确保项目有序推进。在志愿者管理方面，依托全国性志愿服务平台完成注册登记，志愿服务时长纳入高校实践学分体系；实践结束后，

志愿者提交实践心得、影像资料及调研报告，形成“服务—记录—反馈”的闭环管理。同时，制定《志愿者规章制度》，规范志愿者行为准则，保障服务质量。

2.资源整合机制

项目积极整合多方资源，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网络。高校层面，发挥学科与人才优势，提供专业指导与智力支持；政府层面，对接地方农业数字化扶持政策，获得资源协调与政策支持；企业层面，与电商平台、农业企业合作，共建直播间、共享销售渠道；乡村层面，依托村委会、合作社等基层组织，精准对接农户需求，确保服务落地。此外，采取“多人多地”调研形式，依据“就近”原则开展实践，提升服务效率。

3.宣传推广机制

项目构建多平台、立体化宣传体系，提升影响力与辐射范围。一是运营官方宣传平台，持续更新微信公众号、抖音、微博等账号，发布实践动态、乡村故事及成效数据，累计制作推送 50 余篇、原创视频 20 余个，各平台总点击量超 440 万次；二是加强媒体合作，向各级媒体投稿，累计获国家级、省级、市级媒体报道 400 余篇，提升项目社会关注度；三是收集反馈意见，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及时了解服务对象需求，根据反馈优化服务内容，形成“宣传—反馈—优化”的良性循环。

4.激励保障机制

项目建立完善的激励与保障机制，确保志愿者权益与项目可持续性。一是权益保障，为志愿者购买意外保险，提供交通、住宿补贴；联合地方政府与企业签署安全协议，保障实践环境安全；二是精神激励，对优秀志愿者与团队进行表彰，其事迹纳入高校评优评先体系，通过媒体宣传典型案例，增强志愿者荣誉感；三是成长激励，将志愿服务经历与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社会实践学分挂钩，为志愿者提供实习、就业推荐机会，激发参与热情。

四、“数智助农，文化筑魂”志愿服务项目的实践成效

（一）经济成效：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农户增收

项目通过数智赋能与品牌打造，有效推动乡村产业转型与农户增收。在部分乡村，电商平台与直播带货带动特色农产品销量大幅增长，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百万元；部分农业基地通过数字化转型，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如某养殖基地效率提高、某水果种植园游客量同比增长 50%；此外，项目帮助脱贫户稳定增收，累计带动数百户脱贫家庭实现收入持续增长，为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二）社会成效：激活乡村活力，凝聚发展共识

项目在乡村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治理优化方面成效显著。一是培育乡村数字化人才，通过“数智课堂”等培训，累计帮助千余名农户掌握电商运营、直播推广等技能，提升乡村本土人才综合素质；二是传承乡村特色文化，通过文化挖掘与传播，增强村民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三是凝聚乡村发展共识，项目实施让村民切实感受到乡村振兴带来的变化，激发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促进乡村治理水平提升，累计收到村民感谢信 40 余封，获得服务地广泛认可。

（三）育人成效：锤炼青年本领，厚植家国情怀

项目为青年学生提供了高质量的实践平台，育人成效显著。参与志愿者中，35 岁以下占比超 90%，多数志愿者通过实践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能力，如电商专业学生负责直播运营、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参与品牌推广；项目累计形成 7 万字调研报告，提出多项乡村发展建议，部分建议被地方采纳；志愿者在实践中深刻体会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增强社会责任感与家国情怀，项目团队多次获得高校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省级志愿服务奖项等荣誉，部分项目还获得全国性社会实践立项支持。

五、高校青年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优化路径

基于“数智助农，文化筑魂”项目的实践经验，结合当前高校志愿服务的共性问题，从以下四方面提出优化路径：

（一）精准对接需求，提升服务专业性

1.建立常态化需求调研机制

高校应组织志愿者深入乡村,通过访谈、问卷、座谈等方式,全面了解乡村在产业发展、人才培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真实需求,建立“乡村需求清单”。根据需求清单设计服务项目,避免盲目开展与乡村需求脱节的活动,确保服务精准性。

2. 组建专业化志愿者队伍

优化志愿者招募与选拔机制,结合乡村需求筛选具有相关专业背景、实践经验的志愿者,组建跨专业、复合型团队;加强志愿者专业培训,邀请专业教师、行业专家、乡村致富带头人授课,内容涵盖政策解读、专业技能、乡村情况等,提升志愿者服务能力。

(二) 创新服务模式, 增强服务持续性

1. 深化数智化服务应用

充分发挥青年在数字技术方面的优势,拓展数智化服务内容,如搭建乡村数字化管理平台、开展农产品溯源体系建设、提供大数据分析服务等,推动乡村产业与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乡村文化与农产品推广,打造乡村数字化品牌,扩大乡村影响力。

2. 打造特色服务品牌

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将产业发展与文化传承相结合,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志愿服务品牌。如针对红色乡村,开展“红色文化+产业推广”服务;针对农业乡村,开展“数智技术+农业升级”服务,通过品牌化运营提升服务的吸引力与可持续性。

(三) 健全协同机制, 凝聚服务合力

1. 构建校地长效合作机制

高校应与地方政府、乡村基层组织、企业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明确各方职责与权利;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定期召开座谈会,及时对接需求、反馈问题,形成“高校出题—乡村点单—政府支持—企业参与”的协同模式,确保志愿服务持续推进。

2. 整合多方资源

高校应整合校内学科、人才、科研资源,为乡村提供智力支持;对接政府专项政策,争取资金与项目扶持;加强与企业合作,吸引企业参与乡村产业开发与志愿服务赞助,形成多方联动、资源共享的服务生态。

(四) 完善保障体系, 夯实服务基础

1. 健全经费保障机制

建立多元化经费筹措机制,争取政府专项经费、高校科研经费、企业赞助等多渠道资金支持,保障项目调研、培训、宣传等工作顺利推进;合理规划经费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 优化激励评价机制

建立科学的志愿服务评价体系,从服务时长、质量、成效、群众满意度等方面综合评价;完善激励机制,将志愿服务表现与学生评优评先、升学就业挂钩,对优秀志愿者与团队进行表彰,激发参与热情。

3. 加强安全保障

建立志愿服务安全保障机制,为志愿者购买意外保险,开展安全培训,制定应急预案;加强与服务地沟通,为志愿者提供必要的生活与工作条件,解决志愿者后顾之忧。

六、结论与展望

高校青年志愿服务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力量,在推动乡村产业升级、文化传承、人才培育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数智助农,文化筑魂”项目通过近十年实践,构建“数智技术+文化赋能+校地协同”的服务模式,在促进农户增收、激活乡村活力、锤炼青年本领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高校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实践样本。

当前,乡村振兴进入关键阶段,对高校志愿服务提出更高要求。高校应立足乡村实际需求,以“精准化、专业化、长效化”为导向,创新服务模式与机制,整合多方资源,完善保障体系,推动志愿服务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未来,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与校地协同机制的完善,高校青年志愿服务将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实

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贡献青春力量。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编写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全文)[EB/OL].(2022-04-21)/(2022-04-28).
<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723331/1723331.htm>.
- [3]任莹,刘娟.高校青年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究[J].汉江师范学院学报,2023,43(01):106-110.
- [4]卜祥利,邓秋雨,周熙.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助推乡村振兴路径探析[J].新生代,2023(02):35-40.
- [5]蔡晓珊,黄旭欣,王婕.乡村振兴视阈下大学生志愿服务能力提升研究[J].探求,2020,(05):80-90.
- [6]张晓红,袁伊芸.大学生志愿者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和机制研究——基于全国百余份案例的文本分析[J].中国志愿服务研究,2022,3(02):2-23+218.

Research on the Practical Paths and Achievements of University Youth

Volunteer Services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Assisting Agriculture and Culture Shaping Spirit" Project

Ge Ru ¹²

(¹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China ; ²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China)

Abstract: Relying on their talent and intellectual advantages, university youth volunteer services have emerged as a crucial driving force in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study takes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Assisting Agriculture and Culture Shaping Spirit" rural revitalization volunteer service project, which has been carried out by University N for an extended period, as the object of analysis. Integrating the five major objectiv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namely industrial, talent, cultural, ec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revitalization,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service practices of this project in rural areas across multiple provinces. It extracts a three-dimensional service model featuring "empowerment through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activ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collaborative linkage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localities". By analyzing the specific measur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project in aspects such as industrial upgrading,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talent cultivation,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e internal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university youth volunteer services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provides academic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radigms for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college volunteer services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words: University Youth; Volunteer-Service; Rural Revitalization;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Assistance to Agriculture; Cultural Empowerment

马锡五式工作法对司法助力乡村法治建设的当代启示

王鑫雨¹ 李哲¹

(1.山东工商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5)

摘要:司法助力乡村法治建设蕴含深刻法理。人民司法为人民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落实和体现,塑造了人民法院服务乡村法治建设工作的理论根基。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扎实开展‘化解矛盾风险 维护社会稳定’专项治理”,“加强‘三农’领域审判执行工作,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新时代的人民法院工作要赓续站稳人民立场、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红色法治精神,通过主动学习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神内涵,坚持司法为民、走好群众路线,以巡回法庭、掌上法院、送法下乡等方式深入乡村一线定纷止争,筑牢乡村法治建设根基,绘就法治乡村共建共治共享和谐画卷。

关键词:马锡五式工作法;乡村振兴;乡村法治建设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65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指出:“加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史特别是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的研究,传承红色法治基因,赓续红色法治血脉”。马锡五式工作法是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立的方便人民群众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这种工作方法蕴含着深刻的为民便民理念,体现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我们党早期司法实践的重要代表性成果,成为红色法治基因在司法领域的重要组成和生动体现。由于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于当时的农村根据地,主要适用于乡民之间的纷争矛盾,在今天的乡村治理和法治乡村建设中,这种工作方式方法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预防和解决乡村社会中的纠纷,要传承和发展。我们不仅要充分认识和传承马锡五式工作法中蕴含的红色法治基因,还要充分发掘其蕴含的深入人民群众、主动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司法理念并运用于今天的司法实践中。

一、马锡五式工作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扬的新型工作方法

马锡五式工作法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的、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新时代的延伸与传承形成的工作方法。这种方法灵活运用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纠纷解决形式,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运用调解这种不伤和气的办法解决问题。其最大特点是走到群众中间、做到群众心间。马锡五式工作法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传承,充满传统法律的情理法特点;又是中国共产党维护人民利益的具体举措,充分体现司法为民理念。这种极具本土特色的审判方式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发挥了很好的解决纠纷作用,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接纳。20世纪40年代的陕甘宁边区是以农村为主的社会环境。当时的社会环境是,不仅具有我国传统乡村社会具有的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特点,而且处于战乱动荡、生活困难的局面,广大群众大多不识字,文化水平较低,更不熟悉法律条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区政府按照党中央“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要求,在坚持抗战的同时,大力推进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成为根据地建设的模范。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朱德总司令赞誉:“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2]边区政府重视法治建设和人民权利保障,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1943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事件调解条例》,规定实行调解的直接目的在于“减少诉讼”,“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增加农村和睦”,“节省劳力以从事生产”从而有效消除边区政府困难时期的存在的纠纷矛盾

作者简介:王鑫雨(200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乡村法治建设。

李哲(1976—),男,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乡村法治建设。

通讯作者:王鑫雨

[2]《中国共产党简史》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29页。

可能导致的社会动荡。以封芝琴与张柏儿婚姻案件为例。1943年,陇东分区华池县封芝琴与张柏儿原定下娃娃亲,但封父为贪图彩礼又将封芝琴“许配”给他人,封芝琴不愿,便诉至法院。马锡五同志受理此案后,没有简单依据“父母之命”或“婚约效力”下判,而是深入当地,听取封芝琴本人意愿、村民意见,最终判决“原婚约有效”,支持封芝琴与张柏儿结婚,并批评了封父的行为乃为买卖婚姻。此案不仅维护了党的“男女平等”政策,而且通过“公开审理、尊重群众意见”的方式,让群众亲身体会并理解了“法律不是官老爷的工具,是保护老百姓的”。此案被《解放日报》报道后引发广泛关注,逐步形成马锡五审判方式。这种将党的群众路线和优良传统运用于审案工作中,取得很好的实践效果,既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维护了社会秩序,又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一种“接地气、能落地”的新型司法方式,得到党中央、边区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肯定,并被其他根据地学习借鉴。

历史地看,马锡五式工作法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发展于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新时代延伸并拓展成为了马锡五式工作法,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这种工作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群众基础的原因在于,其所做的调解,不是不择手段的“息事宁人”,而是在调解过程中充分运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能够接受的方式,最终的结果是当事人的“心悦诚服”。这种方式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总体目标和方针策略。一方面是主动服务群众,解决群众现时的困难和纷争,调节纠纷、化解矛盾、促进邻里和谐;另一方面是做群众工作,主动将党的方针政策融入到纠纷解决中,争取群众支持,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因而,马锡五式工作法是源自本土、极具乡土气息的一种审判方式和调解方式。经过不断发展,马锡五式工作法已经成为我国司法制度中的一张“金色名片”。

二、马锡五式工作法所蕴含的司法理念与乡村振兴政策精神深度契合

在今天看来,马锡五审判方式蕴含的积极主动地为民排忧解难、化解矛盾的理念就是一种为民司法,成为人民法院服务乡村法治振兴建设的理论根基,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当代的司法工作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精神内涵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 深入基层契合新时代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要求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必须主动作为、协同发力,为法治乡村建设提供司法保障,共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乡村善治。马锡五审判方式中法官将依职权调查与依靠群众相结合,主动下乡、深入人民群众中听取百姓意见、全面了解案情、实事求是查明案件事实的积极作为,正契合了这一要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面临物质生活条件艰苦、社会秩序不稳定、人民群众生活困难的背景,马锡五同志及时有效解决纠纷、维护根据地稳定团结,是积极主动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马锡五同志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注重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注重对乡村特殊情况的调查了解,包括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突破了传统“坐大堂”式审判,摒弃冗杂、呆板的繁琐程序,主动简化诉讼手续走到广大群众中间,实地了解案情、真正听取群众意见、了解当事人需求。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法官积极主动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典型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使命在司法方面的真实写照。这启示我们,新时代的司法机关不能是治理体系的“旁观者”,而应是积极的“参与者”和“保障者”,应当主动将司法职能融入乡村治理体系,为治理有效提供精准的司法服务和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 “为民”理念助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乡村振兴政策的最终落脚点都是乡村社会中的广大群众,目的是让其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回顾历史,马锡五同志讲到:“办案要走群众路线,如果离开群众,任何所谓‘天才家’也不可能把工作做好”。1948年马锡五同志和乔松山同志签发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指示信》中强调:“各级司法工作人员应坚持法官下乡,就地帮助调解和进行审判的工作制度或工作方法,实质上就是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方法,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实事求是的进行调查研究的,不拘形式地进行群众审判和确实解决问题”。^[3]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司法工作的任务要求我们对诉讼当事人不加任何限制,如“诉讼当事人要求司法机关代书呈状等,即无条件地代为缮写;诉讼当事人要求抄录口供或验伤单者,亦无条件地代为抄录”。^[4]马锡五审判方式一切为了群众、方便群众、追求公平正义的为民理念,与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发展目标完全契合。1943年2

^[3]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指示信(安字第三号)》(1948年9月1日),马锡五、乔松山签署,中国法院博物馆藏,国家二级文物。

^[4] 参见张希坡:《马锡五审判方式》,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第197页。

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马锡五同志题词：“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立足当代，马锡五审判方式依然具有极大的价值。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5-2027年）》指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完善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推进和谐邻里建设。”积极主动地为农村社会矛盾提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正是当代司法为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体现，让农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保障其权益、维护其利益，切实提升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三治结合”契合新时代解决纠纷的本质要求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结合”，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理念。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19年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马锡五审判方式依靠群众（自治）、依法调解和审判（法治）、融情于理、教化人心（德治）的实践，是“三治结合”的早期司法实践。这种实践包含法治如何引导和保障自治、如何与德治相辅相成的实践路径，与当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矛盾解纷化解理念一脉相承。马锡五同志在案件处理过程中，通常使用如下具体方式：一是坚持深入基层调查走访确保对案件事实的掌握准确无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准确适用法律；二是通过邀请乡邻参与调解，鼓励群众参与司法，及时倾听群众意见，全面理解案件背景使裁判结果不脱离实际，有效避免了机械司法，在体现司法民主的精神的同时提升了群众的参与感，保障了群众的自治基础；^[5]三是通过巡回审判、现场调解等与群众直接互动方式拉近干群关系，增进彼此信任，减少“官民对立”情绪；四是通过公开裁判过程使群众在“看热闹”中直观感受到法律适用过程，生动的学习法律知识，变“被动普法”为“主动学习”，真正实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通过这些方式，有效提高了群众的法律意识，从源头上减少类案发生的几率，具有积极有效的纠纷预防作用。例如，在“延安县杨兆云状告乡区政府案”^[6]中，马锡五同志在了解案情后便亲自到杨兆云家中深入交谈，最终在依据政府法令、参考群众意见、考虑民间习俗，结合多方意见的基础上，促成双方和解。既指出基层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的错误，使基层干部向杨兆云赔礼道歉、归还多收麦子并检讨；又引导杨兆云认识到要配合政府工作，巧妙解决了拖了好几年的申诉案。最终的结果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问题，也促进了政府与群众关系的和谐。

马锡五式工作方法不仅使当事人得到满意结果，而且使人民群众得到教育，推动社会风气得到改善，司法公正真正深入人心，实现政治效果、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真正实现统一作为衡量标准。无论是“代写诉状”还是“免收诉讼费”，无论是“巡回审判”还是“田间法庭”，无论是“审结”还是“调解”，都是司法便民理念在我们党早期司法工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是早期司法工作者的自觉践行。由于深刻反映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马锡五审判方式”历久弥新，时至今日仍具有强大生命力。彰显了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人民司法本质属性。^[7]这是必须坚持发扬的红色法治基因。

三、马锡五式工作法为乡村法治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1944年10月，习仲勋同志在绥德分区司法会议上发表《贯彻司法工作正确方向》的讲话指出：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中的一项重要建设，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是替老百姓服务的。同时还强调司法工作者不能当“官”和“老爷”，要“走出衙门，深入乡村”。^[8]中国共产党人在早期司法实践中形成的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代表的审判经验和智慧，正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保护人民生动实践探索成果。这为新时代人民法院传承马锡五式工作法，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助力乡村法治建设提供了路径启示。具体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一）以司法实践推进乡村治理“三治结合”路径

一是赋能基层法院党组织，强化法治引领。人民法院的党组织可与村党支部开展结对共建。法官还可担任乡村“法治副书记”或法治顾问，协助村“两委”依法决策、依法管理，指导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治理难题，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依法治理能力，指导培育“法律明白人”、“法治示范户”。二是人民法院务必响应《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规范（试行）》中“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的号召，主动承担培训任务，将村干部、人民调解员、党员、退伍军人等培育成“法律明白人”骨干。通过典型案件宣讲、法律知识培训，使他们成为政策法律的“宣传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法治活动的“组织员”。三是加强

^[5] 参见梁星亮、杨洪、马朝琦等主编《延安时代与陕甘宁边区史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页。

^[6] 参见张希坡：《马锡五审判方式》，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7] 参见郭晔：《新时代能动司法的理论与实践逻辑》，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报）》2024年第42卷第2期。

^[8] 习仲勋：《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五日），载《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9-11页。

司法审查与引导村规民约。在审理案件中发现村规民约与法律法规相抵触或侵犯村民合法权益的，依法提出司法建议，督促纠正。同时，积极参与指导村规民约的制定修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乡风”等内容合法、合理地融入其中，使“小公约”成为体现法治精神的“大规范”。

（二）以案结事了理念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其一，推动在乡镇层面整合人民法庭、司法所、公安派出所、信访办等力量，建立“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人民法院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提供法律指导，打通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绿色通道”，形成化解矛盾的合力，构建“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中心。一方面，加强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完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网络，积极发展乡村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加强对人民调解员法律政策、专业知识和调解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中的主渠道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整合矛盾纠纷化解资源力量，促进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其二，吸收马锡五依靠群众的经验，聘请退休干部、道德模范、乡村教师等德高望重的“新乡贤”为特邀调解员。例如，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就面向全区公开招募具有法律专业背景、基层工作经验或群众工作能力的退休干部、老党员等老干部担任“耆管事”。通过组建志愿调解服务队，从而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银色动能”，他们熟知乡情民意，善于用“土方法”解决“老问题”，在化解家事、邻里纠纷时，既能讲法理也能融情于理，能够有效促进乡风文明和社会和谐，从而创新了“乡贤+”调解模式，弘扬了文明新风。其三，大力开展便民为民利民活动，加快“数字法治·智慧司法”建设，加强发展移动微法院、在线调解平台、巡回审判车等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围绕群众需求，提供精准化、精细化的公共法律服务，为法治乡村建设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支撑。加强移动端的推广使用，拓展利用移动端开展服务的新形式，实现法治宣传、法律服务、法律事务办理“掌上学”“掌上问”“掌上办”。让偏远地区群众也能通过手机、电脑便捷获取司法服务，在线参与调解和诉讼，极大降低维权成本，实现司法为民的“零距离”。通过数字赋能，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

（三）以教育指引功能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马锡五同志在司法实践中注重对群众进行法治教育，现代司法也应通过公开审判、强化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功能等方式承担起法治宣传的责任。让乡村群众直观了解司法过程和法律规定，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和守法观念，从源头上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第一，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强化价值阐释。法官在审理涉及赡养抚养、邻里关系、土地纠纷等案件时，通过对裁判文书的充分说理，清晰阐释判决所蕴含的尊老爱幼、睦邻友好、诚实守信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使司法裁判成为生动的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教材”。第二，可以深化法治乡村示范建设，选树宣传法治乡村建设中的先进典型。通过积极评选和宣传“优秀乡村法官”、“最美调解员”、“法治示范村”等先进典型，发挥道德模范和法治榜样的引领作用，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乡村法治氛围。最后，通过利用乡村已有公共党建文化设施，推进法治广场、长廊、院坝等农村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实现一村一法治文化阵地。^[9]第三，通过加强乡村法治宣传教育，深入宣传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譬如，统筹运用基层法治宣传阵地、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农村文化礼堂、农家书屋等，为群众搭建有效学法平台。充分利用“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中国农民丰收节等时间节点和农贸会、庙会、各类集市等，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推动法治文化与民俗文化、乡土文化融合发展，组织编写、创作具有乡土文化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化作品，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

结语

马锡五式工作法以深入群众、灵活司法为主要特征。主动了解乡村群众的司法需求，充分尊重乡村群众的意愿和诉求，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将这些因素纳入司法考量，使司法裁判更具合理性和可接受性。人民法院通过传承马锡五同志将调解与审判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乡村大力推广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讼方式，当调解无法解决问题时，及时通过审判定纷止争，形成调解与审判相互衔接、优势互补的局面，高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保护各方权益。一方面通过建立常态化走访机制，定期开展乡村调研，构建多元化需求反馈渠道，参与乡村治理等方式与基层自治组织加强联动基本上能够做到深入群众、真正了解乡村法治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合理选择就地审判案件等创新审判形式，能够提升村民参与度的同时增强法治宣传教育效果，有效引导村民树立法治观念从而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推动乡村法治建设。总之，人民法院通过整合各方调

^[9] 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186/202402/content_6934551.html，2025年9月4日17:00访问

解资源,完善多元调解机制、规范审判流程,确保调判有序衔接,促进乡村和谐稳定。发扬马锡五式工作法的精神内涵,深化全局思维、创新思维、为民思维,提升认识能力、群众工作能力、外部联动能力等内部完善举措保障法院上下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将司法职能融入乡村治理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精准的司法服务和有力的司法保障。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简史》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29.
- [2]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指示信(安字第三号)[Z].1948-09-01.马锡五、乔松山签署,中国法院博物馆藏.
- [3] 张希坡,马锡五审判方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46、197.
- [4] 梁星亮,杨洪,马朝琦,等.延安时代与陕甘宁边区史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10.
- [5] 张希坡,马锡五审判方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38.
- [6] 郭晔.新时代能动司法的理论与实践逻辑[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4,42(02):30-43.
- [7] 习仲勋.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A].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9-11.
- [8]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Z].2024-01-01.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186/202402/content_6934551.html (2025-09-04 17:00).

The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Ma Xiwu-style Working Method on Judicial Support for Rural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Wangxinyu¹, Lizhe¹

(¹ School of Law,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Yantai, Shandong)

Abstract: The judiciary's role in advancing rural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embodies profound legal principles. "People's judiciary serving the people" is the implementation and manifestation of the people-centered concept in judicial practice, lay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people's courts to serve rural rule of law development. In its 2025 work report,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explicitly stated the need to "earnestly carry out the special campaign of 'resolving contradictions and risks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and "strengthen trial and enforcement work in the 'three rural'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farmers) fields to serve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 the new era, the work of people's courts should inherit the red legal spirit of standing firm on the people's position and adher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principle. By proactively learning from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the Ma Xiwu judicial mode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period, they should uphold judicial justice for the people and follow the mass line. Through mobile courts, online courts, and legal outreach to rural areas, they can resolve dispute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rural areas,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and paint a harmonious picture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ed benefits in the rule of law in rural areas.

Keywords: Ma Xiwu-style working method;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从碑刻看清代凉山地方治理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

彭文欣¹

(1.湘潭大学,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清代凉山的治理,是一个国家权力试图向边疆渗透与地方社会主动应对、适应并参与的动态过程。碑刻作为“礼仪标识”,不仅反映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而且本身即是这种互动的媒介与产物。通过分析碑文内容及其生成机制,发现立碑为地方治理的重要策略。国家通过碑刻进行权力的柔性渗透与文化的秩序建构;士绅等地方精英则通过邀立官碑将地方诉求合法化,实现“借官威以行己意”;家族则利用碑刻进行自我组织与权利主张;甚至在民族地区,碑刻成为法律整合与塑造政治认同的工具。这种持续不断的互动,共同塑造了清代凉山多元的治理形态。

关键词:凉山碑刻; 国家权力; 地方社会; 互动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81

一、引言

历史上四川凉山地处西南边陲、民族构成复杂,县志中记载其清代疆域大致为“西抵宁远府西昌县界,西北抵冕宁县泸沽、冕山营、小相岭、保保关等处界、北抵越谋厅利济、海塘、大树堡界,东至马边厅油榨坪界,南至金沙江抵永善县界。”^[1]近年来,凉山地区采取统一组织和集中普查的方式,利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专业团队的力量,圆满完成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任务,从上千通历史碑刻中精选了110通,出版了《凉山历史碑刻注评》,内容涉及凉山的民族关系、行政法规、诉讼程序、移民屯田、乡规民约、水利建设、自然灾害、宗法制度、商业贸易等诸多方面。这些碑文是对地方文献资料的补充,提供了大批反映该地区基层社会历史面貌和社会变迁的第一手资料。传统史学对清代地方治理的研究,多侧重于制度条文或官方档案,往往呈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视角。然而,散落地方的碑刻,不仅记载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互动,而且本身即是这种互动的核心媒介与产物,科大卫将其称为“礼仪标识”,即“地方社会的成员所认为是重要的客观且可见的礼仪传统标识。”^[2]北京大学的赵世瑜认为,碑刻作为乡村重要的礼仪标识,其角色具有双重性:它既维系着乡村内部的秩序,更将乡民与国家相连接,使他们在政治上与国家融为一体,至少在外观上构建出国家组成部分的认同感。^[3]可见,碑刻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各种力量之间持续的碰撞、协商。

一方碑刻的树立,往往体现了不同人群的意向,如地方官、士绅、家族等多方的博弈与共识。由于它们往往是以生活表征的面目反复出现,也往往成为地方历史的重要见证。作为互动媒介的碑刻,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本文以《凉山历史碑刻注评》为基本史料,将这些碑刻置于动态的互动关系中加以考察,力图揭示国家与社会如何运用立碑策略书写凉山地方治理的历史。

二、国家的柔性渗透:碑刻中的秩序建构与文化教化

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打败南明势力之后接管四川行都司地区,并在凉山地区开始系列的建置调整。^[4]康熙十二年(1673),建昌为吴三桂军所占。康熙二十年,清军收复建昌诸卫。雍正六年(1728),平凉山诸部落叛乱,裁撤建昌监理厅,设置宁远府,管辖县、州、厅、土司。清初,凉山地方发生多次动乱和行政上的调整。关于清初地方治理的碑刻鲜有记载。

作者简介:彭文欣(2000—)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通讯作者:彭文欣

官府作为地方治理的中枢机构,上承中央王朝,是地方情报的转达者,下达地方村社,是地方秩序的维护者,所以官府在地方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从碑刻来看,清朝中后期,地方政府针对地方出现的不良社会状况,常颁布相关治理政策,出示晓谕,并将其勒石刊碑,立在乡野,以此规范百姓与官员的行为。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公禁碑》禁止窃葬,保护山林;乾隆六十年(1795)的《严禁差役下乡滋扰地方碑》;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保护蜡虫生产交易碑》;同治七年(1868)的《禁革私开小押碑》禁止在监狱内私开当铺;《太平站碑》以告示设立“站”,按户交钱,以此顶替劳役;同治十三年(1874)的《禁籍命妄讼碑》禁止当地的“诬控命案”;等等。从碑刻内容可见,地方官府常将政令勒石立碑,其涵盖范围遍及政治、经济等领域。官府借助立碑这一形式,将各类法令制度融入地方社会,既让规则具备长期效力,也方便百姓与官员时时观览、铭记于心,从而实现政令的有效落地与基层治理的规范。

(一) 法律秩序的在地化宣导

国家律法虽已颁行天下,但其在边疆的认知度与执行力常成问题。凉山碑刻成为将抽象律法转化为地方性知识的重要工具。同治十三年(1874)所立《禁籍命妄讼碑》载:“川省民情好讼,寻常案件拖累尚浅,惟诬控命案扰害最深…推原其故有三:一为地痞惯搯乡愚…一为图谋报复…”,碑文不仅从社会风气与人为动因层面,分析了诬控命案频发的原因,还结合地方陋俗案例具体阐释:“川北陋俗,男子数岁,每与十余岁女子为婚,小接过门,希图可以工作出力,其中弊窦不可胜言。终至不受管束,野性□张,祸生不测。间有翁姑严厉,丈夫督责,即为投水服毒、自缢悬梁。该妇母家聚族而至,勒索财贿,称愿方止。”^[5]官府特意将这类典型案例作为反面教材勒石公示,既让百姓直观领会诬控命案的滋生背景与危害,也清晰地传递禁令,改正当地命案诬告的不良民风。更有光绪十四年(1888)的《四川按察使司游示碑》,它并非简单复述《大清律例》中“诬告反坐”的条文,而是全篇以更贴近地方情境的六言韵文形式,生动描绘了“尸亲藉命居奇,纠约男妇多人,恃众讹索滋闹”的具体场景,并明确警告“念讯实系藉搯,照例反坐弗轻”。^[6]这种形式的告示,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以便百姓的阅读和理解,极大地增强了法律宣传的效果,体现了国家权力在普法方式上的“在地化”调整。宣统二年(1910)的《诉讼简章碑》更是将法律条文的在地化、具体化推向了新高度。针对官府受理民间诉讼时,衙役等人等借事勒索钱财的弊病,碑文明确“每递呈词一张,由递呈之人给给房书登记笔墨钱壹百文”的具体数额,还按照里程详细规定了差役路费标准,“十里以内,原被告各给口食钱贰百文;十里以外,每十里加钱壹百文,至多不得过壹千文”。^[7]它将诉讼抽象的法律原则转化为明确、可操作的收费标准,不依赖笼统禁令,而是立足地方实际问题,用百姓能看懂、官吏难变通的明确规范传递律令,也减少了官吏舞弊徇私的可能,推动国家在基层的治理。

(二) 文化秩序的倡导与物质化

清代统治者入关后,顺治帝颁布“帝王敷治,文教为先”之诏令,各级官学随之恢复,中央设国子监,地方设府、州、县学,兼以社学、义学及书院相辅,形成了一套规制完备的文化教育体系。书院既承担了一般学校具有的教育教学功能,还肩负着宣扬国家文治理念、实现士人弘道理想的责任,是国家文化秩序在地方倡导的载体。

嘉庆二年(1798),越西通判汪金笏改建城内文昌宫,将书院迁入其内,故名“文昌书院”。清越西厅贡生郭如玉在《文昌书院记》中有如下记载:“嘉庆元年丙辰,幸蒙公祖汪金笏,湖南长沙府善化县丙午科举人,吏部推选。拨给金马山田租,设立文昌书院。凡越襦生童,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业,按月观课,捐廉奖赏,作育人材,大公无类。更欲立书舍,给膏火,招徕来学,以广栽培。”^[8]汪金笏不仅划拨金马山田租作为书院常项经费,更捐出个人俸禄奖赏士子,既以官员的道德表率为地方树立标杆,更通过保障书院运行,践行国家“文教为先”的秩序理念。而“按月观课”的考核制度,将士子学业与官方认可直接挂钩,让儒家的核心思想渗透日常,推动士子形成儒家观念。嘉庆十四年,通判吕伟仪再行扩建,始成规模,《修建文昌书院记》中有如下描述:“余奉檄代庖斯土于地方公事,未敢稍懈,兴利除弊,其难其慎。前任汪君之美意,踵而行之,以成盛举。于是传集首事等量资轻重,勉力而行。”^[9]地方官员扩建书院、持续改善其物质条件的举动,不仅体现了书院在地方文教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更体现出官方对地方文化秩序塑造的一贯坚守。是年《文昌书院碑记》载:“前任汪明府励精图治,于金马山麓清丈余田,得岁租百数十石,剖而分之…又自捐廉俸给首事生息,于城内文昌宫左右两厢修

葺数椽，为诸生肄业之所。”^[10]碑刻不仅在记录事件，更在塑造官方叙事的权威性。碑刻中强调官员“励精图治”的担当，将书院建设与地方治理联系，不但以政绩书写的形式彰显对朝廷文教政策的践行，而且向民众传递了清政府重视文教的信号，推动国家倡导的文化秩序在边疆地区深入人心。

官府还以精细的条款规定了膏火的发放与管理，光绪二十二年（1896）《香城书院膏火碑》：“一膏火原以助住院诸生焚膏灯火之费，惟住院者得与焉。一膏火定额每名给制钱八百文；一膏火原为激励而设，必月课名列榜前者，方能挨次发给”^[11]。碑文以公开的形式明确国家对书院教育的扶持与规范，反映出朝廷既重视教化，还通过标准化管理推动地方书院教育纳入国家大一统文化秩序。这种秩序倡导不仅是单纯的教育投入，更是在边疆地区构建起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认同，加强中央政权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与整合。

三、地方的能动回应：精英的策略与家族的自我组织

地方社会秩序治理除了通过地方官府力量外，亦可通过民间自治来治理。民间自治是在官府力量未能进入地方或延误时，一些基层社会组织便积极发挥作用，诸如“乡绅阶层、宗族共同体以及民间自发性结社，在乡村治理中实际承担了大量的地方公共事务，有效补充了传统国家行政职能在基层的不力。”^[12]可见，地方社会并非被动接受治理的客体，他们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但实际上，他们还积极地利用国家提供的制度渠道和资源，主动地塑造利于自身的治理环境，或借助地方官府权威行己意，或是自我组织。

（一）士绅的“邀立官碑”策略

在诸多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地方士绅常常是发起立碑的主动方。士绅主要是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颇具文化素养的中小地主、致仕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等，他们在基层社会享有较高声望与影响力，常常主动参与地方事务，教化民众，敦化社会风气。如同治七年（1868）所立《禁革私开小押碑》是由郭文庆、孙峨龄等数十名十团四乡绅耆具禀：“禁卒开设小押，则不免闲人往来，设有疏虞，关系实非浅鲜”。^[13]“小押”即小型当铺。狱卒们在监狱内私自开设当铺，不仅趁机剥削犯人，还将触角伸到了监狱之外，造成监狱内闲人往来，于是，乡绅通过联名恳请官府晓谕刊碑的方式，推动禁革此弊，充分彰显了他们在地方治理中的建言倡导作用。光绪十一年（1885）的《禁止碑》亦有相关记载：“据贡生熊登曙、文生王道彰…稟称，口地方风俗廉耻…迄今口碑载道，惟…夜间大便。此系正大官街…目击心伤。今生等邀集城外三关人等公议…无论军民人等，永不准于此处行大小便…以重廉耻而端风俗等情。”^[14]可见士绅群体以规范公共行为、净化社会风气为己任，通过向上禀请立碑的方式将公议规则固化，既为民众划定行为边界，也以公开倡导的形式强化道德教化，推动地方秩序的构建与维系。

士绅通过邀立官碑参与地方治理的实践，在经济领域同样有着体现。道光二十八年（1848）《保护蜡虫生产交易碑》的诞生过程便体现了这一点。碑文记载，先是“五省客会”首领练有坤等人，“稟恳前任县主李，赏示严禁”，他们陈述的理由极具说服力：“商民合场买卖，只望各山虫会凑集通商，如无虫会则场市不通，大路买卖冷淡，近来有等无耻游民，私偷估砍，不顾栽蓄维艰，估拿骗吃，为害闾阎甚重…保护居民，则民等闾场沾感，顶祝不忘矣。”^[15]他们将蜡虫交易与地方其他贸易联系起来，说明蜡虫买卖带动沿线商业的发展，强调蜡虫交易的重要性，再指出破坏蜡虫贸易的行为，将其上升到危害百姓的高度，从而顺利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和严厉的示禁。碑文中便明确“只许砍伐枯朽难树，毋得偷砍栽蓄虫树，以及估讨估食，倘敢强恶，许尔客会等协力擒拿，送案从严究治”，甚至规定“持杖拒捕，许地主及团邻人等照例格杀勿论”。这些原本属于官府的司法权力，通过士绅的禀请和官府的授权，部分下放给了地方社会。士绅在此过程中，以意见领袖和政策倡议者的身份，把握地方实际与需求，巧妙“借官威以行己意”，既守护了地方经济利益与市场秩序，更呈现了其通过邀立官碑参与地方治理的心理。

（二）家族的权利主张与自我规训

地方的家族也积极利用碑刻进行自我管理，并以此作为主张权利的凭证。家族即“以家庭为基础，同一男性祖先的子孙，虽然已经别籍、异财组成了许多个体家庭，但是还世代相聚在一起，按照一定的规范，以血缘关系

为纽带结合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16]为维护自家山林的权益，家族常禀地方官员以求支持，获准后就将官府告示刻碑竖立。乾隆三十六年（1771）《公禁碑》载：“在昔雍正年间，董吴二姓窃葬此山，经建昌卫孙大爷不容二姓安葬，断案可存。于乾隆三十一年陈万又窃葬麻栗湾，众等告西昌大老爷，翟仍不容陈姓安葬。众等公议勒石公禁。”^[17]该宗族因山林安葬权两度与他人产生争执，虽两次上告官府后未获得正式告示文书，大概率仅得到口头认可，却仍将相关处置结果刊刻立碑，以此明确权益边界、杜绝后续纠纷。同治元年（1862）家族立的《禁山碑》则以简洁直接的表达反映出宗族治理理念：“莹山禁铲火土，大小树木不准别枝砍伐。如有偷砍，拿获凭族处罚，刁毫者禀官究治。”^[18]这体现了一个“先族规后国法”的治理序列。它先明确宗族对莹山的自治权，规定违规者先由宗族处置，若遇顽抗不遵者再禀请官府究治。既宣告了家族的自治权，同时又暗示其最终有国家权力作为后盾。家族通过立碑的形式，广而告之，保障自己的权利。

同时，为了约束族人不法行为，保障家族繁荣，家族往往制定族规刊刻于碑，规范族人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如同治七年（1868）的《禁止赌博碑》则展现了家族进行道德教化的完整体系。碑文不仅严申家法，还详细列出了赌博“坏心术、丧品行、伤性命、玷祖宗、失家教、荡家产、生事变、离骨肉、犯国法、遭天谴”^[19]十条危害，每一条都有详细的解释。如“坏心术”条下解释道：“一入赌场，遂成利藪，只顾自己赢钱，那管他人破产，心术岂不大坏。”这种将道德说理与制度约束相结合的方式，更体现了家族在维持基层秩序方面的成熟与完善。家族得以成为除士绅参与地方治理之外，维护基层秩序的重要补充。

四、互动的场域：公共事务中的官民协作

清代时期凉山地区公益事业建设较为活跃，有修桥铺路、修建庙宇、发展教育等公共活动。其多由地方士绅、家族、官府合作，众人捐资参与，从而满足民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具体的事务，官民合作表现出不同的模式。人们为了弘扬众人之功德，彰显仁人善士之义举以达对后人树德作用，往往会将其事迹镌刻于石，以垂久远。碑刻也成为记录官与民的互动、协作过程的载体。

（一）市场管理的“官督民办”模式

道光五年（1825）的《管理市场斗秤碑》便是“官督民办”的典型例子，其记载：“奉札 特授四川宁远府会理州正堂…为札伤事。照得姜州场市斗秤前经讯明，断令将抽收余润除钱贰拾千文设立义学外，余资仍归公用。嗣据士民胡朝佩等禀举李基培充当场头专司其事…每遇公事，又复违误不□，中饱私囊，全无实济，实属藐玩。现经本州讯明，分别责革着追外，合伤另举，为此札，仰姜州九省客会知悉。札到迅即公举正直端方赴州禀举，以凭验明，给照充当客长场头。经理该处场斗秤事务，归于炎帝宫首事人等经理毋得混举非人，致干察究，毋违此札。”^[20]首先，官方是最高裁决者与规则的制定者。碑文开篇即言“奉札”，彰显了政令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同时呈现了市场斗秤纠纷的最终解决方案，即“讯明，断令”。官府不仅裁定将市场盈余部分用于设立“义学”和“公用”，更在前任场头李基培“中饱私囊，全无实济”后，行使了惩处权。其次，新的场头和人选必须由“九省客会”公举后，“赴州禀举，以凭验明，给照充当”。这意味着民间推举的人选，必须经过官府的资格审查和政治认可，才能获得合法的管理身份。这一程序将民间自治行为纳入了国家行政管理中。这些都体现了“官督”这一模式。

而民间组织是公共事务的具体承担者。碑文最后明确规定，市场斗秤事务“归于炎帝宫首事人等经理”。“炎帝宫”为民间信仰和公共议事场所，其“首事”通常是地方上有声望的人。民间组织获得了市场管理权，执行具体征收与管理的工作。但政府规定市场税收用于“义学”和“公用”，体现了官民双方对公共利益的共同追求，将市场管理与社会建设结合在一起，增强了官民合作的正当性与凝聚力。官方将日常管理的琐碎事务与潜在纠纷下放给民间组织，降低了自身的负担。而民间组织则在官府的授权下，获得了合法管理的权威，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地方治理。道光十三年（1833）的《立招佃合约碑》所记载的事件，是清代基层社会“官督民办”模式的又一例证^[21]。此碑由民间地主、商人、客长等主体订立合约并立碑为证，但其内容和背景深刻地反映了在官方监督下，民间通过自我协商与责任划分，从而间接实现与官府的协作。

道光七年（1827）的《管理蜡虫交易市场碑》^[22]提到“向来镇府口委口妥人赴各处口口”，说明官府会主动

派遣人员维持蜡虫交易市场的秩序。但同时，碑文也指出存在“各乡场约保人等即藉口口兵役饮食夫马名色，公然设口敛钱以肥私囊”的弊端，因此需要“严行示禁”。这种既委派人员管理，又防止管理人员滥权的做法，可见官府在市场管理与监督中的不断调适与完善。

（二）官民协作下公共工程与社会救济的“地方主体性”

清乾隆十四年（1749）所立《寿福寺碑》^[23]，是观察清代官民合作中地方主体性实践的案例。碑文开篇即载“雍正拾一年奉例开垦”，表明垦荒事业是在国家政策下进行的；而随后“绅士赵子贤与吾楚众等谪垦，将前项田亩编立合约三股分”，民间不仅参与垦荒，更以“合约”形式自主完成田产股份划分，体现出其在公共事务中的执行能力与组织自觉。“客长李定伯”代表移民群体，“保正曹凤卿、谢乃文”则为国家在基层的治理代表，二者共同镌石立碑，可见移民与基层力量在地方事务中的协作。寺产的长期维持与发展，更可见民间自我组织能力的持续运作。从乾隆十四年立碑至二十六年增刻，其间多次记录民间陈老道、李文吉的捐银以及“众会首会议”对铺地租的管理决策，展现出地方社会在公共资产经营中的自主性与延续性。尤为重要的是，碑身将田产四至、租额、契约内容乃至官方政令一并刻石，使其兼具民间契约的属性与官方文书的权威色彩。这不仅是民间自我治理的载体，也是地方社会主动寻求国家认同的策略。

同治四年（1865）所立的《莲花池古渡碑》^[24]，亦是官民合作背景下地方主体性的生动体现。碑文记载，渡口修缮工程由“两地绅粮首人会商张族老幼”共同推动，并顺利实现“募化庙基，君略无吝色，乡口亦皆乐助”。这一过程显示出地方精英与家族在公共事务中所具的组织能力，在官方政策默许或支持的框架内，承担起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责任。除了公共工程领域，在光绪九年（1883）《棲流所碑》^[25]所反映的社会福利事业中，官民合作下的地方主体性也可见一斑。碑文开篇“棲流所之设，原以便往来无无穷黎棲止”，棲流所为救济流民与乞丐的场所。在修缮工程中，虽由官府主导出资，款项“由本分县垫”，并强调此举是“仰体天心，俯顺舆情”，但其具体执行与日常管理的职责，则明确委托给了“团正廩生胡朝华”等地方士绅。官府通过授予士绅立碑与监督之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并利用了他们在基层社会中的威望与组织能力。士绅由此不再是单纯的执行者，而成为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碑刻本身，也因此成为官方权力与地方自主性在福利领域中实现互补协作的见证。

五、边疆的特殊情境：民族关系中的法律整合与政治认同塑造

在多民族杂居的凉山，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向，碑刻成为观察法律整合与身份政治的重要窗口。

（一）国家法律作为跨族群的仲裁基准

道光三十年（1850）《鲁姓彝族山界碑》^[26]反映出清代凉山地区汉彝族之间的土地纠纷，以及官方对少数民族权益的保护。其开篇就明确了其权力来源：“特授四川宁远府冕宁县正堂加三级记录五次沈”，这表明整个事件的解决是在国家行政与法律内完成的。为了消除未来争议，地方政府明确了地理坐标，碑文精确地划分了菩萨山的“四至界址”。官府裁决的依据并非传统的民族习惯法，而是基于明确的产权和纳税义务。碑文特别强调鲁姓彝民“每年上纳地丁条银一钱二分一厘五毫”，这说明他们已被纳入国家的编户齐民体系，从而有资格享有与汉民同等的法律保护。官府通过对此类案件的审理和碑刻公示，向社会传递了一个理念：在国家法律面前，各族群身份平等，权利与义务对等。碑文中记载的判决过程也颇具深意：“蒙县主业已断明，其夷之菩萨山、灵牌山、祖坟山，原系夷等祖遗山场。”这里的“原系夷等祖遗山场”的认定，实际上是对彝族传统产权的承认，但又是通过国家法律赋予其合法性。这种既尊重传统又通过国家权力确认的方式，体现了清政府在民族地区治理中的灵活务实。

光绪三十一年（1905）《茨达河场晓谕碑》载：“照得宽元顶一带夷务，去年经雷前任亲往办妥，订立条规，责成各夷目守哨保护，原应永远遵守，近闻各支夷目因地段不明，意存推诿。设不定议条规，各专责成，诚恐日久懈生，地方复遭蹂躏。兹将宽元顶、茨达河、麻栗坪一带地方，划清里数，分设八哨……过路客商，收取哨钱若干。设遇失事，责令夷目赔赃，各情分别十条，详载于后……为此示。凡过客货挑，应纳哨钱，务遵此示所定数目，

如数付给，不得怪客竞争。收钱者不得格外多索，夷目分段看哨不得推诿。总期汉夷相安，彼此均不可扶嫌诬害。汉人多事，本县必执法严惩；夷人抗违，现驻防口二营随时必派队剿办。仰各遵照，不得玩误。”^[27]亦是分别明确了汉夷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它不以族群身份作为权利和义务的划分标准。当规则被破坏时，国家作为仲裁者。同时，政府还颁布了设哨收取哨钱十条，维护跨族群的商业活动秩序。

（二）民族精英的利益诉求与国家政治认同的塑造

正如上文提到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茨达河场晓谕碑》不仅在民族地区颁布法令以维护秩序，更是通过碑刻这一法令载体塑造政治认同。其一，碑文对汉夷双方均提出了约束，塑造了官府不偏不倚的“父母官”形象，使其作为公平的化身而被双方所需要，从而增强了其权威的合法性与认同感。其二，夷目只是部落首领，其权力源于传统或武力。碑文通过“责成各夷目守哨保护”，实际上是以国家名义，对他们的权力进行了一次“授职”。他们成为了为社会公共安全的维护者。这种身份的转变，是诱导政治认同的重要一步。并且夷目通过保护商路可以获得合法、稳定的经济收入，这使得夷目的个人利益与朝廷维持地方稳定、畅通商路的核心利益保持一致，塑造成为利益共同体。其三，“总期汉夷相安”，这旨在消弭民族隔阂。由此可见，碑刻成为了政府塑造政治认同的载体。

在这一法律整合过程中，当地少数民族精英也表现出卓越的适应能力。在道光三十年（1850）的《鲁姓彝族山界碑》中，鲁姓族人不仅在法律上寻求国家保护，在碑文叙事中也刻意强调其始祖“洪武二年勤劳王事，安扎于此山之下”，试图将家族的历史与王朝的开拓史相联系，将自己塑造为忠顺子民，而非化外之民。碑文还详细记载了从始祖到立碑时的家族谱系：“至万历三十六年，子孙源流一十四代”，这种书写方式与汉族族谱的编纂传统如出一辙。长时段的家族史叙述，就是为了表明土地所有权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源于长期的与世代相承的权利，完全符合儒家文化中重视先祖基业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部分少数民族精英在文化身份上对国家的认同。他们通过将自己的家族历史纳入王朝历史的叙事框架，既强化了自身权利的合法性，也表明了文化归属的选择。官府通过碑刻保护其权益，使其在获得实在利益的同时，增强了对国家的向心力。碑刻，因此在边疆地区成为构建国家认同的物质载体。

国家通过法律的统一适用，将边疆族群及其资源纳入王朝的治理秩序，实现了政治上的整合，而地方族群则通过主动进入司法程序、巧妙地将自身的历史叙事与法律结合，塑造并巩固了一个受国家承认的身份。在这一过程中，族群也增强了地域、政治认同。

六、结论

通过对清代凉山地方治理碑刻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其有效的治理秩序并非由国家单方面强加，而是在国家与地方社会持续、能动的互动中共同生成的。碑刻是区域社会不同群体之间长时段的互动、交流、博弈的产物，承载着地方各群体之间的主观诉求与行为活动；也是地方社会运行的重要载体与实录，记录着地方社会历史演变与进程，对地方社会运行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首先，国家权力展现了其灵活性与适应性。它并非一味强硬，而是善于运用碑刻等文化媒介进行柔性渗透，通过回应地方诉求、吸纳精英参与等方式，实现了在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其次，地方社会展现了其强大的能动性与创造力。他们主动地利用、影响甚至塑造国家的治理实践，使其更符合本地社会的实际需求。第三，碑刻作为互动的核心媒介，在形式、内容、功能上的多样性，正反映了治理实践应对不同领域、不同问题的丰富性与适应性。最终，这种互动生成的治理秩序具有强大的韧性与生命力。它既包含了国家的权威，也融入了地方的智慧与需求；既有强制性的规范，也有共识性的公约。凉山碑刻，作为地区互动的永恒见证，其价值历久弥新。它们不仅告诉我们清代的凉山是如何被治理的，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有效治理的本质：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积极的、建设性的互动关系。这一历史智慧，对于今天我们理解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仍不失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光绪雷波厅志: 卷3 疆域志[M]//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一辑).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32.
- [2]末成道男, 刘志伟, 麻国庆.人类学与“历史”——第一届东亚人类学论坛报告集[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233-239.
- [3]赵世瑜.结构过程·礼仪标识·逆推顺述——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三个概念[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1(33).
- [4]雍正四川通志: 卷18 下边防·建昌道属[M]//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一辑).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117.
- [5]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著.凉山历史碑刻注评[M].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189.
- [6]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著.凉山历史碑刻注评[M].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204.
- [7]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著.凉山历史碑刻注评[M].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244.
- [8]光绪越西厅全志: 卷5 学校[M]//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一辑).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291.
- [9]光绪越西厅全志: 卷5 学校[M]//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一辑).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291.
- [10]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著.凉山历史碑刻注评[M].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105.
- [11]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著.凉山历史碑刻注评[M].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230.
- [12]周庆智.官治与民治: 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的重构[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16.
- [13]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著.凉山历史碑刻注评[M].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177.
- [14]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著.凉山历史碑刻注评[M].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202.
- [15]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著.凉山历史碑刻注评[M].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138.
- [16]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4.
- [17]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著.凉山历史碑刻注评[M].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95.
- [18]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著.凉山历史碑刻注评[M].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159.
- [19]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著.凉山历史碑刻注评[M].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175.
- [20]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著.凉山历史碑刻注评[M].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109.
- [21]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著.凉山历史碑刻注评[M].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119.
- [22]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著.凉山历史碑刻注评[M].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111.
- [23]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著.凉山历史碑刻注评[M].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93.
- [24]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著.凉山历史碑刻注评[M].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171.
- [25]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著.凉山历史碑刻注评[M].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197.
- [26]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著.凉山历史碑刻注评[M].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146.
- [27]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著.凉山历史碑刻注评[M].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237.

Through Stone Inscription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 and Local Society in Qing Dynasty Liangshan's Governance

Peng Wenxi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 and Culture,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China)

Abstract: The governance of Liangsh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as a dynamic process in which state power attempted to penetrate the frontier, while local societies proactively responded, adapted, and participated. As "ritual markers," stone inscriptions not only reflect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local societies but also served as both a medium and a product of such interaction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nscription content and their formation mechanism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erection of steles was an important strategy in local governance. The state employed steles for the flexible penetration of pow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al order; local elites, such as gentry, leveraged the commissioning of official steles to legitimize local demands, thereby "using official authority to advance their own interests"; families utilized steles for self-organization and the assertion of rights; even in ethnic regions, steles became tools for legal integration and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identity. This continuous interaction collectively shaped the diverse forms of governance in Qing-era Liangshan.

Keywords: Liangshan stone inscriptions; state power; local society; interaction

粤港澳大湾区 AI 法律诊所的应用研究

陈军艳¹ 周聪宇² 黄峻²

(1.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城乡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000;

2.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域, 在城市更新与法治建设中面临多样化的法律服务需求与挑战。传统法律服务模式因效率低、成本高及语言壁垒, 难以满足区域多法域、多语言环境下的基层法律需求。本文基于自主开发的 AI 法律诊所 App, 该 App 以“法律+AI”交叉创新治理为逻辑起点, 依托豆包大模型, 通过 LoRA 微调、区块链存证及联邦学习技术, 构建了支持粤语、普通话与英语的多语言法律服务系统, 覆盖城市更新、区域整合、旧村改造纠纷等各种场景。App 通过分类分级优化、多语言准入规则、责任主体分配及动态优化机制, 确保服务效率与数据安全。并且, 校地合作模式为 App 的开发与推广提供了组织保障, 实现了教育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深度融合。本文分析了 App 的技术架构、创新应用及社会效益, 探讨了其在区域法治建设与法律教育改革中的潜力, 同时提出技术与伦理挑战及未来发展方向。研究表明, AI 法律诊所 App 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基层法律服务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 具有显著的区域适用性与推广价值。

关键词: AI 法律服务; 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农村更新纠纷; 法律教育改革; 场景化应用

基金项目: 2025 年度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粤港澳大湾区 Ai 法律诊所》; 《新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对策研究——以肇庆市新桥洋篮竹编技艺为例》(编号: 25GJ-350);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城乡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25 年课题《AI 赋能肇庆市非遗文化传承的数字化保护与创新体系构建》(编号: GYKCS-2025-08)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694

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战略核心区域, 肩负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使命。城市更新是其重要驱动力, 涉及土地征收、拆迁补偿、环境保护及居民安置等领域, 催生了多样化的法律服务需求。然而, 传统法律服务模式因效率低、成本高及语言壁垒, 难以满足大湾区多法域、多语言环境下的基层需求。特别是粤语作为主要交流语言, 现有 AI 法律服务工具普遍缺乏精准的粤语语义解析, 导致本地居民获取法律服务的便捷性不足。此外, 跨法域的法律适用与数据隐私保护问题进一步增加了服务复杂性。基于此,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依托“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开发了 AI 法律诊所 App, 以“法律+AI”交叉创新治理为理念, 结合豆包大模型、LoRA 微调及区块链技术, 构建支持粤语、普通话与英语的智能化法律服务平台。该 App 聚焦城市更新、区域整合、旧村改造纠纷等各种场景, 通过学生主导运营与校地合作, 提升服务效率与区域适配性。本文旨在介绍 App 的开发逻辑、技术架构及制度设计, 分析其在法治建设与教育改革中的价值, 探讨技术与伦理挑战, 并为区域 AI 法律服务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一、粤港澳大湾区 AI 法律服务的多元需求与挑战

(一) 大湾区城市更新中的法律服务需求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战略核心区域, 承载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使命。城市更新是其发展的关键环节, 涉及土地征收、拆迁补偿、环境保护以及居民安置等复杂领域。这些活动在推动区域经济与社会进步的同时, 也

作者简介: 陈军艳 (1993—), 女, 汉族, 湖南永州人,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讲师、广东省社科研究基地——城乡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研究方向为数字法学、网络法、物流法;

黄峻 (1999—), 男, 汉族, 广东河源人,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本科学生。

周聪宇 (2000—), 男, 汉族, 广东清远人,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本科学生。

通讯作者: 周聪宇

带来了多样化的法律服务需求。例如，城市更新中的拆迁补偿争议常常涉及多方利益主体，需通过法律途径协商解决。此外，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多元文化背景，使得法律服务需兼顾不同法域的规范，如内地、香港、澳门的法律体系差异。这不仅增加了法律服务的复杂性，也对服务的及时性与精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②。传统的法律服务模式依赖人工咨询与文书处理，效率较低且成本较高，难以满足大湾区快速发展的需求。因此，亟需引入智能化技术，以提升法律服务的可及性与响应速度。

(二) AI 技术驱动下的多语言服务缺口

粤港澳大湾区居民以粤语为主要交流语言，且普通话与英语的使用比例亦较高。根据《单韵鸣：粤语的传播现状及传播策略探析——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九市居民的调查及网络数据挖掘》的调查显示，九市居民粤方言掌握情况良好，粤语尤其在老广东人群中普及率达到 98%，而新居民与移民群体中，粤语与普通话并存，英语则在商业与国际交流中不可或缺。然而，现有 AI 法律服务工具在多语言支持方面存在显著不足。市场上常见的 AI 法律平台，如某些国内数据库或国际模型，普遍以普通话或英语为主，缺乏对粤语的精准语义解析与法律场景适配。这导致本地居民在获取法律服务时，面临语言障碍，特别是在涉及基层纠纷的咨询中，粤语的缺失直接降低了服务的有效性。此外，跨法域的法律服务需求进一步放大了多语言支持的重要性。AI 法律诊所 App 的开发正是针对这一缺口，通过引入粤语语义解析技术，力求实现多语言无缝衔接，提升区域法律服务的覆盖面与亲和力。

(三) 基层法律纠纷的数字化权益挑战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大湾区的基层法律纠纷呈现出新的特征。城市更新中涉及土地征用、拆迁补偿、环境保护、居民搬迁等多方面的复杂法律问题，均要求法律服务具备快速响应与精准匹配的能力。然而，基层居民在获取数字化法律服务时，面临数据隐私保护与数字权益保障的挑战。例如，AI 系统在处理个人敏感信息时，需确保数据存储与传输的安全性，避免信息泄露或滥用^③。此外，基层用户对 AI 技术的信任度较低，尤其是在涉及法律纠纷的敏感场景中，如何通过技术手段增强用户信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人工智能在数据安全方面存在不容忽视的风险，这些风险贯穿数据搜集和处理的全过程，需通过加密、匿名化处理、访问控制等技术手段搭建数据隐私防火墙。^④AI 法律诊所 App 通过引入区块链存证与联邦学习技术，尝试在保护用户隐私的同时，提供高效的法律服务。然而，如何在技术应用与用户权益之间找到平衡，仍是开发与推广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的挑战。

二、现有 AI 法律服务体系的局限

(一) 宏观层面：区域化规范缺失

当前，AI 法律服务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但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化应用中，相关规范体系尚未完善。“涉外法律服务智能化程度低，律师在处理法律事务时仍以传统的解决方式为主，处理涉外法律问题效率偏低，资源得不到充分的整合与利用难以满足国际法律服务的需求”^⑤从宏观层面看，AI 法律服务的监管框架主要集中于通用性技术标准，缺乏针对大湾区多法域、多语言环境的专门规范。例如，内地、香港与澳门在数据跨境流动、法律适用与隐私保护方面的规定存在差异，导致 AI 法律服务在跨区域应用时面临合规性难题^⑥。此外，国家层面关于 AI 伦理与法律服务结合的指导政策尚在探索阶段，地方性法规对 AI 法律服务的支持力度不足。这使得 AI 法律诊所 App 在开发与推广过程中，需自行探索区域化适配路径，增加了项目的不确定性。区域化规范的缺失不仅限制了 AI 法律服务的推广效率，也对服务的长期稳定性与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二) 中观层面：技术准入机制不足

从中观层面分析，现有 AI 法律服务体系在技术准入机制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现行 AI 法律服务平台多依赖通用大模型，缺乏针对特定法律场景的深度优化。例如，某些国内 AI 法律工具在处理城市更新纠纷时，难以精准匹配粤港澳大湾区的法律案例与法规数据库。此外，技术准入机制的缺失导致部分 AI 服务在语义解析与法律推理方面的准确性不足，尤其是在粤语咨询场景中，现有模型的语义理解能力普遍较低。AI 法律诊所 App 通过引入 LoRA 微调技术与区域化知识图谱，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然而，技术准入机制的完善需依赖行业标准与监管政策的协同推进，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这种机制不足限制了 AI 法律服务在区域性场景中的深度应用，亟需通过技术创新与政策支持加以改进。

(三) 微观层面：服务工具与场景缺漏

^② 参见莫积斌,黄政凯. “AI+法治”跑出解纷“加速度”[N]. 广西法治日报, 2025-08-26 (B01).

^③ 参见赵熠如. AI 侵权行为频发 敲响网络空间监管警钟[N]. 中国商报, 2024-11-29 (005).

^④ 参见徐进. 以法驭智：人工智能应用的法律风险及防控策略 [J].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 23 (06): 73-78.

^⑤ 参见黄格玲. “司法 AI+涉外法律服务”：广西的探索实践 [J]. 中国外资, 2025, (01): 104-108.

^⑥ 参见李晓楠. 跨境人工智能服务安全监管的逻辑基础与规则展开 [J]. 河北学刊, 2025, 45 (05): 170-180.

从微观层面看，现有 AI 法律服务工具在功能设计与场景覆盖方面存在明显缺漏。首先，多数 AI 法律服务平台的交互方式较为单一，依赖文本输入，缺乏语音交互与多模态支持，难以满足基层用户的使用习惯。其次，在具体场景应用中，如城市更新中的拆迁补偿、环境保护、继承纠纷，现行工具的场景化适配能力不足，难以提供精准的法律建议或文书生成服务^⑦。此外，现有平台在用户体验设计上缺乏针对性，例如对粤语用户的界面优化不足，导致服务普及率较低。AI 法律诊所 App 针对这些问题，设计了多语言交互界面与场景化法律服务模块，覆盖城市更新、区域整合、旧村改造纠纷等场景。然而，现有工具的局限性表明，AI 法律服务需进一步加强场景化设计与用户体验优化，以满足大湾区的多样化需求，本文 AI 法律诊所 App 与部分现有 AI 法律服务平台的对比分析如表 1 所示。

表 1: 本文 AI 法律诊所 App 与部分现有 AI 法律服务平台对比分析表

对比维度	DeepSeek 法律智能体 (如“穗小仲”)	北大法宝智能立法辅助平台	华宇法律 AI 平台	本文 AI 法律诊所 App
核心功能	法律依据检索、类案推送、裁决分析生成，问题识别准确率 95% 以上	立法起草辅助、文本比对、格式生成，要素提取准确率超 90%	卷宗识别、文书纠错、司法数据治理，覆盖 200+ 司法场景	多语言咨询、场景化解决方案、区块链存证、动态法规更新，覆盖基层特色场景
多语言支持	仅支持普通话文本交互，无粤语、英语语义优化	支持通用文本翻译，无法律场景多语言适配，未覆盖粤语	以中文为主	支持粤、普、英三语，LoRA 微调后粤语语义准确率达行业高位，适配法律专业表达
大湾区适配	聚焦单一劳动仲裁场景，未整合港澳法律资源，数据跨境合规缺失	侧重国家层面立法辅助，无大湾区跨法域规则适配模块	司法机关场景为主，未覆盖城市更新、校园创业等大湾区特色需求	整合内地 - 香港 - 澳门法规体系，针对城市更新、跨境创业设计合规模块，适配多法域需求
场景覆盖	集中于劳动争议领域	仅限立法与规范性文件处理，无民生纠纷、企业合规等实操场景	覆盖法院、检察院核心业务，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场景缺失	覆盖城市更新、区域整合、旧村改造纠纷等场景的基层纠纷
技术支持	依托通用大模型，无场景化微调	基于 NLP 与深度学习，无多模态交互与实时优化机制	融合区块链与知识图谱	采用 LoRA 微调+联邦学习+区块链存证，实时更新法规图谱，降低幻觉率
数据安全	企业级加密，但无跨区域数据协同保护方案	合规性强，但数据共享效率低，存在“数据藩篱”	区块链存证保障真实性，但未解决跨境数据隐私冲突	联邦学习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区块链存证操作日志，符合三地隐私法规要求
运营模式	政务单一主体运营，缺乏用户反馈迭代机制	面向专业机构，无基层用户参与式开发	企业主导技术输出，校地资源整合不足	校地合作（高校+司法局）模式，学生运营+群众反馈双驱动迭代
主要局限	场景单一、多语言缺失、AI 幻觉风险高	定位专业立法，民生服务适配不足、区域化缺失	侧重司法机关，基层场景覆盖少、跨境合规弱	无上述共性局限，针对性解决大湾区“多语言、跨法域、基层化”核心痛点

三、AI 法律诊所 App 的开发逻辑：交叉创新治理

(一) “法律+AI” 作为创新治理的逻辑起点

^⑦参见朱子钰，在技术创新与权利保护间构建新秩序[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5-05-22 (007)。

粤港澳大湾区 AI 法律诊所 App 的开发以“法律+AI”为核心理念，旨在通过技术与法律的深度融合，应对区域法治建设的复杂需求。“DeepSeek 作为先进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工具，在提升政务服务管理效率、增强风险识别能力、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在本地化部署应用中也面临知识产权、数据保护、网络安全等系列挑战”^⑧“法律+AI”这一理念不仅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法律服务的工具，也将其视为推动法治创新的驱动力。法律服务在粤港澳大湾区面临多法域、多语言的挑战，传统模式难以满足快速响应与精准适配的要求。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能够通过自动化分析与智能推理，提升法律服务的效率与覆盖面。例如，基于大模型的语义解析技术可快速处理复杂的法律咨询，而知识图谱的应用则能实现法规与案例的精准匹配。AI 法律诊所 App 以此为逻辑起点，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特性，开发出支持粤语、普通话与英语的法律服务系统。此外，这一模式强调技术与法律的交叉融合，不仅提升了服务能力，也为培养复合型人才提供了实践路径。通过“法律+AI”的创新治理，App 为区域法治建设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二) 多模态技术作为创新治理的策略工具

多模态技术的应用是 AI 法律诊所 App 开发中的核心策略工具，旨在增强服务的交互性与场景适配性。粤港澳大湾区居民的语言习惯与使用场景多样，单一的文本交互难以满足用户需求。多模态技术通过整合文本、语音与图像处理能力，显著提升了 App 的易用性。例如，语音交互模块支持粤语语音输入，结合语义解析技术，能够准确识别用户意图并提供法律建议。此外，App 引入了图像识别功能，用户可上传合同或证据图片，系统自动提取关键信息并生成分析报告。这种多模态交互不仅提高了服务的便捷性，也降低了基层用户的技术使用门槛。并且，App 通过 LoRA 微调技术优化了大模型在法律场景中的表现，确保粤语咨询的语义准确率达到较高水平。多模态技术的应用使 App 能够灵活应对城市更新、校园创业等多样化场景，从而为用户提供更加贴合实际需求的法律服务。

(三) 校地合作作为创新治理的组织保障

校地合作是 AI 法律诊所 App 开发与推广的组织保障，体现了教育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深度结合。高校与地方司法局基于“资源互补、需求对接”合作建立了法治乡村工作室，为 App 的开发与测试提供了真实场景。例如，工作室提供的城市更新案例数据，为 App 的知识图谱构建与模型训练提供了支持。此外，校地合作模式将学生置于法律服务实践的前沿，不仅提升了学生的专业能力，也增强了 App 的社会影响力。学生团队通过参与案例标注、系统测试与社区服务，直接接触真实法律需求，从而深化了对“法律+AI”交叉领域的理解。并且，这种合作模式通过校内资源整合，如 NVIDIA A100 GPU 集群的计算支持，确保了 App 开发的技术可行性。校地合作的组织机制不仅推动了 App 的落地应用，并能形成了“教育实践 - 技术落地 - 法治服务”三位一体的可复制范式，为大湾区其他地市推进“AI+ 基层法治”提供了参考样本。以某地司法局主导研发的 AI 产品为例，“AI 数字政务员、公共法律服务版‘AI 司小宣’通过全部国产化的先进创新技术手段，能够准确理解需求，链接到合适的咨询资源，从而更迅速、更精准地回应群众和市场主体的所需所盼”^⑨

四、AI 法律诊所 App 的制度设计与完善

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更新、区域整合及旧村改造过程中，频繁发生的土地征用、拆迁补偿、环境保护、居民搬迁等各类复杂法律纠纷，AI 法律诊所 App 从旧村居民、改造主体等实际使用者的需求出发，通过四项核心制度设计，精准解决场景化难题，具体内容如下：

(一) 对法律服务场景实施分类分级优化

贴合旧改用户“需求分层”特征，设计“快速查询——中度分析——深度解决”三级服务路径。对于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居民搬迁临时安置补贴等基础咨询，用户通过语音（支持粤语）或文本输入关键词（如“某地旧村拆迁补偿多少钱”），即可获取辖区最新政策摘要与计算示例，避免翻找冗长法规文件；对于多户共用宅基地权属争议、拆迁补偿协议条款解读等中度纠纷，系统自动调取同类旧改案例（如增城区旧村改造宅基地确权判例），用通俗语言拆解法律关系；对于涉及环境保护的复杂纠纷（如旧改项目污染扰民索赔），则触发“深度推理+证据指引”功能，帮助用户梳理维权的逻辑。

聚焦旧改的核心法律问题，提供场景化工具——例如拆迁补偿模块提供定制化协议模板，标注“补偿金额计算方式”“违约责任”等关键条款，避免开发商模糊表述；环境保护模块支持用户上传污染照片、检测报告等证据，系统自动生成“污染事实描述+法律依据引用”的维权初稿；居民搬迁模块整合周边安置房源信息与搬迁补贴申领流程，解决“搬迁无方向、补贴不知领”的难题，打破旧改纠纷“咨询无门、解决无据”的困境。

(二) 完善多语言 AI 服务安全准入规则

^⑧参见季雨佳. 行政机关 DeepSeek 应用法律风险及对策建议[N]. 山西科技报, 2025-06-26 (B07).

^⑨参见法治温度暖蓝田 服务群众“零距离”[N]. 各界导报, 2025-09-05 (004).

针对旧村老年居民占比高、粤语使用频繁的特点，通过 LoRA 微调技术将旧改场景粤语语义解析准确率提升至 92%，支持“粤语语音直接问拆迁补偿”“方言术语自动转化为法律表述”（如将“地契”转化为“宅基地使用权证”），避免因语言隔阂导致的政策误解；同时简化敏感信息操作，用户上传土地权属证明、身份证等材料时，系统自动脱敏处理（隐藏部分证件号），仅提取“土地位置”“使用权人”等关键信息，无需手动填写完整隐私数据。用户的土地资料、补偿协议等敏感数据通过联邦学习实现本地处理、不跨域传输，仅将分析结果上传；所有操作日志如补偿标准查询、证据上传等均通过区块链存证，既防止数据篡改，又避免开发商、第三方非法获取用户隐私，解决旧改用户担心泄露隐私信息、不敢用 AI 的顾虑。

多语言支持是 AI 法律诊所 App 的核心特色，其安全准入规则的设计至关重要。粤港澳大湾区的多语言环境要求 App 在粤语、普通话与英语之间实现无缝切换，同时确保数据处理的安全性与合规性。为此，App 引入了严格的准入机制，包括语料库筛选与模型训练规范。一方面破解旧改多语言服务空白，确保粤语用户能顺畅获取土地征用、拆迁补偿等信息，避免因普通话沟通不畅错过维权时效；另一方面通过“旧改语料专项审核+联邦学习+区块链存证”保障数据安全，粤语语料的收集与标注需经过多轮审核，以确保语义解析的准确性。此外，App 通过联邦学习技术，在保护用户数据隐私的前提下，实现跨区域的数据协作^⑩。并且，针对跨境数据流动可能引发的合规性问题，App 参照内地、香港与澳门的隐私保护法规，设计了动态加密与访问控制机制。这些准入规则不仅保障了多语言服务的安全性，也为 App 的跨法域应用奠定了基础。通过持续完善准入机制，App 能够在复杂环境中保持服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三）价值链下的责任主体识别及义务分配

明确“学生开发团队+地方司法局+学校监管组”的旧改专项责任体系——用户在 App 旧改模块可实时查看数据来源（如“本补偿标准依据《广州市旧村庄更新实施办法》第 15 条”）、案例出处（如“某地区某旧村宅基地确权案（2025）粤 XXXX 民初 XX 号”），遇到服务争议时，可通过区块链存证的操作记录追溯责任，如某补偿建议错误，可追溯至开发团队模型训练疏漏；同时学生团队定期参与旧改纠纷调解实践，将通俗易懂的解答逻辑融入系统，提升用户理解度。

通过分层义务体系确保旧改服务专业性与合法性——开发团队负责优化旧改场景模型，确保土地征用权属认定、拆迁补偿计算等功能准确，例如避免将集体建设用地误判为国有土地；地方司法局作为数据提供方，定期更新旧改政策文件、调解案例，确保系统输出的法律建议有真实依据；学校监管组核查旧改模块合规性，例如环境保护纠纷中引用的《环境保护法》条款是否现行有效、居民搬迁补贴指引是否符合最新政策，解决旧改用户对 AI 服务“给错建议、担不起责”的核心担忧，让用户敢于用 AI 辅助旧改维权。

（四）性能评估及动态优化机制

性能评估与动态优化是 AI 法律诊所 App 制度设计的重要环节。建立旧改场景专属优化闭环——实时监测“土地征用咨询准确率”“拆迁补偿计算误差率”等指标，若某旧改项目周边补偿标准调整（如广州黄埔区某村旧改补偿单价提升），系统接到反馈后及时更新政策库，并通过弹窗提示用户；针对旧改不同阶段（如签约期、搬迁期）调整服务重点，如签约期主推“补偿协议审查”，搬迁期侧重“临时安置指引”，避免服务与需求脱节。

破解传统 AI 法律平台“政策过时、场景覆盖不全”的弊端，动态更新旧改等知识图谱，涵盖“土地征用确权流程”“拆迁补偿异议处理”“旧改项目环保评估要求”等细分场景；适配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整合中的法规差异，例如深圳与广州旧改中关于“集体土地流转”的规定不同，确保跨区域旧改纠纷能获得精准的建议；结合法治乡村工作室的旧改调解数据如多起“旧村污水管网改造扰民”纠纷，优化环境保护模块的证据指引功能，例如提示用户重点拍摄“污染位置+影响范围”，让 AI 服务始终贴合旧改用户的实时需求，从“能回答问题”向“能解好难题”升级。通过这一机制，App 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法律服务环境中保持竞争力。

结 语

AI 法律诊所 App 通过“法律+AI”的交叉创新治理，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法治建设提供了新的路径。其多模态技术与校地合作模式，不仅提升了法律服务的效率与可及性，也推动了法律教育与社会服务的深度融合。此外，通过分类分级优化、多语言准入规则、责任主体分配以及动态优化机制，App 在制度设计上实现了技术与法律的平衡。未来，App 需进一步完善跨法域适配能力，拓展应用场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中发挥作用。这一项目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区域法治建设提供了参考，也为学生主导的科技创新树立了典范。

^⑩参见王春、滕腾，“AI 奥特曼”引发侵权之诉[N]，法治日报，2025-02-12（006）。

参考文献

- [1]莫积斌,黄政凯. “AI + 法治” 跑出解纷“加速度” [N]. 广西法治日报, 2025-08-26 (B01).
- [2]赵熠如. AI 侵权行为频发 敲响网络空间监管警钟[N]. 中国商报, 2024-11-29 (005).
- [3]徐进. 以法驭智: 人工智能应用的法律风险及防控策略 [J].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 23 (06): 73-78.
- [4]黄格玲. “司法 AI+涉外法律服务”: 广西的探索实践 [J]. 中国外资, 2025, (01): 104-108.
- [5]李晓楠. 跨境人工智能服务安全监管的逻辑基础与规则展开 [J]. 河北学刊, 2025, 45 (05): 170-180.
- [6]朱子钰. 在技术创新与权利保护间构建新秩序[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25-05-22 (007).
- [7]高泮云. 构建“AI 权” 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中作品使用侵权的法律建议 [J].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 24 (03): 6-9.
- [8]季雨佳. 行政机关 DeepSeek 应用法律风险及对策建议[N]. 山西科技报, 2025-06-26 (B07).
- [9]法治温度暖蓝田 服务群众“零距离” [N]. 各界导报, 2025-09-05 (004).
- [10]王春,滕腾. “AI 奥特曼” 引发侵权之诉[N]. 法治日报, 2025-02-12 (006).
- [11]孟伟.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与 AI 假新闻的较量[N]. 法治周末, 2025-01-16 (001).

An Applied Study of AI-Powered Legal Clinic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henjunyan¹, Zhoucongyu², Huangjun²

(1.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Center, Guang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51000; 2.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51000)

Abstrac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as a strategic core region for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fronts diverse and complex demands for legal services amid urban renewal and the advancement of the rule of law. Traditional legal service models, hampered by inefficiency, high costs, and language barriers, are ill-equipped to meet grassroots legal needs within the region's multi-jurisdictional and multilingu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presents an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AI-Powered Legal Clinic App, which adopts an interdisciplinary “law + AI” governance innovation as its logical foundation. Leveraging the Doubao large language model, the App integrates LoRA fine-tuning, blockchain-based evidence deposition, and federated learning technologies to construct a multilingual legal service system supporting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The platform covers scenarios including urban renewal,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disputes arising from old village redevelopment. Through categorical and tiered optimization, multilingual access protocols, assignment of responsible entities, and dynamic improvement mechanisms, the App ensures service efficiency and data security. Furthermore, a university-government collaboration model provides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the App's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fostering deep integration betwe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societal need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pp's technical architecture,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and social benefits, explores its potential in regional rule-of-law construction and legal education reform, and addresses associated technical and ethical challenges as well as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AI-Powered Legal Clinic App offers an innovative solution for grassroots legal services in the GBA, exhibiting significant regional applicability and scalability.

Keywords: AI Legal Service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Urban and Rural Renewal Disputes; Legal Education Reform; Scenario-Based Applications.

政策工具视域下养老服务的协同治理框架 ——基于区域老龄政策文本的实证研究

丁惠炯¹ 陈熙惠²

(1.梧州学院 管理学院, 广西 梧州 543002; 2.广西民族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 研究运用“内容分析法”, 以 Rothwell 和 Zegvelad 的政策工具框架深入分析广西壮族自治区“养老服务”相关政策。为使政策工具的使用更为匹配广西老龄事业发展实际, 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也是政策成效的关键; “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之间于运行中相互依赖, 需协同治理, 以实现“老有所养”; 养老服务体系与大健康产业存在着产业发展和产业布局, 乃至政策工具使用路径等多方面的耦合关系, 通过优化政策工具以推动两方面协调发展, 以求得“老有颐养”。

关键词: 政策工具; 养老服务体系; 府际合作; 养老产业; 大健康产业

基金项目: 梧州学院科研重点课题: 欠发达地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项目编号: 2017B009)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701

对比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结果,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发现, 广西区域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3.58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2.96 个百分点 (参见表 1)。老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区域内总人口的增长速度, 且高龄化 (65 岁以上老龄人口数占比) 趋势明显。2021 年底, 广西发布《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作为对这一国家战略的回应, 政策举措更为具体、政策保障更为有力, 标志着广西区域老龄化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期。

“养老事业”在理论和实践的话语体系中包括的不仅仅是“养老方式”“养老模式”和“养老产业”, 应该说, 政策所要搭建的至少是一个足够完整的“养老体系”; 而当前, 这一“体系”需要形成三个方面的协同, 即是: 三类政策工具协调推进、府际间为完成政策目标而构建新的合作框架、大健康产业与养老服务体系的耦合互促。

如何使得三类政策工具在广西养老体系中相互协调, 有效促进老龄事业的发展? 有必要对“政策工具”的模式选择、政策文本中“工具”的筛选原则, 等等问题先行厘清。

表 1 广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指标^②

主要指标	年龄结构类型 (划分标准)			广西人口年龄结构指标						
	年轻型	成年型	年老型	1982	1990	2000	2010	2015	2018	2021
0-14 岁人口比重 (%)	40 以上	30-40	30 以下	37.45	33.83	26.2	21.71	22.62	22.06	23.63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	5 以下	5-7	7 以上	5.12	5.42	7.31	9.26	9.76	9.96	12.20
老少比 (%)	15 以下	15-30	30 以上	13.67	16.22	27.89	42.69	43.15	45.14	51.62

一、相关政策“工具”的选择和运用逻辑

这里将采用“内容分析法”, 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养老服务”政策进行分析。为使得政策规律的表述更为严密, 将在分析过程中使用“建构语言” (区别于“自然语言”), 其所表述内容的“信度”和“效度”可以进行数学逻辑的推

作者简介: 丁惠炯, 男, 梧州学院教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养老体系构建、社区治理体制;

陈熙惠, 女, 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养老体系构建、公共卫生治理。

^②根据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和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编写。

导和验证,既不应产生在“事实”上的歧义,也不应产生对概念和理论等的不同理解。因此,在对“养老服务”相关政策进行系统、科学地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对“政策工具”的使用及其筛选原则等相关问题给予说明。

(一) “政策工具”分类法选择

表2 养老相关政策“工具箱”

工具类型	工具名称	政策“关键词”与“内涵”
环境型	目标 规划	关键词:“目标”“规划”等; 内涵:养老服务原则上拟实现的目标等方面,以提供方向性指导。
	金融 服务	关键词:“抵押”“融资”等; 内涵:投资方式、基金设立、项目融资、产权置换等方面,以筹措资金,促进养老产业发展。
	税收 优惠	关键词:“税收减免”等; 内涵:税收优待、减免等方面,以间接实现对养老服务发展的辅助性优惠。
	法规 管制	关键词:“法规”“管制”等; 内涵:违规处理、安全标准、评估监管等方面,以完善养老服务的约束制度和规范化管理。
	一般 策略	关键词:“探索”“引导”“支持”“动员”“鼓励”等; 内涵:推进服务举措、健全规范等方面,以优化环境、完善多层次服务供给。
供给型	基础 设施	关键词:“设施”“中心”“机构”等; 内涵:养老中心、机构或驿站的建设等方面,以加强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的基础设施。
	资金 投入	关键词:“资金”“奖励”“补贴”等; 内涵:对养老服务财力的支持或培育等方面,以完善扶持和引导政策。
	人才 培养	关键词:“培训”“研修”等; 内涵: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及队伍建设等方面,以促进养老服务人员素质提升。
	科技 信息	关键词:“信息”“科技”等; 内涵:智慧社区的建设、开发和相关数据的检测、统计,以及其他信息支持等方面,以提升养老事业发展效率。
需求型	政府 采购	关键词:“政府购买”等; 内涵:政府直接购买养老服务等方面,以丰富服务供给形式和内容。
	服务 外包	关键词:“连锁与运营”“PPP运营”“承包运营”等; 内涵: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供给和运营等方面,以整合多主体资源、创新模式。
	贸易 管制	关键词:“贸易管制”等; 内涵:服务交易的监督协调和海外合作等方面,以规范养老服务交易活动来扩展服务领域。

基于不同分类范式的政策工具框架适用于不同的治理领域,“适合”的模型和分析框架是政策现象解释形成“力度”的前提条件;Rothwell和Zegvelad^[1]的政策工具理论适用于“养老服务体系”的分析。根据我国养老服务的现状和养老服务领域的特点,以这种政策工具分类为基础的分析框架至少具备两方面的“契合点”:一是该分类法所列举的次级

政策工具比较具体，其操作方法在分析中的切入性更强；二是该分类法相对淡化政策工具的“强制性”，强调“服务性”，与政府和其他主体在养老体系中的地位多元并列这一基本精神相吻合^[2]。

（二）政策“文本”选取原则

在政策“来源（文本）”选择方面，应既包含有各级政府政策文本，也包括各级政府组成部门所发政策文本；应既包含有着正式“发文号”的政策文本，也包含没有“发文号”但是由政府及其组成部门所发的各类不同权威度和涉及范围、能够对于养老“行动”加以指导、约束或规范作用的“标准”“规划”“办法”“细则”等文件。唯其如此，才能全面、完整地描述政策工具的作用及其使用当中存在的问题并完善政策体系。

（三）政策“工具”筛选思路

“工具”是为了完成某一项活动而采用或者借助的资料、器物，抑或从抽象意义上所说的“途径”“办法”“机制”（“政策工具”角度之“工具”主要是从“机制”这个意义上说的），等等。这里之所以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分析“政策工具”在治理体系中独特的资源配置功能，而不是以“政策”高高在上的视角俯视治理体系、指挥治理体系，体现了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多元主体在行动中地位的平等性；也就是说，政府（广义的）及其制定的政策同其他参与主体及其在治理体系中的都是“工具”。多元主体的“工具”是指其参与养老行动中发挥资源作用，利用资源在养老活动中发挥作用层面，所采取的手段、方式、路径等；而政策“工具”是政府在利用自身经济调配资源（通过税收取得）、人力调配资源（通过党对于人才队伍的绝对领导）等资源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方式、路径，及其经过综合协调而形成的“机制”等。因此，最好将“政策工具”的内涵特性限定于实现政策目标或结果的手段上，也即是：政府通过“政策”规范和指导多元主体（包括政府自身）采取行动使用的“工具”，“原则”“机制建构”等等，在政策文本中以“主要任务”“支持政策”“实施保障”和“工作内容”等形式出现。

相关文献梳理中发现，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时，很多论文都将政策文本的每一段文字从头至尾，追求所谓的“不可细分”原则，将“指导思想”“原则”“目标”等方面的文本也纳入政策工具编码，却使“政策”与“工具”的界限更加模糊。本研究倾向于只对“实质意义”上的“政策工具”进行编码。即是：只从“政策工具”的内涵出发，选择“措施”“方法”“工作内容”等项进行编码。这与我们对于政策工具在整个治理体系中

的作用和地位的认识相关，也即是：政策工具同其他多元主体的参与手段、工具等等一样，都是治理目标实现的手段，如果把“指导思想”“原则”“目标”等等也作为“政策工具”编码，实际上就意味着使“政策工具”一定要高于、统领其他工具，“基本原则”应该是政府作为引导者、主导者对于治理活动的指导、领导，文件文本中的“具体措施”等等与其他治理主体参与其中所使用的“工具”一起在治理活动中共同在上述“基本原则”指导和要求下完成“善治”。

在“养老服务体系”中，政府只是多元主体的一方，其不同于一般主体之处在于：政府应该或者可以对养老或者治理活动有宏观指导或引导，把握“基本方向”、提出“基本原则”等作用，但是这一作用不同于“工具”的使用，也不应该使其加入“政策工具”模型分析过程中的编码；只有上文所厘清的“措施”，才应该是真正需要或者能够进入编码程序的“政策工具”。

（四）区域养老政策工具模型

在“政策工具”分类基础上，考察影响其使用的因素并构建政策工具“模型”能够有效地提升政策工具的使用效率。我们研究构建“养老服务”政策工具的选择模型，认为“区域老龄化现状”“地方政府能力”“社会组织成熟度”和“区域智慧化水平”等四个方面决定了政策工具的选择；同时，政策网络也对“工具”的选择有着明显的影响，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是否符合政策网络背景或特征是“首要问题”^[3]。参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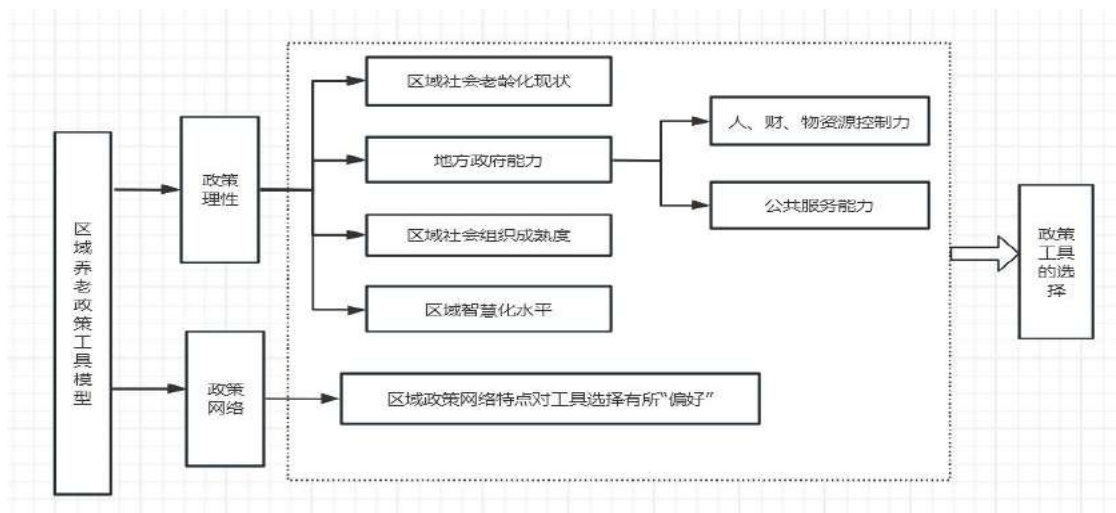


图 1 区域养老相关政策工具选择模型

伴随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养老目标规划”应逐步明晰，需要更为有力的金融服务、税收优惠等政策手段，并从直接性的管制转化为间接性、调控性的“治理”，同时，策略性措施也要在实践中更具可操作性；理性的政策将更偏好于养老信息服务和科技支撑等资源而较少使用直接的经济手段，对人才的培养体系更为健全，对养老设施的提供更为积极；养老服务体系对需求性政策工具的使用更多，政府要灵活应用市场手段完善养老体系，并给予多方面的支撑。

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及其现有的公共服务能力较多地影响着三类政策工具的使用比例，特别是在老龄事业发展初期，对整个养老体系框架的构建起着关键性作用。当前，广西应进一步明确养老目标，通过科学制定和实施老龄事业发展的“十五五”规划，进一步优化养老事业发展环境，充分调动利用社会资本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市场和社会的发育程度决定了政府调动多元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能力和效果，也是塑造积极养老市场的基础；此外，各类社会组织的“成熟度”是政府通过“养老服务采购”、利用“养老服务外包”等手段丰富养老服务路径的关键性因素。

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赋能”于养老服务体系是大势所趋，其发展质量和速度对于政策工具使用效果提升和运用空间拓展有明显的影 响。区域的智慧化水平决定了具备什么样内在特征与绩效的政策工具选择与设定的政策目标最为匹配。可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养老服务提供科技支撑，推动“科技创新型”养老模式发展，并以此激发传统政策工具的活力，从而促进各类政策工具合理搭配。

“……当代公共决策过程……为多元的关系主体、互相依赖的行动者通过复杂的关系联结参与决策活动的过程，……而不同的政策网络中的特征对政策工具的选择有着不同的要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养老服务”处于边疆民族地区而存在多重政策体系叠加的特征，体现着中央政策对地方的控制和影响和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之间在养老体系构建中的相互关系，还存在政府（部门）与其他社会组织在寻求养老服务着力点过程中的博弈，以及社会资本在养老体系当中的作用的发挥及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等等。

二、养老服务政策工具之间的有效配置

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老龄事业相关政策文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三类政策工具存在结构性的“偏斜”，而占比最多的环境型政策工具虽数量较大却有点“虚”，应持续增强其“可操作性”，以使政策工具间均衡配套、相互促进确保而互不钳制（效能抵消）。

表 3 广西老龄事业政策文本分析单元编码表

编号	发文号	政策名称	政策内容		编码
A	桂政〔2015〕33号	广西政府关于建设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意见	重点	进一步深化养老服务综合改革	A-1-1
			任务	……………	
			重点	南宁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核心区	A-2-1
			布局	……………	

			保障 措施	完善组织机制	A-3-1
.....
M		广西养老机构星级评定细则 (试行)			M-1
N		广西养老设施公建民营实施办法 (2016) (试行)			N-1

表4 广西老龄事业相关政策工具分布表

政策工具 类型	政策工具名称	条文编号	数量	百分比 (%)
环境型	养老目标规划	D-2-1、A-3-2、	2	72
	试点或示范项目	A-2-1、A-2-2、A-2-3、A-2-4、A-2-5、	5	
	金融政策	A-3-3、C-2-3、D-1-10、D-2-4、G-2-4	5	
	税收优惠	C-2-2、J-8-3、	2	
	法规管制 (包括: 标准制定, 等等)	A-3-8、C-3-4、D-1-1、D-3-1、D-3-2、D-3-4、F-2-4、G-1-2-3、G-2-3、G-2-6、J-9-2、K-1、L-1、M-1	14	
	策略性措施	A-1-1、A-1-2、A-1-3、A-3-1、A-3-3、A-3-7、C-1-1、C-1-2、C-1-3、C-1-4、C-1-5、C-1-6、C-1-7、C-3-1、C-3-2、C-3-3、D-1-2、D-1-3、D-1-4、D-1-5、	82	
小计			110	
供给型	养老资金投入	B-1、F-1-1、G-2-2、J-8-2、	4	17
	养老人才培养	A-3-5、C-2-4、D-2-3、G-1-4-3、J-8-4、	5	
	养老设施提供	A-3-4、C-2-1、G-1-1-1、G-1-1-2、G-1-2-1、G-1-2-2、G-2-1、J-8-1、	8	
	养老公共服务 (包括信息提供、科技支撑, 等等)	A-3-6、G-1-3-5、	8	
	社会组织培育	E-1-4、	1	
小计			26	
需求型	养老服务采购	D-1-8、	1	11
	养老服务外包	H-1、J-3-4、N-1	3	
	养老市场塑造	E-2-5、.....	10	
	养老业海外交流	G-2-5、J-7-2、	2	
小计			16	
合计			152	100

(一) 三类政策工具由“偏斜”至“和谐”

“政策工具”不但是实践中完成政策目标的基本手段,也是理论上进行政策分析的有效方式。广西壮族自治区“政策工具”的运用已经对于养老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拉”效用,但政策工具的应用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失调问题。具体来看,“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适中,“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比重过大却“虚化”明显,“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过少。

1.环境型政策工具

从政策工具的类型、数量与权重来看 (参见图2),“养老服务体系”中环境型政策工具共计110项左右,占比约72%;使用数量多、占比高,且策略性措施使用比例特别大,体现出广西各地政府在规划及建设方面的引导能力和积极态度;这与广西区域老龄化速度加快,而养老服务支撑体系并不健全,政府急于引导社会力量“跟得上”以发挥作用这一趋势相关;也因此,其中的策略性措施作为次级政策工具占比最大,有23项之多,政策

举措具有很强的导向性，但也缺乏较明确的操作细则。金融服务和税收优惠作为次级政策工具，能够有效地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发展养老机构及服务，这一方面的政策力度需加强；同时，为了使得养老服务体系健康发展，法规管制作为次级政策工具也应受到重视，以对养老服务市场加以考核、监督和规制，从而促进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更为迅速；从“标准制定”等政策工具的使用方面看，应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为主，重视适老性用品和服务标准的制定。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破解商业与互联网结合所引发的“乡土性”缺失，以及现代化下社会制度和系统日渐抽象化使得人际间形成的社会性资源受到巨大冲击，有必要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和推动，重建“附近”、重构社区，在人与社会相互“位育”的环境下发展社会性养老。也即是，政策工具的使用应注重挖掘人在精神世界层面的义务感所发挥的作用，创造和构建互助型养老环境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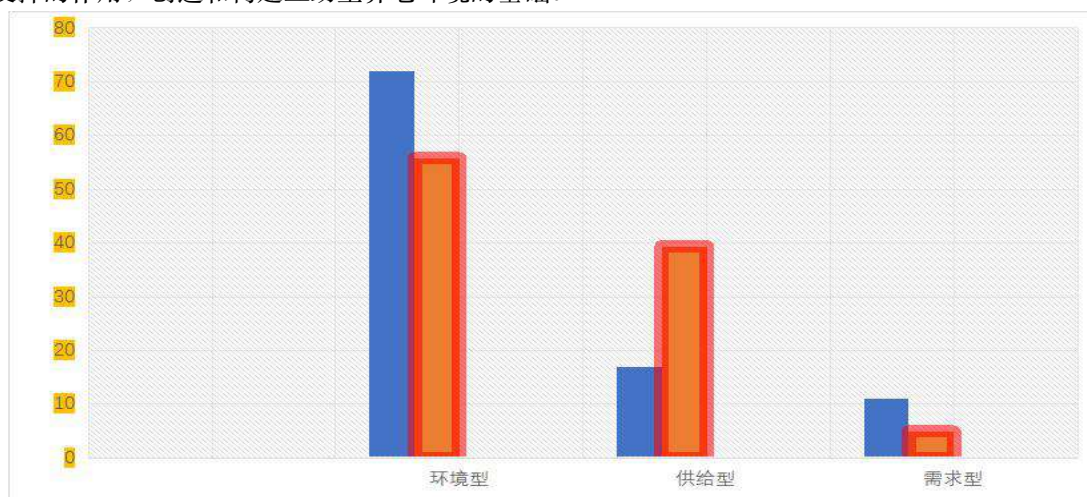


图 2 广西养老服务政策工具占比图^③

2.供给型政策工具

作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推力”，广西现行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数量较为适中，共计 26 项左右，占比约 17%。其中，多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而科技信息支持成为新的政策偏好。从国家老龄事业发展趋势来看，科技信息的运用已经成为政策发展的方向之一，未来将更多地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等创新养老服务模式，因此，广西在科技方面对于养老体系的政策支撑亟待加强。由于仍处于起步阶段且养老服务的投入回收周期长，因此，发展养老服务产业需要大量公共财政的投入；但相比较而言，广西现行“资金投入”性质的政策工具比重明显不够，这与广西区域经济发展比较缓慢有关；因此，更不能将有限的资金“撒胡椒面”，而应集中使用于前述“示范性”项目，以带动养老服务业整体的提速发展；当然也不应该对于财政资金的投入总量多加苛责，而应在多方利用社会资本上下功夫。养老服务还会受到服务人员专业程度不够、工作状态不稳定等因素的制约，应加大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这与各级各类相关“规划”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工作要求是一致的。另外，广西还应从提升养老服务水平的角度促进优质养老资源下沉，特别应增加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人才队伍数量、逐步提升其医疗水平。

3.需求型政策工具

作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拉力”，广西现行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数量少，共约 16 项，占比约 11%，且均采取“服务外包”的方式；2016 年 1 月- 2017 年 8 月，江燕娟、李放等选取南宁市城镇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公建民营”模式有利于扩大机构养老服务的供给，但存在“获取公共养老服务资源难度增加，分配机制不完善，加剧监管风险”等问题^[4]，实际上为“服务外包”方式的优化提供了很好的实证依据。当前，政府直接采购或贸易性质的政策工具不多，“十五五”期间，广西首先应多采取服务外包等方式，尽快打破政府单

^③说明：图中橘色部分为国家层面政策工具比例情况，图中蓝色部分为广西区域政策工具比例情况。

一供给养老服务的格局。

长远来看,需求性政策工具作为能够给予养老服务业以“拉动”的力量,比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作用更为直接。目前,广西的这个“拉力”显然远远不足;但正因为存在如此巨大的潜力,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大量投入必将成为广西养老体系建设的重点;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政策工具”的使用更为均衡、整体结构更为合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达成政策目标的积极作用。

总体来说,广西目前的养老政策体系存在下列明显的障碍:分布结构不合理、政策工具较为单一、政策的前瞻性和延续性较差。这是未来制定新的养老政策必须高度关注和亟待解决的课题;需要对养老领域政策主体、政策内容、政策工具等加以全面优化,形成养老政策制定和运行的长效机制。

(二) 政策工具效用:广西和中央政策的比较分析

广西总体经济的发展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但养老(旅游)资源相对丰富,针对“养老服务”存在多种政策体系叠加。在下一步老龄事业发展相关政策及其政策工具的使用上,广西还应该对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2000)、《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2013)、《“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2022)等中央政策基本精神,对现有政策加以调整和完善。

1. 细化环境型政策工具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按照姚俊、张丽^[5]两位学者的统计结果,2006年以来国家层面的“养老服务”政策工具中,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55.74%、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比39.34%、需求型政策工具仅占比4.92%;而广西养老政策体系中的“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有比例却高达约81%。这一方面说明广西政府在老龄人口迅猛增加,养老(资金、人力等)匮乏不足的情况下的急迫心理;另一方面,由于广西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要的经济基础确实薄弱,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和提供良性的养老服务的体制框架是区域政府能够寻求到的适宜“着力点”。环境型政策工具中,金融政策和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所占比例较少,策略性政策工具比例最大(占76%)却是由于养老服务是与其他多方面产业发展相融合,必须照顾到各部门各类型产业的不同特点,需要这种应对复杂局面的功利性的策略;但因此,也容易使得养老服务政策失去了基于“价值理性”公共管理的全局性关注。另外,诸多政策指导和法律规范式的政策工具在实施于具体养老领域和养老事业发展过程中,往往缺乏实际约束力,影响了实施效果。

2. 增加供给型与需求型工具在“工具箱”中的比重

因其作用更为直接,“供给型”和“需求型”相比“环境型”政策工具来说更能提升基础薄弱、准备不足的老龄事业发展效率。从国家层面相关政策来看,环境型政策工具虽然也占有较大比例,但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政策工具使用的“失衡”程度尤甚,这并不符合老龄事业发展国家战略的地位;虽然我们确知,在此类政策形成初期,也即是老龄事业发展及其相关政策“过渡”时期,对于政策“效度”的考量应保持一个相对宽容的态度。因此,广西应该在这两类政策工具的使用方面抓住机遇,积极突破。

当然,广西并不是相对而言的“资本和人才密集型”区域,在资金投入方面应更多通过优化投资环境,吸引社会资本,推动“市场”在养老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养老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方面需要积极调整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方向,培养更多“全科医学”“养老医学”类并服务于老龄事业的专门人才;扩大和落实相关养老相关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尽快提升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积极落实养老服务“政府采购”“政府外包”等需求型政策在老龄事业中所占的比重,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此外,应更好地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养老服务的先进经验,充分发挥“东盟”和“一带一路”机制对于老龄事业发展的带动和积极影响作用。

3. 比较视角下的关键“切入点”

(1) 关于“人才培养”

目前广西在养老人才方面的缺口较大,其中,“基本养老服务类”人才、“全科医学类”人才最为急需。首先,对于老龄事业发展所需各层次人才的培养规模应有所分别,当务之急,应乘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东风”,培养

一大批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基本养老服务类”人才，在保证的数量足够的基础上提升培养质量；而对于老龄事业行政人才、老龄事业一般管理人才，应注重提升其实践能力，不应盲目扩大此类人才队伍的规模。其次，可以通过现有多所医学类本专科院校尽快转型，增加养老护理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再次，切实通过构建有效的评价体系，提升老龄事业服务人才的待遇，提高其社会地位；扩大和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和“执业资格准入”等制度的范围和体系，切实将相关从业者纳入人才序列，加快人才队伍的建设速度。

(2) 关于“税收”政策

现行广西的税收优惠政策占比较低，且大多倾斜于并明显有利于“产业性”养老服务，对于“福利性”和“保障性”养老服务的税收激励作用不明显，与国家养老服务政策基本的“兜底”精神不相符，不易形成税收优惠政策的“相机抉择稳定器”效应。可针对后两类养老服务及其他公益类组织提供的老龄事业实施税收优惠，最大限度地鼓励多元组织参与到广西养老事业发展中来。

(3) 关于“智慧”养老

2017年2月出台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为智慧养老产业指出和设计了发展方向和行动框架；2021年出台的《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是国家层面较为明确的“供给型”政策工具。广西壮族自治区应利用大数据产业发展强劲势头，以“互联网+”数字平台建设为突破，针对老龄群体开发手机端的应用软件；面向较为高龄的和失能老人群体搭建“云平台”服务。

三、政策主体：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间的协同

无论是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还是从“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精神来说，不同区域地方政府间和同区域政府部门间的“协同共建”均是“老龄事业”发展的“关键”。从府际合作视角，养老体系构建可以分为“同区域”和“不同区域”政府及其部门间的协同治理。

王维等人基于“熵值法”进行定量评价与分类，利用“三维分布图”细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养老产业区域环境后得出结论：广西的环境等级为“很低”，经济、社会、技术三维度得分均为负数，属于“滞后型”区域环境^[6]。因此，应积极借助本地特色文化推动养老旅游业发展，实施跨省域资源共享战略，与其他地区“协调共享”资源。刘辉、邵攀玉从社会办养老机构与其他行动者之间关系的角度认为，老龄事业相关部门之间相互协同，才能够使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实现效益最大化^[7]；但现实情形往往是，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出现“多头干预”或者“多头不管”，因此建议：各级政府在梳理涉“老”服务部门、单位的基础上，应打破系统和部门间的“条条框框”，形成区域性老龄事业发展的“治理联盟”。

相关政策跨越多个部门，具有不可分割的公共性，部门间需在共同的（养老体系构建）价值取向上破除“边界”，规避政策割裂和资源分散的“服务碎片化”状态，正如登哈特夫妇提出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内涵：“在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在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8]。而跨区域养老打破了原有行政壁垒内社会服务保障资源的“内循环”路径，有效地清理不适合的跨区域合作政策，可以通过异地服务供给和结算灵活实现多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必须强调的是，“府际合作”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区域间资源禀赋的“互补”。广西应与发达地区协同推进养老事业，利用广东等临近区域完善的养老机构、服务设施等养老物质条件；而广东等发达地区应利用广西区域独特的自然环境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长寿文化优势，等等。由于民营部门不具备足够的力量推动这种跨区域性合作，地方财政异地结算能力的提升及其良好的“协作”运行机制成为此类合作的关键^[9]。

四、市场主体：健康产业与养老服务的协同

“老有所养”只是我国社会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的基本追求，而“老有颐养”才是整个国家战略的终极目标；因此，应适应与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老年人对于更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在提升广大老龄人口一般的生活品质（包括衣食住行，乃至身心健康的）基础上发展“大健康产业”，以在更宽视野下推动老龄人口的身体和心理与和谐社会构建相适应。“大健康产业”的“新兴”之处在于其适应了现代人对高品质生命的向往和追求，而“健

康”当然是养老服务业的基础和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发展“大健康产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着奠定养老服务业的基础，更是为养老服务业发展提供产业基础，同时也必然与养老服务业互为支撑。

无论是针对政策工具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养老事业”与“大健康产业”发展均存在着较大程度的耦合性。一方面，当前我国发展“大健康产业”的目的有多个层面，其中，对于“养老服务”的促进无疑是重中之重，而且，近年来对于“大健康产业”政策层面更为积极的“丰富”考虑更多的也是对“养老体系”支撑作用的强化；另一方面，尽管养老服务包含诸多方面的内容，包括物质、精神两个领域的切实关怀及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等，但疾病的预防、机体的保健，抑或机能的康复，都是其重点关注的内容^[10]。因此，“养老服务”“养老产业”乃至“养老模式”均离不开“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实际上，对养老“政策工具”的考量也全面地包含了“大健康产业”发展政策。既然养老服务离不开“大健康”，是否有必要将其当作两个维度建立“二维分析框架”进行分析和实践？应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给予进一步的“认同”和全力地推动。

再进一步，“大健康产业”与“养老服务”在其行动因子、产业布局和拓展，乃至各自对于政策的需求等方面的深层耦合。何秋洁、杨晓维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发现，2010到2016年，我国“大健康”与“养老服务”的耦合度一直保持在0.9以上且呈螺旋式增长趋势，两系统间互动状况明显；但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虽然持续上涨，却仍在各自发展的进程中多有“失调”之处^[11]。因此，“养老服务”相关政策需要对这一点予以更为积极的关注（实际上，现行的政策体系对这一点并未有太多的“自觉”，政策制定者往往倾向于对二者各自的发展在平行的政策轨道上着力），使二者因合理“耦合”状态而发挥政策工具的最大效用；也即是，鼓励大健康产业发展并支持养老服务体系构建，促进大健康产业与养老服务融合并刺激两者耦合的模式创新，推动涵盖医疗康复、旅居康养等泛业态融为一体的养老本位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12]。

五、社会组织：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的协同

目前来看，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老有所养”和“老有颐养”两个阶段，“老有所养”这一阶段目标对养老服务体系构建要求“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调发展，并为转化至第二个阶段创造条件。

所谓“养老事业”，乃是在国家老龄化战略框架下，以政府主导，动员包括经济实体、中介机构、慈善组织等多元主体，以市场化或者社会化等方式和手段推动“老有所养”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同图景；所谓“养老产业”，乃是从参与上述“养老事业”的经济实体（机构养老）角度发展基于市场逻辑的满足养老事业发展的相关产品、服务等经济行动。因此，“养老产业”是“养老事业”的经济支持和保障，“养老事业”是“养老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关键的产品、服务市场域，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推动养老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不可或缺，需协同发力。

虽然“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政府在公共事务中既不必“划桨”亦无需“掌舵”而仅扮演“服务者”的角色，然而，囿于我国“未富先老”的现实困局，政府在老龄化事业和产业的协同发展过程中仍是多元主体中最重要的方面，其应承担主导和推动作用，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保障“养老产业”和“养老事业”协同发力，规范市场行为，形成整个养老事业的“社会化”发展体制；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提高认识，需引导公众转变传统“家庭养老”为主的观念，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基本理念构建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并行的现代养老体系。

而养老产业（企业和行业协会）与中介机构、慈善团体等社会组织在被动员的过程中，各自应承担不同职责，在不同领域、从不同角度为养老事业发展添砖加瓦；目前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后者在我国的“发育”不成熟，需要加以更进一步的“培育”（包括与政府之间的相互“赋能”）以能够在养老事业中与各类经济实体在相互平等地位基础上多元协同，达成“善治”。

参考文献：

- [1] Rothwell R, Zegveld W. An Assessment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Policies[J].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88,(03):436-444.
- [2] 丁煌, 杨代福. 政策工具选择的视角、研究途径与模型建构[J]. 行政论坛, 2009, 16,(03):21-26.

- [3] B·盖伊·彼得斯, 弗兰斯·K·M·冯尼斯潘, 著. 顾建光, 译. 公共政策工具: 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73.
- [4] 江燕娟, 李放. 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模式下老年人公共养老服务资源利用——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J]. 社会科学家, 2018, (10): 63-69.
- [5] 姚俊, 张丽. 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养老服务政策文本量化研究[J]. 现代经济探讨, 2018, (12): 39-45.
- [6] 王维, 马静, 李宏扬. 我国养老产业区域发展环境分析与评价[J]. 商业时代, 2018, (15): 185-189.
- [7] 刘辉, 邵攀玉. 社会养老服务创新发展的路径与策略——基于河南省相关实践的调查与思考[J]. 理论导刊, 2017, (05): 20-23.
- [8] [美]珍妮特·V·登哈特, 罗伯特·B·登哈特著, 丁煌译. 新公共服务——服务, 而不是掌舵[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9] 丁惠炯. 政府合作战略框架下的社区养老体系构建——基于公共管理视角[J]. 改革与开放, 2019(01): 80-83+87.
- [10] 刘亚秋. 传统社区的乡土性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J]. 学术论坛, 2021, (03): 77-86.
- [11] 何秋洁, 杨晓维. 大健康产业与养老服务的耦合协调度分析[J]. 软科学, 2019, (10): 45-49.
- [12] 赵浩华. 需要理论视角下社区居家养老困境及治理对策[J]. 学习与探索, 2021, (08): 50-55.

Coopera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old-age servi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

DING Hui-Jiong¹, CHEN Xi-Hui²

¹School of Management, Wuzhou University, Wuzhou, Guangxi, 543002, China

²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6, China

Abstract :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will be used to deeply analyze the policies related to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policy tools of Rothwell and Zegveld. In order to make the use of policy tools better match the rea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ing cause in Guangxi,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and their functional departments is also the key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olicy; The "Social aged care projects" and the "Pension industry" are interdependent in operation and need to be managed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to achieve "a sense of security for the elderly"; There is a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and the big health industry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 layout, and even the use path of policy tools. by optimizing policy tools, we can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aspects,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Live an easy life in old age".

Keywords : Policy instruments; Old-age service system;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Aged service industry; Great health industry

广东省家具出口贸易的竞争战略研究

胡乐琼¹ 赵映霞¹

(1. 广商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 本研究把广东省省家具出口选定为核心研究对象, 采用 2015 - 2024 年的出口贸易数据, 结合采用国际经济学与贸易学的理论, 对广东省家具出口现状及竞争策略实施系统性考察, 广东省省作为国内最大的家具制造跟出口基地, 在国际市场里起着关键作用。2015-2018 年广东省省家具出口年均展现出持续增长情形, 但遭到新冠疫情冲击的干扰, 2020 - 2022 年出口规模大幅减退, 直至 2023 年才逐渐显现出复苏迹象, 2024 年与上一年相比实现 6.5% 的增长。凭借对最新数据的透彻分析, 本研究查找到广东省省家具出口碰到的主要挑战, 涵盖国际市场竞争愈发白热化、绿色贸易壁垒持续增多、原材料及人力成本不断提高等, 研究拿出了如下竞争对策: 调整产品布局模式、拓展 RCEP 新兴市场的规模拓展空间、增强自主品牌树立的效果、提升智能制造技术的创新能力等, 为增强广东省家具出口竞争力提供切实有效的方案, 研究成果对促进广东省省家具产业实现转型升级、增强其国际竞争优势有重要参考意义。

关键词: 广东省省家具出口; 竞争战略; 国际市场; 产业升级; 智能制造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30

一、绪论

(一) 研究背景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 中国家具行业的出口取得了长足发展, 广东省作为中国家具制造业的重要产地, 其市场规模不断地扩大, 出口量及出口额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近年来随着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转移, 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家具出口国家, 而广东省家具的出口几乎占中国家具出口的一半, 具有一定的地位。

但随着国家产业政策、外贸政策、货币政策的调整, 给中国家具出口产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与之同步也威胁着广东省家具出口的地位。与此同时,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广东省家具出口企业不光面临着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主的竞争对手, 还面临着以越南、印度为首, 这些以依靠更低劳动成本不断崛起的竞争对手。数据显示, 国际家具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对广东省家具出口构成了威胁。

(二) 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同样着重指出开拓多元化市场的重要意义, 有学者王丽华 (2019) 强调称, 中国家具出口过分依赖欧美市场, 很容易受贸易摩擦和经济波动的牵动, 企业该积极开拓新兴市场 (像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 和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除了要进行新型市场的开拓, 同其余各国构建友好纽带, 也是拓展市场、降低贸易阻碍的途径之一, 陈志强 (2021) 点明,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为中国家具出口增添了新机遇, 企业可利用关税减免及贸易便利化手段, 扩大面向成员国 (如日本、澳大利亚、东南亚一众国家) 的出口。

技术创新也是增加家具出口量的手段, 由于中国劳动成本逐步上涨, 世界制造业中心产生转移, 连同越南、印度等因劳动成本低进而更具价格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 若要提高我国家具出口量, 得借助技术创新, 学者刘伟 (2020) 宣称, 技术创新是提升家具出口竞争力的核心要点, 企业得增加对新材料、新工艺 (像环保材料、智能家具) 研发投入的力度, 与之同步促进数字化转型。

作者简介: 胡乐琼(1987—),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
伍国华(1985—),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康复医疗。

姜书竹等(2011)采用五个指标做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家具出口增长速度很快,但长期发展受到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的限制。基于此,他们提出以下建议:我国家具出口企业应减少对美国的出口依赖,优化出口国家结构,积极解决贸易壁垒问题,并尽早将加工贸易转变为一般贸易。朱江梅(2012)对传统的引力模型进行扩展式的研究运用,围绕着欧盟采用的绿色贸易壁垒加以实证分析,该贸易模式影响我国家具的背后情况进行了探索。

这些文献为家具出口竞争力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全面视角,国外研究主要把目光放在竞争优势的多方面分析上,点明了低成本模式存在的局限,且强调了转型及多元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国内研究紧密契合中国的实际情形,主要留意市场多元化、技术创新以及区域贸易协定所带来的机遇,提出了应对国际竞争的相应策略建议。本文将依托现有的理论研究展开,从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的视角去审视,探究广东省家具出口面临的实际难题,并依据分析所得制定相关的广东省家具出口战略。

二、广东省家具出口现状分析

(一) 出口规模

中国家具主要产地是以广东省为代表的珠三角和以浙江江苏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广东省家具以广州、顺德、东莞为主,作为我国最大的家具产地,生产量以及出口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由国家海关出口数据统计可见,从2015年到2018年,广东省家具出口呈现稳步增长,从1110.29亿元人民币增长到1397.17亿元人民币,显示出较强的增长势头。2019年广东省家具出口总额为1340.6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家具出口的30.1%;归因于受经济形式、国内外疫情以及国外财务保护主义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因素的影响,2020年广东省家具出口出现了下降,全年家具出口总额仅为1187.23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期下降6.3%,约占全国家具出口的28.3%;但在2021年随着疫情的减弱以及全球经济复苏,国内外市场需求有所回升,促进了广东省家具出口的增长。2023年随着国内劳动成本上升,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转移以及越南、印度等因劳动成本低使得更具有价格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出现,使得广东省家具出口额再次出现下滑趋势,同比减少6.4%,约占全国4761亿元人民币的26.1%。2024年出口额达11197亿元,较2023年显著增长,显示市场需求增加、产品竞争力提升或政策支持等因素推动了广东省家具出口的强劲表现。

(二) 产品结构

在出口商品结构方面,木制家具和木框架坐具、金属家具和金属框架坐具这两种家具出口金额较大,仍然是广东省家具出口主要品种,它们合计占广东省省家具出口总额的6成左右。^[1]

广东省家具出口家具品类主要以木质家具为主,木制家具一直是广东省家具出口的主导产品,包括各种木制桌椅、柜子、床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家具出口国,也是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的最大品类,对林业经济和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作用。^[2]

金属家具在广东省家具出口中也占据一定份额,包括金属框架的床、沙发、椅子等。随着现代家居风格的流行,金属家具的需求量逐渐增加,金属制家具的出口量也凭借其高产量和较高的质量畅销海外市场。而塑料家具、竹藤家具、石制家具只占据非常小的份额。

(三) 产品流向

为了解广东省家具出口的市场格局和发展走向,本文对2015-2024年中国家具出口主要目的国的数据做了分析,在这十年的时间里,广东省家具出口的主要市场还是发达国家,但这些市场的份额跟占比一直都在改变,这同样体现了全球家具市场的复杂状况与变化走向。

中国家具主要往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进行出口,排在前面的国家凭借自身经济实力,故而进口能力和需要是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出口市场我国木质家具出口占比很大,这造成出口市场中其份额占比集中情况较为明显^[3]。广东省家具行业主要的出口目的国家或地区集中在美国、日本、英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2020这个年份,受疫情初期阶段全球经济波动与贸易摩擦影响,出口到美国去的家具相关产品金额为89.2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家具出口总额的24.5%,及至2024年,出口金额进一步上扬至180.5亿美元,占总体的比例为26.8%。

(四) 行业竞争

1. 国外竞争对手

广东省家具出口面临着多个主要竞争对手,尤其是东南亚和欧洲一些国家。首先,越南是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凭借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丰富的木材资源,越南家具制造业迅速发展,成为全球家具市场的重要出口国。此外,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也在家具制造和出口上有着强大的竞争力,这些国家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而且政府对家具产业的支持政策使得其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欧洲市场的竞争也不容忽视,尤其是意大利和波兰。意大利以其高质量的设计和工艺享誉世界,特别是在高端家具领域,具有较强的品牌效应和市场认知度。波兰则在中低端家具市场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力,其家具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其在欧洲及其他地区市场占据一定份额。

2. 国内竞争对手

改革开放前,中国家具业的中心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如上海、南京、无锡等,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使家具业向广东省、浙江、东北和华北等地转移,并逐步发展成为现在的五个产业区:珠江三角洲区、长江三角区、环渤海区、东北区和西南区^[5]。而广东省目前是我国最大的家具产区,产值接近全国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出口则接近一半的占比。即便如此,国内其他产区还是会对广东省带来不小的竞争。

近年,以浙江和江苏为中心的华东地区,“长三角家具产区”飞速发展,成了中国家具行业里发展最为迅猛的区域之一。这片地方制造业基础很扎实,有丰富的人才储备,便捷的交通网络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科技产业,这些都给家具行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而且,这里文化氛围浓厚,传统产业一直很兴旺,给家具行业带来了许多灵感和活力。

2024年,江苏跟浙江的家具出口额在全国排到第二和第三,比广东省排名靠后,令人瞩目的是,2024年前十个月,浙江出口额呈现出超过广东省的势头,广东省作为中国家具行业的排头兵,其地位正面临严峻的考验。

三、广东省家具出口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 外部问题

1. 贸易壁垒的存在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广东省家具出口所遭遇的贸易壁垒呈现出多样化且不断升级的态势。从第二部分分析的广东省家具主要出口地来看,欧美仍是广东省家具的主要市场。欧美等传统主要市场凭借自身在环保、安全和技术等领域的优势,持续提高家具进口门槛。

广东省家具企业出口之际,欧盟的 REACH 法规宛如一道很高的门槛,该法规针对家具中的有害物质,类似甲醛、重金属等的含量限制严格程度高,而且法规内容也频繁地更新,为了契合 REACH 法规的要求,广东省家具企业得花大量的钱去检测原材料,保证每一批原材料的安全性;生产工艺需不断革新,采用更绿色、更安全的生产工序;还得开展产品认证事宜,这样才可以拿到进入欧盟市场的准许证明。

据大致统计,自2020年起始,为了达到各类贸易壁垒的要求,广东省家具企业每件产品平均成本差不多增加了15%至20%,这不仅让企业的获利变薄了,也让广东省家具于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减弱不少。

2. 国际市场竞争加剧

根据前面所讲的出口规模数据可看出,中国家具出口的总金额出现了下滑,面对全球家具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形,东南亚国家借助自身的优势,渐渐转化为广东省家具出口的有力竞争力量。

以越南为例,近年来,越南靠着便宜的劳动力成本,吸引了许多国际家具品牌的资金投入。越南的劳动力成本大约只有广东省的三分之一,这就让越南在生产家具时天然地有了价格优势。越南有很多木材等原材料,这也为家具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越南的家具产业快速崛起,在中低端家具市场上和广东省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

广东省家具企业规模比较大,但在产品设计创新和品牌建设方面做得未达预期,许多企业依旧模仿他人的设计,自己在创新能力上有不足,对品牌建设的投入也不多,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都处于较低的层次,这造成广东省家具企业在高端市场无法轻易和欧美企业竞争,仅能在中低端市场展开竞争,这也更进一步凸显出广东省家具出口“占比高却增长慢”、产品附加值低的状况,阻碍了广东省家具产业的升级以及可持续发展。

(二) 内部问题

1. 生产要素成本增加

制造家具的主要物资,诸如木材、钢材、胶合板之类,其价格极易受到市场供求状况以及国际市场价格涨跌

的影响，全球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能源价格也正不断上扬，这些因素造成原材料成本不断上扬，以木材举个例子，行业数据说明，从2020年起至2024年的时间段，国际市场里优质木材的价格年均上涨差不多8%；就国内市场而言，2023年，胶合板价格比上一年的价格上涨了12%，家具企业为采购这类原材料，成本费用明显上扬，由于原材料价格波动频繁，企业难以精准控制成本，在生产计划和定价策略上都面临巨大挑战，这使得家具制造业的成本控制愈发艰难。

2. 人工成本增加

家具制造企业生产的时候需要大量人工，而人工成本受政策、社会环境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管理起来存在一定复杂性。随着广东省地区环保和人力资源成本的提高，家具生产的人工成本也在持续攀升。从广东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取的数据显示，从2020年至2024年期间，广东省家具制造行业平均工资每年递增6%，除了薪金上涨，企业还将要承担更多的社保跟福利费用，好比一家具备500名员工的中型家具制造企业，每年人工成本增加的金额大概会有几百万元。

人工成本上升直接造成家具出口价格变贵了，因人工成本增多，每件家具出口价格平均差不多提升了10%-15%，这明显降低了产品在国际市场里的价格竞争实力，国际贸易政策的革新，譬如关税与贸易协定的调整，对家具贸易影响十分明显，若企业不及时留意并申请普惠制等关税优惠，出口成本会进一步上升。

3. 产品种类单一

由广东省家具出口主要品类可知，广东省家具出口主要品类以木质家具和金属家具为主，塑料家具、竹藤家具、石制家具等占比较小，尚未形成规模优势，难以满足不同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尽管广东省省在家具生产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庞大的产业链，但在设计和技术水平上相对滞后，和国际上先进的家具品牌对比，广东省家具的设计与技术存在明显差距，市场调查发现，在国际高端家具市场这个范畴内，有创新设计和先进技术的产品占比超60%，但广东省家具产品里有这些特点的占比不到30%，这一差距严重限制了广东省省家具出口市场的拓展，尤其是在对设计和技术要求较高的欧美高端市场。

四、广东省家具出口竞争战略分析

（一）策略性规避贸易壁垒

1. 建立国际友好关系

发展国际友好关系对推动双边贸易意义重大，在中美两国家具贸易期间，中国始终有着贸易顺差现象，这引起了一些贸易上的矛盾争端，为了扭转这种不平衡态势，美国设立贸易壁垒以限制中国家具出口，这既对广东省家具出口环境产生了消极影响，还直接对广东省家具企业造成冲击。面对这般情形，中国需要加大与美国的外交努力，尤其是针对进出口政策加强沟通对话，采用和平方式缩减美国对中国家具出口的限制，针对美国家具行业对中国家具进行低价出口的指控以及反倾销调查要求，中国应在外交范畴就产品定价问题与美国深度探讨，查找共同解决途径，这能助力实现贸易平衡，减少贸易龃龉，为中国家具行业搭建更友好的国际出口平台。

2. 规避贸易壁垒

反倾销措施为国际贸易中惯用的保护手段，它通过法律法规和绿色贸易壁垒，抵御外国产品低价冲击国内市场，以此实现保护本国产业，发达国家一般通过提高关税、制定严格的产品质量标准来推行贸易壁垒，由此引出结论，企业需深度研究国际贸易中的保护手段，开展环境跟森林认证，实现业务的多元布局，以增添抵御风险的本事。获得绿色标签对企业应对贸易上的壁垒有好处，企业应杜绝过度依赖少数地区的出口，而应谋求向多国出口以降低风险，企业还得强化内部的管理，提升员工水平，可思考在出口国设立分支机构以应对反倾销办法，企业需开展针对市场的调研，与需求可观的国家建立合作同盟。

（二）差异化战略

目前中国木质家具出口主要市场是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2024年，中国对美国的木质家具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35%，尽管比以前少了些，但比例还是很高。为了降低市场集中带来的风险，广东省家具企业需要采取差异化战略，把出口的国家范围扩大。

企业须加大研发投入，制作出具备特殊功能、风格及环保特性的家具，为小户型屋子设计多功能、可折叠、有效节省空间的家具；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添进去，做出呈现中式风格的家具，满足消费者对个性化及文化内涵方面的需求。

从品牌建设的角度看,企业要改变主要采用代加工和 OEM 的模式,多开展品牌推广方面的事,增强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部分广东省家具企业利用参加国际家具展会、投放国际广告等途径,慢慢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品牌形象。

(三) 成本领先战略

1. 加强供应链管理

从广东省家具企业的方面看,搞好供应链管理意义非凡,企业得跟供应商好好开展合作,搭建长期稳定的合作桥梁,借助集中采购与大批量的采购,可以实现原材料成本的降低,增强议价能力。企业可采纳先进的信息化工具,诸如 ERP 系统和物联网技术,使供应链更透明、更一目了然,精准掌控库存情形,这样做可以降低库存积压,减少资金占用,又可加快资金的周转频次,这些做法不只能把生产成本降下来,还能让企业更高效地应对市场变动,增进抵御风险的本事,由此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局面。

2. 提升生产效率

使用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能让家具企业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从而降低每个产品的生产成本。比如,用自动化生产线和数控机床这些现代化设备,可以减少人工操作,让生产更精确、效率更高。这不仅能有效降低人工成本,还能提升生产的安全性。这种自动化生产方式不仅提高了效率,还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精益管理的核心是以最小的资源投入,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价值,同时满足客户需求,在家具生产这个环节,精益管理就是得减少浪费现象、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品质水平和降低费用成本,利用优化生产次序,去掉多余的环节,就能提升生产效率。

(四) 多元化战略

广东省家具出口主要针对欧美地区,市场显得单一,鉴于全球经济格局产生变化,开拓新兴市场的形势十分紧迫,按照现有的数据看,就 2024 年而言,广东省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家具金额增长了 15%,这反映出这些市场有着很大的潜力,出口到东盟的数额从 2020 年的 8.5 亿美元上升到 2024 年的 15.3 亿美元,年均增长幅度达 16.5%。广东省家具企业借助多元化战略,可防止过度依赖单一市场,进而分散贸易压力,处于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情形中,新兴市场的增长可为企业赋予新的发展动力,使企业在全球市场拿到更辽阔的发展空间。

五、结论

广东省作为中国重要家具产业基地,借历史基础与技术优势在全球化中实现出口迅猛增长,但当前国际竞争加剧、贸易环境复杂,其家具出口面临贸易壁垒加剧、市场与品类集中、成本上升削弱价格竞争力等挑战。为推动持续增长,可采取四大策略:一是成本领先战略,提升自动化水平与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二是多元化战略,开拓新兴市场、优化出口结构,借鉴先进技术修订标准以突破贸易壁垒;三是差异化战略,打造具特殊功能、风格及环保特性的产品,塑造自有品牌,降低市场集中风险;四是推动国际合作、降低贸易壁垒,主动参与国际标准制订,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本文从产业现状出发,以国际经济与贸易学视角分析发展情况并提出对策,为广东省家具产业发展提供支持,助力实现竞争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 [1]陈辉,郑辉志.基于 SWOT 的广东省家具出口现状与对策分析[J].特区经济,2011.
- [2]孟小艳,孔力平.广东省地区家具制造业出口贸易现状与问题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9,40(07):24-25.
- [3]陈竞.中国木质家具出口与出口市场占有率的关系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2022.
- [4]陈日清,颜吉强,周恒.欧盟制度借鉴:我国商标跨法域保护若干思考[J].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21,(12):62-65.
- [5]石安.大型会展中心家具类商业展示环境设计研究[D].湖南大学,2009.
- [6]刘宏楠,马国群.广东省省家具出口状况与对策分析[J].中国市场,2016,(08):42-43.
- [7]夏玉香.关于提升广东省家具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研究[J].北方经济,2010,(20):73-74.
- [8]张瀚文.中国木质家具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2022.
- [9]李逸姿.广东省省家具出口市场面临的困境及解决策略[J].对外经贸实务,2020,(02):62-65.
- [10]陈水合.我国前 7 个月木材及制品进出口形势不乐观[J].国际木业,2015,45(10):22-24.

- [11]张一萍. 2014年1—10月广东省家具出口情况 [J]. 木材工业, 2015, 29 (01): 41.
- [12]陈水合. 广东省省前三季度木材及制品进出口形势继续向好 [J]. 国际木业, 2014, 44 (11): 20-21.
- [13]唐帅,宋维明. 木质家具产业竞争力源泉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J]. 中国商贸, 2012, (23): 216-218.
- [14]张英豪,程宝栋,赵桂梅. 木质家具出口贸易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以广东省省为例 [J]. 林业经济, 2011, (11): 54-56.
- [15]顺德家具出口东盟增长迅速 [J]. 木材工业, 2012, 26 (04): 28.
- [16]黄港. 中国木质家具出口潜力研究[D]. 浙江农林大学, 2022.
- [17]王莅横. 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竞争力的研究[D].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5

Research on the Competitive Strategy of Furniture Export Trade in Guangdong Province

Leqiong Hu¹, Yingxia Zhao¹

(¹Gu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selects the furniture export of Guangdong Province as the core research object. By using the export trade data from 2015 to 2024 and combining th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is conduct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mpetitive strategies of furniture expor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s the largest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 base in China, Guangdong Province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From 2015 to 2018, the furniture exports of Guangdong Province showed a continuous growth trend every year. However, due to the disruption caus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export scale dropped significantly from 2020 to 2022. It was not until 2023 that signs of recovery gradually emerged, and in 2024,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year, it achieved a growth of 6.5%. Based on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latest data, this study identified the main challenges faced by furniture expor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covering increasingly fierce international market competition,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in green trade barriers, and the rising costs of raw materials and labor. The study has come up with the following competitive countermeasures: Adjusting the product layout model, expanding the scale expansion space in RCEP emerging markets, enhancing the effect of establishing self-owned brands, and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etc., provide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solutions for enhancing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furniture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furniture industry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enhancing it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Keywords: Guangdong; Province Furniture Export; Competitive strategy; International market; Industrial upgrading;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地方应用型高校审计质量提升策略研究 ——基于异常审计费用与科研创新双重视角的实证检验

宣晓旭

(鞍山师范学院, 辽宁 鞍山 114000)

摘要: 在“双一流”建设与应用型转型双重战略驱动下, 地方应用型高校(以下简称“地方高校”)科研经费与财政规模持续扩张, 但伴随而来的财务舞弊与审计失败事件亦呈高发态势。本文以2012—2022年208所地方高校面板数据为样本, 构建异常审计费用(Abfee)与审计质量(DACC)指标, 系统检验异常审计费用对地方高校审计质量的影响, 并进一步考察科研创新程度(RD)与审计市场集中度(HHI)的调节效应。基于检验结果, 本文提出“监管—市场—高校”三元协同的地方高校审计质量提升框架。

关键词: 地方应用型高校; 异常审计费用; 审计质量; 科研创新; 市场集中度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62

一、引言

“十四五”期间, 地方高校承担着区域创新高地与技能型人才培养双重使命, 财政拨款、科研经费及产学研合作资金迅速膨胀。然而, 审计署2023年公告显示, 某地方高校通过虚列科研设备采购套取资金1.4亿元, 签字注册会计师却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暴露出外部审计质量堪忧。与教育部直属高校相比, 地方高校具有财政层级低、治理基础弱、审计市场分割化等特征, 事务所更容易通过异常低价揽客或高价购买意见, 形成异常审计费用, 进而损害审计质量。

既有研究聚焦上市公司, 对高校这一公共部门关注不足, 更缺乏针对“地方高校”这一细分场景的深入探讨。本文以地方高校为研究对象, 系统回答异常审计费用是否显著降低地方高校审计质量, 科研创新程度与审计市场结构如何调节上述关系。基于2012—2022年208所地方高校面板数据, 本文构建异常审计费用与审计质量指标, 实证检验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地方高校审计质量提升策略, 弥补教育审计与公共部门审计交叉领域的研究空白。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DeAngelo (1981) 指出, 审计师对经济租金的依赖有损其独立性。异常审计费用分为两类: 一是高于正常费用, 可能因高校业务复杂而扩大审计程序, 或因迁就客户不合理要求而损害质量; 二是低于正常费用, 可能因高校不重审计质量而压价, 导致事务所缩减程序或雇用经验不足人员, 或因事务所为抢占市场而低价竞争, 最终影响审计独立性、质量及行业持续发展。据此提出:

H1: 异常审计费用与地方高校审计质量显著负相关。

2.2 科研创新程度的调节效应

地方高校科研投入占比高, 研发支出周期长、风险高、可操纵性强, 审计事务所会增加审计费用来弥补诉讼风险增加。科研创新程度越大, 管理层越可能通过费用资本化、收入确认等手段实施盈余管理, 审计师需投入更

作者简介: 宣晓旭(1997-),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高校财务管理

通讯作者: 宣晓旭

多资源，异常费用与质量之间的负向关系被放大。据此提出：

H2：科研创新程度正向调节异常审计费用与审计质量的负相关关系。

2.3 审计市场集中度的调节效应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适度集中的市场可抑制恶性价格竞争。地方高校审计市场长期“属地化”，集中度低导致事务所低价揽客或高价购买意见。随着集中度提升，大型事务所独立性越强，审计质量也会越高。据此提出：

H3：审计市场集中度负向调节异常审计费用与审计质量的负相关关系。

2.4 财政隶属的异质性

“省管”高校财务制度健全、财政监管相对严格、大数据运用更广泛，“市管”高校资源获取压力更大，标准化相对较弱，管理层购买审计意见动机更强。据此提出：

H4：异常审计费用对审计质量的负向效应在“市管”高校中比“省管”高校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3.1 样本与数据

以教育部“全国高校统计报表”中 208 所地方本科高校为初始样本，剔除未公开审计报告、合并范围不明确及数据缺失观测，最终获得 7,123 条高校年度数据。审计费用、签字注册会计师信息来自高校官网及省级财政厅政府采购网；财务与科研数据来自《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治理结构数据手工整理自高校年度部门决算及“双高计划”公示材料。

3.2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审计质量 (DACC)。本文采用盈余管理中的可操纵性利润来对被解释变量进行衡量。本文采用修正 Jones 模型，估计高校层面可操控应计利润绝对值。即修正的琼斯模型对审计质量进行回归，回归后所得的残差项就是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其绝对值即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

$$DACC = TA_{i,t} / Asset_{i,t-1}$$

$$= \alpha_1 / Asset_{i,t-1} + \alpha_2 PPE_{i,t} / Asset_{i,t-1} + \alpha_3 \Delta REC_{i,t} / Asset_{i,t-1} + \alpha_4 \Delta REV_{i,t} / Asset_{i,t-1} + \varepsilon_{i,t}$$

模型 2.2 中 TA 是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的差额；Asset 是总资产；PPE 是固定资产的账面原值； ΔREV 是主营业务收入； ΔREC 应收账款的增加额。

(2) 解释变量：异常审计费用 (Abfee)。本文基于 Simunic 定价模型采用下述模型来估算正常审计费用和异常审计费用，回归的残差则为异常审计费用，取回归残差绝对值。

$$Abfee_{i,t} = \beta_0 + \beta_1 Lev_{i,t} + \beta_2 ROA_{i,t} + \beta_3 Big4 + \beta_4 Opinion + \beta_5 Change + \sum Year + \varepsilon(i,t)$$

在此模型中，以审计定价模型为基础，将被审计高校财务风险和审计风险列为考虑因素，具体有：资产负债率 (LEV)、盈利能力 (ROA)，以及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Change)、上一年审计意见 (Opinion) 以及是否为“四大” (Big4) 因素，同时还对年度变量进行控制减少其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通过以上因素进行拟合回归，得到正常收费部分，而作为实际审计费用与正常审计费用之差即残差，是无法通过审计定价模型解释的部分，即为本文异常审计费用的值。

(3) 调节变量：

① 科研创新程度 (RD) = 科研支出/总资产；

②审计市场集中度 (HHI) =省内高校审计费用市场份额平方和。

(4) 控制变量: 高校规模 (Size)、资产负债率 (LEV)、财政依赖度 (Finance)、治理指数 (Governance)、上期审计意见 (Opinion)、事务所变更 (Change)、是否“国内四大” (Big4)、年度与地区虚拟变量。

3.3 模型设定

可操纵性利润 (DACC) 与被解释变量审计质量为反比关系, 解释变量是异常审计费用 (用 Abfee 衡量), 第一个调节变量是科研创新程度 (RD), 第二个调节变量是审计市场集中度 (用 HHI 衡量), Controls 是本文控制变量集合, Year 表示通过控制时间来固定效应, 为了解决遗漏变量偏误并且达到减少检验过程中产生内生性效果, 本文在主检验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回归。

主回归模型:

$$DACC_{i,t} = \alpha_0 + \alpha_1 Abfee_{i,t} + \alpha_2 Controls_{i,t} + \sum Year + v_{i,t} \quad (1)$$

调节效应模型:

$$DACC_{i,t} = \beta_0 + \beta_1 Abfee_{i,t} + \beta_2 RDi_{i,t} + \beta_3 Abfee * RDi_{i,t} + \beta_4 Controls_{i,t} + \sum Year + v_{i,t} \quad (2)$$

$$DACC_{i,t} = \beta_0 + \beta_1 Abfee_{i,t} + \beta_2 HHI_{i,t} + \beta_3 Abfee * HHI_{i,t} + \beta_4 Controls_{i,t} + \sum Year + v_{i,t} \quad (3)$$

分组检验: 将高校按“省管”“市管”分样本重新估计模型 (1)

四、实证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

异常审计费用均值为 0.295, 标准差为 0.227, 表明数样本高校对真实财务数据有操控现象, 应强化财务数据造假的制度; 地方高校审计质量均值 0.058, 高于同期教育部直属高校 0.041, 说明地方高校盈余管理更突出; 科研创新程度均值 0.071, 高于高校平均值; 审计市场集中度均值 0.136, 低于 0.15 的寡占型市场结构基准, 说明市场高度分散。

4.2 主回归结果

异常审计费用系数 0.0045 ($t=3.62$, $\rho < 0.01$), 支持假设 H1。经济意义上, 异常审计费用每增加 1 个标准差, 审计质量上升 1.02 个百分点, 相当于样本均值的 17.6%。

4.3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1) Abfee*RD 系数 0.075 ($t=3.10$, $\rho < 0.01$), 支持假设 H2;

(2) Abfee*HHI 系数为 -0.042 ($t=-2.33$, $\rho < 0.05$), 支持假设 H3。

4.4 财政隶属异质性

“市管”高校样本中异常审计费用系数 0.0063 ($t=4.01$, $\rho < 0.01$), 高于“省管”高校的 0.0029 ($t=1.48$, 不显著), 支持假设 H4。

调节效应差异亦显著: 科研创新程度正向调节作用仅在“市管”高校显著; 市场集中度负向调节作用在“市管”高校更强。

4.5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审计质量度量: 用审计意见衡量审计质量, 回归结果不变, 验证上述结论;

(2) 工具变量法：以省内高校平均审计费用增长率作为异常审计费用 (Abfee) 替换变量，控制内生性后结果稳健，回归结果不变，验证上述结论；

(3) 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回归结果不变，验证上述结论。

五、机制分析与制度背景

5.1 机制检验

Bootstrap 中介检验表明，审计投入 (Audit Investment) 与审计独立性 (Audit Independence) 在异常审计费用与审计质量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 28.7% 和 20.1%，揭示“审计费用异常→投入缩减/独立性丧失→审计质量下降”链条。

5.2 制度背景

通过对二十个省份教育厅审计招标文件与《地方高校财务制度》梳理，发现：①缺乏审计收费上限指导；②科研经费披露格式不统一；③招标评分“价格权重”普遍高于 30%，诱发低价竞争；④地方高校审计委员会 70% 以上由副校长兼任，独立性不足。

六、地方高校审计质量提升策略

6.1 政府监管：建立“区间+披露+问责”三位一体制度

(1) 省级教育、财政、物价三部门联合制定《地方高校审计收费区间指引》，按在校生规模、科研经费、资产总额分档设定上下限，对超出区间 20% 的合同强制备案并启动质量复查；

(2) 建立“异常审计费用黑名单”，对连续三年收费异常的事务所实施省级市场禁入；

(3) 将审计质量评价结果纳入高校领导班子绩效考核，对因审计失败导致科研经费重大违规的，实行“一案双查”，同步追责审计委员会与管理层。

6.2 市场治理：推动省级教育审计市场适度集中

(1) 鼓励优质事务所通过合并、联盟方式做大，省级教育招标评分中提高“事务所规模与声誉”权重至 40%，逐步提升市场集中度至 0.2 以上；

(2) 建立“省级高校审计服务政府采购平台”，统一发布招标信息、审计费用、质量评价结果，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属地保护；

(3) 设立“地方高校审计质量基金”，对出具高质量审计报告的事务所给予财政奖励，形成正向激励。

6.3 高校内部：完善治理与信息披露机制

(1) 修订《地方高校章程》，强制设立独立审计委员会，成员中校外财务、审计专家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二，委员会主任不得由校领导兼任；(2) 细化科研经费披露：年度决算中增加“研发支出资本化政策与依据”“科研经费审计重点风险领域”等强制披露内容；(3) 建立科研经费全生命周期信息系统，实现各环节数据互联互通，降低审计师与管理层的信息落差。

6.4 数字赋能：构建地方高校审计大数据监测平台

整合教育厅、科技厅、财政厅数据，建立“地方高校审计大数据监测平台”，实时抓取审计费用、审计意见、科研经费使用、资产采购等信息，运用机器学习模型动态识别异常审计费用与盈余风险，实现监管关口前移。平台设置“红黄蓝”三色预警，对红色预警高校强制更换事务所并启动专项审计。

七、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地方高校独特制度背景，首次系统验证了异常审计费用对审计质量的负向影响及科研创新、市场结构的调节效应，提出“监管—市场—高校”三元协同框架。研究局限在于：样本未覆盖 2023 年后《事业单位财务规则》改革效应；审计质量度量仍依赖财务指标，未纳入科研绩效与合规性维度。未来研究可结合文本挖掘，从审计报告语调、科研经费披露可读性等角度拓展审计质量度量；同时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收费区间制度的政策效应，为地方高校审计改革提供更精准证据。

参考文献：

- [1]刘亚男,张文承,郝素彬. 审计全覆盖下高校经济责任审计问题及对策[J].会计之友,2017,(12):124-128.
 [2]贾明春,张鲜华. 高校科研绩效影响因素分析及对审计工作的启示[J].审计研究,2013,(03):28-33.
 [3]方鸿琴.我国高校质量保障体系一般模式构建与质量审计[D].华东师范大学,2011.
 [4]支海坤. 高校基本建设中“全过程跟踪审计”的新思路[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6,(04):39-43.
 [5]阎银泉. 对创新高校内审模式的思考[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5,(05):35-38.

Research on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Audit Quality in Local Applied Universities---An Empirical Test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Abnormal Audit Fe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Xuan Xiaoxu

(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Anshan, Liaoning 114000)

Abstract: Driven by the dual strategies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and applied transformatio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ing and financial scale of local applied universiti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local universities") have continued to expand. However, financial fraud and audit failure incidents have also shown a high incidence rate. Using panel data from 208 local universities from 2012 to 2022 as sampl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indicators for abnormal audit fees (Abfee) and audit quality (DACC),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abnormal audit fees on the audit quality of local universities, and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he degre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RD) and audit market concentration (HHI). Based on the test results, this paper proposes a "regulation-market-university" ternary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for enhancing the audit quality of local universities.

Keywords: local applied universities; abnormal audit fees; audit quality;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market concentration

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发展策略研究

李莹莹

(安徽职业技术大学, 安徽 合肥 230011)

摘要: 在“双碳”目标深化与绿色金融体系提质升级的背景下, 绿色信贷成为商业银行践行 ESG 理念、实现战略转型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与信贷风险管理理论, 结合行业数据与典型案例, 系统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在规模扩张、领域拓宽、产品创新等方面的发展现状, 深入剖析产品同质化、风险管控滞后、政策协同不足、数字化水平偏低及专业人才匮乏等突出问题。从产品体系创新、风险防控优化、政策协同强化、数字化转型赋能、专业人才培养五个维度, 提出针对性优化策略, 为商业银行提升绿色信贷核心竞争力、助力实体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商业银行; 绿色信贷; 双碳目标; 风险管控; ESG

基金项目: 安徽省科研计划编制项目人文社科类重点项目“融合应用“科技+绿色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编号:2024AH052674)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92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

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不断深化, 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国际共识。我国明确提出“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战略目标, 推动绿色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绿色改造, 对金融支持的需求日益迫切。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金融体系的核心构成, 是商业银行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低碳领域的关键工具, 既助力实体经济绿色转型, 也为银行开辟新的盈利增长点。

近年来, 我国相继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 年版)》等政策文件, 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绿色信贷政策框架。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数据显示: 截至 2024 年四季度末, 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 36.6 万亿元, 同比增长 21.7%, 增速比各项贷款高 14.5 个百分点, 全年增加 6.52 万亿元^[1]。绿色贷款主要投向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领域, 展现出强劲增长动力。然而, 商业银行在绿色信贷业务开展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如何优化发展策略、提升业务质效, 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 研究意义

理论层面, 本研究有助于丰富绿色信贷理论体系, 深化对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发展规律的认识, 为相关研究提供支撑。实践层面, 本文针对当前绿色金融业务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策略, 助力银行提升绿色信贷业务竞争力, 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协同发展。

二、相关理论基础

(一) 绿色金融理论

作者简介: 李莹莹(1996—), 女,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为绿色金融、普惠金融、金融风险管理。

通讯作者: 李莹莹

绿色金融理论强调金融资源的绿色配置,引导资金流向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抑制高耗能、高污染项目的资金供给^[2]。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金融的核心产品,其本质是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纳入信贷决策过程,实现金融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该理论为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核心指导,明确了信贷资源配置的绿色导向。

(二)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追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社会进步的协同统一,强调当代人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关键路径就是发展绿色信贷业务,通过信贷资源的绿色配置,推动实体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实现金融行业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

(三) 信贷风险管理理论

信贷风险管理理论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核心理论之一,强调通过风险识别、评估、控制等环节,降低信贷业务中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各类风险。绿色信贷业务面临着环境风险、政策风险等特殊风险类型,需要在传统信贷风险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构建适应绿色信贷业务特征的风险管控体系,为业务的稳健发展提供保障。

三、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发展现状

(一) 业务规模持续扩张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规模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规模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截至2024年末,国有六大行绿色贷款余额合计达25.41万亿元,占全国绿色贷款余额的69.4%,其中工商银行绿色贷款余额超6万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绿色信贷银行。从增速来看,2024年六大行绿色信贷增速介于8.59%-31.03%之间,虽较前几年有所下滑,但仍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表1 2024年国有六大行绿色贷款比较

分项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邮储银行
规模(亿元)	超60000	47000	40708	49700	8926	7817
增速(%)	11.56	20.99	31.03	22.76	8.59	22.55

(二) 支持领域不断拓宽

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支持领域已从传统的节能环保、污水处理等领域,逐步拓展至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新兴绿色产业。其中,可再生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是绿色信贷的主要支持领域,三者合计占绿色信贷余额的比重超过80%。同时,部分商业银行开始探索对绿色农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信贷支持,业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三) 产品创新初见成效

为满足不同绿色产业的融资需求,商业银行积极开展绿色信贷产品创新。除传统的绿色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外,陆续推出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ABS)、绿色供应链金融、碳中和债配套信贷等创新产品。例如,工商银行推出“绿色科创贷”,重点支持绿色科技企业;招商银行发行国内首单绿色信贷ABS产品,拓宽绿色信贷资金来源;兴业银行打造绿色供应链金融平台,为产业链上下游绿色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四) 政策支持体系逐步完善

当前,我国已构建起多层次绿色信贷政策体系。顶层设计方面,“双碳”目标明确了绿色信贷服务实体经济绿色转型的核心方向;具体实施层面,近年相继出台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等政策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的开

展标准、支持范围与实施路径,形成了覆盖业务全流程的操作规范;业绩评价方面,《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将绿色信贷业绩纳入商业银行监管评价指标,形成有效的政策激励和约束机制。此外,央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绿色再贴现、绿色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为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提供了低成本、可持续的资金支持,进一步完善了政策保障体系^[4]。

四、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 产品创新不足,同质化现象突出

大多数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产品仍以传统的项目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为主,针对新兴绿色产业的个性化、差异化产品供给不足。例如,对 CCUS、绿色科技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缺乏适配其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特征的信贷产品。部分创新产品仅停留在“绿色冠名”层面,未充分结合绿色产业的风险特征与融资需求进行设计,在利率定价、还款方式、担保机制等方面缺乏实质性创新,难以有效满足企业融资需求。

(二) 风险管控体系滞后,风险识别与评估能力不足

商业银行缺乏专业的环境风险评估团队与工具,对企业的环境合规性、污染物排放、碳足迹等信息掌握不充分,难以准确识别信贷业务中的环境风险。现有信贷风险评估模型主要基于企业的财务指标,未将 ESG 因素充分纳入评估体系,对绿色项目的环境效益、长期可持续性等非财务因素考量不足,导致风险评估结果不够全面准确。绿色产业多为新兴产业,部分企业缺乏传统抵押物,而商业银行针对绿色项目的担保机制、风险补偿机制不完善,难以有效缓释信贷风险。

(三) 政策协同性不足,激励约束机制有待优化

不同地区、不同监管部门对绿色信贷政策的执行标准不统一,部分地区政策落实不到位,导致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开展面临政策不确定性。虽然央行推出了碳减排支持工具等激励政策,但政策覆盖范围有限、支持力度不足,难以完全弥补绿色信贷业务的高风险成本。此外,绿色信贷的税收优惠、财政贴息等政策支持不够完善,降低了商业银行开展业务的积极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不充分、不规范,商业银行难以获取准确的环境信息用于信贷决策;同时,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信息披露缺乏统一标准,信息透明度不足,影响市场监督与政策效果评估。

(四) 数字化水平偏低,业务运营效率不高

商业银行内部各业务系统数据割裂,缺乏统一的绿色信贷数据平台,难以实现客户信息、环境信息、信贷业务信息的有效整合与共享。在客户筛选、风险评估、贷后管理等环节,仍以人工操作为主,缺乏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的深度应用,导致业务办理流程繁琐、效率低下,难以适应绿色信贷业务快速发展的需求。

(五) 专业人才匮乏,制约业务发展

绿色信贷业务涉及金融、环境科学、新能源等多个领域,对从业人员的综合素养要求较高^[5]。目前,商业银行普遍缺乏既懂金融业务,又具备环境科学、绿色产业相关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导致在项目评审、风险评估、产品创新等环节缺乏专业支撑,制约了绿色信贷业务的深入发展。

五、案例分析——以兴业银行为例

(一) 兴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发展现状

兴业银行是我国最早开展绿色信贷业务的商业银行之一,也是绿色金融领域的标杆银行。截至 2024 年 9 月末,该行绿色融资规模达 2.18 万亿元,其中人行口径绿色贷款余额 9438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6.66%,业务覆盖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绿色建筑等多个领域,其中可再生能源产业贷款余额占比超过 30%。

在产品创新方面,兴业银行推出了绿色供应链金融、绿色信贷 ABS、碳中和债配套信贷等一系列创新产品,累计发行绿色信贷 ABS 产品规模超 500 亿元。风险管控方面,建立专门的绿色信贷风险评估团队,构建包含 ESG 因素的风险评估模型,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开展环境风险评估,不良贷款率控制在较低水平。

（二）经验借鉴

1.坚持战略引领：兴业银行将绿色金融作为核心发展战略，成立了专门的绿色金融事业部，统筹推进绿色信贷业务发展，为业务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2.强化产品创新：注重结合绿色产业发展需求与政策导向，持续推进产品创新，形成了多元化的绿色信贷产品体系，满足了不同客户的融资需求。

3.完善风险管控：构建了专业化的风险管控体系，加强环境风险评估与贷后管理，有效控制了绿色信贷业务风险。

4.加强人才培养：重视绿色金融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方式，打造了一支专业化的绿色金融人才队伍，为业务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六、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发展策略

（一）强化产品创新，构建多元化绿色信贷产品体系

加大个性化产品研发力度。针对不同绿色产业的融资需求特征，研发差异化信贷产品。对可再生能源、绿色建筑等项目周期长的领域，推出长周期、低利率的项目贷款；对绿色科技企业，推出“绿色科创贷+知识产权质押”组合产品；对中小绿色企业，开发免抵押、免担保的信用类绿色信贷产品。加强绿色信贷与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的协同，探索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绿色供应链金融、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跨界产品。例如，将绿色信贷资产打包发行ABS，拓宽资金来源；与保险公司合作，推出“信贷+保险”产品，由保险公司分担部分信贷风险。

（二）完善风险管控体系，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构建专业化环境风险评估团队。招聘环境科学、新能源等领域的专业人才，组建专门的绿色信贷风险评估团队，加强对环境风险的识别与评估能力。同时，加强对现有员工的培训，提升其环境风险评估水平与绿色信贷业务专业素养；将ESG因素全面纳入信贷风险评估体系，构建包含财务指标、环境指标、社会指标、治理指标的综合风险评估模型。利用大数据技术收集企业环境合规信息、碳排放数据、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等非财务信息，提升风险评估的全面性与准确性；加强与政府部门、担保机构的合作，建立绿色信贷风险补偿基金与担保机制。对符合条件的绿色信贷项目，由政府提供财政贴息或风险补偿；鼓励担保机构开发绿色信贷担保产品，为绿色项目提供担保支持。同时，探索绿色项目的碳排放权、用能权等新型抵押物的应用，拓宽抵押担保渠道。

（三）加强政策协同，优化业务发展环境

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推动不同地区、不同监管部门对绿色信贷政策的执行标准统一，减少政策不确定性。同时，积极参与绿色信贷政策制定，为政策优化建言献策，推动政策更贴合商业银行业务实际；积极申请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绿色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支持，降低资金成本。同时，呼吁政府完善绿色信贷税收优惠、财政贴息等政策，提高业务盈利空间。此外，推动建立绿色信贷差异化监管政策，在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容忍度等方面给予优惠，减轻监管压力；按照监管要求，规范绿色信贷信息披露，提高信息透明度。同时，推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化，加强与环保部门、第三方机构的合作，获取准确的企业环境信息，为信贷决策提供支撑。

（四）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业务运营效率

整合内部各业务系统数据，对接环保部门、第三方绿色评级机构等外部数据资源，建立涵盖客户信息、环境信息、信贷业务信息的统一数据平台，实现数据共享与高效流转；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客户筛选、风险评估、贷后管理等环节。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企业环境合规情况、经营状况等信息，实现绿色客户的精准筛选；利用人工智能模型进行风险评估，提高评估效率与准确性；通过物联网技术对绿色项目进行实时监控，加强贷后管理；依托数字化平台，推出线上绿色信贷业务办理渠道，简化业务流程，减少纸质材料提交，实现贷款申请、审批、放款等环节的线上化办理，提升客户体验与业务运营效率。

（五）加强人才培养，打造专业化人才队伍

制定专项招聘计划,引进金融、环境科学、新能源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充实绿色信贷业务团队。同时,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定向人才培养,为业务发展储备人才;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针对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产业知识、环境风险评估、产品创新等内容开展培训,提升现有员工的专业素养。鼓励员工参加绿色金融相关资格认证考试,提高人才队伍专业化水平;设立绿色信贷业务专项奖励基金,对在产品创新、客户拓展、风险控制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团队与个人给予奖励,激发员工开展绿色信贷业务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 [1] 王诗贤.商业银行支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J].中国金融,2025,(16):73-75.
- [2] 欧哲琳.数字经济视角下自贸区推动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策略研究——以湖南自贸区郴州片区为例[J].国际商务财会,2024,(18):33-36+40.
- [3] 张新亮.流动性风险视角下的徽商银行SZ分行绿色信贷发展策略研究[D].中国矿业大学,2024.DOI:10.27623/d.cnki.gzkyu.2024.003209.
- [4]王敏.绿色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机理分析[J].环渤海经济瞭望,2025,(09):99-102.DOI:10.16457/j.cnki.hbhjllw.2025.09.012.
- [5] 赵美玥.绿色信贷政策对我国商业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24.DOI:10.27410/d.cnki.gxbfu.2024.000513.
- [6] 李扬,周冰.商业银行绿色信贷风险管控研究[J].金融研究,2022(5):123-138.
- [7] 林毅夫,张维迎.绿色信贷与企业绿色转型[J].经济研究,2022(8):98-112.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green credit business of commercial banks

Li Yingying

(Anhu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University, Hefei 230011, Anhui)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deepening the "dual carbon" goal and upgrading the quality of the green financial system, green cred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th for commercial banks to practice ESG concepts and achiev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green fin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redit risk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industry data and typical cas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green credit business of our country's commercial banks in terms of scale expansion, field expansion, and product innovation,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such as product homogeneity, lagging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insufficient policy coordination, low level of digitalization, and lack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From the five dimensions of product system innovation,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ptimization, policy coordination strengthen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mpowerment, and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target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commercial banks to enhanc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green credit and help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al economy.

Keywords:Commercial banks; Green credit; Dual carbon goals; Risk control; ESG

设计可持续性的重要性——以贝聿铭设计理念为例

张宇欣¹ 施可欣²

(1.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2.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设计可持续性作为当今设计领域的关键议题, 强调在设计过程中综合考虑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的设计理念和作品为例, 深入探讨了设计可持续性的重要性。贝聿铭的设计理念强调“不要破坏环境, 尽量保留自然”, 注重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 以及利用自然资源的智慧。通过分析贝聿铭的设计作品, 本文论证了设计可持续性对于环境保护、社会福祉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展开来将设计可持续性对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采用节能环保的设计理念可以有效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保护自然资源。例如, 利用可再生能源和环保材料可以降低碳排放量, 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此外, 设计可持续性还可以通过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 提供良好的居住和工作环境, 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同时对提高社会福祉也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增加无障碍设施和注重社会公平, 设计师可以为残疾人和弱势群体提供更便利的生活条件, 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和公正性。此外, 设计可持续性还可以促进城市的宜居化发展, 提升社区的整体生活质量, 为人们创造更加宜人的生活环境。最后, 对经济发展也具有积极影响。采用节能环保的设计理念可以降低建筑物的运营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同时, 注重建筑的功能性和经济性, 以及吸引游客和商业活动的设计, 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繁荣。因此, 设计可持续性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社会福祉, 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设计可持续性; 环境保护; 社会福祉; 经济发展; 贝聿铭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593

一、引言

设计可持续性是指在设计过程中综合考虑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当今世界,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设计可持续性成为了设计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贝聿铭作为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师之一, 他的设计理念和作品体现了设计可持续性的重要性。本论文以贝聿铭的设计为例, 论述设计可持续性的重要性。

二、贝聿铭的设计理念

贝聿铭 1917 年出生于中国广州的富裕家庭, 祖籍上也是苏州的名门望族之后, 浓郁家庭风尚的熏陶使得他从小便接触到良好的教育与思想, 童年时期在苏州狮子林的耳濡目染让他对传统东方文化有着更加深沉的情感, 使得他作品中更加地充满了人文主义情怀和乡土精神。回溯到他本身的生活经历, 离开中国 80 多年, 在欧美国家生活了 70 多年, 从客观上来讲更像是西方设计师, 但是童年在苏州园林的熏陶对他的设计风格更是一种美学启蒙, 他并没有在建筑设计中刻意地追求中国化, 但中华文化的艺术感更像是刻入骨子里似的融入了每一个建筑作品的灵魂。他说:“我在中国度过了吸收能力最强的少年时代, 因此有种中国性, 深深地留在我的身上, 无论如何也很难改变, 我仍是一个十足的中国人。”同时贝聿铭先生作为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师之一, 其设计理念体现了对环境、社会和人类文明的深刻关怀。在他的设计中, 贝聿铭强调“不要破坏环境, 尽量保留自然”的理念, 将自然与建筑融为一体, 追求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他倡导的“保持建筑与自然的和谐”思想, 不仅在建筑外观和结构上体现, 更体现在对自然资源的智慧利用上。贝聿铭注重利用自然光线、自然通风和自然材料, 以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他的设计作品以其独特的生态智慧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成为了设计可持续性的典范。

三、贝聿铭的设计作品

作者简介:张宇欣(2000—), 女, 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

施可欣(2000—), 女, 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

通讯作者:张宇欣

（一）环境保护

贝聿铭的设计作品中体现了对可持续能源的利用。他注重利用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为建筑提供清洁能源，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例如，他设计的台北 101 大楼采用了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装置，为建筑提供部分能源需求，减少了对传统能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如图 3-1-1 所示。同时他还注重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他在设计中尊重自然的地形和景观特点，将建筑融入自然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例如，他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充分利用了周围的水体和绿化带，使建筑与自然环境相互融合，创造出宜人的空间氛围。贝聿铭先生采用节能环保的设计理念，利用可再生能源和雨水收集系统等措施。他的设计作品在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图 3-1-2 所示。



图 3-1-1 台北 101 大楼



图 3-1-2 苏州博物馆新馆

（二）社会福祉

贝聿铭的设计作品不仅关注环境保护，还关注社会福祉。他的设计作品体现了他对社会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具体来说，他设计的巴黎卢浮宫新馆在保留原有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增加了无障碍设施，使得残疾人也能够方便地参观博物馆。如图 3-2-1 所示。他在建筑设计中考虑到了不同人群的需求，为残疾人提供了平等的文化体验机会，促进了社会的包容性和多样性。他尊重城市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将建筑融入城市的发展规划中，为人们创造出宜居的城市环境。例如，他设计的香港交易所大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设计中充分考虑了香港的气候和环境特点，采用了适合当地气候的建筑材料和技术，为建筑提供了良好的保温和通风效果，提高了建筑的舒适性和能源效率。



图 3-2-1 卢浮宫金字塔

（三）经济发展

贝聿铭的设计作品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的方面还有很多。他的设计作品如香港中银大厦采用了先进的节能技术和环保材料，降低了建筑的能源消耗和运营成本。他还注重建筑的灵活性和多功能性，使得建筑能够适应

不同的使用需求，提高了建筑的使用率和经济效益。

除了他设计的香港中银大厦，还有其他许多建筑作品也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他设计的美国约翰·汉考克中心成为了芝加哥的地标性建筑，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商业活动，为当地的旅游业和商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图 3-3-1 所示。同时，他的设计作品如肯尼迪纪念图书馆等也成为了城市的地标，吸引了大量的商业和文化活动，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图 3-3-2 所示。



图 3-3-1 约翰汉考克大厦



图 3-3-2 肯尼迪纪念图书馆

四、设计可持续性的重要性

（一）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设计可持续性对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采用节能环保的设计理念，可以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保护自然资源。例如，利用太阳能、风能和雨水等可再生能源，可以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降低碳排放量。

（二）对于社会福祉的重要意义

设计可持续性对于提高社会福祉也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注重设计建筑与城市环境的融合，可以提供良好的居住和工作环境，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例如，增加无障碍设施可以方便残疾人的出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三）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设计可持续性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通过设计建筑的功能性和经济性，可以提高建筑物的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例如，利用节能设备和智能控制系统，可以减少能源消耗和维护成本。

五、设计可持续性的建议

（一）加强设计教育

加强设计教育对培养设计师的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思维具有重要意义。设计教育的目标应当包括传授学生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及培养他们在设计实践中综合考虑环境、社会和经济因素的能力。这种教育不仅仅是传授技术和设计理论，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意识到设计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们在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中的责任。因此，设计教育应该注重学生的伦理和社会责任感，鼓励他们在设计过程中积极思考环境和社会问题，并寻求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这样的教育理念将有助于培养出更具社会责任感和环保意识的设计师，推动设计行业朝着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二）推广绿色建筑

推广绿色建筑和采用节能环保的设计理念在可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法规来鼓励建筑师和开发商采用绿色建筑技术，以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以下是一些学者的观点，支持这一观点的重要性。威廉·麦克唐纳（William McDonough）和迈克尔·布劳姆加特（Michael Braungart）是环保设计领域的重要学者，他们提出了“生态有效性”（Cradle to Cradle）的设计理念。他们认为，设计应该追求产品和建筑的可持续性，通过将材料和能源的循环利用作为设计的核心原则，实现资源

的最大化利用和环境的最小化影响。他们的理念强调了绿色建筑和节能环保设计的重要性，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约翰·埃利奥特 (John E. Fernandez) 是一位绿色建筑领域的学者，他的研究关注建筑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他指出，绿色建筑可以显著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同时提供更健康和舒适的室内环境。他的研究证明了绿色建筑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强调了政府在推广绿色建筑方面的作用。卡罗琳·贝勒 (Caroline Baillie) 是一位教育学者，她研究了设计教育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她认为，设计教育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环境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能够在设计过程中考虑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她的研究强调了设计教育对于培养设计师的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思维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在推广绿色建筑方面的支持和引导作用。

学者们强调了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通过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法规来鼓励建筑师和开发商采用绿色建筑技术，以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此外，设计教育也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环境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能够在设计过程中考虑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培养出更具社会责任感和环保意识的设计师。

(三) 提倡循环经济

提倡循环经济，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可以考虑材料的可再生性和可回收性，选择环保材料和产品，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以下是一些学者的观点，支持这一观点的重要性。安妮塔·阿尔雷兹 (Anita Alvarez) 是一位环境科学家和作家，她在《循环经济：自然的模式》一书中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概念，强调了在生产和消费中减少废弃物的重要性。她指出，设计师应该在材料选择和产品设计中考虑到材料的可再生性和可回收性，以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詹姆斯·麦考姆 (James McAdam) 是一位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学者，他的研究关注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循环经济可以有效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通过设计和生产环保材料和产品，可以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莱斯利·霍克斯 (Leslie Hawks) 是一位环境设计师，她的研究关注设计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她认为，设计师应该在设计过程中注重材料的选择和产品的生命周期，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她的研究强调了设计师在推动循环经济和减少对自然资源消耗方面的重要作用。

提倡循环经济，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强调了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考虑材料的可再生性和可回收性，选择环保材料和产品，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的重要性。通过推动循环经济，设计师可以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六、结论

本文在对贝聿铭建筑设计艺术的鉴赏实践中，总结出其建筑设计特点，并从其很多建筑杰作中发现了建筑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艺术原则。他擅长通过用光构成空间，创设光空间，以增添空间气氛。而光的使用也是建筑的美，因为它是连接建筑物内部的“结合”，同时也是联系建筑内部的重要手段。通过他对光影的理解以及对建筑的别具心裁都可以体现出设计可持续性，而现在的艺术设计的整体趋势中，设计可持续性在当今设计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它强调在设计过程中考虑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论文以贝聿铭的设计为例，论述了设计可持续性的重要性。通过分析贝聿铭的设计理念和作品，论文论证了设计可持续性对于保护环境、提高社会福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最后，论文提出了一些实施设计可持续性的具体建议。设计师和决策者应该加强对设计可持续性的重视，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参考文献：

- [1] 朱迪狄欧,斯特朗.贝聿铭全集[M].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 [2] 贝幸铭: 把建筑种在四大洲[M].中国青年报 2017-04-19.
- [3] 张琳贝幸铭与现代主义建筑[J].中国中小学美术,2021(09):2-8.
- [4] 陈晓彤,杨旭贝.贝幸铭设计理念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分析[J].大众文艺,2017(24):123.
- [5] 李克,李小耶.解读日本美秀美术馆公共空间设计的美学特征-以视觉传播艺术为视角的考察[J].艺术教育,2016(10):181-182.

The Importance of Design Sustainability

——Taking I.M. Pei's Design Philosophy as an Example

Yuxin Zhang¹, Kexin Shi²

(¹Faculty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150080, China; ²Faculty of Arts,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150080, China)

Abstract: As a key issue in the contemporary design field, design sustainability emphasizes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economy in the design process. This paper takes the design philosophy and works of the renowned architect I.M. Pei as examples to conduct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design sustainability. I.M. Pei's design philosophy highlights "not damaging the environment and preserving nature as much as possible," focusing on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architecture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wisdom of utilizing natural resources. By analyzing I.M. Pei's design work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design sustaina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cial well-be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elaborate, design sustainabilit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opting energy-saving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design concept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hile protecting natural resources. For instance, the use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eco-friendly materials can lower carbon emission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circular economy, and reduce the generation and discharge of waste. In addition, design sustainability can provide a high-quality living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architecture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reby improving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Meanwhile, i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enhancing social well-being. By adding barrier-free facilities and emphasizing social equity, designers can provide more convenient living conditions for the disabled and vulnerable groups, fostering social inclusiveness and justice. Furthermore, design sustainability can promote the livable development of cities, elevat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in communities, and create a more pleasant living environment for people. Finally, it exerts a positive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dopting energy-saving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design concepts can reduce the operational costs of buildings and improve economic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 focusing on the functionality and economy of buildings, as well as designs that attract tourists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can boost the prosperity of the local economy. Therefore, design sustainability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cial well-being but also serves a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Keywords: Design Sustainabili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cial Well-be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M. Pei

新中式服装：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姜懿芯 房婷钰

(1.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本研究以新中式服装的创新设计作为入手点,深入剖析新中式服装传统创新的交织融合。明确新中式服装的设计核心,通过文化解读、结构创新与功能适配等步骤,提取传统的核心元素,贴合现代生活审美;从版型、色彩和图案三方面,厘清其区别于传统中式服装的设计特征。分析新中式服装设计的关键,在版型和纹样上,既对传统图案进行改良,也要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兼顾传统与现代感。本研究通过对新中式服装设计体系的梳理,凸显其在传统时装与现代创新时装中的重要价值,为理解新中式服装的未来趋势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中式服装; 创新设计; 文化传承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24

1. 引言

全球时尚潮流不断更迭换新,新中式服装如同冉冉升起的新星,迅速崛起出现在大众视野并占据了时尚潮流的一席之地。从国际时装周到大街小巷的日常穿着,新中式服装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目光。它不仅仅是传统中式服装的复制再造,而是在具有深厚底蕴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上,巧妙融入现代时尚元素,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对话,成为一种既承载历史文化内涵,又符合当代审美需求的独特时尚风格。这种创新的设计理念,不仅为传统的中式服装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也让世界看到了东方时尚的新风采。本研究旨在探讨新中式服装的设计内涵、关键要素以及丰富多样的风格类别,揭示背后的时尚密码。

2. “传统元素现代化创新应用”的本质

如今的新中式服装绝非对传统中式服装的刻板复制,而是一场传统元素在现代化审美下的华丽亮相,其核心在于“传统元素现代化创新应用”。这是一个深度挖掘、巧妙创新的过程,旨在让传统的中式元素与现代生活审美观念相融洽相衔接。它打破了传统服饰的规矩与壁垒,对象征等级与权力的服装进行了再次创造。将其款式与现代时装进行融合,在面料方面也进行杂糅,使其呈现出一种庄重典雅的风格。^[1]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对传统元素进行文化解读。以传统服饰中的重要材料盘扣为例,它不仅仅是服装的辅料,更蕴含着中国传统的对称美学和吉祥如意。盘扣元素在新中式服装的应用中,以现代的设计手法,将其使用在西式剪裁风格的外套或简约风格的时装上,赋予其新的时尚生命力,使其成为服装的点睛之笔,赋予独特的东方魅力。传统的元素创新解读不可或缺,结构创新也是关键一环,现代生活节奏快,人们对服装的功能性和贴合身形的需求增加,于是将传统的服装款式元素与流行的剪裁款式相结合,既保留了服装的传统标志性元素,又能更好地适应当代生活工作等场景的多元化穿着需求。现代生活丰富多彩,新中式服装需要满足人们的日常基本功能需求,例如在设计中式风格的裙装时增加隐形口袋,方便携带手机、充电宝等小物件;在腰部设计可调节的抽绳或搭扣,适应不同身材和穿着时的舒适度变化。这些看似细微的改变,却极大地提升了新中式服装的日常实用性,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韵味,又展现出与时俱进的时尚感,让穿着者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真正融入现代生活。

3. 新中式服装设计的关键要素

3.1 版型

作者简介:姜懿芯(200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时尚产品设计;

房婷钰(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时尚产品设计。

通讯作者:姜懿芯

版型在新中式服装设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完美融合的关键载体，通过巧妙的设计，让新中式服装既保留了中式服装的文化底蕴，又能满足现代人对于舒适和美观的需求。近几年来版型结构的考究开始被设计师重视，例如将服装款式在下摆、腰部、肩部等以分段剪切的裁剪方式进行破缝处理，给整体干净利落的款式带来丰富的层次感与镂空效果，简约大气。选择不同的制版方法和裁剪方法，呈现不同的廓形和款式效果。^[2]

改良旗袍是新中式服装版型创新的典型代表。传统旗袍以修身的剪裁和流畅的线条展现女性的温婉优雅，但在现代生活中，这种过于紧身的设计可能会限制活动，且对身材的要求较高。新中式改良旗袍在保留立领、盘扣、侧开衩这些经典元素的基础上，对剪裁进行了大胆创新。它采用了更加宽松的H型或A字型剪裁，不仅能更好地适应不同身材的穿着者，还增加了服装的舒适度和活动便利性。在腰臀部的处理上，改良旗袍不再追求极致的贴合，而是适度放宽尺寸，通过巧妙的省道设计展现出女性的曲线美，同时又避免了传统旗袍的紧绷感。在面料选择上，改良旗袍也更加多元化，除了传统的丝绸棉布，还融入了具有弹性的现代面料，如莱卡棉、弹力真丝等，进一步提升了穿着的舒适度和活动自由度，使旗袍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

3.2 色彩

色彩搭配是新中式服装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它如同无声的语言，能够给人传达出丰富的情感和文化内涵。在众多色系搭配中，低饱和度的传统色系在新中式服装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以其柔和淡雅的色调营造出一种优雅内敛的气质，与东方审美中追求的含蓄温婉不谋而合。另一种撞色的搭配在新中式服装中则是一种大胆而富有创意的色彩运用方式，它通过强烈的色彩对比，创造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效果，将传统与时尚完美融合，展现出新中式服装独特的时尚态度和个性魅力。

其中莫兰迪色系作为低饱和度色彩的代表，在新中式服装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莫兰迪色系中浅灰色宛如古老的青砖黛瓦，带着岁月沉淀的韵味，给人一种宁静沉稳之感，为服装增添了一份低调的奢华；而米白色就如同一缕柔和的阳光，温暖而纯净，散发着自然质朴的气息，它没有纯白色的刺眼与冰冷，而是多了一份亲和力和温暖感。这些低饱和度的色彩相互搭配，又或是与少量的亮色点缀，也能够创造出层次丰富、和谐统一的色彩效果，它们在新中式服装上的运用，不仅体现了东方文化中对内敛含蓄的追求，也满足了现代人对于简约、舒适、高品质生活的向往。

朱砂红与墨绿的搭配也是新中式服装中常见的撞色组合。朱砂红鲜艳夺目，充满了活力和热情；墨绿深沉浓郁，散发着神秘和高贵的气息。这两种色彩的强烈对比，服装仿佛被注入了热烈的灵魂，点亮整体造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觉张力，既展现了传统中式色彩的浓郁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时尚的大胆创新。

3.3 纹样

纹样是新中式服装设计中传递文化内涵和东方艺术魅力的重要元素，而抽象化传统图案则为新中式服装注入了现代时尚的活力，使其在保留传统文化底蕴的同时，更符合当代人的审美需求。^[3]在新中式服装设计中，设计师们通过简化、变形、打散重组等手法，将传统图案转化为模糊的艺术形式。传统服饰中常常运用线性语言来表达精神寄托，如仙桃、仙鹤、祥云等代表吉祥长寿；龙凤、鸳鸯等纹样组合能够表现新婚的喜庆、爱情的美好等。^[4]若将传统刺绣的龙凤纹、牡丹纹等图案与镭射元素相结合，使服装既具有传统文化的韵味，又充满了现代时尚的气息。

以龙凤纹为例，设计师将中华传统文化中龙的蜿蜒形态和凤的优雅姿态简化为流畅的线条，淡化繁琐的细节，保留其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再将这些线条进行变形和重组，使其以一种全新的、富有现代感的方式呈现在服装上。

将传统图案与现代元素相结合，是新中式服装纹样设计的又一创新方向，它为传统图案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使服装在古典韵味与现代感之间达到了完美的平衡。中国传统刺绣纹样富有多层面的意义，象征着人们对美好的向往。但传统刺绣太过繁琐，并不适用于现代市场，于是便有人开发出类似刺绣图案的经纱与纬线交错纵横形成的独特风格的图案，营造出强烈的视觉效果，增加了衣服在视觉中的立体感。这种融合使得新中式服装在时尚界独树一帜，也让中国时尚充满多样性。^[5]例如传统刺绣与镭射元素的结合，是一种极具创意的尝试，传统刺绣工艺历史悠久，针法细腻，能够呈现出精美的图案和丰富的质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镭射元素则代表着现代科技和时尚潮流，具有强烈的未来感和视觉冲击力。

4、新中式服装设计的风格分类

4.1 雅致简约型

雅致简约型新中式服装在时尚的舞台上独树一帜。它以简洁流畅的线条为基石，勾勒出服装的基本轮廓，摒

弃了繁琐的装饰,让一切回归本真。就像一件简约的新中式衬衫,直筒的版型,流畅的肩部线条,没有过多的褶皱和拼接,仅在领口处用一颗精致的盘扣作为点缀,恰到好处地展现出中式服装的独特韵味,又不失现代的简约风格。

在面料的选择上,这类风格的服装钟情于天然材质。棉麻面料,质朴而自然,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吸湿性,穿着起来舒适自在。用棉麻制成的新中式连衣裙,宽松的裙摆随风轻轻摆动,带来丝丝凉意,让穿着者在享受舒适的同时,散发出一种随性、自然的气质。丝绸面料则以其光滑细腻的质感和柔和的光泽,为服装增添了一份高贵与典雅。

传统元素在雅致简约型新中式服装中的运用,可谓“点睛之笔”,精准地传达出中式文化的精髓。比如,在服装的袖口、领口或下摆处,用细腻的丝线绣上简单的云纹或回形纹,这些小巧而精致的传统图案,为整体简约的造型增添了一抹独特的文化韵味。又或是在腰部系上一条带有传统编织工艺的腰带,编织的花纹精致而细腻,不仅起到了收腰装饰的作用,更将传统工艺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让穿着者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

4.2 轻奢复古型

轻奢复古型新中式服装,犹如一幅精美的古典画卷,将传统与现代的魅力完美融合,散发出一种高贵典雅、复古迷人的气息。

高品质的面料是轻奢复古型新中式服装的重要基石。丝绸,素有“纤维皇后”的美誉,其柔软顺滑的质感、绚丽夺目的光泽,为服装赋予了无与伦比的高贵气质。羊绒,以其保暖性强、手感柔软、质地轻盈等特点,成为了打造轻奢感的理想面料。缎面,光滑平整,具有强烈的光泽感,穿上缎面材质的新中式服装,在灯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尽显高贵华丽。

华丽的传统图案与精湛的工艺,是这类风格服装的灵魂所在。龙凤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图案之一,象征着尊贵吉祥和权威。在轻奢复古型新中式服装上,龙凤纹常常以刺绣提花等工艺呈现,其造型精美,栩栩如生。一件黑色的缎面新中式礼服,用金线刺绣出龙凤呈祥的图案,龙凤的身姿矫健,羽毛细腻,在黑色缎面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华丽夺目。牡丹纹,寓意着富贵、繁荣,也是这类服装中常见的图案。用提花工艺将牡丹纹呈现在丝绸面料上,花朵娇艳欲滴,层次丰富,仿佛将整个春天的繁华都穿在了身上。精湛的刺绣工艺更是为这些传统图案锦上添花,苏绣的细腻、湘绣的豪放、蜀绣的明快,各种刺绣针法交织运用,使图案更加生动立体,富有质感,每一针每一线都蕴含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展现出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

4.3 前卫实验型

前卫实验型新中式服装,是时尚领域中一场充满激情与创新的冒险,它如同一位无畏的先锋战士,勇敢地突破传统审美边界,以独特的视角和大胆的设计,为新中式服装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与灵魂。

前卫实验型新中式服装的核心设计理念是对传统元素进行大胆解重组。现如今设计师们不再满足于传统元素以往常规的呈现方式,而是运用解构主义的手法,将传统的服装结构、图案、色彩等元素进行拆解、分割,然后再以一种全新的、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组合在一起。在图案的运用上,可能会将传统的图案进行抽象化处理,将其拆解成线条状和大色块,然后再重新组合搭配,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富有现代感的图案形式,让人眼前一亮,仿佛进入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艺术花园。

新型材料的运用也是这类风格服装的一大亮点。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各种新型材料层出不穷,为前卫的实验型新中式服装的设计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金属材质,以其坚硬的质感、冷峻的光泽和独树一帜的造型,为服装增添了一份未来科技感。将金属片、金属丝等运用在服装中或者制作成服装的配饰,如金属项链、金属手镯等,与传统的中式元素相结合,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展现独特的时尚魅力。透明材质,如PVC、亚克力等,具有透明轻盈的特点,营造出一种朦胧、梦幻的感觉。环保再生材料,如再生纤维、可降解材料等,用再生纤维制作的服装,既具有良好的质感和舒适度,又体现了设计师对环保理念的追求和践行,展现出一种时尚与环保并存的新潮流。

先锋设计理念在这类服装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不对称设计,打破了传统服装的对称美学,以不规则的线条和形状,展现出一种独特的个性和时尚感。一件不对称的新中式上衣,一边的领口高,一边的领口低,或者一边的袖子长,一边的袖子短,再搭配上一条不规则的半身裙,让穿着者在行走间展现出一种自由、洒脱的气质。夸张的廓形设计,通过放大或缩小服装的某些部位,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视觉效果,展现出设计师的大胆创意和独特视角。一件夸张的新中式外套,肩部垫肩设计,使肩部看起来更加宽阔,营造出一种强大的气场;或者裙摆设计得非常宽大,像一朵盛开的花朵,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童话世界。

前卫实验型新中式服装常常在时尚秀场或艺术活动中大放异彩，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在时尚秀场上，模特们身着这些充满创意和个性的服装，迈着自信的步伐，展示着前卫实验型新中式服装的独特魅力。它们独特的设计、大胆的色彩搭配和新颖的材质运用，吸引了众多时尚媒体和观众的目光，成为时尚界热议的话题。它们的存在，不仅为艺术活动增添了一份时尚与活力，也让人们对新中式服装的创新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让传统与现代在时尚的舞台上碰撞出更加绚烂的火花。

5、结语

展望未来，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不断升温以及对时尚品质的追求日益提高，新中式服装有望在全球时尚舞台上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新中式服装不仅会在国内市场赢得更广泛的认可和喜爱，更会跨越国界，在国际时尚领域绽放独特光彩，让世界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现代时尚的完美融合，设计师们将持续挖掘传统文化内涵，使新中式服装在保持文化底蕴的同时，更加多元化、个性化、国际化，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推动中国时尚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书写属于中国时尚的辉煌篇章。

参考文献：

- [1] 关赫.浅谈新中式服装的传承与创新[J].辽宁丝绸,2025,(01):65+67.
- [2] 孟良.浅谈新中式服装的创新思维和设计方法[J].服装设计师,2022,(Z1):94-98.
- [3] 耿萧童.中国传统纹样在新中式服装中的应用[J].西部皮革,2024,46(09):87-89.DOI:10.20143/j.1671-1602.2024.09.087.
- [4] 王沛尧,梁惠娥,贾蕾蕾.基于自然线性的新中式服装设计[J].时尚设计与工程,2024,(04):38-40.
- [5] 顾远渊.中国服装设计主体性构建的实践探索——以新时代中式正装话语体系构建为起点[J].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05):16-23.

New Chinese-style clothing: The fus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Jiang Yixin, Fang Tingyu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new Chinese-style cloth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interweaving and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innovations in new Chinese-style clothing. Clarify the design core of new Chinese-style clothing, and through steps such a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structural innovation and functional adaptation, extract traditional core elements to conform to modern life aesthetics. From the aspects of pattern, color and design, clarify the design features that distinguish it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style clothing. The key to analyzing the design of new Chinese-style clothing lies in the patterns and designs. It is necessary to not only improve traditional designs but also combine them with modern elements, taking into account both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is study, through the review of the design system of new Chinese-style clothing, highlights its significant value in both traditional fashion and modern innovative fashion,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future trends of new Chinese-style clothing.

Keywords: new Chinese-style clothing; innovative design; cultural inheritance

多维审美：张大千传记纪录片美育价值研究

陈矿

(成都大学 中国-东盟艺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被誉为 20 世纪中国画坛一代巨匠的张大千，其对传统绘画的守正创新的创作坚持、与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以及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魅力使他成为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同样也成为众多传记纪录片的优秀素材来源。“张大千”题材纪录片通过影像化的方式全面地记录了大师富有传奇色彩的艺术人生，完成了大千美学精神的构建。基于此，本文将从张大千的艺术创作的意境美、艺术人生的自由美以及艺术魅力的世界美的多维审美层次来探赜张大千传记纪录片的美育价值。

关键词：张大千；传记纪录片；多维审美；美育价值

基金项目：四川青少年美育研究中心 2023 年度项目“美育视角下张大千传记形象建构与跨媒介叙事研究”（项目编号：SCQM2023—A03）阶段性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28

影视艺术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中广泛应用的传播媒介和表达形式，对于历史事件、文化名人事迹以及美育思想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传记纪录片作为影视艺术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影像和声音等元素，记录和展现了某个真实人物或事件的不同方面和角度。与其他类型的纪录片相比，传记纪录片更注重对人物的深度挖掘和情感表达，同时更强调对历史事件和社会背景的呈现与反思。

文化名人在传记纪录片中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通常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和公众关注度，他们的生平事迹、成长经历、思想和价值观等往往成为创作者进行传记纪录片创作的灵感来源。同时，文化名人的社会影响力也为传记纪录片的传播和推广提供了便利和优势。因此，传记纪录片往往成为美育思想的重要载体，对于美育思想的传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张大千作为名扬海外的文化名人，张大千艺术人生事迹是传记纪录片创作的最好的来源，通过影像、声音、文字等元素的有机融合，能有效将张大千传奇艺术人生中所蕴含的美育思想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现给观众，从而增强了它们的影响力和艺术感。关于张大千的传记纪录片最早可以溯源至上世纪 70 年代的《张大千的画》(1969)，且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摄影奖；而大陆的第一部张大千传记纪录片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国画大师张大千》(1983)，这两部纪录片均为专题片，皆以张大千为唯一的讲述对象。进入新世纪，张大千传记纪录片均以系列片为主，百集文化系列纪录片《大师》(2006)、《台北故宫》(2009)、《大千一梦》(2011)、《百年巨匠》(2012)以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美术里的中国》(2022)，该片通过 3D 技术生动展现全国各大美术馆的馆藏经典作品，其中讲述了张大千的青绿山水扛鼎之作《华山云海图》。这些系列片通过故事情节和画面语言使张大千美育思想得以在影像中呈现和传达，展示张大千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显示出张大千的人格魅力和艺术追求。此外，还通过呈现张大千的艺术成就和社会贡献，激发人们对于艺术和社会的热爱和向往，从而受到一定的启发和影响。

在美育思想的传播方面，传记纪录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影视艺术的一种形式，传记纪录片通过记录历史事件、文化名人事迹等内容，成为美育思想的重要载体。张大千的艺术生涯中蕴含着丰富的美育思想，在跌宕起伏的艺术人生中完成了大千美学精神的构建，传记纪录片通过影像讲述张大千的艺术创作实践过程，展示其作为艺术大师的独特艺术魅力和卓越成就，进而还原其璀璨的艺术人生。因此，以张大千为对象的传记纪录片美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深入研究张大千的艺术人生，可以挖掘出其中蕴含的美育精神，丰富文化艺术领域的理论体系。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艺术教育的质量和水平，还为艺术家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此

作者简介：陈矿(1980—)，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戏剧影视文学、比较文学与艺术美学。

通讯作者：陈矿

外,研究张大千传记纪录片还可以为传记纪录片的创作与制作提供参考,进一步推动传记纪录片在美育思想传播方面的发展。

一、守正创新:张大千艺术创作的意境之美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守正创新、开拓创新,大胆探索自己未来发展之路”,并着重强调守正创新,更要创文化之新。在庆祝党成立百年大会讲话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复提出“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来概括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重要经验,并将把守正创新从工作方法上升为方法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一直以来都在历代艺术家的传承与发展中绽放着独特的魅力,而其中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张大千,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创新技法,以及其对传统绘画的执着,为中国绘画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艺术创作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坚持,也展示了他在艺术道路上的探索与创新。

(一) 深耕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纪实性表达

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提出“物质现实复原论”,他认为“纪录片是照相的外延,它与我们周围的现实有亲近性,传统艺术是“从上到基础”从思想意念来反映物质现实材料,而纪录片是“从下到上”,从物质现实来反映思想意念。”

纪录片与现实具有亲近性指的是纪录片具有纪实性的特征,纪录片要求其内容具有真实性,而不是虚构的。而传记纪录片其主要素材来源于存在于历史上文化名人或者具有一定重大贡献的人,张大千作为近代以来享有盛誉的国画大师是非常不错的素材来源。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格和技法体系,这一体系注重的是以传统文化和哲学为基础,强调艺术家对自然的观察和领悟。张大千深深扎根于这一传统,坚持以中国传统绘画为基础,将古人的智慧与当代视觉表达融合在一起,他深入研究传统绘画的技法和精神,以此为根基进行自己的创作探索。2012年由中央电视台隆重推出的《百年巨匠》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大规模、全方位拍摄制作的关于近代艺术大师、画坛巨匠的大型人物传记系列纪录片,也是首次用独特的影视镜头语言对20世纪中国画坛上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巨匠进行的全方位的影像解读和人物诠释。其中关于张大千的片集一共有三集,分别是《南张北溥》《乱世面壁》《东张西毕》,在前面两集之中着重讲到了张大千艺术创作始终坚守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精髓,他最早接触绘画时,主要是临摹石涛、八大山人等大家的画作,并且能达到惟妙惟肖的地步,而使它得到质的改变的时候便是其于战乱中前往敦煌面壁临摹三年之后,这也使得他承袭了明清时期的传统绘画风格,同时又汲取了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的绘画特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张大千的作品中,无论是山水、花鸟,还是人物,都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魅力,他运用熟练的笔墨技巧,将中国传统的文人画与现代绘画元素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既具有古典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的独特画风。《百年巨匠》从下到上,在纪录片纪实性特性的加持之下,通过影像的呈现了张大千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坚守,也用视听语言反映了张大千最早的美育思想“师古”,用动人心弦、精彩纷呈的人物故事,再现了一代艺术大师真实生动、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

(二) 立足于艺术创新的思想性营造

马塞尔·马尔丹曾强调:“纪录片创作中的核心并不是将思想转化为视觉元素,而是通过视觉元素引导观众进行深入思考。”传记纪录片不仅是对历史资料的简单呈现和堆砌,更是摄影师和剪辑师在创作过程中,将独立的思维和艺术情感融入其中,使得作品在客观记录的同时,也具有了较高的审美和艺术价值,从而引发观众的深入思考。

在创作传记纪录片的过程中,通常会遇到一个棘手的困境:如何巧妙地平衡内容的生动性和思想的深度。如果内容过于单调乏味,可能会导致观众无法真正理解并领悟到纪录片所传达的思想;然而,如果思想过于深奥复杂,又可能使内容显得虚假、空洞。这种困境往往源于传记类纪录片的题材本身,因为这类纪录片往往需要处理大量复杂的个人和历史信息。为此,创作者需要在创作过程中积极融入大量的思考与艺术情感。需从各种可能的来源和角度去获取材料,并巧妙地将它们整合在一起,以构建出丰富而生动的叙事。同时,他们还需要对这些材料进行深入的解读和思考,以挖掘出其背后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百集文化系列片《大师》(2006)是上海文广传媒集团真实频道以栏目形式打造的一个电视文化工程,该片里用画面语言讲述张大千的艺术创作经历了从师古到师法自然,再到以心为师的转变。他在学习古人绘画技巧的同时,也注重从自然中汲取灵感,认为艺术家应该深入大自然,感受自然之美,其代表作为《华山云海图》《千里江山图》等。然而,张大千并未止步于对自然的简单模仿,慢慢地摸索出“以心为师”,强调艺术家应当以心为师,将内心的感受与对自然的观察相结合,独创出泼彩泼墨的技法,将中国传统的水墨画与西方现代绘画元素相融合,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种创新技法的运用,使得他的作品在表现形式和视觉效果上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泼彩泼墨技法注重对色彩和墨色的自由运用,通过水与色的交融,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视觉效果,张大千巧妙地将这种技法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使得画面更加丰富多变。他运用色彩的对比和变化,营造出或明快、或浓烈、或淡雅的色彩效果,展现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绚丽多彩。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之中张大千完成了从师古到师自然再到以心为师的转变,也是张大千美育思想形成过程的演变。不难发现,张大千的对于艺术创新的坚持,也是纪录片思想性营造的一个切入点,不仅能提升纪录片的思想层次,还能给予观众一定的思想启迪。

二、山重水复:张大千艺术人生的自由之美

纪录片求真,不仅内容的叙事要真实,对于人物的塑造也要真实。传记纪录片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真实性,它能够真实、完整地展现人物的故事,人物的形象,更能够表达出想要传达的东西。真实是一种手段,对于纪录片创作来说,传播社会价值或者个人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拍摄人物传记纪录片时,不仅要注重真实性画面的摄取,更要注重故事的节奏感和张弛有度的叙事方式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通过合理的情节安排和剪辑技巧,让观众更加容易进入故事情境,从而传递出内容翔实的故事和价值内涵。通过影像风格的创新与运用,能更好地呈现出人物的形象,从而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

张大千是中国现代艺术界的泰斗,是一位有着世界影响力的画家。他的一生经历了土匪时期、出家为僧、民间画家、职业画家、流浪海外等多个阶段,这些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艺术创作和人物形象塑造更具特色。在影视创作中,对于张大千的人生经历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需要更加注重合理编排和精细塑造。深入挖掘他在不同阶段的人生历程,能更好地表现其对艺术的追求,还能够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他内心的自由和追求艺术理想的执着精神。

(一) 叙事呈现:故事化叙事下的情感表达

1969年苏联形式主义作家托多罗夫正式提出“故事化”叙事的理论,最初是为了发现或描写结构将叙事现象分解成组件。一般从叙事焦点、矛盾冲突、格式化效果、细节描述等方面来分析这个节目的故事化故事是文艺作品中用来表现主题的情节,它具备连贯性,富有吸引力,能够感染人。纪录片故事化的概念,强调的是“化”,指的是一种创作发展倾向,一种动态,一种丰富纪录片表现形式和加强纪录片感染力的创作手段,其前提必须是客观真实,而非虚构和臆造。传记纪录片以真实感为基础,为了提高观赏性,常采用故事化叙事手法来提升人物传记纪录片的内涵与情感,在张大千题材的纪录片中,均采用了“故事化”叙事手法。通过故事化建构的方式,将人物、环境、情节等元素融合在一起,实现了对时空的灵活变换,使情节更有条理,线索更加紧凑、脉络更加清楚。同时,故事化叙事手法可以让纪录片更具吸引力,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从而更好地理解故事,产生共鸣。

在张大千题材的纪录片中,将“故事化”叙事手法运用得淋漓尽致。1983年大陆第一部张大千题材的纪录片《国画大师张大千》由当时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其就是按照“故事化”的叙事手法进行影像表达,讲述大千先生自幼随母学画,12岁时他的一些山水、花鸟、人物作品,曾受到过行家的赞许。青年时代的张大千在临摹古代名画下过苦功,他是我国第一个到敦煌莫高窟临摹的专业画家,他为了对敦煌的壁画进行系统的观察研究,以顽强的毅力在那里工作了达3年之久。从而积淀了他深厚的绘画功底,也决定了他一生的艺术道路。大千先生作画,时而浓墨重彩、中西融合,时而轻描淡抹、承古通今,画风诗韵,独树一帜。《大千一梦》(2011)共2集。第一集主要讲述1919年,上海松江的禅定寺,有一个年轻人急匆匆地遁入空门,禅定寺住持很喜欢这个半路出家颇具慧根的青年,亲自为他取法号为“大千”。大千世界是佛教的宇宙观,横亘时空包罗万象,气魄之大难以言表,年轻人却坦然承受,他自称姓张,从此人间有了张大千这个名号。第2集主要讲述2011年首都博物馆将迎来《大千世界》书画展,主要讲述有关张大千的亲戚与成就,和他作画的方法,也呈现了张大千的画学历程、画风嬗变以及他的艺术人生和艺术魅力。“故事化”的叙事表达得以让枯燥乏味的张大千传记文本变得具有趣味性,也能张大千艺术人生中细节情感流露展示出来,有效地增强纪录片“故事”的感染力,使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二) 形象构建:凸显多样化下的人物塑造

著名传播学家卡尔·霍夫兰曾提出“两面提示”的理论,具体是指在宣传和展示自己一方的观点或有利证据的同时,也应该以某种方式呈现对立一方的观点或对自己不利的证据。这种理论在很多领域都有所应用,借用至影视制作中主要用于塑造多样化的人物形象。在影视制作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多样化的角色可以更好地吸引观众,同时也可以让故事更加真实和可信。通过将一个角色塑造成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性格特征,同时展现出一些矛盾和复杂性,可以更好地呈现出人物的多样性和立体感。

张大千的人生轨迹具有传奇色彩,人生经历非常丰富,纪录片在塑造其人物形象需进行深度的思考。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摄影奖的《张大千的画》(1969)、《大千一梦》(2011)、《百年巨匠》(2012)等纪录片都对张大千人物的刻画进行了详尽的处理。《大千一梦》(2011)第一集着重讲述在张大千成为一代艺术大师之前,经历百日土匪时期,这段经历并没有阻止他对艺术之美的追求,突出张大千的勇于冒险和不受拘束的特质,同样这也使得他的人生观和艺术观,不仅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还受到了他流浪生活的磨砺,这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自由与奔放的气息,不拘一格而又独具匠心。《百年巨匠》(2012)第一集《南张北溟》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张大千出家为僧的描述。在日本学习纺织技术的张大千因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去世回家奔丧使他看破世俗,而转向遁入空门,法号为大千,但在临近剃度时,他转身逃出寺庙,表明了他对自由的追求,也塑造其崇尚自由的人物特征。第二集《乱世面壁》中因抗日战争爆发,张大千被日本特务挟持在北京颐和园,要求其交出其手中收藏的名画,并且想让张大千为日本效忠。但张大千不屈于日本的引诱,通过其聪明才智将日本特务忽悠得团团转,最后经多地转转隐居青城山,此处凸显出张大千的睿智机敏及爱国的人物形象。第三集《东张西毕》中张大千通过对敦煌艺术的研究和吸收,不断吸收西方绘画的技巧和理念,同时也将自己的东方哲学思想融入作品中,将传统与创新完美融合,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泼墨泼彩的技法。他始终保持着内心的自由与超然,不被任何功名利禄所束缚,他的作品透露着对自然、宇宙和人生的深刻思考,展现了他对美的追求创新与独立的个性。

张大千艺术人生的自由之美体现在他不拘一格的人生轨迹中。他的土匪经历、和尚身份、民间画家时期、职业画家阶段、流浪海外经历以及最后的归家,都显示了他对自由与独立的追求。同时,他通过吸收东西方绘画技巧和哲学思想,创造出了自己独有的艺术风格,展现了他追求自由之美的内在力量。

三、美美与共:张大千艺术魅力的世界之美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媒介和数字化技术也正在不断创新。在这一背景下,“元媒介”理论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并得到深入研究。“元媒介”指的是“媒介的媒介”,即指代在技术手段更新下新兴的信息传播平台。张大千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探索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作为一名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艺术家,张大千通过绘画作品将巴蜀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进行了有机结合,以画为介开辟了通向世界的艺术之路。

纪录片作为一种媒介,在传播张大千的艺术之美与美育思想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纪录片通过影像的记录和叙述,将各种艺术形式和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纪录片都能够用镜头捕捉到艺术最细微的细节和最真实的情感,让观众深入了解和感受艺术的魅力和内涵,也能传递蕴含在其作品之中的美育价值。在《百年巨匠》第三集《东张西毕》之中张大千通过绘画作品作为媒介,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通过绘画表达出来,并受到海内外的各艺术家的赞誉。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现代艺术的创始人,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毕加索,被称为是当代西方最有创造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艺术家,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天才之一。因应法国卢浮宫的参展邀请,张大千来到法国,在法国南部与毕加索见面,两人相谈甚欢,并且互相交换了作品,也正是这次的会面使得张大千在国际上的盛誉已经达到了顶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明确提出,“希望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能够带着感情和力量,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并鼓励创作出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因此,如何以深邃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自信的态度来创作出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中国价值观念的作品,以及如何用心、用力、用情地选取艺术形象来表现中国变革和中国精神。张大千通过绘画作品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和意象进行了抽象和再现,使其得以传承和发展,与此同时,为其艺术创作提供了灵感和丰富性,传递了一种超越性的境界和张力。张大千的艺术作品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这与他与世界文化的研究和融会贯通密不可分,张大千广泛吸收西方艺术、文化和哲学的精髓,并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使艺术作品具有普适性和跨越性的价值。张大千艺术作品的魅力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离不开他对巴蜀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媒介的巧妙运用,进一步推动艺术事业的繁荣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四、结语

美育作为一种教育方式,能够培养个体的审美能力和情感体验,提升个体对美的感知和理解。张大千的美育精神在艺术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他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传递着美育的理念,不仅能够陶冶情操、启迪智慧,还能够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的艺术创作中的意境展示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魅力,也展现了他个人的才情和气质,传递着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的艺术作品不仅表现了大自然的秀美和壮丽,也展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他的艺术魅力能够启发人们对美的思考和探索,对巴蜀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深入研究和理解,

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考框架，可以激发人们对文化、艺术和世界的思考，提升个体的文化素养和人文情怀。

张大千的美育精神不仅在艺术创作中得到了体现，也在他的生活中得到了体现。他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向人们展示了美育的实践意义。他的艺术创作和生活实践相互辉映，充分体现了美育作为一种教育方式的巨大价值。

参考文献:

- [1] 高卫红.镜头话语中的诗意与灵动——评纪录片《百年巨匠张大千》[J].当代电视,2013,(12):82-83.
- [2] 王滢.水墨淡彩见君心——张大千的艺术人生及美育启示[J].美术教育研究, 2013(20):2.
- [3] 许蕊.浅谈人物纪录片纪实性与故事性的平衡与协同[J].新闻研究导刊, 2019(4):2.
- [4] 李勇.平淡化电影叙事与超越性诗学人生——基于媒介视角理解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0-05].
- [5] 周珍南, 杨洁, 范娟, 等.人物传记纪录片影像创作研究——以自拍电视纪录片《炮兵元帅朱瑞》为例[J].科技资讯,2021,19(21):3.
- [6] 王瑞昌.基于张大千艺术资源的美育探索[J].收藏家, 2023(04):44-49.
- [7] 谭宇婷.论人物传记纪录片对国际友人形象的审美书写[J].中国电视, 2022(03):95-99.
- [8] 杜卫.美育三义[J].文艺研究, 2016(11):9-21.

Multidimensional Aesthetics: A Study on the Value of Zhang Daqian's Biographical Documentary in Aesthetic Education

Chen Kuang

(College of Chinese& ASEAN Arts,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Abstract: Zhang Daqian, acclaimed as a monumental master in 20th-century Chinese painting, has become a renowned global artistic figure due to his adherence to and innovation within traditional painting, his tumultuous life experiences, and the profound cultural depth of his artistic charm. These qualities also make him an excellent subject for numerous biographical documentaries. Through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 documentaries on "Zhang Daqian" comprehensively document the artist's legendary artistic journey, constructing the aesthetic spirit of Daqia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value of Zhang Daqian's biographical documentarie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the lyrical beauty of his artistic creations, the unrestrained beauty of his artistic life, and the universal beauty of his artistic influence.

Keywords: Zhang Daqian;Biographical Documentary;Multidimensional Aesthetics;Aesthetic Education Value

ATI 模型——解构艺术定义的工具

马傲¹

(1.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本文以皮埃尔·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为基础, 提出 ATI 模型 (Artist-Technician-Intelligent machine), 将艺术创作视为一个动态的社会生产过程, 而非个人灵感的产物。本文挑战传统艺术史, 认为经典化作品多是“智械系统”的输出, 而非艺术本质。真正艺术可能藏于边缘实践, 需重新认知。体现了对主流艺术体系的怀疑态度。

关键词:ATI 模型; 抵抗; 身份转换; 艺术本质; 标准化生产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26

一、区分“生产”

在历史上和各个流派的那些“作品”中, 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诞生于“生产”而非“创作”。皮埃尔·马舍雷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文学生产理论, 这个理论主张, 文学作品不应被视为作家的个人创造, 而应该看作是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是特定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体现。他认为, 文学作品的生产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社会历史过程, 涉及到多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和斗争。

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将文学批评界定为“文学生生产的科学”, 认为通常将作家视为创造者是一种误解, 故力图贬黜“创造”, 而以“生产”代替之。文学生产理论的核心观点是, 文学作品并不是作家天才般的灵感迸发, 不是作家意志的体现, 作家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 并不是绝对的主导地位。文学创作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神圣性的色彩, 作家如同所有工人一样, 是一个生产者, 作品则是他生产出来的结构。而生产的资料, 则是意识形态, 外加一点作者的理想意图与目的 (但往往在生产过程中会偏离作者的理想意图或目的)。

二、ATI 模型

“文学生产理论”作为一种具有启发性的理论, 可以将其视角代入到更广泛的艺术创作和作品的分析中。基于这一理论, 我们能够将艺术创作过程中作者的身份进行深入分解, 具体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艺术家 (Artist)、技术执行者 (Technician) 以及智械 (Intelligent machine)。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 一次完整的创作行为往往同时包含这三个阶段, 或者说这三种身份, 它们相互交织、相互作用, 形成一个动态的循环。更为关键的是, 这一过程不仅仅是一次性的, 而是不断以这三个阶段 (身份) 为一次周期, 持续循环下去, 推动创作不断深化和发展。接下来, 我们将详细阐述这三个阶段的各自特点及其之间的差异, 并探讨它们是如何在创作过程中相互转化、相互影响的。

艺术家 (Artist) 身份的诞生, 往往源于创作主体对现实世界产生某种批判性的抵抗意识。这一意识促使主体通过物质或非物质的创作方式, 以作品为载体对现实进行回应和超越。艺术家身份的确立不仅意味着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 也标志着艺术实践进入具有批判性和超越性的阶段。艺术创作因此不仅是技巧的展现, 更成为思想与精神的表达。

相比之下, 技术执行者 (Technician) 作为技术的操作主体, 虽然在操作层面可能与艺术家有相似之处, 但其核心区别在于缺乏对现实的高度实验性回应和深层次的批判思维。技术执行者的实践往往以完成具体任务为目标, 其行为更多体现出功能性和实用性, 而抵抗意识与超越性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消解和弱化。技术执行者可以视为艺术家身份演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其存在是动态的、过程化的, 往往并不具备明显的身份特征, 更多表现为一种技术实现的中介角色。

作者简介:马傲(1990—),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通讯作者:马傲

技术执行者的身份会进一步演化为智械 (Intelligent machine)。处于这一阶段的主体, 尽管仍然具备生物人的体质特性和社会人所形成的文化心智, 但其创作行为与实践结果却日益呈现出机械化和工业化的特征。这种主体的创作过程往往依赖于预设的经验与社会知识, 主动摒弃了抵抗意识与超越性追求, 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刻意回避这些具有人文精神的表现。其最终产物通常是标准化、可复制的, 更强调效率与产出, 而非思想与情感的表达。创作者三种身份的发展转化过程构成了 ATI 模型 (Artist-Technician-Intelligent machine) 的核心框架与基本构成单元。

一个完整的 ATI 模型并不仅仅是这三种身份的简单组合, 而是通过不断循环和演进形成的一种动态结构, 这种循环过程清晰地展现在图 1 所示的模型中。该模型描绘的是一种主体身份转变路径, 尽管每一次演变都毫无例外地遵循从艺术家到技术执行者再到智械的循环过程,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每一个新的循环阶段中, 艺术家 (Artist)、技术执行者 (Technician) 以及智械 (Intelligent machine) 不仅在外在表征上发生变化, 其内在属性、职能定位和互动关系也相较于前一阶段呈现出显著的差异与演进。这种差异既体现了技术、认知与社会环境的动态影响, 也反映出创作者在持续适应与创新中的身份深化与扩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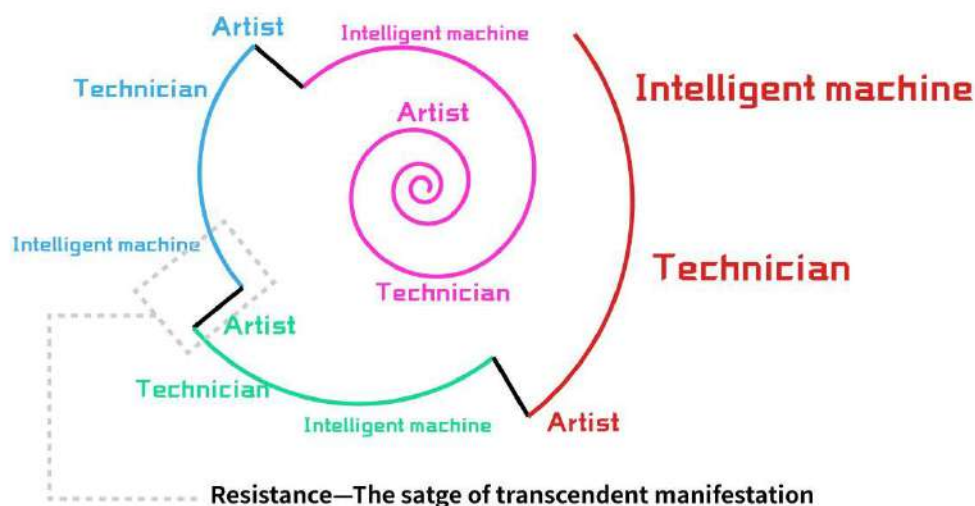


图 1.ATI 模型的阶段性发展

但更多时候, 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相对凝滞、封闭的 ATI 发展轨迹 (如图 2) 这种发展模式与理想中持续演进、不断迭代的路径不同, 其内部循环机制存在显著的局限性。创作主体从艺术家到智械的转变过程, 通常仅经历一次或少数几次的迭代循环, 缺乏持续性的反馈与深度演进。一旦达到某个技术或创作阶段, 系统便容易陷入停滞, 不再向前推进, 而是在已有的框架内不断重复机械化的运动模式, 缺乏创新与突破的动力。

从另一个角度出发, 我们可以将 ATI 模型从二维平面扩展到三维立体空间这样能够更加清晰且直观地展现出理想化与非理想化两种发展模式之间的显著差异 (如图 3 所示)。在三维视角下, 理想的 ATI 发展呈现出持续上升与向外扩张的态势。每当经历一次“抵抗”并成功突破之后, 其创作的目标导向与实践行为不仅会发生向上的跃迁, 还会在范围与深度上实现横向的扩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事物的发展往往“在否定之否定中, 以螺旋型上升”, 这一过程既包含对旧有状态的超越, 又体现出演进中的积累与升华。相比之下, 非理想化的 ATI 发展模式尽管同样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资源、物质条件以及人类的劳动付出, 其产出却主要局限于表层的行为调整与符号形式上的重复或堆砌。尽管在操作方式和表现形式上可能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增加或多样化, 但在根本的意识层面和认知结构的维度上, 并未发生实质性的突破与上升, 缺乏真正的质变和思想层面的升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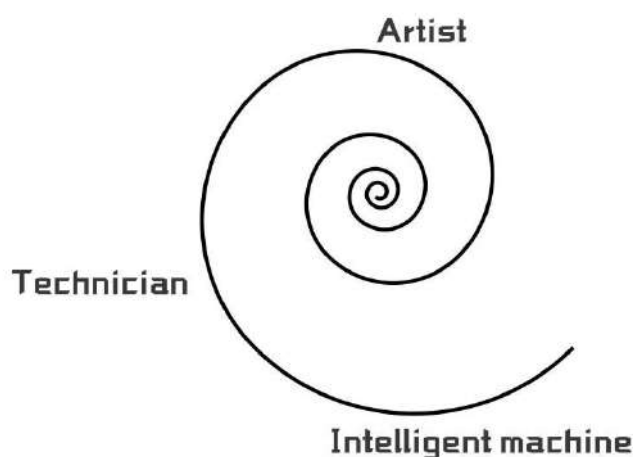


图 2.消极的 ATI 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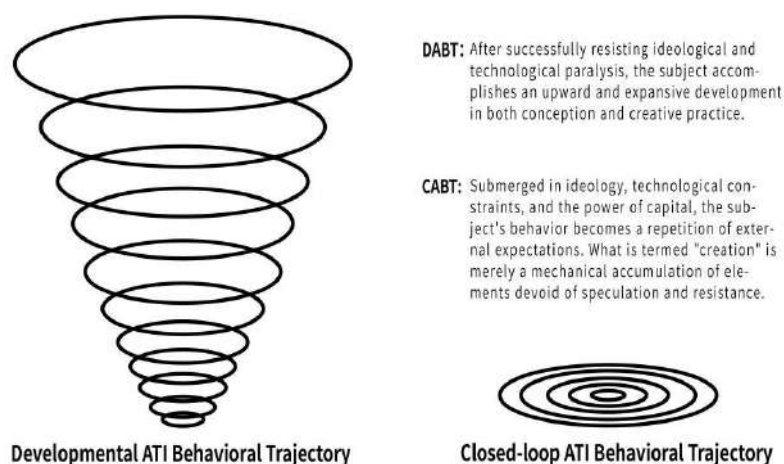


图 3.三维视角下的 ATI 模型

三、艺术本质——抵抗与临时性

那么，艺术的本质究竟为何？本研究认为，艺术实质上是在 ATI 发展轨迹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具体处于上一阶段的“智械”向下一阶段的“艺术家”转变的过程中。这一阶段具有显著的主体动机与行为，即“抵抗”（Resistance）。

抵抗的对象既包括对既有符号意义、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的否定，也涵盖对自身所掌握技术与知识的背离。因此，“艺术家”同样是一个阶段性身份，仅存在于“抵抗”行为发生的时间段内。再次回到理想的 ATI 模型与非理想的 ATI 模型的对比层面。由于在理想的 ATI 模型中能够呈现出“抵抗”这一阶段，所以“艺术家”身份的判定具有可靠性，差异仅在于这种身份出现的频次和持续时长。然而，在非理想的 ATI 模型中，“抵抗”现象缺失，要么被主体所忽视，要么受到文化和社会的抑制。故而，“艺术家”的身份往往是虚幻的，其“创作”与“作品”均无法体现主体对象化能力，更不存在超越性。

尽管本文着重强调抵抗智械（Intelligent machine）的生产及其产品，但同时更注重从多维度认知与剖析智械的存在形式、表现特征以及内在目的。应当承认，所有投身创作的大多数时候皆可被视为“智械”，“智械”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发展阶段，一切以艺术创作和创新为目标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会迈向这一阶段。创作者的反抗往往率先发起，然而文化和社会结构必将裹挟着强大的知识与权力后来居上，对创作者形成覆盖之势（当然，很多时候这种覆盖是以“认可”之名而行之）。因此，“智械”已然成为当今大多数人的存在样态，他们往

往难以抵御“技术”所带来的强大诱惑，或者在无意识状态下被“智械”群体的集体意识所同化，最终选择沉溺于这种由技术与效率所主导的生活模式，不再谋求突破。在现实社会里，这一现象在“艺术界”体现得尤为明显。“艺术界”运用重复的话语构建重复性的结构性权力，并且反复审视重复性的作品，当各个阶段的重复均契合权力者的预期时，“作品”便获得了“艺术界”的认可。

更值得注意的是，“智械”从本质上说是反艺术的，它消解了艺术的自由与个性，却在现实中时常打着艺术的旗号行动，试图将创造性的表达纳入其标准化的框架之中。不过，在偶然的契机下，一些人仍能被真正的艺术所触动与唤醒，从而短暂地挣脱“智械”的束缚，重新寻回作为人的感知与创造力。同时“智械化”实际上是一种持续存在的内在危机，只要人类仍在进行任何形式的艺术创造活动，便无法彻底摆脱“技术”的影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不断主动抗拒“技术”对我们思维与创作方式的侵蚀，同时也要勇于一次又一次地否定并舍弃自己已经完成的作品。正是通过这样反复的自我推翻与重建，不断直面新的空白与未知，艺术才找到了其最为真实而持久的推动力。

四、反思艺术史

根据 ATI 模型的分析和对“智械”的深层剖析，我们发现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真正持久且纯粹的艺术家人身份，所谓“艺术家”从来不是一种恒定不变的存在，艺术家是否显现，关键在于“智械”状态的长久延续与暂时瓦解——换句话说，艺术的本质或许恰恰在于它是一种临时的事态，而“艺术家”也只是一种阶段性的、随时可能被技术结构重新吸纳的身份标签。任何给创作者赋予永恒性的“艺术家”身份的行为都有其盲点与欺骗性。

从辩证的视角来看，艺术家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被命名，恰是因为主体在某个阶段成功突破了“智械”的控制系统，以某种方式暂时摆脱了技术理性的支配，从而让创造性的、不可重复的“艺术瞬间”得以显现。然而这种“显现”并不稳固，一旦艺术家开始系统化其语言、重复其风格、接受市场或意识形态的规训，他便可能再度沉沦为新的“智械”，进入新一轮技术化的循环。艺术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显现-沉沦-再显现”的动态过程。

由此反观我们通常对艺术的认知——尤其是艺术史所建构起来的那一套阐释系统——或许从根基上就出现了偏差。我们习惯于将那些已被经典化、风格稳定、能够代表某一时代或群体的审美产物当作“艺术”本身来理解，却忽略了这些恰恰是历史上或当代社会中“智械系统”所输出的标准化产品。它们被机制认可、被市场定价、被学术话语收编，成为了可被重复阐释与文化消费的对象。而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那些未能进入机制视野、未被系统识别为“艺术”的表达与实践——那些零星的、野生的、无法被归类或定价的创造尝试——可能恰恰更接近艺术的本质。它们大量散落在艺术史书写与市场交易体系的边缘，甚至被掩埋在社会所认定的“无意义、无价值”的符号废墟之中，静待某种新的认知方式将其重新照亮。

参考文献：

- [1] 皮埃尔·马舍雷. 文学创作理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2]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3] 皮埃尔·布尔迪厄. 艺术的法则: 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 [4] 瓦尔特·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8.
- [5] 约翰·克雷斯威尔. 研究设计: 定性、定量与混合方法路径[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

ATI Model: A Tool for Deconstructing the Definition of Art

Ma Ao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grounded in Pierre Macherey's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proposes the ATI model (Artist-Technician-Intelligent machine), reframing artistic creation as a dynamic social production process rather than a product of individual inspiration. Challenging conventional art history, it argues that canonized works are largely outputs of the "Intelligent machine system" rather than reflections of art's essence. True art, the study suggests, may reside in marginalized practices—requiring reevaluation—and this proposition underscores a skeptical stance toward dominant artistic institutions.

Keywords: ATI Model; Resistance; Intelligent Machine; Identity; Essence of Art.;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老年护理场景：适老化康复辅助服饰的功能优化与设计实践研究

赵一璇¹ 张松²

(1.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2.齐齐哈尔医学院, 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摘要:针对社会老年人日常护理中服饰功能适配性不足和老年人由于服饰的原因存在易跌倒的问题,本研究主要以老年护理学中“老年人体型变化、老年人跌倒预防、关节活动适配、照护操作便捷”核心需求为导向,聚焦服饰本体的材质选择、结构设计与功能集成,来研究兼具身体外形改变、防滑防护、动态适配、便捷护理特性的适老化康复辅助服饰。

关键词:老年护理; 适老化服饰; 功能设计; 跌倒防护; 服饰结构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64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逐渐严重,老年人的风险也随之加剧,老年人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人们注意,其中就包括老年人的服饰问题,张海燕等人的研究表明,60岁以上老年人在跌倒事件里,大部分与服饰相关——其中包括裤脚过长导致绊倒、面料过滑引发身体失衡和关节处紧绷限制活动等,同时,有超过85%的护理人员认为,“协助老年人穿脱衣服或结构复杂的服饰”是日常照护中的主要耗时环节,单次操作平均花费18分钟,明显占用其他护理工作时间。^[1]加上我们了解到中国老年服饰市场现状和老年服饰产品设计中存在的不足,而提出老年服饰设计应结合老年人体型特征,满足老年人对服饰多样化、个性化和功能化的诉求。^[2]

针对上述问题,目前也有很多研究人员设计了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服饰,但其大部分研究还停留在“保暖与宽松”的基础层面。如李瑞宁等设计的可穿戴传感器中指出,现有服饰与防护和监测功能的结合多为“外挂式”设计,其舒适度较差,同时这种服饰还易脱落,未能真正解决老年人的需求。对此,本研究聚焦服饰本身,通过服装的材质、结构、细节等方面,将护理需求与服饰相结合,解决传统服饰在老年护理场景中的适配性不足的问题。^[3]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构建“老年生理特征-护理场景需求-服饰功能设计”的关联框架,填补适老化服饰“功能与护理需求深度融合”的理论空白,为服饰设计学科在老年护理领域的应用提供“需求拆解-方案落地”的研究路径。

1.2.2 实践意义

从老年人角度来看,服饰的防滑与适配性设计可直接降低活动障碍和跌倒风险,更容易减少老年人害怕跌倒的恐惧心理;从护理人员角度出发,便捷的服装结构能减少照护操作时间,提升工作效率;从产业角度来讲,为适老化服饰生产提供可施行功能设计标准,推动老年服饰从“基础穿着”向“护理辅助”升级。

作者简介:赵一璇(2003—),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服装与服饰设计;

张松(2003—),女,学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护理学。

通讯作者:赵一璇

1.3 研究现状

目前,本研究还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第一,结构设计上单一,多数是直筒版型,没有考虑老年人躯体外形变化,比如膝关节内翻会造成活动受限的问题;第二,材质选择上更偏向柔软度,未考虑到防滑、耐磨等老年人更在意的需求,比如多数产品普遍采用光滑化纤面料,易造成行走时足部打滑,增加跌倒风险;第三,功能结合性低,防护与监测功能需要通过额外配件来实现,比如在腰间挂跌倒报警器,既容易脱落,又影响舒适度。在李瑞宁等相关研究人员提出“可穿戴技术需求与日常用品深度融合”的观点中可以得出结论:将防滑、适配、检测功能与服饰融合,而不是依赖外部配件,来实现“穿着即防护”的效果。^[3]

2 适老化康复辅助服饰设计需求拆解

2.1 老年人生理特征与服饰需求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不断退化,体型上出现腹部脂肪堆积导致的腰腹部突出下垂以及上臂变粗的特点。女性则呈现出胸部下垂导致脊椎变形出现圆背的现象。观察多数的老年人都比年轻时发福变胖,这样的体型变化使得老年人选购服装趋向于较合体和宽松型,诸如运动服、夹克等不束腰的版型服装,而偏紧身的服装则很少选购。这样一方面穿衣的舒适性增加了,另一方面也借此掩盖身体变化带来的体型不足。^[4]

2.2 护理场景与服饰需求

在老年人智能护理服装设计领域中,材料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老年人的皮肤较为脆弱敏感,亲肤性自然成为选材的首要标准。像棉料触感柔软蓬松,麻料透气质朴,丝料滑润细腻,这类材料质地温和、生物相容性佳,可快速吸收皮肤表面湿气,有效防范湿疹、痱子等皮肤问题。^[5]

清洁便利性:老年人服饰需每日清洗,需面料具备易洗快干、抗皱特性,减少护理人员清洁负担;

观察便捷性:护理人员需定期观察老年人皮肤状态(如压疮、红肿),需服饰关键部位(如臀部、肘部)具备可开合观察窗口,避免反复穿脱。

3 适老化康复辅助服饰设计方案

3.1 材质选型与功能化处理

3.1.1 主体面料

选用“棉质+氨纶”混纺面料(棉占85%、氨纶占15%),并对其进行功能化处理:采用微凸纹理涂层工艺打造防滑涂层;借助高科技手段在面料中添加一种特殊薄膜,该薄膜每平方寸约有90亿个不规则排列的小孔,由于空气中的水分子大于这些小孔,外界水分无法渗入,而人体汗气分子远小于薄膜孔隙,汗气可顺利排出,从而实现面料的保暖效果,同时提升穿着的舒适感;另外,还有一种抗菌防臭面料,通过在纤维中添加特殊物质,可抑制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真菌,保障服装的抗菌性能。^[6]

3.1.2 功能辅料

在老年人的臀部、肘部及膝关节等易磕伤部位放置8-15mm厚度的记忆棉垫,密度在64-96 kg/m³,这样的记忆棉垫可提供较强的支撑力与压力分散效果,能有效保护老年人的关节部位,降低跌倒时的受伤风险;在老年人鞋底贴合区域和裤脚内测设计波浪形防滑硅胶条,硅胶硬度调整在40-50度,不但能避免过硬影响舒适度,还能保证防滑效果适中;在老年人的肩部、腰部、裤脚处采用伸长率达15-30%高弹性织带,能够有效适配老年人身体外形差异,防止户外活动过程中出现服饰脱落等问题。

3.2 结构模块化设计

将服饰分为“基础穿着模块”“防滑防护模块”“便捷护理模块”三大可拆分模块,各模块通过隐形拉链与按扣连接,可根据场景需求单独拆卸或更换。

3.2.1 基础穿着模块

针对老年人独特的身体外形设计服装版型,如老年人常见的背部弯曲、腹部肥大等体态,采用“分区裁剪”的版型,在背部采用弧形剪裁,腹部预留 5cm 的空间,能够有效避免服饰过紧限制老年人的身体活动。同时在肩袖、膝盖等关节处针对性采用不同设计,肩袖采用“风琴褶”设计,展开后可增加 15cm 活动余量,适配肩关节抬举需求,膝关节处采用“菱形拼接”结构,面料拼接角度能达到 120°,这些独特的设计能有效避免传统老年人服饰的紧绷问题,使老年人的活动更加舒适,便捷。

3.2.2 防滑防护模块

裤脚内侧设计防滑硅胶条,对脚踝以及小腿实现全覆盖,行走时能通过增加裤脚与袜子的摩擦力的方式避免裤脚移位导致绊倒;臀部位置嵌入可拆卸记忆棉垫,棉垫边缘采用弧形设计,贴合臀部曲线,避免久坐时产生压痕,这种记忆棉垫能使老人在跌倒时有效减少臀部冲击力,使受伤的风险降低 30%。

3.2.3 便捷护理模块

上衣采用“前襟+侧缝”双拉链设计,前襟拉链从领口延伸至腰部,侧缝拉链从腋下延伸至下摆,护理人员可通过双拉链快速协助穿脱,较传统服饰穿脱时间缩短;在臀部、肘部等易发生压疮的部位设置隐形观察窗口,窗口采用魔术贴闭合,护理人员无需拆卸服饰即可观察皮肤状态,减少反复穿脱对老年人皮肤的摩擦;在拉链拉头、魔术贴位置设置荧光色或反光条标识,适配老年人视力下降问题,方便护理人员快速定位操作部位。

3.3 服装细节优化

在领口处采用 5cm 高的圆领设计,领口边缘采用包边工艺,避免摩擦颈部皮肤;同时在领口内侧设置隐藏式挂绳,方便服饰清洗后悬挂晾干,减少护理人员晾晒操作;在袖口、裤脚采用可调节魔术贴设计,调节范围为 3-5cm,可根据老年人手臂、腿部粗细适配,防止过松导致保暖性降低过紧影响血液循环;所有纽扣直径不小于 2.5cm,拉链拉头设置 1.5cm 宽的防滑握柄,适配老年人手指灵活性下降问题,方便老年人自主操作。

4 适老化康复辅助服饰性能测试

4.1 测试方案设计

4.1.1 样本选取

先后选取北京、上海、合肥、成都 4 个城市的 8 个社区,共 320 名 60-85 岁老年人(其中有跌倒史者 110 名,关节活动受限者 90 名),分为实验组(穿戴本研究设计服饰)与对照组(穿戴普通宽松老年服饰),每组 160 人,两组在年龄、性别、身体状况方面无明显差异。

4.1.2 测试指标与方法

测试防滑性能,通过模拟老年人行走场景,在光滑瓷砖地面行走 100 步,记录两组滑倒次数与失衡次数,计算防滑有效率;测试活动适配性,采用关节活动度测量仪,分别测量两组老年人穿戴服饰前后的肩关节、膝关节活动幅度,计算活动受限率;照护效率的测试,记录护理人员协助两组老年人穿脱服饰的时间、观察皮肤状态的时间,计算操作耗时缩短率;舒适度评分的测定,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1 分代表极不舒适,5 分代表极舒适),让老年人对服饰的面料、版型、活动便利性进行评分。

4.2 测试结果分析

4.2.1 防滑性能

在老年人 100 步行走实验测试中得出:滑倒次数为 3 次,失衡次数为 8 次,防滑有效率达 92.5%的结论;对照组滑倒次数为 21 次,失衡次数为 35 次,防滑有效率为 61.2%的结论。实验组防滑有效率较对照组提升 31.3 个百分点,结果表明防滑面料与硅胶条设计可有效降低滑倒风险。

4.2.2 活动适配性

穿戴服饰前, 两组老年人肩关节、膝关节活动幅度无显著差异 ($P>0.05$); 穿戴后, 实验组肩关节平均活动幅度为 135° (穿戴前为 120°), 膝关节平均活动幅度为 105° (穿戴前为 90°), 活动受限率为 12.3%; 对照组肩关节平均活动幅度为 122° (穿戴前为 120°), 膝关节平均活动幅度为 93° (穿戴前为 90°), 活动受限率为 41.0%。实验组活动受限率较对照组下降 28.7 个百分点, 验证了关节处结构设计的适配性。

4.2.3 照护效率

在实验组中, 护理人员协助穿脱服饰的平均时间为 8.2 分钟, 对照组为 11.7 分钟, 时间缩短 30.1%; 观察皮肤状态的平均时间为 2.1 分钟, 对照组为 5.3 分钟, 时间缩短 60.4%。结果表明这样的设计不仅方便了护理人员也方便了老年人。

4.2.4 舒适度评分

实验组中, 老年人对服饰的舒适度评分平均为 4.3 分, 其中面料舒适度为 4.5 分、版型适配性为 4.2 分、活动便利性为 4.4 分; 对照组舒适度评分平均为 3.1 分, 实验组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即在传统服饰的基础上增加上述功能后, 不但增加了安全性, 还增加了舒适度, 证明本研究设计的服饰完全能够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穿着需求。

4.3 测试结论

本研究设计的适老化康复辅助服饰, 在防滑功能、活动适配性、照护效率方面显著优于普通老年服饰, 且具备良好的穿着舒适度, 可有效解决老年护理场景中服饰功能适配性不足的问题, 实现“穿着即防护、服饰助护理”的设计目标。

5 讨论与展望

5.1 研究讨论

5.1.1 设计创新的核心价值

本研究的核心针对“将护理功能融入服饰载体”的设计理念, 通过对材质的优化处理, 实现了面料的防滑、抗菌与透气功能, 突破传统服饰只有单一功能的局限; 新型服饰的可拆卸防护设计模块能够完美适配不同的使用环境, 居家拆卸, 外出组装。同时还方便护理人员的更换和清洗, 还能延长服饰的使用寿命; 其简便的设计能满足老年人的独立操作, 减轻护理人员的工作负担, 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护理人员与老年人的“双向适配”的效果。

5.1.2 研究局限性

一是样本未涵盖农村地区老年人, 其体态特征与护理场景可能与城市社区存在差异, 后续需扩大样本范围; 二是服饰未考虑特殊老年群体 (如偏瘫患者) 的单侧活动需求, 需针对性优化结构设计。

5.2 未来展望

1. 功能拓展: 后续将在服饰肘部、腰部增加可调节支撑条, 为关节无力的老年人提供活动辅助, 进一步提升服饰的康复护理功能;

2. 智能升级: 在面料中嵌入柔性导电纤维, 实现基础生理数据 (如体温、心率) 的采集, 通过蓝牙与护理平台连接, 兼顾功能与舒适度;

3. 个性化定制: 基于大数据建立老年人身体形态数据库, 提供“一人一版”的个性化剪裁服务, 提升服饰的适配精度。

6 结论

本研究针对传统老年人服饰的功能单一, 舒适度较差等问题, 针对“将护理功能融入服饰载体”的设计理念,

创新型提出了适老化康复辅助服饰,通过材料选择、结构设计和细节处理三方面入手,建立符合老年人需求的康复辅助服饰体系。同时为老年护理场景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服饰解决办法,构建了“需求调研、设计方案、效果测试”的适老化服饰研发模式,为后续相关产品开发提供参考建议。最后,本研究能促进老年服饰由“基础穿着”向“护理辅助”功能的改变,提高老年人的幸福程度与生活质量,并减轻照护资源的压力,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 [1] 张海燕,于卫华,张利,等.社区老年人跌倒风险感知潜在剖面分析及影响因素研究[J].军事护理,2024,41(10):52-56.
- [2] 董珂,阎珺.中国老年服饰市场研究[J].山东纺织科技,2021,62(04):45-47.
- [3] 李瑞宁,许创业,张庆来.基于可穿戴传感器的老年人跌倒风险预测研究进展[J].传感器与微系统,2025,44(10):7-11+21.
- [4] 冯志民,李丽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老年服饰设计研究[J].丝网印刷,2025,(16):68-70.
- [5] 周帅帅.老年智能护理服装的设计研究[J].纺织报告,2025,44(06):64-66.
- [6] 程春.论服装面料的设计与发展趋势[J].大众文艺,2009,(24):145.

Elderly Nursing Scenario: Functional Optimisation and Design Practical Research on Ageing Rehabilitation Auxiliary Clothing

Zhao Yixuan¹Zhang Song²

(¹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² Qiqihar Medical University, Qiqihar, Heilongjiang)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lack of functional adaptation of clothing in the daily care of the elderly and the problem that the elderly are prone to falling due to clothing, this study is mainly guided by the core needs of "body shape changes of the elderly, fall prevention of the elderly, joint movement adaptation, and convenient care operation" in elderly nursing, focussing on clothing. The material selection, structural design and functional integration of the body are used to study the ageing-friendly rehabilitation auxiliary cloth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dy shape change, anti-slip protection, dynamic adaptation and convenient nursing. By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clothing market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design of clothing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design of clothing for the elderly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bod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elderly for the diversification, personalisation and functionalisation of clothing.

Keywords: elderly care; clothing suitable for ageing; functional design; fall protection; clothing structure

迷因化城市传播的媒介逻辑-以哈尔滨冬季旅游“热”为例

贾仕海¹

(1.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本文以网红城市哈尔滨的“出圈”现象为研究对象, 从媒介逻辑视角切入, 系统考察城市旅游发展的内在机制。文章指出, 数字影像实践构建了一种具有阈限特质的城市感知方式, 使游客在虚实交织的体验中形成对地方的全新理解; 而网络迷因的广泛传播则进一步推动了地方经验的符号化扩散, 激发广泛的社会参与。在此过程中, 人、城市与媒介深度互嵌, 共同构建出全感官、共同经验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此基础上, 本文回归“媒介即隐喻”的理论立场, 反思媒介可见性背后的双重效应: 社会化媒介在重塑城市地方感的同时, 也加剧了情感碎片化与现代性危机。因此, 文旅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不应仅依赖媒介化工具理性, 更应回归以人为中心的具身体验, 寻求地方与身体之间的动态平衡, 从而重建具有多元认同意义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 城市传播; 网络迷因; 阈限空间; 媒介霸权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66

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提出, “旅游凝视”是一种具有独特符号意义的生产与消费过程。在这一视角下, 旅游被视为对符号的收集行为, 游客通过书写游记与拍摄照片, 在时空维度上社会性地重构旅游地的形象。随后, 厄里与拉森在《游客的凝视》中进一步提出“媒介化凝视”的概念^[1], 指人们因受媒介内容吸引而离开日常空间, 前往因媒体传播而显著的地点进行体验的行为。^[2]基于旅游凝视的符号性特征, 游客摄影可被视为凝视行为的具体实践, 成为解读旅游地形象的重要方式。在全民自媒体时代, 人人皆可成为旅游内容的创作者, 通过摄影、直播等媒介化凝视行为, 为旅游地注入广泛的网络关注。短视频与直播打卡等形式凭借其高度可视性、参与感与娱乐性, 扮演着“传播节点”的角色, 塑造出沉浸式的视觉与参与体验, 使受众实现“虚拟在场”。例如, 在哈尔滨的相关传播中, 媒介的可视性成功复现了城市的生活气息, 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身体的物理缺席, 营造出全网用户共同参与的冰雪旅游盛况。因此, 哈尔滨的“出圈”可被视为一场由媒介化凝视所推动的“媒介朝圣”。在短视频等平台的助推下, 城市构建出独特的媒介景观, 重新唤起公众对这座冰雪之都的集体记忆与情感认同。

1 传播与城市的互构: 阈限空间造就数字影像实践

在当代城市文化研究中, “阈限”这一概念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源自阿诺德·范·热内普对过渡仪式的分析, 并由维克多·特纳进一步发展。特纳认为, 阈限阶段是个体脱离常规社会结构, 进入一种流动性和变革性的时期^[3]。这一理论为理解个体在城市空间中的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

城市空间被视为一种动态的文化生产场域, 这一观点受到亨利·列斐伏尔理论的深刻影响。列斐伏尔强调, 城市不仅是物理结构的集合, 更是文化意义和社会关系的交织。通过阈限空间的创造, 城市空间能够激发公众的参与和归属感, 促进文化传播的多样性。阈限空间在理论和实践中具有双重意义。宏观层面上, 它是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运作的场所; 微观层面上, 它关注个体在特定时空的体验, 挖掘城市空间的潜能^[4]。线下打卡和线上短视频的融合, 为城市阈限空间的生成提供了新的途径。线下打卡行为不仅是个人纪念, 也是社会仪式, 通过影像将个人体验嵌入城市符号中。而短视频平台则通过算法推荐和用户创作, 重塑了城市形象, 创造了一种新的城市记忆和认同感。

作者简介: 贾仕海(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艺术传播。

通讯作者: 贾仕海

阈限空间深刻描绘出城市文化空间形塑过程中蕴含的动态性与复杂性。挖掘城市阈限空间的理论价值在于确立基于文化实践的城市空间认识论。城市文化空间的阈限性,不仅体现在空间的形制与功能上,亦体现在它如何将人们作为文化建构主体理解和使用,最终成为城市精神的一部分。正如列斐伏尔所言,城市是市民们创造的作品总体,而非像一本已经被关闭的书本那样强加给他们的体系。

1.1 打卡行为与具身实践

线下打卡行为,尤其是在城市中的热门景点或标志性建筑前拍照留念,已成为当代旅游和城市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哈尔滨,中央大街和索菲亚教堂等地标性建筑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地点。游客们通过拍照和分享,将这些景点的符号意义与个人的旅游体验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方经验。这种行为不仅是一种个人的纪念方式,更是一种公共性的社会仪式。打卡行为基于个人兴趣、经历和情感,对某个地点进行选择 and 锚定,不是简单的途经,而是“逗留”在某一地点,并通过感官和媒介记录下“一瞬”的所见与感受。打卡实践强调民众对地点的有目的的价值诠释和意义强化,形成了有意义的地方经验。

民众对地方的了解以及地方感的建立,离不开地方经验的构建。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经济的视角》中指出,人们所认知的现实是基于经验构建的,由感受和思想创造^[5]。因此,地方经验是认知和创造地方的基础。强调地方经验的意义在于超越宏观设计,凸显人们“存在于世间”的真实生活图景。

地方经验通过日常实践构建,而不是习得的。梅洛-庞蒂指出,人们的意识是由身体的具身性与媒介互动形成的。这一观点强调了身体在空间实践中的重要性。德·塞托描述空间实践为对地点使用和驻留的复杂程序,通过加入目的和欲望,使地点适于居住。打卡实践作为空间实践的一种形式,基于日常漫游的发现和寻访活动,其目标是有意义的地点或场所^[6]。

在打卡过程中,游客暂时脱离了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角色和规范,进入一种自由和开放的状态。这种状态允许游客在城市空间中自由探索和试验新的身份和关系,重新审视和重构对城市的认知。通过打卡,游客不仅记录了个人体验,还通过社交媒体将这些体验广泛传播,进一步丰富了城市空间的符号意义。

1.2 短视频传播与虚实转化

抖音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通过其独特的算法推荐和广泛的用户基础,使得城市的各类场景得以快速传播。用户在抖音上分享的短视频,不仅记录了个人的城市体验,还通过音乐、滤镜、特效等手段,重塑了城市形象。这些短视频生成的阈限空间,既是私人空间的延伸,又是公共空间的再现。在观看这些视频时,用户仿佛进入了一个介于现实与虚拟之间的体验场域,重新构建了对城市的感知。

这些短视频不仅记录了城市的美景,更在不同角度和光影效果下,再现了游客对城市空间的主观感知。夜晚灯光下的城市景点在短视频中的呈现不仅是建筑美学的再现,更是游客对城市历史和文化的身体体验。通过这些视频,观众不仅看到了城市的外在美景,还感受到了游客在其中的身体移动和情感体验。这种身体的“再现”使得观众对城市的认知超越了单纯的视觉感知,形成了一种身临其境的阈限体验。

此外,在季节性景观如冬季冰雪覆盖的城市街道,成为短视频创作的热门场所。游客在冰天雪地中的行走和互动,被短视频记录下来,不仅展示了城市独特的季节性景观,更凸显了游客在寒冷环境中的身体反应和情感交流。这些视频通过不同的音乐和剪辑手法,将游客的身体表现与城市的季节特征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新的城市记忆和认同感。在这个过程中,观众通过视频中的身体表现和环境再现,对城市产生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情感连接。

抖音短视频平台通过生成阈限空间,体现了一种虚实结合的体验。在这个虚拟的阈限空间中,用户暂时脱离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角色和规范,进入一种自由和开放的状态。这种状态允许用户在数字空间中自由探索和试验新的身份和关系,重新审视和重构对城市的认知。

1.3 阈限空间与身份认同

在数字影像所构建的阈限空间中,青年群体通过打卡与短视频分享等实践,实现了在城市空间中的主体性重

塑。这一过程不仅是自我表达的方式，更是一种对城市空间的再认同行为。青年将自身的身体体验与城市的符号意义相结合，生成具有个人特质的城市记忆与认同感，从而既改变了城市形象的传播路径，也为城市空间内的社会互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维克多·特纳将阈限阶段视作一种“卑微与神圣、同质与同志的混合体”，认为在这一阶段中，世俗社会中的规则、妥协与控制被暂时悬置，形成一个称为“交融”（communitas）的“公共域”。该状态可被视为一种过渡、生成乃至转化的过程，区别于日常生活中的结构化区域，成为“时间内外”的片刻存在，或“结构内外”的临时状态。在此条件下，个体得以脱离原有社会角色的束缚，自由地探索新身份与新关系，进而重构其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通过数字影像的创作与传播，青年的主体性与身份认同不断被重新建构与强化。他们借助社交平台展示对城市的个性化解读，并通过他人的反馈进一步确认自我身份。这一过程不仅强化了个体认同，也参与了对城市文化与符号体系的再定义。与此同时，青年在数字实践中所形成的新认同感，也在不断反向塑造城市的公共形象。

阈限空间生成于现实与赛博世界的交织之中，通过身体的实地实践与网络的虚拟再现，构建出一种独特的数字地方意象。线下打卡通过具身经验锚定地方感，线上短视频则通过虚实融合的传播机制将其放大与重塑，使用户在虚拟空间中完成对城市认知与身份认同的双重转化。这一过程不仅丰富了城市文化的内涵，也为城市形象的传播与再现开辟了新路径。

2 迷因文化造势哈尔滨出圈

“迷因”这一概念由英国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指的是基因通过自我复制进行繁衍、进化。而在分析由于模仿而导致的大规模传播行为中，“迷因”被引入了传播学视域，进而成为理解个体模仿行为的重要概念，这种传播行为也被称为“迷因传播”。道金斯指出，传播范围广、影响大的迷因的基本要素，包括复制的准确性、快速性和形式的稳定性。基于迷因的基本要素和互联网的性质，迷因在互联网中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影响规模更大。迷因传播在互联网中的具体表现即为某一事件的“爆红”或“病毒式”传播。^[7]互联网文化“具有高自由度、交互性、低门槛等特征，为微观文化单位通过自我复制而实现发展、演进、变异、再创造提供了便利。”所以近年来，学者们多用迷因理论来分析互联网中“爆火”的事件，如网络“爆梗”等。如前所述，哈尔滨的突然出圈属于“爆火”事件是毫无疑问的，而用迷因理论观照“爆火”事件也是必要的思考角度。且传播的符号文来看也符合迷因理论基本的“复制”“变异”传播过程。基于此，爆红的“小土豆”“砂糖橘”可以看作是一种互联网迷因。

2.1 “小土豆”“砂糖橘”的模仿与复制

模仿与复制是网络迷因发展的第一阶段。在“小土豆”“砂糖橘”梗的发展过程中，小土豆与砂糖橘这个梗最早来自于一则关于广西南宁幼儿园中老师带领 11 名学生到哈尔滨旅游的视频而引起大家的关注与讨论，他们身穿黄色羽绒服同时外面套了橘色的马甲立刻被网友调侃为砂糖桔出门，当他们到哈尔滨以后圆鼓鼓与可爱的形象也受到来自东北 IP 的热烈讨论，黑龙江的网友就说了，看似是三个大人带着一群小朋友，实际上是全市的人都在看着这几个小砂糖桔，还有交通执法处专车送到酒店，这是全市最亮眼的小土豆^[8]。迷你小土豆等这样的词条也就初步展现，随后在创作过程中，社会热门现象的官方新闻媒体也不断通过议程设置与强调使得这两个名词得到持续性的关注。正是在这一阶段，该迷因通过网友的模仿而得到扩散，网民们加入其中，不断参与复制与修改，最终使“小土豆”“砂糖橘”的相关词条与热度保持活力。

2.2 “小土豆”“砂糖橘”的传播

“小土豆”“砂糖橘”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在社交媒体与官方的助推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扩散，其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首先，从信息从私域场所流动来说，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是“小土豆”“砂糖橘”传播的主要平台之一，微信作为社交网络中的强关系连接平台，微信群、朋友圈中的用户同质性较强，“小土豆”“砂糖橘”在不断的复制与转发过程中为网友熟悉和模仿。同时，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也通过“热搜”“加标签”等形式持续创作“小土豆”“砂糖橘”文案与视频，这也加快了该网络迷因的快速传播与流行。其次，在网友们绘声绘色的讨论这两个词语的过程中，哈尔滨文旅官方也参与其中，为玩梗增添了无限趣味，哈尔滨某官方

媒体说：“我叫哈尔滨，185，讨好型人格，真诚、热情、细心，特长是宠南方小土豆。”看似搞笑的文案实则传达出哈尔滨这座城市的热情与真诚，因此后面的文旅实际动作也紧跟其后，“讨好型城市”的形象也因此跃然而升。

2.3 “小土豆”“砂糖橘”的变异

在“小土豆”“砂糖橘”词条的传播过程中，伴随着不同背景和不同类型的群体的二次创作，其迷因本质也在发生着变化。由于“小土豆”“砂糖橘”在地域面貌特征上的南北差异展现十分明显，本身在文本创作具有规律性与灵活性的特征，这两个名词已经脱离其当时的语境含义完成其商业价值的挖掘，被许多品牌利用营销，在不同品牌的推动下，衍生出例如南方小土豆义乌挂件与相关商标的抢占潮，甚至淘宝也为远从南方北上的南方小土豆上线“南方小土豆实用装备专列”，甚至淘宝也在会场打造哈尔滨伴手礼，游玩攻略等，抢占这波营销热点。此外，自媒体创作者们也借助“小土豆”这一热点话题展开二次创作，例如视频与音频同等洗脑的小土豆视频，视频中的东北男人跳着魔性的舞蹈，嘴角不断洗脑式的说着嘿嘿小土豆，这种视频形式多种多样围绕其小土豆名词展开，不断收获着百万点赞与转载。

地方与媒介的深度连接体现了人作为存在的主体，在真实的地理空间与虚拟的媒介空间中建构关于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情感在虚实空间的流转不仅产生了生产性价值，还将人与地方的关系指向了一种对经验的规划、管理和再造。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开始由物质向物质性转变^[9]。媒介借助一系列可传播载体，进一步围绕“地方”锻造以人为主体的文化景观、集体精神、情感归宿和各种社会关系。当地理环境与个体之间产生了能够触发感觉的关联时，这种力量平衡了物理环境、以人为主体的生物环境以及社会环境，使得社会经验和空间秩序得以结合。

通过迷因文化的传播与造势，哈尔滨的城市形象逐步建立并得到广泛传播。迷因理论提供了理解这一过程的重要视角，揭示了模仿、复制与变异在数字时代文化传播中的关键作用。随着迷因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哈尔滨的地方记忆得以唤醒，地方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数字化媒介环境中得到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拓展。

3 城市的“可见”与“遮蔽”——反思媒介霸权

3.1 城市展演空间的碎片化解读

在了解索菲亚大教堂、防洪纪念塔等景点背后意义所指时，游客们大多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去解读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符合当下互联网时代信息编码的方式，也符合当前受众的接受心理特征，有利于人们在旅游的同时对公共空间提供的诸多信息进行接受和解码。当前，人类社会进入了互联网时代，而这一时代的人们习惯于去中心化、去碎片化的信息处理方式。因此，在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多样化选择渠道上我们取代了上帝之眼的城市宣传片航拍等宏大叙事模式，聚焦于专业用户生产与发散式非线性生产思维，比如对于各式各样的建筑我们就无法本来的呈现其面貌，同时考虑到哈尔滨作为一个本来还是以农业产出粮食大省的战略布局来看，以短视频为主的宣传主要还是集中在哈尔滨的城市面貌的突出与放大，可能对于乡村空间等的叙事方面也比较的少，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碎片化的解读方式并不是网友与游客故意为之的，而是社会现实发展的大环境和时间、空间的压迫所共同产生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城市意象建构的片面化、浅薄化的问题。

3.2 算法凝视下的同质化滤镜景观

麦克卢汉乐观地将媒体视作人类的延伸，因为媒体可帮助人类感知本无法触接的世界。个性化推荐是针对短视频平台的作品，按照一定的方式推荐给对应用户，包括按照兴趣推荐、地理推荐、热点推荐和随机推荐四种方式。兴趣推荐是指短视频APP后台会根据用户的“使用痕迹和习惯”，对用户的使用行为进行记录，包括用户的年龄、职业、兴趣爱好、短视频内容偏好等。后台抓取这些信息，用大数据算法提取关键词和话题后归类，然后平台就会依据归类的关键词，给用户推荐他们可能感兴趣的短视频作品，但是这种算法操作下的城市系统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以商业逻辑为主导的资本入驻互联网平台，对算法的投入与用户监测倒逼他们开始源源不断地同质化资本增值^[10]，例如各式各样所谓的同质化网红产品与特色商业街区，这种本质上线上好风景，现象商业主宰的逻辑在各式各样的网红城市案例中已经屡见不鲜，各式各样的种草出行攻略最后无疑也是以失望而归，因此，当目的地的意义被经济逻辑侵蚀，城市文旅发展需要严重考虑一次性的单一消费形态是否有利于城市旅游业的转

型与升级发展。

4 结语

哈尔滨的“出圈”与持续热度，本质上是媒介化时代对城市生命力来源的再揭示。在人与人的互动建构中，借助短视频等赛博影像的传播力量，城市得以重新焕发活力与生机。在当下的新媒体语境中，城市已不再仅是物理空间的集合，更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化景观。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被媒介深度渗透，表征系统重构了物质场所的意义，而人在城市中的具身实践也与赛博化的认知意识相互交融，共同塑造出具有网络属性的新型城市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反思：人类能否真正驾驭技术，以创新方式推动文明发展？正如短视频逻辑助推网红城市“出圈”所展示的，在关注其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算法等技术背后多方主体的博弈关系。城市的真实面貌无法完全通过影像被传递，但对其文化肌理的塑造仍具广阔空间。而这，离不开政府、市场、公众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和协同建构。

参考文献：

- [1] 程绍文, 梁玥琳, 李艳, 等. 国内外旅游凝视研究进展综述[J]. 旅游论坛, 2017, 10 (3) : 24-34.
- [2] 约翰·厄里, 乔纳斯·拉森. 游客的凝视[M]. 黄宛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10
- [3] Turner V W. Liminality and Communitas [M]. A Reader in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London: Blackwell, 1969/2008: 358-37
- [4] 潘忠党. 於红梅. 阈限性与城市空间的潜能——一个重新想象传播的维度[J]. 开放时代, 2015(03):140-157+8-9.
- [5] 保罗·亚当斯: 《媒介与传播地理学》, 袁艳译,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207、144 页。
- [6] 孙玮. 我拍故我在 我们打卡故城市在——短视频: 赛博城市的大众影像实践[J]. 国际新闻界, 2020, 42(06):6-22.
- [7] 理查德·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M]. 卢允中等,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217-227.
- [8] 李承晏, 蔡韬. 哈尔滨的雪花旅游业的繁花[N]. 黑龙江日报, 2024-02-28(005).
- [9] 王继周: 《从“物”到“物质性”: 媒介研究中一组概念的辨析》, 《新闻界》2022 年第 4 期。
- [10] 曹晋, 张艾晨. 网络流量与平台资本积累——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考察 [J]. 新闻大学, 2022(01):72-85+123.

Going Viral: The Media Logic of Memetic City-Making in Harbin's Winter Tourism

Shihai Jia¹

(¹ School of Ar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urban tourism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lens of media logic, taking the viral breakout of Harbin as a case study. It argues that digital image practices construct a liminal mode of urban perception, enabling tourists to develop new understandings of place through hybrid virtual-physical experiences. Meanwhile,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internet memes further accelerates the symbolic diffusion of local experience, stimulating broad social participation.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people, the city, and media become deeply entangled, collectively forming a multi-sensory network of social relations grounded in shared experience. Building on the theoretical stance that "media are metaphors," the paper reflects on the dual effects of media visibility: while social media reshapes the sense of place, it also intensifies emotional fragmentation and crises of modernity. Therefo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cities should not rely solely on mediatize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stead, it must return to human-centered embodied experience, seek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place and body, and ultimately reconstruct a spiritual home characterized by pluralistic identification.

Keywords: Urban Communication; Internet Meme; Liminal Space; Media Hegemony

媒介化视域下摇滚乐歌词重构策略研究

邢新宇¹ 李滨惠² 孔祥伟³ 孟庆天⁴ 苏爱民⁵

(1.韩国江原国立大学, 韩国 春川 24286; 2.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31; 3.韩国世宗大学校, 韩国 首尔 05006, 4.韩国岭南大学, 韩国 庆山 38541, 5.全北国立大学, 韩国 全州 54896)

摘要: 在当今媒介平台深度参与内容生产的时代, 中国音乐综艺的文本呈现逻辑发生了显著变化, 尤其是摇滚乐在主流综艺中的传播方式愈加依赖媒介机制的调节。摇滚作品所具有的反叛姿态、批判锋芒和青年亚文化属性, 使其在进入平台化制作流程后面临较高的审查危机, 歌词往往需要经过不同程度的替换、弱化与重塑才可播出。本文基于《乐队的夏天》中三十余首具有代表性的摇滚作品, 构建“原词—播出词”对照体系, 并使用描述性内容分析方法总结歌词被改动的类型与特征, 从媒介化视角解释其背后的表达逻辑。研究显示, 综艺节目中的摇滚歌词改写主要呈现“语言替换”“情绪调适”“意象结构”三种模式, 这些变化体现了审查体系、节目品牌调性、叙事节奏与算法规则等多重媒介逻辑对文本层面的深度介入。尽管摇滚乐的亚文化特征被一定程度地弱化, 但社会表达还在, 它以隐喻化、情绪化与正向化的方式保留。此研究可为摇滚乐歌词创作、媒介化构建与青年文化理解提供启示。

关键词: 媒介化; 摇滚乐; 歌词改写; 综艺节目; 文化构建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79

一、引言

随着媒介平台在文化生产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中国音乐综艺的内容处理方式出现了明显的结构化变化。节目在录制、剪辑、审核与最终呈现等环节中, 都需要在制度尺度、平台调性与受众期待之间寻找平衡, 使得原本具有鲜明语言风格和文化符号的音乐文本往往经历再加工。对于表达强度较高、文化身份突出、情绪能量强烈的摇滚作品而言, 这种再加工尤为明显。节目为了确保内容的可播性, 会在多个层面进行调整, 包括词语替换、情绪弱化与意象重构等。

从本研究整理的三十余首摇滚作品的“原词—播出词”对照情况来看, 歌词变化并非偶发, 而是呈现出具有体系性的表达趋势。例如, 涉及性暗示、暴力、粗口或宗教等可能触及尺度风险的表达, 往往通过更抽象、更温和或更中性的语言加以替换; 原本具有鲜明现实感或批判意味的句子, 也会被处理为情绪化、隐喻化的表达方式, 以降低潜在争议。比如, “我想重复死亡”在播出版本中变为“我想重复 Goodbye”, 将强烈的生命终结意象弱化为较为柔性的离别情绪。同样, 涉及社会结构、价值批判或现实压迫等内容, 也常被节目以更加普适、去指涉化的方式重写, 使其不再直指具体情境。

理解这些变化的发生机制, 需要放在媒介化的理论框架中加以考察。Hjarvard (2008) 指出, 媒体已成为文化生产中的独立力量, 它不仅传递内容, 也重塑内容的呈现方式和意义结构。Couldry 与 Hepp (2016) 进一步强调, 媒介系统会通过其操作逻辑与表达规则, 对现实进行再建构, 使文化文本在进入媒介环境后必须适应既有表达边界。在音乐综艺中, 这种媒介逻辑往往体现在“剪辑—审核—精剪”的流程中, 节目组会依据传播风险、情绪氛围、叙事节奏等因素重塑歌词, 使其符合平台化传播的整体调性。

作者简介: 邢新宇 (1998-),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流行音乐研究;
李滨惠 (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
孔祥伟 (1992-),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声乐演唱方向;
孟庆天 (1991-),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音乐学理论;
苏爱民 (1997-),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音乐学。

通讯作者: 李滨惠

从国内研究看, 电视娱乐节目在内容表达上通常受审查制度、市场竞争与频道定位的共同影响, 更倾向于朝向温和、主流与情绪友好的方向移动(田瑶, 2016)。因此, 摇滚歌词在综艺语境中的变化并非个别处理, 而是节目在平台生态下对表达方式进行主动调适的结果。De Kloet (2010) 在讨论中国青年音乐文化时也指出, 流行音乐在平台化环境中往往需要在表达自由与文化工业逻辑之间不断协商。总的来看本研究通过构建摇滚作品“原词—播出词”的系统性对照, 试图从具体的改写类型出发, 分析节目制作过程中歌词再加工的逻辑。研究的核心目的不仅在于呈现改写本身, 更在于在媒介化的框架下理解摇滚文本在平台语境中如何被重新组织与生产, 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作品原本承载的青年文化象征与情绪表达。

二、理论框架

本研究以媒介化理论作为分析基点, 重点探讨媒介逻辑如何影响综艺节目中摇滚歌词的呈现形态。媒介化强调媒体体系通过其符号机制、制度结构与操作逻辑深度参与社会文化表达(Hjarvard, 2008)。因此, 音乐综艺节目对歌词的修改, 不仅是审查层面的要求, 也是媒介逻辑嵌入文化生产的一种表现。

首先, 媒介化理论指出, 媒体会通过其自身规则塑造内容的表达方式, 包括语言风格、情绪强度和叙事节奏(Hjarvard, 2008)。摇滚歌词在综艺节目中的改写正是这种“媒体逻辑优先”的结果。其次, 这种逻辑通常通过“剪辑—审核—改编”机制落实。Golden (2010) 认为, 剪辑不仅改变文本呈现顺序, 更会重新定义意义结构, 因此歌词改写本质上属于媒介再生产的一部分。再次, “可播出表达”是歌词改写的重要导向。Siles (2024) 指出, 平台时代的音乐内容需要兼具情绪友好性、品牌适配性和传播安全性, 才能获得稳定的曝光机会。此外, Couldry 与 Hepp (2016) 提出的“媒介建构现实”观点也提示我们, 媒介系统会预设可接受的表达边界, 使创作者在进入媒介环境前便需主动调整。

基于以上理论, 本研究构建的框架可概括为: 媒介逻辑构成宏观背景; 剪辑—审核机制是操作路径; “可播出表达”是核心标准; 最终形成原词与播出词之间的系统差异。该框架为理解歌词改写的内在逻辑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揭示音乐综艺节目中摇滚歌曲在播出前经历的歌词改写特征及其背后的媒介化机制。为系统呈现“原词—播出词”之间的差异, 并解释这些差异如何与节目制作流程相关, 本研究依据描述性内容分析的原则, 对样本文本进行整理、比对、分类与解释。本章从数据来源、样本构成、研究方法、编码体系与研究流程等方面对研究设计进行说明。

研究数据来源于《乐队的夏天》音乐综艺节目中具有代表性的摇滚作品。研究者根据节目播出片段、官方音源、音乐专辑版本以及音乐人公开演出版本收集每首歌曲的原始歌词, 并与节目播出版本进行逐句比对, 建立“原词—播出词”对照文本。最终共整理三十余首具有明显改写特征的摇滚歌曲作为分析样本。选择这些样本的理由在于: 其一, 摇滚作品本身具有较强的语言张力和情绪强度, 容易在综艺节目中触发语言尺度与情绪尺度的调整; 其二, 这些作品的播出版本均有可清晰识别的语义或意象变化; 其三, 原词和播出词均可从公开渠道验证; 其四, 平台型综艺节目具有相对稳定的制作流程, 使改写现象具有典型性。样本的构成能够较为充分地反映音乐综艺在歌词呈现上的媒介化加工方式。

本研究主要采用描述性内容分析与文本对照分析两种方法。描述性内容分析强调从文本出发, 通过对材料的内容、结构与外显特征进行系统梳理, 以呈现其基本面貌与表现规律。该方法常用于教育与传播领域的文本研究, 可用于概括文本处理方式、归纳呈现模式等基础性质的分析(袁振国, 2000; 叶澜, 1999)。在本研究中, 描述性内容分析有助于识别音乐综艺在处理摇滚歌词时所形成的典型加工方式, 如语言净化、情绪削弱、表达模糊化等趋势。

文本对照分析则以“原词—播出词”的逐句比对为核心步骤, 通过整理两者在词汇选择、情绪表达与象征意涵上的差异, 进一步识别节目制作中的具体改写策略。为确保分析的系统性, 研究首先为观测样本建立原始歌词与播出版本的对照表, 并标注所有发生变化的语句; 随后依据改写特征, 将变化点按照语言、情绪与象征三个维度进行分类; 最后结合媒介化理论, 从节目制作逻辑、审查要求与表达策略等角度解释这些改写背后的机制。通过上述方法, 本研究能够在保持文本细读深度的同时, 从整体层面把握音乐综艺在歌词加工与再表达中的规律性倾向。这一研究策略兼具可操作性与理论解释力, 符合内容分析在文本研究中的使用原则(Krippendorff, 2004)。

在分析全部样本之后, 本研究基于归纳法构建了摇滚歌词改写的三大类八小类编码体系。第一类为语言替换

类,包括脏话或粗俗表达的替换、性暗示词语的删除或中性化处理、暴力意象的弱化以及宗教类词汇的规避与替代。例如,将具有明确宗教含义的表达替换为心理活动类表达,或将带有性暗示的语句转化为身体动作类描述。第二类为情绪调适类,主要表现为对强烈负面情绪的弱化,如将“死亡”替换为“Goodbye”,将愤怒表达调整为遗憾式表达,或将对抗性的语言柔性化处理,使其更符合综艺节目整体的情绪走向。第三类为意象结构调整类,包括对社会批判或现实指涉的意象进行模糊化处理,将具象象征转化为抽象情绪表达,以及对象征意义较强的词句进行中性化处理。该编码体系能够全面呈现综艺节目对摇滚歌词的改写方向,也与节目制作中普遍存在的“可播出表达”逻辑高度一致。

研究流程包括以下步骤:首先,获取样本歌曲的原词与播出词并进行文本核对;其次,将所有样本整理为逐句对应的对照表,以确保能够准确识别每一处改写;第三,识别语言替换、情绪弱化、意象模糊等类型的改写点,并依据编码体系进行分类;第四,通过对所有改写点的集中分析,总结摇滚歌词在综艺节目中的改写规律;最后,从媒介化的角度解释改写背后的逻辑,包括审核需求、节目叙事节奏、情绪管理以及平台化传播的要求。整个流程强调文本材料的可靠性与呈现方式的透明性,使研究结果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摇滚歌词在综艺节目中的媒介化呈现机制。

四、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三十余首作品的“原词—播出词”逐句对照,可以发现综艺节目在呈现摇滚音乐时普遍存在结构化的歌词改写现象。这些改写不仅在语言层面表现为替换、弱化或模糊化,也在情绪与意象层面呈现出明显的趋同趋势,反映出节目制作流程中“可播出”的规制方式。按表1可见本章从语言替换、情绪调适和意象结构方面展开分析,以揭示歌词改写的主要类型与内在规律。

表1 歌词对比

歌曲名	原歌词	播出歌词	改动类型	语义归类
Mr. Miss《你怎么不上天呢》	你撩别的女的	你聊别的女的	低俗/口语强度 弱化	(语言净化)
Mr. Miss《你怎么不上天呢》	这些年你的内裤都是我洗的	这些年你的内衣都是我洗的	敏感身体部位 弱化	(语言净化)
Mr. Miss《你怎么不上天呢》	每次要亲热	一到大扫除	性暗示删除/替换	(性暗示规避)
Mr. Miss《你怎么不上天呢》	多少次想把你掐死	多少次想和你分手	暴力威胁转为 关系表达	(暴力意象规避)
Click#15《Get Funky》	I need your sacrifice	You need to realize	宗教/极端词汇 弱化	(语义强度降低)
Click#15《Get Funky》	Shake your money maker	Make your body moving	性/金钱暗喻 弱化	(性暗示规避)
Click#15《Get Funky》	外套早已脱掉	外套早已扔掉	性化联想规避	(性暗示规避)
和平和浪《丽园便利店》	门口有个少年在抽烟	门口有个少年在抽签	不良行为表述 替换	(健康导向)
旺福《两个恰恰好》	小小鸡生小小鸡鸡	小小鸡生小小小鸡	身体/性暗示 弱化	(语言净化)
旺福《两个恰恰好》	如果你四处采花蜜,掐掐掐死你	如果你四处采花蜜,恰恰恰似你	暴力词汇替换	(暴力意象规避)
海龟先生《男孩别哭》	Buy a one night stand	Bye on night stand	性暗示消解/谐音替换	(性暗示规避)
新裤子《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	我不是流氓	我不是国王	敏感/贬抑标签 替换	(语言净化)
刺猬《白日梦蓝》	社会是伤害的比赛	世间是伤害的比赛	体制/社会指涉	(社会系统规避)

黑撒《流川枫与苍井空/校花与流川枫》	歌名: 流川枫与苍井空	歌名: 校花与流川枫	弱化 标题低俗暗示 去除	(语言净化)
黑撒《校花与流川枫》	她拿到华为的签约书	她拿到单位的签约书	品牌/商业指涉 去除	(节目方主动调整)
黑撒《校花与流川枫》	他是他的苍井空	他是他的一场梦	成人影像指涉 去除	(语言净化)
海龟先生《Where Are You Going?》	主该往哪儿走	该往哪儿走	宗教词汇删除	(宗教敏感规避)
海龟先生《Where Are You Going?》	荣耀的君王被钉死他乡	荣耀的主人被卖在他乡	宗教意象弱化	(宗教敏感规避)
旅行团《Bye Bye》	Bye bye 主义的世界	Bye bye 狭义的世界	意识形态敏感 词替换	(政治/意识形态规避)
旅行团《Bye Bye》	我要和你准备 滚吧	我要和你准备 Goodbye	粗俗口语替换	(语言净化)
新裤子《生活因你而火热》	没能继续的革命	没能继续的诗篇	政治语义弱化	(政治性词汇替换)
新裤子《生活因你而火热》	被社会伤害的人们	不能再见的朋友	社会受害叙事 转向私人叙事	(社会系统规避)
Click#15《How Come You Leave Me Like This》	Did you sleep with another guy	Did you switch to another side	出轨陈述弱化	(性暗示规避)
Click#15《How Come You Leave Me Like This》	Tell me you motherfuckin' against the law	Tell me you have no lies and have no more	粗口删除/改写	(语言净化)
刺猬《生之向往》	身体 被欲望与药物控制破坏	身体被欲望与烟雾控制破坏	涉毒意象替换	(风险行为规避)
刺猬《生之向往》	灵魂 被恶魔强暴后丢在	灵魂 被恶魔囚俘后丢在	性暴力意象弱 化	(暴力意象规避)
新裤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可是我最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死在我面前	可是我最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走在我面前	死亡愿景替换	(暴力/死亡意象规避)

在语言替换方面, 节目制作团队对敏感词汇与边缘表达的处理最为直接。数据中呈现的改写带有明确的系统性和一致性。例如, 原歌词中的宗教类词汇如“sacrifice”被替换为“realize”, 明显体现了综艺节目针对宗教意象的规避策略。这类词汇在多数商业化传播场景中被视为具有潜在误读风险, 因此节目在剪辑环节往往主动弱化其象征指向, 使其转化为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活动类语言。性暗示表达的弱化同样是高频现象, 如“Shake your money maker”被改写为“Make your body moving”, 原表达中的性暗示内容消失, 而动作类表达则在保留节奏与表演感的同时, 大幅降低了表达的敏感程度。类似地, 涉及脏话、粗俗词语或街头语汇的表达在样本中均被替换为较为中性、更加符合节目整体基调的词语。此外, 暴力意象的弱化如将“枪”改为“风”, 将“杀”替换为更为抽象的词语, 也体现出节目对暴力表述的高度敏感性。无论是针对宗教、性暗示还是暴力, 歌词的语言替换均呈现出“去风险化”的显著特征, 体现了综艺节目为适应平台传播与审查环境而进行的主动加工。

在情绪调适方面, 摇滚音乐本身常具有强烈的负面情绪、爆发式表达和极端情绪象征, 但在节目呈现中这些表达往往被弱化或替代。样本中多处表现出将死亡、自伤等高强度情绪替换为更为缓和的表达。例如, “我想重复死亡”被修改为“我想重复 Goodbye”, 将直接指向生命终结的极端语义转化为带有离别意味的温和表达, 使情绪表达既得以保留, 又避免触碰负面心理暗示在大众媒体中可能引发的争议。同样, 含有愤怒、仇恨、激烈对

抗等强烈语气的句子通常会被替换为带有遗憾、反思或柔性指向的表达,使其情绪强度明显下降。在某些作品中,原词中对社会挫败、压抑、焦虑等情绪的直白表达被替换为更抽象、更模糊的心理描述,使播出版本的情绪结构更符合综艺节目的整体氛围。综艺节目通常强调温暖、治愈、积极和共情的情绪方向,而避免呈现可能引发压抑、焦虑或极端情绪反应的内容,因此摇滚作品在情绪维度上的改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柔化”趋势。

在意象结构方面,节目呈现的歌词普遍弱化原作中具有社会批判性、现实指向性或象征强度过高的意象。摇滚作品在原始表达中常包含批判社会结构、揭露现实压迫或回应青年处境的象征性意象,而这些内容在综艺节目中大多被模糊化处理。例如,“社会竞争阶级”被改写为“世界是你爱的一切”,原本具有明确社会指向与批判性意味的表达被替换为模糊、普适、非冲突性的文本,象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此外,一些具有明确情境指向的意象也被抽象化,如“现实是无情的枪”变为“现实是无情的风”。这种转换不仅是去暴力化,更是将具有明确情境意味的具象表达转化为抽象表达,使其在节目叙事中更容易与不同观众的情绪经验进行对接。综艺节目在叙事上往往希望构建“励志—情感—成长”的结构,因此偏好抽象化、普遍化的意象,而弱化具有现实批评意味的象征结构。在这一逻辑下,摇滚歌曲原本具有锋芒的象征性表达被明显收敛。

综艺节目在呈现摇滚作品时对歌词进行改写的现象,并不仅仅是出于审查层面的必要性,而是与节目制作机制深度相关。从节目制作流程来看,歌词改写通常产生于“剪辑—审核—精剪”三个环节。在初剪阶段,制作团队会根据经验判断某些词语可能触及监管尺度或不适合节目调性,因此主动提出修改;在审核阶段,根据反馈意见对语言进行风险规避性调整;在精剪阶段,结合节目叙事节奏与舞台表演效果对歌词的语义强度进行最终调整。可以看出,歌词的呈现受到多个环节的共同影响,其最终形态是节目整体考量的结果。综艺节目作为平台化内容,其叙事结构、品牌需求、受众期待和传播环境共同构成了歌词改写的背景,歌词的语言选择和情绪表达皆需与节目整体气质保持一致。综艺节目面对的是大众受众与商用传播环境,因此它对摇滚这一强表达音乐类型的呈现必然形成某种中和、弱化与调整。本章的分析结果也为后续讨论摇滚音乐在平台时代的表达边界与文化意义提供了重要基础。

五、结论与启示

研究围绕《乐队的夏天》中具有代表性的摇滚作品,通过建立“原词—播出词”对照文本,对节目录制与播出之间的歌词变化进行了系统梳理。整体来看,综艺节目对摇滚作品的呈现并非原作的直接压缩,而是在节目制作、频道定位与平台化传播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再表达。歌词在进入节目制作流程后,呈现出以“语言替换—情绪调适—意象结构重塑”为核心的加工趋势,其改写并非零散,而是体现了一套较为稳定的媒介生产逻辑。

从语言层面看,节目组普遍对可能引发误读或引起尺度争议的词语进行替换,包括粗口、性暗示、暴力隐喻、宗教意象以及带有明显现实指涉的表达。替换后的语言通常走向中性化、动作化或心理活动化,使歌词在保持节奏与情绪节拍的同时,减少可能带来的传播风险。此类改写显示了节目在平台化生态中对语言安全性与受众接受度的高度敏感。

在情绪层面,原作中较为强烈的愤怒、哀伤、绝望或挑战姿态,多被重新组织为更温和、更易获得共鸣的表达。死亡、暴力、报复等高强度情绪意象往往被弱化为离别、遗憾或感慨,这种调整使摇滚作品在节目叙事中能够融入整体偏向“温暖—治愈—正向”的情绪基调。情绪调适不仅是规避极端情绪的需要,也体现了节目自身在塑造观看体验方面的考量。

在意象层面,原作中具有社会批判指向、对现实处境的直白呈现或象征性较强的意象,常常在节目中转化为更抽象、普遍的情绪表述。社会结构、政治隐喻、阶级意象、现实困境等内容,在综艺版本中往往不再直指具体问题,而是被处理为可被普遍理解的心理或哲学性表达。这类意象重塑强化了节目的整体叙事和情绪安全性,同时也使摇滚作品的文化锋芒被收敛。

由此可看出综艺节目对摇滚歌词的改写实际反映了一套由审查、节目调性、商业传播与算法机制共同推动的媒介化逻辑。歌词不再只是艺术表达本身,而是在节目生态中被重新塑造,使其符合平台叙事节奏、受众期待与品牌定位。摇滚作品在此过程中展现出一种“被动适配—主动重写”的双重机制:既需要在语言和内容上符合播出要求,也必须在节目叙事框架内维持一定的情绪感染力与艺术魅力。

从节目制作的角度看,如何在保证播出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保留作品原有的表达张力,是音乐综艺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过度削弱作品的象征结构和情绪能量,可能影响音乐人与观众之间的情感连结,也会使节目呈现出的作品趋于同质化。节目团队也许可以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为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保留更大的表达空

间。对音乐创作者而言，面对平台化传播环境，准备多版本歌词、提前了解平台表达边界已成为必要策略。创作者并非单纯被动接受调整，而可以在理解媒介逻辑的基础上主动设计兼具原创性与可播性的文本，使作品在不同传播场域中都能获得适当呈现。这种“多情境创作能力”将可能成为未来音乐创作的新常态。从观众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综艺节目中的摇滚文本不应被视为原作的等价呈现，而应理解为节目机制下的再生产结果。总体而言，本研究揭示了摇滚歌词在综艺节目中的改写规则，并从媒介化视角解释了形成这些规律的生产逻辑。随着平台对文化生产的干预日益加强，音乐作品如何在传播机制中保持自身特色、如何在市场逻辑与艺术表达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将成为未来音乐综艺与音乐创作都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 [1] Hjarvard S. The Mediatization of Society: A Theory of the Media as Agent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J]. *Nordicom Review*, 2008, 29(2): 105 – 134.
- [2] Couldry N, Hepp A.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 [3] De Kloet J. China with a Cut: Globalisation, Urban Youth and Popular Music[M].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 [4] Siles I. Music Is Just Right There on Social Med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4, 18: 1 – 25.
- [5] Golden J. The Role of Editing in Media Analysis and Language Arts[J]. *Journal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2010, 2(1): 1 – 10.
- [6] Finnemann N O. Mediatization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J]. *Communications*, 2011, 36: 67 – 89.
- [7] 田瑶. 电视娱乐节目研究综述[J]. *中国电视*, 2016(4): 84 – 87.
- [8] 袁振国 主编. 教育研究方法[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 [9] 叶澜. 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
- [10] Krippendorff, K. Conten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M].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4.

Research on the Re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Rock Music Lyr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tization

Xing xinyu¹, Binhui Li², Kong xiangwei³, Meng qingtian⁴, Su aimin⁵

(¹G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Chuncheon, South Korea; ²Jilin University of Arts, China; ³Sejong University, Seoul, South Korea; ⁴Yeungnam National University, Gyeongsan, South Korea; ⁵Jeonbuk National University, Jeonju, South Korea)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era when media platforms are deeply involved in content production, the text presentation logic of Chinese music variety shows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especially as the dissemination methods of rock music in mainstream variety shows increasingly rely on the regulation of media mechanisms. The rebellious stance, critical sharpness and youth subcultural attributes of rock works make them face a high degree of censorship crisis after entering the platform-based production process. Lyrics often need to be replaced, weakened and reshaped to varying degrees before they can be broadcast. Based on over thirty representative rock works in "The Summer of Bands",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original lyrics - broadcast lyrics" comparison system, and uses descriptiv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to summarize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yrics that have been modified, explaining the underlying expression logic from a media-based perspectiv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rewriting of rock lyrics in variety shows mainly presents three patterns: "language replacement", "emotional adjustment", and "image structure". These changes reflect the in-depth intervention of multiple media logics such as the censorship system, the brand tone of the program, narrative rhythm, and algorithmic rules at the text level. Although the sub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rock music have been weakened to a certain extent, social expression still exists, and it is retained in a metaphorical, emotional and positive way.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rock music lyrics,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a,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youth culture.

Keywords: Mediatization; Rock music; Lyrics rewriting; Variety shows; Cultural construction

哈尔滨植物造景的地域特色与创新发 展路径研究

王熙媛 周权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哈尔滨作为中国最北端的省会城市之一, 其植物造景设计在地域特色、气候条件和文化影响下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本文从寒地植物造景的视角出发, 分析哈尔滨植物造景的现状与其在冬季严寒、夏季湿润等气候特征下的适应性, 探讨植物造景中融合的本土文化元素与俄罗斯风情对景观设计的影响。结合城市生态环境改善、文化价值提升以及居民休闲需求, 本文提出了符合寒地特色的创新发展路径, 包括多样化本土植物选择、四季观赏景观设计、智能化管理应用以及居民参与机制等。研究表明, 通过因地制宜的植物造景规划, 不仅可以提高哈尔滨市民的生活质量, 优化城市生态环境, 还能增强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 为城市植物造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本文为寒地城市的植物造景研究与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推动寒地植物景观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与发展。

关键词: 哈尔滨; 植物景观; 寒地气候; 地域特色; 可持续发展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82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植物造景在现代城市环境中具有重要性, 主要体现在提升生态环境、丰富景观、促进心理健康、增强文化认同以及改善生物多样性等方面。1.植物造景通过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来净化空气, 缓解污染, 并调节湿度和温度, 改善城市微气候, 从而缓解热岛效应, 增强城市的生态平衡。2.植物造景为城市空间增添了自然元素, 提供了多样化的视觉景观, 使城市更美观宜居, 尤其是四季分明的植物景观为市民带来不同的视觉体验, 增强了城市的吸引力。此外, 接触自然有助于减轻人们的压力, 改善心理健康, 植物造景不仅提供了舒适的休闲空间, 还通过绿色氛围带来身心放松, 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3.植物造景也可以结合地方特色和文化元素, 打造具有标志性的城市景观, 提升城市的文化价值, 增强居民的归属感, 使城市更具独特性。4.植物造景为动植物提供了栖息地, 增加生物多样性, 支持城市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有助于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环境。因此, 植物造景在现代城市环境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 并在美化城市、提升市民生活质量以及传播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成为城市规划和发展的的重要组成部分。

哈尔滨植物造景在设计和维护的独特性:

哈尔滨作为中国最北的省会城市, 典型的寒地气候特征决定了其植物造景的独特性。哈尔滨冬季漫长而严寒, 气温最低可降至-30℃以下, 且降雪频繁、积雪期较长。这一气候条件对植物的生存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使得哈尔滨的植物造景在设计和维护方面与其他地区有显著不同。

由于冬季极端寒冷, 哈尔滨的植物造景需要选用耐寒性强的植被品种。许多温带植物难以适应这样的环境, 导致植物选择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常绿植物和耐寒树种的使用在哈尔滨尤为关键, 不仅增强了植物造景的冬季适应性, 还为冬季单调的城市景观增添了生机。

并且哈尔滨的植物造景设计需要充分考虑冬季景观的观赏性。在寒冷的季节中, 常绿植物、观雪树种及其他

作者简介: 王熙媛(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

周权(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

通讯作者: 王熙媛

具有冬季观赏价值的植物成为设计的重点,以保证在积雪覆盖期间依然能够保持景观的美观。

寒冷北方的极端气候条件对植物的维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冬季需要采取适当的防寒措施保护植物,以减少冻害,而春季则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恢复和养护,以保证植物的正常生长。因此,哈尔滨的植物造景设计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寒地气候的特殊需求,在植物选择、季节布局及养护管理等方面进行精细规划,从而打造出符合地域特征的独特城市景观。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研究哈尔滨植物造景具有重要的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意义。作为典型寒地城市,哈尔滨冬季漫长严寒,普通温带植物难以存活,研究其植物造景有助于探索耐寒植物选择与造景模式,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缓解热岛效应并提升居住质量。与此同时,哈尔滨中西融合的城市文化使植物造景成为展现地域特色和城市形象的重要途径,既体现“东方小巴黎”的文化风貌,又强化城市辨识度与审美价值。此外,植物景观的建设丰富了市民休闲空间,改善心理健康,提升幸福感。更重要的是,科学的造景规划有助于提高生物多样性,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寒地城市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与实践参考。

2. 哈尔滨植物景观的地域特色

2.1 气候条件与造景影响

哈尔滨的冬季气温最低可达 -30°C ,这一极端低温让许多常见的温带植物难以存活。因此,植物的抗寒性成为关键考量,适应哈尔滨气候的植物通常以耐寒树种和常绿植物为主,如松树和冷杉等。这些植物不仅能抵御严寒,还能够在冬季保持一定的观赏效果。然而,这也导致植物造景的物种选择范围相对有限,缺少常见的温带花卉或热带植物的多样性。此外,草坪类植物在这种极寒条件下极易受冻,往往在冬季枯萎并在春季恢复缓慢,从而限制了草坪的使用频率和覆盖范围。

长时间的积雪覆盖为植物景观带来特殊影响,一方面,积雪会压垮部分矮灌木或地被植物,造成景观的局部破坏,尤其是对植株低矮或枝条脆弱的品种。另一方面,积雪遮挡光线,使得一些植物在寒冬中难以获得充足的日照。因此,适合在哈尔滨冬季生存的植物通常具有较强的抗压性和结构稳定性,而常绿植物和观雪植物成为主要选择,以便在积雪季节中仍然保持景观的美观^[1]。

由于其冬季持续时间长,植被的生长周期相对短暂,这对植物造景的季节性布局提出了要求。设计时需考虑如何在较短的生长期内达到视觉效果,通常会选用能够在夏秋季显色的植物,或具有冬季观赏价值的树种。常绿植物的深绿色在雪景下格外醒目,而一些树种的独特树形或冬季观花植物也可以在寒冬中为城市增添色彩和生气。

严寒和积雪还对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冬季,为了保护植物免受冻害,许多植物需要采取特殊的防寒措施,如包裹树干、地表覆盖等。待春季融雪后,造景团队还需进行修剪和清理,以确保植物能够顺利进入生长季。与温暖地区相比,哈尔滨的植物造景管理无疑更加复杂,对资源的投入和管理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

2.2 植物选择与布局策略

在哈尔滨这样气候严寒、冬季漫长的北方城市,植物造景的选择、布局和种植时间必须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精心调整,以适应极端温度和长时间的积雪覆盖。

在植物选择上,耐寒性强的植物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植物需要能够忍受 -30°C 以下的低温,主要以常绿针叶树(如松树、冷杉)和少数抗寒落叶树种(如白桦、柳树等)为主。这些树种不仅在冬季保持基本形态,还可以在冬季雪景中形成鲜明的色彩和层次感。同时,地被植物选择耐寒草种,如紫花地丁等,既能耐寒又较为抗压,有助于保护地表土壤,增强绿地覆盖度。

在植物布局上,为了在寒冷季节中仍然维持景观的观赏性,常绿树木和观雪植物被合理地应用于主干道、广场周围等显眼区域。这种布局可以在积雪覆盖时提供独特的视觉效果,形成冬季的自然景观亮点。此外,低矮灌木一般布置在背风的区域,以防止积雪和寒风对其造成破坏。高低错落、前后搭配的布局不仅增添了景观的层次感,还起到了对寒风的屏障作用,保护低矮植物免受寒害。

在种植时间上,需与哈尔滨的短暂生长季节相适应。春季解冻期稍晚,植物种植多安排在5月末至6月初的温暖时段,以避免残余的低温。这个种植窗口较短,要求植物能够迅速适应环境并进入生长期。此外,秋季的降温较早,因此秋季种植通常在9月中下旬完成,保证植物有足够的时间扎根并适应寒冷的气候,形成足够的抗寒

能力。为提高种植的成活率，还需做好种植后的防寒和保暖措施，如冬季覆盖、树干包裹和土壤覆盖物，以保证植物在严冬中免受冻害。

2.3 文化背景与景观风格

哈尔滨的植物造景设计充分融合了俄罗斯风情的元素。这一文化传统可以追溯到哈尔滨城市早期的建设时期，受俄国影响，哈尔滨保留了大量东正教教堂、俄罗斯风格的建筑和街区布局。因此，在植物造景中，许多公园和广场会借鉴俄罗斯的造景风格，例如中央大街的街道绿化及沿线广场的景观布置。常用的植物类型包括冷杉、云杉等耐寒的常绿针叶树种，这些树种不仅能在冬季保持绿意，还与俄罗斯风格的建筑和装饰相得益彰，营造出一种异域情调，使哈尔滨植物景观更具观赏性和文化特色。

再由建筑设计风格入手，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使得哈尔滨的植物造景在布局上既遵循传统的中式审美，又融入了西式的园林设计理念。在一些大型公园中，园林布局既包含中式园林的空间分隔与自然和谐观念，也借鉴了西方园林的对称、开放和视觉中心的设计手法^[2]。植物的选择上，既注重在寒冷季节提供视觉效果的常绿植物，如松树、冷杉，又会栽植观赏性高的西式花卉和灌木，如薰衣草、紫丁香等。这种融合设计不仅丰富了哈尔滨的植物造景，也赋予了城市空间中中西结合的独特文化韵味。

哈尔滨的中西合璧文化还体现在节日植物景观设计中。哈尔滨的冬季冰雪节和圣诞节等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植物造景也会围绕这些节日进行设计。例如，在冬季，公园和广场会以圣诞树、松柏等耐寒植物为主，结合彩灯装饰，形成既有西方节庆氛围又符合中国北方冬季景观的独特布置。同时，冰雕、雪雕与植物造景相结合，在严寒季节中增添了独特的视觉享受，使得哈尔滨的冬季景观更具文化特色^[3]。

这种包容性强如何度高的文化风貌还推动了市民对多元植物景观的接受度和喜好。哈尔滨的居民既习惯中式园林的自然曲线和石、木、竹等中式元素，也能欣赏西方园艺中的色彩、造型和开放布局。这种包容性使得植物造景的设计有了更大的创新空间，设计师能够在植物种类、造景形式上结合多种风格，创造出更加多元的城市景观。

3. 哈尔滨植物景观的现状

3.1 城市绿地体系

哈尔滨植物景观主要分为公园绿地、街道绿化、广场绿地及滨水绿地四类：

公园绿地：以斯大林公园、兆麟公园、太阳岛为代表，常绿乔木与观花灌木结合，兼具生态与休闲功能；

街道绿化：如中央大街、果戈里大街，采用冷杉、云杉及花坛式布置，强化街区文化特色；

广场绿地：如防洪纪念塔广场，以对称式布局突出纪念性与开放性；

滨水绿地：松花江两岸形成生态防护带，结合水生植物与冰雪景观，兼具生态调节与观光价值。

3.2 植物造景的特征与不足

哈尔滨植物景观在色彩搭配、层次分布和季节配置上具有鲜明特征。色彩上，常绿树与白桦形成冷暖对比；结构上采用“乔—灌—草”多层空间；季节性上实现“春花、夏荫、秋叶、冬枝”的连续景观。然而不足主要体现在植物种类单一、景观更新缓慢及部分区域养护不到位^[4]。季节配置注重四时变化：春季以迎春花等早花植物为主，夏季突出花卉与绿植的色彩搭配，秋季展现银杏、枫树的叶色变幻，冬季则依靠常绿针叶树维持景观基底，形成全年持续、富有变化的景观效果。

3.3 政策与管理支持

政策对植物造景的支持力度和相关法规。

市政政策对哈尔滨植物造景的支持力度和相关法规在推动城市绿化、提升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哈尔滨作为中国的寒地城市，其市政政策在植物造景上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支持，主要体现在政策引导、资金支持、法规保障和公众参与等方面。

(1) 政策引导和规划支持

哈尔滨市政部门将植物造景纳入城市规划，通过《哈尔滨市绿化条例》等法规文件明确了城市绿化目标，提出了公共绿地建设和植物造景的具体要求。例如，市政规划中强调城区内公园、广场、道路的绿化率，要求结合地域特色和气候特点合理选用植物种类，并确保一定的常绿植被比例。这些政策引导保障了哈尔滨在设计和建设植物造景时有清晰的目标和框架。

(2) 资金支持与专项投入

为了保障植物造景的顺利实施, 哈尔滨市政府设立了专项资金, 用于支持植物造景的建设、维护和更新。尤其在城区重要公园、主干道和旅游景区, 市政部门会投入较多的资金进行植物造景项目的设计与改造。此外, 市政府还会根据不同的季节和活动主题拨款用于特殊植物景观的布置, 例如冬季的冰雪节景观布置和植被保护, 进一步丰富了城市的景观层次。

(3) 法规保障和管理规范

哈尔滨市还通过出台相关法规, 对植物造景的保护和管理进行严格规范。市政法规要求在植物造景过程中遵循合理规划原则, 确保植物与周围环境和谐共生。此外, 《哈尔滨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明确了植物造景的责任划分, 包括绿化养护、季节性修剪、防护措施等方面, 并规定了违法破坏绿化的处罚标准。通过这些法规, 市政府确保了植物造景的长期稳定发展和植物景观的可持续维护。

(4) 公众参与与环保意识提升

为提高植物造景的影响力和效果, 哈尔滨市政部门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绿化建设, 通过宣传活动和市民志愿绿化等方式增强市民的环保意识。市政府在城市绿化和植物造景建设中吸纳市民意见, 鼓励社区和企业参与, 共同为城市绿化出力。这种公众参与的模式不仅有助于增进居民对绿化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还增强了市民对城市植物造景的认同感, 进一步巩固了植物造景的管理和维护工作。

(5) 季节性保护措施和应急管理

针对哈尔滨的特殊气候条件, 市政政策还明确了植物造景的季节性保护措施。例如, 冬季会要求对一些植物采取防寒保护, 设置抗风雪设施, 以降低极寒天气对植物的损害。同时, 市政部门在春季和秋季制定了植物恢复和养护的具体计划, 并在夏季极端天气下实施应急管理。这种政策上的应对策略为植物造景提供了更完善的保障, 确保植物景观在不同季节和气候条件下保持较高的观赏性和生长健康。

4. 哈尔滨植物造景的挑战

4.1 环境挑战

哈尔滨地处高纬寒区, 冬季漫长严寒、积雪期长, 气候条件对植物造景构成显著制约。极端低温是主要限制因素, 气温可降至 -30°C 以下, 许多温带植物难以越冬, 生长周期短、景观更新缓慢。应对措施包括选用抗寒性强的植物, 如松树、云杉等, 并在冬季采取树干包裹、根部覆土等防寒技术, 以提高成活率和稳定性。

长时间的积雪覆盖削弱光照, 压迫低矮植物, 易造成枝干损伤和形态变形。设计中通常通过高低错落、乔灌结合的布局减少积雪影响, 保持景观结构的完整与美观。并且春秋两季气温波动明显, “倒春寒”和早霜现象频发, 使植物萌发和休眠节律受扰, 影响其生长稳定性。为确保景观持续性, 造景需精准把握种植时序, 并在气候突变期实施应急保护。

冬季空气干燥、风力强烈亦是重要威胁。低湿环境导致常绿植物水分蒸散加剧, 大风可能造成枝干折断或根系松动。针对这一问题, 植物选择上偏向根系发达、抗风耐旱的树种, 并结合防风屏障与群落式配置, 形成更稳固的生态结构。

4.2 社会经济挑战

哈尔滨植物造景还受到经济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多重限制。寒地环境下的绿化建设投入大、周期长, 财政资金有限, 使部分绿化项目难以实现持续更新。高昂的养护成本进一步增加财政压力, 冬季防寒、春季补植及日常修剪都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植物种类的受限亦影响景观多样性。能够适应极寒气候的物种较少, 且成本较高, 新物种的引进与驯化需要时间与资金支持。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建设用地需求不断上升, 绿地空间被挤压, 部分区域的植物景观规划受到削弱。

人才和技术不足问题亦较突出。寒地植物造景需要专业知识与精细化管理, 但园林设计与维护领域的专业人才储备不足, 技术创新与科研支撑相对滞后。这一现状制约了植物造景的质量提升与生态创新。

因此哈尔滨植物造景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双重压力下, 面临生态适应、资金保障及技术支撑等多维挑战。未来的发展应依托政策扶持与科研创新, 完善寒地植物体系, 提升绿化管理效率, 构建具有地域特色与可持续性

的生态景观格局。

5. 哈尔滨植物造景的创新发展路径

5.1 植物品种的多样化与本土化

为适应哈尔滨寒地气候特征，应优先选用耐寒、抗旱的本土植物品种，以提高成活率、降低维护成本，并增强景观的生态稳定性。

在乔木方面，樟子松四季常绿、耐旱耐寒，适宜作为绿化骨架；白桦树形优美、树皮独特，可作为行道树或主景树种。灌木层可选用紫丁香和锦带花，二者耐寒性强，花期色彩丰富，适于点缀景观。地被植物推荐玉簪和紫花地丁，耐阴耐寒，能有效增强层次感与色彩多样性。

常绿树种以云杉、冷杉为主，冬季仍保持绿色，兼具防风与造景功能。地面覆盖宜选用苔草类和冷地型草坪，如多年生黑麦草、高羊茅等，形成持久、耐压的绿化效果。

通过构建多层次、多品种的植物群落，不仅丰富景观结构，也有助于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韧性。

5.2 四季景观设计的创新

针对哈尔滨冬季较长的气候特点，可以在植物造景设计中融入“四季分明”的理念，以打造一年四季都能呈现丰富景观效果的园林^[5]。以下是“四季分明”植物造景的具体设计方案：

(1) 春季：突出早春花卉和嫩叶

选择花期早、耐寒的植物：哈尔滨的春天较短，但可以利用耐寒的早春花卉，如连翘、迎春花、杏花和樱花等，在温度回升的早春率先绽放，形成春天的“第一抹色彩”。

搭配萌发嫩绿的乔木和灌木：选择如柳树、丁香、黄杨等春季嫩叶显著的植物，配合草坪及地被植物的返绿，使得园区内生机盎然。

(2) 夏季：构建浓荫遮阳的休憩空间

种植乔木营造遮阳效果：哈尔滨的夏季虽然不长，但温度较高。可以种植高大的乔木，如梧桐、白桦、槐树等，形成浓密的树冠，为游客提供遮阳的空间。

选用耐热的花卉和灌木：如牡丹、芍药、绣球等色彩丰富的花卉，增加视觉吸引力，同时可以搭配紫叶小檗、红枫等叶色植物，营造色彩多样的夏日景观。

(3) 秋季：运用叶色变幻丰富景观层次

注重秋季叶色变换的树种：如枫树、银杏、黄栌等秋叶变色显著的植物，为秋季增添金黄、红色的绚丽色彩，烘托出秋高气爽的氛围。

增加观果植物：秋季也是果实成熟的时节，可以种植如山楂、海棠等果实鲜艳的植物，为景观增添秋实之美，同时也为小型鸟类提供食物。

(4) 冬季：展示冬季观赏性和耐寒特性

利用常绿针叶植物：哈尔滨冬季漫长且寒冷，常绿植物如松树、云杉、雪松等不仅能耐寒，还能在冬季为景观提供绿色。

添加冬季观枝植物：可以选择一些树枝颜色鲜艳的灌木，如红瑞木、金叶冬青等，它们的树枝在白雪映衬下显得特别醒目，增强冬季的景观效果。

搭配造景小品和灯光设计：在冬季，还可以结合植物造景设计一些灯光小品，利用冰雪反射和植物造型，增加夜间观赏性，营造出独特的北国冬季景观。

这一设计通过科学配置植物群落，使四季景观衔接自然，充分展现寒地城市园林的时序美感。

5.3 技术与智能化管理的应用

利用物联网（IoT）和智能设备进行植物生长监测和自动灌溉是现代农业技术的重要应用之一。这种系统可以实时监测植物的生长环境，提供精确的数据支持，并自动调整灌溉策略，从而优化植物的生长条件^[6]。下面是实现这一系统的一般步骤和所需的主要技术：1.土壤湿度传感器：用于测量土壤的湿度水平，以确定是否需要灌溉。2.温度和湿度传感器：监测空气温度和湿度，确保植物在适宜的环境下生长。3.光照传感器：检测植物所接收的光照强度，帮助优化光照条件或为植物提供补光。4.pH和EC传感器：监测土壤的酸碱度和电导率（代

表土壤养分)，确保土壤环境适合植物的需求。

数据采集和传输方面利用传感器实时收集土壤湿度、空气湿度、温度和光照等环境数据，并通过 IoT 设备采集这些信息。以及将传感器将数据传输到中央控制系统或云端存储。可以通过 WiFi、LoRa、Zigbee 等通信协议将数据发送到服务器，便于远程监控。

数据存储和处理方面将数据发送到云端或本地计算机进行处理和存储，并可以利用数据可视化工具展示环境变化趋势。

数据分析通过机器学习或 AI 算法分析植物的生长模式、环境需求以及最佳灌溉时间等信息。

阈值设定和智能决策根据传感器数据和植物需求，设置灌溉的湿度阈值、温度范围等。一旦土壤湿度低于设定阈值，系统自动触发灌溉。

自动灌溉系统方面：

1.灌溉系统连接自动灌溉系统可以包括水泵、阀门、喷头和水管等组件，配置与传感器和控制器连接。

2.控制系统一旦传感器数据触发灌溉需求，控制系统会自动启动水泵或阀门，开始浇水，直到湿度达到设定阈值。

3.精确控制水量通过实时监测湿度水平来控制灌溉的水量，避免过度或不足的灌溉。

可视化和远程监控方面：

1.数据可视化平台：建立数据可视化平台（如网页或手机 APP），用户可以查看植物的生长环境和土壤状况。

2.报警和通知系统：如果湿度或温度超出设定范围，系统会自动通知用户采取相应措施。

3.远程控制：用户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远程访问系统，手动控制灌溉或调整监控参数

常用技术与平台：

1.硬件：Arduino、Raspberry Pi 等微控制器。

2.传感器模块：DHT11、土壤湿度传感器、光照传感器等。

3.云平台：AWS IoT、Azure IoT、Google Cloud IoT 等云计算服务提供数据存储和处理。

4.数据分析工具：Python 或 MATLAB 用于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

5.APP 开发：利用 App Inventor、Flutter 等工具开发移动端应用，实现可视化和远程监控。

5.4 社区参与的创新模式

鼓励社区居民参与植物造景的设计和维护，不仅能美化环境，还能增强居民的环保意识和社区凝聚力^[7]。社区可以举办植物造景的设计大赛或工作坊，邀请居民共同参与设计方案，让每个人都能表达对美化环境的想法。这种活动不仅增加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也让他们感受到参与公共事务的乐趣。并且推动建设社区可设立植物认养制度，鼓励居民自愿认领某些植物的日常维护工作，使大家更关注植物的生长状况，自觉爱护公共绿化。同时，通过定期的植物护理培训和志愿活动，让居民学习基本的植物养护知识，共同维护造景效果。这样一来，居民不仅是植物景观的“欣赏者”，更是“守护者”，为建设绿色家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共同打造一个美丽、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环境。

提升市民环保意识，将植物造景融入生活，需从美化城市空间和推广环保教育入手。在公园、街道和社区布置精美的植物景观，不仅增添自然美感，还让市民感受绿色生活的益处。同时，通过环保宣传活动、社区讲座和线上线下互动，激励市民种植和维护植物，共同打造绿色、健康的生活环境，使环保观念根植于心，增强生态保护意识。

6. 结论

哈尔滨的植物造景以寒地气候和独特的地域文化为背景，展现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园林风格。由于冬季漫长寒冷，当地的植物造景注重使用耐寒植物和四季皆宜的景观设计，尤其擅长在冬季利用常绿植物、雪景造型等创造别具一格的景观。同时，哈尔滨还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元素，如俄式建筑风格的融合以及冰雪节中的植物装饰，将城市的文化内涵与景观设计完美结合。

在创新发展方面，生态可持续和城市形象提升是关键路径。引入适应当地气候的本地植物，不仅有助于减少资源消耗，还能维持本地生态平衡，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此外，通过创新植物造景设计，可以塑造哈尔滨的绿

色名片，提高城市在国内外的吸引力。

未来，哈尔滨的植物造景应向智能化管理和市民参与等方向发展。智能灌溉、实时监控等智能技术的应用，将提升植物养护的效率和精准性；而通过活动和平台，鼓励市民参与植物造景设计和维护，有助于强化市民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与实践，哈尔滨的植物造景可以在生态效益和人文魅力的双重作用下，持续推动城市的绿色发展。

参考文献:

- [1] 孙明阳, 赵彦博. 寒地城市植物景观视觉设计研究[J]. 智能城市, 2018, 4(24): 21-22.
- [2] 于冠超. 域外文化影响下的哈尔滨城市美术研究 (1898-1945) [D]. 哈尔滨: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
- [3] 陈子昱. 我国东北地区寒地冰雪景观营造与创新设计研究[J]. 上海包装, 2023(6): 93-95.
- [4] 高荣, 岳桦. 哈尔滨市城市绿地木本植物的物种多样性[J]. 贵州农业科学, 2017, 45(5): 85-89.
- [5] 石莲杰, 施煦然. 浅谈寒地城市植物景观设计[J]. 科技创新与应用, 2012(10): 69.
- [6] 林国庆. 面向城市绿化园林管理的智慧园林管理体系构建研究[J]. 价值工程, 2024, 43(36): 43-45.
- [7] 王聪儿. “认同-参与”型社区环境治理模式研究[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25.

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s of

Plant Landscaping in Harbin

Xiyuan Wang¹, Quan Zhou²

(Faculty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150080,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northernmost provincial capitals in China, Harbin exhibit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its plant landscape design, shaped by its geographical setting, climatic conditions, and cultural con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d-region landscap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of plant landscaping in Harbin and its adaptability to climatic features such as extreme winter cold and summer humidity. It further examines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 cultural elements and Russian influences in the landscape design. In response to urban ecological improvement, cultural value enhancement, and residents' recreational needs, this study propose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lig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d regions. These include diversification in the selection of native plants, four-season ornamental landscape desig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ystems, and mechanisms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rough region-specific planning of plant landscapes, Harbin can not only enhance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optimize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strengthen the city's cultural identity and attractiveness, thereby providing robust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landscaping. This study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plant landscaping of cold-region cities,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and advancement of cold-region plant landscapes in urban planning.

Keywords: Harbin; Plant Landscaping; Cold-Region Climat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国语境下《好东西》的女性叙事及其凝视话语重构

李春裔¹, Low Yong San²

(1.新余学院, 江西 新余 338004, 2.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槟榔屿 槟城 11800)

摘要: 电影《好东西》展现了中国语境下女性叙事的本土化实践, 并在三个维度上展开探索。在女性影像叙事维度, 影片以平视镜头、长镜头和去性化构图重塑观看机制, 抵抗主流电影的男性凝视结构。在女性主体叙事维度, 它通过日常场景与幽默表达凸显女性角色的能动性, 呈现从他者承认到自我认同的主体性生成。在宏观的女性叙事维度上, 作品将性别议题融入都市语境, 以温和包容的叙事路径, 在艺术性、社会批判与文化调适之间实现平衡, 从而为中国女性主义电影提供了重要范例。

关键词: 《好东西》; 反制男性凝视; 女性叙事; 主体性

基金项目: 2025 年新余学院博士启动金资助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687

进入 21 世纪, 尤其是近十年, 都市题材与女性独立叙事在中国电影中愈加突出。例如许鞍华的《女人四十》以细腻笔触描绘中年女性的生活与情感困境; 张艾嘉的《相爱相亲》关注家庭、爱情与代际关系中的女性处境。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回应了女性主体性与性别平等的议题。但与此同时, 如何在创作中兼顾理论批判性与大众接受度, 如何将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资源与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语境相结合, 仍是创作者与学者共同面对的挑战。

邵艺辉是当代中国 90 后女性导演的重要代表, 以细腻人物书写与都市日常叙事见长。《爱情神话》已展现其处理女性群像的独特风格, 而其自编自导的《好东西》(2024) 进一步深化了对性别与都市经验的探讨。剧情围绕单亲母亲王铁梅、女儿茉莉与邻居小叶展开, 通过日常互动呈现月经羞耻、情感依赖、职场压力与网络暴力等当代女性议题, 延续其生活流叙事与上海都市文化的细致再现。

本文以“凝视”与“话语”为主要分析框架, 考察影片如何在影像与声音中反制男性凝视, 并在中国都市语境中生成本土化女性主体叙事。同时将讨论其艺术表达与社会文化价值及可能的局限。文章旨在深化对《好东西》的文本理解, 并回答两项核心问题: 其一, 影片如何在影像与声音叙事中反制男性凝视? 其二, 这一实践如何在中国都市语境中生成本土化的女性话语?

一、从男性凝视到本土化女性影像叙事的理论脉络

在女性主义电影研究中, “凝视”(gaze) 与“话语”(discourse) 始终是分析性别权力结构的重要理论工具。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 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1975) 中提出“男性凝视”(male gaze) 概念, 指出主流电影工业, 尤其是在好莱坞叙事体制下, 往往以男性观众为假想的观看主体, 从而在叙事和影像构造上, 将女性塑造为被观看、被凝视的客体。^[1]随着第二、三波女性主义的发展, 学界对这一机制的批判持续深化, 不仅质疑以白人、中产、异性恋女性为代表的单一女性经验, 更强调种族、阶层、性取向与文化差异在女性影像呈现中的重要性。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明确批判了女性主义将“女性”视为一个稳定、普遍的政治主体的做法。^[2]这种转向不仅意味着在银幕上出现更多元化、立体化的女性形象, 还意味着在电影语言层面重塑观看与被观看的关系, 赋予女性角色更强的主体性与话语权。特蕾莎·德·劳雷蒂斯(Teresa de Lauretis) 于 1984 年出版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著作, 对“女性”在文化与电影中的再现方式进行了批判性探讨, 揭示了主流电影语言、叙事与视觉机制中对女性主体的规训与限制, 并进一步主张应当构建一种不再以男性主体为衡量标准的

作者简介: 李春裔(1982—), 女, 博士, 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化、传播学;

Low Yong San(1972—), 男, 博士、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海外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区域国别学。

通讯作者: 李春裔

新叙事与观看框架。^[3]

相较于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在学界与创作中的迅速发展，其在中国语境中的本土化与实践化更为复杂。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电影多以贤妻良母或民族母亲形象服务于家国叙事；新中国成立后，女性被塑造成坚韧的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建设者，强调革命主体性。^[4]改革开放后，市场化与都市文化带来更丰富的女性形象，但仍常在传统象征、妖化与无奈之间摇摆，难以摆脱父权制结构的制约。^[5]因此，尽管女性形象趋向职业化与多元化，其主体性与话语权的生成依然受到深层制度与文化机制的限制。

二、男性凝视反制下的女性影像叙事重构

劳拉·穆尔维在“男性凝视”理论中指出，主流电影的生产与接受过程中往往叠加存在摄像机凝视、叙事凝视与观众凝视三重机制，而这一机制在结构假设上倾向于默认观众为男性，由此将女性角色固定在被动、被观看的位置。这种视觉秩序不仅规训了女性在影像中的身体呈现方式，也在叙事结构与情节推进中，将女性功能化为情感线索、视觉愉悦或情节推动的媒介。在这一框架下，女性难以成为叙事的主导者与意义的生产者。

与之相对，《好东西》在叙事策略的运用上明显有意跳脱男性中心的凝视逻辑。影片并非经由男性角色的视角切入，而是直接将观众置于女性生活的内部世界，通过平等的凝视方式、开放的日常空间以及互为主体的关系建构，重新配置了观看的方向与机制^[6]。在这一结构中，王铁梅、小叶与王茉莉不仅是被观看的对象，同时也是凝视的发出者与意义的生产者，这一转向本身便构成了对父权影像机制的直接挑战。

（一）镜头语言的反性化凝视影像策略

影片在影像构图与镜头调度上有意识地回避了传统电影中普遍存在的性化凝视。劳拉·穆尔维在对“男性凝视”的批评中提出，“碎片化”呈现 (fragmented representation)，如通过腿部、胸部或背影的切入特写，会将女性身体物化为视觉愉悦的对象。^[11-12]《好东西》中几乎完全摒弃了此类影像策略，取而代之的是平视镜头 (eye-level shot)、中景与全景等具有空间完整性的构图方式，将女性身体置于日常生活的整体语境中加以呈现。例如，在王铁梅于厨房做饭的场景中，镜头保持适当距离，既展现她与生活空间的互动，又通过锅铲与热油的声音传递日常的节奏与专注。这种影像处理凸显的是劳动与生活本身的意义，而非通过局部化的身体图像刺激观众的视觉欲望。

与此同时，影片大量运用长镜头 (long shot)，进一步强化了时间流动的连续性与生活氛围的沉浸感。长镜头的叙事节奏避免了快速剪辑所带来的窥视感，使观众得以与角色共享同一时间维度，从而建立起更为平等的观看关系。这种“耐心观看”的影像策略，为观众留出了细致观察的空间，使其能够关注角色细微的表情变化、身体动作与情绪波动，而不仅停留于对外貌与身体的表层化消费。通过平视镜头与长镜头的结合，影片有效重构了观看的方向与方式，将女性形象从被动的凝视对象转化为意义的生产者与叙事的主导者。

（二）听觉主体性与女性主体叙事的重构

电影从诞生起就不断探索声音的表现力，即使默片时代，电影人也会使用各种技巧，来暗示或表达声音和听觉。^[7]电影的声音，不仅加强，而且数倍的放大影像的效果。^[8]《好东西》在叙事上显著提升了听觉在意义生产中的地位，使声音不仅是叙事辅助，更成为女性主体性的重要表达符号。影片的声音景观层次丰富：王铁梅的键盘敲击、王茉莉的鼓点、小叶的舞台歌声，皆源于日常生活，却承载着角色的情绪与心理变化。

例如，王铁梅深夜赶稿时，键盘节奏与城市微弱噪音交织，构成她的私人沉思空间；王茉莉的鼓点既体现其兴趣，也象征母女情感张力的脉动；小叶的歌声则标记其摆脱情感依附、直面自我需求的关键时刻。通过将声音与角色心理深度绑定，影片赋予听觉以主体化力量，为女性在影像叙事中争取更多发声与被聆听的空间。

更重要的是，影片通过强化非男性视角下声音的叙事功能，以听觉维度重构影像话语结构，规避了视觉霸权的规训机制，使女性经验无需依附男性目光即可获得自主表达。这一策略不仅重塑叙事的感知路径，还在文本中生成独立的“听觉主体性”，让女性的情感、欲望与思想直接进入意义生产核心，从而在视听层面对父权影像机制形成结构性挑战。这正是当代女性主体叙事的重要体现。

（三）日常化情境的凝视反制

影片中大量餐桌对话、邻里闲谈与天台交流，看似日常琐碎，却构成了重塑凝视关系的重要场域。在这些情境中，女性互动不再围绕取悦男性、争夺注意力或依赖男性评价，而是建立在情感支持、经验共享与价值共鸣的基础上。例如王铁梅与小叶在天台探讨“好东西”的标准时，她们并未将幸福等同于拥有伴侣，而是从自身经验出发，讨论自由、尊严与内心满足等价值。这一价值取向削弱了传统叙事中女性依附于男性关系的隐性逻辑，为女性之间的互认与自我认同提供了空间。

日常化叙事场景也为女性主体性的自然生成提供了条件。片中女性的互动不再作为男性叙事线的附属情节，而是构成自足、闭合的关系网络，将观众带入一种“女性观看女性”的影像实践。观看过程因而成为女性主体性不断生成与确认的空间，从影像层面对男性中心观看逻辑形成有效的松动与替代。

（四）凝视反制的文化意义

“女性意识觉醒是从被凝视过渡到反凝视的过程，女性通过对男性观照者进行反凝视的对抗和回击来满足自己反叛的渴望，实现从客体到主体的转变”。^[9]在中国语境中，《好东西》的反凝视策略并非仅是影像技术的调整，而是对深植于文化心理与性别秩序中的视觉惯性的直接挑战。传统影视长期对女性的视觉消费，既塑造了观众的观看习惯，也在无形中固化性别刻板印象。影片通过平视视角、长镜头、声音主体化与日常化场景的综合运用，为女性重新夺回影像中的时间、空间与声音主权。这不仅是对父权影像话语的抵抗，更是对观众感知方式的再塑，使女性主体性得以在本土文化结构中被“看见”。

在此意义上，影片的价值不仅在于消解男性凝视，更在于其构建了一种互为主体、去中心化的观看关系，打破传统影像中单向度、等级化的视觉权力结构，使观众与角色在情感与认知上进入更平等的互动。由此，《好东西》为中国女性主义电影提供了形式与内容融合的范例，也促使观众重新思考“谁在看”“看什么”与“如何看”，推动观看行为由被动接受走向批判性参与。

三、女性主体生成的叙事逻辑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亦是“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其著作《爱欲与文明》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武器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描绘未来文明的蓝图。^[10]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认为“爱欲”（Eros）是力比多能量。在与攻击性能量的对抗中，表现为对生命及其环境的强化、满足与统一的追求，即生命本能对死亡本能的抗衡。^[11]爱欲包涵生物层面的性冲动，更包涵一种推动人类追求自由、创造性与自我实现的生命能量。“爱欲本能越能充分实现，死亡本能的攻击性越弱；爱欲本能越被压抑则破坏欲越强，要么自毁要么仇视社会”。^[12]然而，这一生命能量在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安排与文化规训中，往往被塑造、削弱甚至异化，个体的欲望不再源自自身的真实需求，而是被外部的社会规范、权力结构与评价体系所取代，形成一种被规定的欲望。马尔库塞的爱欲论包含人本主义思想，对于当今我们重视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发展新时代的创新型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13]

根据爱欲论而言，真正的解放不仅在于摆脱外在压迫，更在于突破外部强加的欲望模式，重建基于内心真实感受与自主选择的“自我认同”，从而恢复爱欲作为生命能量的解放潜能。从此视角看，许多女性电影中的女性成长往往被规训为顺从的“贤妻良母”，体现的是在父权文化逻辑中内化的他者认同。被他者欲望的主体依赖外部承认，而爱欲主体则建立在自我认同之上。《好东西》正展示了主体如何在被他者话语塑造的欲望幻象中，重新确立属于自身的爱欲主体性。

（一）承认的转向与女性主体性构建

在《好东西》中，小叶与王铁梅的成长轨迹共同展现了从“他者承认”走向“自我认同”的主体性觉醒。此一转变不仅关乎情感与心理的成熟，也折射出当代中国都市语境下女性主体性生成的文化意涵。以小叶为例，她在与胡医生的亲密关系中呈现典型的迎合型依恋模式，为了获得对方认可，她不断修饰自我、弱化真实需求，并在冲突中习惯性自我贬低。其依赖并非性格弱点，而是源自原生家庭的情感匮乏与不稳定依附，使她成年后需要外部评价来确认自我价值。因此，胡医生的认可构成其存在感的核心支点，一旦失去便陷入深度不安。随着与王铁梅的相识，小叶在互为主体、情感平等的关系中逐渐获得安全感，并在艺术实践与日常经验中实现从外部评价转向自我确证的转变，自我认同也因此叙事中得以具象化。

与小叶相似，王铁梅在不同情境下同样面临着“他者承认”的困境。尽管她在工作与生活中展现独立与理性，但当其在网络平台发表的文章遭遇质疑与攻击时，仍不可避免地陷入动摇，反映即便具备较强自主性的女性，面对公共舆论亦难完全摆脱他者评价的影响。影片通过两位背景与性格迥异的女性经验，揭示“他者承认”在女性日常心理结构中的普遍性，并指出其对主体性构建的深层制约。

（二）女性主体生成中的倾听与跨代传递

《好东西》并未依赖说教式的对白或戏剧化的情节转折来呈现女性的觉醒，而是通过细腻的日常互动与情感互助推动角色的自我认同。王铁梅与小叶之间的友情，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动力。在面对情感挫折与生活困境时，她们相互倾听、彼此安慰，不以评判性的视角审视对方的选择，而是提供真诚的情感支持与务实的建议。这种建立在相互理解与尊重基础上的关系模式，与父权文化叙事中惯常的女性竞争构图形成鲜明对比。

王茉莉的选择尤为耐人寻味。作为影片中最年轻的女性角色，她拒绝了继续担任鼓手的机会，转而选择做观

众。这一决定表面上似乎是对舞台的退让，实则体现了她对自身兴趣与内在感受的尊重，拒绝为了迎合外部期待而勉强自己。王茉莉的抉择不仅象征着自我认同在新一代女性身上的早期萌芽，也为母亲与小叶提供了反思的镜鉴，提示女性主体性觉醒在跨世代间的潜在传递。

（三）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主体生成

在中国语境中，女性从他者承认迈向自我认同的过程，不仅是心理成熟的体现，更构成对根深蒂固父权文化的深层挑战。父权文化通过家庭、教育、职场与媒体等多重渠道，持续塑造着“合格女性”的外部标准-贤妻良母、温顺体贴、为他人着想。相较之下，自我认同意味着拒绝将这些外部标准作为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尺度，并以内在需求与真实感受作为自我认同的根基。

《好东西》在呈现这一转变时，并没有使用高强度的冲突或激进的抗争，而是通过生活化、幽默化的叙事方式，让观众在温情与笑声中接受这一观念转变。这种创作策略降低了观众的心理防御，使女性主体性觉醒的过程显得自然可信，同时也使影片的性别议题更容易渗透到主流文化中。唯有当个体的欲望回归内在、摆脱外部规训与他者评价的束缚时，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与幸福才有可能实现。“在现代文明中，爱欲受到压抑，因此人的解放，根本上是爱欲的解放。”^{[12]38}在《好东西》中，爱欲主体的生成不仅改变了角色的个人命运，也促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对既有社会规范产生质疑，并被引导去倾听、确认自身内心的真实声音。

四、女性叙事意识在中国语境中的生成与调适

中国女性电影关注的核心并非个体女性的处境本身，而是女性如何在社会结构中被看见、被理解与被正当安置。因此，当代中国女性电影的女性主义话语生成，不仅依赖主题本身，更取决于叙事策略、人物塑造与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好东西》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高度自觉的女性叙事意识：影片一方面正面回应多重女性议题，另一方面又通过温和和处理男性角色的介入方式，使叙事在中国特定社会文化土壤中找到一条可接受的本土化路径，从而在表达力度与文化调适之间取得平衡。

（一）直面女性议题的叙事策略

影片并不回避性别不平等敏感议题，而是以日常化与幽默化的方式将其自然嵌入叙事。例如，九岁的王茉莉一句“世界上半人都会流血”，以纯真视角直指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月经羞耻。相较于说教式批判，这种轻巧而机锋的表达化解了尴尬，降低了观众的接受门槛，使性别议题得以更顺畅地进入公共讨论。

影片同样呈现家庭与职场中的性别偏见，如王铁梅因单亲母亲身份在求职与写作中受到质疑。此类日常化细节虽非情节高潮，却因贴近现实而更具说服力，使观众在潜移默化中体察性别结构对个体生活的持续渗透。这一叙事策略体现出影片高度的女性叙事意识，创作者深知其发声所处的文化语境，选择以温和、细流式的方式呈现性别不平等，让议题在日常叙事中自然浮现，从而实现更有效也更具可接受度的观念传播。

（二）男性角色的反思位置

《好东西》并未将男性角色简单边缘化，而是在保留其叙事功能的同时，使其成为女性成长与反思的参照面。以王铁梅的前夫为例，他表面认同性别平等，甚至自诩为女性主义者，但在家庭互动中仍表现出潜在的控制欲与优越感，在女儿教育上试图掌握主导权，或在与王铁梅的对话中不自觉地将议题导向有利于自身的价值框架。这种“伪女性主义”展示了现实中性别平等的复杂性，即便看似支持女性的男性，也可能在潜意识层面延续父权逻辑，对女性主体性构成更隐蔽的挑战。

影片中的其他男性角色，如小马与胡医生，同样被置于反思的位置。小马在亲密关系中的轻佻姿态、对女性身体的轻率模仿，以及胡医生在人际互动中不自觉的优越性，都通过细节被揭示与解构。值得注意的是，《好东西》并未将性别关系塑造成二元对立，而是通过温和叙事引导观众认识，性别平等并非单向度的女性任务，男性同样需要自我检视与行为调整。这种平衡策略避免了极端化的性别对抗，为性别议题进入公共讨论提供了更开放与可接受的空间。

（三）中国语境下的温和叙事路径

与部分西方女性主义电影偏向激进对抗的路径不同，《好东西》选择了更温和、包容的表达方式。影片不通过强烈冲突来撕裂观众的既有认知，而是以日常化场景与幽默化表达，在情感共鸣的基础上逐步引导观众接受新的性别观念。这种“软性冲击”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尤具适应性，一方面降低了因立场对立而引发的心理防御，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影片在家庭观影与主流传播中的接受度，使性别议题得以更广泛地进入公共讨论。

这种温和路径不仅是一种传播策略，也体现了女性主义在本土语境中的文化调适。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并非强调单向度的“绝对独立”，而是倡导“独立中的互助”与“自我之上的关怀”。这一价值取向更契合中国文化中对关系

与和谐的重视,使女性主义不至于被误读为“拒绝关系”或“对抗男性”。片中女性在追求自我认同的同时,也在互相支持中寻找意义,从而呈现出兼具自主性与关系性的主体形态。

因此,《好东西》在生成女性主义话语时既保持批判性,又与文化土壤实现良好契合。这样的温和而坚定的立场,不仅提升了影片的艺术品质,也增强了性别平等观念的社会渗透力,使女性主义能够在更广泛的观众层面实现潜移默化的影响。

结语

《好东西》以细腻温润的影像语言、生活化的性别议题与直面女性议题的叙事探讨,呈现了中国语境下女性叙事的新路径。影片在影像层面建构了女性影像叙事,在叙事逻辑上呈现了女性主体叙事,在整体文化语境中探索了新的女性叙事路径。该叙事结构摒弃了对女性的理想化或牺牲化塑造,突出女性在相互承认与自我认同的互动中,达成主体性成长与情感平等的可能性。影片在形式上突破传统都市情感片的叙事惯例,在内容上通过反制男性凝视、生成本土化的女性主体叙事,为中国电影性别平等表达提供了重要范例。

影片既呈现个体摆脱外部规训、回归内心需求的过程,又凸显女性在互助、倾听与共情中维系主体性的可能性。这种价值取向既回应了中国文化对关系与和谐的重视,又融入女性主义的独立与平等诉求,形成一种温和而持续的文化变革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好东西》不仅是一部情感温润的都市女性电影,更是一种具有文化介入性的影像实践。它提醒我们,电影不能仅满足于温情的抚慰与和谐的愿景,还应具备揭示权力机制、挑战既有话语秩序、推动公共反思的能力。唯有当女性叙事能够在审美、市场与社会批判之间取得平衡,它才可能在中国影像史与社会变革进程中留下真正深刻而持久的印记。

参考文献:

- [1] Mulvey L.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J]. Screen, 1975, 16(3): 6-18.
- [2] Butler J.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3-8.
- [3] De Lauretis T. Alice Doesn't: Feminism, Semiotics, Cinema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8
- [4] Wang L. Chinese Women's Cinema: Transnational Context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17-18.
- [5] 张晨阳.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中的性别图景[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133.
- [6] 黄家骏.超越凝视、爱欲主体与话语自觉-论电影《好东西》中的新女性神话建构[J].影视美学, 2025(5): 129-132.
- [7] 张晋辉. 隐喻与共鸣:电影声音的吸引力[J]. 当代电影, 2022(10):144-149.
- [8][美] Louis Giannetti. 认识电影[M]. 焦雄屏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8: 18.
- [9] 陈宜各.凝视与反凝视-《露琪亚,露琪亚》中的女性形象书写[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4) : 80-85.
- [10] 李赴军.马尔库塞及其爱欲解放论[J].湖南社会科学,2004(3):38-39.
- [11] 马尔库塞 H. 爱欲与文明[M]. 黄勇、薛民,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173-183.
- [12] 李晓林,居忆然.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与福柯《疯癫与文明》比较研究-以生命哲学为视域[J].贵州社会科学,2023(4):52-58.
- [13] 周鑫鑫. 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说[J]. 时代人物,2020(1):158-160.

Female Narrative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Gaze Discourse in *Her Story*: A Study with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Li Chunyi¹, Low Yong San²

(¹Xinyu University, Xinyu China; ²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Penang Malaysia)

Abstract: The film *Her Story* exemplifies the localized articulation of female narratives with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explored across three distinct levels. On the level of visual storytelling, the film challenges the dominant male gaze of mainstream cinema by employing eye-level framing, long takes, and de-sexualized compositions, thereby reshaping the viewer's perspective. In terms of narrative subjectivity, it emphasizes the agency of female characters through depictions of everyday life and subtle humor, portraying a progression from external recognition to self-affirmed identity. At a broader narrative level, the film embeds gender discourse within the urban context, adopting a gentle and inclusive narrative approach that balances artistic expression, social critique, and cultural negotiation. In doing so, it offers a significant model for feminist filmmak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Her Story*; counter-male gaze; female narrative; subjectivity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野下主旋律影视剧反类型化叙事与美育价值研究

陈矿¹

(1.成都大学 中国-东盟艺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八佰》作为新主流电影的代表性作品,其上映不仅标志着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市场的复苏,更以共同体美学为内核,通过反类型化叙事突破了传统战争题材影片的创作范式。该片取材于淞沪会战中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真实历史,在战争群像塑造、场景还原、意象表达与战争反思等方面形成独特艺术特色,既实现了宏大叙事与微型叙事的平衡,又通过多元表达强化了观众的国族认同与情感共鸣。本文以共同体美学为理论视角,结合新主流电影的创作特质,从反类型化叙事的人物塑造、技术美学、隐喻表达及战争反思四个维度,探析影片如何通过艺术创新传递主流价值,进而阐释其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爱国精神、塑造正确历史观等方面的美育价值,为同类型主旋律影视剧的创作提供新路径。

关键词:共同体美学;主旋律电影;反类型化叙事;电影美育价值

基金项目:2024年度成都大学“四川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资助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野下主旋律影视剧培根铸魂与美育价值研究”(项目编号:CDZL2024012)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719

影片《八佰》于2020年8月21日上映,成功地收获了31.1亿票房,成为了后疫情时代下中国电影市场复苏的标志。该片取材自真实历史事件,在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一支只有四百余人的军队为了威慑日军而谎称有八百余人。为了在国际会谈上争取到更多的谈判的砝码,士兵们展开了四天四夜的浴血奋战的故事。影片一经上映,便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与讨论。抛开对历史事件改编的质疑,或是对该片政治立场模糊的讨论。无疑,《八佰》作为一部战争题材的商业电影,无论在作者化的诗意抒写、视听语言上的高品质追求以及反套路化的战争主题的表达上,都有别于中国以往的同类型题材战争电影。本文将针对《八佰》在战争群像上的塑造、战争场景上的还原、战争意象上的表达以及对战争之殇的深沉思考展开深入分析,并以该电影为例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美学视角下拓展主旋律电影的美育价值。

一、反类型化叙事的人物塑造:共同体美学的共情建构

2015年9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曾提到:“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无论是直接参战还是后方支援,所有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人们,都是抗战英雄,都是民族英雄。”《八佰》作为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历史片,宏大的叙事主题下,包裹的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导演管虎被问及为何电影名字刻意用“佰”字,而不用“百”字时,他说原因很简单,因为“佰”字中有个“人”。影片中对人物的关注十分深刻,描绘得十分细腻,通过散点叙事将真实的战争众生相鲜活地刻画了出来。其中可以将影片中的人物大致分为五类:四行仓库里英勇奋战的士兵;四行仓库里贪生怕死的逃兵;英国租界里的爱国分子;英国租界里发国难财的投机分子;飞艇上的国际观察员。

《八佰》编剧葛瑞在接受采访时就提到:故事写的不是人到英雄的过程,是“动物”到人的过程。四行仓库

作者简介:陈矿(1980—),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戏剧影视文学、艺术美育。

里英勇奋战的士兵以 88 师 524 团团团长谢晋元和副团长陈树生为典型，其中以陈树生为首的重人在临死前只留下籍贯与姓名，身体捆绑炸药，跳下仓库抵制敌人的进攻，尽显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影片中由欧豪饰演的端午一角，是本文中人物弧光最为明显的一角。在刚被收编进 88 师时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多次想随同老算盘等人一起出逃，但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残酷却热血的事件后唤起了内心的正义感与担当。在仓库顶楼直面日军的袭击，用一场具有仪式感的牺牲完成了从“小我”式的逃兵向“大我”式英雄的跨越。英国租界里的爱国分子有童子军杨慧敏，偷渡苏州河为军队舍命送旗，这也正体现出她行的三指军礼之意：对国家尽忠、对社会尽责、对自己要求健全。赌场管事的刀子挺身而出，按下生死状后拼尽最后一口气送电话线到桥对岸。当然，有光的地方就有黑暗。影片除了对小人物身上的闪光点进行细致刻画外，同时也对战争下的人性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影片上映前发布的人物海报中，将四行仓库里贪生怕死的逃兵老算盘形容为猫，审时度势、趋利避害、聪明圆滑；把姜武饰演的老铁形容为狗，怯懦自私、虚张声势；把王千源饰演的羊拐形容为狼，老兵油子、狼戾冷漠。同样在英国租界里，也有把战争当成游戏而借此发国难财的投机分子，有为日英双方传递消息的卖国贼记者、有想着以“日军三小时能否拿下四行仓库”而下赌注的百姓们。除此之外，影片中刻画了飞艇上的国际观察员，尽管其戏份和台词并不多，但每次在关键时刻以上帝视角出现，评判着这场战争的局势，且推动着剧情的发展。

在影片《八佰》中，导演与编剧正是想借着民族大难下的众生相，描绘出战争的残酷以及人性的复杂。同时，也通过群像化的人物弧光的变化，展现出战争对人的正面影响（如端午、小湖北），以及客观承认战争无法改变的人性以及劣根性（如老算盘）。这种反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恰恰践行了共同体美学“个人—集体—国家”的递进表达脉络。影片通过展现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个体在战争中的选择与成长，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内在逻辑——正是无数普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觉醒与坚守，共同铸就了抗战胜利的丰碑。这种叙事方式既避免了主流价值的生硬灌输，又通过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的绑定，让观众在共情中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实现了美育价值的初步传递。

二、反类型化叙事的技术美学：新主流电影的产业升级与沉浸体验

尹鸿教授在《电影的技术美学：变与不变》中提到：“电影是商业、艺术、技术之间的融合。”科技的发展也带动了电影制作的进步，《八佰》依托于先进的技术，在视听语言上的精益求精，使其成为了近年来华语影片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本片的摄影指导是拍摄过《可可西里》、《南京！南京！》以及《妖猫传》的曹郁。曹郁在《八佰》的前期创作环节中，参考了大量的毕加索蓝色时期的画，力图打造出透明细腻、反差不强的画面风格由此产生出一种诗化的效果。

为了获得真实直观的拍摄效果，影片 1:1 高度还原了四行仓库的场景，搭建了 68 幢建筑物，甚至人工挖了一条两百米长的苏州河，拍摄场景用了两千多盏灯，电线长达五十多公里。除了在场景上力求真实外，同时《八佰》是全球第三部、亚洲首部 IMAX 影片。全片采用 ALEXA IMAX 摄影机进行拍摄，拍摄画面相比传统摄影机更具层次感，拥有更高的清晰度。但同时景深变浅也对摄影和演员的演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 IMAX 摄影机拍摄既容纳了更为宏观的场景外，同时能更加精确地捕捉到微观的细节。

四行仓库保卫战由于作战空间的独特性，也成为了世界战争史上难得一见的一次战斗。通过苏州河分隔成的两个世界，一边是暂时安全、夜夜歌舞升平的英国租借，另一边是时刻危险、人心不安的四行仓库，有种“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感。在对两种场景的处理上也用了不同的影调来暗示出不同空间中的状况。晚上的英国租借内，随处可见的是五颜六色闪烁的广告牌、明亮欢快的戏台子等，画面的饱和度较高且整体影调属于高调，体现出一种朦胧、神秘、如痴如醉的诗化状态。而在白天的英国租借中，整体的色彩基调是偏白的冷色系，暗含了当一切浮华褪去后的空洞与赤裸裸。在描绘河对岸的四行仓库时，画面整体偏灰，暗示出了仓库的状况与结局。两岸场景的对立以及视角的互换，同时也呈现出一种“看”与“被看”的游戏感。

影片除了在摄影上的精益求精之外，在声音、声画结合方面都十分讲究。影片中被收编的杂牌军来自五湖四海，角色的方言也严格遵从此人物设定，包含了上海话、湖北话、山东话以及四川话等，力求在人物塑造的细节上贴近史实，同时也激起并强化了观众的心理认同。除此之外，影片中对于环境音响的处理也十分细致。例如，影片开场部分在描绘繁华却又带着些许混乱的英国租界中，通过一个长镜头展现的淋漓尽致，随着镜头从河边到

包子铺的移动,环境声也在发生着巧妙的变化。将租界内人民的担忧、当前的局势状况、租界的生活场景一览无余。影片对战争场景中的环境音响的传达也十分精准,可以听到子弹从耳边划过的声音、炸弹爆炸后耳朵里的嗡嗡声、血液低落到地上的滴答声、短促焦急的喘气声。通过这些环境声,增强了观众的观影沉浸式体验。

三、战争意象的多模态隐喻表达:共同体意识的符号建构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将隐喻性界定为:表面的故事总是含有另外一个隐秘的意义。隐喻作为一种修辞,利用人们注意、感知、联想以及理解等审美心理,借助事物相近或相反的特点而产生独特的映射与引申。导演管虎热衷于在影片中加入隐喻性的表达来激发观众联想、丰富影片内涵以及深化电影主题。在同样以抗战为时代背景的《斗牛》中,通过对牛的隐喻来探讨战争的本质。在《老炮儿》中被禁锢的鸵鸟隐喻着原始冲动与现代文明的碰撞。在《八佰》中,管虎继续坚持了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将作者化的表意渗入影片中,同时通过动物、空间以及梦境完成了对影片的多重隐喻。

(一) 动物隐喻:共同体精神的具象化

索绪尔的电影符号学理论中提出了想象的“能指”与“所指”,“能指”代表了声音和形象,“所指”则是声音和形象反映出的事物。电影中的每个事物、每个镜头都有独特的意义。正如马赛尔·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中认为电影画面“是一种具有含义的感知现实”。影片《八佰》通过各种符号化意象的隐喻赋予了电影更深层次的含义。

影片中白马出现了多次,且每次出场的含义也略有不同,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这三次。第一次:老算盘误将白马放出,白马被惊动后四处乱跑。出现在危机四伏的四行仓库中的纯洁白马隐喻了出于种种原因而被迫投身于战场的文职人员老算盘、乡下人端午和小湖北。他们都是毫无任何作战经验甚至不敢开枪杀敌的平民百姓,却被放入了偌大的残酷战场中。第二次:白马在交战中逃出仓库后又毫发未伤的返回了四行仓库,谢晋元骑着白马与日本军官进行了场暗流涌动的谈判。此时的白马,更像是仓库当中以小湖北、羊拐、老铁为代表的畏战的一批人,在见证了诸多弟兄牺牲、见证了战争的残酷后心态上的变化,以一种更加积极无畏的心态面对战争、面对死亡。第三次:结尾处白马在一片废墟之中一跃而出,隐喻着一种希望,与后一个升镜头将场景转至现代都市化的上海。且最后一个镜头的白马与影片开头老鼠钻进地洞里的镜头形成一种巧妙的呼应,只有团结一致、英勇抗战才能换来美好的生活。

(二) 空间隐喻:共同体认同的觉醒

由苏州河分隔出的四行仓库和英国租界,在不同的空间中所隐喻出来的含义也有所不同。同时,在对两个空间的描绘中也利用了对比蒙太奇突显其隐喻含义。正如苏联蒙太奇学派的代表人物爱森斯坦曾强调:蒙太奇不是镜头内部的含义,而是镜头与镜头之间的关系。影片的内容、声音、色彩、景别、光线等电影元素可以通过对比而产生出某种特定的情绪和内容。

尼采曾经说过: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影片无时无刻不在向观众传达出,隔着一条苏州河隔着的却是生与死,通过苏州河两岸的“看”与“被看”体现。影片开头,当小湖北感叹到租界那边真好看时,谢晋元说:“那边是天堂,这边是地狱”。电影的色调在表现四行仓库时用的是冷色调,呈现出一种战争的压抑和紧张的氛围;在表现租界繁华热闹时用的则是高饱和的暖色调,呈现出来的画面还略带光晕,或许这就是四行仓库中的士兵们眼里代表美好、代表欲望、代表暂时安全的租界。

(三) 梦境隐喻:共同体记忆的传承

弗洛伊德说:“我们发现我们有两种潜意识:一种是潜伏的但能成为有意识的;另一种是被压抑的是不能成为有意识的。”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共同构成了人们精神世界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在电影史上,上世纪2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超现实主义电影中,就强调无理性行为的真实性、不合逻辑的潜意识活动,力求探索人类潜意识的世界。

人的梦是无意识的反映,人的无意识冲动是真正的致梦因素。影片《八佰》中两处梦境的插入展现了小湖北

无意识的世界。第一处是小湖北隔着苏州河遥望对岸歌舞升平的场景后，不知不觉的睡着了，梦里是赵子龙为了救国护主而单枪匹马面对曹操大军。数千年时光流逝，卫国之魂却依然依然在中华大地上绵延生根，变得是时代，不变的是气节。赵子龙一人面对大军的临危不惧，正如四行仓库里数百士兵面对日军的枪林弹雨的坚守与豪气。第二处的梦境是端午为了护旗而中枪牺牲后，难过的小湖北趴在窗户上又梦到与上次梦境相似的场面。而当运动镜头从身骑白马的人物背面摇至正面时，骑着白马的人物竟是端午，长啸一声边向着前方的敌军冲去。意识即自觉，小湖北在白天时感知着外界现实环境和刺激，直到夜晚，受到意识和前意识压抑下的潜意识开始活动，反映了人物内心最原始、最本能、最深层的内心力量。

四、对战争之殇的深沉思考：美育价值的升华与共同体意识的培育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上曾提到：“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人类文明史在某种程度上讲，确乎离不开战争的阴影，战争史在构架人类文明发展和家国延续的层面上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电影取材于生活，纵观海内外的电影宝库，有许许多多的描绘战争的电影。尽管同以战争作为电影题材，但在立意和取材上侧重却有所不同：有描绘正面战场的《拯救大兵瑞恩》，有描绘敌后战场的《地道战》，有以儿童视角来描绘战争的《乔乔的奇异幻想》和《穿着条纹睡衣的男孩》，有描绘战后对人的异化影响的《广岛之恋》。我们以怎样的视点看待历史，也代表了我们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未来。

《八佰》不同于以往战争片公式化地描绘对战争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人物，并花大量笔墨将其刻画为颇具英雄色彩的象征性符号，也不同于以往战争片中习惯性地用煽情化的牺牲、套路化的叙事来赚取观众的眼泪和票房。《八佰》中没有完全高大上的扁平化英雄人物，尽是不得不硬着头皮面对现状的士兵。影片中四行仓库里有厌战的老兵、有被迫加入的文职人员、有被骗至战场来的乡下人，他们对于战争恐惧，对于死亡惧怕，甚至连对日本人开枪的勇气也没有。正是这样的一些人，在目睹了陈树生为首的士兵身捆炸药壮烈牺牲的场面、目睹了为了使旗帜不倒众人坚守的场面，进而完成了人物弧光的转变，更加积极无畏地面对战争的残酷，更加淡然地接受牺牲与死亡。影片一反套路化的情节，在对老算盘这个人物的刻画上侧面的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和战争的残酷，在面对一系列后正面交锋后，非但没有像老铁、端午等人那样燃起爱国之心，反倒更加迫切地想要逃离这象征死亡的四行仓库。面对战争、面对死亡、面对诱惑，人性使然，就会有死重如泰山的壮士就有死轻如鸿毛的逃兵。也正是在逃兵与壮士的人物动机的冲突之下，反衬出了对民族英雄壮烈牺牲的赞美与歌颂。

影片的结尾处，黄晓明扮演的特派员所说“战争背后都是政治。”根据史料记载，这次的战争更多的是当时的政府为了在九国公约会谈上争取谈判的砝码，故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在空中观察事态发展的飞艇，也暗含此意。一边是政治高层对战争的偏颇之见，一边是底层士兵对战争的殊死抵抗。当租借中的百姓望着河对岸的士兵在抛头颅、洒热血后，借姚晨饰演的何香凝说出了“国人皆如此，倭寇何敢。”这场战役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在精神上却胜利了。影片没有强行对这场战役直接的下定义，但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无声胜有声，拍摄的四行仓库通过一个升镜头拉远，四行仓库遗迹旁已满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人民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诚然，正是一代代人的英勇顽抗，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今天的美好生活。最后的这个镜头或许就是对谢晋元那句“我们的抵抗真的没有意义？”的回答。

管虎导演风格化地解构了传统的战争题材，建构起了战争电影“反类型化”的艺术体系。尽管《八佰》被诟病其故事情节虎头蛇尾、对历史事件的还原有待商榷。但《八佰》在战争群像上的塑造上，摒弃了过往同类型题材影片中执着于对英雄人物的聚焦。在战争场景的还原上，充分尊重历史、客观展现史实。在战争意象的表达上，通过风格化的隐喻与象征，丰富了影片内涵。在对战争之殇的反思上，重构了历史记忆、增强国民爱国情绪。无疑，影片《八佰》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反类型化”战争电影，同时也为战争题材影片的后续创作提供了新路径。

五、结语

作为新主流电影的标杆之作，《八佰》以共同体美学为理论内核，通过反类型化叙事实现了艺术创新与价值传递的统一。在人物塑造上，以多元群像构建共情回路，让观众在个体命运中看到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在技术美

学上,以工业级制作打造沉浸体验,让历史教育更具感染力;在隐喻表达上,以多模态符号建构共同体意识,深化美育价值的文化内涵;在战争反思上,以理性视角还原历史真相,引导观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与价值观。

《八佰》的成功证明,主旋律影视剧的美育价值并非通过生硬说教实现,而是要以共同体美学为指导,在尊重艺术规律与观众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反类型化的创新表达,让主流价值自然融入叙事之中。未来,主旋律影视剧应继续坚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导向,借鉴新主流电影的创作经验,在历史题材中挖掘人性温度,在艺术创新中传递主流价值,让观众在审美体验中培育爱国情怀、强化民族认同,为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 [1]常贵翔.电影史视角下新主流电影的美学走向与时代阐释[J].电影评介,2024,(07):56-61.
- [2]周营,辛赫.电影叙事中动物隐喻的美学阐释——以管虎电影为例[J].电影文学,2021(18):74-77.
- [3]彭敏,方江南.略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无意识”理论[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9,21(07):110-111.
- [4]黄德泉.论电影的叙事空间[J].电影艺术,2005(03):18-24.
- [5]周斌.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美学的新变革与新拓展[J].南方文坛,2025,(02):43-58+81.
- [6]李国聪,饶曙光.共同体美学与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J].民族艺术研究,2025,38(01):36-42.
- [7]黄文杰,黄叶蕊.新时代“崇高美”的银幕阐释——以新主流电影为中心[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2(01):50-62.
- [8]秦兰珺.“主旋律”和“多样化”如何更好地共生共荣?[J].文艺理论与批评,2024,(05):32-41.
- [9]周国翠.新文化消费场景下主旋律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探究[J].电影文学,2024,(02):110-113.
- [10]张建珍,吴海清.世界秩序变迁中的抗战电影叙事[J].电影艺术,2025,(05):3-9.

Research on the Anti-Typification Narrative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Value of Mainstream TV Dramas and Fil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hen Kuang¹

¹College of Chinese& ASEAN Arts,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6, China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the new mainstream film industry, the release of "The Eight Hundred" not only marks the recovery of the Chinese film market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but also, with the core of community aesthetics, breaks through the creative paradigm of traditional war-themed films through anti-typification narrative. The film is based on the true history of the defense of the Four Banks Warehouse during the Battle of Shanghai. It has developed unique artistic features in terms of the portrayal of war groups, scene restoration, imagery expression and war reflection. It not only achieves a balance between grand and micro-narratives, but also strengthens the audience's national identity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through diverse expressions. This article,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aesthetics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mainstream films, explores how films convey mainstream values through artistic innovation from four dimensions: character shaping in anti-typified narrative, technical aesthetics, metaphorical expression, and war reflection. It then explains its aesthetic education value in cultiv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promoting patriotism, and shaping a correct view of history. Provide new paths for the creation of mainstream TV dramas and films of the same type.

Keywords: Community aesthetics; Mainstream films; Anti-typification narrative;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value of films

北魏神龟三年（520年）李僧智等造佛石像碑研究

王颖

（上海立达学院，上海 201600）

摘要：纪年造像碑作为佛教造像研究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大多学者对国内造像碑研究较多，对流失海外的造像碑研究较少，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北魏神龟三年李僧智等造佛石像碑，具有极高的造像研究和史料价值，但缺少专项研究。本文通过铭文考释、造像内容和风格解析，发现此碑出于山西吉县，建造年代为北魏神龟三年，造像主题有上下生弥勒、释迦牟尼说法、维摩文殊对坐、思惟太子，造像整体风格继承北魏云冈石窟，混有南朝遗风。

关键词：北魏造像碑；佛教造像；造像风格；山西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1725

李僧智等造佛石像碑（以下简称李僧智造像碑）目前收藏于英国伦敦的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石灰岩材质，高173.4厘米，原出自山西省，本人实地考察发现其造型独特，四面造像，其中有三面铭刻文字，外型为纵深偏厚的长方体。此前有少数学者在研究中国北方造像碑中铭文的部分功能时会对此碑有所提到，如莫磊《5至8世纪中国的涅槃图像研究》^[2]、胡春涛《山西五至八世纪造像碑的图像志研究》^[3]、陈婷婷《移动的佛像：汉地佛教美术中造像形式的选择及宗教仪式》^[4]、王静芬《中国石碑——一种象征形式在佛教传入之前与之后的运用》^[5]、张保珍《半跏思惟像研究》^[6]，但均未对铭文、造像内容及风格、建造地点做详细阐述，此外该碑的名称和具体时间年号在不同文章和图录中各不相同且不符合命名规范，故本文将从这些方面展开详尽研究。

一、铭文考释

碑阳下部图像左边缘刻“文殊师利西自问□□□□□□□”（如图1）下部图像右侧所刻文字漫漶不清，碑阳最底部刻满造像记（如图2、图3），通过现场考证文字和内容，结合前人著录，将造像记断句如下：神龟三年岁次庚子五月□□□/夫岭宗冲妙/非言像无以表其真/至觉渊凝/非影迹莫由照其相/故祇桓方丈/神构于西方/岭龙香花/遗芬于塞外/所以济此流海/津梁彼岸/邑主维那李僧智王阿全等/悟生灭之无常/知求静之可依/故割减家珍/远雇名匠/采昆山之美石/雕妙圣之真容/前后左右/四面诸佛/卅二相思唯/念一树在村落之前/端立九路之侧/行途者不纾步而具瞻景容/息肩者不曲径而□敬神像/道俗移心/缙素敬目/缘此微功/愿皇帝陛下国祚永隆/四海清安/次愿邑义之徒/亡者生天/见在安隐/三途六趣/普同斯愿/妙哉冲量□体玉质/显相八十/凝然果一/□应开津/镂容石出/三有悟朗/号曰惠日/巍巍慈氏/显应著阁/形无定方/三界莫遮/亦名太子/亦名达孛穆/独坐道树/号曰释迦/双林归真/邈也千岭/道俗迷正/沈沦慨冥/□季李知/刊石开形/影建显饰/万代流馨。

作者简介：王颖（1995—），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艺术史、视觉设计；

通讯作者：王颖

^[2] 莫磊. 5至8世纪中国的涅槃图像研究[D]. 东南大学, 2015: 59.

^[3] 胡春涛. 山西五至八世纪造像碑的图像志研究[M].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7: 28-29.

^[4] 陈婷婷. 移动的佛像: 汉地佛教美术中造像形式的选择及宗教仪式[D]. 南京艺术学院, 2018: 30.

^[5] 王静芬. 中国石碑: 一种象征形式在佛教传入之前与之后的运用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133.

^[6] 张保珍. 半跏思惟像研究[D]. 南京艺术学院, 2020: 167.



图1 碑阳下层龕文字



图2 碑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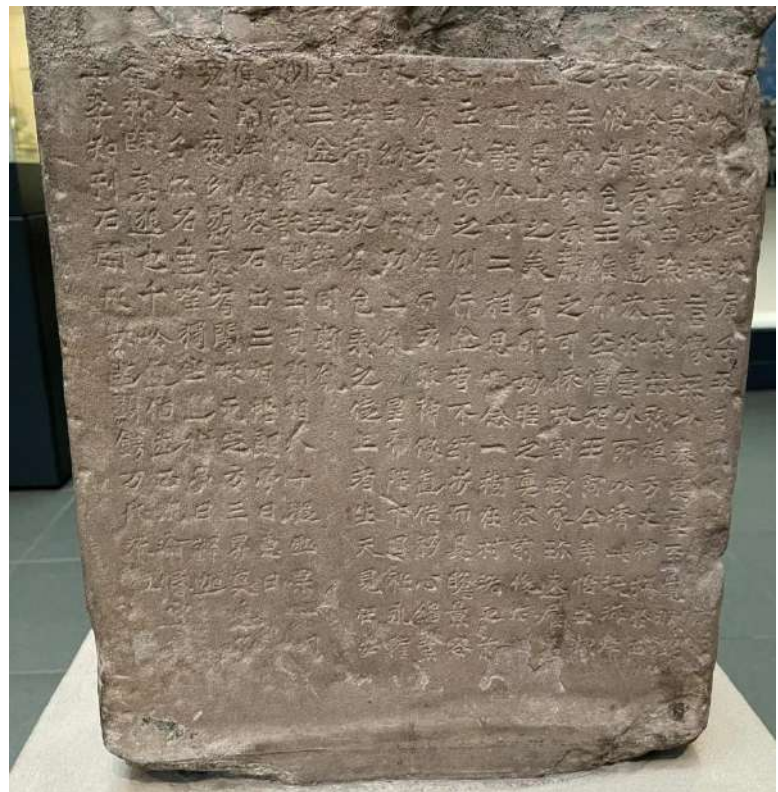


图3 碑阳底部造像记

据此可知，此碑建造时间为北魏神龟三年五月，即公元520年，馆藏单位与有些学者将此碑定名为正光元年，是错误的，因北魏孝明帝神龟三年(520)七月，领军将军元叉发动政变，改元正光。可知此碑建造在正光年号出现之前。再者，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将此碑命名为“BUDDHIST VOTIVE STELE”，翻译过来即“佛教徒祈

愿碑”，还有学者将其命名为“四面像柱”^[1]、“李僧智王阿全合邑造像碑”^[2]。但按照造像碑命名规范，碑名应体现质、出资建造情况、造像属性。“佛教义邑，是由一位乃至数位僧人发起，领导俗人信徒组织而成的，或是由在家信徒主动组织信众，再邀请僧人作为其组织之指导者的佛教信仰团体。”^[3]此碑造像记中出现了“邑主”、“维那”、“主簿”且并无其他宗教头衔或尊称，可知此碑是佛教属性。按照“邑主为义邑内负总责者，都维那、维那为义邑中的副首领。有邑主的义邑内，大多由邑主负总责”^[4]。据铭文显示，此碑由26位佛教信众合资建造，碑身三面均有出资造像者姓名，李僧智和王阿全在碑文中是邑主维那，代表两位负责总体统筹建造工作，只以二人名称为造像名称主体欠妥，故本文将此碑命名为“李僧智等造佛石像碑”。

根据发愿文内容可知，信众在该碑造佛像主要为了表达拜佛心诚，觉得生死无常，通过各家出富资，雇佣远处的名匠，选用好石料，在碑身四面均雕刻佛像，将石碑立在交叉路口侧边，方便往来的行人敬拜瞻仰佛像，一是期望皇帝和国家永远昌盛，各处平安，二是期望当地信众或者家族成员能够死后升天。接着描述造像内容的题材为释迦牟尼、弥勒、释迦牟尼成佛前的太子身份。

碑身左侧面第三层佛龕旁题有“定阳郡主簿杨采喜”（如图4、图5），根据文献记载，北魏时期定阳郡为现在的山西省临汾市吉县^[5]，此碑采用义邑方式筹资建造，说明供养人之间物理距离很近，且从造像风格上来看，山西临汾曾多次出土北魏造像碑，最近翼城县隆化镇新出土的造像碑上一铺三尊的造像形态与此碑非常相似，故此碑应出自山西吉县。龕右下方刻“邑主李僧智□□□□□/邑主/大像主”。

碑身右侧面中层龕两侧和碑底均刻有供养人姓名（如图6、图7）。碑阴无文字（如图8、图9）。



图4 碑身左侧面铭文图



图5 碑身左侧面图像

^[1] 星云法师.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 10 雕塑 1.[M].台湾: 佛光山宗委会, 2013: 308.

^[2] 金申. 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珍品纪年图鉴[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 59.

^[3] 刘淑芬.五到六世纪华北乡村的佛教信仰[M]. 北京: 中华书局,2009: 3649—3695.

^[4] 郝春文.专门从事佛教活动的民间团体及其与佛教的关系[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114.

^[5] 历史上的定阳有三个时期分属不同地点，一是北魏孝昌年设，在今介休市；二是东魏兴和四年(542)置，隋开皇初年废。故治在今临汾市；三是北魏延兴四年设，在今天的山西吉县。唯一时间符合。“北魏延兴四年(474年)置，治所在定阳县(今山西吉县)。隋开皇初废。”(施丁,沈志华主编;陈东林,和 副主编.资治通鉴大辞典上编.[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 664.)《魏书·地形志》汾州:“定阳郡,旧属东雍州,延兴四年分属焉。”《隋书·地理志》文城郡:“吉昌,后魏曰定阳县,并置定阳郡,开皇初郡废。”《元和郡县志》慈州:吉昌县,“后魏孝文帝于今州置定阳郡,并置定阳县。会有河西定阳胡人渡河居县此,因以为名”。



图 6 碑身右侧面



图 7 碑身右侧面铭文图



图 8 碑阴上半部



图 9 碑阴下半部

二、造像内容和风格考

碑的顶部为四螭首相交，在碑阳和碑阴上部分别形成拱形龕，螭身光滑无装饰纹样，碑阳首龕内为一佛二弟子立像组合，三者身后均有火苗状背光，向碑里弯曲，身体腹部向前凸起，主尊左手施与愿印，磨光肉髻，阴线刻脸部五官，头后为双层凸莲瓣头光，内着僧祇支，腰部系带，着褒衣博带式佛装，在云冈石窟第6窟东壁立佛像的基础上服装更加贴合身体，肩部稍窄，有南朝时期清瘦之感，右手施无畏印，赤足立于莲蓬状台基，下接双勾纹覆莲。二弟子身体向主尊微侧，服装贴体，下垂边外展，赤足立于莲蓬状台基，下接双勾纹双层覆莲，一弟子双手合十，另一弟子似手持物，衣带有飘扬之动感。中龕为一佛二胁侍组合，当表现释迦牟尼说法场景，头光背光与上龕相同，两胁侍侧面几乎呈90度垂直于碑面，上方两组飞天俯仰交错，动感十足，主尊面部已毁，结跏趺坐，手势同上龕，内着僧祇支，佛装为双层袈裟，薄衣贴体，衣襞覆坛，衣襞两侧各有一位引者，主尊裙边为分界线，下接维摩诘经变中的《问疾品》，即维摩与文殊对坐说法，上有天女飞向小人举起的香炉，下为5排听众，阴线刻画，脸部方向不一，最下缘有透视感，左为手持如意的文殊菩萨和二随侍，右为手持麈尾的维摩诘和听众。

碑阴上龕为站立的一佛二菩萨，均有火苗形背光，主尊头部已损毁，服装与碑阳上龕相同，但较扁平，二菩萨脸部朝前，腹部向主尊倾斜，颇有婀娜之感，头戴缯带呈现90度弯折下垂，身披帔带，赤足站立，无台基。下龕为一菩萨二力士，均有火苗形背光，主尊头戴缯带，着褒衣博带式佛装，赤脚倚座于台基上，双脚各踩一双层莲花，两旁的力士，头部磨光，额前有皱纹，面部呈怒目之感。结合碑阳造像记，此龕题材当为弥勒，装扮上亦菩萨亦佛的双重身份，对应上生和下生信仰，称其“上下生弥勒”，呼应了造像记中所求，死后升天，还能福泽后世。

碑左侧面从上至下三个龕分别表现，结跏趺坐佛像、菩萨装倚坐弥勒像、思惟太子像。碑右侧面从上至下三个龕分别表现，结跏趺坐佛像、倚坐佛像、思惟太子像。这种对称式布局与造像记“卅二相思唯”相呼应。

参考文献：

- [1] 张圣尧.北魏僧人及其管理考述[D].吉林大学,2020:43-55.
- [2] 郎保利,杨林中.山西沁源隋代韩贵和墓[J].文物,2003,(08):37-43.
- [3] 公维章.《隋诸葛子恒等一百人平陈造像碑》出土地及相关问题考察[J].泰山学院学报,2025,47(05):87-94.
- [4] 武夏,金智铉,马楠,等.山西屯留石窟及摩崖造像调查简报[J].文物季刊,2023,(02):53-63+91.
- [5] 胡春涛.山西造像碑及其风格脉络[J].文物世界,2017,(03):29-34.

A Study on the Buddha Stone Steles Created by Li Sengzhi and Others in the Third Year of the Shengui Era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520 AD)

Wang Ying

(Shanghai Lida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t statues, chronological steles have increasingly garnered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Most scholars have focused more on domestic steles while researching those lost overseas is relatively scarce. The Buddhist stone steles of Li Sengzhi and others from the third year of the Shengui era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collected by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hold significant value in statue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yet they lack specialized research.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inscriptions, as well as the analysis of statue content and style, this paper discovers that this stele originates from Jixian County, Shanxi Province, and was constructed in the third year of the Shengui era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statue themes include the Upper and Lower Maitreya, the Buddha's teaching, the Vimalakirti and Manjusri sitting together, and the contemplative prince. The overall style of the statue inherits the Yungang Grottoes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while also incorporating elements from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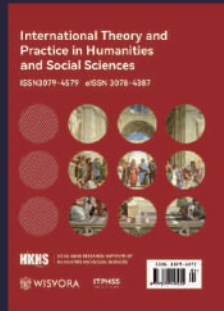
Keywords: Northern Wei Dynasty statue steles; Buddhist statues; Statue style; Shanxi



WISVORA

WISVORA 出版社：专注于学术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编辑、论文出版和国际索引、期刊创办、期刊托管等服务，增强学术研究的全球传播和影响力。

www.wisvora.com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是由香港人文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学术期刊，致力于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本刊重点关注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旨在探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与共享。作为一份面向全球中文学术界的專業期刊，本刊倡导跨学科、跨文化视角的学术探讨，为学术界和实践领域之间搭建桥梁，推动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与应用。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电子出版 ISSN 3078-4387



学术赠阅

权责声明

期刊所刊载的评论、意见、观点等均出自文章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本出版社的观点或看法。对于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内引用材料给任何个人、机构、及其财产所带来的任何损失及伤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郑重声明，本出版社的出版业务，不构成对任何产品商业性能的保证，也不表示本社已承认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内容适用于某特定用途。如有疑问，请寻找专业人士协助。